

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

ZHONGGUOGONGCHANDANGKOU SHUSHILIAOCONGSHU

■ 第6卷(下)

编委会主任 欧阳淞

主编 高永中

副主编 陈夕 刘荣刚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
口述史料丛书

ISBN 978-7-5098-2317-0



9 787509 823170 >

定价：120.00元(上下册)

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

第**6**卷

(下)

编委会主任 欧阳淞

主编 高永中 副主编 陈夕 刘荣刚

 中共党史出版社

彭真餐厅讲“大事”

郝建国

18岁参加解放军时，我曾问过战友：政委为啥叫“政治委员”，什么叫政治？当时，战士们文化水平低，大都讲不出个道理来。有一个老兵向我解释：凡是革命队伍中的大事都归团里、师里、军里的政委管，因此“大事”就是政治。我又问：什么是“大事”？他说：众人的事、军队的事是大事，个人的事、家庭的事是小事，我听后感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是带着这种认识走下了战火纷飞的战场，迈入了新中国的大门。不想，在给彭真当警卫员的日子里，我对“大事”和“政治”的含义有了新的感受。

吴晗用餐少俩菜

1949年8月，中央调整了北平市的领导班子，叶剑英另有安排，市长改由华北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聂荣臻兼任。当时，北平市委书记是彭真，市委常委兼副市长是张友渔，市政府秘书长是薛子正。1949年11月，还有一位副市长就是吴晗先生。吴晗时任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是毛泽东、周恩来从西柏坡带进北平城的15位民主人士之一。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是一位资深的历史学家。中央任命他为北平市副市长，可见对其十分器重。

北平刚解放时，市政府设在府右街南口路西的一座大院里。当时机关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机关食堂分大、小灶，规定市级领导吃小

灶，每餐标准“四菜一汤”。由于聂荣臻在军队里有要职，彭真在市委机关工作，一般不在市政府用餐。正常情况下，到小灶用餐的只有张友渔、吴晗、薛子正三人。他们三人常常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食堂管理员按规定在他们的餐桌上摆放“四菜一汤”，从不敢超过标准。

有一天，张友渔、薛子正两人到市委开会中午未回，市政府的小灶只留下吴晗一人用餐。大概是食堂管理员怕做多了浪费，中午只给吴晗上了两菜一汤。吴晗并未在意，吃完饭当管理员问他“您吃好了？”他说了句“谢谢，吃得很好”，就走了。

第二天，彭真到市政府有事，中午被大家留在小灶共进午餐。午餐的标准还是“四菜一汤”，四位领导边吃边聊，气氛十分融洽。彭真十分关心和尊重吴晗，说话间常向他请教一些城市管理的问题。当彭真问及吴晗在工作和生活上有何困难和意见时，吴晗当即表示说：市政府机关的同志对他的工作、生活十分照顾，昨天还单独为他炒了两盘菜。彭真一听，脸上渐渐收起了笑容。等吴晗吃完饭，彭真站起身，很客气地请吴晗先回去休息，并亲自送至餐厅门口。回来后，彭真一脸严肃地坐在餐桌前对张友渔、薛子正二人说：“吴晗先生昨日在这里吃饭，为什么只给上了两盘菜，你们了解吗？”薛子正一听，忙叫人喊来管理员。管理员一见是彭书记问及此事，只好将昨日因吴晗一人用餐，“菜上多了怕浪费”的实际想法向彭真作了汇报，并一再解释，吴晗先生吃完饭后，表示过很满意。彭真说：“既然有标准就要按照标准办。特别是对吴晗先生，他是一位党外民主人士，是党中央、毛主席为我们请来的专家。国民党反动派扬言：共产党打仗行，但他们不懂得怎样管理城市和发展经济。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是外行，所以要请一些党外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专业人士和我们一同工作，一同建国。对这些人我们要格外尊重他们，除了在工作上支持之外，也要在生活上给予特别的照顾。如果昨天的午饭，只给你们（指张、薛二人）上两盘菜或者是一盘菜我绝不会说什么，但给吴晗先生少上两盘菜就不行。我们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势利眼，给人家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昨天的事非同小可，这里面有关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你们应当受到批评并向市委作出检讨，我们也要就此事写出

报告上报中央。”

听了彭真的一席话，张、薛二人当即表示承担责任，管理员也一再向彭真保证，今后再不会发生类似的事。

这么一件小事我以为过去了，没想到几天后，彭真、刘仁（时任北平市委副书记）、张友渔、薛子正等几位领导一块被叫到中南海开会，回来后马上召开市委、市政府机关党员干部大会。在会上，彭真给大家介绍了那天午饭发生的事。许多同志见为这么件小事专门开大会，不大理解，在下面窃窃私语。此时，彭真在会上大声讲道：“毛主席、周副主席刚刚把我们几个市领导叫去，就此事批评了我们。毛主席说：过去我们在解放区，在农村待惯了，到了城市还是老一套。我们有些同志只注意搞节约，不注意团结人，不注意搞统战，不注意党的形象和影响，更不注意党的方针政策，这样做要不得。周副主席也要求我们的各级干部，就此事认真反省一下，如何搞好统战工作，不要只看眼前利益，凡事要往大处去看、去想就对了。”

这次大会，吴晗也到会参加。彭真代表市委、市政府当面向吴晗表示道歉，感动得吴晗热泪盈眶。吴晗在会上发言，表达了对共产党、新中国的热爱和向往之情，决心要用毕生的精力为党、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

1957年3月，经彭真、刘仁介绍，党中央批准，吴晗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敬迟到罚三杯

1949年9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平召开。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的黄敬也到北平参加大会和开国大典活动。

会前某日，北平市的几位领导彭真、聂荣臻、张友渔、吴晗和薛子正，邀请黄敬游览颐和园，中午在颐和园内的听鹈馆设便宴招待。约好上午10点钟在颐和园昆明湖畔的一处小亭子聚齐，由张友渔亲自去黄敬下榻的饭店接他。不想，因黄敬有事耽搁了时间，加上当时到颐和园的道

路不好，人多路窄且多为土路，等他们赶到颐和园时，彭、聂、吴、薛等几位领导已在湖边恭候多时了。老战友们相会十分亲热，大家边说笑边游玩，沿颐和园的水榭、长廊漫步，共同沐浴着秋日的温暖阳光，领略着昔日皇家园林湖光山色的美景。

不知不觉时已至正午，来到听鹂馆门前，秘书长薛子正说：“饭已准备好了，请黄市长入席吧。”黄敬高兴地说：“颐和园我过去曾来过，却从未在此吃过饭，今日承蒙各位的盛情，真是三生有幸，谢谢啦。”

听鹂馆里摆了两桌饭菜，首长们坐主桌，我们这些秘书、警卫、司机们一桌。彭真代表市委市政府简单地说了几句祝酒词，大家就吃喝起来。

黄敬性格豪爽，席间话多酒也有量。谈到城市建设和管理问题时，黄敬说：“进城以后，不管是建设也好，管理也好，还不都得我们拿主意、想办法。我们是城市的管理者，上级可以管我们，但下级就该服从我们。今天，我和张市长在来的路上，被你们北平的交警拦住了车子。你们的司机和张市长还真怕交警，人家不举手里的棒棒，硬是不敢走。”说到这里，黄敬已显露出在路上的不满之意。他接着有些洋洋自得地说：“我也会开车，在天津我就不怕交警（当时北平、天津刚解放不久，交通警察大都是被留用的解放前的旧警察），有的交警要拦我的车，我一露脸他们就得马上放行。”

见黄敬话说到这儿，彭真接过话题笑着对黄敬说：“黄敬同志，你的做法在天津行，因为在天津你是‘老大’。可在北平，我们在座的都不是‘老大’。不光我们，连周副主席也不是（当时新中国还未成立，周恩来是党的副主席之一）。前不久，周副主席身边的一位司机给他送一份紧急公文，由于不听交警的指挥发生了交通事故。周副主席知道后当即把司机的领导找来，严肃地批评了他们，并要当事人作出深刻检查，要求中央机关所有的同志都要服从警察的管理，支持北平市的工作。”

黄敬见彭真这么一说，脸上立刻收起骄矜自得之色。黄敬和彭真是老相识了。彭真曾在天津工作多年，担任过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29年6月在天津被捕入狱，1935年秋出狱后又出任过中共天津工作组负责人。

1945年，彭真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彭真面前，黄敬怎敢自认“老大”。

彭真见黄敬低头不语，接着又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要我们进城后要经受住人民的考验、历史的考验，要我们考出个好成绩，不要做李自成。我们就要踏踏实实地坐下来学习，学习经济知识、城市管理知识、法律法规知识。不要让人家讲我们共产党人是一群啸聚山林的山大王，只会打游击不会搞建设。过几天我们就要建国了，毛主席对我说过，建国后我们要先制定一部国家的大法，就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今后我们还要研究颁布许许多多涉及多方面工作的法律、法规。我们要学会用法来管人，用法来管事，用法来治理国家。那种自以为是、无法无天的游击习气要彻底纠正过来，尤其是我们这些党的高级干部，更应该以身作则，带头执法守法才对。”（1949年10月19日，彭真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作者注）

说到这里，彭真为缓和严肃的气氛，笑着对黄敬说：“黄敬同志，在北平有毛主席、周副主席，有党中央管着我们，我们每天都在谨慎从事，不敢懈怠。在天津你是‘老大’，深得中央的信任，希望你能像周副主席那样要求自己，要求部属，当好天津人民的父母官。”

黄敬见状忙说道：“老彭啊，快别再提什么老大不老大的话了。在您和诸位面前，我黄敬只配当学生，今天这顿饭使我学了不少东西，你老彭的一番高论，让我铭记终生。回去后从我开始，所有机关干部都要认真检查一下思想问题，努力做好天津市的各项工作，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薛子正见席间气氛过于严肃，忙插话说：“黄敬同志有此认识和态度，真值得我们学习，但不管怎么说，今天迟到总是不应该，让诸位同仁等你多时，应该罚酒三杯。”黄敬一听，忙站起身来连声说道：“该罚、该罚、我认罚。”说着伸手端起桌上的酒盅，在几位好友的笑闹声中，连干三杯。

班禅赴宴“挨一蜇”

新中国成立后，和平解放西藏作为国家的一件大事，被提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1951年初，中央致电十四世达赖喇嘛，欢迎他派代表来京进行和谈。同时，中央特别邀请十世班禅活佛来京共商祖国统一大计。

1951年4月22日，阿沛·阿旺晋美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率和平谈判代表团抵达北京。

4月27日，班禅活佛率青海塔尔寺堪布会议厅的僧俗官员一行45人也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李济深亲往车站迎接。当天晚上，周总理又设宴款待班禅，为他和塔尔寺的僧俗官员接风洗尘。这次见面是班禅和周总理的第一次见面，各自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班禅视周恩来为“最可信赖的长辈”，而周恩来赞誉班禅是“少年活佛，英俊潇洒”。那年十世班禅刚满13岁。

4月28日晚，北京市政府受周总理委托，在市政府大楼设宴盛情款待班禅，以尽地主之谊。参加宴会的有彭真、张友渔、吴晗、薛子正。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邢西萍）作陪。西藏方面除班禅活佛外，作陪的有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驻京（指南京）办事处处长詹东·计晋美等人。

当时，市政府条件差，根本没有大一点的干净餐厅供宴会用。薛子正只好让大家腾出二楼的一间会议室，临时改做宴会厅。做饭的厨房在办公区的另一端，相距约300米远，中间还要穿过一处大院子。院子里生长着许多树木。正是春光明媚时，紫色的丁香迎风盛开，香气扑鼻，令人陶醉。

由于是盛宴，厨房的距离又远，考虑到安全问题，薛子正叫来我们这些首长身边的警卫和勤务（当时称公务员），一共七八个人为宴会服务。宴会开始后，大家按照事前的分工，端茶的端茶，上菜的上菜，最多的是提着盛菜的食盒，来回奔跑在厨房和宴会厅之间。大家都在尽力地

工作着，生怕出点纰漏挨批评。可偏偏不遂人愿，在宴会中就出了件意想不到的“大事”。

宴会过半时，班禅年少，吃得又快，最先放下碗筷要去洗手。当时，屋里只在墙角处放了一个脸盆架，脸盆边上搭着条半湿半干的新毛巾。脸盆里的水，是刚刚由一个同志从外面端进来的。

班禅站起身走到脸盆处，在洗完手拧毛巾时，突然大叫起来，引得在场的领导都跑过来看究竟。只见班禅双眉紧锁，哭丧着脸，叽哩哇啦地讲些藏语，使劲地甩着左手。班禅的陪同詹东·计晋美听了班禅的述说，拿起脸盆里的毛巾一看，上面趴着只蜜蜂，原来是班禅的手被蜜蜂给蜇了。薛子正叫人找来机关的医务人员，又是上药，又是包扎，好一阵忙乱，才使班禅平静下来。宴会不欢而散。彭真等几位领导送走了客人回到宴会厅，大家相继坐下后，谁也不说一句话。

过了好一会儿，彭真发话问：“怎么搞的，蜜蜂怎么会爬到脸盆的毛巾上？”薛子正答：“我问了，是刚才打水的同志端着脸盆路过院里的丁香树下，无意中蜜蜂跌落到脸盆里的。”彭真听后，提高了嗓音狠狠地批评起薛子正来：“你这个秘书长是怎么干的？为什么不事前叫人用铁壶将水打好？做事粗心大意马马虎虎，你看你用的这些人！”彭真用手指着我们这些站在墙边的警卫和勤务怒气冲天地说：“一个个愣头愣脑，冲锋打仗还可以，端着脸盆像过敌人的封锁线，根本就不是干这事的料！为什么不去北京饭店请几个服务员过来？”这时，在场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插话说：“老彭，算了！也没什么大事。”彭真一听扭头对他说：“不！这个问题很严重，是一次政治事故。今天我们是受党中央和周总理的委托以北京市政府的名义宴请班禅，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班禅活佛是西藏的宗教领袖，是来和中央商讨和平统一的国家大事的。接待工作中出了问题，是会影响到党的大政方针的。你回去后先向中央汇报一下这里的事，我们马上向中央写出书面检讨，请求处分。”

过了几天，彭真带着市委市政府的几位领导来到中南海，当面向周总理汇报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在彭真身边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对“政治”的含义有了极其深刻

的认识。政治不光是指一些大事，有些看起来不起眼儿的小事，也会演变成大事。大事、小事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后来，我调到国管局工作，几十年来时刻牢记着“服务工作无小事”的教训，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机关后勤战线上，直到离休。

和彭真同志的几次接触

孙孚凌

彭真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顽强奋斗，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彭真同志一直担任北京市党政主要负责人。我有幸在彭真同志领导下以民主党派的身份参政议政，为首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做贡献。恰逢纪念彭真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回忆与彭真同志接触的点点滴滴，他的音容笑貌犹在我眼前。

实事求是 开创新业

北平刚刚解放时，经济衰退，民不聊生，百废待举。北平市委、军管会为稳定形势，更好管理城市，从1949年3月开始，在台基厂老的德国大使馆内，一连召开了几次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座谈会，我作为工商界代表参加了这些会议。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参加会议的就有彭真同志，这也是我最早见到他，他在主席台上神采奕奕。参加会议的还有叶剑英（时任北平市委第一副书记兼军管会主任、北平市市长）、刘仁（时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李乐光（时任北平市委宣传副部长）、崔月犁（时任彭真秘书）、李续刚（时任北平市委副秘书长），民主人士有钱

端升（北大教授、法学院院长）、雷洁琼（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之一，北大教授）、浦洁修（民建会员、北平振北制革公司经理）、刘一峰（民建会员、西鹤年堂经理）、王向宸（北平私营慈型铁工厂经理）等四五十人。

那时，我们的会议常常开到夜里一两点钟，讨论如何管理城市、治理北平的方方面面的问题。4月21日夜里12点多，就在座谈会上，彭真同志高兴地向大家宣布：人民解放军渡过了长江！与会代表无不欢呼雀跃，鼓掌庆祝。

有一件事情我到现在记忆还非常深刻。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的政治热情很高，讲话时有过头。在一次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增加生产、搞好群众生活时，陈荫堂（时任北平大华窑业公司经理）说：“解放了，我们很高兴，赔钱也干。”我认为他的话不现实，就转了一转，“少赚可以，赔钱不现实，你有多少钱可以赔？赔光了你的工人怎么办？”彭真听到我的话连连点头，表示了对我的观点的认可。

记得新中国成立不久，彭真就说过：北京是首都，不是尾都。他要求北京事事都带头，所以在公私合营上，也是在全国带头。在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1953年底，我积极响应党的“一化三改”的号召，与乐松生、常子久等北京市爱国工商界代表性人物，申请企业公私合营。1954年底宪法公布后，我的这个要求更为迫切，主动批判自己的剥削思想，认识到“改变私有制不像梅兰芳唱戏，台前台后各一套，而是要脱胎换骨”。北京市有关部门考虑到我是工商界比较开明的代表性人物，加上福兴条件较好，党、团、工会基层组织都较健全，遂选定福兴面粉厂作为公私合营的试点单位。北京四家企业申请公私合营，有同仁堂药店、大有粮店、福兴面粉厂、双合盛啤酒厂。在福兴面粉厂的带动下，其余11家私营面粉厂，在1955年6月至8月间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由于有了福兴的经验教训，少走了许多弯路，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得以顺利完成。

公私合营时，彭真曾说：所有代表性的人物都不脱离原厂，脱离原单位就没有特点了。他的话完全符合工商业改造时期共产党的政策，发挥代表性人物的带头示范作用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合营之后我亦留在原厂

(福兴面粉厂)任职,1958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市服务事业局局长,并一直兼做青年工作和工商界工作。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我在彭真领导下,响应中共中央号召,为国家做了一些事情,虽然作为党外人士与彭真接触次数有限,但我对他无比敬佩,我对他的总体印象是襟怀坦荡、实事求是。这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所具有的胸怀。他的这些品质对我也有很大影响。

坚韧乐观 老骥伏枥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北京首当其冲,全国陷入一片混乱状态。彭真由于敢于坚持真理,制定限制文艺界批判扩大化的《二月提纲》以及所谓“畅观楼”事件,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造谣、污蔑,而被打倒,失去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和人身自由。此后10多年我再也没见过彭真同志。

由于我是以“资本家”身份进入新社会的,在公私合营时我曾经说过:公私合营可以不派公方代表(那时公私合营企业除了党支部以外,还有私方和公方代表。当时反对公方代表很容易被定性为“右派”)。加上我长期在彭真、刘仁(市委第二书记)、崔月犁(市委统战部部长)领导下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我也遭到批斗。红卫兵批斗我时说了一些话,大意是如果没有彭真保我不是右派,我早在反右派斗争中就被打倒了。我到现在也不清楚彭真具体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因为我主要通过崔月犁与市委领导联系,与彭真直接接触不多,但彭真和市委其他同志确实在反右派斗争时极力保护过我,我到现在都感激他们。“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真已经“自身难保”,1968年,我被发配到面粉五厂(即原福兴面粉厂)劳动改造。

5年劳动改造,我一直在厂里劳动,切实感受到工人群众的宽广胸怀、热忱无私,他们并没有因为我是劳改对象对我另眼相看。后来想想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我有以下两方面认识:一是自己通过劳动改造,强壮了身体,思考了一些问题,算是一个收获;二是自己虽然

当时身处困境，但从没有放弃希望，因为当时我就想毛主席旁边有一两个人犯错误是可能的，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犯错误，那么多人被打倒呢？

“彭、罗、陆、杨”、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那么多领导人，那么多干部群众被打倒，这个运动肯定不正常，不正确，运动总会结束的，只要有结束的一天，我就有希望。

在工厂劳动改造时，还出了不少笑话。记得上夜班，摊饼时，馅都弄好了，但不懂火候，旁边的工人就不断地帮我翻。我们可以买柿子、买西瓜吃，可以吃甲菜（当时饭食分等级，甲菜是比较好的菜），那时对我们这类人这是不可以的。有个房山的工人，平常对我们都很好。记得给我安排住宿的时候，那个屋子有点潮湿，地上有一门板。房山的工人大声喊：金仲文（工厂一位工人），去拿铺板来！他的意思是让我睡到木板上防潮湿。就是那么好的人后来对我发脾气。我吃柿子不爱吃皮，他有点意见，说：你们吃柿子可以，但别把皮扔了，皮是可以吃的。你看我们的工人多么朴实。不过在面粉厂劳改，批斗我的时候搞“喷气式”，我的腰由此落下了毛病。

由于林彪、江青一伙极力诬陷和打击，彭真先被从家中抓走，关押到北京卫戍区，后来转押到秦城监狱。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彭真被解除监护，遣送到陕西省商县。1976年，“四人帮”被逮捕，“文化大革命”结束，整个国家从混乱状态逐渐走向正轨。1978年底，彭真回到北京，在首都机场受到300多人的欢迎。彭真同志回到北京后，我去看过他一次，当时他精神不佳，看得出身心受到极大折磨，不过他仍旧谈笑风生，充分表现了面对挫折困难坚强乐观的精神。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肯定彭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以后的17年中，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工作中的成绩是主要的，不存在反党的问题；推倒“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彭真的种种莫须有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决定恢复彭真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后来，彭真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委员长，直到1988年离休。

斯人已去，音容犹在。彭真同志为党和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任劳任怨，奋斗一生，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

(张惠舰 整理)

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的岁月

岳 祥

我曾于1958年至1966年、1979年至1981年担任彭真同志的秘书。回忆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日子，很多事情仍然历历在目。彭真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以及对我的悉心教育与关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获益终生。

上任之初，当面考试

在担任彭真秘书之前，我曾经见过他，但没有直接接触。1958年，在我担任机要秘书第一天，他见到我时说：“噢，原来就是你啊！”他表示，在这之前对我是有印象的，但是不知道我叫岳祥。

为什么作为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彭真能有印象？一方面是因为他平易近人，另一方面也跟我之前在市委组织部的工作经历有关。在进城之前，我是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负责抄写干部调配任免名单和管理干部档案，为进城做准备。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为了贯彻党对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市委经常召集干部会议，由市委组织部负责组织，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负责通知、收票或者签到。我们在会场门口常能见到市里的领导同志。那时候彭真经常给干部作报告，到会场时，我们能看到他，给他让路，他对站在门口的工作人员估计也会有点印象，包括我在内。

记得有一次，大概是高饶事件时，北京市委在市总工会礼堂召开保密会议，传达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这个会开的时间比较长，傍晚时分，彭真同志夫人张洁清拿了一件衣服过来，让工作人员送进去给彭真，当时我正好站在门口，她就交给了我。于是，我遵照她的吩咐，将衣服送进会议室，给彭真披上。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跟彭真比较接近的接触了。

当时彭真住在台基厂头条，上班在原德国大使馆的院子里，那时机关工作人员比较少，我们偶尔在路上或单位院子里也能见到他。

1958年，我被派到彭真身边工作时，是市委组织部部长余涤清找我谈话，说：“刘仁同志讲彭真同志那里缺一个秘书，组织上考虑让你去。”我想自己之所以被派去当秘书，可能是因为当时还很年轻，能多跑跑腿吧。

真正的接触是在1958年8月27日，我记得非常清楚，这是我去彭真家里报到，在门口给警卫报上名就进去了。一进大门，我就看见彭真正在院子里散步。我上前打招呼说：“我是岳祥，来您这边工作。”他微笑着说：“哦，原来就是你啊！”接着严肃地说：“到我这里来工作，可不能老要调动啊！”他说完就离开了。于是，我到秘书办公室，当时的秘书马甸同志就开始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转交给我来做。

在刚担任彭真秘书的那段时间里，我的思想和精神都是高度紧张的。特别是刚报到的那一天，吃完晚饭，服务员拿过来一叠很厚的《参考资料》，跟我说：“首长让你先看看，他出去看戏，9点回来，到时让你跟他说说这里面比较重要的内容。”我一听就慌了神，因为我以前只做过档案整理、党员干部统计等工作，从来没有接触这些国家和国际上的大事，怎么看《参考资料》，哪些是重要的消息，真摸不着头脑。

当然，领导交下来的任务，我就是硬着头皮也得完成啊，于是就赶紧翻看这些资料。但是，将这些资料来回翻了几遍，我的心里还是一点谱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

后来，我稍稍使自己镇定一下，开始一篇一篇地翻看每一条消息，看到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内容，就折上一个小角。就这样，前前后后看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吧，这本资料基本都看完了，但仍有一些内容说不清重要

不重要。

彭真回来后，就让人叫我过去汇报。当时，我心里非常紧张，忐忑不安，但还是赶紧跑到彭真书房，说：“我看了，觉得有些内容比较重要，大致给您汇报一下吧！”然后，我就将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内容逐条向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我汇报完了。彭真说：“好，那你先下去吧！”于是，我回到秘书办公室，一颗紧绷的心才稍稍平静下来，至于结果怎么样，当时还真没敢多想。第二天，张洁清过来说：“首长表示昨天汇报得还可以。”就这样，我算是过了这一关。

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不免有些激动。彭真为什么要考我呢？我估计他是想大致考察一下我的语言逻辑表达能力吧。他平时很注重讲普通话，他要听听我有没有口音，同时他还担心秘书传达事情时出现差错，或秘书说话别人听不明白，所以让我说些消息给他听。

我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普通话还是比较标准的，说话口齿还算清楚，语言逻辑表达还比较清晰，因此我就幸运地过关了，成为彭真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其实，现在想想，这些素质和能力确实是作为秘书所必须具备的，而且是很重要的。

注重大事，掌握一手材料

在担任彭真的秘书后，我才知道，他身边共有四位秘书。当时，我们对外联系或接听电话时，一般都说，“我是彭真同志这儿”，并没有“彭真同志办公室”这一说法。我们的职责不一样，分工也不同。

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张彭应该属于彭真的政治秘书。1958年，需要一位有经济工作经验的同志担任彭真的秘书，组织上就安排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张彭担任。他经常帮助彭真了解一些情况、商量一些问题、起草一些文件等。彭真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对某件事情产生一些想法后，需要找个人说说，并且在说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自己的思路。这个时候，张彭一般就在旁边陪着他，或是在办公室，或是在院子里散步。另

外，张彭当时还兼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这个身份方便他直接到基层去了解情况。

王林和我是彭真的机要秘书，王林是从中共中央办公厅过来的老同志，经验多、岁数大、资格老，我们大多时候都听他的。我们俩主要负责机要文件的收发、上传下达一些事项等日常工作。

张道一可以说是彭真的新闻秘书。他是1959年从市委宣传部调过来的，学英文出身，是市委当时唯一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为什么调他过来呢？党的八大后，彭真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特别是1959年邓小平腿部摔伤后，彭真代理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他需要了解掌握国内国际动态，所以，就将擅长英文的张道一调到身边协助工作。张道一每天都要翻阅和整理《参考资料》，阅读英文资料，晚上将重要内容向彭真汇报，有时也议论一些国际上的问题。后来，张道一还参加了有关京剧改革的工作。

当时，中央办公厅每天都会送来很多材料，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国内的材料一般是中央办公厅的文件、各省呈送的材料，以及新华社的资料等；国际的材料一般都是外交部、中联部的材料，及各驻外使馆报送的电报等。由于文件数量太多，无法逐一审阅，所以，我们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从这一大堆材料中选出比较重要的有关内容，送给彭真，摆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一般是早上出去开会，中午、晚上回来后翻阅这样材料，或者直接让我们向他汇报材料中的重要内容。

彭真非常注重大事，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需要及时掌握第一手材料。例如，他到中央开会时，如果发现毛主席或其他中央领导说起某件事而他不知道，回来后必定要责问：“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电报材料？为什么不送给我？”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心里就会特别紧张。

秘书的另一项重点工作是及时送阅传阅文件。当时，处理日常工作的一种方式传阅文件，一般是由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审批传阅的，他们三位的生活习惯不同，我印象很深的是，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同志都经常工作到很晚，晚上一两点我们还经常收到或送出他们审批后的文

件。小平同志睡得早起得早，早上阅批文件。中央办公厅就按他们不同的习惯送批阅文件。

另外，彭真几乎每晚一点多钟都会跟周总理通电话，讨论国内外重大事件，交换工作意见等，而且一般都会谈很长时间，打完电话后才休息。我和王林属于机要秘书，两人轮流值班，每人值守24小时，节假日也不休息。

“大跃进”中，理性思考

我到彭真身边工作时，“大跃进”运动已经开始。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推动“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大跃进”是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全国的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这个“风”是很强劲的，全国上下都想要“超英赶美”。

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况，我感觉彭真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但是他不轻易发表意见。比如说，其他地方有高产田、放“卫星”，那么北京要不要有高产田？高产田产出那么多粮食，符合实际吗？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彭真就让市委找了一块地进行试验，并从河北那边请人打理这块地，看看到底能翻多深，能打多少粮食。

实践出真知，后来，在试验的过程中还真是发现了很多问题，如光照、水分、通风等，这些都无法解决。这样，彭真心里就很质疑这些数据和事情。当时，尽管京郊农村粮食产量排在全国的后面，大家感到压力很大，但彭真依然指示市委各部门，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

还有，在1958年、1959年大炼钢铁时，彭真也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他一直在理性地思考，但他并未直接反对“高指标”，而是采取措施了解真实情况，想办法努力实现这些目标。那时候，彭真经常召集冶金部、煤炭部、林业部、铁道部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到家里进行座谈，了解情况，商议对策。在这个过程中，陆续发现选矿、各种炼焦煤的开采、坑木的采伐运输都无法适应。当时还缺乏这方面的科

学知识和概念，以为炼钢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实现。

1958年11月，彭真为《前线》撰写发刊词《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他指出，“要站在革命与建设的最前线，就必须站在群众之中和运动之中，跟群众血肉相连地打成一片，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领导群众一同前进……要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就是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根据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大限度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即用党和群众自觉的努力，使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以客观上可能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在这里既不能右倾保守，也不能单凭主观的热情，盲目地蛮干……我们要改造现实——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可是我们却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凭灵机一动的‘本能’办事，不能按照片段的材料和表面现象办事，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即跟着空气办事。总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任意乱干。我们必须，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按照客观规律改造现实。”

从这里不难看出，彭真虽然有主张“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思想，但根本却落在“以客观上可能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其实，他已经看到高指标、浮夸风等问题的严重，心中也有一定的想法，但是当时又不可能站出来明确反对。我觉得，这是一位政治家的智慧所在，政治家做事是要顾全大局、把握时机的，时机条件不成熟，可能会适得其反。

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邓小平、彭真同志带领工作组到怀柔重点调查了解食堂问题。当时，农村吃食堂已经搞了三年。可想而知，这么长的时间，食堂的饭菜不可能适合每个人的口味，更不可能适应老弱病残幼的需要，而且在刮风下雨等各种条件下都要到食堂去打饭，老百姓不可能都是赞成的。

1961年5月，在调查的基础上，邓小平和彭真同志联名致信毛主席，汇报调查情况，并就农村的社队规模、余粮分配、供给制、公共食堂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议。最后，也促成了公共食堂的最终解散。

山雨欲来，被批为“独立王国”

1960年6月，彭真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中苏两党代表团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冲突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苏联共产党以“老子党”自居，要求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与其“对表”，赫鲁晓夫蛮横无理，对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彭真率中共代表团顶住压力，遵循“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彭真理直气壮地对赫鲁晓夫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只服从真理，绝对不会屈从于你的压力。”后来进行的“中苏论战”，彭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4年6月，毛泽东要求文艺界整风，7月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966年2月，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起草了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并由彭真向毛主席汇报后，加上中央批语发到全党。

这些都说明，中央当时是非常重视和信任彭真的，他也经常出席各项重大活动。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1966年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访华时，彭真没有露面。这一年五一劳动节，彭真也没有出来。对此，大家议论纷纷，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北京的政治空气也显得格外紧张。

往回想想，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竟把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写的《海瑞罢官》中描述明朝海瑞的“退田”、“平冤狱”等情节，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批判“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彭真当时对《文汇报》随意公开点名批判吴晗，感到很不正常。他告诉北京市委，吴晗问题的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属于学术讨论范畴，界限要掌握好。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后两周内，首都各报均未转载。这件事可能让毛主席对彭真和市委领导很不

满，说彭真是吴晗的后台，北京市是“独立王国”。

即使是这样，11月底，《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转载姚文元文章时，可能是按照彭真的意见，加了“编者按”，提倡学术讨论应“实事求是、以理服人”。1966年的“二月提纲”，彭真还试图将批判《海瑞罢官》运动控制在学术讨论范围之内。

然而，没过多长时间，4月28日，毛主席在杭州的讲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后来，彭真的处境日渐艰难。5月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进行错误批判。

当时，我们还在郊区参加“四清”运动，从市委传来消息，说市委大楼里贴大字报了。我们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跑回去看。回去后，发现满大街都是大字报。

1966年6月，我们回到城里后，因为仍然是彭真的机要秘书，还是回到彭真家里。那时候，各种材料和文件都已停止，我们几个秘书都没什么事情了。彭真待在屋里，他不叫我们，我们也不去找他。大概是有人交代过了，王林跟我们说，“如果彭真叫你们去，去后说了什么内容要及时汇报”。

后来有一天，上面来通知，说有一群学生要到彭真家里来问一些事情。王林负责接待，让我去做记录。我记得当时只简单记了半页纸，学生们问的比较简单，彭真给他们说的也不太多。当时，学生们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是简单问了一些问题，没有喊口号，也没有批斗。

我们在彭真家里大概待了一个月，就接到通知让离开，各自回家了。后来，市委被“改组”，他们将所有曾与彭真有关系的人都集中起来，包括张洁清、项子明等，也包括他的秘书、电话员等，共40多人，即所谓“反革命黑帮分子”。大家被要求站在当时市委三食堂的台子上低头认罪，喊了一些口号。然后，这些人都归各自所在部门的“造反派”领走了，而我们那儿当时没有“造反派”，就被归到行政处。

复出担重任，全力恢复法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开展，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作出了正确的政治抉择和战略抉择，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这次会议刚结束，12月28日，彭真就被中央接回北京。当天，前往机场接他的人很多，将近200人，大家都是自发前往的。我记得中央组织部有一位副部长是代表党组织前去迎接的。彭真乘坐的飞机到达机场后，其他旅客先下机，彭真最后下来。一见到他，大家就热烈鼓掌欢迎。然后，他被请到贵宾休息室，大家轮流过去跟他握手问候，和他说上一两句话。

彭真回京后暂时被安排住到前门饭店。过了几天，我去前门饭店看望他，跟他说说话。这一次，他坐在沙发上，问我：“你多大啦？”我回答：“我49岁了。”他很感慨地说：“哎呀，你都快50岁啦。”后来，我就问他：“这十多年来的日子您是怎么过的啊？”他告诉我：“很简单，什么事情大，我就想什么事。”

虽然当时没有细说，但后来实践证明，彭真还真是这样的。在人生的低谷中，哪怕是在监狱中，他都始终坚持读书学习，仔细研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狱中没有纸笔，他将女儿送来的画报和牙粉袋撕成窄窄的纸条，用嚼烂的米饭粒贴在书上，标出重点，加强记忆。几年下来，他用这种方式标出重点的书有30多本。

彭真经验多、能力强，处理事情有自己的独特方式与想法，他看待问题所站的视角比我们更是高很多。在读书学习的同时，联系到种种现实问题，他当时已经思考了很多重大的事情，譬如，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在他到中央政法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后就把这些想法付诸实

践了。

彭真刚回到北京，身边没有人。看到这种情景，我就主动问他：“您如果愿意的话，我还可以回来给您做一段时间的秘书。”他说：“好，可以。”这样，我又重新回到彭真身边。当时，彭真原来的房子由吴德住着，所以他回北京后被安排住在前门饭店。后来，由于前门饭店那边比较乱，就搬到北京饭店。一直等到吴德搬走后，才搬回原来的住宅。

1979年2月，彭真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担负起领导新时期民主法制建设的重任。其实，新中国成立后，彭真一直就领导、主持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工作。1954年，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并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宪法确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制原则作了深刻的论述。接着，又领导了刑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虽身陷囹圄，但他还对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的是，1979年4月，我们当时还住在北京饭店，中央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很多后来平反的人都参加了这个会。会议期间，彭真反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还要不要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当时，这是大家都特别关注的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大家有一些不同意见。他跟大家讲：“你不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你还能举谁的旗？”所以，在这次会议上，他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指出：

“我们必须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整个革命战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对自由化思潮必须严重注意。但不能动摇我们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决心，不能动摇我们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用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决心。”在这一点上，他跟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是一致的，是完全吻合的。

彭真复出工作后，全力进行恢复法制、制定基本法律的工作。他不顾70多岁高龄，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即使在发高烧打点滴时，也在审看材料或找人研究问题，带病参加会议汇报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参考我国“文化大革命”前的法律及草案，以及我国历史上和国外的法律，结合

中国的国情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实行法制的愿望，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拟定了刑法、地方组织法、选举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法律的草案。

彭真在主持制定法律的同时，十分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贯彻执行颁布的法律。他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们全体人民、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口号。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允许言行不符，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之外或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他特别强调，不能搞个人专制，不能造谣诬陷，要坚决维护工作、社会、生产等正常秩序，因为这些都是国家的利益，都是人民的利益。他的思路很清晰、很明确。我觉得，什么叫大事，这就叫大事。

当时，另一项重点工作就是修改完善宪法。1981年7月，中央决定由彭真直接领导宪法的修改工作。他提出，宪法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要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其进行继承和发展。这些恐怕不是临时想出来的，而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实践所得出来的结论。

他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指出：“从革命战争时期主要依靠政策办事，到人民掌握全国政权以后，不仅依靠政策，而且依法办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立法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东西；各级国家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把法律交给群众，这是法律得以遵守、执行的可靠保证；在我们国家，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彭真在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和完善立法体制的措施，并且通过修改宪法和制定有关法律将它确立下来。1979年以来，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

本的重要法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1年以后，我不再担任彭真的秘书，后来跟他接触就比较少了，只是在他生日或生病的时候去看望他。1988年，彭真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仍然一直关心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总而言之，彭真是我多年的老领导，回想起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日子，很多往事依然记忆犹新。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对我的关怀和教诲，使我受益终生，并一直指引着我前行。

(熊根琪 杨 洋 整理)

深情缅怀彭真同志

李 晨

我从1949年北平解放起，就在以彭真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领导下工作了17年，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这17年中，彭真同志始终坚持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是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抓好北京市各方面的工作。闭目遐思，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城市政策座谈会上第一次接触

1948年11月上旬，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就让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赶紧去西柏坡汇报平津的情况。形势发展太快，刘仁当时尚无这个准备，就赶紧通知城里的同志去汇报最新情况。几天后，刘仁才急匆匆地带着我（负责学运）和杨英（负责工运）从城工部驻地泊镇出发，经石家庄赶赴西柏坡。去了以后，刘仁当即到周恩来同志处汇报工作。那个时候中央已经决定建立北平市委，彭真担任书记。彭真正在召开一个城市政策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不多，有黄敬、高文华、邓拓、廖鲁言等六七位同志，我和杨英也应邀列席。这个会大约开了三四天，现在好多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主要是讨论入城政策。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彭真同志，他那种平易近人，虚心听取意见的民主作风，高屋建瓴的政治水平，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找我了解石景山区“两厂”情况

1948年12月在良乡，北平市委组建各区县领导班子，王鹤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找我谈话，说市委决定让我马上去当时已经解放的石景山区担任区委书记。石景山是个工业区，区委的重要任务是协助人民政府办好两个大厂，一个是钢铁厂，一个是发电厂。当时，这两个厂在北平算是最大的工业企业了，钢铁厂已经停产，发电厂刚恢复发电，正在为保证城里“大放光明”紧张地工作，生产任务是很重的（北平没解放时，在国民党统治下，城里经常停电，市民管电力公司叫“黑暗公司”）。

我是1949年1月2日到石景山区的。约在三四月份，彭真想的是，对于石景山这样两个国营大厂应如何改造？如何管理？当时我们的政策是：对国民党的政府机构原则上是打乱解散；对原有的经济组织和企业则是原封原样，不打乱旧机构，先接收下来，照常生产，再逐步加以改造。

中央曾经指示说：现时资本主义的工厂、企业管理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长期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不仅为我们准备了科学技术同时又为我们准备了一套管理制度；资本主义的管理制度不仅有适应高度剥削需要的一个方面，也还有适应高度技术需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的任务是批判地接受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发扬其合理性和进步性，去掉其不合理性和反动性。

彭真大约就是按照这个精神，特别对于这两个厂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工厂和职员的情况作了详细了解，他把这两个厂的科室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技术、计划、原材料供应、财务会计之类直接为生产服务的科室；另一类是工厂保安、管理工人的科室以及黄色工会等组织，他们订立了不少侮辱、压迫工人的制度，严重地影响了工人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应该坚决予以废除。

1949年4月，北平市委提出了国营工厂企业实行管理民主化问题，并

且选定电车公司和人民印刷厂作为试点。

重视中小学教育质量

1954年，在彭真直接领导下，市委作出《关于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这是由市委经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后制定的。彭真和刘仁同志亲自到学校召开座谈会，在这个基础上着手起草《决定》，写出初稿后，他们又与起草的同志座谈，亲自修改。并在有各部部长参加的市委会议上，就提高教育质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反复讨论，统一认识。

彭真在几次座谈中，对提高教育质量问题提出许多重要意见。他说：“教育工作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事，应当十分重视。”他还反复强调，教师待遇要提高，要克服待遇上的平均主义。他还谈到领导干部要钻研教育工作成为内行，各级领导、学校和教师都要定出提高教育质量的计划等等。这些重要指示成为《决定》中的主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决定》体现了教育事业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教育的客观规律。它规定的培养目标是：贯彻全面发展教育方针，要求学生做到“三好”。它抓住了办好学校的决定性条件——干部和教师队伍的建设，而且从政治和业务两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培训提高。它提出的管理办法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切实可行的措施，而且有检查、有评价、有奖惩。它还要求教育部门的干部和校长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的内行。

这些都是符合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的，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因而贯彻执行以后两三年就使北京市中小学教育工作改变了面貌，教育质量显著提高，显示了党对教育事业的坚强领导。

当时，彭真、刘仁同志并不熟悉中小学教育的业务，但是他们重视教育，能够虚心听取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第一线的校长、教师和教育部门干部的意见，而且一再强调要听取不同的意见。这样，他们就能够比较全面地、深入地了解教育工作的情况，集中广大干部、教师的经验、智慧，从

中提炼出若干带规律性的东西。这样作出的决定当然就体现了内行领导的水平和教育工作的规律。

“大跃进”中不乱放“卫星”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是从农业开始的，接着又兴起了以大办钢铁为代表的工业“大跃进”，那时报纸、广播天天报道此起彼伏的“元帅”升帐，“卫星”上天，还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类夸大主观意志作用的口号，一时形成一股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大风，席卷各行各业。什么“亩产小麦千斤”、“亩产万斤”，我当时在市委建工部工作，常下工地，建筑工人原来多数是农民，干过农活，大家懂得当时亩产也就是100多斤、两三百斤，不可能上千斤！我记得很清楚，他们不满地说：“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对在“大跃进”高潮中由于急于求成，违反客观规律出现的许多问题，彭真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早在1955年北京市第一次党代会上彭真就提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用客观上的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一个是“最高标准”，一个是“客观上可能”。1958年彭真通过《前进》发刊词还提出，既反对“不力争上游，却安居中游，稍有成绩就沾沾自喜”，也反对“单凭主观的热情，盲目地蛮干”。也就是说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根据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即用党和群众自觉的努力，使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以客观上可能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凭灵机一动的‘本能’办事，不能按照片断的材料和表面现象办事，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即跟着空气办事。”“我们必须，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在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按照客观规律改造现实。”听到这个方针后，工人们高兴地用自己的语言说：“这个标准就是要我们踮着脚，够得着啊！”可见这个方针在当时是切切实实地起了鼓舞作用。今天回想起来，虽然50多年过去了，我还能回忆起当时听到这个方针以后，大家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高标准地要求工作思考问题的情景。

“文化大革命”前夕， 曾力图稳定中小学的动荡形势

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当时“阶级斗争”之风越刮越烈，已经波及学校。一些中学也开始揭“学校阶级斗争盖子”，对学校执行什么阶级路线，依靠什么人，培养什么人提出质询，掀起揭发“学校走资派”浪潮，冲击了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很多教师惶恐不安，学校秩序动荡不安。

1964年11月，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带队，由中央有关教育部门组成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进驻北京六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一进学校就发动师生“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开展“夺权斗争”，批判所谓由党支部正副书记组成的“反党集团”的错误，说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文化大革命”后，均予平反恢复）。同时还批判了一些教师。

在六中这个由中央教育部门在学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影响下，北京市一些中学“闹革命”顿成山雨欲来之势。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北京市委和彭真决定在当时北京拔尖的影响最大的四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工作队进驻四中之前，彭真指示：要从广泛接触群众，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了解情况入手，不带框框，不定调子，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经过7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方了解情况，全面历史地进行分析，认为四中的成绩还是主要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缺点错误是政治思想工作比较薄弱，对教学工作领导不很得力，对带好教师队伍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认识不足，党内教育很差。得出的结论是“四中没烂，成绩是主要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从而亮明了市委的态度，对全市中小学的干部师生起了一些“定心丸”的作用。

为了稳定局势，市委还让我以教育局局长的身份给全市学生作报告，主要的内容是：学生要为革命而学习，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中学是打基础时期，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文化，需要掌握文化科学技术知识。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无法选择，立场道路是完全可以自己选择的。这个报告当时在中学学生教师和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意图是力求稳定学校的正常秩序，保证学生的正常学习，但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即将来临，这个报告自然扭转不了北京市中小学动荡局势。

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多年，我深深感受到他的优良作风和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深受教育。

(杨华锋 史坤坤 整理)

我心中的贺龙

——一个“红小鬼”的回忆

李 克

我初次见到贺龙元帅，是在1937年，当时我在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给程子华部长当勤务员，住在山西省离石县马茂庄村。

一天早晨，我正帮程子华穿衣服（程子华在战斗中双手致残），他问我：悟尘（我当时的名字——笔者注），你听说过贺龙吗？我顺口回答：听说过。他笑着说：今天你就能见到贺龙了，并嘱咐我把周平副支队长从太原前线带回来的战利品“日本罐头”打开几筒给首长们品尝。

早饭后我正在扫院子，忽听有马蹄声，十几位军人跳下马来，走进院子，为首的是一位留着八字胡、手提红缨马鞭的首长。他边走边喊：“子华！子华！”程子华很快走到院里，热情地迎接客人走进窑洞。后来得知，同来的除贺龙外，还有八路军一二〇师关向应政委、萧克副师长、周士第参谋长、甘泗淇主任。我把随行人员领进我住的窑洞，立即烧水。当我把茶水和打开的罐头端到首长们面前时，贺龙摸着我的头，问我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当我回答刚满12岁时，他笑着拉着我的手说，给我当儿子吧！

从那天起，他就记住了我这个“小鬼”，每次见面，都格外亲热地问长问短、关怀备至。有几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随首长们赴延安 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8月中旬，我随程子华骑马离开岢岚县，太阳落山前赶了120里路到了岚县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部。几天前，彭真也从晋察冀边区通过敌人层层封锁线来到了岚县。一二〇师首长组织了欢迎会，研究如何去延安开会的问题，然后我们就上路了。

我们一行20多匹快马，离开岚县向黄河边进发。贺龙骑一匹铁青马，手持红缨子马鞭，端坐在马背上，大笑着说：“来，咱们今天比一比，看谁的马跑得快！”随即命令警卫员把程子华扶上马，又叫司令部副官处杨虎臣副官把我抱上马，他关心地对我说：“悟尘！你要当心啊！”说实在的，我也担心从马上掉下来，可我当时并没示弱，说了句“没事”。贺龙说着把马鞭子一扬，两脚轻轻一磕，铁青马飞奔而去。彭真、关向应、萧克、程子华以及我们这些随从人员紧紧追赶上去。赶到兴县时，太阳快落山了。首长们3个小时跑了180里路，晚上，说说笑笑都很快进入了梦乡。谁料，第二天才知道，累死了四匹战马。关向应叹息着说：“它跟随我爬雪山、过草地，征战多年，是立了大功的，谁知道把它累死了。”贺龙见我走路一拐一拐的，两条腿成了“罗圈腿”，心痛地问我：“悟尘，痛吗？”我默默地点点头，没有哭。他鼓励我过几天就会好的。

补充马匹后，我们又赶着上路了。越接近黄河，人烟越稀少，道路越难走，住房越困难。为了减少老乡们的麻烦，宿营时几位首长同挤在一个窑洞。从行军路上到熄灯时分，首长们谈论着长征路上的艰难生活，向往着美好的未来，总是以欢乐、兴奋的心情，盼着早日到达延安。我跟随首长们鞍前马后，耳闻目睹，受益匪浅。

好不容易到了黄河边，贺龙在黄河渡口兵站给河西绥德国民党专员何绍南打电话，经过多番交涉，对方才答应给派一部汽车来。在船上，我第一次见到怒吼的黄河水咆哮着奔腾而下的场面，船夫喊着号子和风

浪搏斗，心中实在有些害怕。贺龙鼓励我不要怕，坐好不要动，船是翻不了的。我们靠岸后改乘汽车，破旧汽车不时需要停车修理，经过米脂、绥德、清涧、延川、延长各县，我们一行总算在会前赶到了延安城，住在凤凰山下八路军留守处。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关向应等17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到会，各地区负责干部林彪、贺龙、邓小平、彭真、徐海东、萧克和程子华等38位首长也参加了会议。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的内容我们当时不知道，但感到会议开得十分紧张。会议前几天，我随首长们住进会场，按规定随从人员都应该留在城里，会场安全工作和服务工作由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但因为程子华生活不能自理，破例批准我跟随程子华住进会场。

会场设在延安城东十里铺、清凉山下的桥儿沟天主教堂，会议代表大都住在这里。毛主席住城里，有时骑马有时坐车来参加会议。王明、博古、林伯渠等住院里的小平房，一人一间。其他首长住天主教堂内小格子房中，房门上挂着小木牌。我记得第一间写着朱德、彭德怀；有一间写着贺龙、关向应、萧克；彭真、杨尚昆、冯文彬和程子华四人住一间，睡的是三条腿木架支起来的单人木板床，铺着白布褥子和白床单，被子、枕头是自带的，其实枕头就是包首长衣服等物的小包袱。每天集体用餐，几天改善一次生活，从未超过四菜一汤。

朱德、贺龙喜欢运动，晚饭后，他们经常叫我抱着篮球、拿着哨子到简易篮球场。贺龙喜欢当裁判，吹着哨子跑来跑去，不时下达命令：“悟尘，快把篮球捡回来！”彭真、程子华站在一旁观战、助威，不时哈哈大笑。晚上，曾放过电影，是黑白无声影片，主要是苏联的《夏伯阳》、《列宁在一九一八》等。放映时，有人站在放映机旁现场翻译。看完电影后，贺龙、彭真、程子华常给我讲解电影的情节，使我知道了不少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故事。

会议期间，周恩来副主席坐飞机到武汉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程子华曾带我随朱德、彭德怀、邓小平、贺龙、关向应、徐海东诸首长到飞机场

为周恩来送行。贺龙问我：悟尘，你见过飞机吗？我说：没有。他说：你今天好好看一看，这是美国援华队的飞机。首长们在飞机前合影留念，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照片。

会议结束后，我们又回到了八路军留守处居住。不久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城，当晚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就搬出延安城。我随首长们骑马东渡黄河，回到一二〇师师部。

我这次在延安虽然只待了3个月，但对我的教育、影响却很大，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特别是贺龙师长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育永生难忘，在以后的岁月里，当我也成为一名领导干部并成家有了孩子后，我经常对部属和子女讲述这些经历，进行传统教育。

战斗在晋察冀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调程子华到冀中担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同时决定贺龙率一二〇师主力4000余人挺进冀中。临行前贺龙问我：我和程子华都到冀中去，离开你的家乡上千里路，你愿意去吗？我明确表示：首长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他说：那好，跟我们一起到冀中去。

我们1939年1月到达高阳县一带和吕正操、王平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为了统一领导冀中区党和军队的工作，中央指示组成了以贺龙为书记的冀中区军政委员会，关向应、黄敬、吕正操、王平、程子华等为委员，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对敌斗争，所以我见到贺龙的机会多，常能聆听他的教育。

1939年4月，河间县之敌向我军进犯，贺龙亲临前线指挥，歼敌700余人，这就是威震冀中平原的齐会大战。战斗中敌人施放毒气，贺龙中毒，正巧白求恩大夫也在冀中，前去为其治疗。我随程子华带着慰问团前去慰问一二〇师部队，看望贺龙，他见我流泪，拉着我说：老子还没有死，不要哭！程子华对他说要送我到一二〇师教导团学习，他表示赞同，并对我说：去了好好地学习，有机会我去看你。很快我就到了一二〇师教

导团参谋训练队学习。

1939年9月间，驻石家庄之敌1500多人，进犯陈庄，企图摧毁我晋察冀军区后方机关、学校。我当地驻军、学校师生英勇阻击，掩护机关、学校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当时我们参谋训练队驻在陈庄以东大夫庄村，我们班驻大夫庄北侧高地。

这时，贺龙率部队从冀中平原回师晋西北反击阎锡山对我新军的进攻，部队刚通过平汉铁路，到达唐县一带。得知敌人进攻陈庄，贺龙当即命令张宗逊旅长率部急行军赶到陈庄，将来犯之敌团团包围，展开激战。

张宗逊选中了我们班这块高地，作为指挥所观察敌我阵地。这天上午贺龙、关向应、周士第来到指挥所，刚听了张宗逊报告敌我态势，敌机飞临上空。我们正为首长们的安全担心，忽然看见敌机投掷许多降落伞，飘飘扬扬地落在敌我阵地上。贺龙当即对张宗逊说，敌已弹尽粮绝，立即发起总攻。张宗逊抓起电话，下达总攻命令，各个山头响起了机枪、火炮、手榴弹、冲锋号声。经过六天六夜的激烈战斗，歼敌1000余人。这就是抗日战争中著名的陈庄大战。

陈庄大战结束后，部队准备撤退时，贺龙叫我过去，拉着手对我说：“悟尘呀，我马上带教导团回山西去了，你不要学习了，还是回到子华同志那里去吧，他需要你。”我说：“是！”他回过头来对周士第说：“老周，明天派骑兵把悟尘送回冀中军区。”第二天，我通过平汉铁路，回到了冀中军区。程子华得知此情后，感慨地说：贺老总总是多为别人着想啊！

进军大西南

1943年4月，我随抗大二分校附中共1000余人，通过敌人层层封锁，行程4个月，徒步3000余里，从冀中平原来到延安。朱德、贺龙接见我们，并讲了话。贺龙说，发给你们三件宝——镢头、枪杆子、笔杆子。你们到甘肃省陇东豹子川抗大七分校学习，拿起镢头开荒种地，拿起枪杆子保卫边区，拿起笔杆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当我走到贺龙面前

向他问好时，贺龙问我：是子华同志把你送回来的吧？我默默点头说是。他说：你是第二次回延安了，机会难得，要多学些知识。我带着贺龙的期望，经过7天行军，到达豹子川，在那里工作、学习了4年。

1948年我军各个战场捷报频传，急需大批干部。贺龙命令我所在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步兵学校和贺龙中学到山西临汾合并组建西北军政大学，他兼校长。当我们东渡黄河到达临汾时，他百忙中亲自选定了校址——临汾北营盘，明确建校方针，边招生、边建校、边教育。学校门口挂起了西北军大和贺龙中学两块牌子，年龄小、文化低的入贺龙中学；年龄大、文化高的入西北军大，很快就招生1000余名。教课方法是集中全校上大课，分别组织讨论。

1949年5月23日，西安解放刚刚三天，西北军大第二期学生刚刚举行开学典礼，贺龙就电令迁移西安，大量招生。我随钟师统副校长等60余人乘车连夜赶到西安。贺龙指示西北军大校址设在西安王曲原国民党黄埔分校旧址，当我们先遣分队乘车赶到王曲时，敌人刚刚逃跑，各种教具、地图扔得满地都是。

1949年11月初，贺龙亲临西北军大，看到青年男女学生近万人在大操场欢迎他，非常高兴。他登上讲台，号召大家响应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当场宣布全体学生提前毕业，向大西北、大西南、向全国大进军。台下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当我送贺龙上车时，他对我说，我马上率部队进军成都，你也来吧。我说学校已决定我到西北军大南进支队司令部任参谋，负责组织第一批400余师生乘车南下。他高兴地和我握手告别。1950年1月我们到达成都新津县接收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完成任务后，我调西南军区司令部工作。

1952年在西南军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贺龙坐在主席台上，看见我在下面。休会时他从台上走下来，一把抓住我的手，高兴地问我：你都穿上呢子衣服了，当什么官了？我回答说：我在司令部军务处任兵员科长。他很满意，对我说他要到北京工作了，让我在大西南好好干，有机会去北京看他！我依依不舍，向贺龙敬了个军礼。不久，我赴抗美援朝战

场，回国后调南京总高级步校当教员。以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到贺龙，这次分手竟成了永别。

贺龙是我最尊敬的老首长，几十年过去了，他豪爽、生动、诚挚的音容笑貌和对我的关心照顾，仍经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鼓舞我不断前进。

萧克将军与共和国元帅的 相识相交

周炳钦

在1955年的将官授衔典礼上，周恩来总理颁发授予萧克上将军衔的命令状。在这次授衔的55名上将中，萧克名列榜首。也许这并没有表明萧克戎马生涯的全部，授衔前毛泽东曾亲自找他谈话，对他说，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别人就不好说什么了。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萧克不仅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他还有着与同时授衔的共和国元帅们相处共事的特别经历。他长期在朱德、陈毅、彭德怀的麾下工作，做过罗荣桓、徐向前、刘伯承的直接下级，担任过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的副手，还两次出任林彪的参谋长。萧克或在他们的指挥下，驰骋疆场，南征北战；或在与他们共事中，运筹帷幄，襄助戎机。20世纪90年代，我有幸参与了《萧克回忆录》的编撰工作。萧克将军与共和国元帅之间的深厚情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8年10月24日，萧克将军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享年102岁。我得知消息后感慨万千，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苦寻朱德，一见如故

萧克对元帅们有的是未曾谋面已慕名。他第一次见到朱德的名字，是在南昌起义后的街头布告中。1927年南昌起义时，萧克是叶挺部的一

个连指导员。起义军兵败流沙，他所在的二十四师溃败，他的那个连也只剩一二十人，不几天又全被俘虏。到释放时，他已是上无组织，下无士兵，身无分文。不久，他听到朱德在湘南领导起义的消息，并听说朱德是反袁护国军的高级将领，到西欧和苏联留过学，是共产党员，在湘南起义中以少胜多，打败了“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许克祥。萧克是从嘉禾县师范毕业后投笔从戎的，自然崇拜朱德这样文武兼备的将领，于是便决计去找朱德。

当时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各地党组织都转入地下，就连国民党军都难以找到“共军”的影子。然而，萧克坚信朱德的部队不会完，共产党不会完，天下终究是要光明起来的。于是，他根据自己捕捉到的信息，扒船到广州，又扒车到湘南，四下打探。他奔波了几个月，还乞讨过，但不仅一无所获，还把身体搞病了。万般无奈，他只好回到离别了几年的家乡湖南嘉禾县小街田村。他联络了几个同样在起义后溃散回来的同志，成立了中共嘉禾南区特别党支部，准备在家乡搞暴动。他想，只要闹出点声响来，就不愁找不到组织。

1928年春节前夕，党支部派人到临武星子坪活动，带回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朱德的部队在宜章举行起义！大家一致认为，搞武装斗争的机会到了，支部立即决定派萧克等人去宜章联系。还没到宜章，便探知起义失败的消息，朱德的部队已退到巴黎堡、黄沙堡一带去了。但萧克等却与宜章县碣石镇党支部接上了关系。这里正在准备搞暴动，需要懂点打仗的人，萧克他们便决定留下来一起干。根据支部决议，新组建的独立营由彭睽任营长，萧克任副营长，主管军事工作。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正当宜章独立营打土豪、分田地，搞得风风火火的时候，朱德派部下龚楷前来与当地党组织联系。龚楷到宜章时，正值独立营发动起义，就留了下来。后因彭睽调宜章县委工作，龚楷接任了独立营营长。起义失败后，他们判断朱德的部队已经东去，就率领600多名农民军向东跟进。在资兴东南的龙溪洞，这群扛梭镖的农民队伍意外地与毛泽东率领的井冈山红军会合了，又见到了著名的农民运动先驱毛泽东，十分高兴。井冈山部队也欢呼雀跃：“宜

章独立营来了！宜章独立营来了！”当时，毛泽东是为接应朱德部，率部队从井冈山进入湘南的。1968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萧克，还记得40年前的那次会师。他握着萧克的手说：“我们是在龙溪洞第一次见面的吧。那时候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啊？”萧克激动地答道：“男女老少加在一起，有五六百人、六七十条枪、300多杆梭镖。”毛泽东听后不住地点头道：“揭竿而起，揭竿而起！”

在龙溪洞休息了一天，萧克与部队就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向井冈山进发。到达宁冈的砬市镇，听说朱德的部队已集结在这一带。龚楷对萧克说：“你还没有见过朱德师长呢，我带你去见他！”萧克自南昌起义知道朱德后，早就想见到他。

一天，龚楷领着萧克来到龙江书院，一推门，就听见一个四川口音说：“是龚楷吗？快进来，快进来！怎么就你一个，和你在一起的萧克没有来？”龚楷把萧克拉上前，说：“他就是。”萧克激动地向朱德敬了军礼。朱德紧紧握住萧克的手，说：“你的名字我早就知道喽，你们干得好啊！”

萧克向朱德汇报了碣石暴动和在黄沙、梅田活动的情况，也感慨地说：“南昌起义失败后，我苦苦地找党；湘南起义后，也到处找朱师长！”朱德呵呵笑道：“是噢，你找我，我找你，现在终于见面喽！”“现在革命力量在湘赣边大会合，今后会有一个大发展。”从此，萧克就一直在朱德的麾下，英勇转战，由一名下级军官成长为一名高级指挥员。

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投了陈毅一票

萧克和陈毅都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但他们当时隶属不同的部队，分别任连、团指导员，还互不相识。直到湘南起义时，从人们常提到的起义领导人中，萧克才知道陈毅的名字。陈毅当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外面张贴的布告上有师长朱德和他的署名。

1928年4月下旬，朱毛井冈山会师后，两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陈毅任军委委员、第十二师师长。萧克在第十师二十九团二营七连任

连长。会师后不久，江西敌军对井冈山发动第二次“进剿”。陈毅率十二师一部随朱德率领的军部与十师翻越黄洋界，准备迎击左路进攻之敌，相机夺取永新城。途中在小行州宿营，陈毅专程来到十师二十九团驻地，看望这支以宜章农军为主编成的部队，鼓励他们做好战斗准备，在实战中提高杀敌本领。萧克在这里与陈毅第一次见面。随后，陈毅先后任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主要做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在萧克的印象中，陈毅经常向部队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善于宣传教育，鼓舞官兵的斗志。

1929年1月，红四军为了打破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的“会剿”，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这时陈毅担任第一纵队党代表，萧克任该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他们常常一起行军作战。萧克对陈毅有了更多的了解。萧克认为，陈毅性格开朗，豪放豁达，批评人很严厉，有时也骂人，但不记仇。因此，大家都觉得他宽厚、诚恳，愿意同他交谈。在这次进军的过程中，陈毅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处理红四军党内的那场争论，给萧克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自朱、毛红军会师以后，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四军党内及主要领导者之间，对红军和根据地建设问题，逐渐产生一些不同意见和分歧。红四军党的七大之前，争论的焦点开始是要不要在红四军设立军委，以后又引发出对红四军各种制度、政策的看法，争议最大的是“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1929年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打下龙岩后，根据陈毅建议，红四军前委决定利用部队整训间隙，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统一思想认识，解决当时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6月22日，大会正式召开，由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及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陈毅代表前委作了报告，毛泽东、朱德等先后发言，大家各持己见，争论激烈。毛泽东认为红四军党内对一些原则问题的认识不一致，前委不好工作。他甚至严肃地表示：前委现在是不生不死，这个问题不解决，他请求更换书记，让自己离开前委。为缓和气氛，陈毅努力地进行了调解。他诙谐地劝导毛泽东、朱德：“你们朱毛两人吵架，一个晋国，

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打架，我这个郑国怎么办？我跟哪个，站在哪一边？我还是希望你们两方面团结！”

会议只开了一天，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设立一个军委的意见，认为这确系机构重叠，无再设之必要。决议对刘安恭、林彪两个纵队一级领导在争论中推波助澜、散布挑拨性言词进行了批评；同时对毛泽东和朱德也作了批评。决议还指出：争论中所谓“党代替群众组织，完全不是事实”；说前委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失于武断，不合事实”；所谓前委领导有“家长制”倾向，“书记专政”问题，是“纯属偏见”。会议最后在选举新的前委时，通过举手表决，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等及各纵队的士兵代表共13人为前委委员；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大多数代表投了陈毅的票，萧克也是其中之一。结果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原来由中央指定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落选。由于这次会议的时间仓促，时机还不成熟，争论的问题未能很好解决。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去地方工作。部队中很快感到领导和政治工作受到了削弱，纷纷要求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复职。

后来萧克在谈到此事时认为，当时与会者大多数人投票给陈毅的初衷，是感到陈毅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出面调解矛盾，对停止党内争论、稳定局面起了好的作用。毛泽东、朱德之间的认识分歧和矛盾给部队造成了一定影响，也必然影响到他们的个人威信。

会后不久，陈毅即去上海向党中央作了如实汇报，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信中充分肯定了红四军斗争的经验，强调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决定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陈毅回到闽西后，按照中央的指示主动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工作，后又协助毛泽东、朱德成功地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古田会议，系统地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质上已为这次七大作了结论。

我军初创时期，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出现分歧，发生一些曲折，这本属正常。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地翻

出这段历史，无限上纲，借此打击迫害朱德、陈毅，萧克也因此背上“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

令人意想不到的，萧克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复出又与陈毅有关。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1月10日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原本没有安排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突然赶来悼念。毛泽东也许因为陈毅的逝世和此前发生的林彪事件，联想到当年在井冈山斗争的同志们。在休息室里，他突然问周恩来：萧克来了没有？周恩来马上机敏地答道：他在地出差。实际上周恩来像当时对其他许多老同志那样，也一直在关注着萧克。3年前萧克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时，周恩来曾提出给他带名炊事员，萧克谢绝了。毛泽东的这一问，使周恩来感到可以为萧克的复出作出安排了。很快，萧克于1月16日即接到电话通知：“农林部党的核心小组决定恢复你的组织生活。”20天后校部正式通知他，将派军代表陪同他返回北京。这年春节后不久，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找萧克谈话，宣布军委决定他到军政大学工作。于是，萧克振作精神，在阔别军队13年后，又金铎重操。

与贺龙并肩战斗的岁月

北伐军的高级将领贺龙，萧克早就耳闻；后在南昌起义及红二、六军团会师前的军内通报和中外报刊上，萧克进一步了解到贺龙的革命活动，对他深为敬佩。伟大的革命战争又使萧克和贺龙走到了一起，战争年代他们曾先后两度共事。

先是在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长征中，从红二、六军团会师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他们有近两年的时间在一起并肩战斗。贺龙任红二军团军团长，萧克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组成红二方面军后，贺龙任总指挥，萧克任副总指挥。

这段相处的岁月是令他们难忘的。他们一起运筹帷幄，挥师进军湘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由会师时的8000人，一年间就发展到2.1万余人。1935年11月，萧克与贺龙等率部退出湘鄂川黔革命

根据地，于第二年7月长征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

萧克与贺龙在这段相处的日子里，不仅收获了爱情，而且还双双喜得儿女。慈利县的一对红军姊妹花，姐姐蹇先任与贺龙、妹妹蹇先佛与萧克结为伉俪。在长征出发前夕，蹇先任与贺龙的女儿诞生，萧克为贺龙的这个女儿取名为贺捷生，意为“战斗告捷时所生”。这个在襁褓中就随军长征的女婴，如今是人民解放军的女将军。蹇先佛与萧克的大儿子堡生，也在长征过草地时出生，后在抗战期间不幸牺牲于日军的细菌战中。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假如说在红军的队伍里也有一对生死朋友，那么，这对朋友无疑就是26岁的六军团司令员、身材修长的萧克和36岁的二军团司令员、相貌英俊的贺龙了。”

抗日战争初期，萧克与贺龙再度共事。1938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贺龙、萧克分别任一二〇师师长和副师长。他们挥师东渡黄河，出兵山西，开赴抗日前线，在晋西北领导抗日军民打击日本侵略者，率部配合友军举行忻口会战和反击太原、石家庄的作战行动，并指挥部队独立地取得“收复七城”的胜利。1939年2月，萧克出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前往北平周围创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又与贺龙惜别。萧克在谈到当时的心情和在一起共事的感受时说：“在一起工作一年多，关系是好的。虽然我们在个人性格、作风、爱好方面有不同，有时还发生不悦，但在大的政策和军事行动方面是合作得好的”。

两次出任林彪的参谋长

萧克与林彪之间的交往共事，主要是在战争年代的两头。红军时期相处的时间较长，从井冈山起，直到1931年6月萧克任独立第五师师长时才分开。这期间，萧克任连长、营长、纵队司令，林彪都是他的直接上级。他还两次出任林彪的参谋长：第一次是林彪任红四军一纵队司令时，萧

克由所属第二支队调任该纵参谋长；第二次是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时，林彪任野战军司令员，萧克从华北军区调任野战军第一参谋长。

红军时期，因为他们是同龄人，萧克还年长林彪几个月，平时接触较多，相互还比较了解。萧克是师范生并在叶挺部任过职，林彪对于他的文化和军事素养是看重的。萧克在与林彪的交往中也了解到，林彪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到武汉后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排长，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林彪在湘南起义时任连长，因在耒阳一战中作战勇猛，被任命为营长。林彪是从见习排长逐级提拔上来的，平时注意对部队的训练，管理严格，临阵有决心且灵活，同时也很注意自身军事素养的提高。林彪爱看兵书，《曾胡治兵语录》、张乃燕的《世界大战全史》都读过，对军校的教程、条令较熟悉。1929年打下龙岩时，部队收缴到一本国民党军操典。林彪看后告诉萧克，这个操典好，并选出其中的部分让萧克刻蜡版，印发给大家。后来纵队成立教导队，这个操典是教导队的教材之一。

1929年秋，萧克任一纵队参谋长，林彪让他兼任教导队队长，规定他打仗时回纵队司令部，执行参谋长职务；不打仗时就住在教导队，全力抓教导队工作。萧克认为自己做军事教育工作，就是从此起步的。战斗宿营时，林彪常亲自与萧克一起看地形，如何部署兵力，如何组织宿营、警戒，边看边定，地形看完了，命令也就起草好了。

在这几年的交往共事中，萧克对林彪的印象是：有军事指挥才能，但性格孤僻，不聊天，极少开玩笑，给人以高深莫测和凛然难犯的样子。过分自尊，不大容人。

1949年4月，在第四野战军奉命进军中南时，萧克从华北军区调任第四野战军第一参谋长，这时林彪任野战军司令员，他们再次共事。萧克受命后，立即从石家庄赶到北平，与四野领导会合。罗荣桓政委当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已决定留北平。他向萧克介绍了四野领导干部的情况，并明确参谋长的分工，萧克主管军事工作，第二参谋长赵尔陆主管南下大军的后勤工作。

在四野主力自平、津地区分路南下后，四野机关即进至中原局所在

地开封。5月，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原局为基础组成华中局；将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与四野领导机关合并，改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领导干部职务均兼任。机构整编后，6月20日进驻汉口。在这次进军中，萧克率司令部机关，密切配合林彪指挥作战。在林彪的指挥下，先后发起宜沙、湘赣战役，组织策应长沙起义，随后取得衡宝战役的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白崇禧集团，为尔后进军两广，全歼中南地区之敌创造了条件。

1950年春，进军中南的作战还未全部结束，萧克即调任军委军训部部长。他在回顾这次任参谋长近一年的情况时说：在进军中南过程中，我与林彪合作是好的，他在工作上、业务上对我是信任的，但也有过一次争议。那是在1949年6月中旬，我们同到汉口。有一天，林彪同我谈中南地区的工作重心问题。他说中南地区几年之内应以农村工作为中心，并说了若干理由。我听了以后不以为然，因为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提出了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我也讲了些理由，但林彪听不进去。过几天，他便在华中局会议上通过了他的提法。7月1日，他又在武汉地区纪念党的28周年大会上大讲了一遍。次日，《长江日报》就将他的讲话全文刊登了。听说当时他将这个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表示可以按照自己所设计的几个步骤去布置城乡工作。1950年2月，邓子恢从北京回来，在华中局传达中央意见，中央认为华中局去年夏天那个口号与中央精神不衔接，要华中局自己讲一下，否则中央要讲话，因为“你们登了报的”。我在会上发言，中心意思是同意中央的意见，还讲了我的看法。但林彪在两天的讨论中含糊其辞，对中央的指示不置可否，却说我“否定一切”，从此产生嫌隙，耿耿于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无端夸大其词，加以指责。

萧克说，我同林彪共事多次，知道他的个人尊严很重。在革命游击战争时期，军队的民主作风好，同事间即便上下级也可以互相批评，可以争论。在当时那种方式是无人非议的，林彪也如此。但他成为一方重寄后，名望大了，地位高了，自尊也更严重了。他把自己的缺点推向极端，就不习惯于过去那种党内生活了。但我们还是按照老习惯同他打交道，他不能容忍，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襄助叶剑英办学、治军

叶剑英在北伐战争时已是军中的高级将领，萧克早已慕名，后来他们在中央苏区时相识。内战爆发前，叶剑英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为会商热察两省的军事调处问题，时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的萧克，数度与叶剑英一起同机往返于北平、张家口、承德之间，进行停战谈判和军事调处，相互间有了较多的直接接触。此后，萧克曾两度作为叶剑英的副手与他共事。

他们初次共事是在华北军政大学。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并决定在这里办“大党校”、“大军校”。这是中央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军委任命叶剑英兼军校校长及政委，萧克兼副校长。在此过程中，萧克感到叶剑英的办学理念使他深受教益。

萧克说，叶剑英当时提出的两句警句在校内深入人心，这就是“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学而教是谓害之”。叶剑英认为，军队一定要有教育，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同时教育者应先受教育，教员不仅要有“诲人不倦”的态度，还必须有诲人的本钱，否则就会害人害己。为此，叶剑英提出教员要当专家，要精通业务；号召教员与教员、教员与学员、学员与学员之间，要相互学习，相互为师；要求学员大队以上领导干部，每人都结合自己的工作，选学一门课程。叶剑英自己更是以身作则。萧克说，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他就是在那时听了叶剑英向他谈了列宁对这本书的评价后读完的。叶剑英还将自己读过的《苏联国内战争史》送给他看，他发现书中画了许多圈圈点点，作了不少眉批。

华北军大建校之初，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叶剑英提出“从那些脱离敌人营垒的旧军官和被我们俘虏过来的人中，吸收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来学校任教”。叶剑英把这一想法告诉萧克后，他积极拥护。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学校挑选和接受了一些有文化和军事知识

的俘虏与起义人员来学校任教。叶剑英要求学校各级领导和有关同志，对旧军官要做到思想上重视，态度上诚恳，政治上平等，生活上关心。同时他还身体力行，以平等的态度与他们对话交流，主动与他们商讨教学中的问题。虽然他们大都有受过中外各类军事学校教育的背景，但在叶剑英面前多属晚辈。因此，他们不仅敬仰叶剑英，而且更感受到人民军队对他们的信任，从而在教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萧克说，自己过去也赞成使用旧军人中有知识、有技术的人为革命做工作，在叶剑英的言传身教下，对争取旧军人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了，在实践中方法也改进了。

1955年4月，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组成，因部长刘伯承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由叶剑英代理部长。当时兼任该部副部长的萧克，又一次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两年多的相处共事中，叶剑英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及时提出新的治军方略，给萧克留下深刻的印象。

叶剑英从战略的高度强调军队正规化现代化训练，主张军事训练工作必须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适应。上任不久，叶剑英即向中央军委提出要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军队行动和战斗的训练，很快得到军委的批准。叶剑英认为我军几十年战争经验有许多是带有普遍性质的，这些原理现在和将来也是有用的。但另一方面，对于直接依存于技术的战术、战役来说，就有一定的时代性，技术装备改变了，作战的方法也要随之改变。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萧克说，叶剑英主持训练总监部工作期间，在上述思想和方针的指导下，先后连续组织了9次防化演习，全军有3000多团以上干部参观见习。叶剑英还亲自担任总导演，在辽东半岛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抗登陆演习，以探索现代战争条件下部队训练和作战的经验。这次参演的陆、海、空三军部队近5万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和一些友好国家的军事代表团前往观摩。通过这些演习，丰富了我军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知识，取得了诸军兵种合同战术训练的经验，把军队训练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心中永远的“聂司令”

在十大元帅中，萧克将军与聂荣臻元帅相处共事的时间最长，一起在正副司令员的任上就有7年多。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地区会师时。那时聂荣臻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委，萧克是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当时，萧克握着聂荣臻的手说：“聂政委，你是我的老长官啊！”聂荣臻注视着他：“这话怎讲？”萧克说：“南昌起义时，你是我们二十四师的党代表，我是七十二团二营八连指导员。”“是吗？”聂荣臻握着萧克的手用力抖了抖，似久别重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939年初，萧克奉命组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离开一二〇师来到晋察冀军区驻地河北平山县，从此他就在聂荣臻的领导下工作。1942年初萧克到晋察冀军区任职后，聂荣臻与萧克先后为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的正副司令员，直到1949年初萧克到第四野战军任职。萧克说，在此期间他们在一起办公，一口锅里吃饭。在共同战斗的岁月里，他们相互信任，配合默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让萧克难忘的是，在此期间聂荣臻两次紧急派他执行保卫石家庄的任务，充分体现了他们之间的信任和默契。

一次是1948年4月，晋察冀军区得到情报，国民党军的4个摩托化步兵师和骑兵师将由保定偷袭石家庄。解放不久的石家庄，当时正成为华北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党中央已搬到石家庄西北几十公里的西柏坡，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也在此筹建中。而这里除警备司令部不多的兵力外，几乎没有战斗部队，附近也无主力可调。就军事力量而言，石家庄近乎一座空城，形势十分危急。聂荣臻召集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领导，一起进行了研究和部署。萧克提出就近火速调遣兵力的方案，并提请在这次保卫战中，授予他对战区范围内党政军民最高指挥权。聂荣臻听后当即拍板同意，并说：“好哇，看来保住石门是没有问题的！”

萧克迅速赶往这个华北重镇研究对策，在做好军政机关和重要物资保护和转移方案的同时，想方设法迷惑敌人。他们通过市区的广播，不断通报敌情，告诉敌人的动向和我部队、民兵阻击的情况。每日晚饭后，萧克与市里的领导故意走上街头，还不时地同行人打招呼，让人们知道他们也没有撤。这样既安定了人心，也示敌我已作好准备。敌方不知虚实，果然不敢贸然前进。几天后，国民党军进到沙河就缩回去了。

第二次是1948年冬，萧克正在华北军政大学开会，突然接到聂荣臻的电话：“老萧啊，有情况了，敌人又要袭击石家庄，兵力和上次一样，你马上去那里，安排部署。”萧克这时兼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就在石家庄附近。聂荣臻向他概略地介绍了敌情和自己的考虑。尽管这次我方的兵力已有所增加，但较之欲犯之敌的兵力，仍然是敌强我弱，而且复杂的是城内的机关、团体更多了。不过这次萧克却成竹在胸：既然你故伎重演，我也故“计”再施，并将作战方案报告了中央。他除带了由学员组成的临时教导团参与设防外，还利用控制的敌方通讯设备迷惑敌人。为配合这次行动，党中央还利用广播、报纸等新闻工具，公开揭露敌人的阴谋。国民党军见自己行动被和盘托出，不得不又收兵回营了。事后，刘伯承说：是聂荣臻唱了一出空城计。聂司令听后笑笑说：不是我，是老萧他们搞的。

新中国成立后，萧克与聂荣臻虽然直接的工作关系逐渐少了，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往来。战火中锤炼的真挚友情，又经历了政治风浪的考验。

由于反教条主义的错误处理，1959年国庆节后，萧克被安排到国家农垦部任副部长。他离开军队后，虽然与聂帅没有直接工作关系了，但聂荣臻还常往趋问，同萧克谈与他工作相关的话题。聂荣臻在一份报告上看到海南岛水土流失严重时，马上告诉萧克：“你在农垦部，可要注意水土保持，不然子孙后代会骂我们的。你们开荒是好的，但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那场饥荒时，他们在一起谈到粮食问题。聂荣臻对萧克说：“要注意这个问题，没有粮食，军队不能打仗，老百姓也不会安定。”后来，萧克每当在工作范围内涉及此类问题时，他总

要想到聂帅的这些警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聂帅也受到冲击，大街上有“万炮齐轰聂荣臻”的标语。萧克说当时非常担心聂帅的处境，经常与他保持联系，给他以精神上的支持。但不久萧克也被造反派抓走了，被弄到农业大学的一间房子里，听说要开万人大会批斗。萧克家人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老伴蹇先佛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情急之下，她想到了聂司令，跑到他家写了一封求援的信，请聂司令转交给周恩来总理。虽然聂荣臻当时处境也很困难，但还是设法很快将信转到了。萧克并不知道这一切，只感到后来对他放松了管制，10天后就回家了。每当提到这件事，蹇先佛总是感激地说：“多亏了聂司令！”

可敬的良师刘伯承

萧克说，他与元帅们的相识都是源于革命。南昌起义时，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布告中刘伯承的名字，被参加起义的革命青年萧克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时他们终于见面了，那时刘伯承是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为了使部队顺利通过草地，刘伯承奉朱德总司令的指示，来给二方面军的干部讲打骑兵的战术，那次报告会是萧克主持的。刘伯承讲述了学习这一战术的重要性和基本要点，从实战队形讲到平时的演习，详尽而生动，使萧克对他丰富的军事学识和实战经验深为敬佩。

萧克与刘伯承较多的交往，是建国初他任军训部部长时。刘伯承的严谨和效率，给他的工作以极大支持。军训部成立后，当时亟待要做的三件大事，其中两件与刘伯承有关。

一件是编写军队共同条令。这是实现全军统一的首要措施，也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周恩来总理指示，内务、纪律、队列三大条令编写完成后，由刘伯承审定。但此时刘伯承还远在西南前线，萧克就决定每写出一部分，即派人给他送去。刘伯承在戎马倥偬中，拨冗指正，每次退还稿

本时都有附信，具体说明他的意见和建议。条令几经修改，从未在他手中耽搁过。由于刘伯承的全力支持，1951年2月三大条令即颁发全军试行。

另一件大事是筹建陆军大学（后正式定名为军事学院）。老一辈军事家们从人民军队创建之日起，就希望我军有一所正规的高等学府。萧克一上任，军委就指定他负责此项筹备工作。正当军委和军训部物色校长人选时，刘伯承主动请缨，恳切地向军委提出：“战争结束了，让我去办学校吧！”军委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他毅然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立即投入创办军事学院的工作中。学院开始准备设在北京，朱德还亲自同萧克一起看过几个地方，结果都感到不理想。后来萧克去南京，发现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址比较合适，就提出将学校设在南京。萧克去向刘伯承做了汇报，刘伯承欣然表示：“这事你定就行了。”接着，在可不可以选用旧军人来当教员问题上，他们又想到了一起。在当时师资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准备选调部分“解放”的国民党军官来校任教。有人提出怎么能让打败仗的人来教打胜仗的人？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能向旧军人学习呢？对此，他们在交流中认为，军事理论、军事原则是人类共同财富，哪个阶级都可以用。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军事学院于1951年1月15日在南京正式开学。

在与刘伯承的交往中，还有一件事是令萧克难忘的。1972年，萧克重新恢复工作后，军委任命他为军政大学校长。他一到职，就专程去看望了刘伯承，想听听刘帅的意见和建议。那时，刘帅已近80高龄。当萧克将情况向他汇报后，刘伯承高兴地说：“你又去教书了，好！我年老了，你还年轻，好好干吧。”不久，刘伯承还委托家人将自己保存的2000余册军事书籍赠送给军政大学。从刘伯承的所言所行中，萧克深深感到了他的殷殷之期和厚望所寄。萧克说：“在我的眼里，刘伯承同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元帅教育家，我视他为良师。”

“上书”彭德怀后的遭遇

萧克是在井冈山斗争中认识彭德怀的，当时他为有彭德怀这样的好军长率红五军来井冈山而高兴。在革命战争年代，萧克虽然与彭德怀直接交往不多，但一直对他非常敬重。

萧克与彭德怀接触最多的，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军训部部长和训练总监部部长任上。1950年6月，萧克任军训部部长。1952年彭德怀回国就医后留在中央，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彭德怀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1月萧克任国防部副部长；次年4月训练总监部成立，萧克兼任副部长，1957年11月任部长。在彭德怀的直接领导下，萧克感到他工作中魄力大，要求严，建章立制，强调效率。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推动全军学习借鉴苏军经验，加强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他的主持下，根据部队建设的实践和发展，修订军队建设计划，探索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的经验，逐步建立和完善军队院校初、中、高级培训体系，还于1953年、1957年两次重新修订和颁布三大条令。萧克说，回想起来，这段时间无论从我们党、我们军队还是我个人来说，都是一段难忘的岁月。那是一个齐心协力搞建设，全心全意干事业的时期，大家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到处充满了朝气。然而，就在他任训练总监部部长不久，那场突如其来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把他一下搞懵了。虽然其中有着复杂的背景，但他认为也与他给彭德怀写的那封信有关。

萧克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当时的处境，政治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在全党、全军掀起学习苏联的热潮中，出现了一些脱离实际、照搬照套的偏差。如对苏军条令、制度中某些不适合我军实际的东西，不加选择地套用。在南京军事学院，部分学员对当时实行的“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近似“三堂会审”的考试形式，反映强烈，认为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太紧张、太严格等。对于这些，他们也逐渐察觉了，并已在开始纠正中。但由于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又在整

风反右的背景下，影响了军队对学习苏联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在机关和院校中争论很大，以至反映到中央和军委，有人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

在这种情况下，军委对此非常重视。1957年2月，彭德怀亲自带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作调查，并向中央和军委作了书面报告。其中指出：“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适应。”“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参加军委秘书长主持讨论这个报告的会议上，萧克表示不同意上述评价。后来虽在措辞上作了一些改动，但认识上并没有统一。

1958年2月，彭德怀将一篇为纪念苏联红军建军40周年大会而准备的讲话稿，送给萧克征求意见。文中说：“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联系到对军事学院的评价，萧克感到有必要同彭总交换一下意见，就给他写了一封信，阐述这两个口号的正确性，并引证了《共同纲领》总纲及毛泽东等和彭总本人过去对这两个口号的论述。萧克提出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但建议将批判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本身。

当时党内军内的民主风气比较好，萧克给彭总写信开始并没有什么顾虑，并一直在等待回音，但彭德怀没有找他。因此他也担心这样直率地提意见，会不会引起彭总的反感。不久，他得到的是意想不到的回应。先是在训练总监部召开的贯彻中央“双反”（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决定的机关四级干部会议上，总政突然派来的工作组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5月下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发展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萧克受到严厉的指责和被点名批评。萧克的这封信也成了他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他是“挑刺挑

到国防部来了”。7月19日，彭德怀在会议总结中点名批评萧克“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军委决定撤销萧克在国防部和训练总监部的一切职务。

然而，就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后一年，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也成了被批判的主要对象。萧克说，就像我好意给彭总写信，却成了“挑刺”和“反党”的把柄一样，彭总好意上书毛主席，也被说成“下战书”，招致了沉痛的打击和磨难。也许是因为相同的遭遇，使彭德怀对“左”的错误有了痛彻的认识。他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儿彭起超，在有机会时一定要代他向萧克道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彭起超经总政联系找到萧克说，“伯伯早就要我向您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萧克听了非常激动。萧克说，其实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没有怨气了。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对党内斗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历史终将会恢复其本来面目的。

献给宋老的一朵茉莉花

陈 威

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往事都已淡忘。但多年前跟随宋老（宋任穷）的广西之行却难以忘怀。

1988年12月，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为了隆重庆祝这个节日，中央决定派出以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赴广西参加庆典。当时我在中顾委办公厅任编辑室主任，常驻玉泉山协助薄老完成专著的编写工作。有一天回中南海机关，厅领导问我想不想回一趟广西？我是广西人，新中国成立初期又在广西工作了六年多，当然愿意。于是请示宋老办公室，宋老表示他没有意见。这样，宋老秘书吴宗华同志和我，作为宋老的随行人员，乘代表团的专机飞赴南宁，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大庆。

宋老率中央代表团与广西各族干部、群众进行了广泛接触，开展了大规模的慰问活动，在12月11日的庆祝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极大地增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和睦，鼓舞了广西各族人民推进改革开放，把广西建设好的信心，圆满地完成了中央的重托。这些报刊都有记载。我想说的，是亲身经历的若干细节。

一是“让房”。代表团飞抵南宁后，入住区党委、政府的“西园宾馆”。原来宾馆不只一栋小楼，但有的已经拆掉，唯一留下的只有一栋曾供张云逸大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休养的独门独院，区领导安排宋老专用。宋老提出，他用一半；另一半由代表团副团

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同志使用。他的随行人员，除秘书外，住宾馆大楼。宋老这种“礼贤下士”和对党外人士的尊重，充分反映了打下江山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不骄不躁的作风，不愧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二是坚持“四菜一汤”的用餐标准。宋老一到广西，就根据当时广西的经济工作正在“爬坡”，人民生活并不富裕的实际，宣布庆典期间，不举行宴会，自己也不参加任何宴请。坚持每天在住所餐厅用餐，标准是“四菜一汤”。餐厅摆了两张四方桌：一桌是宋老夫妇，吴秘书和我；另一桌是费老和照顾他的一位亲属。没上山珍海味，但家常饭菜做得非常可口，量也不大，够吃了，一点不浪费。有一天中午，宋老亲自去关灯，说光线很好，不必开灯。服务员告诉他，这是装饰灯，才没有关掉。12月11日，宋老作重要讲话后，区党委书记、政府主席提出陪宋老吃一顿饭，加两个菜，宋老都婉言谢绝了。作为井冈山斗争的老战士和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国上将，革命胜利后依然保持战争年代那么一股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宋老不愧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三是牵挂革命老区群众的疾苦。当时宋老已近80高龄。照理说庆祝大会后，他到南宁附近的左江革命老区慰问一下也就可以了。但他坚持要到小平同志领导百色起义的右江革命老区慰问。当年南宁到百色既无高速公路又不通火车，行车要好几个小时，而且接待条件也比较差。宋老还是风尘仆仆地去了，并且提出，还想到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东（兰）、巴（马）、凤（山）革命老区看望那里的干部和群众。因山区路途遥远且不很安全，经地方领导同志一再劝阻才未成行。改革开放后，宋老曾身居中央政治局委员高位，退居二线后，心里仍始终装着曾为创建新中国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革命老区人民的疾苦，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润物细无声”。在宋任穷同志诞辰百年时，忆及他的这些散发着茉莉清香的细微之处，对于我们这些晚辈和后来人，都将是一种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和鞭策，激励我们努力工作，继续奋斗。

关于父亲瞿秋白的历史评价问题

瞿独伊

编者按：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1935年，瞿秋白英勇地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他那拒绝劝降、从容赴难的高大身姿早已定格于昭昭青史，永存于世人心间。然而，“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掀起“讨瞿”运动，把瞿秋白说成是“叛徒”，还编印了所谓“罪证”材料，以《多余的话》为依据，给瞿秋白强加上“投降”、“自首叛变”等罪名，并以文件下发，致其身后遭受不公正待遇。粉碎“四人帮”后，瞿秋白的英名得以恢复。那么，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就父亲重获公正历史评价的经过作了下述回忆……

走访老前辈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为了给父亲早日昭雪，我开始走访父亲的老战友和许多老前辈。这一部分我是凭记忆按走访的前后顺序记叙下来的，可能会感到零乱，但这是历史事实。

我走访的第一位老前辈是陆定一同志，当时陆老刚被解放，住在医院里。我去探视他，我问他：“为什么我父亲被诬陷为叛徒？”他对我讲了下述情况：大约1964年他当宣传部长时，毛主席问他要我父亲写的

《多余的话》看。陆老给了主席香港出版的司马璐著的《瞿秋白传》，其中附有《多余的话》。主席看过之后对陆老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有没有秋白亲笔写的《多余的话》？”陆老说：“还在解放区时，李克农同志曾说，外面有人要卖给我们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原稿，问我要不要买……我说，这是伪造的，不要买……周总理曾对我说过，他看见过，确是瞿秋白的笔迹。”毛主席对陆老说：“今后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宣传方志敏烈士。”

之后，我走访了杨尚昆同志，他原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说：“大约1962年主席看了《多余的话》对我说：‘瞿秋白对革命有贡献，但临终前写了《多余的话》，这是消沉，最多是动摇，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临终前还是可以谅解的。’我没有听到过主席说瞿秋白是叛徒。主席只说过‘瞿秋白怀才不遇’这样一句话。”

我去探望过薄一波同志，他问起我母亲的情况。我说：“妈妈被林彪、‘四人帮’关押了近六年，被他们迫害死了。”薄老听后流下了眼泪。他和妈妈共事过，很关心她。当我问起关于我父亲的事，薄老说：“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过，盲动主义的责任加在瞿秋白身上是不公正的。这个责任应由共产国际罗米那兹负责。《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瞿秋白已有评价。主席还说：‘立三路线问题，经过瞿秋白、周恩来已经解决。瞿秋白当时是比较有威信的领导人，如果交他来搞，后来不至于产生像王明路线这样大的错误，就是由周恩来搞也不会发生王明路线。’”

我看望萧三同志时，他回忆1939年他回延安后见到毛主席，谈话中他谈起老战友瞿秋白不幸牺牲，可痛可惜！毛主席沉默了许久，说：“是啊，如果他还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呀！”

访问丁玲同志时，她说：“我了解瞿秋白，早在解放区时就看过《多余的话》，我认为在《多余的话》里没有叛变的意思。”

冯雪峰同志的儿子冯夏熊对我说过，当红军要长征时，他父亲找毛主席问过：“为什么像秋白这样的领导同志不和大家一起参加长征？”毛主席说：“我也提过意见，但没有用，要问一下组织部长李维汉。”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复查

有一天我去北京医院探视廖承志同志。他说：“独伊，你应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你父亲平反。”廖公是我父母的好朋友，“文化大革命”后期很关心我和父母的平反问题，为此帮助过我。后来我到医院去看望陆定一同志，把廖公对我说的意思告诉了他。他说：“你应该听廖公的话，给党中央写信。”

过了几天，陆老要我到医院看他，我到了他的病房。他说：“我已写了一封信给陈云、黄克诚同志，请求为你爸爸平反。”并把此信底稿给我看，其内容如下：

陈云、黄克诚同志并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说秋白是叛徒，我很怀疑，现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意见，请求复查此事，理由如下：

（一）瞿在被捕之后，写了《多余的话》，情绪消沉，这篇东西，因周总理曾见过，确是秋白所写。但以此为根据，判定秋白是叛徒，则证据不足。因为它究竟不是自首书或反共宣言。

（二）定秋白为叛徒的是以谢富治为部长的中央公安部，时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谢富治人品很坏，当林彪、“四人帮”的走狗诬陷了很多好人，对瞿秋白的叛变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值得重新检查，不能轻率相信。

（三）秋白被枪决，国民党曾发过消息，登过报。如果秋白叛变了，国民党必须大肆宣传，但这种宣传并未发生。

专致

革命敬礼。

陆定一

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

于北京医院

我看完此信后，陆老说：“你赶快给党中央写信。”回家后我就给党中央写了一封请求给我父亲平反的长信。

在这封信里，我提到1946年我母亲和我从新疆监狱释放回到延安，毛主席单独请朱旦华和我母亲吃饭，我也在场。毛主席关心地同母亲说到瞿秋白时说：“你放心好了，中央已经对他的问题做了结论了”（指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不久，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了复查我父亲问题的复查组。中纪委成立复查组之前，在报刊上已有人发表一些文章，如黎澍呼吁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给瞿秋白同志平反。尤其是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起到了为我父亲平反的先导作用。后来复查组邀请陈铁健同志参加复查组的工作。

复查组组长孙克悠同志找我谈话。她说：“你给党中央的信我们看到了，你放心，我们会实事求是地复查。你的姑妈也写了信要求给瞿秋白平反……”

我和女儿想把问题搞得更清楚，决定去找杀害我父亲的宋希濂。

宋希濂谈了他所知道的情况。他说：“秋白先生在狱中确实写了《多余的话》，委托参谋长向贤矩寄给他在武汉的朋友，向贤矩问我可否寄，我说可以寄。蒋介石派两个中统特务到长汀和秋白先生谈话，劝降，但他们从瞿先生那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秋白先生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宋希濂说：“当时我直接审问过他，手下人多次审问过他，南京国民党组织部专门派人来审讯过他。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秘密共产党员。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当时我是看过的，这篇文章是瞿先生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从文字上看情调伤感消沉，但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

宋希濂说他在长沙中学读书时就读过瞿先生的访问苏联的文章，后来到广州在黄埔军校又读过瞿先生的文章，并听过他的报告。他说：“那时我对瞿先生曾经崇敬过，仰慕过。但是我当时肩上的国民党中将军衔亦就是反动的政治立场，促使我对瞿先生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

宋希濂劝过我父亲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说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适合中国国情。瞿秋白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屠杀人民，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当宋希濂对我父亲说，时到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产党和“匪区”有价值的情况时，瞿秋白说：“我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绝对不会放过我，自从你们知道我的身份之后，我就没有打算活下去……”瞿秋白是唱着《红军歌》、《国际歌》，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胜利万岁”走向刑场的。

我们说了约40分钟。回家后，我把谈话记录整理后交给了复查组，协助他们的工作。

复查组大约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和复查，了解了实际情况。他们走访了许多知情的老前辈和研究人员，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当时有些老前辈在报刊上发表了回忆我父亲的文章，这些文章为父亲的平反起了舆论作用。

孙克悠同志告诉我，本来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准备为刘少奇和瞿秋白平反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结论，但在五中全会上没有讨论有关瞿秋白的平反问题。她要我到京西宾馆找陆老，请他在会议上提一提有关秋白同志平反的事。我真的去了，并找了陆老转告了复查组的话。陆老说：“我和刘澜涛同志一起都提了书面意见，但没有被大会采纳。这样一来五中全会没有讨论也没有通过有关瞿秋白的平反文件。”

在这期间，我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问为什么父亲的平反问题在五中全会上没有讨论，是不是因为有个十二号文件（文件中说瞿秋白自首叛变了）不好改，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当时“两个凡是”还起一定作用。

复查组走访了好多同志，在上海还召开了20多位知情人参加的座谈会，材料收集得充分。当时我想，如果在北京能召开这样的座谈会该是多好！北京有好多了解我父亲的老前辈，也刚好是父亲就义45周年快到了。我分别找到了周扬、贺敬之、林默涵三位同志，给他们谈了我的这一想法，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并由中国文联向中国宣部并向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到由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

于6月17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西厅举行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45周年座谈会，邀请一些老同志、文学艺术界和社会科学界的知名人士参加。座谈会拟请周扬同志主持，请胡乔木、薄一波、陆定一、李维汉同志讲话，会后由新华社发布消息。座谈会倡议，由毛著编辑办公室研究瞿秋白的著作，搜集瞿秋白的手稿，编辑出版《瞿秋白文集》。有关文艺思想的著作，由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负责；政治论文由中央文献编委会编辑出版；并组织几篇纪念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这报告很快被批准了。座谈会于1980年6月17日召开，有300人参加。周扬同志主持会议，他还作了题为《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报告，这报告于6月18日见报。特别使人感动的是，茅盾伯伯眼睛刚刚手术也赶来参加会议，他是坐轮椅被推进会场的。他说：“回忆秋白的文章我已写了，并在报上发表了，这里我不多讲了，我只想提一个意见，秋白同志给我们留下很多遗著，我建议把他的政论由文献编委会编书，而文学著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来编。这是对秋白同志最好的纪念。”他说完后，我们就推他回去休息。

这里我要提一下，茅盾伯伯非常关心我母亲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关在“牛棚”，为了设法给被关押的母亲平反，我请假出来到茅盾伯伯家里避难三次。他和他的儿子韦韬及儿媳小曼热情地帮助和保护了我。我没有想到，在白区工作的年代我父母在茅盾伯伯家里避难多次，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又不得不在茅公家里避难。当时母亲有病，她在监禁中需要吃药，需要向中央反映她的情况，争取早日获得解放。茅盾伯伯、胡愈之夫妇热情帮我找药，并创造各种条件以便我给周总理写信。我从心里非常感谢和感动，至今难以忘怀这深情！

座谈会上发言很踊跃，谭震林、李维汉、袁任远、曹瑛、温济泽都发言了。谭震林同志发言中提到，说邓小平同志说过，秋白同志不搞家长制，他是最讲民主的。

李维汉同志也发言说，秋白在党内不搞家长制，他很讲民主。他还谈到八七会议后，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白色恐怖，我们就用“红色”恐怖来对付他们，因此犯了盲动错误。秋白犯错误是思想认识问题，和

王明的错误完全不一样。秋白在八七会议后代替了陈独秀的领导，但他还是尊重陈独秀，尊重他的人格，会后还去看望他，与他谈话。

曹瑛同志的发言也值得一提，本来上级领导不同意他代表复查组讲话，但曹瑛同志说，他不代表复查组，是代表个人来发言。会上他讲了复查的结果，当时这样做是要有一点勇气的。

虽然正式平反文件还未下来，但这一次座谈会和老前辈们在报刊上发表的纪念文章，实际上已给父亲平反昭雪了，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1980年10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父亲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下发了。复查的结果表明：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瞿秋白同志所作的历史评价，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把瞿秋白同志诬蔑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应当为瞿秋白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平反后的纪念

座谈会后，我们收集了近期发表的和以前许多老同志写的回忆我父亲的文章，并请人民文艺出版社编了一本书，书名为《忆秋白》，是茅盾伯伯题写的书名。在这一本书中有陆定一、周扬、杨之华、羊牧之、瞿轶群、沈颖、郑振铎、王统照、叶圣陶、胡愈之、丁玲、茅盾、曹靖华、萧三、周建人、李维汉、郭沫若、吴玉章、马辉之、冯雪峰、许广平、史平（陈云）、夏衍、邓伯奇、徐特立、李伯钊、赵品三、庄东晓、石联星、刘英、温仰春、李霁野和我的文章。以上同志绝大部分已不在世了，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回忆。此书出版后，很快销完，不久再版了。

不久，中央文献编委会、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人民出版社组织了两个瞿秋白文集编辑组，均由温济泽同志负责。文学编由王士菁和牛汀二位同志负责，政论编由丁守和同志负责。参加编辑组的同志们都是不脱产的，基本上是义务工作。《瞿秋白文集》文学编，是在原来冯雪峰同志编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未发表的作品，共出版六卷。政论编，过去未出

版过，完全是重新选编的，共八卷。

父亲平反后，1986年，陈铁健同志著《瞿秋白传》出版了；1989年，王观泉同志著《一个人和一个时代》（也是瞿秋白传）出版了。

在父亲就义50周年前夕，夏衍同志见到胡乔木同志向他建议，能否在瞿秋白就义50周年之际，开一个纪念会？于是，1985年6月18日在中南海召开了纪念瞿秋白就义50周年大会。胡绳主持会议，杨尚昆同志作报告。报告中他特别说明，因为秋白同志在身前身后都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不是在诞辰而是在他牺牲的日子开一个纪念会。杨尚昆同志对父亲的革命业绩给予了很高评价：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父亲获得平反后，学术界在他的家乡常州、南京、徐州多次召开过学术研讨会。家乡瞿秋白纪念馆编辑出版《瞿秋白研究》一书，一共出版了14辑，家乡常州成立了瞿秋白研究会。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也编辑出版了《瞿秋白研究文丛》等研究、宣传瞿秋白的书籍。

我写这篇文章以纪念先父，同时也为后人留下点真实的历史材料。

父亲的才思，他的理想，在错误路线的迫害下过早夭折，每回忆于此，总让人痛彻心扉。怀念父亲，也是真心希望我们的国家今后尽量没有这样的遗憾！

回忆父亲陆定一

陆 德

为了理想而革命

父亲1906年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家道殷实的官僚家庭。他参加革命很早。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很多人是因为家庭贫困、吃不上饭而奋起反抗，参加革命的。而父亲从小过的是诗礼相传、衣食无忧的生活。他1925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还在读书时就参加了五卅运动，受先进思想影响，矢志要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父亲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后来随着所受思想的影响而前进的。他先加入国民党，追随三民主义，希望实现工业救国、技术救国；后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洗礼，认识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靠工业和技术是不能救国的，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翻旧社会，打倒官僚、军阀，中国才能有前途，从而确定了他最终的革命方向。

1925年秋，父亲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20世纪20年代末，他曾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少共国际代表，是党的第一代革命家，也是共青团第一代领导人。

我的外公严朴也是中共第一代的早期革命家，他1925年参加革命，是江南一带有名的农民革命领袖。严朴家是无锡有名的大财主，但他早在1926年左右就把自己的田地分给了农民，之后又变卖了家产，投身到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并曾在瑞金苏维埃政府任财政部副部长。陈云同志称赞他是“三公子毁家闹革命”。我的母亲严慰冰，一个典型的江南才女，也抛弃富家千金的身份，追随丈夫和父亲，为同一个革命理想奋斗而无怨无悔。我的前母唐义贞被“左”倾教条主义者迫害，开除了党籍，未被允许参加长征而留在苏区战斗，后被地主武装“铲共团”抓住。她英勇不屈，是被敌人开腔剖腹而壮烈牺牲的。

早期红军条件恶劣，父亲又两次遭受“左”倾路线迫害，长征前丢“官”罢职，只是一名普通战士宣传员，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理想，即便是在长征这样艰苦卓绝的过程中，他扛着梭镖，文笔下产生的依然是《老山界》那样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

“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高山的陡立，夜行军的气势……一篇写景抒情、险中有美的散文《老山界》正是文由心生的写照。这篇文章后来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几十年来感染了整整一代人，也让后辈深深记住了“陆定一”这个名字。据老红军赵发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万里长征”这一政治术语也是由父亲提出来的。父亲在长征中与贾拓夫等人创作了《长征歌》、《打骑兵歌》等诗歌，他还独自填写了《会师歌》，其中《会师歌》是建国十周年大型歌舞剧《东方红》中的主题歌之一。这些革命歌曲都被后世传唱。父亲所写的《长征大事记》，记录了从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之前红一方面军每一天的活动情况和大事，成为研究二万五千里长征史的珍贵历史资料。

艰苦的长征见证了革命的情谊。父亲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廖承志曾被捆着长征，当他到达延安想照张相给妈妈何香凝报个平安时，连完整的衣服都没有。父亲于是脱下自己的衣服借给了廖承志。今天还能在军事革命博物馆里看到廖承志的那张长征照片，他当时穿的就是父亲的衣服。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进监狱时，中央专案组为了搜查所谓的“罪证”，不仅家里被掘地3尺，就连他身上的笔、表都被拆卸了。父亲出狱后，廖承志去医院看望他，看到父亲连个手表都没有，便脱下自己的手表戴在父亲的腕上。直到1996年去世，父亲戴的一直就是廖承志的那块

手表。

我名字的来历

1942年是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时期：当时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停发了军饷，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在冬天穿的还是单衣。就在环境和条件这样恶劣的时候，我降生了。因为是早产儿，我刚出生时的体重仅仅有4.5磅。妈妈没有一滴奶水，我的体重很快又掉到3.6磅，对于一个新出生的婴儿来说，这意味着悬在了生死线上。那时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一家一天只能分到一瓶牛奶。朱老总得知我的情况，就把自己的那一份让给了我们家。因为延安的医院条件差，没有婴儿暖房，朱老总同时又把自己的暖水袋拿出来给我家用。后来李井泉的夫人刚生完孩子就把我抱去，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哺乳。此外，给我喂奶的还有一位“廖妈妈”。

对于这些革命同志在困难时期的无私帮助，父亲很感动，为此给我取名陆德德，一是为纪念朱德，二是提醒自己要以德报德。直到1961年，我准备参军上大学，觉得“德德”这个名字太小孩子气，才提出改名字。一次观看文艺演出中场休息时，父亲向郭沫若提起：“我孩子马上就入大学了，但他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合适，请您给他改一改。”郭沫若就问一旁的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叫德德。”郭沫若晃着头想了想说：“就改叫陆德吧，少了一个字，但是意思没有变，多快好省！”

但这个寄寓了美好的希望、意义丰富的名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却成了父亲反党的“罪状”之一。有人诬陷说：“陆定一给孩子起的名字‘德德’，一个是朱德的德，一个就是彭德怀的德。彭德怀是反党的，说明陆定一很早就有反党之心。”当时父亲是这样反驳的：“这是形而上学的解释。第一，众所周知，陆德的‘德’是为纪念朱老总起的；第二，即使是为了纪念彭德怀，当时彭德怀是解放区的副总司令，后来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彭德怀是我们自己的革命同志。毛主席当时不也亲笔题词‘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嘛！‘陆德德’这个名字是1942年起的，你们不能把庐山会议以后才发生的情况颠倒过来去定罪。”

尊重事实首倡“双百”

父亲学识渊博，对古典文学和历史造诣较深，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他的英文水平也非常高。毛主席与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谈话，就是由父亲直接口头翻译的。父亲对待工作非常认真，他的文章从来不让秘书代笔，几十年来都是自己在“爬格子”。他笔耕勤奋而且谦虚好学，对不熟悉的领域和不懂的问题，都会虚心请教，学术上非常严谨。例如，20世纪60年代，他对原子物理了解不多，就拜专家为老师，还专门请何祚庥来给他讲课，一直坚持上课到“文化大革命”前才被迫中止。何祚庥赞叹说：“这么大的领导干部，还如此学习的，没见过。”正是这样的学风，他写的文章才能与众不同，提的方针政策才能务实而具有针对性。

父亲是中国“新闻”定义的提出者。早在1942年4月，父亲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就撰写了《从实际出发》等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同年8月，父亲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他撰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提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短短的13个字，是各种新闻定义中最短的一条，但却涵盖了新闻的所有特质。他明确指出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强调新闻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东西”。他始终坚持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和及时准确性，反对那种以“政治性”为借口，以“政治”为理由而篡改事实的做法，认为这就失去了新闻的真谛。父亲对新闻的定义虽被林彪、“四人帮”肆意批判，但深受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支持和拥护，至今仍被大学新闻系的教科书沿用。

历史上著名的“双百”方针，其内容也是由父亲提出的。他在1956年4月2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中，提出“双百”主张，被毛主席在28日的总结发言中肯定，其“双百”的名称则是由陈伯达建议的。1956年5月26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父亲在中南海怀仁堂，向自然科学

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毛主席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肯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主席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党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主要管文教卫体宣，他希望以他的努力，至少在这个范围内能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父亲在50年代那种大政治环境中，提出“双百”方针，提出要允许不同学术派别自由辩论，不要乱戴“政治帽子”，不要一派压一派，“要允许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的“四大自由”，提出“要把学术和科学技术研究同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是十分不易的。父亲在晚年时曾对我讲：“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还有待时日，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总希望在文化、学术领域能创造出一个自由研讨、畅所欲言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促其蓬勃发展。”这是他一生的理想追求。

狂涛急流中的坚定

1966年以前，我家住在中南海的增福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为母亲反对叶群和林彪，被打成反革命，抓捕入狱。当时父亲正在外地视察，他回到北京在机场才被通知妻子被抓，而且全家已被搬离中南海的消息。之后我们几个孩子随父亲搬到安儿胡同一个有两进院的房子。我们住里院，外院是警卫班，形同监禁。但这种看似平静的日子也没过多久。一天，中央文革小组来人，把孩子们叫到外院谈话。没多久我们就听到里院很乱，感觉肯定是出事了。当我们冲出来的时候，父亲的影子都没了，连告别也不允许。后来我们才知道 he 被抓进了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一个6平方米的单人囚室，里面没有床，只有地铺，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68164”。它有特定的含义：68——入狱年份；

1——特等犯人；64——这个囚犯的编号。父亲的名字就被这个“68164”所代替，而且这一代替就是13年。

整整13年，父亲被隔离关押。毛主席对“秦城监狱虐待犯人问题”批示后，被关押干部的亲属被允许定期“探监”，但我们却13年都不能见父亲一面。究其原因，是因为父亲始终坚持不认“罪”，而且不揭发其他“党羽”，是“态度恶劣”。参加公审“四人帮”陪审团的何访拔同志（北京市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后来和我谈起父亲的狱中情景时，非常感慨地说：“我看过所有被关押审查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审讯材料，你爸爸真是个硬骨头，一个知识分子被吊起来拷打审讯，态度依然那么硬。”父亲被抓后不久，江青又点了四个孩子的名：陆德、陈小鲁（陈毅之子）、粟寒生（粟裕之子）、董良翻（董必武之子）。中央文革小组要这四个人到公安部投案并接受审查。其中我是唯一从清华大学被直接押送到公安部的，之后在监狱待了6年。在监狱中他们要我揭发父亲，按着他们的调子说，不然就不给饭吃，还要挨打。一次我被推到一间黑屋子里，几个人轮番踢打。我还在“学习班”挨批斗，遭殴打，最终被打断了一根肋骨。

当时为了整掉父亲，中央专案组采用的是“株连九族”的做法，不管有无问题，凡是主要亲属都抓起来，被关押的多达63人。我的外婆和叔叔被整死，一位不愿说假话的证人被专案组打死，一位副部长自杀。我妈妈被戴“背铐”5年多，两手铐在背后，吃饭睡觉都不让摘。但这都不能摧毁他们的意志。

我蹲监狱的时候，弟弟妹妹也被赶出家门。妹妹陆瑞君终日低头沉默。弟弟陆健健在清华武斗的时候，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要去火车站长凳上过夜。由于陈伯达批示只给陆定一家“最低生活标准”，故一个月弟妹只能领到12元生活费，每天4毛钱，只够大学里的两顿饭费。但是就这样，得知我在狱中得了肝炎，弟弟每月探监时还会给我带两斤红糖。出狱后我才知道，这是用他每天省一顿饭的钱买的。

父亲的言传身教

因为工作忙，父亲和我们直接交流的机会并不多。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更忙，白天黑夜都要工作。当时他担任中宣部部长，《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在他签字后才能发。《人民日报》每天凌晨两点开始排版，所以他必须两点前把文章批完。父亲每晚都要两点以后才能睡觉。孩子们和他最多只能一起吃一顿晚饭，也只有这时他才有空问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父亲这一辈子，平常很少找我们谈话。和我交流最长的一次是1961年我去哈军工上大学之前，他专门抽出两天时间给我讲了讲老子的《道德经》。他认为《道德经》充满了辩证思想，年轻人要独立思考、辩证思维，不能再是简单的1加1等于2，很多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他还让我重点看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说我们走上社会必须学会辩证地看问题。

作为一个学者，父亲一辈子都在看书学习。直到去世的前三天，他还在床上看书。他对我们子女的要求就是好好学习，将来为建设新社会贡献自己的能力。但他不希望我们走仕途，60年代就告诫我们“不要去作官，而要好好学科学技术”。我去哈军工和清华大学学习技术，他非常支持，但是他并没有在入学时帮我们走后门，两个学校都是我自己按正常程序进入的。如今，我们三兄妹都是技术型的干部，没有一个是走仕途的。

我和妹妹、弟弟都把父亲当做心中的行为典范。没有文字的照本宣科，我们却在日常生活中模仿着父亲的一言一行，规范着自己的道德行为。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父亲在外面视察，接见工人和农民时都是主动两只手握过去。有时候别人也会提醒，身为国家高级领导人，不需要那么谦卑。他回答说：“民以食为天，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最值得尊敬。”父亲在改革开放后，到各地视察，都会特别叮嘱不要搞形式，不需要警

车开道，不需要保镖和官员们的前呼后拥。他曾说：“安全和接近群众，到底哪一个更重要？我们不能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从来不摆谱，不铺张。

父亲去世后，他的悼念活动规格是500人。但要求前来悼念的人很多，讣告连续加印了6次（每次500份），最后4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父亲去世前并不身处显赫的地位，但由此可以看出其影响很大，那一次让我们全家颇受感动。

父亲在遗嘱中写道：“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回想过去，大至政治主张，小至个人品质、个人道德，都是没有什么遗憾。古来志士仁人，老来都有‘悲慨’，我没有这种悲慨，因为我亲自参加的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和一百年的帝国主义统治，把中国扶到富强的道路上。哪里还有什么‘悲慨’可言。我怀念革命中牺牲的无数有名无名的烈士们，相信中国人民将会永远纪念他们……我已老迈，不能为革命和建设做更多的贡献，相信必定后继有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千年的事业……这个事业必定胜利，但它又必须经过长期奋斗才能实现。”

父亲临终时讲：“参加革命几十年，几经生死，我无怨无悔。”他最后的一句话是：“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

朱元石

胡乔木从1961年夏开始病休，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被审查和“冷冻”，直到1975年，在邓小平的交代下，他着手筹备和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并开展工作。也就在此时，我有幸同胡乔木有所接触，并在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中深入了解其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风格，而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初识胡乔木

在接触到胡乔木之前，我们年轻人早已知道他是毛泽东的秘书，不仅心仪已久，而且对他充满了好奇。谁知一见他面，倒觉得很平常，文弱书生模样。

胡乔木温文尔雅，性情平和，说话细声细气，慢条斯理，娓娓道来。听他讲话，只要能一字一句记下来，就会惊奇地发现，那是一篇如同已经经过字斟句酌的文章。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热火朝天，但是中兴波澜，不久便被说成是“右倾翻案风”的黑风口。胡乔木又一次陷入政治危机。

有一次，我在中南海紫光阁旁的小道上，与正在散步的胡乔木不期而遇，就同他一起走着。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他这样亲近地说话。他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是上海人。他噢了一声：随即不无调侃地

说：在上海，上海人可是看不起苏北人的呀，苏北人大多是在那里做最底层的工作的。可是一个大城市，没有这些被看不起的人在工作，恐怕就很难维持了，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我说，是的，但不少地方可能都有一种盲目的地域偏见，从而会有意无意地排斥外地人。然后不知话题是如何转变的，他说他重新做工作以来，就有一种特别兴奋的劲头，觉得有做不完的工作，所以就像拼命三郎似的踢打。他对当时的前景并不太乐观，说他前一阵子的劲头也许是回光返照吧。

“四人帮”倒台后，大家都欣喜若狂。胡乔木和邓力群等带领政研室全体人员到天安门前游行庆祝，欢天喜地地走了一圈。胡乔木一下子年轻了，不苟言笑的他脸绽笑容，跟着大家一起高喊口号。

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

1977年中央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部级单位，派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三位领导——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胡乔木任院长和党组书记，邓力群协助他，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于光远也是副院长。于光远是胡乔木向中央推荐的。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陷入困境的时候，邓力群和于光远是最保护胡乔木的。当时邓力群大包大揽，把自己做过的事的一切责任都担当了起来，不推到胡乔木身上。于光远是另有高招，说东道西，讲得很热闹，但造反派听了却是一本糊涂账，抓不到胡乔木的半点把柄。所以这三个人整整齐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来，大家都一片叫好。1977年11月，中央正式发出任命通知。

当时朱佳木随胡乔木、我随邓力群一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组建院一级领导人员的工作中，邓力群曾向胡乔木推荐周扬。邓力群认为，毛主席说过，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现在周扬还没有工作。周扬调入后，也很快担任了副院长的职务。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草创阶段，困难很多。办公室不够，宿舍不够，随

着大批干部和研究人员的调入，这些原已存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本来已经够拥挤的办公室越发不够用。为解决燃眉之急，胡乔木和邓力群首先合计把他们两人的办公室合并，让出一个。那时实际上就是朱佳木和我在胡乔木的办公室里摆了两张办公桌子，邓力群的办公室完全腾了出来。这在领导同志之中起了带头作用，反响很好。嫌办公室小、太挤等的抱怨声，一下子便销声匿迹。

尽管条件有限，但是也要搞得整齐清洁，这是个机关单位的面貌问题，不可小视。越是困难越要有一种精神来支撑。胡乔木看到厕所很脏，就自己动起手来打扫卫生。这种无声的、榜样的、没有批评的教育，使得人们感动不已。举一反三，全院上下每一角落里的扫把和抹布都跟着动了起来。后来新调来的外事局局长王光美，竟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人们看了，纷纷说老革命的作风回来了，艰苦朴素不简单！邓力群坐的小汽车是一辆已用过很久的伏尔加，司机开起来就像老牛拖车。上级又为邓力群配了一辆红旗轿车，他说，我的车还可以用，把它配给周扬同志吧。这辆有些气派的红旗轿车便让给了周扬。这也成为领导同志之间的一段佳话。在胡乔木的带领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正气抬头，歪风邪气吃不开，大家一门心思都扑在了工作上。

做党和政府的得力助手

胡乔木一心一意要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成一个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殿堂，使之成为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

这个时候他的工作非常忙碌。他当时是中共中央的副秘书长。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胡乔木又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责任更重了。他自己身体力行，不断为中央起草着各种文件，并兼而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支队伍左冲右突。他以“还我青春年少，达旦不须辞”的情怀鼓足干劲，以“老马知途好着鞭”的自觉奋发勇进，不顾身上的病痛，“小车不倒只管推，车倒扶起往前追”。

1980年2月，我根据邓力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多次讲话，写了一篇

文章《共产党员要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约有三四千字，发表在2月22日的《北京日报》上，占了第一版下面近半版。新华社为此也向全国发了通稿，许多报纸转载，反响很大。邓力群说我写得不错。据《北京日报》的同志说，胡耀邦也打电话去表示很高兴看到这篇文章。胡乔木因为办公室合并后总是有所不便，不大到办公室来。有一次由秘书黎虹陪着来了，他向黎虹介绍说，这就是朱元石，声音轻得其他人难以听见。黎虹走上来热情握手，我看得出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秘书，不像我完全是一个生手。后来又有一次，我在走廊里碰到来院的胡乔木。他说，那篇文章是你写的？难怪乔木这样问，因为文章的署名是“元石”，没有出全名。我回答说，是。他点一点头，嗯了一声，没有说称赞的话。我知道，在他面前，我的文章是否论述到家，是否完善确当，那是不一定的。在这位每字每句都要较真的老人家眼里，这文章一定有不少不足。胡乔木在理论问题上更不轻易表扬人，他的严谨作风我始终心悦诚服。他没有批评，就是对我的鼓舞，我心满意足了。

后来他多次说了跟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话。1981年1月23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常委扩大会上郑重地说，在政治上，我想也应该这样说，社会科学院里至少是绝大多数的研究所，是能够跟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上跟中央保持一致，和我们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这两个要求之间并不矛盾。”他强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党和国务院领导的一个社会科学机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个科学研究机关，理所当然地、毫无疑问地要同怀疑以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斗争。“中央提出与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要起到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的作用，就只能通过它的科研成果。不作这样的努力，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在胡乔木的精心领导下，经过两年半的艰苦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有了相当声势，全院工作人员已达3760多人，党员占到一半，有1880多人。1980年5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第一次党代会。胡乔木在报告中首先说，得到中央书记处的同意，中国社会科学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党组的工作就结束了。我这个院长要做些什么？我想讲一下社会科学院的根本

任务问题。他开宗明义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服务，要为社会科学的现代化服务，为社会科学院本身的现代化服务。“首先，它应该通过科学研究的成果，来做好党和政府的助手。这也就是为社会和人民服务。”这个报告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胡乔木说，政治是政治，学术是学术，政治也可以作为科学来研究，“我以前说过，我们不希望把社会科学院变成一个时事的论坛，因为这不_{符合}社会科学院的身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不在这一方面。它如果讨论政治问题，就是把政治当作一个科学的对象，它要写出有严肃性的、有充分论证的、系统的科学著作。”“我们不但过去搞了很多的清规戒律，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守着这些清规戒律，使得马克思主义这一门应该是最富有生气的科学变得没有生气。我们的社会科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我们的共产党员应该负起这样的责任，研究新的材料，研究新的问题，研究新的方法，写出新的著作。”他进而说，“今天的报纸上发表了邓小平同志为儿童节给《中国少年报》的题词，上面说，希望全国的少年儿童要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我们不是少年儿童，可是，我们需要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这只有通过严肃的科学研究，拿出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相称的产品才能做到。”可见，胡乔木在解放思想方面，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方面，常常是站在前列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是在胡乔木坚持下创办起来的，成果喜人。从这个研究生院毕业的学生，不少已经是科研战线以及其他战线上的骨干和领导了，他们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新一代中坚力量。胡乔木对研究生院给予了特殊关切，做了不少细致工作，感人的事情更是不胜枚举。研究生院创办初期，吸引了全国的不少有志学子。有一位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的残疾青年，在考入研究生院以前在上海市烫金材料厂工作，曾在1977年被评为市轻工业局的先进工作者。他是因幼年时患小儿麻痹症造成下肢残疾的。他在考入研究生院前，胡乔木曾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作调查，看有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然后决定是否录取。哲学所为此曾派专人到上海进行审核。1981年9月，他研究生毕业出来，分配到上

海的一个科研单位，人事处竟因他有残疾而拒绝接收。他拄着拐杖到处求告，奔波了9个月也未能解决。胡乔木得到反映，即于1982年6月29日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写信，要求过问一下，尽可能给予这样的不幸者以人道的援助。他说，他既能自理生活，为何不能让他研究西方哲学史呢？“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和同志爱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后来我在把这封信编进《胡乔木书信集》时，不觉为胡乔木的这颗金子般赤纯的心所感动，止不住流泪。

1980年12月，胡乔木鉴于自己的头衔越来越多，在中央的工作越来越重，“深感再兼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职务，实在负担不了”，终于向中央提出辞去院长职务，同时建议也批准时任中办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工作头绪也很多的邓力群，辞去副院长职务，一起专心中央的工作。这一要求得到中央的批准。

我和朱佳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待了些时候，最后都回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去工作。后来，我读到胡乔木在1982年写的题为《仙鹤》的诗：“你娴静，又欣然起舞翩跹，/你沉默，又俄然飞鸣震天。/除了避敌，你行止常闲，/除了孵卵，你直立不蜷。/不猛不怯，你温良而庄严，/不骄不媚，你入世而超然。/勇毅啊，你不顾远道无援，/忠信啊，你每年春北秋南。”由此深深地感悟了胡乔木自身的意念，完全地理解了他的为人和待人接物、处世之道。

回忆胡乔木

王梦奎

早就读过胡乔木的文章和诗词，直到1981年才第一次见到他。

当时我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4月16日接到办公室通知，要副研究员以上人员到中南海西楼听胡乔木的报告。我向来不喜欢听报告，虽然是胡乔木的报告，还是向办公室请示：可否不参加？答复是要参加。这就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了胡乔木的报告。

胡乔木身材瘦小，文弱安详，在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中一直端坐着，似乎连臂和手都不曾动过。他不善演讲，慢声细语，缺乏抑扬顿挫，像一篇平铺直叙的文章，不能引人入胜。当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这篇讲话经过整理，收入稍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论文集。我读了一遍，竟和听讲的印象全然不同。他讲的观点或许有某些可以商榷之处，但整个报告思路开阔，有许多独到见解，显示了他理论功底的深厚和思维的缜密。他所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不同流派和模式，关于对社会主义观念的不同理解，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开端的设想和推测，都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他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不断地总结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不断补充、修改，个别原理要修改，更不要说具体提法了。”现在这已经成为常识，但胡乔

木是在1981年讲的，当时人们的思想还很禁锢。那时他正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的大概是起草过程中的一些想法。

二

第一次同胡乔木面对面谈话是1984年5月14日。当时我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副组长，被通知到胡乔木南长街住所听他谈关于经济文章的写作问题。同去的有经济组的吕律平和郑新立。这次谈话是漫谈式的，主题是不集中的。主要是他讲，我们听，从我保存下来的记录篇幅看，谈了大约一个小时。

胡乔木说，这几年经济上的转变是非常之大的，但还没有文章来说明这种转变。这类文章不算少，大抵是涉及的范围愈小文章愈多，概括性的比较少。要对改革作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要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作些总的概括，在关键问题上讲些道理出来，说明我们的步骤和成功，以及为什么会取得成功。他把当前的经济改革概括为：城乡都是摆脱“左”的束缚，城乡都有多种经济形式，城乡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城乡的改革都冲破了原来管理上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都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谈得比较多的是农村联产承包问题，讲了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的历史过程。胡乔木说，要从理论上说明，承包制为什么有那么大力量，不能仅限于分配方面。谈到当时还在讨论的实行承包制后农民能否拥有汽车、拖拉机等大型生产资料的问题，胡乔木说，他还没有想得太清楚，既然实行承包制，对社会主义是个进步而不是退步，农民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是合理的、必要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胡乔木说到近几年自己没有写出有分量大块文章的原因。据他说，胡耀邦对他1977—1978年写的关于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章，以及后来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都比较满意，但此后就没有那样有分量的文章了。他解释说，这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上疏忽的地方。每年都有一两篇

重要报告或讲话、决议，其中包括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报告。身体差了，干点这个，干点那个，很难有时间写长的东西。他说的是实情，也流露出无奈和烦恼。

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红旗》杂志向我约稿，我写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发表在1984年第15期。文章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原理，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改革作了一些理论上的说明。这篇文章算是对胡乔木谈话的响应，但现在看来分析不深，说理显得一般化，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

三

1984年11月中旬，研究室领导要我随胡乔木到外地调查研究。行前到胡的办公室谈了一次话。他说，想到广东做些调查研究，例如农村经济和供销社问题，看看城市在改革与开放中的新动向，也想在那里休息些时日。11月30日启程。胡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按规定在列车上单挂一节车厢。同行的有他的秘书邱德新和警卫参谋魏建国。沿途无事，我在车上写了一篇关于企业领导制度的文章，材料是事先准备好的。

在广州停留两天。12月2日至3日，和先期到达的胡启立、艾知生、彭珮云一同听取关于广东教育情况的汇报。12月4日，胡乔木同胡启立一行同车到深圳。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浩和新华社分社记者刘卓安同行。胡乔木在列车上时断时续地几乎是一个人讲了一路，谈话内容现已毫无印象，好在我手头保存有一份省委宣传部整理的记录稿，从中可以看出主要是谈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他说：哲学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是要研究实际问题，二是要把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充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去，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僵死的东西，成为教条。关于实际问题，他列举了农村联产承包制的研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研究，认为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问题要按照实践加以正确的而不是离开实际的空洞的解释，不要说得太绝对。关于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他列举了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说社会主义社会许多发展规律是一个系统。

胡启立当时也是政治局委员，只是偶尔插话，其他同行者都没有讲什么话。

在深圳只住一晚。一天多时间，胡乔木召集市委组织部、宣传部以及市总工会和共青团干部开一次党建问题座谈会，参观一个渔民村。村支部书记吴柏森说，全村147口人，过去人均收入30元，现在增加到430元，都盖了新房。有两间窝棚式的破木板房，那是有意保存的历史见证。胡乔木向吴提出两点要求：一是每年吸收一个人入党，二是找一个省内中等水平的渔民村结成姐妹村互相帮助。还说，村民委员会应该是全体村民选举出来的集体代表，要有权。

12月6日，胡乔木和胡启立一行同乘游艇到珠海，住石景山旅游中心。在珠海基本上是休息，市领导来看望和汇报工作只是例行公事。有两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件是，胡乔木对宾馆女服务员浓妆艳抹颇为不悦，晚餐时拉着她们的手说：指甲涂成红色或者别的什么颜色我不管，但从事餐饮服务留这么长的指甲是不卫生的，希望你们剪掉。剪过指甲回来，胡又问：你们知道文天祥吗？知道他写的《过零丁洋》的诗吗？零丁洋就在珠海附近，今写作“伶仃洋”，是南宋最后兵败之地。几个服务员对文天祥和他的诗毫无所知，瞠目结舌。胡不胜唏嘘叹惜，命人找来纸笔，当场写出文诗，逐句讲解，还鼓励她们“留取丹心照汗青”。在同服务员座谈时，考问的问题包括什么叫直角三角形，以及澳大利亚在哪个洲等等，都极其严肃认真而又有些天真。

另一件是，一天到游乐场参观，那里有座当时国内还比较罕见的“过山车”。我怕眩晕，未敢奢望，年过古稀的胡乔木却老当益壮，执意要上去玩一把。因为这种娱乐太惊险，警卫竭力劝阻，推托说负责人不在，打不开。胡很不高兴，背手独自前行，低声嘟囔道：“这班小人。”我很诧异，这件小事何以引起他的不满。后来还是做了一种虽然悬空旋转但缓慢安全的转盘游戏，才算转嗔为喜。

大约是12月14日离开珠海，经中山、江门、新会和佛山，沿途听取当地领导汇报，参观考察工厂和农村。胡乔木问了许多基层的具体问题，没

有作正式讲话。在新会看了梁启超故居和“小鸟天堂”。16日抵达广州，仍住珠岛宾馆。胡乔木在广州逗留月余，休息和治疗眼疾。眼科专家、中山大学毛文淑教授多次到宾馆为胡乔木检查治疗，说他的眼睛分泌物过多、视力模糊是用眼过度所致。我也顺便作了眼睛检查，毛教授警告我，年老可能发生同样毛病，并建议我使用新材料塑胶镜片。毛的丈夫陈耀真是中国近代眼科的创始人之一，重病卧床，我陪同胡乔木到医院探望过。到郊区访问过专业户，参观过华南植物园。元旦前夕省委书记任仲夷到宾馆来礼节性地看望和宴请。

1985年1月22日下午，在广州参加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研讨会文化部副部长丁峤和电影演员张瑞芳、赵子岳，到住地看望胡乔木。胡向他们祝贺电影表演艺术学会成立，说明没有得到开会的消息，否则是会去参加的。他谈到一些电影和关于电影的文章，也说到一些演员，讲了不少很专业的意见，显然对电影界的情况很熟悉。他说：中国电影不论三十年代的，五十年代的，都有独到之处。中国的电影表演艺术是在不断进步的。我们往往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比如《茶馆》，如果不出国演出，在国外得到好评，国内不会有那么大影响。电影也要出国，获得国际上的承认。中国电影固然有不足的地方，但外国人无论如何演不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来。又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艺术的真实要跳出生活的真实，这就需要勇气。艺术作品往往有不真实的东西，比如《巴黎圣母院》，很难说有多少真实性，但不能否定它是优秀作品。艺术作品有时候创造一种境界，使人不去计较具体的真实。丁、张、赵听得入神，频频点头称是。次日晚，胡乔木到中山纪念堂观看演出，休息时间会见了张瑞芳、秦怡等电影演员。这次谈话，我做了记录和整理，后来以《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为题，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一书。

在广州那段时间，我经常陪同胡乔木在院里散步。散步时的谈话是随意的，或者可以称作“散话”，不连贯，没有主题，漫无目的，零零碎碎，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的广泛领域，以及许多历史和现实的人物和事件。他的许多说法，见人所未见，对我来说则是闻所未闻，

真是受益匪浅。他对西方文学很熟悉，对党的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有亲身见闻。今天，回顾往事，我真后悔当时太过拘谨，没有能够趁机向他提更多的问题，学更多的东西。

胡乔木对毛泽东有深厚感情。在广州期间，他和他的夫人谷羽都很感激地同我说起过：“文革”期间毛主席是保护他的，1967年五一节毛从天安门下来，经过南长街时下车要到家里看他，家里人没有听见敲门，没有见成；说以后再来，但没有再来。他们一直为此而遗憾。

或许是英雄常见如凡人吧，我觉得胡乔木对毛泽东并不迷信，言谈中经常有出人意料的评论。我向胡乔木问过一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毛主席为什么那么重用陈伯达？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毛主席不大熟悉马列主义文献，我们的理论和政策表达要和马列主义文献相衔接，需要陈伯达这样熟悉马列著作的人。别的人，比如说我，当然不能说不熟悉，但毕竟不是科班出身。陈伯达在苏联学习过，是科班出身，又有比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毛主席需要这样的人。

有一次，胡乔木考问我：你读马列著作，哪一本收获最大？我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列宁的《哲学笔记》；从一般著作中得到的是逻辑论证和结论，从这些笔记中得到的是他们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思想酝酿的过程。看来他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说《哲学笔记》他读过不止一遍，有同样的感觉，但《剩余价值理论》这样重要的著作没有读过，回去一定要抽时间读。胡乔木这样身居高位的大学问家，在我这样一个晚辈面前，竟如此谦虚和坦率，增加了我对他的尊敬。

我问过胡乔木：为什么在为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写的序言里，说“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胡乔木说明他的用意，并且讲了聂的坎坷经历，对聂的遭遇深表同情，感慨唏嘘。我对他在序言里所说的聂诗“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持不同看法，认为那是逆境中的辛酸、无奈和强为笑颜。胡乔木对我的看法既未肯定，也不反驳，谈话陷入沉默。根据我同他接触的经验，是引起了他的思索，一时还不能或者不便明确表示态度。

胡乔木在广州没有再提起关于农村经济和供销社调查的事。12月11

日在江门市，市委书记黎子流在汇报中曾说到农村调整承包土地，实现耕种适当集中的情况，胡乔木说：三中全会以后的分散，从抽象意义上说是退步，但从具体意义上说是大进步；现在农业面临一个新的转化，即新的集中，这也是进步。我觉得江门市的经验可能预示着农村经济变化的新趋向，有理论和政策意义，便趁胡乔木休息的时间，在广东省农委卢龄的陪同下到江门做了几天调查，写了一篇《江门市农村调整土地关系、延长承包期的调查》。回来向胡乔木汇报，他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或许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了。这份调查报告后来辗转到分管农业的广东省委常委杜瑞芝手里，他大为称赞，并建议由省委转发，推广江门的经验。

我于春节前夕返京，胡乔木则同家人和秘书、警卫去福建，在那里过春节。

四

回到北京不几天，1985年2月4日，胡乔木的另一位秘书杨文英告诉我，胡乔木夫妇要我去给胡做秘书。我猜想，此项动议可能是因为广东之行印象尚可，或许也有杨的从中推荐。杨是谷羽的侄女，当过钱俊瑞的秘书，我在1980年同钱一起出访欧洲时就认识她。我向杨明确表示不愿意去。

不料次日邓力群找我谈话，说：乔木同志希望你去当秘书，我说你会同意的。邓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研究室主任。我因为已有思想准备，便回答说：我不想做这项工作。邓颇感意外，问原因。我说，乔木同志知识渊博，要考虑和处理思想文化领域多方面的问题，我很难适应他的工作要求。这虽是实情，但也有些搪塞。见邓不悦，我便如实交代：我的专业是经济学，想以此报效国家，现在虽不敢说已经登堂入室，但总可以说初入门路了。我今年46岁，今后打算继续在经济研究方面进行努力，不想放弃自己所熟悉的专业知识而从事其他。况且，我遇事爱争论，固执己见，做秘书工作不是我的长处，不必舍长而取短。邓力群没有勉

强我。邓是我多年的领导，对于青年人研究学问一向是热心鼓励和支持的。

就在这个时候，我眩晕症突然发作，住进305医院。想到事关重大，在医院里于2月7日、8日分别致信杨文英和邓力群，重申当面说过的意见，以示郑重。我没有答应给胡乔木当秘书，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但尔后无论是胡乔木还是邓力群，都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看来并没有怪罪我。这表明他们的大度，我也因此更增加了对他们的敬重。

五

出院即收到胡乔木的信：

梦奎同志：

2月13日信收到，谢谢。原附件退还。

我的身体还好。眼疾也已接近于完全复原。你的身体（包括眼睛）倒使我挂念。望经常注意不要过劳。

在粤多承帮助，甚感。我们将于22日离开厦门，先到漳州，24日坐火车回京，因在武汉要作短暂的停留，估计26日可到。以上并望告力群同志。

胡乔木

19/2

此信在厦门未及发。回京后闻尚在医院。顷悉已出院上班，故检出奉上。望仍注意节制用脑，保留后劲。

在穗曾谈及去北大看陈老事，如无不便，可否于下周择一时间同去？

胡乔木

信中所说附件，是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对胡乔木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建议的批示。事情的原委是：在广州期间，审计署副审计长祁田也

住在珠岛宾馆，她是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时的领导，财会专家，经我介绍同胡乔木谈了一次。胡当时在考虑加强经济监督的问题，同祁田谈话后，给胡启立并胡耀邦、赵紫阳写了一份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建议^①，随信附有祁田写的对深圳合资企业进行审计情况的材料。赵紫阳在胡乔木建议信上批示，要张劲夫^②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听取祁田的汇报。我回京后得到赵紫阳批示的复印件，转给了胡乔木。许多人都知道，1982年宪法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是出自胡乔木的建议。在广东期间他曾同我谈起过这件事。

信中所说的陈老，是我的老师、北京大学经济系陈岱孙教授。胡乔木在广州期间和我谈起过陈寅恪、钱钟书、朱光潜、冯友兰、顾颉刚、沈从文等许多人，以及他们的成就。胡乔木不熟悉陈岱孙，是从陈的一篇关于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文章注意到他的。

3月20日下午，我陪同胡乔木到北京大学看望三位老教授。首先看陈岱孙。稍事寒暄，胡乔木即对陈说，现在有的学校，包括干部培训，例如大连有个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用的完全是美国人编的教材，希望陈先生过问一下经济管理教材的编写工作。陈岱孙未作响应，沉默不语。我见陈面有难色，说了些同他研究领域有关的题目转移了话题。离开陈宅后到燕南园看望了朱光潜和冯友兰。朱中风失语，他的夫人简单介绍了饮食起居情况。冯双目失明，没有说几句话，只是他的女儿宗璞提出，希望给冯配备助手。

回程我对胡乔木说：陈岱孙对经济思想史造诣很深，但编经济管理教材并非最佳人选，未免太劳累他了。而且，据我了解，大多数地方经济管理干部培训使用的《国民经济管理学》大体可用，得到中组部、中宣部和国家经委的认可，印数累计达50多万册，而大连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所印教材流布并不广。胡乔木对我的意见表示赞同，说看了陈岱孙的文章，觉得他关于西方经济学既要参考借鉴又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的意见很好，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加以号召，不是要他具体组织，经济管理教材不必勉强。我立即把胡的意见和我的想法函告陈，很快收到回信。看得出，他简直如释重负：

梦奎老弟：

月之廿一日信顷收到。

太太感谢了。我这几天正在发愁呢。乔木同志所说的事，是一个待决的问题。但我是没这本事插嘴的，当面我又不好断然拒绝，后来你说管理较复杂，还是从西方一般经济学说入手为便，我体会到是为我开脱的。现在能根本釜底抽薪，则大大地更好了。

大半年来，我债台（笔墨者）高筑。本以为春节前可告全部清偿，而未能做到。明天又得去全国政协报到参加年会，则这债务只好再背上一时了。

勿复，并颂

日祺

岱孙

八五，三，廿二

胡乔木这次北大之行，似乎并没有特定目的。我的感觉是，他是作为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要对老一辈知识分子表示关心。访问者和被访问者都饱经沧桑且年事已高，彼此没有多少话说，场面有些沉闷而尴尬。

六

我懒于走动，北大之行后同胡乔木很少往来。值得一记的是以下几件事：

1987年3月初，我写了一篇《关于股份经济的若干思考》，登在研究室的内部刊物上。3月16日，胡乔木致函邓力群：

力群同志：

读了王梦奎同志的文章，受益不少。建议考虑此文可公开发表，以打破自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经济学界（和其他学术

界)被认为“万马齐喑”的局面。这是一篇讨论文章,很有深度。所引数据来源的准确程度需要斟酌一下。

胡乔木

三月十六日^③

文章4月6日在《人民日报》刊出,并未产生胡乔木所期望的社会效果。当时实行股份制的主张刚被提出,全国只是有个别规模不大的试点,人们还比较陌生,所以反应寥落。我在这篇文章里对股份制作了一些理论分析,认为股份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组织形式,其优点是,构成其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既可分解又能合并,可以舍去具体的物质内容而将其间的差别表现为纯粹量的差别,简便易行,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我是把实行股份制作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具体措施进行讨论的,不敢奢望自己一篇文章就能打破学术界万马齐喑的局面。文章发表后,我又收集各种不同意见,以及一些地方实行股份制试点的方案,编了一本《关于股份制问题》,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印数竟达1万册。就我见闻所及,这是经济改革以来国内比较早出版的一本关于股份制的书。

1989年春北京政治风波期间,胡乔木住玉泉山五号楼,曾找我和国家体改委的詹武去作一次短时间的座谈,说是想向中央提出关于反腐败的建议。我讲了关于尽快取消价格双轨制,以及健全市场秩序和加强税收征管的意见,说这是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所必须的。后来事态急剧变化,胡的建议似乎并未出手。

1989年邓小平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信和中央关于同意邓小平辞职的决定,起草工作落到党的十三大后已经离开领导岗位的胡乔木和邓力群身上。据邓力群说,是杨尚昆向他和胡乔木转达邓小平的意见,要他们两人起草的。邓小平的辞职信是胡乔木起草的,中央决议是邓力群起草的。邓力群找我去帮忙,说是中央要起草这么一个决定,并就决定内容以及写法讲了很明确的意见。我整理成稿后邓力群做了修改,然后一起到胡乔木住所,对两个草稿进行讨论修改。对决定中一句话的

表述，我不赞成胡乔木的意见，而且固执己见。胡没有生气，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悄声说：你怎么老不开窍呢。最后当然是按照他的意见改定的，但现在已经记不得是哪一句话了。

1990年春节，我收到胡乔木签名赠送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④。这本诗集，反映了胡乔木旧体诗的深厚修养和对新诗体裁的探索。其中《快乐的女工》、《小鸟天堂》和《专业户》是1984年12月在广州写的，《红帽》和《松林》是在那里修改定稿的。当时胡乔木有不少烦恼，心情是不好的，但这些诗仍然流露出诗人的天真和质朴。

1992年9月，我拿着一束鲜花，到305医院看望生命垂危的胡乔木。他吃力地伸出手和我握，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谢谢你。他的秘书邱敦红凑到耳边告诉他：上海选您当“十四大”代表。他用更加微弱的声音说：谢谢。他再也没有力量说更多的话，闭上了眼。我在床前肃立片刻，想到从此生死异域，不禁黯然泪下。

胡乔木是公认的文章高手，关于如何写文章有不少精彩的论述。1995年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时，为青年人编了一本《怎样写文章》的参考读物，辑录的是毛泽东、鲁迅、郭沫若、胡乔木、邓拓、何其芳、胡绳、孙犁等大家关于怎样写文章的论述，其中有胡乔木的两篇：《短些，再短些！》和《怎样写好文件》。这本小册子后来由言实出版社公开出版并且多次再版，流布甚广。我想，如果胡乔木在世，他会高兴的，或许还会选出他认为更合适的文章。

七

胡乔木长期参与、主持党和国家重要文件和其他文稿的起草工作，用他的文字为中国革命作出过独特的贡献。社会革命和机遇使胡乔木闪耀过光辉，同时也使他的晚年带有某种悲剧的色彩。虽然在他逝世的时候，中央给予很高的评价，实际上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备受争议的人物，被境内外的一些人视为保守的代表。在几十年来中国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有一种简单地用“左”和“右”划线的深重积习，

胡乔木不免也这么做过，最后这种厄运也落到他的头上。这是中国的不幸，也是胡乔木的不幸。

胡乔木是勤于思考的人，对许多问题的观察都有深刻独到之处。他不仅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持否定态度并且做过理论上的说明，对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观点，对马克思和列宁的一些重要观点，甚至对流行的、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口号，也大胆地提出过批评。在前述自广州到深圳列车上的谈话中，他批评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分工的观点，说马克思的想法是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他多次表示怀疑，还批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社会主义国家说成是一架很大的管理机器的思想。在广州同丁峤、张瑞芳等人的谈话中，胡乔木对电影演员赵丹临终前写的一篇引起很大争议的文章表示赞同。他说：赵丹说，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这个说法是对的。党是政治组织，对文艺本来不应该具体管，何况太具体？即使是艺术组织，比如剧协，也不能管每一个人的创作。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都由剧协审查，未必能出那么多好作品。^⑤胡乔木还同我谈过教育改革问题。我向他反映，中学政治课让学生死记硬背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比大学生读《资本论》还难懂。他说，教育不能沿着老路走，要改革，要从社会需要出发。现在全国有30多所大学设哲学系，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哲学家，而法科和商科又太少，需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也要加强。他主张在大学开设一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课程，后来似乎根据他的建议开设过这门课，不知道坚持了没有；还主张设立编辑专业，说编辑是专门学问，后来个别学校也这么做了。还讨论过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的作用问题，胡乔木主张工会发挥更大作用，企业重要决定要有工人代表参加，还说他批评过工会的领导，为什么听不到你们为工人说话。我从胡乔木的多次谈话中感觉到，他对许多问题是有深入思考的。

胡乔木的晚年，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大的变革。胡乔木曾经为这种社会变革作过理论论证和热情鼓吹。中国的社会经济变革，是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变革的广度、深度和速度超过包括胡乔木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预料。社会变革所伴生的消极现象

使胡乔木深为忧虑。他对实际经济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对于社会经济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变化缺乏充分的准备；他从理论上或者逻辑上或许意识到了，但面对纷繁的社会经济变局仍然难免不知所措。一般地说，胡乔木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做的理论上的说明，大体上还是可以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逻辑地得出来的。由此开启的更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所需要的新的理论，就是胡乔木力所不及的了；他努力这样做，但并不都是很成功，有的甚至是失败的。对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的理论说明向来很不容易并且充满风险。历史上常常有站在社会变革前列的理论家随着变革深入而不能适应甚至落伍的现象，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中国的康有为，虽然胡乔木的作用和影响远不能同普列汉诺夫和康有为相比。

或许不能忽视社会政治变局中复杂的人事关系。在广州之行中，我感觉到胡乔木有一种明显的失落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老一辈领导人的大批复出是一种过渡现象，最高领导层不能不从年龄结构上进行调整。新的领导人有自己的笔杆子，胡乔木失去了依托。既然连器重和提携胡乔木的毛泽东，连不计较胡乔木在“文革”末期“批邓”中的表现、排除异议而重新起用胡乔木的邓小平，都说胡乔木“固执”，新的领导人谁还能够很顺手地用胡乔木这枝笔呢？或者说，胡乔木对谁还会像对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恭谨呢？胡乔木并不善于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何况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见分歧。胡乔木并不摆谱，他是秘书出身，平易近人，就我的接触和观察，觉得他对年轻的领导人是尊重的，甚至对年龄和地位悬殊的青年人也往往是热情和客气的。即使如此，仍不免陷于进退失据的窘况。胡乔木逝世前不久在重病中写的一首诗里，发出“晚年遭遇颇离奇”的感叹，并且说“自古功成身合退”^⑥。如果功成身退，及时离开政治的前台，他的晚年或许会过得更洒脱轻松些，留下的遗憾也会更少。

胡乔木是“学而优则仕”，由“士”而入“仕”。他具有官员和学者、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多重性格，是以笔作为武器的职业革命家。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和诡谲的社会政治变革中，他有太多的所

历所见所闻，在思想和作风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言论和行动。更因为主管理论和宣传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社会对于他的关注达到高峰。褒的，贬的，褒多于贬或贬多于褒的，都大有人在。这或许并非胡乔木的不幸，凡夫俗子哪能引起人们如此广泛的关注呢？中国社会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对于许多人物和事件都有争议，是正常现象，不过意识形态领域首当其冲，此中人又多舞文弄墨，掌握媒体，显得异常热闹罢了。时转势易，社会关注的热点也在迅速变化。现在人们对胡乔木的关注早就淡化，一些青年人甚至已经不知胡乔木为何许人了。是的，胡乔木已经成为历史人物。

1984年底在广州期间，我曾建议胡乔木集中精力撰写回忆录，宁可少干一些别的事。我认为这是他晚年所能够做的对社会也是对自己最有益的工作。他未置可否，但终于没有动手。据说直到逝世前一年，即1991年6月，他才下了写回忆录的决心。实在是太晚了，结果只留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的几篇“谈话录”，以及由龚育之和郑惠等人代拟的写作提纲。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好在他晚年自己审定了《胡乔木文集》一至三卷和诗集，他逝世后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统称“乔木文丛”的几本专题文集，使他的文字遗产得以比较完整地流传，此亦不幸中之大幸也。

我没有在胡乔木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加之年龄和地位悬殊，同他的接触不算多。这篇文章不是全面评论胡乔木，而只是记下个人交往中的一些琐屑印象和回忆，作为纪念。

注释：

① 200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中，《致王梦奎》“注2”（第622页）说，“附件”是“当时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对胡乔木关于组建审计署工作的建议的批示”。这条注解是书信集编者约我撰写的，最近翻检档案资料，发现记忆有误。——作者注。

② 张劲夫，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

③ 《致邓力群》，见《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28页。

④ 胡乔木：《人比月光更美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 ⑤《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316页。
- ⑥《赠谷羽》，《胡乔木诗词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呕心沥血 默默奉献

——忆乔木同志

黎虹

2012年是胡乔木同志诞辰100周年，逝世20周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眼前，许多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从1979年到1984年，我给乔木同志当秘书，在他身边整整工作了五年。这五年，正是我们党处于拨乱反正、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也是改革开放艰难起步的阶段，各项工作千头万绪。

乔木同志开始作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后来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思想、理论与宣传方面的工作和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任务极为繁重。

1979年我刚去时，他正在主持起草国庆30周年纪念会上叶帅的讲话，紧接着就是负责起草历史决议（从1979年10月至1981年6月，共20个月）、修改宪法（从1980年9月至1982年11月，共26个月）、修改党章（从1980年1月至1982年9月，共32个月）、起草十二大政治报告（从1982年5月至10月，共5个月）。这些起草任务，多半是齐头并进或相互交叉，延续时间很长。这期间，还穿插着其他重要文件、讲话、文章和评论的起草和修改。在党史和文献编辑出版方面，他还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撰写、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和《邓小平文选》、《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

集》、《朱德选集》、《任弼时选集》的编辑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上述工作中，乔木同志所表现出的卓越才能和崇高精神，常常使我敬佩不已。他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思想深邃，文辞优美，不愧为党的大学问家、大理论家和“党内第一支笔”。作为他的秘书，我深感难以胜任，学识和文字能力都不能适应乔木同志的要求，只能帮他做些具体事情。对我来说，这五年是我一生中受益最大的五年。我有幸直接聆听他的教诲，目睹他忘我地为党操劳、为民分忧。他那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品格，深深感动了我，教育了我，让我终生难忘。

可说的感受很多，我仅就他在起草文件过程中的一些突出贡献和动人事例，作一简要回忆。

忍受病痛，主持起草、修改历史决议

大家知道，在我党历史上有过两个带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决议。第一个是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是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乔木同志是这两个历史决议的参与者，对这两个决议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第二个历史决议，他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主要负责起草小组的工作。经过20个月的紧张奋斗，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交办的起草任务。

起草工作从1979年10月开始。最初几个月主要是查档案，看材料，做些必要的准备工作。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为了集中精力起草历史决议，乔木同志带领20多人的起草小组先后住在新六所和玉泉山。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为了达到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求，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挑战身体的极限。他给起草小组作过33次长篇谈话，对历史决议稿作过九次大的修改，至于小的修改就不计其数了。有些难写部分和段落，乔木同志总是亲自动手，做出示范。

从起草历史决议一开始，乔木同志就向起草小组提出，起草这个决议面临两个难题：一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二是毛泽东思想的实

质是什么？不答复这两个问题，决议就失去价值。

关于毛泽东思想，他首先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别，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加以区别。他说：“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不包括毛主席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在内。作了这样的区分，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得到了正确的解决。乔木同志想出这样的解释以后，非常高兴，立即跟我谈了。并说，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困扰了我半年多了，现在总算解决了。随后他就在1980年7月3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得到大家的赞同。当天开会回来后跟我说，大家听我讲后都说这样一区分，简单明了，很有说服力，都能接受。

然后，他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党建六个方面扼要评述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并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点和灵魂，回答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什么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乔木同志概括毛泽东思想丰富内容的精粹之作。

关于“文化大革命”，是决议最难写的部分。起草小组的同志写过多遍，他都不满意，认为起点低，很多问题没有说清楚，写法上也不像历史决议，而像大批判稿，于是他亲自动手写。当时已是8月中旬，中央要求必须在8月底完成历史决议稿，9月份提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时间很紧。所以他夜以继日地写了十多天，终于按期完成。在这个稿子里，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段作了评述，对重大事件和主要论点作了概括，对“文化大革命”的对象、纲领、依靠力量、性质作了判断，对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主要责任以及毛泽东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区别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剖析。层次分明，逻辑严谨，充分显示了乔木同志深厚的理论和文字功底。

乔木同志为了写好这部分决议稿所付出的辛劳及忍受的病痛是常人难以体会的。

乔木同志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太好。中年做过胃切除三分之二的手术，到了70岁的时候又做了胆囊切除手术。由于长期用脑过度，他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他的工作和休息，完全靠药物来调节。上午工作时，要服兴奋剂；中午休息时，要服镇静剂；下午还得服兴奋剂，否则无法工作。尽管这样，有时定量服药也不起作用，于是就加大药量，造成恶性循环，带来很大痛苦。

大约在1980年8月20日左右的一个夜晚，我和乔木同住玉泉山5号楼，一觉醒来，听到隔壁乔木卧室里有动静。我打开灯看表，已是凌晨3点钟了。于是我推开他的房门，他正在桌边看书。我问他为什么还不睡觉，他说前一天写稿子太紧张，吃药也不管用，睡不着，躺着难受。我劝他还是躺下休息，可是到了5点钟，他又起床出去散步了。早饭以后，他躺了不到一小时，就起来服兴奋剂，又开始工作了。到了中午，他通常是12点吃午饭，12点半躺下休息一小时，可是那天不到1点钟就来敲我的门，说他上午服兴奋剂过量，非常难受，怎么也睡不着，要我陪他到院内小湖里划船。8月的夏天，中午十分炎热，在烈日下划船就像烤火一样。我们划了不到半小时就回来了。看到他坐卧不安的样子，我心里十分难过，也十分感动，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他当时已是年近70的人了，身体又不好，可是为了党的事业，还是这样耗尽心血，拼命地工作。

1980年10月，中央组织4000多名高级干部对历史决议稿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之后，乔木同志又带领起草小组开始新一轮的紧张修改。1981年1月12日，陈云同志得知乔木抱病修改历史决议的情况，在一天之内，三次催他立即去外地休息。乔木当晚致信陈云，除表示对陈云“极为感激”之外，还告知自己因承担《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及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判决书的修改工作，不能马上离京休息。直到1月25日，他才离京去南方。

在休息期间，他仍要起草小组将决议修改稿送他审阅。3月16日，他从昆明打电话给邓力群，详细谈了他对2月23日修改稿的意见，并提出新的修改方案。3月18日，邓力群、吴冷西向小平同志汇报了乔木的修改方案，得到小平同志的肯定，并说“轮廓可以定下来了”。

乔木得知小平同志意见后，一方面要起草小组按他提出的方案进行修改，另一方面从昆明到武汉作短暂停留后于3月28日赶回北京。从4月16日到26日，他全力以赴地对决议稿精心修改，一切会议和活动都不参加。由于连续十天紧张工作，当改到第六部分（共八个部分）时，他的腹部突然剧烈疼痛，不得不于4月27日住进305医院。经医生检查，诊断为胆囊炎急性发作，需要做胆囊切除手术。

5月9日，胡乔木的病情报告送到了中央办公厅。5月13日，中办副主任冯文彬打电话给我，转告耀邦同志意见：“对历史决议要乔木同志不要操心，一切服从医院治疗；现在的历史决议稿基本上差不多了，重点在六中全会后和决议公布前，到时仍请乔木同志把关。”我转告耀邦意见后，乔木表示：“在这紧要关头，我不能丢下决议去治病。”于是他硬是忍着疼痛又用三天时间把决议稿修改完。5月14日，乔木将修改稿送邓小平、胡耀邦。邓小平看完后即于5月15日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了几点意见，乔木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又作了修改。直到5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后，他才从305医院转到北京医院，并于5月22日做胆囊切除手术。

手术之后，乔木同志虽然躺在病床上，但脑子里仍在琢磨历史决议。一周后，他几乎每天都要我把他想到的修改意见转告起草小组。半个月后，他身体尚未恢复，为了参加六中全会预备会议对历史决议的讨论，就提前出院了。他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忘我的工作精神的确令人敬佩。

不辞辛劳，抓宪法修改工作

在起草和修改历史决议期间，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胡乔木任秘书长，具体负责修改宪法的工作。因当时忙于起草历史决议，他就抽出几天时间，把修改宪法的工作班子和先期准备工作做了安排，把修改宪法的任务交副秘书长胡绳、王汉斌先行负责，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更为紧迫的历史决议的修改、加

工上面。

1982年宪法的修改工作历时两年零两个月。当历史决议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后，从1981年12月开始，乔木同志又回过头来抓宪法修改工作。这时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在彭真同志（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下已初步完成。于是乔木同志对草案进行认真修改，并对宪法结构、设立审计机构、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在农村恢复乡政府、切实实行义务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采纳。

关于宪法结构，中央书记处1982年2月讨论时发生分歧。有人主张：在第一章“总纲”之后，接着写“国家机构”，然后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乔木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总纲”的补充和继续，“国家机构”是程序问题，是为“总纲”和“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实质问题服务的。因此，“权利和义务”应该放在“国家机构”之前。经讨论，意见没有统一。当天下午，他让我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王叔文：请尽快把世界各国宪法中的“权利和义务”查一下，看看哪些国家放在前面，哪些国家放在后面，简单列个表，明晨9点送到。王叔文等查了111个国家的宪法，其中有101个国家放在前面，只有10个国家放在后面。乔木随即把这份材料送中央常委同志阅。2月17日，小平同志找彭真、胡乔木、邓力群谈宪法修改问题。他说：“我同意乔木同志的意见。”

乔木同志特别注意发挥法律专家的作用，虚心向他们请教。1982年夏天某日，他对我说，钱端升是一位对比较宪法有研究的专家，已80多岁了。接着让我陪他冒着酷暑，亲自去钱家拜访。他同钱老谈了整整一个上午，请教了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回来以后，他又要我通知张友渔，以后研究宪法修改时，尽量请钱老参加。

乔木同志对语言文字的运用向来是非常考究的。他多次向修改班子提出，写法律条文不同于起草文件，文字表达一定要格外准确、严密。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对宪法草案提出了一些文字上的意见。于是，他一方面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反复推敲，另一方面又请了20多位法学和语言文字专家逐条、逐句、逐字挑毛病，收到良好效果。

“竭尽全力”，起草十二大政治报告

任务一个接着一个。修改宪法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起草十二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又提上日程。1982年4月22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十二大文件的起草工作由胡耀邦、胡乔木共同主持，具体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邓力群协助。5月5日之前，起草班子到玉泉山集中，6月底以前交出初稿。遵照乔木的吩咐，当天下午我即找邓力群商量起草班子的成员，提出了一份10多人的名单，并随即送耀邦同志审定。

名单确定后，乔木同志于4月24日把袁木、郑惠两人找来，谈了对十二大报告的要求和起草工作的打算。他说：“十二大报告既不同于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也不同于国庆三十周年叶帅的讲话，要求理论性强，有文采，有新意。既要讲清我们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又要指明前途，给人以信心。”他交代：下午就通知起草小组所有成员到玉泉山集中，先分头到有关部门开座谈会，做些调查研究，听取他们对十二大报告起草的意见和建议，然后我们再共同研究。谈话以后，起草班子就按乔木同志的部署行动。他本人也找姚依林等人，听取他们对十二大报告经济工作方面的意见。

5月1日晚，乔木同志在玉泉山5号楼召集起草小组开会，先听取他们汇报到各部门调查研究的情况，然后讲了他对十二大报告的构想。

从5月6日至8日，胡乔木同胡耀邦一起，在玉泉山5号楼召集起草小组全体成员开了三次务虚会。然后动手起草报告。一周后，围绕初稿展开讨论。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精神文明建设，一个是经济问题。精神文明问题，主要由乔木同志主讲，大家没有不同意见。但讨论经济问题时，乔木和耀邦同志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有三个：一是发展速度问题；二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三是消费与积累的关系问题。乔木同志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轻声细语、对人温和的瘦老头，可是在内部讨论涉及重大问题时，却无话不说，敢于直言，

只要他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从不轻易放弃，有时坚持到固执的程度。耀邦同志也是心无芥蒂、直来直往、从不隐瞒自己观点的人。两人在讨论中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乔木同志言辞尖锐，动了感情。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心中不免有些担心。会后我劝乔木发言不要太尖锐。他说：“我和耀邦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我们之间的争论都是为了党的工作。”后来我想了想，乔木同志确实是个“正道直行”的人，当年给毛主席当秘书时就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同毛主席争论，这是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到的。这次他同耀邦同志发生争论是很正常的事，说明我们党内民主生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了恢复和发扬，也说明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个探索和认识的过程。

此后，乔木同志带领起草小组对报告稿进行反复修改，力求从内容到辞章上都能达到小平、陈云等同志的要求。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到6月中旬才改出一稿送各位常委审阅。他确实累极了。有一天他躺在5号楼前的草地上，有人见了奇怪，问：“乔木同志，你怎么啦？”他答：“我有能源危机，要接点地气。”

在起草十二大报告的过程中，正碰上乔木同志70寿辰。6月1日晚，写作小组在玉泉山和乔木同志及其家人一起聚餐，耀邦同志特地送来几瓶葡萄酒，习仲勋、胡启立、陈伟达等同志打电话表示祝贺。席间，郑惠、李慎之朗诵了他们各自写的诗，邓力群讲了几句话，说乔木同志忧党、忧国、忧民，为党的事业操劳，值得学习。

就在70寿辰的前夕，乔木同志写下了七律四首《有所思》，并于当年7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他以旧体诗的形式回顾过去，总结人生，展望未来，抒发情怀。从“七十孜孜何所求”开头，到“不尽愚公到有期”结束，说明他一生为党的事业孜孜不倦地工作，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利益，而是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为实现党的目标和宗旨奋斗不止。

70岁以后，乔木同志又用“小车不倒只管推，车倒扶起往前追”的精神奋斗了10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忠诚地实现了他在《有所思》中向党和人民立下的誓愿。

父亲和黄敬

王端阳

我的父亲王林和黄敬并肩战斗一生，是平生知己。20世纪30年代初，父亲是青岛大学（简称青大）党支部书记，看中黄敬，培养和介绍其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已是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之一的黄敬却为父亲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在青岛大学和北京大学，他们共同学习、闹学运；在冀中和天津，他们一起共事、为友。长期的共同战斗使得他们成为知音，父亲可以率性地在办公室的门上留下“王林去也”，辞去黄敬任的“官”；黄敬也能当面指责父亲是“革命队伍里的自由兵”。虽然他们有时候意见相左，各持己见，但都抱“匹夫不可夺志”之态度，互相尊重。黄敬去世后，父亲痛哭：“以后再有心事可跟谁说去呢？”大有知音走，琴弦断，与谁诉说之痛。

父亲介绍看似“花花公子”的黄敬入党

1930年9月，我的父亲王林（当时叫王弢）离开北平的今是中学，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

青岛大学当时刚刚开办，由杨振声任校长，张道藩任教务长，并请来梁实秋任外文系主任，闻一多为文学系主任。父亲是青大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可是，10月中旬学生就和学校当局发生矛盾，并发动了第一次罢课

斗争，父亲负责学生纠察队。罢课很快被学校当局以“共党暴动”为名，叫来警察镇压下去。其实当时青大还没有中共的党团组织，父亲虽是团员，但也没接上组织关系，罢课完全是学生自发的。青大第一期招生126人，这一次就开除了60多人。

父亲因为“弢”字难认而漏网，可他觉得对不起被开除的同学，准备自行离开青大。这时校工告诉他“有朋友来找”。父亲到接待室一看，不认识来人，扭身要走。来客说：“你叫王弢吗？李续纲给你捎了个信。”李续纲是父亲入团的介绍人，所以他一听就知道是“组织上”来人了。就这样父亲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在青大留下来。

这一年的冬天，父亲的宿舍里来了一位旁听生，比父亲小两岁，叫俞启威。他当时西服革履，爱说爱玩，但是谈问题思想“左”倾，于是引起父亲的注意。他就是后来的黄敬。

1931年春，父亲转为党员，并任青大党支部书记。实际上他长期光杆一人，因而搞任何秘密活动，都拉着黄敬干，把他作为培养对象。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浪人见国民党在东北采取不抵抗政策，便冒充日侨，放火焚毁了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的大楼。而蒋介石竟然一面号召全国人民“忍辱负重”，“听候国联调查”，一面调兵遣将，“围剿”红军。学校当局也借口青岛环境特殊，不允许学生进行任何反日爱国活动。青大党支部趁此机会，召开全校大会成立了“反日救国会”，之后，又组织同学赴南京请愿，逼得蒋介石在接见各地请愿团的大会上表示：“三年之内如果不赶走日本，收复东北失地，当割我蒋某之头以谢天下！”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部署，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青大学生更感到亡国之痛迫在眉睫，怎能安心坐在书桌前读死书呢？学校当局为限制学生的爱国行动，却宣布实行“学分淘汰制”，欲借此迫使学生无暇关心国家存亡大事。但是，青大当权的新月派和国民党大同盟派的赵太侔与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派的社会学教授杜毅伯之间愈益激烈的争斗，也给学生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青大党支部根据市委的指示，决定借用各种学术组织团结同

学，相继成立了时事讨论会、新文学研究会，并在1932年4月成立了海鸥剧社。

黄敬来青岛前，在上海曾经参加过“剧联”直接领导的南国剧社（社长田汉），他给南国剧社的田洪（田汉之弟）写信，与“剧联”领导成员之一的赵铭夷取得组织联系，秘密成立了“剧联”青岛小组，所以由他牵头成立了海鸥剧社。可是没有女演员。当时青大的女生还有点儿封建，不肯粉墨登场。听说图书馆职员李云鹤（即江青）曾经在济南实验剧院干过，就请她来当演员。她愿意干，也就参加了。后来崔嵬等人也参加了海鸥剧社。

第一次演出是在青岛大学的小礼堂，可容纳300人左右。演出的节目为《月亮上升》和《工厂夜景》两出话剧。

《月亮上升》是英国爱尔兰剧作家的名作，世界著名的独幕剧。内容是描写一个民族革命志士，与奉政府通缉令随时要逮捕他的警察斗争的故事，具有浓厚的诗情画意和爱国的传奇色彩。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民族危机步步加深、亡国之痛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演出这出独幕剧，自然激起观众的强烈反响。

《工厂夜景》（易扬编剧）是一出反映旧中国上海工人被压榨和进行斗争的话剧，由黄敬扮演男主角，江青扮演女主角。当时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青岛，在山东最高学府的青大礼堂能公开演出这种话剧，也是十分不容易的，因而在青岛革命斗争史和青岛戏剧史上，都占有光荣的一页。当时上海“左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新闻》还以《预报了暴风雨的海鸥》为题，报道了海鸥剧社的演出活动。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黄敬都是活跃分子，父亲每次跟青岛市委书记李春亭接头时，也都汇报黄敬的情况。但因黄敬出身成分和社会关系复杂，上级总说在实际工作中多考验考验，但同意把党内文件给他看，在校内的活动也可以和他一起研究。到了1932年春，李春亭叫父亲正式向黄敬宣布，他已经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1932年6月，青大学生以抵制“学分淘汰制”为由开始罢课。在坚持了2个月以后，南京教育部忽然下令解散国立青岛大学，勒令全校学生3天

以内离开校舍，并且重申开除为首的10余名学生代表学籍的命令，父亲就在其中。更不幸的是，这时李春亭被捕，青大罢课斗争失去了领导。父亲和黄敬、张福华坚持留在校内，编辑罢课斗争专刊，准备与离校同学进行联络，继续斗争。罢课专刊稿件整理好后，父亲正要拿到市内找印刷所付印，国民党便衣特务突然包围青大，指名逮捕王弢。父亲察觉后，从宿舍大楼的后窗跳出，钻进了后山的森林，藏在一个同情分子处。后来，黄敬找到父亲，说便衣特务仍未散去，劝父亲去上海（当时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随后黄敬买了2张船票，他们一同到了上海，住在黄敬的母亲家中。

1932年秋，青岛大学改名山东大学重新开学，校长是赵太侗（那时正在追求黄敬的姐姐俞珊，后结婚）。黄敬因为家族的关系（他叔叔俞大维是国民党要员），当初没被学校开除，当山东大学开学后，他就回校了。而父亲在上海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继续进行地下工作和兵运。

一天，中共杨树浦区负责人之一的小叶，介绍一个操山东口音、年约30多岁的男同志与父亲谈话（小叶退出了）。这个操山东口音的同志把父亲的历史情况详细盘问以后，突然问道：“你来之前，青岛的组织是否遭受到破坏？”父亲回答：“不知道。”只把李春亭不按预定的时间、地点来接头的情况说了说（建国后才知道当时青岛党组织确实遭受到大破坏，李春亭被捕，壮烈牺牲）。这个操山东口音的同志又问父亲青岛大学尚有未被开除学籍的党员吗？父亲答有黄敬。他又问如何与黄敬接上党的关系，父亲详细作了回答。父亲一直怀疑这个操山东口音的人是康生，从口音和动作上都像，但从未证实过。

1933年底，父亲到上海接关系住在黄敬的母亲家，正遇见黄敬从济南释放回家。黄敬被捕，父亲原来不知道。见面时黄敬说山东省委组织部长被捕叛变，领着便衣特务把他也捕了去，是黄母托俞大维找了陈果夫，才把黄敬保了出来。70年代末，父亲曾经谈起过黄敬和江青同居的事，而且说他就和他们一起住在黄敬的母亲家，大约就在这个时期。

后来黄敬和江青分手，具体的原因说不清，但有一条父亲很肯定，那就是黄敬的母亲不喜欢江青，一是觉得江青出身寒微，而俞家是个名

门望族，门不当，户不对；二是江青没读过大学，不会英文；三是江青是“解放脚”，小时缠过足，后松绑，但走路看得出来。

另外在他们家还发生过一件事，一天黄母发现自己的一颗钻戒丢了，她说过去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显然是怀疑江青偷了。可江青不承认，弄得全家疑神疑鬼。过了几天，那颗钻戒又突然出现了，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件事虽然不了了之，但肯定影响了黄母和江青的关系。就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江青离开了俞家。

黄敬恢复父亲党的组织关系

父亲为组织“兵暴”的事曾给江苏省委写过一封信。就在他等待上级指示的时期，一天赵铭夷突然来找父亲，说：“你的信，我转给江苏省委了。今天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江苏军委（有人）被捕叛变了！你那封信可能最后是转到江苏军委了，你要当心！”赵铭夷说完，转身就匆匆走了。父亲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危险，马上向黄敬借了路费，就立刻直奔火车站逃回衡水老家去了。父亲因此再一次脱党。

1934年春，父亲一到北平，立即在黄敬的姐姐俞珊家（景山东街，北大西斋西邻）找到黄敬。黄敬此时也因被捕而脱党。当时北平正由国民党军分会和宪兵第三团统治，异常恐怖。他们也是“惊弓之鸟”，待人接物，异常小心，不敢和生人接近。这时黄敬在北大旁听数学系的功课，父亲则在北大旁听文学院的课，他们俩还一同到中国大学旁听李达讲《资本论》。

开始他们在政治上很苦闷，曾多次展开争论，黄敬主张先找到党，解决了组织关系后再做群众活动。父亲反对，他根据在上海的所见所闻，认为托陈取消派和叛徒特务也曾冒充党的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如果找到他们就要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父亲主张先搞群众活动，如果有成绩，党会主动找上门来。因此他曾企图通过私人关系，打入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和山东昌邑海滨盐场搞群众活动，但都未成功。

这期间父亲开始了文学创作，陆续在《现代》、《大公报》、《国闻周

报》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并于1935年1月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而黄敬于1935年夏考上北大数学系二年级插班生。但他们两人始终往来不断，几乎朝夕相处。

1935年秋，华北眼看成为日寇的占领地。北平的学生开始酝酿请愿活动。12月9日早上8点，父亲和黄敬一起从北大西斋宿舍出发，徒步走到新华门，加入示威游行大队。游行队伍在王府井大街南口被国民党军警冲散后，黄敬领着被冲散的学生退到北大三院，宣布组织北平总罢课时，父亲也都在场。

12月16日，北平学生组织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黄敬是总指挥。父亲骑自行车当总指挥部的交通，走在最前头。行至前门被国民党警察和大刀队拦路阻挡并开枪时，父亲与开枪的警察相距不过丈许。后来，黄敬带着部分学生冲进前门内时，父亲也跟着冲了进去。游行队伍到西单牌楼南大街上被阻，又被国民党警察和二十九军大刀队冲击屠杀后，父亲突围到了路西小胡同里，正遇见黄敬。黄敬把两个被大刀队砍成重伤的女同学交给父亲，让他急送协和医院。解放后才知道这两个女生就是聂元素和毛德贞。

12月16日的大游行后，黄敬从日文报纸上得悉毛泽东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并有来华北对日直接作战的征候，因此叫父亲回老家给“南下农村扩大宣传团”打前站。黄敬说他准备拉一部分学生到冀南，与冀南暴动起来的农民（即刘子厚等拉起来的一部分武装）结合后，为中央红军来华北打前站。后黄敬又改变主意，派父亲去博野张荫梧主办的“河北农村建设人员短期训练班”去做地下活动。

1936年4月，父亲被张荫梧驱逐回北平，并由黄敬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此时黄敬已是中共北平市委的负责人之一，至于他何时恢复的组织关系父亲不详，但从1934年春到1935年底，他们两人都是跟党失掉组织关系的。父亲曾估计，由于黄敬在一二九运动中的出色表现，党又“找到”了他。

这年夏天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向李楚离（“文化大革命”前曾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后被卷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事件）传达“办理

自首手续”的事。父亲在1930年通过过家和认识了李楚离，1936年5月间听说李楚离已被捕多年，于是和过家和去探过监，并想利用过家和的社会关系把他救出来。奔走一些日子以后，过家和对父亲说：“李楚离出狱的事不好办，因为国民党有规定，刑期不满提前出狱，必须办理自首手续。”过家和觉得自己不能劝同志叛变自首，因此他就不再奔走此事了。

父亲这时与黄敬几乎天天见面，就把上述情况告诉了黄敬。起初黄敬对此事没有表示过任何态度。大约在6月底，黄敬忽然很严肃地向父亲说：“有件工作，需要你去做一做。你不是跟姓过的同学要救李楚离吗……党中央很关心这些在狱里押着的老同志……因此组织上决定叫他办手续赶快出来。”父亲一听这件事非同小可，不免一惊愣。黄敬见父亲一惊愣，更加严肃地说道：“这是组织上的决定，而不是他个人的动摇变节！你要利用你那个姓过的同学的特殊关系，把组织上这个决定告诉李楚离，叫他赶快办手续出来！”

父亲通过关系见到了李楚离（旁边仍有警察），用隐语把这个决定转达给他。他起初好像没有听明白，表现吃惊之状。后来他听明白了，立刻热泪盈眶，痛苦地摇摇头说道：“我已经坚持六七个年头了，剩下的刑期也有限了，我不能最后落个叛徒出去！”父亲继续用隐语，用党的名义说服他。他含着泪花，警惕地看着父亲问道：“你怎么能证明你是代表组织来的？”父亲没法证明，只能重复黄敬的话。他不等父亲说完，一转身，蹬着铁镣回牢房去了。

父亲木然良久，回去汇报给黄敬。黄敬听了低下头沉默着，一句话也没有说。以后他再也没有叫父亲做这项工作。

父亲辞了黄敬任的“官”

1936年7月，黄敬决定叫父亲到陕北红军大学学习，忽又决定叫他到西安东北军里做地下工作。于是父亲到了西安。在经历了西安事变之后，父亲随着东北军被遣散，回到老家，再一次和党失去联系。就在他准备去北平找党组织时，卢沟桥事变爆发，父亲就留在冀中参加了抗日

战争。

1938年夏，黄敬代表晋察冀边区到冀中召开党代会，父亲才又见到他。党代会后，黄敬任冀中区党委书记，父亲就直接在他的领导之下了。当年夏末秋初，黄敬调父亲到冀中导报社当记者，其实只是挂个名，真正的工作是调查国民党省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特务从冀南往冀中进攻和捣乱的情况，供冀中区党委研究对策。

实际上父亲真正的兴趣是文学创作，并为此亲身经历生活，收集各种素材。黄敬还曾让他当过一个什么“官”，他干了三天，在门上留了一张条子：王林去也！就不辞而别了。所以黄敬不止一次地批评他：组织观念不强，革命队伍里的自由兵。父亲也就由他说去，自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由于父亲和黄敬、吕正操、孙志远（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冀中区党委常委，父亲中学同学）的这种关系，冀中区党委有什么特殊的任务都直接交给他，如蒋介石派个专员来调查，就派他去“奉陪”。

就这样父亲在抗战期间写了十几个剧本和其他文学作品，其中包括长篇小说《平原上》（被日寇烧毁）和《腹地》。父亲都尽可能地拿给黄敬看，征求他的意见。黄敬也毫不客气地从党的政策的角度提出批评。在1952年3月27日父亲的一个检查中有这么一段话很有意思：

1938年夏天黄敬就警告过我：“你别以为你在学校里是反对梁实秋的，而且被他们开除和抓捕，可是你受他的影响是很深的！”……但是长期不理解。

不管以后对这种文艺思想如何评价，这很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

1942年日寇开始“五一一大扫荡”，黄敬随突围部队到了冀鲁豫边区，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父亲仍在冀中。

1945年初黄敬得了精神病，被送到延安疗养。1947年他病愈回到晋察冀边区，父亲听说后，特地上山看过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腹地》在1943年完稿后就受到陈企霞等人的批评，直到1949年才在黄敬的直接干预下得以出版。尽管在1950年又遭到陈企霞在《文艺报》上的批判，但它毕竟“生出来了”，没有胎死腹中，而且半年就发行了2万册，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对此父亲一直念念不

忘，也算是知遇之恩吧！

父亲痛悼黄敬： “以后再有心事可跟谁说去呢”

进城后，黄敬任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市长，并兼天津总工会党组书记，父亲任总工会文教部部长。但没多久他就不想干了，而要去当专业作家。此举遭到黄敬的反对，批评父亲“不愿做行政工作，就是政治冷淡”。父亲不以为然，和他争执起来，说：“目下不写‘五一大扫荡’，以后哪有另一种生活能比我亲自参加的‘五一大扫荡’更深刻？”黄敬见劝说无效，无奈地感叹道：“匹夫不可夺志！”

直到1958年2月黄敬去世前，父亲常到黄敬家去玩，有时还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北京郊区打猎，我和小三（黄敬的儿子）用“弹弓子”。回来的路上，我因为晕车，吐在了刚进口的小轿车上。

黄敬去世后，父亲异常悲痛，在日记中写道：“以后再有心事可跟谁说去呢？想到这个就觉心里堵得慌！接着泪就控制不住了！”

黄敬家是个大家族，兄弟姐妹每个政治观念都不同，走的道路也不同，家庭内部也有矛盾，特别是在照顾老太太方面，各有各的打算，让治丧委员会很难处理。他们知道父亲与他们家的特殊关系，挨着个儿地找父亲诉说各自的理由。父亲不得不出面，帮助治丧委员会处理黄敬的后事。在处理过程中，父亲曾在日记中感叹道，这一家子真复杂。

黄敬去世后，父亲开始搜集他的逸闻，先后采访了蒋南翔、姚依林、郭影秋、范瑾、张逢时、甘子玉、杨述、张君、金城、张霖之、段君毅、万里等人，写了许多回忆文章，不管发表和没发表，都给后世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1958年六一儿童节那天，在《纪念黄敬同志》一文的旁边，父亲含着泪给我们写了下面这段话：

孩子们，今天是你们的节日，这篇纪念黄敬叔叔的文章，就

是给你们的最珍贵的礼物。长大了要好好学习黄敬叔叔!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来找父亲调查黄敬和江青的情况。尽管他们是百般威胁诱导，父亲始终坚持尊重历史的态度，没给他们可乘之机。他的那些“交代”，现在看来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和黄华携手走过的日子

何理良

2010年11月24日，黄华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他逝世后，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为“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资历最老的外交家”，美国《纽约时报》也罕见地发表悼念文章，称他是“中国迈向开放时值得尊敬的外交家”。从1936年随斯诺进入陕北时的一介书生到新中国的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70多年的外交生涯，外交经历之丰富，友好交往之广泛，堪称外交界的奇迹，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见证了新中国的外交史。他这一辈子看起来顺畅而风光，但光环和鲜花背后艰辛曲折的故事几人能知？艰难岁月苦苦坚守的心情何人能解？我和他自1944年在延安结婚至他去世，66年风风雨雨一起走过，虽各自为事业而奔波，但彼此心心相印，深情相依。斯人已去，思念日切，一直想写一篇文章以示纪念，但忆及往事往往情不自禁，难以下笔。在黄华去世一周年前夕，终成此文，谨以此表示深切怀念。

延安喜结良缘

我是浙江杭州人，我的父亲何思敬（笔名何畏）早年留学日本，喜欢阅读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受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影响甚大。我的母亲是日本华侨，从小在日本长大，毕业于日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我1926年7月出生在日本，不到一岁就随母亲回国。1927年初，父亲受广东

国民政府邀请到中山大学教书。回国不久，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32年，父亲在上海毅然加入处在困境之中的中国共产党。1935年，因单线联系的波兰同志被捕，父亲失去和党组织的联系。父亲是进步教授，口才好，演讲能力强，常常宣讲革命道理。他的课很受欢迎，以至很多学生挤在教室的过道里站着听。1936年初，中山大学校长怀疑父亲是共产党员，准备逮捕他，父亲逃到香港才躲过一劫。

1937年5月，蒋介石在庐山举行抗日座谈会，邀父亲参加。父亲一腔爱国热情，欣然前往。不过，父亲离开香港后很快发生七七事变，形势急转直下，他来到武汉，跟周恩来、叶剑英等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很快武汉失守。1938年初父亲就奔赴延安。父亲走后，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没有生活来源，生活拮据。虽然后来党组织每月提供50港元，够我们基本生活所需，但母亲觉得并非长久之计，和父亲商量后决定全家投奔延安。

1939年12月30日，我们历尽艰辛终于到达延安。到延安后，我首先到边区师范学校学习，不久转到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初中部，后又转到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父亲懂四国外语，英文、德文、日文很好，法文也不错，但是不懂俄文，而他恰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感兴趣，所以就让我学俄文，将来好翻译苏联哲学著作，帮助他进行研究。我只读了几个月，抗大三分校就搬迁了，俄文大队也随之结束。不久，我又转到中央军委底下的俄文学校，一些从苏联回来的干部给我们当老师。当时，中央的意图是培养一批俄文干部，以备苏联向日本宣战时当翻译。后来俄文学校又设了英文系，变成了外语学校，但我依然主攻俄文。我在俄文学校4年，但实际上学习时间并不长，中间两年主要搞整风和审干。在审干运动中，除了马列和我，其他同学都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不再让他们学俄文。

在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学习时，我和朱总司令的姨侄女贺高洁是同学，关系很好，所以经常到朱总司令院子找贺高洁玩，这样就与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熟悉了，同时认识了黄华。刚开始，我对黄华不大了解，只知道他是大学生，懂英文，还在学法文，是朱总司令的秘书。他具体干什么

我不太清楚，只偶尔看见他给朱总司令收拾文件、帮着搬椅子回窑洞。

俄文学校距离军委总部所在地王家坪只有两里路，离朱总司令住地也很近，所以在俄文学校学习期间，我依然常去找贺高洁。抗日战争时期国共进行谈判，周恩来、吴玉章、叶剑英从重庆回来后常作报告。俄文学校学员就带一块木板垫在屁股底下坐在地上听报告。每次报告活动，黄华也都参加。那时，他30来岁，我十七八岁。我能感觉到他常常远远地偷偷看我，我虽感觉不好意思，但并未在意。

除了听报告以外，有时候王家坪还举行舞会。舞会非常简单，大家着装也非常朴素，跳舞时，有人穿着草鞋，有人穿着布鞋。因受父亲影响，我也喜欢音乐，并懂一点简谱，会吹口琴，还是乐队的指挥和鼓手。黄华跳舞水平虽一般，但常去参加舞会，估计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在延安，男女比例实在太悬殊，大概是十比一，男同志对女同志十分感兴趣。所以，黄华刚开始有意无意关注我时，我并未多想，更没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康克清同志找我谈话，说找对象就得找黄华这样的，说他是知识分子，有才华，待人又诚恳。据说当时有干部向朱总司令建议，帮我介绍其他对象认识，朱总司令说你们不要管她了。很明显，他希望撮合我和黄华，向我介绍黄华是个老实可靠的人。自从他们介绍后，我就开始注意黄华，慢慢感觉他确实不错。因为是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的文化水平都比较高，我们家对文化素质看得很重。我父母听说康克清向我介绍黄华一事后，通过多方了解，认为黄华上过大学，知识层次比较高，懂外语，党性强，也比较满意。

当时，黄华看到我就傻笑，从不跟我讲他给斯诺当过翻译等经历。但是，他很用心，很关心我，知道我正在学习俄文文法，就托人在外地买了一本延安买不到的文法书送给我。我比较喜欢吃甜食，他就请我吃枣子。因为双方都比较满意，我和黄华慢慢就确定了恋爱关系。1944年秋，我们决定结婚。当时，胡耀邦同志是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批准了我和黄华的结婚报告。办喜事那天，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为我们祝福，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从南泥湾弄来一桌美味佳肴，有鸡、猪肉和大米等。朱总司令和康大姐请了我的父母，以及叶剑英参谋长等军委的几位

同事和俄文学校的代表何方同志参加。俄文学校的俱乐部主任借了王家坪的桃园，请学校的100多位教员和同学开了个晚会。大伙儿围坐成一个大圆圈，吃着红枣和花生，在马灯光下和胡琴声中跳起交际舞……

结婚后，我才慢慢了解到黄华很有意思的经历。他出生于一个教职员兼地主的大家庭，原名王汝梅。他父亲受过中等教育，曾任县府督学和实业局职员，重视子女教育。黄华天资聪颖，又很用功，成绩很好，19岁就考上了燕京大学。在大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还因游行示威被捕入狱。因思想进步，表现积极，1936年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华来延安可以说既是必然又是偶然。在燕京大学期间，黄华和斯诺、海伦夫妇两位老师关系很好。1936年6月中旬，黄华正在准备毕业考试。一天，看到天津《大公报》刊登的范长江通讯，报道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情况，萌生了去陕北参加红军的想法。恰巧此时斯诺秘密地问黄华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助他做翻译。黄华感觉真是喜从天降，所以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其实，黄华正临近毕业，去陕北就不能参加考试，拿不到文凭。但他很坚决，毅然放弃了文凭。为避免走漏风声，他直接向中共北平市委的黄敬汇报赴延安的情况，黄敬同意不必经过支部上报。

到达延安后，黄华先是陪同斯诺采访党和红军领导人，后来决定留在红军，曾目睹红军三大方面军在甘肃会师。1941年7月黄华被调至军委任朱总司令的政治秘书，这样就有了前面提到的我与黄华产生交集，有缘相识，并走到一起，从此风雨同舟66年。

聚少离多的岁月

1945年日本投降后，和我一起从俄文学校毕业的大部分人被分到前线。我因为已和黄华结婚，而且一位苏联内科大夫的翻译回家乡东北接受日本投降去了，我就被留在延安给苏联大夫当翻译。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为监督停战命令的执行，双方签署《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决定在北平

成立军调部。中共代表是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黄华作为秘书随叶剑英赴北平。1946年8月，我也被调至北平军调部。黄华那时是中共方面的新闻处处长，我平时帮助柯柏年同志做些简报，弄点资料。在随薛子正同志跟美方谈判的时候，我兼做文书兼记录。那时，我的文化水平还远远不够，记录困难，能记到一半就不错了。

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叶剑英就带着我们坐飞机回到延安，没多久胡宗南准备攻打延安。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在王家坪召集从南京、重庆、北平撤回来的外事干部开会，安排撤退事宜，决定由薛子正任队长、黄华任副队长，带领外事人员40多人，准备东渡黄河到晋绥军区。3月9日我们离开延安。因为外事组大多是知识分子，有些刚从国外留学回来，身体比较弱，走不惯山路，而且还有老弱妇孺，一路上我们历尽艰辛，还出了不少洋相。我们离开延安时，总务处给我们雇了几头毛驴。刚从美国回来的徐永瑛带着两个孩子，才一两岁，就放在毛驴驮的两边箩筐里。路上徐永瑛走不动了，骑到一头小驴上，结果毛驴走着走着就跪下了，徐永瑛从驴脖子上栽下来。老同志柯柏年虽然身体比较单薄，但坚持走路，陈家康、章文晋、凌青、林展、王光美、黄华和我决心一路走到晋西北。有时候山路狭窄，只容得下一头驮东西的毛驴通过，而且毛驴脾性也怪，就喜欢沿着外沿走，这样外边的箩筐就悬在深谷之上，一晃一晃的，让人胆战心惊。离开延安的第10天，也就是3月19日，一大早狂风四起，黄沙漫天，真是天昏地暗，似乎暗示着什么一样。傍晚得知延安被胡宗南占领了。尽管知道短期放弃延安是党中央早已预定的策略，但它的陷落仍然使我们黯然神伤。

过了黄河，我们来到山西的晋西北军区贺龙司令员的总部兴县。在兴县听说，中央3月26日在清涧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工作，以刘少奇为书记、朱德为常委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黄华于4月中旬接到命令任朱总司令秘书，随中央工作委员会去晋察冀军区。少奇同志身体不好，中央决定让苏联内科大夫米里尼科夫跟随照顾，我顺理成章充当翻译。我们这一行人由刘少奇、朱德率领，有康克清、徐冰

(原名邢西萍,少奇同志秘书)、张晓梅(徐冰夫人)、潘开文(朱总司令的机要秘书)、米里尼科夫、齐明臣(朱总司令的卫士长)以及黄华和我。离开兴县后,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骑着马边赶路边思索,考虑如何实施中央交代的任务。有一次少奇同志走过一座很窄的桥,不小心掉进河沟里,冻得要命,黄华赶紧给他披上朱总司令给的皮大衣。

我们前后共走了20多天,才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即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途中,米里尼科夫不知道为何又回地处三交的后方工作委员会去了,我自然也就不当翻译了。一路上,少奇同志利用晚上的时间召集当地党政干部开会,调查研究农民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土改中存在的问题。会后他写报告给中央,有时写到深夜,交给我帮他誊清。后来,少奇同志移住建屏县的西柏坡村。7月份,我们参加了少奇同志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7月17日土地会议开幕,我记得会场是露天的,只是搭了一个简单的主席台。刘少奇和朱德在主席台上就座并讲话。土地会议后,我们随邓颖超同志到阜平县细沟村搞土改工作。邓大姐做群众工作很有经验,对我们帮助很大。有一次,她的秘书知道村里要选举,就把选票给裁好了。邓大姐知道后批评指出:你要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什么都替他们想得好好的。让他们自己动手,你提醒就可以了。

1948年春,黄华被调回西柏坡待命,并在任弼时和冯文彬同志领导下研究如何开展全国的青年工作问题。我继续在细沟村待了一阵,直到土改基本完成。后来,米里尼科夫大夫又跟着后委的叶剑英同志回到西柏坡,我继续给他当翻译,直到1949年进入北平。

1949年1月17日,即天津市解放后两天,黄华和章文晋奉中央命令离开西柏坡到天津,分别任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和副处长。当时,我还有任务在身,没有跟着去天津。4月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平召开成立大会。任弼时要黄华到团中央工作,调他去北平参加成立大会。在会上,周恩来副主席见到黄华,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

望。”这样黄华就到了南京。

1949年4月，团中央接到一个任务，要组团去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我被调去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任翻译。开完会议回程时，我们参观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那时已是10月1日，苏联同志跟我们说，你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我听了十分兴奋，顾不上再参观，急急忙忙赶回国到南京同黄华团聚。10月下旬，黄华又接到命令，让他到上海任军管会外侨事务处主任，接替调往北京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11月，我坐火车赶往上海。因为国民党用美军飞机轰炸上海，苏联派了一个市政专家组到上海帮助建设，我就作为上海外事处干部给他们当翻译。不过，到1952年下半年，我又接到命令，去华沙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当时，我们的孩子才9个月大，黄华在上海也忙得不可开交，我只好让孩子断奶，带到北京让家人照顾。

参加完世界和平大会回到莫斯科时，已是1953年2月。此前，因多批苏联代表团来访，工作中感觉知识不够用，尤其是在翻译工作中感觉很吃力，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有进步和突破。我的父母都上过大学，都认为大学是求知的重要阶段，鼓励我趁年轻把基础打牢，父亲尤其鼓励我去上大学，学好俄文。当然，最关键最重要的还是黄华的默默支持。当时我们的孩子还小，需要照顾，但是黄华坚定地支持我去读大学，进一步提升自己。因此，在参加和平大会前，我提交了到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学习的申请，此时被顺利批准。3月5日，斯大林去世。一周后，哥特瓦尔德也逝世。中央派周恩来总理率团分别前往吊唁。我临时作为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当了一阵翻译。回到莫斯科时已是5月，国际关系学院通知我赶快去报到。报到后，他们的副院长跟我谈话，问我在经济系、法律系、历史系当中，想去哪个系学习。我数学基础不好，不能去经济系，也不喜欢法律，所以就报了历史系。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是培养苏联外交官的学校，学制五年，要求十分严格，一位学生要学两至三门外语，还要学习历史、法律、经济等知识，课程特别多。

学习期间，我们每月发500卢布，除了伙食费和交通费，我还买一些书，其他东西就基本上买不了。因为我不愿像别的同学那样光吃自己煮

的面条省钱。有时候我还到大剧院看看戏，就是在开幕前最后几分钟买最便宜的票，座位在五层，只能看到演员的头顶，但可以欣赏很多经典的文艺作品。别的同志能省钱买照相机，我买的却是《列宁全集》。

我出国后，孩子和家务主要由我母亲、阿姨等负责照顾。那时孩子小，常患点小毛病，我又不在身边，所以经常哭，大家都说我是最狠心的，为了求学不顾家庭。其实我每天都在想她，尤其因为宿舍旁是个儿科诊所，我一听见孩子的哭声就心里难受。不过黄华很支持，从不说什么。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每年七八月放假，发津贴1000卢布。我就拿这笔钱做交通费，每年夏天都回国。我们还积攒过1万块钱，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我们有那么多钱，是“走资派”，我们就把多年积蓄全部作为党费捐掉了。现在想来，受当时环境影响，我们有点书呆子气，当时很多人生活困难，也应该多支援一下他们。比如，有一位曾和我们一块学习的女同志，丈夫在朝鲜前线牺牲了，一个人带着两个子女生活很困难，我们也经常接济她，但当时应该多留出一点钱给她的。

到了第5年，即1958年毕业前夕，学校准备安排即将毕业的学生到国外使馆实习，但又不愿意派中国留学生去苏联的驻外使馆。我们也很懂事，就向校方建议：我们先完成毕业考试，然后再回国实习。因为帮他们解决了难题，校方很高兴地批准了。所以，我在1958年2月就回到了祖国。

从我1952年去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到毕业回国近6年的时间里，黄华忙于各种外交活动，满世界跑。1953年8月，周恩来总理问外交部的章汉夫和伍修权两位副部长，能不能请黄华在一个月內将上海的外资房地产问题做一个了结，调离上海，参加在朝鲜的政治会议工作。他还强调说，在朝鲜开城的班子需要生力军。这样，黄华调离上海，到朝鲜参加中朝方面和美韩方面关于朝鲜和平问题的政治谈判。1954年春，黄华又被从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召回北京，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作为代表团顾问和新闻宣传组组长随行。回国后到了8月，他被任命为外交部欧非司司长。1955年2月，中国决定应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五国邀请，派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亚非会议，黄华又是代表团的顾问之一。

在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中，黄华临上机前接到周总理通知，改乘“空中霸王”号，才躲过一劫。

1958年，我回国后被分配到国际关系研究所任研究员。自从1944年结婚，我和黄华各忙各的，聚少离多。从1958年回国到1960年8月，我们终于难得的团聚了一段时间。1960年7月5日，中国和加纳发表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加纳成为原英属非洲殖民地第一个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一天，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和罗贵波找到黄华，问他愿意去哪个建交国任大使，黄华表示首选加纳。8月5日，黄华被任命为中国驻加纳首任特命全权大使，25日，我随黄华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在加纳，我主要在大使直接领导下搞调研工作。毕竟在国际关系学院学习近5年，经受了系统而严格的训练，所以我关于加纳社会的调研报告后来很受外交部重视。去加纳时，我已怀上第二个孩子，1961年初孩子在加纳出生。在加纳这几年，算是我们结婚后在一起时间最长、最稳定的日子。

“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

1965年11月，黄华和我从加纳奉调回国，为黄华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当大使做准备。1966年初，黄华接到命令，调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任大使，我也随行。出国不久，国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黄华到任拜会即将结束时，国内发出指示，要使馆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通知。该通知称：中央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要求“彻底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和调动他们的工作……”5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这个消息使我们感到十分吃惊，使馆党委几次开会讨论，大家对通知感到很不理解，但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是提出一些疑问，会议开得很沉闷。

埃及首都开罗是个大码头，是亚欧、亚非的重要通道，从国内来的人很多，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传给使馆人员，一部分人开始不安心于正面学习了。有些年轻同志，尤其是在埃及大学

学习阿拉伯语的20多名中国留学生开始躁动，响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关于“造反有理”、“破四旧”的号召，要求到大使馆“破四旧”。他们认为大使官邸院子里20多尊一人多高的白水泥塑造的希腊女神像是“封、资、修”的东西，要砸掉。黄华和使馆的参赞都不赞成，因为这一群塑像在当时也算是扎马力克岛的一个风景点，砸掉塑像是否使人感到中国人非常可笑？但是学生们和使馆几位干部坚决不能容忍，一天夜里把塑像砸了，挖土深埋。院内的女神塑像一夜之间消失，开罗报纸还就此发表了几条消息。

1966年10月，我被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黄华幸运地继续留在埃及。那时，中央不许在国外闹革命，所以一部分很“左”的同事回国闹革命了。1967年初，我国各驻外使领馆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同志已有一两千人。他们以使馆为单位组织战斗队，把大使、参赞和他们的夫人当做“当权派”揭批斗，要他们检讨并“触及灵魂”。一些大使遭到责骂，个别甚至被罚跪殴打。有一次，他们说晚上开会，让我也去。当时我刚生下第三个孩子不久，就以孩子要喂奶为借口告假，结果那天他们让那些大使和夫人们跪在台上进行批斗。据说，章文晋回国时，一下飞机就让他背毛主席语录，他一直在国外，当然背不了。所以，到了外交部，造反派让他头顶皮鞋跪在地上挨斗。不过中国驻埃及使馆的同志还算好，就批评几个参赞和我，我们写了检讨获得通过后，就算是“解放”了。

国内情况这样混乱，黄华在大使馆的处境也不妙，工作难以正常开展。1967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江青对陈毅、谭震林等进行猛烈攻击。外事口的造反派闻风而动，酝酿打倒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打倒陈毅之风传到驻埃及使馆，一些年轻人主要是工勤人员就来劲了。一天晚饭后，党支部书记召集全馆开大会。一个工勤同志领头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大家举手跟着喊。黄华既没举手，也没开口。领头喊口号的同志质问：“黄华，你为什么大喊口号不举手？”黄华沉下脸说，我不知道陈毅同志有什么错误。那个人很生气，继续喊了几次施压。黄华还是不为所动。在这次支部大会后，黄华还同武官和驻亚力山大总领事一道约定，绝不举手打倒陈毅。

不久，又从国内传消息到埃及，说造反派对外交部领导实行了业务监督，驻埃及使馆一些人也要仿效。有人说：“黄华，我们要对你实行业务监督！”有一次，他们要监督黄华同一名外国朋友的会见，被黄华严词拒绝。使馆有些人仿照国内的做法，动辄背诵毛主席语录，每个人都拿小红书翻看和引用。有一些年轻同志吵吵嚷嚷，引用“造反有理”等语录，黄华就引用“我们需要热烈而镇静的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等语录应对。语录中的内容大家各取所需，针锋相对。造反派对黄华的不合作十分恼火。有一次，他们跑过去怒气冲冲地说：“黄华，你表现不好，我们要撤你的职！”黄华也毫不示弱地回答：“我是毛主席任命的，要撤也不归你们来撤我。”他们一听是毛主席任命的，便不作声了。据说，1967年6月间，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战斗队也曾要求把黄华揪回国内。他们的无理要求被周总理拒绝了。周总理表示，我们至少要留一个大使在外面嘛！否则一些重要的交涉和外交活动都没有特使代表中国政府出面，这样行吗？外交是讲究身份的嘛！

1969年夏，在周总理的督促下，驻各国大使、参赞被“解放”，陆续返回原岗位。恰恰相反，黄华1969年7月被调回国。早在他回国的半年前，我已被下放江西干校。黄华回来后，首先被安排参加“文革学习班”。不久，黄华的自我批评获得通过，终于得到“解放”。此时因为有情报说苏联要进攻中国，林彪发出一号命令，要求中央各机关大批人员疏散到其他省份。外交部军代表命令我们家的老人孩子离开北京。因为军代表认为大使和夫人长期养尊处优，应该进行劳动改造。于是，黄华被下放到湖北钟祥的干校劳动锻炼。因我母亲临行前捆扎行李腰病发作，不能行动，经批准，家属终于留在北京。

我和黄华觉得到基层去也很好，可以真正接触群众。我买了4本农业方面的书进行学习，从土壤结构，一直到防治病虫害。对农业的兴趣我早就有了，在延安时也得到了锻炼，所以基本农活难不倒我。那时我虽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但在干校是甲等劳动力，种菜、挑水、插秧样样都能干。我们十几个大使夫人在一起，都觉得自己是革命者，什么也不怕。江西的冬天冷得要命，我们就在地板上铺几块砖烧树枝取暖，满屋

子都是火焰，如今想到那种情景，也觉得挺有意思的。黄华觉得接触基层挺好，不过他要从汉江的船上将砖头挑到岸上，船和岸之间就几块竹木板，摇摇晃晃的，他不会游泳，掉下去就十分危险。湖北冬天夜晚的气温有时会下降到摄氏零下几度，黄华从北京带去的布面貉绒皮很受班里夜间站岗战友欢迎。

1970年6月，党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斯诺夫妇访华，周总理借机调黄华回京参加接待工作。于是，黄华成为第一个从湖北干校调回北京的，他的战友们由此预感到他们也将陆续被调回京，都非常高兴。班里还为他举行“百鸡（田鸡）宴”饯行。黄华回到北京约两个月后，我也接到回京调令，我在江西干校大约待了一年半。历尽磨难，我们全家终于在北京团聚。

斯诺到北京后，急着和毛主席、周总理见面交谈。但是周总理劝斯诺先去参观或去北戴河休养。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从8月下旬起，黄华带着我及外交部的两位英文翻译陪同斯诺夫妇在北京和外地参观。我们参观了清华、北大，包括斯诺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时的燕园。接着飞西安，去访问延安和保安（即今志丹县——编者注）。后来又到了上海，在那里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出面接待斯诺的是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徐景贤，他津津乐道地叙述“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发动的经过，长时间介绍造反派夺权的安亭事件，然后讲批斗老干部的情况，说那些老家伙根本就不触及灵魂。斯诺听了感觉很不是滋味，对徐景贤说，没有老干部就没有你们今天！并忽然站起来说，你们要老革命触及灵魂，可他们的灵魂是干净的！讲完就告辞，弄得徐景贤很尴尬。

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斯诺终于见到毛主席，并交谈了约40分钟。事后毛主席说，这是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12月7日，周总理给黄华写了封信，要他报告斯诺夫妇访问了什么地方，接触了什么人，还有多长时间留在北京，以便毛主席考虑何时见斯诺并同他谈些什么问题。还提醒黄华，在报告中不要建议林彪、江青见斯诺；更不要提请周总理见斯诺。周总理要黄华报告斯诺的访华情况是理所当然，其他的提醒则很出人意料。实际上，对林彪、江青等争夺最高领导权的

险恶图谋，周总理和许多老同志看得十分清楚，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们得逞。

1970年12月18日晚，毛主席请斯诺去中南海谈话和吃早饭，由王海容和唐闻生担任记录和翻译，黄华和我都没有参加。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通栏位置报道了毛主席12月18日会见斯诺的消息，并刊出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时和斯诺的合影，含蓄地向美国发出信息。离开中国后，斯诺在意大利刊物上发表了与毛主席的谈话。这一谈话在美国和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不过，斯诺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毛泽东说：“我是一个孤独的和尚，在雨中打着伞走来走去。”这段话使人感到十分诧异和迷惑不解，许多外国朋友就此不断询问黄华。我们也觉得很纳闷，看得一头雾水。原来斯诺把毛主席的一句话误解了。毛主席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意即中国不是联合国和国际条约的成员，在世界上很自由，不受约束。明白其中缘故后，我们捧腹大笑。

1971年初，黄华接到中央通知，安排他到加拿大任大使。对此，大家都很高兴，认为黄华当第一任驻加拿大大使比较合适，在外交部谁好谁不好大家心里很清楚，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4月间，周总理又通知黄华另有任务，暂推迟赴任时间，并向加方打招呼，取得谅解。后来才知道，黄华被留下来，主要是参与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5月下旬，中央决定为中美谈判成立由周总理、叶帅和黄华组成的中央外事小组。有一天晚上，周总理带黄华去向毛主席汇报，在说到基辛格博士将在巴基斯坦山区失踪时，毛主席说：“黄华同志，你也失踪嘛！”就这样，黄华这个已被北欧四国驻华大使设宴饯行的大使，消失了一个多月，在钓鱼台国宾馆四号楼潜心为基辛格访华做准备。基辛格到达后，黄华就忙于中美双方的谈判工作，我则在后台工作，帮助准备一些资料和其他服务工作。

直到中美两国签订联合公报，基辛格完成使命回国，黄华才作为中国首任驻加拿大大使于7月23日抵渥太华履新，我也随他到使馆工作。我们到加拿大后，华侨非常高兴，很多人争相来看，都想看看新中国的大使是什么样的。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毛主席又亲自点将，组成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熊向晖和其他7人为正副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所以，我们在加拿大只待了5个月。走的时候加拿大已是秋天，我们受朋友邀请到郊外游玩，真是落叶缤纷，五彩斑斓，风景如画。

11月11日，黄华结束在加拿大的使命，飞往巴黎与中国代表团会合，然后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同志完成任务回国后，黄华则作为中国驻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首任常驻代表留在纽约工作，直到1976年12月。黄华去巴黎与代表团会合时，我没有跟去，直到1971年11月底才去联合国。

外交领域是“四人帮”捣乱的重灾区，黄华在联合国的工作经常受到造反派干扰，甚至被谩骂。外交部有来自部队和地方的干部，他们不懂外语，但参加革命早，很有贡献。年轻的、懂英文的造反派就整这些老干部。按照中国的传统思维，女同志少说话，不要干预男同志的工作，否则有事没事都给你造一些谣言。所以，除了自己负责的工作外，其他事我一概不管，就算明明知道有些人无理取闹、有些事毫无道理也不插嘴，否则将对黄华不利。从延安时代起，我们就受到严格的教育和训练，不让知道的就不问，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很多事情，黄华没有告诉我，我也从不多问，所以常常事后才知道。当然，有时他也透露一点，告诉我该怎么办，要注意什么问题。

国内很“左”的做法自然影响到外交政策，从国内发出的指示有些很“左”，有理无理都批超级大国。有时，黄华反反复复研究国内指示，但还是一头雾水，因为有些跟外交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文化大革命”在全世界都有影响，有些问题外国人很迷惑。比如，江青说贝多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有一个比利时驻联合国代表就问黄华，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古典音乐？为什么说贝多芬是资产阶级的人？他是穷困而死的，他的音乐是代表人类的意志和理想的，他怎么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黄华没办法辩论，只能说这是她个人的意思。有一次，阿根廷代表问黄华，你们为什么扣着人不让出国？黄华说我们没有啊！你们要多少人呀？1000万？2000

万？阿根廷大使就不敢问了，中国人这么多，真正敞开了阿根廷也受不了啊！

1974年批周总理的时候，在纽约也莫名其妙地突然开了一个大会，会上狠批黄华，说他带头违反纪律，不再让他管使馆内部事务。黄华心里很明白，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和国内政治动向密切相关。他隐忍下来，不让他管就不管了，每天还是看必要的报刊、文件和内部的管理指示。

在联合国，我先是做友好联络方面的工作，其间发生了一件后来闹得风风雨雨的事：对华友好的老朋友约翰·S·谢伟思先生介绍一位叫罗克珊·维特克的大学副教授给我认识。维特克说希望到中国采访邓颖超、康克清等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妇女。我想这很好，可以宣传中国，然后就介绍她到了北京。到北京后，维特克不仅采访了邓颖超和康克清，还被江青接去进行长谈。维特克回到美国后，撰写了《江青同志》一书，后来有好事者又给闹出所谓“红都女皇”的笑话。不过必须澄清的是，维特克不是我有意介绍给江青的，是江青一厢情愿地想培养一个像斯诺宣传毛主席那样的人罢了。其实，当时周总理的意思是让维特克和邓大姐、康大姐谈一次，只谈妇女解放运动，不谈其他的。但是，江青把维特克接去后，周总理就难以控制了。

联合国下设七个委员会，第六委员会是负责法律的，主要讨论研究怎样发展国际法。当时我们的干部都分配到其他委员会了，六委没人去，我就到了六委。国际法我学过一点，不过远远不够做好这项工作。国际法工作很复杂、很专业、很耗时间。比如，为了拟定一个国际海洋法公约提纲，就花了9年时间。

黄华除了忙碌多边、双边交往外，很注意同美国友好人士和旅美华人联系，很注意同秘书处的华裔官职人员交往。我在联合国5年，除了六委的工作外，还常作为大使夫人参加友好交流，并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我常随同黄华与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等晤面。有一次，我们到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教授如何教学，那种宽松自由的氛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教室是阶梯式的，他在下面讲，学生坐在阶梯上听，学生中有大胡子的、秃头的，形形色色，完全不拘小节。李政道边讲边随时回答学生插

话提问，氛围十分自由活跃，这跟我在苏联学习时有天壤之别。在苏联，教授在前面讲，学生规规矩矩坐着听。如有疑问，首先说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发问，征得同意后才可以站起来提问，提问完坐下后，教授才给回答，总之非常古板。

在美国期间，虽然因两国长期隔离对立，互相之间还存在不理解，但民众比较友好。当时，为了监视我们，一辆美国警车总停在我们住地门前。我们有时候星期天去附近的风景区游玩，警车就在后面一路跟着。我们停下，他们就在离我们大概50米远的地方停下。偶尔，我们随手拿两瓶可乐给警察，他们也挺高兴地接受。纽约人一看男士们穿着中山服，女士们穿着翻领上衣和长裤，就知道我们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多数能客气地打招呼，问路时也能详细地给予指点。我们男同志走路喜欢迈八字步，有人就建议不要那样，因为很不雅观。美国人很幽默，有时还弄出点稀奇古怪的东西。有一年的圣诞节前两天，我们注意到对面房子的窗户上挂出一大幅招贴画，上面用英文写着：“向中国代表团致敬！”下面落款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running dogs）。”他们一定是觉得走狗这个词太有趣了，故意博中国代表团一笑。

粉碎“四人帮”后的日子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一公布，举国欢庆。我们在纽约代表团里也聚餐饮酒以示庆祝。12月1日，黄华接到中央的调令，要他在10天内完成辞行拜会并回国，但并未说明回去干什么。12日，我们回到北京，在首都机场一下飞机，就看到外交部全体副部长都来接机。我们感到很纳闷，还没有来得及询问，王海容就告诉黄华，乔冠华已被免职，中央决定让黄华担任外交部长。离开美国前，一些人一反常态，忽然对黄华非常热情，还举行送别会，热情地赞扬他一番，这让我和黄华觉得很纳闷！后来才明白，原来是他们已从其他渠道得到黄华要当外长的消息。

回京后第二天，黄华应邀去见李先念。李先念向他介绍了相关情

况，还说，“政治局要你回来主持外交部的工作”。过后，黄华去看了叶剑英副主席，听他简单地介绍了打倒“四人帮”的过程。

黄华突然当上外交部长，令人感到意外。很多人很高兴，尤其是入党很早的一批外交骨干。他们外语好，外交经验丰富，可是被撤了职，只能干一些抄抄写写的工作。当时，外交部的极左残余和派性仍非常顽固，工作秩序还没走上正轨。黄华决定先从干部政策上打开突破口。他担任部长不久，就恢复了那些德才兼备被无端地靠边站干部的职务，调整了部和司的建制，并把在“五七干校”劳动的4000多名干部陆续调回外交部和部属单位，充实了国内和驻外使领馆的干部队伍。尽管如此，头两年的工作还是很不好做。后来黄华告诉我，有一次选一个党代表，推荐上来的却是一位给江青写过效忠信的女同志。外交部党组开会讨论时，廖承志和黄华不同意，另外两人极力推荐，军代表则一言不发，一直讨论到第二天凌晨4点也没结果。后来没有表决，直接报告上去，请上面定夺，由此可知黄华处境之艰难。

从加拿大回国后，本来让我到外交学会当副秘书长。我觉得自己精力不是很旺盛，每天到外交学会上班太折腾。而外交部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就一两里地，骑车上班方便。我就提出，能不能让我到国际司工作，获得批准后我就任国际司副司长。国际司工作任务很重、很繁忙，去了以后，我看到一些年轻人随便发号施令，老外交官反而低头哈腰地接受命令，觉得不利于开展好工作。我把这个情况向上面反映，说经验丰富的老干部身体还不错，为什么让他们干科员的工作，而那些年轻人反而升得那么高，占据领导位置向老干部发号施令？大概到1978年，这种情况引起了上面的注意，两个升得很高的年轻人被调到党校学习去了，情况基本好转。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工作慢慢步入了正轨，黄华在邓小平等同志领导下，在推进对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小平等同志的信任和支持。1980年9月，黄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82年5月，担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11月10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去世。当时中苏关系虽然恢复了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但两国长期

形成的紧张、对立关系并无变化。苏联方面和国际上都高度关注中国对勃列日涅夫去世的反应。外交部建议让钱其琛率团去吊唁，因为他长期跟苏联专家打交道。小平同志考虑到他当时还只是副部长，不是中央委员，觉得还是让黄华去合适。

对黄华此次苏联之行，外交部拟定了一个方针，并已得到中央批准。11月13日晚，黄华打电话向小平同志报告情况，并请他指示。小平同志表示，他考虑需要对原定方针作些补充，并谈了具体想法。14日清晨，黄华乘客机飞往苏联。其实，中央为黄华安排了专机，但黄华觉得坐专机费用太高，普通航班很方便，时间也来得及，就婉拒了。由于黄华来不及在行前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中央决定改用书面谈话形式。苏联的电台和报刊当天宣传和登载了这篇谈话，在苏联的领导层和普通民众中引起巨大反响。黄华在莫斯科刚下飞机，杨守正大使就低声告诉他：中央有特急电报，要他去看。看了特急电报和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全文，黄华发现谈话有两处突破了原来请示报告所定的表态范围。一是加大对勃列日涅夫正面评价的分量，同时指出中苏关系“到60年代后期，恶化到严重地步”，该时期的苏联由勃列日涅夫掌权，这实际上是作了委婉的批评。二是关于两国关系。原定方针是不主动谈分歧，不直接提消除障碍的问题。而谈话则明确说到“双方要共同努力，消除两国关系中的障碍”。特急电报除了要求根据谈话精神表态外，还有两处对原定方针作了重要改动和补充。首先，原定方针没有要求同苏方进行正式会谈，特急电报则指示黄华以外长身份主动要求拜会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同他进行坦率的对话，要利用这次出席葬礼之机，举行一次两国外长的政治会谈。其次，特急电报还指示黄华在会见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时，除原定表态内容外，要加上“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的领导作出新的努力，促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黄华看完会心一笑，心中有数，因为这些新思想基本上就是小平同志13日晚对他讲的补充意见。

黄华参加完葬礼，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进行正式会谈，但完成各项任务回到国内后，却已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调至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决定虽下得特别突然，但黄华早有预感。对此，黄

华也是有看法的。但他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洗礼，没过分在乎，一切服从组织安排。我就安慰鼓励他，说我们是共产党员、革命者，不在乎地位高低，我们尽心尽力干好自己的工作就问心无愧了，至于如何安排是组织上的事情。事实说明，组织上始终还是信任黄华的，1983年6月，他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本来让他到外事委员会去的，后来没有这么安排。实际上，在全国人大工作的5年，他多次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国交流访问，进行了大量的外事活动。1987年，他又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中顾委常委，直至1992年中顾委撤销。

1992年黄华彻底从党政岗位上退下来。因为在外交界奋斗了一辈子，与许多外国友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对外交工作怀有浓厚感情，离休后他依然发挥余热，加强与对华友好人士的交流联系。黄华学的是经济，却没干过一天经济工作，搞了一辈子外交。同样，我主修的是俄文，后来却主要跟黄华在英文国家工作，俄文翻译没派上用场。十分遗憾的是，我因兴趣广泛，尤其喜爱绘画，没太集中精力学习英文，到现在说英文都还有点磕磕绊绊。后来，黄华让我出国当大使，对搞外交的人来说驻外大使是个很荣耀的职务，对我更是很大的信任。不过，一方面我觉得胜任大使大概没问题，但另一方面我对此兴趣不大，无意仕途，加上照顾家庭等因素，我放弃了当大使的机会。作为老资格的副司长，我本来有机会再提升，不过我响应小平同志的号召，过了60岁生日就离休在家，不再上班。对此，黄华可能也觉得我不够上进吧，不过他从不勉强我干什么。

我们家比较开放，电话号码很多人都知道，而且黄华既有许多中国朋友，也有许多外国朋友，所以我们家的电话本与众不同，是按照A、B、C、D排列，总计恐怕有几百号人吧！黄华对曾热情帮助过中国的国外友人情深意重。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时，黄华多次去看望斯诺的第一任妻子海伦·斯诺。1997年海伦·斯诺去世后，我和黄华还专程赶往美国参加她的葬礼。2008年，基辛格参加完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开幕式3天后就来看看黄华。黄华听说基辛格带着儿子、孙子等家属来到北京，非常高兴。那天，他刻意挑选了一件大红唐装穿上。那时他身体还行，还能从床上

坐起来，他把一个我从开幕式上带回的拨浪鼓拿在手上，基辛格一进门他就摇着拨浪鼓表示欢迎。那天，两位老朋友谈得十分高兴。

延安时期黄华就参与中共的对外交流活动，几乎参与了新中国所有的重大外交事件，为了将这一宝贵经历记载下来，给后人留下经验和启示，在相关单位和各界朋友支持下，黄华离休后努力进行回忆录的整理工作。回忆录出版后，我们获得10万元稿费，除了缴纳2万元税费外，黄华将剩下的8万元全部捐给了以“推动国际民间交流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为宗旨的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说到推动国际友好交流的资金，还有一笔感人款项有必要一说。曾采访朱德写成《伟大的道路》一书的作者、著名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在1950年患重病进行手术前，特地将她的稿费全部捐给朱德，以支持新中国的建设。1976年朱德逝世后，这笔原封未动的稿费转交给康克清，康大姐去世前又转交给黄华。最后，黄华将这笔钱交给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保管。为了珍藏这位国际友人赤诚、炽热之心，这笔钱被“全额储存，分文不动”。

2010年11月，98岁高龄的黄华带着他的智慧和学识走了，留下了优良的作风和精神。70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历经了大风大浪洗礼，接受了种种考验。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不管是学生运动中面对阴森的监狱，革命战争年代面对随时可能的牺牲，还是面对波谲云诡的外交战场，他都毫不畏惧、机智勇敢地从容应对。在工作生活中，他光明磊落，耿直不阿，不羨名利；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岁月，他堂堂正正，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对外交涉中，他坚持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立场，有坚定的原则性，又与人为善，和许多国际友人结下了深厚情谊。“生逢其时，一生充实”是黄华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他是幸运的，他看到了共和国61周年的辉煌，13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他是欣慰的，无论是在外交界，还是在科技界、教育界，他都有许多知心朋友；他既忘我工作，也倾情家庭，是我和子女的良好良师益友。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文世芳 汪文庆 整理）

父亲田家英与毛岸英的 一段师生情

曾 自

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1950年11月牺牲在朝鲜战场，年仅28岁。历史的尘封，使毛岸英的故事鲜为人知。

我母亲晚年追忆父亲田家英时，多次提到“岸英”的名字。毛岸英1946年从苏联回国至牺牲近5年间，和我父亲既是师生又是挚友。

母亲印象中父亲同毛岸英 非同寻常的关系

我的母亲董边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奔赴延安的那批热血青年中的一员，1941年和父亲田家英在延安相识相爱并走到一起。

母亲忘不了和毛岸英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她说：

1948年底，我从晋察冀回到西柏坡。我是1945年8月随大部队从延安北上，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工作的，这时已和家英分别了三年。

可巧，家英初任毛主席秘书，被主席派去东北考察了。

数天后，我参加了中央妇委会为召开第一次全国妇代会的筹备工作，妇委会在东柏坡。家英出差回来，兴冲冲地来东柏坡找

我，他身边跟着个高高个子的青年。没等我反应过来，这个青年就给我深深鞠了一大躬，并大声说，“师娘好！”我为人腼腆，一下子臊了个大红脸。家英忙解释，这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在跟我学文化，故称你“师娘”。我这才注意，岸英是个热情爽朗的青年，高高的个子，脸晒得黝黑，脸上还带着顽皮的笑，很可爱。

以后我在西柏坡多次见过岸英，都是和家英在一起。看得出，他们关系融洽，好到连上厕所都形影不离。

他俩都是1922年生，家英长岸英半岁，但显得比岸英成熟些。

岸英性情坦率、奔放，加之长期在苏联生活养成的习惯，更显得直白爽快。家英也是个性情真率，表里如一，有话藏不住的人。他和岸英成为挚友是很自然的。

1950年1月底，我在协和医院生小英（姐姐的乳名），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在延安送给老乡了。听说得了女儿，家英高兴地到医院来看我。我清楚地记得，是和岸英一起来的，他们之间毫无芥蒂，亲如手足。

进城后，岸英主动要求到工厂锻炼，不常回家。但只要回中南海，一定来静谷家英办公的小屋坐坐（静谷是中南海里的一个园子，离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仅二三百米）。两个人见面有说不完的话。我在静谷不止一次见到岸英，他对人还是那么热情大方，开开心心，给人以感染力。

母亲对毛岸英的印象很深，但所知毕竟有限。多年的关注，使我从知情人那里，知道了更多关于父亲和毛岸英的故事。

父亲成为毛岸英的老师

父亲是什么时候，又是怎么当上毛岸英老师的？据有发言权的曾彦

修老人（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讲：

毛岸英于1946年初回国，组织安排他在中宣部搞俄文翻译。那时田家英也在中宣部，帮胡乔木和陈伯达收集整理资料。中宣部在延安的杨家岭，岸英和家英、于光远、何均、陈真、曾彦修都住在一排窑洞，热血青年很快熟悉起来成为朋友。

至于田家英给岸英当老师，我认为不会是毛泽东亲自点将，更不像有些人推理的，毛泽东曾听见田家英在马列学院讲课，驻足窗外，因而对田有印象。田家英当时只是中宣部一名普通干部，和毛泽东没有那么近熟的关系。

事实应该是，毛泽东让陈伯达教毛岸英，陈已为毛泽东做了多年的秘书，并谙熟中国历史，是延安公认的威信最高的文化人。

但熟悉陈伯达的人都知道，他的逻辑思维强，文笔好，就是手懒，既不用功，也不刻苦，靠聪明。他写东西离不开田家英、陈真、史敬棠、何均四个人给他收集资料、做长编，最后他重新逻辑梳理和概括成书。

陈伯达的福建官话说得很难懂，正式场合他讲5分钟的话都困难。最主要是他素不爱管闲事的性情，当任何部门的领导都是甩手掌柜，一心只在修书上。

陈伯达对田家英很了解。1941年起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他就是田家英的领导。田家英传统文化功底好，19岁在马列学院当教员，善于表达。且田家英和岸英关系又好，陈伯达把毛泽东交代的这项任务交给田家英，是顺理成章的，也是负责任的选择。

毛岸英去苏联近10年，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缺乏了解，以至他父亲何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也不完全理解。对毛岸英的培养，组织上是很重视的，转战陕北期间，特别交代昆仑支部的于光远、曾彦修、史敬棠等同志，若田家英不在时，大家都有义务帮助岸英了解情况，熟悉工作。

朱老总的秘书何均，也是父亲终生的好友，他曾对我回忆：

田家英给毛岸英当老师，非常尽职。他将中国历史和语文糅合在一起，按历史时间进程循序渐进地讲授。田家英9岁失学，知识主要来自自学。背诵经典古诗文，是他认为很有成效的学习方法之一。他常年坚持，养成习惯，成了一生的乐事。他为岸英设置的课程中，自然包括背诵。他选择经典名篇、诗词和精彩文章要岸英背诵，并严格检查。

一次，田家英督促毛岸英背一篇毛泽东论述经济问题的文章，毛岸英背得不甚流利，可田家英一丝不苟。我见状替岸英开脱，说古文有韵律，好背，现代文不好背。田家英没有争辩，将这篇文章一口气背诵出来，然后说，该背的东西就是要背，现代文也一样，学习非如此不可。我们深为田家英的博闻强记和刻苦精神所感动。

给毛岸英补习中国文史，主要由田家英承担。组织交代过，中宣部内和毛岸英相熟的同志，都有义务帮助岸英，曾彦修也做过岸英的临时“教员”。1948年毛岸英赴山东土改，田家英还特别嘱托史敬棠继续帮助毛岸英学习文史。田家英还把延安党内知识渊博的老前辈范文澜、叶蠖生介绍给岸英，让毛岸英向他们学知识。

回国短短几年，毛岸英进步很快。

从一封珍贵的书信 看毛岸英写作的进步

历史当事人的讲述，被一封尘封近50年的书信印证了。

1995年，史敬棠（曾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从“文化大革命”被查封的书籍中找到夹在里边的一封毛岸英写给他的亲笔信。那年他们随康生去山东渤海区搞土改复查，毛岸英和于光远、吴剑迅、曾彦修四人在

张家集小组工作了半年，同吃同住，关系亲密。信是土改复查工作结束，大家分手后写来的。

信虽不长，但读来却令人回味无穷。

敬棠同志：

到田家英处偶尔读了你写给他及彦修（作者注：即曾彦修）同志的信，颇有所感。

许多天前我曾经康公（作者注：即康生）处转你一信，不知收到了没有？

张家集党小组会上我对你的放肆的批评，今愿收回80%。由于我对自己的认识错误，所以也不能正确地认识别人；现在我对自己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你的认识也就随着改变了，出发点改变了。望你把我这一点反省当作衷诚之语，决不是那些专门为写信而写的门面话。

吴剑迅已到此地团校学习，你知道吗？我准备于数日内写信与他，我对他的批评也太过分了。

我现在原机关工作（作者注：即中宣部），与曾彦修、于光远诸同志在一起。准备在不声不响的工作中逐渐地改过，能改到什么程度就改到什么程度，决不求那种可能的快，更不求什么“奇迹”。我愿意努力地真正学习一番，我的知识少得可怜！！

田家英送了我一句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我当把它作为今后工作与学习的座右铭。

过去我曾对你说我愿另名为“波别”，并要你给我写信时亦用此名，现在我对这一点也取消了，因为即在“跋鳖千里”这一句我曾决定把它当作自己的座右铭的古话中，也潜伏了害我致深的毒素。

还有一点请你取消（如果你还没取消的话）！记得你曾对我说，我的一大优点就是待人亦诚，纯洁，热忱等，事实证明我曾是一个不老实，不热忱待人的人，在这一方面田家英可替我多说几

句话。

不是说客气话，我有许多地方应该向你学习，比如对工作忠实，采取老实态度，注意收集零碎材料等，请你在做教员这一点上，一本过去毫不吝啬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你现在的工作相当困难（过去搞乱了），但“困难”不正是你所渴望碰到的东西吗？所以你说“事与愿违”，恐怕还须加上一句：“违而安知非福”？

我说这话是有所指己的，我想如果我不“失马”，一直“飞奔”，恐怕“永福”（作者注：毛岸英的乳名）当成为“永祸”的讽刺语了。当然我的情形与你的大不相同。

坐在田家英屋里写信，已经够随便了，再加上这样松的内容，恐怕会使你觉得“不正经”，因而甚至会影响到你对我所写的“衷诚之语”要打好些折扣。折扣是一定要打的，因为无论如何这只是一张白纸上的黑字而已。

不过我在这无形的自然的随便之中却自然地告诉你，我所想象中的你我关系。这样的关系，其实我们在张家集时就已建立了。但后来被我的那一股骄气损坏了。我愿意随着这股骄气的消失，我们的“老”关系也恢复正常。你愿意吗？也许你认为我们间的关系并无甚大变动，那么我就更有所反省的了。

信已写的这么冗长。书不尽意，留到下次再写吧！凌云现在何处工作？望告。

谨祝你工作顺利，愉快，健康！

紧握你的手

岸英上

1948年7月24日

读了毛岸英的信，我很想知道，究竟因为什么，他对史敬棠提出了“放肆”而“过分”的批评，以至于像毛岸英说的，损害了他们的友情，要作“事实证明我是一个不老实，不热忱的人”的忏悔和自责。

对毛岸英的影响和帮助

毛岸英的信是在我父亲西柏坡的小屋里写的，信中多次提到“田家英”。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田家英的影响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

和毛岸英同去山东土改复查团的曾彦修对毛岸英一再申明要“在工作中渐渐地改过”，恢复同史敬棠等的“老关系”的原委，记忆犹新。

1947年初，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解放区一天天扩大，中央为巩固后方，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旧有土地制度实行改革的工作上。这年3月，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代表中央在晋绥分局指导土改工作，带队到山西临县地区抓点。那次，毛岸英也跟着去了。

康生主持的晋西北土改，出现了严重的“左”的偏差。在没收地主的土地之后，还用过激的方式逼打地主交出浮财。曾在晋西北工作过的老同志梅行曾感叹，康生搞的那个“左”呀，就别提了！然而，这种过激的做法，却被视为土改工作的经验在《晋绥日报》多次报道，并一再加上“按语”推广。

回国不久的毛岸英，对中国农村情况既感新奇又觉陌生，以为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你死我活、残酷的。对康生的做法，他不仅没有怀疑，反生几分钦佩，在给其父毛泽东的信中，称赞“康公真有办法”。

土改工作的偏差，很快引起中央的重视，在1947年12月的中央会议上，不点名批评了康生的做法。1948年2月，又发布了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1月18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1948年2月11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1948年2月15日）等党内指示。部分地区根据中央精神，很快进行了土改复查。

1948年初，毛岸英参加了仍为康生带队的山东渤海区土改复查团，和曾彦修、史敬棠、于光远、吴剑迅同在张家集一个党小组工作了半年。

这时的毛岸英，经过学习文件和基层工作的磨砺，对土改中的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对康生这样的“老资格”，也不再一味地“崇敬”。

一次，华东局留守处负责人请土改复查工作团的同志吃饭，毛岸英、史敬棠、曾彦修、于光远等都出席了。饭桌上，华东局领导扬帆反映乡村反动会道门活动猖獗，有些自然村被他们占据，村边挖壕沟，架吊桥，谁也进不了村。我们的伤病员在村中疗养，他们借此讲条件，不答应条件就把伤病员杀了。康生听到此，“啪”的一声拍案而起，桌上的碗筷都被拍得蹦了起来。他瞪大眼睛吼道：“还有这样的事？老子开两个团过去，把他们的村子平了！”在座的都对他的失态举止感到意外，但谁也没有再搭腔。

回到张家集工作团住地，大家议论起白天的事，对康生的举止不以为然，但只能心照不宣。因为自延安“抢救运动”，许多人心存余悸。对上级领导的指示，不能有丝毫的质疑，几乎是百分之百地服从。更何况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作团团长。

对于没有这段阅历的毛岸英，顾虑自然少得多，他直率地提出，“今天康生同志太缺乏政治家风度，派两个团轰平了村子，全村的乡亲岂不要都跟着遭殃？作为中央领导，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毛岸英讲的是实话，经历了土改纠“左”的过程，他对康生所作所为显然有了认识。可是史敬棠等就不好对领导妄加评议，在毛岸英面前，还要替康生做些辩护，说那不过是康生的气话，是要压一压反动分子的气焰。

张家集小组讨论工作时，对于土改复查中仍然存在的某些偏离政策的现象，同志们顾及方方面面的影响，有时不便坚持己见。这就难免，毛岸英和同志之间对问题的认识有分歧。毛岸英认为史敬棠、吴剑迅不能“坚持原则”，对仍然偏“左”的做法持妥协态度。于是，他言词激烈、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同志。

曾彦修老人说，这就是毛岸英提到的“放肆的批评”。

1948年上半年，毛岸英从山东渤海区回到西柏坡中央驻地。作为学生和朋友，毛岸英经常到我父亲的小屋上课、谈心。渤海区土改复查工作中的种种情况，以及和同志们发生的争执，显然都是他和老师交谈的

话题。

今天我们不会知道当年老师和学生是怎样分析探讨问题了，但毛岸英在以后的工作中，较之过去，思想逐渐成熟起来，在实践中更加自觉地磨炼自己，当是与老师田家英的影响分不开的。

父亲16岁到延安，26岁经胡乔木推荐，给毛泽东做了秘书。胡乔木非常了解田家英，不仅知道他很早就研究中国近代史，以后又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他还了解田家英研究讲究方法，注重收集一手资料 and 做编年大事记等基础工作，出版过《民国以来大事记》。田家英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著作的研究也很深入，肯下工夫。因此，当全国解放战争进入决战，战事异常繁忙，毛泽东身边非常需要人手时，胡乔木首先想到了田家英。

这时父亲已经给毛岸英做了三年老师，父亲的思想方法、人格品行，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毛岸英。当毛岸英反思自己看问题过于简单化，不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和位置去思考；反思自己一年来对纠“左”希望一蹴而就，是不现实不成熟的表现时，他一定明白了一个道理——事物本身存在着多面性和复杂性；他一定更多地了解了他自己的父亲成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经过了怎样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国革命走到接近胜利的今天，又经历了多么复杂的艰苦历程。

毛岸英从古文中找到两个座右铭

从毛岸英这封信，看到他的文史知识、国文水平进步之快，是足以令人惊讶的。

杨开慧牺牲时，毛岸英年仅8岁。到1936年组织上送他和毛岸青去苏联时，他14岁。中间6年的时间，有5年是他和弟弟在上海流浪度过的。毛岸英在中国基本没有受过正规学校的教育。1936年至1946年，他在苏联生活了近十年，读完了中学和大学，可以想象，这个在异国成长的青年，祖国文化会学到多少。他识得的汉字还是小时候母亲教的，上海流浪的岁月，靠一本字典又自学了一些。在苏联时，最初读父亲毛泽东的信，

还要请人翻译，回复也仅仅是简短的一段。这样的基础，回国仅三年，就能用中文流畅地给朋友写信，且灵活运用成语典故，是多大的飞跃啊。

还是回到这封珍贵的书信。毛岸英曾以“跛鳖千里”一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听了田家英讲授的《荀子·修身篇》：“故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意思是跛脚的鳖，虽然走得不快，但只要一直不停，也能远行千里……意喻力气再小的人，只要坚持不懈，终能达到目的。为了鞭策自己永不停步地进取，毛岸英用“跛鳖”的谐音给自己取名“波别”，愿学远行千里的“跛鳖”，虽鲁钝，只要努力，终有所成。

从张家集土改回来后，田家英又送他一句古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是《礼记·中庸》里的一句话。其上下文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意思是：广博的学习，详细的求教，慎重的思考，明白的辨别，踏踏实实地实行。除非不学，要学而没有学会，绝不放弃……除非不做，要做而没有做出成绩，绝不放弃。别人一遍学会的，我学一百遍；别人十遍学会的，我学一千遍。果能如此，即使笨人也会变为聪明人；即使弱者也会变为强者。

这段古话使正在反思自己的毛岸英深受触动和鼓舞：用百倍于别人的努力去工作学习，就是愚人也会变为聪明人。于是毛岸英决心把这句古语“作为今后工作与学习的座右铭”，而不再以含有更多自我意识的“跛鳖千里”为座右铭了。

从第一个“座右铭”到第二个“座右铭”，可以说，毛岸英的精神境界发生了一次飞跃。如果说前一个“座右铭”，反映了毛岸英坚信自己只要百折不挠，就一定会实现父亲毛泽东的期望、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决心；那么后一个“座右铭”，则不仅反映了他的坚韧的毅力，还反映出他觉悟到自知之明对人一生的重要作用，决心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脚踏实地地开始新起点。

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

毛岸英回国后，分配到中宣部做翻译，和田家英、陈真、于光远、曾彦修、何均住在杨家岭同一排窑洞。由于延安物质生活困难，点灯的煤油常供应不上。晚上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就摸黑凑到一个窑洞，挤在大炕上说古论今，谈见闻，谈读书，海阔天空。我父亲脑力好，记忆力过人，能背很多古诗文，尤其喜爱辛弃疾的词。由于他古文功底好又爱好文学，成语典故、古诗古文经他释译成白话文，生动易懂，文采奕奕。于光远不仅懂经济，还涉猎哲学、自然辩证法，知识面广。曾彦修则强于思辨，大家爱听他谈见解、解析问题。不经意间，没有油灯的夜晚，在宽松的交流气氛中，大家相互学到许多知识。毛岸英有幸和一群“书生”在一起，他像海绵吸水一样，吸吮着文化知识。

据曾彦修老人回忆：

他们那时喜爱探讨中国古代哲学的命题，这和毛泽东关注先秦哲学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受陈伯达的影响。陈伯达在杨家岭的窑洞，周末成为青年人聚会的地方，田家英和我都是常去的人，到时总是挤得满满的，大家听陈伯达讲历史、讲哲学。

陈伯达从1939年给毛泽东做政治秘书，他研究先秦诸子百家，是毛泽东的窑洞里除公事以外可以随便聊天的唯一一人。他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两本书，其理论贡献和创作能力，是公认的。

当年延安的年轻人，都佩服陈伯达。田家英就在很多方面受陈伯达的影响。以后田家英和陈伯达关系不好那是后话了。

探讨问题，田家英思维活跃，爱提点新见解出来。例如他说，“塞翁失马”的寓言故事虽简单，但内中的哲理却很深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似乎意寓的仅仅是福可以转化为祸，祸也可以变化为福，万物变化难以预料。实际这里还告诉人们，人的思维

往往会出现偏颇：人们都知道“盛极必衰，物极必反”的道理，可很少有人去追问“衰”的极限，而都在追寻“盛”的极限。他讲的确实耐人寻味。

从毛岸英给战友的一封信件，也能说明当时的青年人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浓厚兴趣。

毛岸英针对史敬棠工作上出现的不顺利和困难，告诫战友，看事物可以从另一面去理解，困难“不正是你所渴望碰到的东西吗？”“事与愿违”，“恐怕还须加上一句：违而安知非福？”毛岸英运用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辩证思想，说明坏事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事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

顺着这层意思，他联系到自己，“我想如果我不‘失马’，一直‘飞奔’恐怕‘永福’当成‘永祸’的讽刺语了。”他的乳名叫“永福”，他巧妙地把自己的名字运用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里，自喻自律，且运用得诙谐自如。

可以想象，聪明又充满活力的毛岸英，是怎样在老师的引领下，游弋于文化的海洋，享受着祖国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一封书信，很难记载所有和全貌，但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感受到毛岸英与他情同手足的老师田家英至深的友情，看到当年那群追求真理的青年人火热的生活风貌。

我与范长江的交往

严怪愚

初识老乡范长江

1938年春，台儿庄大捷之后，我到了徐州。同旅社住的一位《武汉日报》的记者告诉我，说：“名记者范长江明天便要到徐州来了！”语意中似挟讽谏。我说：“本是名记者嘛！我们欢迎！”他说：“什么名记者？！”“老实说，没有《大公报》这块牌子，凭他的本事，他‘红’得起来吗？”（范长江当时是汉口《大公报》战地特派员）我说：“我佩服的倒是他的本事，而不是《大公报》这块牌子。我认为不是《大公报》这块牌子为范长江生色，而是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和《塞上行》这两篇文章给《大公报》生色。”

第二天，范长江果然来了。我们谈了一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事，便问他与我同旅社住的那位《武汉日报》记者的思想情况。他告诉我：“这个人的确有点阴阳怪气，他想向上爬，却又十分自尊。想做个名记者，却又不与外界接触。他经常瞒着别人找特殊新闻，想做个新闻‘走私贩子’。可是却一直站在新闻圈外，没多少人理会他，所以他经常牢骚满腹。猜忌人，日子很不好过。”

我听后，讲了一则伊索寓言：“牛辛劳地在耕地，一只苍蝇围绕着它飞鸣，牛不为所动，苍蝇说：‘牛大哥，你可能有点麻木了？我这么找你开玩笑，你却并没有感到似的！’牛说：‘苍蝇小姐，对不住，我还不知你的存

在!’”

我们相与大笑。

良久，范长江说：“这个人在开始向恶性方面发展，但还没有烂。我们大家应当设法帮助他！总而言之，只要他基本上同意抗战，愿意为抗战做点宣传工作，我们便应当争取他，团结他。”

我个子本来比他高，但突然间，觉得我比他矮了半截。

范长江称我做“老乡”，我说：“我不是四川人。”他说：“我却是湖南邵阳人。”我问是怎么一回事。他告诉我，他祖父是由邵阳范家山迁居四川内江的。但他还没有到过邵阳。他说，他路过湖南时，一定要到邵阳范家山为祖先扫扫墓，并要我陪他。

谈到邵阳，他精神百倍，并且非常自豪。他说：“中国有三个大县，即邵阳、合肥、番禺。三县中，又以邵阳为最大，人口列全国第一。曾国藩说过：‘修到湖广便是仙，而湖广以衡宝（宝庆即今天的邵阳）为最。’这话是不错的。”……湖南古丈县的田赋银子只九两八分七，邵阳的田赋却有二百七十几万两。“这是个多么重要的地方，多么美丽的地方！我一定要去看看我的祖先曾经耕耘过的地方！”

他说起来，如数家珍。

我惊异，说：“你怎么记得这么些事？”

他笑了，说：“新闻记者嘛！——新闻记者没有丰富的常识，怎么能将世界上的新事旧事告诉读者呢！”接着就严肃起来：“没有常识，便等于没有感觉！……说起来，我实在还够不上一个记者。我是北大学历史的，而且自认对中国民族问题有一定的研究，可是一到‘那边’（指延安——笔者注），不管哪一方面，我都成为一个白痴了。那些人，哎！那些人，多么丰富，多么伟大呵！他们熟悉过去，掌握现在，并且能精确地预测将来！中国的每一个旮旯，每一件事情，他们都了如指掌。……有机会，我劝你过去看看，学习学习……”

为生计所累，我一直没有到“那边”去“看看”。1939年秋，范长江到邵阳，我陪他去范家山为他的祖先扫了墓。

在范长江鼓励、指导下工作

徐州突围后，我先回长沙，不久，范长江也来了。他促我出面筹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湖南分会”。我束手束脚，不敢大刀阔斧地干。我说：长沙情况复杂，CC分子、复兴社分子争权夺利，无孔不入，稍不慎，青年记者学会便会变成派系记者武会。他说：“‘青记’是团结、培养、教育青年记者的社团，除了汉奸，只要他是进步的、愿意抗日的、以新闻事业为职业的都可以吸收。胆子放大些。出不了什么问题！”在他的鼓舞、督促下，我“大胆”地发展了4个会员。与当时全国1000多个青年记者学会会员比，等于没有工作。1938年5月，开完“民族音乐演奏会”后，我离开长沙到湘南和广州走了一遭，然后在南岳整整住了3个月；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力报》迁邵阳，我回到家乡，“青记”的工作交给另一位同志负责。武汉弃守，“青记”迁长沙，我赶到长沙，范长江责备我：“你怎么做起‘新闻隐者’来了？”我说：“看着目前情势，我有点丧气！——1927年大革命时期，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我当时16岁，也一样坚定兴奋，做了一些我应当做的工作。那时期，提到‘革命’两字，便像红光耀眼，大家都靠拢去，可是北伐军一进徐州，国民党反动头子与北洋军阀妥协了，‘革命’两字便变了颜色，灰溜溜的，没有人愿意说这两个字了，多少烈士、多少青年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中国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封建的结果我看到了，滋味也尝到了。目前，我是兴奋的，坚定的，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一份工作。可是，武汉弃守后，‘抗战’两字似乎也在改变颜色，全国人民的热情似乎渐渐冷却了。原因我找不到，但我相信，一定有别的帝国主义在插手，日本帝国主义一定在诱和。国民党反动派从来就没有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心目中，假如他再向帝国主义妥协，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甚至把矛头再指向人民，中国前途将不堪设想……我想，与其将来懊悔，倒不如现在静观一个时候！”

范长江望着我，良久，讽刺地问我：“老头，你高寿？”我也开起玩笑

来：“老夫行年二十有七，业已娶妻生子，勿劳挂念！”他说：“我以为你已七十有二了！——照你这么说，我们便只有等待亡国灭种，或者雇用别人把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消灭，由我们来享受和平了？！——不要糊涂，老哥！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几次挫折、几场浩劫，能够使我们的国家民族永远抬不起头来了吗？历史在前进，人民在觉醒，中华民族一定会站起来的！有位烈士留下一首诗，说：中国这般大，人才岂不多？涓涓一流水，泛滥成江河！写的好！……向西北角上望，那块地方是神圣的、干净的。也就是说，那儿反帝、反封建的意志是坚定的，做法是彻底的。中国的希望在那儿……挺起胸膛，老哥！不要被一时的灰尘蒙蔽了视线。与其做‘新闻隐者’，等待亡国灭种，不如到战场上去与敌人搏斗。”

“Come on! 同意！”我叫起来。

“Best man!”他也举起了双手。

1939年1月，《力报》在邵阳复刊，我做了中国西南旅行记者。到桂林《国际新闻社》，胡愈之先生和范长江给我一些关于广西情况的原始资料，要我冒风险写一篇揭露这个“模范省”黑暗的通讯，我“遵命”写了《春草遥看近却无》。想不到因此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白崇禧看了，竟在广西省“扩大行政纪念周”上，指名道姓把我骂了一通。军校武冈分校开学，他路过邵阳，曾两次派人找我“谈话”，我没有去。2月我抵重庆，范长江先我而到，谈及这件事，长江说：“我们不过想试试你的勇气！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假如没有勇气，便也算不了有什么正义感。”

大约是3月初，汪精卫叛国投敌已处于半公开状态，但重庆各报仍不敢披露。范长江找到我，并递给我一份资料，说：“国民党禁锁严密，《新华日报》为照顾关系，也不好刊登。我们商量，只有找到你，再试试你的勇气，让《力报》首先发表这则震动国际的新闻。天高皇帝远嘛！你有勇气吗？”

我把材料看了，立刻就拍急电回报社，并航寄《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通讯一篇，《力报》第二天一字不漏地在头条位置刊了出来，早中央社和全国各报半个月。薛岳和政工人员胡越跳起来，说：“严怪愚造谣，

非抓回来枪毙不可!”

事情实在隐瞒不住了，待《中央社》把消息含糊发表以后，范长江说：“他们在写‘旧闻’了！不过能把‘旧闻’公布，也算是向前跨进了一步。……新闻就是要‘新’嘛。对什么事都躲躲闪闪，胆小怕事，让旧思想、旧意识缠住了脚，能够做新闻记者吗？只有新人才能做‘新事’。而做‘新事’总是要几分胆识，总是要冒几分风险的。”

我说：“我的胆略是你给我的。”

范长江说：“快别这么扯。多上几次战场，就不会怕炮火了。”

留下的遗憾

我和范长江重庆一别，一直到1946年秋，才在南京重晤。这期间，我在湘西搞《力报》和《中国晨报》，经常接到由“那边”寄来的用《中央日报》、《扫荡报》挟卷的《新华日报》。他没有署名，但我认识他的笔迹。

1946年秋，我到南京，范长江在中央和谈代表团工作。我到梅园新村看他，谈到内战问题，我很担忧。他说：“忧，解决不了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斗争，与群众一起斗争，我们希望和平，一万个需要和平。中国人民苦了八年，也可以说苦了近百年，再也不能发生战争了。不过这是我们一方面愿望，万一这个‘委员长’不顾人民死活，硬要消灭我们，我们也只好拿起武器来奉陪了！说句老实话，要是这个‘委员长’硬要点起内战火焰，不需三年，我们便要把他赶到美国去组织流亡政府！”

我说：“你在算命了。”

范长江说：“唯物论者并不回避预测。从民心，从士气，从国际形势，从历史发展，总而言之，从各方面的条件来推断，我们敢说这句话。”

因当时周恩来的住所离范长江的住所很近，我要求“去看看周公”。我说：“周公忙，我只见一面便满足了，绝不耽误他。”范长江陪我一起去。我和周闲暄了几句，并问了“和谈”的前途。周叹了一口气，但笑着说：

“这个委员长呀，真不好对付！有了美国的顽固派撑腰，他居然以胜利者自居了。说了话不算数，做了坏事不认账。”我问：“内战可不可能避免？”他无意中摸了一下胸膛，说：“这很难说。我们是一天也不希望打。要是想打，我们也不会到南京来和谈了。”

1946年冬，我到上海，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上海和谈代表团撤退，与中共南京代表团同回延安，只我一个人到上海北站送行。车快开动了，徐迈进跳下车来，抱住我，我含着泪。徐迈进说：

“别难过！三年之后，我们在长沙见！”

还不到3年，1949年8月，长沙便解放了。当时我在邵阳游击队里，不曾参加迎接解放。但我知道范长江、徐迈进都没有到长沙。

我多么渴望看看范长江、徐迈进胜利后的面孔啊！1952年冬，我接范长江口信，要我和妻到北京《光明日报》工作，我因刚刚经过“思想改造”，检查了自己的组织观点，不便马上离开原单位，竟没有去。于是我们一直没有见面，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1977年，我在上海一家杂志上读到冯英子写的一篇《悼长江》的文章，知道范长江竟于1970年就被迫害致死了，我怆然。

范长江离开人世已经多年了！多年来，我一直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祈祷：安息吧，我敬爱的朋友！

往事依稀人不见，
小寓微雨空多时。

朱旦华的传奇人生

刘勉钰

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朱旦华，革命经历丰富，一生充满传奇，先在新疆与毛泽民生死与共，后又与江西省原省长方志纯结为革命伴侣，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许多老同志都尊称她为朱大姐。几年前，我因接受写《方志纯传》的任务，曾多次访问朱大姐及有关人员，因而知道她一些鲜为人知且非常感人的故事。

学生运动的“四大金刚”之一

朱旦华原名姚秀霞，原籍浙江省慈溪庄桥镇。她1911年12月26日出生，那时清王朝已经被辛亥革命所推翻，而中华民国又还没有成立，所以朱旦华自我介绍说：“我出生在一个没有朝代的年代。出生日期和毛主席一样。”她的父亲姚载福早年上海当学徒，后来与亲朋一起集资在上海开了一家“国布庄”，专做土布生意，收购手摇纺车纺出来的纱，运到乡村织成一尺多宽的棉布，再拿到“国布庄”销售。于是，姚载福就率全家迁到了上海（朱旦华的母亲生有三女七男，朱旦华排行老二）。后来，由于外国资本在上海猛烈扩张，洋货充斥上海市场，姚载福的土布店很快就被挤垮了，家庭生活越来越艰难。朱旦华小学毕业时，尽管成绩优秀，还是报考了不需交学费的上海务本女子中学师范科。她学习勤奋，成了务本女子中学的优等生。毕业后，她留在学校教务处当办事员。

她体贴父母，关爱弟妹，将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养家糊口，成了这个贫困家庭的“顶梁柱”。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炮轰沈阳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奋起抗战。民族的危亡激起了朱旦华强烈的爱国热情。但由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打破了人们对蒋介石的幻想，朱旦华的内心再也平静不下去，她决心要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抗争。1935年的华北事变，日本要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中华民族更加危急。而在上海发生的“新生”事件，则对朱旦华影响至深。这年5月，《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了《闲话皇帝》一文，其中写道：“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然也奉天皇之名义而行，其实早就做不了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就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不久，日本驻沪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碍邦交”的罪名，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封闭《新生》周刊，并惩办编者杜重远和作者易水以及上级有关部门。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抗议俯首帖耳，完全照办。结果，《新生》周刊被查封，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全部被革职，杜重远被判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杜先生被判刑后，上海律师公会发表了《呈请司法院予以纠正》的公告。各界民众和东北军将士络绎不绝前往监狱慰问爱国人士杜重远。

不久，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辗转传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全国各地爱国学生奋起响应，上海各界救国会也随之成立。上海务本女子中学的师生们也活跃起来了，其中被上海地下党组织誉为“四大金刚”的四名学生最为积极。他们为首的是该校职员、中共地下党员褚志元，还有该校教师、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李延禄的女儿李万新，该校体育教师王平以及朱旦华。她们四人经常在一起议论国事，评论时弊，阅读地下党组织传来的书刊和文件，从而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的认识。她们进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把《八一宣言》在街头、乡村、学校内外张贴，甚至贴进了一些公

共厕所，可以说是在一定范围内使《八一宣言》广为人知。

奋勇向前的新女性

1937年中华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上海务本女中停办，朱旦华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有一天，朱旦华收到一位好友从延安寄来的信，非常兴奋。她把信交给了地下党办的《解放周刊》。该刊将信以《陕北来信》为题发表出来以后，吸引了上海许多进步青年与文化人士。朱旦华更是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向延安。李万新资助了她70元钱，作为去延安的路费。于是，朱旦华绕道浙江、江西、湖北等省，终于在1937年冬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

陕北公学是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校长是德高望重的成仿吾，教务长是与方志敏共创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邵式平。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陈云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和许多著名的理论家都在这里讲过课。生活虽然艰苦，但朱旦华对这里的学习条件很满意。有一天，有位正在马路上散步的长者，一见这群风尘仆仆的青年，立即迎了上来，亲切地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等大家回答完后，他说：“欢迎！欢迎！大家辛苦了。”后来才知道，那位长者就是赫赫有名的朱德总司令。开学那天，毛泽东讲第一课，他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从劳动创造世界，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讲到全民动员，持久抗战，号召大家“要安心坐下来，认真学点马列主义”。在延河水、小米饭、马列主义哺育下，朱旦华像许许多多进步青年一样，茁壮成长起来。

朱旦华在陕北公学毕业后，听从党的安排，和28个陕北公学毕业生一道来到新疆。新疆当时的统治者是盛世才。他为了得到苏联的援助，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他提出在新疆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同意在迪化（乌鲁木齐）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不公开挂牌），并请共产党派干部去帮助他。

1938年7月，朱旦华被分配到省立迪化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不久被推选为新疆省妇女协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秘书长，新疆省政务委员

会委员。

朱旦华到女中后，把学校当做传播革命思想、培养进步青年、壮大革命力量、支援抗日前线的重要基地。她制定了“诚毅团结、勤肃紧张、敏活健壮、精勇创造”的十六字校训，并亲自创作了《迪化女子中学校歌》歌词，号召“姐妹们，努力，努力，站到斗争的最前线”。在教学中，她着重讲“反帝、亲苏”，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思想，使迪化女中的师生开始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朱旦华在迪化女中度过了四个不平凡的春秋。作为新疆妇女协会的宣传部长，她组织学校师生业余歌咏队、话剧团，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上街宣传演出。她还编辑发行《妇声》半月刊、《新疆妇女》等刊物，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妇女解放，介绍苏联，因而她被称为“朝气蓬勃、奋勇向前的新女性”。

与毛泽民喜结连理

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者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热的战斗和工作之中，很少有人和有条件去考虑个人的婚恋问题。朱旦华在工作上有使不完的劲，但对找对象的事还没有考虑过。有一天，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找朱旦华谈话：“你的年纪不小了，也该成家了吧？”“女同志找对象，主要是政治上可靠。”邓发以长者的口气说：“周彬同志就是这种人。他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

朱旦华疑惑地问：“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他不是结过婚吗？”

邓发说：“他是结过婚，但由于两人性格差距，感情破裂，已经不在一起了。他和钱希钧同志是经组织批准分手的。”“周厅长身体不好，又没日没夜地忙于工作。从斗争形势和党的工作考虑，周厅长身边确实需要一位可靠的助手。”毛泽民原来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由延安赴苏联治病的，1938年2月途经迪化时留在了新疆。毛泽东后来说，这是应盛世才的要求由他批准的。

毛泽民在新疆化名周彬，任省财政厅代厅长。朱旦华多次听过他的

报告，知道他是理财专家，很能干，对他很尊敬。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的不同，很多同志没有条件和时间自由恋爱，党组织也就有义务关心干部的婚姻问题。组织部门给做媒，使很多有情人终成眷属。邓发作为中央派到新疆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找朱旦华谈话，其分量可想而知。

不久，邓发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让人多炒了几个菜，把朱旦华也请来吃饭。席间，邓发突然宣布：“今天的宴请，既是为周彬饯行，也是为周彬与朱旦华办的订婚酒。”

1940年5月，在新疆省政府的大礼堂，毛泽民与朱旦华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新郎毛泽民穿一件干净整洁的旧毛料西服，新娘朱旦华穿的是来新疆后添置的米色裙装。他们没有发请柬，但来参加贺喜的人不少。当时在新疆的名人沈雁冰、张仲实等都来了。他们以茶水招待，没花公家一分钱。迪化女中的歌咏队为他们唱了一首美丽的赞歌：“贺新郎，贺新娘，你俩在同一条战线；纵海枯石烂，骇浪掀天，也毁不了你俩的贞坚；为民族的生存，拼搏向前；为大众的解放，奋勇争先……”

婚后，他们就住在财政厅的一间普通的房子里，陈设很简单：毛泽民只有一个旧皮箱和一个旧藤条包，里面装的除了几件旧衣服、一双旧毡筒和一顶旧皮帽外，就是一堆书；朱旦华只有一个从延安带来的背包和一台手摇缝纫机。

毛泽民与朱旦华婚后的日子美满幸福。第二年，他们的儿子降生。毛泽民中年得子，喜出望外，给儿子取名远新。这名字既符合毛氏族谱中“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的“远”字辈牒序，也含有对其生在遥远的新疆的纪念。

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建设新疆，毛泽民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顾个人安危，日夜苦干。他严格控制预算外支出，整顿税收，合理增加地主、牧主的赋税，减轻农牧民的负担。他大胆改组银行，改革币制，从而稳定了物价，使新疆全省金融财政收支达到了基本平衡。老百姓纷纷竖起大拇指，称“周厅长亚克西”！

为了募捐支援抗日前线，朱旦华找到当时在新疆的文艺界名流赵丹、徐韬、叶露茜、俞佩珊、鲁少飞及从延安来的于村、白大方等人，请他

们来迪化女中，辅导女中话剧团演出了《朔风》《妇女解放三部曲》《乱世男女》《雷雨》《屈原》《北京人》和《武则天》等剧目。通过他们的演出，募集资金买了一架飞机支援抗日。

在新疆监狱中的斗争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改变了亲苏联共的政策。他认为，苏联打不过德国，中国共产党也靠不住了。1942年8月29日，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赴迪化对盛世才进行拉拢，给他八大要职。盛世才除了掌握新疆的党、政、军、财大权外，还获得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等头衔。于是，盛世才立即投靠了蒋介石。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的领导人及其妻室儿女秘密软禁于满城邱公馆。紧接着把昔日他请来新疆帮助工作的所有共产党人及其家眷全部关押。这样，朱旦华和儿子毛远新被关进大牢。

1943年2月，陈潭秋、毛泽民等人被投入第二监狱。3月，蒋介石面示盛世才：“对于共党重要人员应判极刑，对于其他重要人员也应严惩。”“务必肃清共党在新疆的力量。”

1943年4月，朱旦华等女眷和她们的孩子都被投入了第四监狱。朱旦华被指定为女牢党的负责人。当时狱中党组织称为学习干事会，由张子意负责。张子意提出了“百子一条心”的口号，把大家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朱旦华和学习干事小组以“百子一条心，争取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作为狱中斗争目标，做了许多思想和秘密工作。

朱旦华在狱中写了不少诗歌，鼓舞斗争士气。在一首《缝衣》诗中，朱旦华寄托了对亲人的思念与关怀之情：

小小的灯啊暗黝黝，夫妻被捕分开手，
夏去秋来冬又到哇，要给他缝件衣裳温又柔，
乖乖的孩儿别淘气，缝好衣裳妈妈陪你睡，

你别叫别闹要听话哟，你爸爸回来一起回延安。

敌人对毛泽民等用尽了“打手板”、“老虎凳”、“坐飞机”、“挂炸弹”、“站铁刺”、“站火炭”、“灌辣椒水”等酷刑，威逼他们承认盛世才捏造的所谓“共产党阴谋暴动”。毛泽民和陈潭秋、林基路等人始终宁死不屈，大义凛然。1943年9月27日的深夜，毛泽民被盛世才秘密杀害。刽子手用大棒把他击昏，再用绳子勒死，装入麻袋，偷偷地埋入荒郊。同时遇难的还有陈潭秋、林基路两位烈士。

直到1945年2月，朱旦华才从男牢得知这一不十分确切的噩耗。这消息像晴天霹雳一样，把朱旦华和陈潭秋的夫人王韵雪、林基路的夫人陈文瑛（陈茵素）击昏了，把女牢的同志都震懵了。在悲愤中，朱旦华朗诵了一首“为死难的丈夫而作”的长诗：

《新春之歌》

——为死难的丈夫而作

.....

夏去秋来，秋去冬至
 没有了你的消息。
 在漫长的冬夜里，
 噩梦压得人停止了呼吸。
 我梦见血渍斑斑的一条长绳，
 那上面挂着你的名字，
 据说是刽子手的新杰作，
 勒死了八路军的勇士，
 又梦见你默默地坐在窗下，
 伸长着浮肿的双足，
 我看不清你的脸部，
 因为那已是一团模糊。

.....

噩梦，竟然就是事实？

幻想，成了泡影！
孩子爸不再回来了。
“爸爸已被反动派暗杀，
记住这血海仇恨吧。”
我失去了良师益友，
斗争途中的亲密伴侣。
人民在悲愤叹息，
战友们光起了火红的眼睛：
“血债要用血来还，
这笔账总有一天要清算！”

中共中央对新疆被捕的同志极为关怀，并多方设法营救。中央电告周恩来：“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陈潭秋的化名）等一百四十余人的要求……”1945年6月，林伯渠向国民党当局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面交的《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之意见书》，再次提出：“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并点出新疆的徐杰、毛泽民、杨之华等人的名字。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阿勒泰）三区人民举行了武装暴动，他们向新疆省政府提出了“释放一切政治犯，包括八路军在押人员”的谈判条件。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急电蒋介石，称“事态严重，前途不测”。蒋介石派张治中来新疆与三区人民革命武装进行谈判。在张治中赴新疆前夕，周恩来亲自到张治中家里，拜托他查清被盛世才关押的中共100多位干部及其家属的下落，并无条件释放，送回延安。在重庆谈判中，毛泽东、周恩来也郑重地向国民党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在谈判中，周恩来拿出了一份被关押在新疆男女监狱中的共产党人及其家眷的名单。这份名单是朱旦华等人为了让党中央了解新疆监狱的被捕人员状况，用糨糊写在一块白布上的。尔后，朱旦华又想方设法通过她在迪化女中的学生张玉贞，冒着生命危险送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交给了周恩来的秘书魏传统。这封转给周恩来的“信”至今仍珍藏在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张治中是周恩来的好朋友，也是重庆谈判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他曾亲到延安接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他深明大义，在周恩来面前打了保票放出被押人员。1946年4月1日，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很快就履行了诺言。1946年6月10日，131位男女老少，在党中央的营救、新疆人民的呼吁及张治中的支持与协助下被释放出狱，登上8辆苏制十轮大卡车回延安。1946年7月11日，他们终于实现了“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誓言。

母子得到毛泽东特别照顾

党中央对从新疆返回延安的同志关怀备至，毛泽东、朱德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前往慰问，并在艰苦的条件下设宴招待，延安的报纸也连日作了报道。1946年7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在三天内，三次到新疆返延同志驻地看望大家，说：“你们回来了就是胜利！”毛泽东看到这些在新疆战斗的同志，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弟弟毛泽民。他强忍悲痛，一再走到朱旦华身边，把侄儿毛远新抱在胸前，亲了又亲。见到此情此景，朱旦华不禁脱口而出：“主席，泽民至今下落不明，请党中央同国民党中央联系，要他们下令查找。”

新疆出狱同志在延安休养三个月后，陆续被分配工作。这时，毛泽东单独接见了朱旦华母子。他把毛远新抱到怀里，深情地交代朱旦华说：“要好好培育孩子。”朱旦华被分配到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毛远新和一批新疆回来的孩子，进入了中央机关办的托儿所——洛杉矶托儿所。那时，毛泽东住在杨家岭山沟里面，中央妇委设在杨家岭的山沟外面。朱旦华有时散步就能碰见毛泽东。毛泽东给她讲了毛泽民的许多往事：在家时照料父母，为父母养老送终；辛勤劳动，为兄弟筹措读书费用；舍小家，为大家，投身革命成为理财专家；接济杨开慧，救出岸英三兄弟；长征路上用担架抬起负重伤的嫂子贺子珍，顾全大局留在新疆……

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时，洛杉矶托儿所首批撤离延安。撤离

延安之前，毛泽东送给毛远新一床毛毯。江青对朱旦华说：“这（毛毯）是前线缴获送来润之盖的。润之让送给远新，你带去吧。”那时在延安，毛毯弥足珍贵，毛泽东自己还盖着旧棉被。因此，朱旦华怎么也不肯收（此时，张治中已将毛泽民在新疆牺牲的事正式通知中共中央）。江青含泪劝朱旦华说：“这是润之决定的事情，也是我们对孩子的一点儿心意。”朱旦华似乎已经明白了一切，她双手颤抖地接下了毛毯。这条毛毯毛远新盖了，朱旦华自己又盖，一直伴随到老。在撤退时，中央拨给托儿所一批骡马，马背两侧挂着筐，一个筐里装一个小孩。毛远新和其他孩子就在马背上的摇篮里，由陕北转移到山西，再到河北，最后抵达西柏坡。1948年秋，毛远新和托儿所大班的孩子们一起，进入中央办公厅办的育英小学读书。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选举蔡畅任全国妇联主席，朱旦华被任命为全国妇联干部科科长。

打破封建嫁给方志纯

三大战役胜利后，中央开始组织干部南下。时任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兼中央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的方志纯，已经接到南下通知。行前，他来全国妇联看望朱旦华。他们是新疆监狱的难友，彼此都很了解和信任。他们一同坐牢，一同坚持狱中斗争，一同回到延安。方志纯和毛泽民更熟悉，闽赣苏区时就是战友，在苏联学习时共居一室，感情深厚。朱旦华和方志纯原妻楼曼文也很亲密。楼曼文在狱中生下女儿时，朱旦华对她们精心照料，烧水做汤，缝制襦祿，情谊深厚。在西柏坡时，楼曼文重病不起，朱旦华常去看望和安慰。楼曼文因患癌症去世，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全国妇联的几位大姐看到方志纯来看朱旦华，十分高兴，便主动当起红娘。“我们妇联有好几个寡妇，其他人年纪大了，你还年青，应带头打破封建。”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帅孟奇单刀直入，劝朱旦华与方志纯成亲。杨之华、康克清更是积极，两头奔跑，极力撮合。“不要再等了，毛

泽民是等不回来的了。”蔡畅一再开导她。接着，大姐们又去劝方志纯。

1949年6月1日，大姐们叫朱旦华打电话把方志纯找来了，说要给他俩办喜事。方志纯说：“我还没有向组织上打报告。”几位大姐说：“嗨！打什么报告，我们都在，大家都可以证明。”这样，由帅大姐作为介绍人、邓大姐作为证婚人，全国妇联喜气洋洋地为朱旦华与方志纯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恰好那天是农历端午节，大家都说是“双喜临门”。

朱旦华与方志纯结婚后，带着远新和囡囡、荣欣一起生活，组成了一个新家庭。但没有几天，方志纯和朱旦华带着小荣欣南下了。囡囡、远新还留在北平读书，等候考试。是年暑假，康克清派人把囡囡、远新姐弟送到南昌。毛远新在南昌读了两年小学。

方志纯临出发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又把方志纯找去，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要他到天津时，顺便把贺子珍和贺怡姐妹带回南方，并要照顾好她们的生活。贺子珍拟任浙江省妇联主任（后改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怡任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善于保密的方志纯，对任何人都没有透露风声。当列车快要到达天津站时，方志纯郑重其事地对朱旦华说：“这次我们南下，毛主席交给我们一个任务，陪同贺子珍同志一起到上海。到上海后，再根据贺子珍同志的意见，看她是留在上海或到福州哥哥家，她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回南昌。”他还交代说，“她身体很不好，不要随便问她什么。”列车到站时，天津市委的负责同志已经把贺氏姐妹送到了站台。天津市委的同志向双方做了简单介绍后，方志纯便把贺氏姐妹领上了火车。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娇娇）也在天津站为妈妈和姨娘送行。

朱旦华与贺子珍、贺怡是三妯娌，但是没有见过面。好在方志纯与贺子珍在苏联同过学，贺怡又爱讲话。贺怡是毛泽东小弟弟毛泽覃的妻子，精明能干，生性活泼。贺怡在火车上介绍了她们此行的原委：她姐姐贺子珍回国后，开始安排在东北财委任机关党总支书记，后来在哈尔滨市总工会干部处工作。1949年春，娇娇用俄语给爸爸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亲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娇娇

毛泽东收到娇娇来信，非常高兴，随即复信：

娇娇：

看到你的来信很高兴。

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去苏联十多年一直未见过面，你一定长大了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

毛泽东

这样，贺怡便去哈尔滨，和姐姐及娇娇一起南下，到达天津。接着，贺怡把娇娇送到北平毛泽东住处，受到盛情接待。

1949年6月中旬，方志纯率六七十名南下干部到达上海。他们先去拜访了上海市市长陈毅，畅谈十多年来的阔别之情。第二天，朱旦华领着丈夫去看望离别12年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母女见面之后抱头痛哭。母亲以为她会留在上海工作，朱旦华却说：“我还要去江西。”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只是惋惜地说了一句：“秀霞呀，侬比花木兰还花木兰哟，把姆妈想死喽。”

带毛远新上北京

1949年7月，方志纯率领的南下工作团抵达南昌。方志纯任江西省副省长，朱旦华任江西省妇联宣传部部长。1951年10月，全国妇联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妇女儿童工作会议，江西省妇联主任危秀英派朱旦华去北

京开会。毛远新知道妈妈要上北京开会，也吵着要去。9月底，朱旦华顺便把毛远新带到了北京。康克清大姐见到毛远新非常高兴，便对朱旦华说：“你开会带着孩子不方便，我把他送到主席那里去。”于是，毛远新被带进了中南海。这时，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毛泽东心情不大好。毛远新去了以后，与李敏、李讷两个姐姐玩得很开心，使毛泽东得到一些宽慰。在妇女儿童工作会议结束以后，朱旦华来到中南海毛泽东家里，准备把毛远新带回南昌。但毛远新以听不懂南昌话为由，提出要回到北京育英小学读书，和在马背摇篮里长大的小朋友在一起。毛泽东说：“还是跟妈妈在南昌好，可以经风雨见世面。住在中南海会成为温室里的花朵。”毛远新调皮地说：“我又不住您这里，我住在学校，不是温室里的花朵。”毛远新的争辩，把毛泽东逗得哈哈大笑。江青也禁不住笑了起来。江青把朱旦华拉到一旁说：“自去年岸英牺牲后，润之从来没笑过。今天大笑是头一次。”又说：“主席很喜欢这孩子，留下来可以常和他说话，主席的心情好多了。”朱旦华望着毛泽东，等候他表态。毛泽东在毛远新的肩膀上拍了拍，说：“那就留下吧。”从此，毛泽东把毛远新当成自己的儿子来抚养。平时，毛远新和李讷都住在育英小学，周末才回家。到寒暑假，毛泽东就派人送他到南昌与母亲、继父相聚。快开学时，方志纯、朱旦华又派人送他回北京。毛远新1954年小学毕业后，进了北京101中学，直至1960年高中毕业。经过高考，他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后经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同意，转入哈军工就读，1965年底毕业，被分配到空军工作。空军领导打算把毛远新留在司令部当参谋，毛泽东不同意，要他下连队去当兵，不要留在机关当官。毛远新问道：“参谋算什么官？”毛泽东风趣地告诉他：“‘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算得上是最小的官了。”毛远新理解了伯父的意图，到空军要求分配下连队。结果，被分配到高射炮兵独立第四师三营一连二排当战士。毛远新去部队报到之前，先到南昌看望母亲和继父，又上了井冈山，到了红都瑞金参观学习，然后回到韶山，给爷爷奶奶坟上献花，参观了故居和毛家的祠堂。返回北京后，就去部队当兵锻炼。1975年和2000年，他两次到新疆，代表全家给父亲毛泽民扫墓，尽了孝心。

与贺子珍在庐山畅谈

朱旦华从1949年7月到江西以后，一直在妇女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37年，成绩出色。她历任省妇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副主任、主任。1956年，在中共江西省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朱旦华当选为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并被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江西是著名的老革命根据地，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老干部很多，朱旦华能当选为八大代表，实属不易和光荣。在江西选出的25位八大代表中，她是唯一的女代表。

1958年“大跃进”期间，朱旦华到江西修水县调查研究，和修水县妇联的干部及当地妇女，同吃、同住、同劳动。她发现修水妇女发动起来以后，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一改过去妇女不出门、不下水田的陋习，在农业生产战线上起了很大作用。妇女群众还编了一首生动的歌谣，显示妇女自身的强大力量：“过去妇女累呀累，抵不上男人一条腿。现在妇女力量大无边，顶住生产半边天。”朱旦华对这首歌谣非常喜爱，认为是妇女自强、自信、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的表现，于是写了个文字总结。不久，朱旦华在全国妇联召开的会议上，汇报了修水妇女的革命干劲和“妇女半边天”的响亮口号，得到与会同志的赞赏，被登载在会议的简报上。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正好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在讲话中称赞了“妇女力量大无边，顶住生产半边天”。并强调说，妇女不仅是生产的半边天，而且是整个半边天。后来毛泽东在谈到妇女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时，就肯定了“妇女半边天”的伟大作用。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对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说：他想和贺子珍在庐山见一见面。当时，贺子珍还在南昌休养。于是，杨尚奎立即安排水静（杨尚奎的夫人）和朱旦华下山，把贺子珍从南昌接上庐山。贺子珍在南昌休养期间，朱旦华常去看望，两人无所不谈。贺子珍曾与朱旦华谈及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她说：“主席在延安经常接见一些

外国记者，有男的也有女的。我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女子，哪里见过男女在一起长谈、握手、碰杯的场面。有一次，主席与一个外国女记者碰杯，我火气一来，上去就把那个酒杯打掉了。事后，主席要我写检查，我就是不写。我说我走，我去苏联学习，我又不靠你。开始主席以为我说说而已，没有理我。后来见我收拾包袱动真格了，便来劝我。这时，我已下了决心，不管他怎么劝，我是四条牛也拉不回来了。”说完，酸楚地笑笑。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朱旦华和许许多多老干部一样，遭到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改革开放以后，1983年出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1997年离休。

1993年7月31日，老伴方志纯病逝，朱旦华老泪纵横，沉湎在一幕幕的回忆之中。

方志纯一家满门忠烈，至亲中有7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是方志纯的堂兄方志敏烈士留下的名言，也是方志纯、朱旦华一生的座右铭。方志纯常说：“革命的胜利是那么多战友们牺牲的身体垫起来的，我们活下来的革命者没有丝毫享受、奢侈的权力。”朱旦华对笔者说：“方老将补发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工资几万元钱，全都捐献给家乡弋阳县办水利用了。”

方志纯去世后，朱旦华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安葬在老家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

1995年12月26日，湖南韶山举行纪念毛泽东诞辰102周年大会，朱旦华带着儿子毛远新应邀出席。当朱旦华被请上主席台就座时，成千上万的人们向她致意，她向人们频频招手微笑。

传奇老人朱旦华的特别“遗嘱”

陈干群 刘勉钰

2010年5月29日，令人尊敬的革命前辈朱旦华因病医治无效，在南昌逝世，走完了她近100岁（生于1911年）的人生旅程。

朱旦华于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新疆工作。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投蒋反共后，她被捕入狱。经党中央营救，于1946年回到延安，分配在中央妇委工作。1949年7月南下江西，历任江西省妇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54年任江西省妇联主任、党组书记。1983年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曾任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朱旦华革命阅历非常丰富，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940年在新疆与中共中央派驻新疆做统战工作的毛泽民结婚。毛泽民是毛泽东的胞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闽赣省革命委员会财政部部长、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新疆省财政厅厅长、民政厅厅长等职。1942年盛世才由联苏联共转向投蒋反共，将毛泽民和陈潭秋、林基路秘密逮捕，后又加以杀害。朱旦华和被派赴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也全部被捕。朱旦华在狱中团结难友，坚持斗争，“百子一条心，争取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终于取得胜利。1949年南下前夕，她与新疆监狱难友、刚任命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方志纯结为伴侣。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堂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赣

东北革命根据地和闽赣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赣东北特委常委、团特委书记、赣东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信南分区区委书记、闽赣省省委委员兼黎川中心县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红三十一师政委等职。1941年由苏联学习回国，滞留新疆。1943年被捕入狱，直至1946年经党中央营救获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省长、省军区第一政委、省政协主席等职，1993年去世。

方志纯、朱旦华以方志敏为榜样，廉洁奉公，生活简单朴素。他们的接待室和卧室连在一起。客厅不到10平米，里面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東西：紧靠北面墙摆着一张四方饭桌，两张长方形木板凳，一张长条沙发，一张木茶几，还有一张老人自用的藤椅。饭桌上端的北面墙上，贴着一张毛泽东主席的标准像，客厅西面墙上挂着方志敏烈士的《清贫》。朱旦华在江西省妇联工作时，经常深入群众，和妇女姐妹心连心。20世纪50年代，她还经常下乡调查研究，和妇女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妇女半边天”的口号，就是她最早在江西修水县和妇女们一起劳动时总结出来的。汇报上去后，首先得到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的称赞，后又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她德高望重，许多老同志都尊称她为“朱大姐”。

朱旦华逝世前后，各级领导都非常关心，以各种方式表示慰问和悼念。2010年6月4日，在南昌殡仪馆举行了“沉痛悼念朱旦华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大厅里摆满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和机关单位及个人送的花圈。江西省委书记苏荣、省长吴新雄、省政协主席傅克诚等领导亲临告别，许多七八十岁的老同志、老厅局长不顾年事已高，前来见朱大姐最后一面。中青年同志更是络绎不绝而来，整个大厅挤满了人。这折射出人们对朱大姐的深切怀念之情。

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们，都拿到一份《朱旦华同志生平》。《生平》介绍了朱旦华的革命经历和优良品德，其中有一段话特别吸引人，也非常令人感动：“2005年10月，她给省政协党组亲笔写信，对省委照顾解决老同志新住房，表示衷心感谢，请求组织上把自己的住房指标留给更需要的老同志。”

此事传开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人民群众对朱大姐更加敬佩。有的说：“朱大姐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有的说：“朱大姐了不起！”更多的人说：“现在像朱大姐这样的高级干部不多见。”有的评论说：“千古绝唱。”当然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由于笔者曾多次访问过朱大姐及其家人，因而有幸看到朱大姐写的这封信的复印件。信的原件已存入江西省政协的档案。朱大姐去世后的第二天，省政协主席傅克诚叫人从办公厅的档案柜里，找出5年前朱大姐写给省政协并转省委的亲笔信，并复印给其家属子女。信的落款时间为2005年10月15日。那时，朱大姐健康状况良好。头一天，省委、省政府为纪念方志纯同志诞辰100周年举行了座谈会，这引起老人感慨万千。她想到自己年事已高，有些事情必须早作交代，并向组织上表明态度。她在信中写道：

我一九三七年只身从上海去延安参加革命，在将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坐过敌人的监牢，也被下放劳改过。但我从不后悔，只觉得自己为党和人民所作的贡献太少。毛泽民烈士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方志纯同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们永远是我也是我的子女们学习的榜样。我已九十多岁了，我想在现在住的房子继续住下去，我死后，房子交公。我还有一点存钱，交给我的大儿子，全部用于我的后事开销，尽量不要再给组织增加负担。我认为，毛泽民烈士和方志纯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格，是留给子女们最宝贵的遗产。

信中还特别谈道：“最近得知，省委要以低廉的价格为一些老同志，包括我，提供新房子，我理解并感谢省委对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关心和照顾”，“趁我现在头脑还清楚，正式向领导表明：我不要买新房子，请组织上把这个指标留给那些比我更需要的老同志吧！同时，也请领导监督，不许任何亲属打我的旗号，利用这个指标。”

信的最后一句话说：“这是我认真思考后作的决定。也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遗嘱吧。”据说，省里是按正省级（因方志纯曾任江西省省

长)分配给朱旦华住房。但朱大姐没有要,也不让她的子女亲属要。她原住的房子也交公。在和平年代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如同战争年代牺牲的英烈们一样,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这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是革命前辈的高风亮节!

朱大姐的信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时任江西省政协主席的钟起煌读了这封信后,写道:“一名为党为人民作出过突出贡献的老共产党员、老一辈革命家的那种高风亮节给我以深刻的教育,被她那种无私精神所感动。”她的这种大公无私、高风亮节,永远值得学习和敬仰。

妻子儿女眼中的陈永贵

苏 容

1963年8月，太行山脚下的小村庄大寨经受了一场灭顶之灾，七天七夜的暴雨使全村房倒窑塌、地毁苗光。村支部书记陈永贵面对这种困难，却说：只要没死人就是喜事！他带着大寨人，凭着双手，用铁锹和扁担，在不要国家一分钱援助的情况下，硬是在满目疮痍的黄土地上建起了一个新大寨——灾后产量没减，社员口粮没少，原定完成的国家征粮任务斤两不差。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寨精神传遍全国，大寨和大庆一起，成为当时中国的两面旗帜。陈永贵成了新闻人物，后来成了新中国第一位农民副总理。在妻子儿女眼中，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

父亲是儿子心中的精神力量

陈永贵的小儿子陈明亮曾经成为网上的热门人物，一篇题为《陈永贵之子陈明亮涉赌涉毒被刑拘内幕》的文章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

然而，此陈明亮非彼陈明亮，对这条张冠李戴的假新闻，陈永贵的儿子一笑了之：“有的事情也许陈明亮可以做，但陈永贵的儿子不能做。我不能给父亲争光，至少也不能给他丢脸。”

2002年第一次采访陈明亮的时候，他名片上的头衔还是澳大利亚成功商务集团董事长和广东东莞新中食品有限公司的集团主席。而今天，陈

明亮已经是北京福阅投资公司和重庆正一实业有限公司的总裁。在人们的记忆中，无论职务多高，无论进行什么活动，哪怕是国事访问，陈永贵永远是一身农民打扮，人称“扎白毛巾的副总理”。而我见到的陈明亮则是西装革履，头发纹丝不乱，深酒红色的西服里是件挺括的暗蓝隐格衬衫，无框珐琅眼镜，文质彬彬，与他父亲那身著名的打扮形成鲜明对比。

父亲在陈明亮心中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陈明亮说，“不管多忙，我每年清明节都要回去给我爸爸磕头，大寨是我的根。我一进大寨就特别激动，我爸爸当年的很多老战友一看到我就说，哎呀，明亮回来了！他们老泪纵横，我也热泪盈眶。”“俺孩子回来了，回来好！可好哩！”最后这几句话陈明亮是用昔阳方言说的，口音纯正，这一刻，他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

陈明亮是在父亲去世几个月后考上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的。他说：“上大学以后，家里很困难，最拮据的时候我身上只剩下3毛5分钱。当时我就想，得挣钱，得改变这种状况。”从上大二开始，陈明亮就一边上学一边打工。毕业后进了一家公司，之后开过发廊和餐馆，当过商贸公司的经理，做过股份制企业董事长。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去了澳洲，在进修了两年工商管理之后，开始做贸易。他的经商信条是：该赚的钱赚，不该赚的，白给也不能要。

陈明亮热爱山西，被称为新一代晋商典范，2008年当选为太原新晋商联盟副主席，2009年1月又当选为重庆市山西商会首届会长。但是对陈明亮来说，最大的成功不是做了多大的生意，而是母亲宋玉林的一句夸奖：我儿子可孝顺了！

因为喜欢，所以选择

宋玉林18岁就当了妇女干部，当过妇女委员、妇女队长、卫生委员。日本投降以前她给八路军做军鞋军服，一直是支前模范、积极分子。解放以后，县里每年都要给她送请柬邀请她去参加劳模会。她就是在劳

模会上第一次见到了陈永贵。如同评剧《刘巧儿》里的那句唱词：“上一次的劳模会上我爱上了人一个呀……”在那个年代，劳模就是最大的偶像。宋玉林对陈永贵这个全国劳模自然心怀敬佩，但并没有想到有一天两个人能走到一起。

1965年，陈永贵的第一个妻子患癌症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当时全国已经开始学大寨，陈永贵天天忙村里县里的事情，根本顾不上照顾家，有人就给他介绍了离婚的宋玉林。

那时陈永贵还没有那么多职务，而且比宋玉林大10多岁。对于当年的选择，老人满脸笑意地用“喜欢”两个字就解释了。

嫁给陈永贵后，宋玉林虽然不享福，却很幸福。陈永贵在家里从不摆大男人的架子，家务事能做的都做。有一年去北京开会，发现北京人两口子都互相帮着做饭，回到大寨他就大力提倡“要男女平等”。

陈永贵总是带头多交粮食，家里的口粮不够吃，就吃杂面。宋玉林心疼丈夫，经常单独给他做一碗白面擀的面条。可是后来她发现，给陈永贵盛一大碗他说吃不了，一小碗还说吃不了——他就是要分一点出来给她和孩子们吃。

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宋玉林还在村里的托儿所给人看孩子，到大寨参观的外国客人、领导人提出要见她，她不好意思，觉得自己衣服不干净，穿戴也不好，就东躲西藏。可是陈永贵不在乎，非要找到她不可。找出来还说：“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见人的？劳动最光荣。”还开玩笑说：“有人造谣，说我娶了个20多岁的大姑娘，你也让大家看看嘛。”所以后来宋玉林也跟着参加一些接见活动，她家里至今还留着一张她迎接荷兰公主的照片。

陈明亮在北京买了别墅，将母亲宋玉林接过来一起住。前些年，宋玉林家里除了几个大沙发和两个看上去价格不菲的大鱼缸显示出一些现代气息外，一切都是老人所喜欢的“老式的”摆设。房间里到处可见陈永贵的痕迹：墨西哥总统访问大寨时与陈永贵的大幅合影、世界农业协会发给陈永贵的奖杯、陈永贵用过的橘黄油漆的旧书柜——上面摆着几乎所有和陈永贵有关的书籍：《陈永贵传》、《扎白毛巾的副总理陈永贵》、

《中国名村纪实——大寨》……还有小儿子陈明亮从澳洲带回的一份当地最大的华文报纸，因为上面有《中国农民领袖陈永贵》的文章。

而在老人的卧室里，最引人注目的是端放在柜子上的陈永贵的大照片。照片前有两个香炉——每到祭日，家里人总是要在他的笑容前点几炷香。

墙边有一台老式缝纫机，宋玉林说，这是老伴去世以后留下的唯一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从前给孩子们做衣服全靠它。宋玉林年轻的时候就是针线好手，还教过村里的女孩子学裁缝做军衣。拉开缝纫机抽屉，是一大堆已经发黑的旧顶针，老人伸出手来，说她的手骨节大，就是戴顶针磨的。

老人花白的头发永远梳得整整齐齐，皮肤白皙，气质颇好，年过八旬的人看起来倒像60多岁，听到别人这样说时，老人家连连摇头：“不像不像，你们也知道我一辈子农民，农民都显老。”一股子的实在和坦然。闲的时候，老人经常去花园走走，晒晒太阳，无论到哪里她都不愿意介绍自己是谁，她说：“老伴说了，干部是由群众产生出来的，不要自己去摆。”

从抱怨到理解

宋玉林说，陈永贵最爱小孩子，从来舍不得打，要是发现村里谁家打孩子，他都要去训人家。也许因为是小儿子，陈明亮是陈永贵最疼爱的孩子。他连名字都不叫，从来都是叫“小淘气”。“他爸不嫌淘，说淘点才有脑筋。当时怀孕的时候，我就不想要，40多岁了，都当奶奶了，怎么还好意思生儿子啊！当时他爸爸在北京，打来电话把我骂了一顿，你怎么这么傻？有这么一个儿子，你老了就得上劲了。谁知道还真让他爸说着了。”

陈明亮是陈永贵家唯一有北京户口的孩子。陈明亮能跟着父母到北京，是因为他刚刚小学毕业。“如果当时我是18岁，生活能够自立，肯定也是来不了的。”陈永贵自己的户口都是在不当副总理后才迁到北京的，这之前他一直是寨户，家里人每年把他的几百斤口粮换成粮票带到

北京。他拒绝了周总理和中央多次对他户口的安排，“他说这样可以减少城市户口”。陈明亮说，父亲认为子女不能沾父辈的光，所以至今他的哥哥姐姐还都在山西昔阳。

大哥陈明珠是他们中职位最高的，曾做到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20多年一直也没有再提，现在已经退休。

“我二哥陈明善当时在陕西当工程兵，干得很优秀，部队首长说他表现很不错，入党了，准备提干，再到军校锻炼锻炼。我爸就反对，说不管他干得是不是优秀，只要他是我的儿子，就不能这么做。我二哥17岁当兵，一直到我爸去世还是工人。”后来陈明善所在的昔阳县拖拉机厂倒闭，赋闲在家很长时间，前几年才去电业局上班，以工代干。

陈明亮的姐姐多年来一直在昔阳县公安局管档案。陈明亮说：“陈家媳妇女婿个个都是普通职员，我姐夫和嫂子曾经很有意见，进了陈家门不但没有沾什么光，反而处处受压制，也许不攀这门亲，凭他们自己的本事能获得更好的职位。”

如果说最初子女们还对父亲有什么埋怨的话，现在也都渐渐理解了，父亲不是不希望孩子们都在身边，他只是太无私了！

宋玉林说，她知道他是一心为公，他什么都不要，只为集体。

“我父亲临走前最放不下的就是我，1986年我正面临高考，他本来打算看我上完大学的。”讲到父亲的去世，陈明亮的眼圈红了。“我爸的遗嘱我到现在还留着，他留了8300块钱，这里面还包括土改时候房子作价给集体的3000来块钱。我爸当时的意思是全部交党费。为这钱，我妈和我爸狠狠吵了一架。她就问他一个问题，你全部交了党费，明亮今年上大学怎么办？所以我爸的遗嘱是改过的。”

“3月26号他去世那天，掉着眼泪说，俺这孩子没这命了，我原来打算再活四年，现在看来四个月也不允许了，陈家没出过大学生，我跟你都没念过小学，想看着明亮大学毕业哩。”宋玉林老人说着眼圈也红了。如今，陈家第三代人除了1人是中专毕业，其余6人都是大学生。

陈明亮精心保存着父亲的影集，有出访墨西哥的，出访柬埔寨的，在大寨接待中央领导人和外宾的，去外地作报告的，在田里参加劳动

的……这位朴实的副总理除了标志性的农民打扮，几乎在所有的照片里都开怀地笑着，那是一种心底无私的笑。陈明亮说，一个人自己有多大的力量能够不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保持本色太难了！我父亲没有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精神财富是我们几代人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对于陈家人来说，陈永贵是和劳动、无私、本色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的，他当不当副总理并不影响他的人格魅力。

博古批准我入党

沈安娜

2007年是博古（秦邦宪）同志诞辰100周年，我现在虽然已经90多岁了，但革命年代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期间博古批准我入党一事，仍然时常在我脑海中萦绕。

在国民参政会上初次见到博古

1935年1月，在我还未满20岁时，就和丈夫华明之（江苏无锡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起投身党的早期情报保卫组织——中央特科，由王学文直接领导。王学文派我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那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开始了九死一生的长征，留在南方八省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还在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他指示浙江省政府“清剿”我游击区。我从省主席和省保安处长主持的会议记录中，获取了当年（1935年）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对我闽浙赣、皖浙赣和浙南地区反复“清剿”的军事情报，提供给了党组织。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我和华明之与上海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中，我们俩决定到武汉去找党。1938年5月，在武汉，我见到了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鲁自诚。鲁自诚此时由董必武单线联系，他及时向董老为我们俩作了政治证明，我们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终于接上了关系。随即中共长江局的领导人周恩来、董老亲自与我谈话，派遣我设

法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通过原国民党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的安排，我顺利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任速记员，以此为掩护，搜集情报。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家骅安排我参加此次会议的速记工作。我党方面的参政员应有7位，毛泽东因事请假，只有6位出席。在大会的速记席上，我兴奋地注视着我党6位领导人在会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6人中，董老、吴玉章、林伯渠已年过半百，而王明、博古、邓颖超只有30来岁。老者儒雅沉稳，少者精明干练。其中4位，我此前已在八路军办事处见过。只有林伯渠、博古我是第一次见到，特别是博古，当时30刚出头，年轻帅气，高大挺拔，头发直立，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透着睿智和一点书卷气，给我的第一印象很深。但是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我必须掩饰自己的兴奋心情，当然更没有可能与他们直接接触。

博古不同意我去延安

1938年8月，我和华明之根据董老的指示到了重庆。10月，我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的工作中，得知国民党开始筹备五届五中全会，其中有反共的内容。我便在华明之的掩护下，趁着夜色，进了八路军办事处，指明要见董老。工作人员报告后，不一会儿，董老就出来了。他一边高兴地叫我“小速记”，一边招呼博古和王明也来听我汇报，还叫工作人员在街上买了些五香豆腐干、花生米。他们很有兴致地听我汇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组织机构和人事情况。当我汇报到国民党开始筹备五届五中全会，其中有反共内容时，董老和博古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的表情顿时警觉起来。董老说：“情况很重要，继续了解内幕，及时报告。”博古说：“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和保密啊！”

1938年12月，蒋介石从外地到了陪都重庆，立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常会”）。我担任此次中常会的速记。此后，我进一步获悉了即将提交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讨论的两个反共文件的草

稿，当即将主要内容记在脑子里，准备向党组织汇报。也就在此时，由于我对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深，产生了思想波动。眼看国民党机关衙门里死气沉沉，而我党八路军办事处里却热气腾腾，于是产生了想去革命圣地延安的强烈愿望。怀着矛盾的心情，我又一次在华明之的掩护下，溜进了八路军办事处。这次接见我的是董老和博古。他们坐下后，认真听我的汇报。我首先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蒋介石如何主持中常会。虽然董老和博古不止一次与蒋介石正面交谈过，但是他们对蒋介石主持高层会议的内幕情况，还是听得很有兴趣。接着，我尽可能详细地复述了我看到的两个反共文件的内容。董老专注地听着；博古睁着大眼，不时提些问题，让我详细回答，以便能全面掌握。最后，他们对于我能在会议召开前和文件出台前就提供上述情报，表示赞扬。可我此时却全然不顾他们的称赞，急切地和盘托出我想去延安的想法，还说得振振有词。

博古听了，先是一愣，原本和善的眼神，带着微笑的嘴角，立刻变得严肃起来。他皱着眉，摇了摇头，首先表态，说了一串“不行”。董老也明确表态不赞成，他笑着说：“你去了延安，我们这里就没有小速记了！一会儿我们俩要开会去，这事以后再谈吧。”我顿时泄了气，两位领导都不同意，肯定去不成了。我闷闷不乐地回了家。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周恩来突然派人来找我谈话。他和邓颖超大姐一起，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想去延安？”我很明白，这个“听说”，显然是听董老和博古说的，是领导们商量好了，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我既兴奋，又有点后悔，自己的幼稚打扰了领导。周恩来和邓颖超大姐循循善诱，给我上了一堂终生难忘的课。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可我心中却充满阳光。从此以后，我下定决心：一辈子坚守在党的隐蔽战线，绝不动摇。

博古领导我们做秘密情报工作

1939年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博古任常委、组织部长。此时，国民党在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后，不断制造磨擦，破坏国

共合作。为了保护打入敌内的我和华明之的安全，南方局党组织决定，改派早年在中央特科，有秘密工作经验，现身份较隐蔽的卢竞如大姐，来接替时任《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吴克坚，直接领导联系我们的秘密情报工作。卢大姐领导联系我们将近两年。过去，我们只知道卢大姐的领导人是“党组织”，她把情报交给了“党组织”。但具体领导人到底是谁，我们一直不知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卢大姐在写回忆录时，道出了不少细节，我们这才知道，她当时受命于博古。博古将我们夫妇的政治情况、打入敌内的背景以及家庭地址，详详细细交代给卢大姐，指示她一定要仔细做好对我们的领导和联系工作，好好保护我们，以便我们能在敌内长期埋伏，为党工作。

自此以后，卢大姐就打扮成女职员模样，根据我们家窗帘分合的暗号标记，来我们家“串门”。这期间多数情况下，由我获取国民党中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的会议讲话记录和机密文件原件，由华明之整编、密写、密藏，然后交给卢大姐。也有例外的情况，记得有一次，华明之在自己工作的单位——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电讯总队，密取到一份对我党有价值的绝密件，一大厚本，周末晚交给卢大姐。卢大姐带回红岩，当即由博古组织八路军办事处的有关同志，日夜抄写。周一早上华明之在上班前，悄悄将绝密件放回了保密柜，真有点神不知鬼不觉。这时我们的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屡屡受到党组织的鼓励。卢大姐80年代曾告诉我们，我们获取的各种情报，她都是单独交给博古，并向他直接请示汇报。她记得，博古看了我们提供的情报很高兴，连连说：“他们的材料不但有数量，而且有质量。”

与此同时，我也多次把蕴藏在心中已久的入党要求向卢大姐倾诉：我原是一个出生在封建世家、书香门第的青年学生，由于受反帝、反封建、爱国救亡思想的影响，向往革命，进入党的秘密情报战线后，一直受到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才逐渐成长起来的。我渴望能入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终于，在1939年中秋节前后的一个晚上，卢大姐如约来我们家接头时，兴奋地告诉我：“党组织决定吸纳你为共产党员，我是介绍人，博古

同志批准同意了！”我激动得泪流满面，与卢大姐紧紧拥抱在一起。随即，卢大姐郑重地转达了博古对我的嘱咐：“要始终对党坚贞不渝！”

1940年2月，我们的女儿出生了。一天夜晚，卢大姐抱了一大包婴儿用品，有小衣服、鞋帽和丝绸斗篷等，来家里看望我们，使我和华明之深深感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后来卢大姐告诉我们，她买婴儿用品前，事先请示了博古。博古表示同意，说：“你去办，我来签。”后来，买婴儿用品的发票，就是博古签字，在财务报销的。

博古当年领导秘密情报工作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博古在南方局长期负责组织工作，还曾代理南方局书记，审批我这样一名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年轻战士的入党问题，实在不过是他工作中的一个点。但他“要始终对党坚贞不渝”的嘱咐，我们一直牢记在心。现在回想起来，这对我们后来坚持战斗在敌人心脏，实在是至关重要。特别是1942年，南方局派来接替卢大姐领导联系我们工作的徐仲航，不幸被捕入狱时，我们直接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面临名利和地位的考验。那时，博古“要始终对党坚贞不渝”的嘱咐，以及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的教导，一直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顶梁柱”。我和华明之持续为党提供情报，直到1949年。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几年，我才逐渐了解了博古。他的一生是短暂而伟大的，有辉煌、有挫折、有壮烈。不论是追求真理，还是修正错误，他都始终对党坚贞不渝。撰写此文，算是对他的纪念吧！

出席中共一大的尼克尔斯基 照片发现经过

张小红

在笔者工作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陈列着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照片和简历介绍，其中13人是国内出席者，2人是共产国际代表，15人中14人都有大幅照片，唯有在尼克尔斯基的位置上没有照片。尼克尔斯基是怎样的一个人，在中共创建史的研究中不仅不知道他的模样，连他的生平，甚至他在中共筹建中做了哪些工作，或语焉不详，或众说纷纭。80年代以来，经过国内外学者的发掘，笼罩在尼克尔斯基身上的迷雾逐渐散开，近几年来，更有了突破性进展。但是尼克尔斯基的照片，却还是没有踪影。2007年，这个惹眼的“空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给补上了。2007年9月27日上午，我馆在空了半个世纪的位置上，挂上了尼克尔斯基的大幅照片。

卡尔图诺娃博士的寻觅

我馆在1986年中国共产党诞生65周年时，就曾通过外交途径，向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请求帮助寻找尼克尔斯基的照片。2006年，我馆又曾托共产国际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研究员，帮助寻找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寻找无果后，李玉贞又托她的朋友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卡尔图诺娃博士帮助寻找，并把我馆委托卡尔图诺娃博士寻找的公函转给她。原来，卡尔图诺娃早就在搜集尼克尔斯基的资料了。她的研究成果《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是尼克尔斯基生平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发表在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2006年第4期上。不久，该文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马贵凡研究员翻译，刊登于《百年潮》杂志2006年第12期。卡尔图诺娃在这篇文章中说：“1987年，苏共中央一位书记应中共中央邀请访问了中国，回国后，他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办公室提出一项任务：寻找中共一大参加者尼克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和照片。那时我在该院工作，这项任务就交给了我。”卡尔图诺娃与同仁几乎查遍俄国各大档案馆，依然没有找到照片。最后，只查到一张尼克尔斯基在狱中被折磨得形象不堪的照片，有关方面不同意将此照片提供给中国。她很无奈，只得在《远东问题》杂志上撰文：“我吁请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档案工作者和研究者，一旦发现内曼-尼克尔斯基的照片，请寄给我们或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

布亚科夫教授的突然出现

正在“踏破铁鞋无觅处”之时，有人把尼克尔斯基的照片送上门来了。2007年6月29日上午9时多，阿列克赛·布亚科夫手持照片要求见我们馆的领导。我们与他交谈之下，知道布亚科夫是俄罗斯人，1958年生，1981年毕业于远东大学历史系，1986年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研究生毕业，曾在远东国立海事大学当教师，现在远东国立大学当教授。他的专业是研究苏联特种历史、特种服务，也研究苏联海军史和中国移民史。布亚科夫正在写一本《1920—1945年远东地区情报人员在中国的历史》，书中涉及尼克尔斯基此人，因此开始收集尼克尔斯基的资料。他用了几年的时间，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历经曲折才找到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应笔者的要求，布亚科夫写了一份寻找照片经过的文字材料，即《弗拉基米尔·涅伊曼：在寻找照片中已知晓的和不知晓的事情》。弗拉

基米尔·涅伊曼，即尼克尔斯基的俄文原名，尼克尔斯基只是他当年到中国活动使用的化名。在这份材料中，布亚科夫是这样描述寻找尼克尔斯基照片过程的：

尼克尔斯基的照片，不仅在苏联正式出版的资料中找不到，就是在各个国家级的档案馆里也没有。

1927—1929年，涅伊曼曾在海参崴的国家联合政治局海参崴地区反间谍处工作过。我希望能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当地党组织的党员登记卡中找到他的照片。我向滨海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写去函询，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没有带来惊喜：在众多的档案资料中，国家安全部门的许多工作人员的党员登记卡都在，但是没有涅伊曼的党员登记卡。我不得不再次向伯力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写去函询，因为在苏联垮台之后，苏联共产党伯力边疆区委员会的档案移交到那里。过了一段时间，伯力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给我回信，没有找到涅伊曼的党员登记卡和照片。

我没有就此停止，我又向俄罗斯联邦安全部伯力边疆区安全局发去函询，提出寻找曾是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涅伊曼的照片的请求。两个月后有了回答：在伯力边疆区安全局的档案资料中只有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的侦讯案件档案，但在案件档案中没有发现照片。此外，他们指出，在联邦安全局的档案里没有涅伊曼的人事档案或档案照片。他们在回信中建议向俄罗斯联邦安全部提出函询。

我又写好相应的征询函，寄到莫斯科的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后来收到了他们的回信，在标准格式的信函上写着，我们这里没有涅伊曼的照片。但是，这封信同时又给我带来了一条有益的信息，它与涅伊曼生平的某些事情有关。俄罗斯联邦安全部的回信建议我应该到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鄂木斯克州联合档案馆看看，那里可能有涅伊曼的照片。

于是，我向鄂木斯克州联合档案馆发去了下一个函询，过了

两个月，那边的回信来了，同时还寄来一个光盘，里面有两张照片：一张是涅伊曼人事档案封面的照片，另一张是带有涅伊曼本人照片的履历表的照片。

就这样，我终于成了尼克尔斯基照片的拥有者。从照片上可以推断出他是于1932年底在什么地方拍摄的。再把目光投向照片上这个人，这是一张有着与众不同的外貌的脸：高高的额头，微秃的额角，向左分的头发和向前突出的鼻子。原来，涅伊曼就是这个样子生活在那个离我们很远的那个现实生活里，他这样的相貌也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布亚科夫说起他给我们送照片的缘起：他2006年曾来我馆参观，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纪念馆，但在陈列中看到只有马林的照片，没有尼克尔斯基的照片，觉得实在太遗憾，决定下次来上海时，要把尼克尔斯基的照片带来送给我馆。我们对他提供照片表示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并愿意按规定对他的艰辛付出给予一定的酬谢，他耸耸肩、摊摊手说：“我不是为这个来的，现在是俄罗斯中国年，能为此做点事很高兴。”这使我们很感动。

为慎重起见，我们希望布亚科夫复制一份带有尼克尔斯基照片的原始档案给我们，他答应日后复制好寄给我们。即使如此，我们决定还是暂不公开此事。因为我们担心党史界、文博界未必会首肯这张照片，这毕竟是孤证。

达西达瓦教授的确证

布亚科夫走后才一个多月，8月份，我们得到蒙古方面的消息，说他们也找到了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事情是这样的：2001年蒙古国人民革命党一位负责同志来我馆参观。当这位负责同志知道了尼克尔斯基照片的位置空着的原因后，主动说他愿设法寻找。我们听了很高兴，就托他帮助查找。他回去后把蒙古

国的有关档案馆都查了，没有找到。他就向曾任蒙古国家档案馆馆长、现任蒙古国历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朝伦·达西达瓦教授咨询蒙古国有没有尼克尔斯基的照片，达西达瓦肯定地说蒙古国内没有尼克尔斯基的照片，要找只有到俄罗斯去找，而达西达瓦与俄罗斯学术界有密切关系，于是找照片的任务就落实到达西达瓦身上了。

达西达瓦在为我们所写的《简述尼克尔斯基》中叙述了他查找的经过：“2006年4月，我在莫斯科学术交流期间，到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外交部档案馆查找尼克尔斯基的相关资料，工作了14天。2006年9月到伊尔库斯克、乌兰乌德参加会议期间，到布里亚特民族档案馆、伊尔库斯克省档案馆工作了10天。2006年10月，到俄罗斯赤塔参加会议期间，到赤塔省档案馆工作了7天。同时到过上述地区和城市的图书馆进行查找，并查阅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研究人员撰写的学术文章，并与俄罗斯研究共产国际问题和研究远东中国问题的学者进行座谈。上述工作的结果，使我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尼克尔斯基的个人简历、工作情况。在上述工作中，我也注意查找尼克尔斯基的照片，但查找照片的工作难度非常大，因为从其简历上发现尼克尔斯基当时做地下工作，身份特殊，其照片不知在哪个档案馆里。”最后，达西达瓦还是通过朋友找到了照片，并于2007年7月底寄给他。

接到蒙古方面8月打来的找到照片的电话，我们喜出望外。因为这样达西达瓦的照片与阿列克赛的照片就可以互相印证作进一步的考证了。于是相约9月份达西达瓦来我馆送交照片。

9月11日，达西达瓦一到上海，顾不上休息就到我馆。扣人心弦的一刻到了，达西达瓦与布亚科夫分别提供的照片是不是同一个人的悬念，马上就要揭晓了。事后，倪兴祥馆长说，当达西达瓦拿出照片的一瞬间，他用眼光一扫：是同一个人！心中的一块石头砰然落地了。原来达西达瓦提供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尼克尔斯基1932年前后拍的，这是与布亚科夫提供的照片相同的一张，另一张是尼克尔斯基20年代拍的照片，这张照片离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更近。

照片得到确证后，我们又听取了党史界有关专家的意见并得到了支

持，决定公布这一重大发现。《人民日报》9月24日在第11版以整版篇幅首先作了详细报道，标题为《中共创建史重要发现——一大“第十五人”揭开面纱》。新华社9月26日发专稿，标题为《中共一大出席者：那神秘的第15人是谁》。9月27日我馆举行了尼克尔斯基大幅照片正式挂上一大纪念馆第三陈列厅的简单仪式。

抗战初期何遂与中共高层的交往

何世庸

九一八事变当晚我正在沈阳。当时我是日本在沈阳办的南满医科大学预科的学生。我因此目睹了一场有预谋的侵略，也亲身体会了沦为亡国奴的痛苦。当我辗转逃回北平家中，向父亲讲述了在沈阳的经历时，父亲说：“果不出我预料，日本人真的动手了。”

父亲是个抗战派

我的父亲何遂是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人。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护法斗争，1924年参与了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发动的“北京政变”，成为国民军第三军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第三师师长是杨虎城）。1929年末，他辞去黄埔军校“代校务”（代校长、副校长主持校务）后，闲居北平。1931年初，应杨虎城邀请，他当了十七路军总参议。那年夏天，他到日本考察，回到北平对家人和朋友说，中日难免一战，日本人首先想在东北挑起事端。

九一八事变激起父亲民族意识的大爆发，他四处奔走联络抗日。1932年1月初，他与朱庆澜正式组建了“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朱庆澜任会长，他任副会长兼主任干事。“后援会”成立会议是在北平察院胡同我家住宅召开的，我家从此成为“后援会”活动的中心。经常往来的“后援会”要员，除我熟悉的朱庆澜伯伯，还有高仁绂、严

宽、王化一、何绍南、查良钊、刘竹波等。“后援会”向国内外发出抗战号召，募集捐款、物资。父亲还代表“后援会”到热河，敦促汤玉麟整军抗日。

1931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父亲为立法委员，1932年6月又任命他为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父亲没有放下在北方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活动，而是把这一活动带到南京、上海。他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毁家纾难的启事，称“国难日亟，抗日救国之士，喋血疆场，忠勇可佩。遂报国有心，输财无力，兹将家存古物及拙作字画等，悉数运沪粤等处，展览公卖，以助军实”。首批运至上海的文物2350件，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著名学者叶恭绰、傅斯年等亲往参观。叶恭绰认为，公开标卖恐流失国外。经叶恭绰与傅斯年撮合，由南京中央研究院收藏部分展品，酌付奖酬4万银元，父亲悉数捐给了“后援会”。

我是父亲的长子，他对我比较关注。我那时很积极地投入到风起云涌的学生抗日活动中，常常带着两个弟弟去参加游行、集会。父亲笑我只会空喊口号，说他干的才是实事。我乘机要求参加“后援会”的工作。1932年隆冬，父亲终于让我随“后援会”骨干王兰田，陪同从南京来的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纪亮为首的“中央慰问团”赴热河前线慰问抗日义勇军。代表团成员20余人，另有一批新闻记者及学生代表随行，其中就有范希天（后改名范长江，时为北大学生）。这次慰问活动，从承德出发后，沿路慰问了冯占海、宫可法部，在开鲁遭遇日机轰炸，许多居民被炸得血肉横飞，曝尸街头，我用携带的小电影机把所见情景拍成了短片。

父亲和我在热河期间，某日白天，突然有多名持长短枪的黑衣大汉闯入察院胡同我家，将全家老小和侍从驱赶到后院一间屋里，声言抢劫，逼我母亲交出钱财。这些人在翻箱倒柜后，仅取走苏俄代表团赠送的水晶烟盘等少量物品，人也没有受伤。父亲闻讯返平，心知此举决非一般抢劫，可能是北平当局对自己的某种警示。但他除了在家里增加保镖外，并未退缩自保。

1933年初，热河形势紧张。父亲代表孙科再次赴热河敦促汤玉麟奋起抗战。父亲还向蒋介石请缨杀敌，被任命为驻热河的五十五军军长。

父亲刚到任即逢日军大举进攻，汤玉麟望风而逃，父亲率部仓促应战，在赤峰、围场遭遇重创后，率余部转移到察哈尔的沽源。五十五军的骨干是原东北义勇军冯占海、宫可法的旧部，虽然装备、训练都较差，但由于有义勇军的渊源，颇受各方注目。父亲在沽源，一面受冯玉祥、方振武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影响，一面又受蒋介石的限令，军队内部又和副军长严武(何应钦的把兄弟)矛盾日深。所以这年秋天，他辞去了五十五军军职。

在他画的一幅画上，题了这样一首诗：

新亭涕泪终何补，往事难为挥尘谈。
无那长空归雁急，劳人风雨又江南。

诗后写道：1933年登高之作。是年春，张学良不合作，卸东北义军事归。

1934年，父亲卖掉北京的房产，举家迁往南京。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是孙科，孙科对既是老同盟会会员又交游广阔的父亲相当青睐，父亲一时成为南京政坛太子系的红人。

中共中央代表走进我家

1936年夏，我从南京中央军校第10期毕业，即到驻河北邢台的三十二军军部通信大队当了准尉见习官。这年年底，国民党军事训练总监部主办的军官外语补习所招收学员，父亲请三十二军军长商震保送我去。商震开出的保送公函上把我从准尉提升为中尉。我在1937年1月回到南京家中。

父亲告诉我，不久前，西安事变刚发生时，宋美龄曾让林蔚(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曾是父亲的学生)来找过他，要求他到西安去，利用他与杨虎城的关系，设法营救蒋介石。宋美龄表示，对方有什么条件都可以商量。父亲答应担负这个任务，并已确定由沈德燮安排专机，但他内心认为蒋介石是活不成的。后来事情急转直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这对父

亲触动很大。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愿意拥护蒋介石的领导，父亲认为，这真是从民族大义出发，又富有政治远见。

1937年上半年，在日本全面侵华山雨欲来的背景下，国民党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5月末6月初，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南京，国民党方面负责接待的是父亲的好友张冲。在张冲的安排下，父亲见到了周恩来、博古等代表团成员。对于这次见面父亲非常兴奋，回家后对我说，周恩来称赞他和冯玉祥、孙岳等一起策划打倒曹锟，电迎孙中山先生北上议政的行动是“进步之举”；赞扬他支持东北义勇军和坚决抗日的主张，希望他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与孙科的关系。为团结抗日救亡多做贡献。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南京的政治氛围也有了清新的改观。这时期，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曾多次到普陀路我家来访，并与父亲互有宴请。

当时，一个国民政府官员在家里接待共产党的代表，还是件不寻常的事情。对此，我与同在军官外语补习所学习的二弟何世平都十分关注。尽管我俩都参加过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也知道一些中国共产党的简况，但对真正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其领导人，仍然怀着忐忑的敬仰又充满好奇心。我和二弟在他们每次来访时都尽量守在旁边，生怕漏掉什么事情。我们怎么也没想到叶剑英竟是那样一位学识渊博、谈笑风生、潇洒而平易近人的人。叶剑英对我们两兄弟特别亲切，问长问短，他听说我们参加过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十分高兴，鼓励我们投身到抗日民族解放事业中去。

有一天，叶剑英和李克农来到我家，坦率地对父亲说，中共代表团的警卫人员缺少武器，而环境是有危险的，希望父亲帮助解决。父亲当即答应把家中存枪全部相赠。因为这些枪支都存放在京郊栖霞山我家的别墅里，父亲对我和二弟说：“这事就交给你们了。”于是，我和二弟调开家中司机，自己开车到栖霞山取回四支步枪、两把驳壳枪，连同子弹用麻袋捆好。叶剑英派汽车来，直接倒进我家车房，顺利地取走了。

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

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周恩来、叶剑英等亲到“首都反省院”看望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后，“政治犯”开始成批放出。就在此时，孙科的亲信、南京市市长马超俊突然来访，我正好在家接待了他，马超俊见父亲劈头就说：“共产党要在南京搞暴动。”父亲问其原因，马超俊说，据报有许多形迹可疑的人纷纷向傅厚岗集中，外面风传共产党要搞暴动。父亲立即打电话给叶剑英，叶剑英很快就赶来了，听说后笑道：“这完全是误会。最近有一批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刚获释放，他们急着找中共代表团，找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衣着破旧，长期和外面隔绝，自然到处打听中共代表驻地，这本是情理中的事，想不到引起这么大的误会。”父亲为此向马超俊作了解释并请他将此事转告孙科。我当时非常惊讶，像马超俊这样的堂堂大员，平时嘴里也说“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碰到一点事情，竟然连分析事物的普通常识都没有了。

父亲性格豪放，酷爱诗词书画，他与叶剑英很谈得来，应叶剑英之请他陆续把一些好友介绍给中共代表。有一次，父亲在万花楼请客，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都去了，父亲把他的好友吴石、张维翰、缪秋杰等介绍给他们，席间相谈甚欢。父亲很看重和共产党的交往，态度是真诚的，我记得有这么一些事情：父亲从北平回南京后，常到老虎桥监狱（江苏省第一监狱）去看望陈独秀（他与陈独秀是在民国初期陈独秀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秘书长时相熟的），他们在文字学、音韵学和古典格律诗词方面有着浓厚的共同兴趣。1936年父亲与陈独秀合作写了一本关于日本片假名源起的小册子，傅秉常把该文列入由他主编的三民主义文库中出版了。1937年初，父亲根据他收集的甲骨文残片，写了一本《叙圃甲骨释略》，陈独秀亲自为他抄录稿件，并题了词（此书石印出版，得存其真）。在与中共代表的接触中，周恩来委婉地劝父亲不要和陈独秀交往过密，父亲并不了解中共党内的事情，但他还是接受了。还有一件事情，父亲曾写了一份报告，要求派他担任国民党驻第十八集团军代表，通过孙科呈交蒋介石，蒋介石未予采纳。

父亲陪周恩来去山西

1937年9月，父亲受程潜之托，陪周恩来去山西八路军总部。程潜、周恩来、李世璋、父亲等人先乘火车专列到彰德府，而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父亲和副官苏鸿恩一起，乘一辆小汽车，经石家庄由太和岭而雁门关，历大同、太原、忻口一线。在由太原赴五台县八路军总部途中，汽车陷进日寇炸出的弹坑，父亲让苏鸿恩去找人推车，苏鸿恩没有找到。周恩来笑着对秘书说：“你去，你去。”不久周恩来秘书就找来一群乡亲，周恩来亲自和他们一起搬石填坑，有说有笑，使父亲大为惊讶。后来，父亲对我说及此事，赞叹说：“共产党就是会做群众工作。”这次在五台县八路军总部，父亲见到朱德、彭德怀等，谈得很是投机。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是阎锡山，因为在辛亥革命时，父亲作为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亲信参谋。曾设计阻止了协统吴鸿昌对山西的进攻，并随吴禄贞到娘子关与阎锡山相见，组成“燕晋联军”。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后，父亲带着吴的尸体到山西去，和阎锡山共同抗击清军进攻。这段患难经历使阎锡山和父亲的关系很好。当时忻口战役正激烈进行，国民党军队正面坚守，八路军集中在雁门关和平型关一带，以山地游击战为主堵截日军，破坏敌交通运输，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同仇敌忾的气氛是很浓的。阎锡山也承认八路军对日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为人城府很深，对共产党颇有疑忌。当时八路军的给养较差，父亲对阎锡山说，八路军是来帮你守山西的，既然是联合抗日，让别人在前面作战，不让吃饱穿暖怎么行呢？阎锡山把补给的责任推到大本营，父亲又通过时任军令部次长的林蔚去疏通，给八路军增加了一些军饷（由40万增至45万）。

1937年中国历史发生着巨大转折，青年一代的思想极为活跃。我家的客厅当年是一批青年人聚会的场所，经常来“指点江山”的有我六叔的女儿何慧（后去延安成为新华社著名记者）、二弟吴淞中学的同学吴博（后与叶剑英结婚）、我的堂姑金陵大学学生何垫曾和她的男友李庚

(时为金陵大学学生会会长)等。我们传递消息,议论时政,而战局的不利特别是常败将军刘峙的大溃败,使我们激愤又懊恼。蒋介石酝酿调整战区,任命参谋总长程潜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赶赴华北前线。程潜派他的亲信李世璋来催父亲到前线莅职(父亲任第一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李世璋到我家时恰巧叶剑英、李克农在座。李世璋非常高兴,他谈了正协助程潜组织长官司令部,他将出任秘书长兼政训处处长。李世璋对叶剑英说,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叶剑英站了起来,把我拉到李世璋面前说:“那好,就把这个青年交给你吧,让他跟着你上前线去。”叶剑英、李克农知道父亲极为好动,还劝他不要离开战区司令部,这样才能掌握全面情况,不为局部情况所左右。

南京沦陷前夕,我和二弟随外语补习所迁到湖南长沙岳麓山继续上课。1938年元旦刚过,三弟何康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大吃一惊,因为当时不满15岁的他是福建马尾海军学校的学生。我问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他说,我和赖鉴、谭毓枢几个同学决定要上前线打日本,又低声说,我们要到延安去!我看着三弟瘦小的身躯和用刷了绿油漆的床单裹着的背包,两眼顿时模糊了。我们兄弟三个一起到了汉口。1938年2月,我随父亲到郑州,当了第一战区政训处处长李世璋的机要秘书。7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经组织安排,我奔向了延安。我的二弟何世平先我一步去了延安,三弟何康也在次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当年在抗日烽火中走上革命道路,固然有严重民族危机的促迫,也确实烙上了家庭的特殊印记。

(何 达 整理)

为解放战争胜利奔走的何遂

何世庸 何 康 何 嘉

1946年下半年，蒋介石撕毁重庆“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此时刚从广西大学农学院毕业的何康回到南京家里。他感到局势骤然变化，担心失去党的关系，便冒险去了梅园新村。董老（董必武）看见他，用责备的口气问：“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啦？”何康讲了自己的心情，董老向他介绍了形势，说全面内战已经爆发，自己即将撤回延安，叮嘱何康注意隐蔽，在家里等着，会有人和他联系。不久，联系人带何康去见了钱瑛和钱之光。钱瑛告诉他，董老已将他们兄弟三人（何世庸、何世平、何康）的党的关系交给她，随她一同转至中共中央上海局（钱瑛是上海局委员、组织部部长）。

毅然转变甘做桥梁

何遂当时认为，抗战八年，老百姓受苦受难，国家破败不堪，需要休养生息；蒋介石非要打内战，是逆天悖理，他已经把蒋介石看透了。何遂有个特别的长处，就是在政治上敏锐而清醒，从善如流，他此时已从不满蒋介石发展为反对蒋介石，从同情支持共产党发展到愿意为共产党工作。这个转变和他的家庭是分不开的。何遂的家庭非常特殊，表露在外面的温馨而团结。团结的政治基础是他所有的成年子女都是共产党员和坚决跟共产党走的“激进分子”（女儿和媳妇此时尚未入党），清一

色，无一例外。如果别人找共产党要费点周折，他不用；如果从前他的爱国、正直、真诚影响过子女，现在却是一个个成熟的子女影响着他。何遂是慈父，从来没有苛责过子女，更别说是打骂了。他天性很爱孩子，加上还有什么“民主平等”、“个性发展”之类的理念。此时，他慈爱之余，又增加了“尊重”，尊重的是子女身后的共产党。

这时期，吴石是何家的常客。吴石和何遂是闽侯小同乡，他俩碰到一起习惯用家乡方言交谈，叽里咕噜比外国话还难懂。吴石是颇有见地的军事家，在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之际，他已预言国民党必败。吴石虽然顾虑较多，但何遂对这位挚友极其透明，说起话来总是激情澎湃。吴石在政治上的确受了何遂的影响，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表示希望通过何遂和共产党的高层代表直接联系。何康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他的领导张执一。吴石抗战时期长期担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时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是一个能够接触高级机密的军事行家。吴石的动作引起中共高层的关注，1947年4月，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负责军运统战策反工作的领导张执一，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并宴请了吴石，何遂与何康作陪。这不是一般的会见和宴请，其意味着吴石与共产党正式建立了组织上的联系，也意味着吴石正式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此后，吴石由张执一单线联系，何康是联络人。对从小看着长大的何康，吴石是放心的。何遂确实发挥了一次桥梁作用，对此张执一写道：“蒋军现役军人吴石，就是通过他（何遂）的关系为我方工作，后被蒋帮杀害，是革命烈士。”

何遂于1947年农历三月初十，在南京普陀路4号寓所庆祝了自己的60华诞。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于右任、邵力子等亲临致贺，侯宝林、郭启儒等著名艺人也给绿茵草坪上的客人们带来阵阵欢笑。何遂回顾往事，展望前程，满心得意和快乐。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年8月，何遂心脏病发作，来势甚猛。病名为“心冠动脉血栓症”，就是心脏的两条冠状动脉堵住了一条，这种病彼时死亡率极高。幸喜病发后及时送往中央医院，由著名心脏科专家戚寿南医师为他主诊，用了大量进口特效药，加上他身体素质好，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因父亲病危，何遂的子女都集中到他身边。9月，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在锦江饭店召集何家三兄弟布置工作，向他们讲述了形势的有利发展，要求他们运用父亲和缪秋杰的关系，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孤立蒋介石集团。决定以缪秋杰与何遂合资办企业的名义，由何康出面开展经济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处理宋庆龄先生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解放区争取到的一批物资。这批物资主要是西药，包括盘尼西林、链霉素、血浆、消炎片及X光机等战地用品，有数百箱之多，因内战爆发，滞留上海，存于四行仓库。办一个公司，便于“消化”这些重要物资。领导要求进一步发挥何遂、缪秋杰的掩护作用，命三人立即切断与进步团体的一切联系。刘晓问，已经通知住在南京何家的同志离开，是不是已经走了？何康回答：“已经走了。”（此处指张登等同志，即沙文汉）他们让何世平仍回台湾工作。

当时兄弟三人议论，认为领导希望父亲和缪伯伯在“战略”位置上多发挥作用，因此要更注意隐蔽。此时，何遂的朋友，时任天津港务局局长的邢契莘想在南京设一个点，有意购买何遂在普陀路的房子。三人研究，卖掉南京的房子，父母举家迁居上海与何康同住，这对掩护何康开展经济工作十分有利。便商诸父母，何遂夫妇很高兴地同意了。

何遂一家迁居上海住在哪里呢？这就得益于缪秋杰（何遂挚友、亲家）和他的长女缪希霞（何康之妻）了。愚园路俭德坊2号是一幢独门独院的三层西式小楼，业主是汉奸，抗战后被关在监狱里，房子作为“逆产”，成为盐务系统的高级招待所。缪希霞找了中统安插在盐务系统的要员杨隆沪，杨便做了顺水人情，把房子定为缪总办莅沪寓所，由缪的亲家和女儿住了。这幢楼房，建筑考究，四面围墙，院中一侧还有平房，地点远离闹市，十分幽静，它实际成为共产党的一处秘密机关；在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中共上海局的高层领导人都在此住过。

听组织安排竞选“立委”

根据1946年末“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1948年1月要进行立法

委员的全民直接选举。立法委员相当于西方的议员，当选立法委员也就成为即将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的“国大代表”。

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何遂思想有了变化。他感到自己已经当了17年立法委员，而且长期担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现在大病初愈，何苦为当这个“官”再去竞选？他萌生了退意。张执一和他作了长谈，希望他在两种国家命运的决战中，为新中国的诞生多做贡献。这次竞选，不是为了做国民党的高官，而是为了更好地替人民解放做事。何遂的积极性上来了，决定抱病竞选，他拿出三成卖房的钱作为经费。张执一指示何康，由瑞明企业公司（共产党的资产）拨出一笔经费支持何遂竞选，并让何世庸主持其事，叮嘱何世庸要“尽力选上”。何世庸此时在南京盐务总局任职，缪秋杰立即调他到广东专管莺歌海盐田的开发，何世庸利用调职之机，做了何遂的“竞选办公室主任”。

何遂是福建人，选区安排在福建。由于行动迟缓，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任赖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已经预作部署，所以比较被动。何遂在赴闽前专门去拜访了陈立夫，陈立夫当场为何遂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国民党福建省党部，要求他们帮助何遂竞选。

陈立夫的信，打乱了赖琏预先的安排，也让愿意帮助何遂的福建省主席刘建绪（何遂辛亥时期在广西的战友刘建藩的胞弟）找到了借口，加上省议长丁超五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全力支持，竞选的形势大变。何遂祖籍福清县，何氏宗族势力很大，港头镇一带大部分姓何，那里是何遂的票仓。可是，县里有位豪绅郑某，也参加竞选，他肯定选不上，但不仅分散选票，而且干扰进程。何世庸送给他4000元，请他退出，他不干。何正发愁，平潭岛一个姓林的黑社会头子（此人是个恶霸，当过土匪）找上门来说，你老爹对我有恩，有什么难处只管说。何世庸就说郑某不肯退出，我没那么多钱给他。姓林的立即对郑某提出了“土匪式”的警告，郑某乖乖地退出了竞选。刘建绪把这个县的县长和县党部书记找了去，亲自关照了一下，打通了关口。于是，何氏宗亲总动员，投票前已将每一个投票站的管理人，每一个投票箱的监督人，全部换成了姓何的。3月21日正式投票，白天有人组织投票，到了晚上，管理人就变成把大批填好的

选票塞进票箱的“投票人”。选举结果，何遂在福清一县得票近18万张，福州得票也不少，总之，高票当选“首届民选立法委员”，同时也成了当然的“行宪国大代表”。

支持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激化蒋桂矛盾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迅速崩溃是和它内在的深刻矛盾分不开的，蒋介石从来都没有实现过所谓的军政统一，在大大小小各种矛盾中，“蒋桂之争”贯彻始终，到后期，更成为主要矛盾。1948年3月至5月，蒋介石为给独裁统治抹上一层“民主”色彩，在南京召开了“行宪国大”。这次大会的主要议程是选举总统和副总统。总统归蒋没有悬念，只有居正作为配搭参加竞选；副总统蒋介石内定孙科，参加竞选的有于右任、程潜、莫德惠。桂系首脑李宗仁在美国人暗示下毅然竞选副总统，蒋介石当面劝李退出，被李拒绝，蒋大为恼火，也使这一幕变得分外热闹。

何遂与桂系的关系非同一般。何遂1909年从保定陆大二期毕业后，就和一批革命党人进入广西，担任广西督练公所参谋处筹略科科长兼陆军干部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教官。他是同盟会广西支部的创建人之一，广西同盟会下设一个“军事指针社”，以陆军小学为工作重点，何遂为负责人。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当时都是该社的常客；李宗仁是1910年加入同盟会的，李、白、黄与何遂的友谊从那时开始。抗战时期，何遂长期兼任军委会桂林行营总顾问、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总顾问，奔走于重庆与广西之间。不仅如此，何遂与桂系的关系还有更深的“经济因素”。1939年12月，国民党元老谢持状告川康盐务局局长缪秋杰滥用职权、滥用公款，缪被免职。何遂即向李、白力荐缪为干才，李宗仁、白崇禧联名致电蒋介石，保荐缪秋杰出任粤、桂、湘、浙、赣、闽六省盐务特派员。蒋以这六省在桂林行营辖区（白崇禧是桂林行营主任），事关军务，便同意了。缪上任前，化名商人黄楚卿，冒险潜入上海，利用租界和他曾任两淮盐运使的身份，居然把存放于淮南东台、上海、淮北各地以及松江盐

区的大批尚未被日寇控制的存盐，抢运回了大后方。“食盐”和粮食一样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它是一个“政治商品”，一旦发生盐荒，必定军心动乱，社会不稳，故食盐例行“专卖”。此时，宋子文建议，与其“楚才晋用”，不如中央自用。1940年4月，国民政府罢免了盐务总局总办朱庭祺的职务，任命江南六省盐务特派员缪秋杰接任总办。由于这一戏剧性的变化，缪从被免职到升任总办不足四月。缪上任后，投桃报李，在食盐专卖配额等方面着力关照桂系防区（食盐专卖价格与市场实际价格相去甚远），这成为桂系的重要财源。1940年末，李宗仁、白崇禧一次送给何遂5万元现款，这应该不仅是“补贴老师家用之困”这样温馨的理由。

何遂参加了1948年3月末在南京举行的“行宪国民大会”，重头戏是4月19日开始的总统和副总统竞选。副总统的竞选过程可谓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前后共进行了四次投票，其间还出现了程潜、李宗仁联手放弃竞选，孙科也被迫放弃竞选的局面。蒋介石无奈，只得表面妥协，劝回三位主角，把戏唱下去。最终，4月29日第四次投票，结果李宗仁得1438票，孙科得1295票，李宗仁战胜孙科当选国民政府第一届副总统。何遂是极力支持李宗仁的，他和黄绍竑等推波助澜，卖了不少力气。

据李宗仁从蒋介石扈从卫士那里听说的情况，蒋介石在官邸听副总统选举唱名选票的广播，“当广播员报告我（李宗仁）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可见，此事加剧了蒋桂矛盾，对蒋介石是个打击。

三访白崇禧劝桂系认清形势

1948年夏，张执一让何康找妹妹何嘉谈话，说党组织有意派她到台湾去工作，征求她本人意见。何嘉当时不满22岁，是复旦大学社会系的学生。她当时虽尚未入党，却是一个纯真、一心憧憬为共产主义献身的青年。她当即表示同意。不久，经组织安排，何嘉以患肺病为由，办理了休学手续，先到香港青山达德学院学习。组织对她的要求是，不得与任何

人联系。直到这年末的圣诞节，内心焦灼的何嘉才等来嫂嫂缪希霞。缪向她讲了形势，告诉她台湾方面已另外派人去了，她将另有任务。次日，缪带何嘉到香港摩利臣山道见了张执一。“胖公”（张执一较胖，身边同志有此尊称）亲切地问了她的近况，何表示了要求投入战斗的急切心情。不久，由邓裕民做介绍人，何嘉入党了。她接受的第一个工作任务，就是陪父亲到武汉去见“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

何遂是中共党组织特地从上海请到香港来的，具体任务是刘晓和张执一当面向他交代的。随行者何嘉的任务是刘晓、张执一让邓裕民布置的，写在一张纸上，让何嘉反复记诵，背下来之后，把纸烧掉了。留在何嘉记忆里的只有两点：一是劝白崇禧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不要上蒋介石的当，为老蒋拼光了“家底”；二是劝白不要在长江以北与共军作战，应收缩主力，必要时向湘桂转移，给部队留条后路。

1948年下半年，全国解放战争的局势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推进，蒋介石嫡系精锐丧失殆尽，傅作义集团放弃抵抗，桂系军事集团被推上第一线。1948年12月24日，白崇禧在武汉发出“亥电”，打出“和谈”旗号，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并于21日宣告“引退”，李宗仁成为代总统。此时，长江以北还有部分城市仍控制在国民党手里，比如战略要地安庆易守难攻，守军即为桂系大将夏威（时任安徽省主席）麾下的第四十六军一七四师吴中坚部。了解了这样一些背景，就可以看出，1949年1月末，何遂赴武汉见白崇禧，是具有明显的战略性、针对性目的的。

上面交代的基本任务，何遂能明白无误地向白崇禧表达并进行劝说吗？回答是可以。何遂不仅和桂系关系很深，而且和白崇禧私交甚好。何遂欣赏白的才干，1940年日寇占领了昆仑关，“桂南战役”前期，是由白崇禧指挥的，总顾问何遂、参谋处处长吴石都住在迁江前线指挥部。昆仑关大捷是抗战史上第一次攻坚战胜利，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一战成名，白崇禧是有功的。但蒋介石抓住日寇增兵再次占领昆仑关，把白崇禧免职（让张发奎顶替），何遂大为不平。何遂40年代初画了一张巨幅老虎图送给白崇禧，并附词一首，谨录于下：

《望海潮》画虎题赠白健生将军

昂头风起，传声谷应，山君一怒凭临。家国播迁，乾坤板荡，寇氛可叹凌侵。城郭正秋深。看孔明台峻，虎旅如林。人倚长城，龙今不卧虎成擒。年来墨突难黔。抚萧疏短鬓，花好羞簪。西走赵并（指古并州——作者注），南临楚越，算公是我知音。神剑肯空吟。况欢同鱼水，谊比苔岑。并力澄清天下，大斗为公斟。

词中以“知音”、“欢同鱼水，谊比苔岑”来表达他们的友谊。

这里不妨说个小笑话。有一次，桂林行营主要官员赴渝开会，出发时所有人都到了，飞机起飞的时间也到了，就缺何遂。有人等得不耐烦，提议走吧。白崇禧笑着用桂林腔说：“莫急，莫急。叙甫先生已经画完最后一条老虎腿了，这就到，这就到。”在一片笑声中，何遂也赶到了。

何遂与白崇禧是可以关起门推心置腹谈话的老朋友。

何遂与何嘉1949年1月底从香港启程，经广州到汉口，住在湖北省盐务局局长杨隆沪的家里。他们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三次到“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拜会了总司令白崇禧。第一次去时白正卧病在床，何介绍了女儿，白很客气，请何嘉坐在卧室外面的客厅里休息，他与何遂就在自己的卧室里谈话。令何嘉惊异的是，前后三次，只有她一个人待在室外的客厅里，没有白的任何一个警卫、文秘人员或侍者出现过。他们两人长谈的内容谁也不知道。

何遂每次回到住处，都要向女儿“汇报”一番。何嘉感到，他们的关系变了，不仅是父女，而且是为同一个目标共生死的战友。岁月悠悠，何嘉的记忆模糊了；只有当年印象最深的还有一点痕迹：何遂毫不留情地揭露蒋介石假“和谈”、假“引退”的面目，说老蒋把你们推到前台和共产党血拼，他最想看到的，不是你们打败共产党，而是共产党怎么把你们吃掉，劝白要“保存实力”，不要上蒋介石的当。何遂说：“‘划江而治’是做梦，换一个位置你们肯住手吗？”何遂甚至为桂系军队最后的出路作了设想。他说：“老蒋不会让你们往四川撤的，还是回老家吧！实在无路可走，还可以到越南，保大和法国鬼子不一定是你们的对手。即便队伍

散了，小弟兄在家乡讨口饭吃，也比在外乡容易啊！”

何遂完成任务，又与何嘉同到南京，参加“国大”的会议。这期间，他还主动（不是共产党布置的任务）面见代总统李宗仁，劝李不要存“划江而治”的幻想，把和谈的底线降低，采取更灵活的姿态，和共产党真诚和谈息兵，避免继续生灵涂炭，给国家留点元气。何遂父女回到上海已是3月了。张执一特地在锦江饭店设宴款待，何康、何嘉作陪。“胖公”对“何老伯”（张执一一直尊称何遂为何老伯）大加称赞。

冒险赴台续谋大计

1949年4月，何嘉奉命到杭州请父亲，这一次他们的任务是先赴广州后转台湾工作。4月下旬，何遂父女与吴石、吴石的副官聂曦同机飞往广州。当时国民政府已从南京迁至广州，一切都混乱不堪。不多日，吴石到福州去了（他已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临行前，他将一包绝密军事情报交给何遂。这组情报包括：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兵力部署图，国民党在江南地区军队的编制、人数、装备情况以及国民党总兵力统计和总后勤方面的统计资料等，都是铅印的，数量较大。何遂立即交给何世庸与何嘉，让他们设法送出。国民党的行政机构虽然半瘫痪，特务却很猖獗，尤其是通往香港的交通线，鹰鹫如云。何世庸借口送妻子回九龙娘家分娩，与何嘉一起，带着一儿一女和两个保姆，夹带着这批情报，安全到达香港。通过余秉熹交给了华南党组织在港负责人饶彰枫。

5月，余秉熹到广州来，说中央军委有位负责同志来到香港，要看华南地区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主要是湖南、广东、广西交界地区的地图和华南几个大城市的市内交通图。何遂与何世庸想了很多办法，终于从国防部一个参谋那里弄到这些地图。何世庸让何嘉送到香港去。何嘉用牛皮纸把地图卷成一个卷，正为难地考虑如何躲过沿路鹰鹫的眼睛，听说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尚在广州，而且正要飞往香港公干，便找到这位精干的中年军官，托他把牛皮纸卷送到何世庸的岳父家，纸卷上写明了地址与何遂亲启。聂曦（他去台湾后还到香港送过两次情报，牺牲得很英

勇，至今没有一个烈士的名分)痛快地答应了。当何嘉乘火车赶往九龙李朗如家时，牛皮纸卷已送到了，何嘉迅即交给了余秉熹。

6月，何遂、何嘉去了台湾。他们先到台北，见到了何遂的胞妹何璋生。何遂积极地做了争取妹夫马德建和乃兄马伯良(原上海江南造船厂厂长)的工作。马德建20世纪30年代初是电通影业公司的老板，投资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等早期进步电影，在电影史上留下了一页。在台湾，他是一个兵工厂的厂长，少将军衔，他接受了内兄的一些影响(20世纪70年代初，马德建夫妇回大陆定居，受到政府欢迎并给予安置，马德建不幸死于唐山大地震)。

何遂带着女儿到高雄去看望了妻子陈坤立和何世平一家。何世平遵照组织指示已经在台湾工作三年了，陈坤立来台和次子同住也有一年多了。何世平一直在台中、台南盐务系统“潜伏”，1947年、1948年，张执一曾两次到台南来听取何世平的汇报并布置工作。何世平是根据张执一的指示，设法调到高雄一家盐场当厂长的。何世平经考察得出一个结论：沿海凡建有盐田和盐场的地方，都是适宜军队登陆的地方。何世平讲了一个新情况：6月，香港报纸登出接管上海军管会干部的名单中，有何康的名字，何康是军管会农林处处长。这个信息已经传到台湾，何世平的同事们私下已有议论，有人甚至散布“何家弟兄都是共产党”。何世平还获知，何世庸已撤至香港，准备参加接管广州的工作。因此，何家人要在台湾工作是越来越危险了。

8月，何遂、何嘉再次到台北。吴石将军已于福州解放前夕飞来台北，就任了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职务。这期间，何遂与吴石以携带家人游山玩水为名进行密商。在明知环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吴石毅然决定甘冒斧钺，以更秘密的方式为共产党工作，并亲自去接上关系，他却催何遂一家快走。9月1日，何嘉陪同母亲陈坤立与长兄何世平全家在基隆乘秋瑾号轮驶往即将解放的广州，再转香港。何遂则于9月初由吴石买好从台北直飞香港的飞机票，并亲自送他上了飞机。关于何遂离开台湾的情形，吴石的长子吴韶成在《五十年代在台湾殉难的吴石将军——挥泪忆和父亲走过的岁月》一文中，有如下叙述：

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走访在北京白塔寺寓所的何遂伯伯。老人谈起1949年逃离台北情景时声泪俱下。当时台湾风声已经很紧，情况很不好，父亲一再催促他赶快离开虎口，以防不测。父亲对他说：“我不要紧，有国防部参谋次长这块牌子掩护，你快走！”就这样，父亲替他买了去香港的飞机票，第二天亲自开车把他送到飞机场，直至上了飞机才离开。老人说：“你父亲和我40年之交，情同骨肉，非同一般。他关心我胜过关心自己，不意从此竟成永别！”

吴石于9月和10月初两次到香港，在何嘉协助下，与中共中央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领导人万景光接上了关系。

1949年12月末，经党组织安排，何嘉陪同父母乘一艘英国轮船从香港抵青岛，转陆路经济南回到上海。当天，刘晓带着多位领导同志到家里来看望了何遂夫妇。

(何 达 整理)

从大陆战斗到台湾

——我所知道的吴石

何 康

1950年6月10日，吴石将军在台湾遇害，同时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杀害的还有女共产党员朱枫、吴石的好友陈宝仓中将、吴石的亲信聂曦上校。此案震动台岛，美欧媒体多有报道。在中国大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长时期来知道此事的人很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境外信息的涌入，坊间有关传闻渐多，报刊上介绍吴石的文章也偶有所见。由于信息不畅，难免有些猜测、舛误。岁月倏忽，我也已耄耋之年，作为与吴石有两代深交的当事人，谨述所知，以志纪念。

难得的军事人才

张执一（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在《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载《革命史资料》第五期，全国政协编，1981年版）一文中写到我的父亲何遂时称：“何遂，福建人，出身保定军校，曾任西北军系统孙岳部参谋长。在蒋政府长期任立法委员，抗战初即与我党发生关系，他的三子一女一媳（三个儿子是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儿何嘉，媳缪希霞），均为我党地下党员。他在旧军政界的关系很多，我经常与他接触，运用他的关系开展工作。蒋军现役军人吴石，就是通过

他的关系，为我方工作，后被蒋帮杀害，是革命烈士”。近年，不少文章称吴石受“共产党员何遂单线领导”，这是不确切的，何遂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领导过吴石。吴石与父亲是几十年的生死之交，确实是受父亲影响并通过父亲和共产党建立直接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人民解放和国家统一大业，最终壮烈牺牲。

吴石，字虞薰，1894年阴历八月十五日出生于福建闽侯县螺洲乡一个“累世寒儒”的家庭；少年就读于富有维新色彩的福州开智学堂、榕城格致书院时，接触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从老师那里知道了孙中山反清起义的壮举。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7岁的吴石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福建北伐学生军；1913年春转入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1915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与白崇禧、黄绍竑、张治中等是同期同学。吴石记忆力极强，又十分刻苦，1916年末，他在同届800学生中以第一名毕业。由于陆军部按省籍分配，当时福建省没有地方部队，并遭受皖系军阀李厚基的残暴统治，吴石不愿为军阀效力，在家闲居数月，十分苦恼。适逢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吴石乃投身福建以方声涛、张贞为领导的地方民军“驱李”斗争。他在自传中写到，此时与“归自欧洲的何叙甫”结识。我父亲字叙甫，是北京政府派赴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上校武官。1918年回国后，他被广州护法军政府任命为“靖闽军司令”。所谓“靖闽军”实无军队，主要依靠地方民军及反李势力。吴石与父亲在这一斗争中熟识。由于暗杀活动失败，牺牲了十多人，吴石与父亲被迫离开福建，经武汉北上。吴石因喉疾在北平休养，1922年至1924年，他拜闽籍大儒何振岱为师，学习诗词国学。从此，古典格律诗词的创作成为吴石一生的嗜好。父亲则于1920年经孙岳引荐进入直系，参与了1924年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发动的“北京政变”，成为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父亲请吴石出任该师军械处处长并统领炮兵，兼任南苑干部学校上校教官。但国民军仅一年多便在直奉两军夹击下瓦解了。这时，蒋介石正在南方誓师北伐，朱绍良任总部参谋长，委吴石为作战科长。1927年，方声涛回福建主持政务，吴石又回福建任军事所参谋处处长，致力于整理本省民军。

1929年，吴石作出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他决心到日本陆军大学去继续求学，成为一个深入了解日本军队的真正的军事家，报效国家和民族。吴石的决心得到方声涛的支持，由福建省政府出资，保送东渡留学。吴石先入日本炮兵学校，继而考入日本陆军大学。他在日本六年，一家人过着清贫淡泊的生活，把节省的钱全部用来购置日本各种军事著作和有关资料。吴石是个才子，精通日语，而且英语也很好，他埋头苦读，193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35年，吴石回国，在南京任职参谋本部，兼任陆军大学教官，同时开始军事理论著述，陆续出版了《兵学辞典》、《孙子兵法简编》、《克罗则维兹兵法研究》等著作。这时期，他和父亲来往十分频密，已成莫逆之交。

抗日战争中的高参

1937年五六月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南京，父亲与代表团成员多有接触。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初步形成，叶剑英希望父亲多介绍一些朋友给他们，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父亲便把吴石、张维翰、缪秋杰（张时任立法委员，后曾为台湾监察院院长；缪时任两淮盐运使，后为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此二人均为吴石好友）等介绍给了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博古等人。吴石对日军入侵深恶痛绝，对共产党提出的“枪口对外”、“团结抗日”的主张是明确赞同的。当时蒋介石组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吴石作为军界公认的“日本通”进入大本营第二组担任副组长、代组长（组长徐祖贻未到任）兼第一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他在参谋部时即凭借多年积累的资料和研究心得，编撰了有关日本军队《作战之判断》、《海空军总动员》、《兵力番号编制》及主要将领的《蓝皮书》，此时再充实翻印，弥补了国民党对日军事情报储备的不足。八一三上海抗战的事实证明，日本侵略军的兵力组合、攻击指向，大多如《蓝皮书》所判断。

上海、南京沦陷后，大本营移武汉，第二组改为军令部第二厅，吴石任副厅长兼第一处处长。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每周都召见他，咨询日

军动态。1938年8月，第二厅在珞珈山举办了“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吴石主持并特地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去讲课。我的长兄何世庸当时就以第二十集团军上尉联络参谋的身份参加了这个训练班，亲聆了周恩来的形势报告和叶剑英讲的游击战争大课。吴石在对学员的讲话中指出，作战中的中国军队缺乏情报和保密素养，所用四字头密码早已被日军破译，这是造成战场被动的一个原因。

1938年11月下旬，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决定设桂林、天水两个行营，分别统一指挥南北两战场作战。桂林行营主任是白崇禧，参谋长是林蔚，吴石担任桂林行营参谋处处长。桂林行营辖第二、四、六、九战区，吴石以一腔抗日热忱承担了大量统筹协调筹划的幕僚任务。1939年11月末至12月初，日寇攻占南宁和地扼桂越交通线的要隘昆仑关，揭开了长达一年的桂南会战。初期，由白崇禧指挥，以第五军为主力，四个集团军配合作战，于当年12月31日收复昆仑关，取得了抗战以来攻坚战的首次胜利。在这次战役的紧张阶段，吴石白天不离地图，夜晚不离电话，连续几昼夜未曾合眼。昆仑关大捷吴石是有贡献的。随后由于日寇增兵，昆仑关再度失守。从1940年2月起，桂南作战改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吴石仍然肩负参谋重责。经过艰苦作战，1940年10月末，中国军队终于收复南宁，取得了桂南会战的胜利。吴石敏锐判断了日军撤退的动向，及时组织追击，日寇仓皇逃遁出海，使南宁及沿途地方未遭破坏，且缴获了日军大批辎重。南宁作战后，吴石升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

吴石担任第四战区参谋长长达五年。这期间，他为人正直，淡泊名利，埋头苦干，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与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他得力的助手，也博得同僚广泛的赞誉与拥戴。

在抗日战争时期，吴石也非常重视发动民众协力抗日。他在桂林时，首倡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把大批日俘组织起来，为抗日服务。他还利用同乡纽带，创建福建旅桂同乡会做桥梁，吸引了大批南洋华侨和福建青年到广西入学参军就业。他还在自己家里热情接待过闽籍爱国侨领陈嘉庚，和他共议抗日救亡、建设乡梓、培养后人的大事。应该特别指出的

是，在国民党一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挑起反共磨擦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在特务密布的12个战区中，第四战区始终保持了国共团结抗日的局面，这和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参谋长吴石、中将副参谋长陈宝仓等一批爱国高级将领坚持正义立场密切相关。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柳州时，我父亲先任桂林行营总顾问；桂林行营撤销后，又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总顾问。我在广西大学农学院读书时，常常得到吴石的关照。1944年日寇攻陷桂柳前，我和弟妹还有我的几位同学都是由他帮助安排撤离的。我大哥何世庸是地下党员，利用父亲与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的关系，隐蔽在广西盐务系统工作。桂林失陷前，大哥接到董必武“向桂东转移”的指示，特地去向吴石咨询，吴石向他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态势，指出桂东三角地带，日军兵力暂难顾及，是相对安全稳定的地区。这个分析帮助了新任桂东盐务办事处处长的大哥利用控制的5万多担存盐（战乱中每担盐市价1两黄金），放手支持桂东自卫抗战保护民主力量。后来事实证明，吴石的判断是准确的。

情报工作建奇功

吴石与父亲投缘，不仅因为思想性格相近，还因为他们都酷爱中国古典诗词书画，且都有较高的造诣。在吴石出版的《东游乙稿》一书中有一首《喜叙甫至》的七律，记述了他们1931年夏相聚于日本的情景：“羽音夕至客朝临，鸡黍微情一往深。相慰百书输此面，论交几辈得齐心。”当时吴石是日本陆军大学的留学生，父亲是到日本考察的。异国相聚，欣喜之情跃然纸上。父亲回国后，曾在家中说：“日本人要在东北挑起事端。”看来他们那时对中日局势是有议论的。在父亲画的《长江万里图》上，吴石题了四首诗词。题在三峡段的七律，首联是：“远览方知天地宽，心安蜀道未为难”。平平淡淡的诗句，凸显出深刻的哲理：人只有眼光远大才能知道天地的宽阔；只要意志坚定，心态平稳，面对蜀道也不以为难。题在武汉段的七律，回顾了他与父亲1919年过武汉的游踪，“孤心郁勃凭双剑，共济安危托一舟”，道出了他们之间“共济安危”的非同

寻常的关系。父亲在吴石50岁生日时写了一首《百字令》的长词送给他，其中一句为“收拾乾坤归腕底，吾辈固应如是”，口气很大，但这确实是他们共同的抱负。

抗战胜利后，吴石回到南京，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吴石在抗日期间就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做法不满。桂柳战役失利，身处第一线的吴石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局面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偏爱嫡系，重用刘峙之流无能败将，也让他深为不平。他受过系统的高等军事教育，却始终无缘军队的实权，这是吴石难解的心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五子登科”式的“劫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景，特别是蒋介石违背广大民众和平建国的意愿，悍然发动内战，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多次发出“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的喟叹。我父亲在爱国、抗日、反蒋这条心路上与吴石十分一致。父亲虽然胸无城府，政治上却敏感而清醒。西安事变后，他明确拥护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真诚地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内战爆发，他对蒋介石政权完全绝望，认识到，要救中国只有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他和吴石之间的交流，没有什么隐晦，这种鲜明的态度对吴石的影响是很直接的。吴石也表示，希望通过父亲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建立直接接触。

1938年，我在抗日烽火中于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敌宣传队，次年5月在重庆南开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形势和工作的需要，我和两个哥哥（大哥何世庸是延安抗大第五期的，二哥何世平是抗大第四期的）的组织关系都转至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叶剑英直接领导。叶剑英调回延安后，由董必武直接领导，直到1946年末才一起转到中共中央上海局。上海局的书记是刘晓，副书记是刘长胜，负责统战、军运工作的领导是张执一。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瑞明企业公司总经理。瑞明公司公开业务是做西药、货运等生意，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局一个核心的经济机构。1947年4月，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并宴请了吴石，父亲和我在座。这是吴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始。

此后，在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我家寓所，张执一与吴石有过多次数单独会面。俭德坊2号是一幢有围墙院落的三层西式小楼，我父母与我一

家住在一起。父亲当时是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素以交游广泛知名，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在上海解放前，主要以此为联络点，由张执一和我与吴石联系。1948年底，吴石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组织上派谢筱迺赴闽配合他工作。吴石那时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大多由他自己送来，有时则包扎好，写明由我父亲收，派他的亲信副官聂曦送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49年3月，吴石亲自到俭德坊，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我，其中有一张图比较大，是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我当时很注意地看了，使我吃惊的是，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我知道这组情报分量之重，迅即交给了张执一。关于这组情报，渡江战役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将军，曾两次向我提及。一次是在上海解放不久军地干部集会见面时，他知道我是上海地下党，高兴地对我说：“渡江战役前，我们收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了解了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的情况，这对渡江作战很有帮助。”另一次是我担任国家农业部部长以后见面时，他再次讲了类似的话，并提到准确的情报对确定渡江的主攻方位是有参考作用的。

1949年4月下旬，吴石和我父亲、妹妹何嘉（中共上海局地下党员，时为复旦大学社会系二年级学生），同机从上海飞往广州。临行前夜，我与爱人缪希霞（中共上海局地下党员，瑞明企业公司财务主任）等在霞飞路“卡弗卡斯”咖啡馆为吴石饯别。那个店有一个不大的舞池，留声机不停地播放“何日君再来”之类的歌舞曲。吴石告诉我们，他接到了催他赴榕莅职的电报，他到广州短暂停留（国民党政府已迁至广州）后，即赶赴福州。当时解放大军已首先从安徽胜利渡江，我们会心地交换了对局势的看法。他知道我将留待上海解放，今后我们很难再直接联系，不胜依惜。吴石是豪爽侠义之人，平时讷于言，当晚却心情激越。他兴奋地跳舞，还用福州乡音吟唱出那首古老的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当时只感到他心潮奔涌，此去福州，必有所为。没想到这竟是我与吴石的永别。

吴石在广州短暂停留即赴福州莅职，临行前将一包重要情报留给父亲，父亲让何世庸与何嘉送出。这组情报包括：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兵

力部署图，国民党在江南地区军队的编制、人数及装备情况以及国民党总兵力统计和总后勤方面的统计资料等，都是铅印的。何世庸借口送其妻回娘家分娩，与何嘉等，夹带着这组相当数量的情报安全到达香港。

吴石于5月初返回福州，6月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有汤恩伯、朱绍良、李以勳等出席的福州军事会议。蒋介石很想固守福州，以屏蔽台湾。吴石违反蒋的意愿，极力阻止修建福州半永久性城防工事，使大批市民免遭劳役和战俘之苦。他通过谢筱迺送出许多重要情报。谢筱迺曾深情地回忆：“吴石将军为人忠厚，亲切热诚而且学识渊博。对我这当年只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十分体贴，每星期我都到温泉路吴家一次，有时还在那儿吃饭。吴夫人也很和气，办完事，吴将军每次都亲自送我到巷口，还一再关照，万一出事要及时设法通知，好营救。在周密安排下，福州没打什么仗就解放了。吴石将军于福州解放前夕飞台湾。我们曾相约在台湾相会，后因我另有任务，未能履约。”不仅如此，吴石还极富远见地冒险将一批原定直运台湾的绝密军事档案留给了新的人民政权。这批档案原由国防部史政局保存，共500多箱。后来他将其中核心部分留下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一片丹心存青史

吴石于福州解放前夕飞往台北，就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这时，我的父亲和妹妹，按照组织意图也在台北执行任务，他们原本是准备留在台湾工作的。我二哥何世平则已经在台湾台南、高雄等地盐务机构工作三年多了，母亲与他们一家人同住。张执一这年春天还到台湾检查并安排过他的工作。但此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上海是个国际性的大都市，西方对共产党能否成功接管上海十分关注，外电包括港澳媒体的报道中出现了我的名字（我是接收上海的军管会农林处处长）。这消息传得很快，我二哥的同事已经公开散布：“何家弟兄都是共产党。”这就使何家人失去了在台湾继续工作的基础，组织上急令他们撤出。这段时间，吴石与父亲在台北接触密切，他们还以携带家人游山玩水为名进行密商。当时中

国大陆的战局已经明朗，蒋介石集团企图凭借台湾海峡固守台湾，而海空力量薄弱的人民解放军要跨海作战，来自内部的准确情报就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环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无论吴石还是我的父亲和兄妹，都相信共产党将不惜代价通过军事手段解放台湾，不会容忍国家的分裂。这样，吴石确实面临了人生重大的抉择。他虽然已经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到了台湾，海峡阻隔，基本上和共产党断了联系，他可以完全切断这种联系，安稳地在台湾做他的高官。如果选择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就必须在组织上建立更紧密的秘密联系，那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吴石恰恰作出了甘冒斧钺的选择，他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并主动接上关系，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效命。吴石的抉择是他一贯爱国思想的延续，也和我父亲的影响分不开。

此时，蒋介石的残余力量已基本集中于台湾，这个突然拥挤的岛屿变得十分敏感而危险。吴石关心朋友的安危胜于自己，他一再催促父亲赶紧离开虎口。他们经过商量，我的母亲、二哥一家和妹妹于8月末9月初由基隆乘船到广州，然后转往香港。随后，由吴石买好从台北直飞香港的机票，并亲自送我父亲到机场，看他走进了飞机。紧接着，吴石也悄然来到香港，经何嘉联系，并陪同他到港岛牛奶公司与余秉熹见面，他们单独作了长谈。事后，何嘉陪吴石渡海过九龙，吴石笑着对何嘉说：“小妹，我该给你买双鞋了，为我的事情，你的鞋都跑坏了。”吴石对我们兄妹，一向是很亲切随和的。这次吴石很快就回台北了。10月初，吴石再次来到香港。何嘉再去找余秉熹。余说：“万景光已来香港，这个事情今后由万景光负责。”（万时为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的领导人）第二天，万景光就到九龙塘沙福道李朗如（香港陈李济的老板，解放后曾任广州市副市长，他是我大哥的岳父）家来看望了我的父亲，随即由我两位哥哥和妹妹陪同万景光去见吴石。谈完话，告辞出来，万景光又命何嘉回去送送吴石。当天下午，吴石飞回台北，何嘉送他到启德机场，目送他离去。

吴石回台后，曾三次派人送情报到香港，其中两次是由他的亲信聂曦送来，一次是托我姑父的弟弟送来，都由他亲自封好，写明由我父亲亲启。1949年12月，我父母和妹妹由香港回到上海。仅仅隔了几个月，便

传来吴石在台湾遇害的消息。我父亲闻此噩耗，痛不欲生，致心脏病发作。父亲生前多次说：“吴石是为人民解放和祖国的统一牺牲的。”

吴石有一子一女留在大陆，长子吴韶成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高级经济师，是河南省冶金建材厅总经济师，河南省第六、七届人大代表。长女吴兰成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北京市第六、七、八届政协委员，还是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们长期承受外界的误解甚至迫害。“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吴韶成写信向中央申诉。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干预下，1973年吴石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吴石夫人王碧奎女士当年也牵连入狱，吴石牺牲后，经故旧多方营救才被释放，独自含辛茹苦抚养尚幼的一子一女，直到1980年5月才得以移居美国洛杉矶。翌年冬，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吴韶成、吴兰成赴美探亲，分离近40年后骨肉终获团聚。韶成兄妹带回其父在狱中秘密书写于画册背面的绝笔书。这是吴石留下的最后的笔墨。他概述了生平抱负，表达了对妻子的歉意和深深的眷恋，亦表示不忘故人对己的恩惠。想到自己的两儿两女，他写道：“余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以购书与援助戚友……所望儿辈体会余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谨守吾家清廉节俭家风，则吾意足矣。”末尾，留下一首绝笔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吴石，人如其名，他像一块巨石，坚硬、厚重、洁净，朴实无华，任湍流激荡，不改凛然身姿。

1991年12月10日，长期在周恩来总理身边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罗青长（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在接见韶成、兰成兄妹时说：“我们对你们父亲的事一直念念不忘，我当时是当事人之一。1972年接到你（指韶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申诉报告，周总理、叶帅都亲自过目

并作了批示，派人去河南专门处理此案，落实政策。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总理弥留之际，还不忘这些旧友，专门找我作过交代。你们父亲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作过很大贡献，这有利于加速军事进程，避免重大伤亡。最终他献出生命，我们是不会忘记的。”接见时，我和谢筱迺在座。罗青长为吴石烈士纪念册的题词是：“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1993年2月，王碧奎女士在美国洛杉矶逝世。1994年，吴石小女吴学成从台湾捧回了父亲的遗骨，吴石幼子吴健成从美国捧回了母亲的遗骨，国家有关部门遵照二位故人的遗愿，把他们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并由我主持举行了小范围的追悼仪式。

吴石丹心永照！吴石忠魂不朽！

（何 达 整理）

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

邢方群

每忆起陈琏，我的脑海里便呈现出多年前一个端庄、秀丽、刚毅的女青年形象。她有一双明亮清澈的大眼睛，玉脂般的皮肤，适中的身材，经常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布旗袍，一双布鞋，走起路来轻盈盈的，言谈举止，温文尔雅。从外表看来，她很像生长在江南的大家闺秀，但她的性格却是坚强的，富有反抗旧制度的精神，她的心里蕴藏着革命的烈火，充满对党对人民群众的热爱。她是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的陈布雷的女儿，更是一位外柔内刚的女战士。

背叛家庭 参加革命

我认识陈琏，是在1939年秋她考进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那时，我担任中共西南联大支部委员会组织委员。一天，支部书记袁永熙告诉我，新来了一位女同学叫陈琏，是个党员。在当时，党组织完全处于秘密状态，所有的党员虽然同属一个支部，但只有同一个党小组的同志才能在一起过组织生活。我同陈琏没有组织上的直接联系，只是在公开场合有些接触。可是袁永熙常对我谈起陈琏，说陈琏对他很热情，关心他的肺病；又说陈琏性格温和，革命热情高。我从袁永熙几次谈话中觉察到，他对陈琏颇有好感，超乎一般同志的好感。稍后，我知道她的父亲是陈布雷，是为蒋介石十分信任和器重的高级幕僚。那时，由于国民党极端腐

败，而共产党的威望日益提高，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子女背叛自己的家庭，参加共产党，投身到革命队伍，并非罕见的事，但像陈布雷这样地位很高的官员的女儿也参加革命却难能可贵。

陈琏是1939年上半年在四川合川国立二中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她到西南联大后，在同学特别是女同学中开展革命活动。当时的西南联大的群社，是党领导下的一个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群众组织。陈琏不仅自己积极参加群社的活动，还介绍周围的女同学参加。西南联大同学王民嘉说：“1939年冬天，我离家只身来到昆明遇到她，我是多么高兴啊！她是我杭州中学的同学……她很关心我，介绍我参加校内进步组织——群社举办的读书会、歌咏会、朗诵会，以及出墙报，上街宣传抗日，募捐等活动。由于对她的信赖，我兴奋地投入了这火热的生活。”

1939年9月，联大剧艺社（社员大都是群社社员）演出《阿Q正传》。党组织大力支持这次演出，通过各种关系，动员了近百人参加前后台的工作。陈琏和十几个同学担任前台招待，里里外外忙个不停，丝毫没有“小姐”的架子。她还是群声歌咏队队员，和同学们一起唱进步歌曲。

抗战时期，学生的生活很艰苦。西南联大的教室、宿舍，初期都是借昆明当地几个学校校舍或会馆，大都陈旧简陋。很多同学来自沦陷区，靠贷金维持吃饭和零用，生活也很苦。同学中也有人是富家子女，过着舒适、奢侈的生活。陈琏甘于清贫，从不打扮，衣着朴素。王民嘉对她曾赞美道：“她却是一个富有的人，她拥有巨额的精神财富，真理和理想给她身上洒满光辉。”

1940年春，中共西南联大支部改为总支，陈琏担任总支宣传委员。那时，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和以我党为主的民主进步力量之间的斗争日趋尖锐，在西南联大，以国民党、“三青团”为一方，以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群社和其他中间偏左的团体为另一方，也展开激烈的斗争。壁报宣传有斗争，话剧演出有斗争，学生会选举也有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党的总支委员会成为领导学生运动的核心，陈琏作为总支委员会的一员，付出了很多努力，做了许多工作。

皖南事变后隐蔽外地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从重庆跑到昆明，策划迫害云南的进步力量。一天，他到西南联大对全校师生讲话，扬言只要学生循规蹈矩，遵纪守法，不扰乱社会治安，国民党政府就不会逮捕。他这是向同学们进行恫吓，为将来迫害进步学生打下楔子，因为他们可以随时把“行为不轨”的罪名加到某些学生头上。西南联大的党组织，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把学校中大部分党员，特别是已经受到国民党注意的党员以及少数进步同学，先后疏散到云南各地，改名换姓，找个职业，隐蔽起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中共云南省工委让袁永熙去个旧隐蔽，并领导周围几个县的党组织。省工委的同志也动员陈琏随袁永熙去。陈琏起初有顾虑，以为与袁一同去，就必然要结婚，所以很犹豫。后袁永熙解释，同去一个地方，并不一定结为夫妻。这样，陈琏也就去了。随后，她到离个旧不远的石屏县高级师范附中教书，并改名为程国仪。过了一个多月，我也从学校里去了个旧，被派到蒙自，在蒙自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教课。我们都由袁永熙领导。暑假里，我同陈琏都到个旧度假。那时，袁永熙已去四川，行前他告诉我们，将来上级会派人来，同我们商量今后的去向。在个旧，有一个较老的党员叫孙仲宇（又名镜秋），同另一位从西南联大疏散来的党员周天行合办一份名叫《曙光报》的小报。他们住在一个大庙里，空房很多，我同陈琏还有孙仲宇的爱人杨静芬（也在蒙自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教书），也住到那里。孙仲宇、周天行、陈琏和我4名党员，自然地组成以孙仲宇为领导的党小组。为了便于掩护，陈琏称孙仲宇为表哥，我因和杨静芬同在一个学校里教书，乃以同事相称，这样国民党特务一旦来查问，我们就有了统一答复的口径，免得露出破绽。

在整个暑假里，白天，孙仲宇和周天行去办公室编报，陈琏、杨静芬和我各自在自己的房子里看书，有时帮助几名中学生补习英文，讲讲时事

政治。晚上，大家聚集在孙仲宇的房子里，谈理论，谈文艺，谈理想，谈生活，亲如一家人。

个旧地处亚热带，但因地势高，夏天并不热，是避暑的好地方。有时，陈琏、周天行和我到个旧郊外散步，会看到个旧锡矿周围许多工人像牛马一样在劳动。他们衣不蔽体，个个骨瘦如柴。据说，每到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总要死些工人，因为工人们平日根本吃不到肉，肚子里没有油水。过节时，资本家“开恩”，供应酒肉给工人吃。工人们狼吞虎咽，吃得过多，口渴了，又喝了大量凉水，结果，有些人就因暴饮暴食胀破肚子而死。有时我们正在郊外走着，忽然从红黄色的土坡上钻出一个人来，光着上身和下肢，从头到脚沾满红黄色的土，好像一个鬼怪猛然从地狱里跳出来。仔细一看，是从小土锡矿窑的坑道爬出来的挖锡矿砂的工人。那坑口直径不过1米，里面黑黑的，像一个蛇洞。锡矿工人背着矿砂，从坑口匍匐着爬出来，满身大汗，气喘吁吁。每当看到这种惨景，我们就会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陈琏拿她过去接触到的达官贵人与工人对照，曾非常激愤地说，总有一天，这些工人要成为锡矿的主人，用现代化的机器，从地下挖掘宝藏。

1941年秋，中学快开学了，陈琏要不要回石屏、我要不要回蒙自成了难题。因为那时西南联大新毕业的学生中，有些国民党“三青团”团员也到云南一些县的中学任教，我们若同他们相遇，便会暴露。当时云南尽管是地方实力派龙云的统治范围，国民党特务还不敢随意逮捕我们，但我们还是应该尽量隐蔽。恰恰就是陈琏任教的石屏中学，就有一个女“三青团”团员要去任教。于是，我们同孙仲宇、周天行商量，决定转移地方。杨静芬有个姐姐住在云南宜良县狗街子镇附近一个名叫西村的村子里，村子比较偏僻，孙仲宇让我和陈琏先到那里暂住。杨静芬姐姐家比较殷实，有一座简易的土楼房和几间平房，陈琏住在楼上，我住在楼下，吃饭在附近一个小饭铺包伙。陈琏被介绍到附近竹瓦村山竹里中学任教，我则等待机会到外地工作。事不凑巧，陈琏到那所中学教了几天课，便发现一个西南联大的“三青团”团员也到了该校，陈琏赶紧找个借口，辞了职。这期间，我们除了读书之外，不能从事别的工作。我们随身带来

一些马列著作，两人分头看，有时交换读书心得。

一天傍晚，我们漫步田边，不知怎的走进一个土埂圈成的大水塘边，土埂上长满了人头高的仙人掌，水塘边盛开各种颜色的鲜花，晚霞倒映在清澈的水塘里，如同彩绸，与周围的五彩缤纷的鲜花相辉映，真有如仙境。陈琏置身在这美丽的境界里，兴奋得容光焕发，连声赞叹。可是现实总归是现实，在旧社会，人世间哪里有什么仙境！陈琏说：“自然虽美，可是这社会却十分丑恶。让我们同广大革命者用斗争来缔造人间仙境吧！”就在往回走的路上，在距我们几百米处突然啪的响了一枪，随之一颗子弹打进离我们不到3米远的水田中。很可能是坏人向我们打黑枪，这等于警告我们，随时要提高警惕。

“傻瓜！”——“一个圣人！”

一天，我们忽然看到云南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寻人启事，寻找“怜儿”。大意是：怜儿快快回家，家长很思念。陈琏看后，戚然地笑了笑，说这是她父亲在寻找她。我问她，为什么叫怜儿？生长在你这样高级官员人家有什么可怜的？陈琏告诉我关于她出生后的一段遭际。陈琏的父亲陈布雷与陈琏的生母杨品仙（又名宏农）于1909年结婚。婚后夫妇感情极好。1919年，杨品仙在家乡浙江慈溪叶家站官桥家中生下了陈琏，可产后不久即病故。陈布雷痛悼爱妻之死，并将爱妻之死迁怒于刚出生的陈琏。一天，他独自一人在楼上，发疯一样把哇哇大哭的陈琏拎起来要往痰盂里塞，想把她溺死。家里人听到陈琏哭声异常，急忙冲进房内，只见陈布雷又疯狂地把孩子往窗外扔，幸而窗外有篾棚架子，把襁褓中的陈琏托住。家里人急忙跑下楼把她从棚架上抱下来，之后由外祖母抚养，怜儿的名字由此而来。我曾问陈琏：你后来背叛了家庭，参加革命，是否与当年你父亲曾这样残忍对待你有关？她说不是。

抗战开始不久，陈琏正在杭州高中读书，国家与民族的苦难，使她不能平静地生活下去，她与同学们一起参加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1938年，她进了设在四川合川县的国立第二中学。那里的学生大多是从沦陷

区来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相当热烈，她也成了其中的积极分子。她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和报刊，认识到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而不是她父亲为之效劳的国民党。1939年，她参加了共产党，走上和她父亲截然相反的道路。陈琏每谈到她父亲时，总是十分不满他的政治立场，但又多少流露出父女之情。她说，在政治上，她父亲是站在反动派的一边，但他的为人是廉洁的、正派的。在重庆时，陈布雷只靠着薪金生活，绝不以权谋私。在物价飞涨的日子，生活过得相当拮据。宋美龄为了讨好和拉拢陈布雷，曾暗地派人量了陈布雷衣衫的尺寸，然后叫裁缝做成衣服送给他，有时还送些别的礼物。

我又问陈琏，在一般人看来，像你这样的大小姐，自幼生活优裕，应该感到很幸福了，但你居然抛弃这些，参加被国民党反动派处心积虑要斩尽杀绝的共产党，前途充满荆棘，随时都可能牺牲生命，思想上是否经过激烈斗争？她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拿出一本日记，打开扉页，递给了我。我接过一看，上面有她用娟秀的字体抄录的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诗——《门槛》。这里我摘引一部分：

我看见一所巨大的建筑。

正面的一道窄门大敞着。门里面阴森昏暗。高高的门槛前面站着一个女郎……一个俄罗斯的女郎。

这望不穿的昏暗发散着寒气，而随着冷气从建筑的深处还传出一个缓慢的、重浊的声音。

“啊，你想跨进这门槛来做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

“我知道。”女郎这样回答。

“和人疏远，完全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不仅是你的敌人，而且你的亲戚，你的朋友都给你这些痛苦，这些打击。”

“是……便是他们给我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准备着牺牲吗？”

“是。”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毁掉，甚至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也不要怜悯，我也不要声名。”

……

“进来吧！”

女郎跨进了门槛。一幅厚的帘子立刻放了下来。

“傻瓜！”有人在后边这样嘲骂。

“一个圣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这个回答。

看完陈珽抄的诗，我陷入沉思。屠格涅夫所处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当然不同，对革命斗争前途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但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参加共产党，投身革命，确实要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确实要具有与家庭、亲属疏远甚至被一些人讥笑的心理准备，确实要冒着忍饥受冻、蹲监狱、上刑场的种种困苦和危险。在有些人看来，这些共产党人的确是“傻瓜”，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千千万万个“傻瓜”，中国将永远是阴森黑暗，国家将永远是人间地狱。我抬起头来再望望陈珽，觉得她的形象很高大，恍如法国女英雄贞德，又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

我们在村子里住了三个月，中共云南省青委一直没有来人，而我们又不能长期住在这里，因为左邻右舍都是农民，只有我和陈珽是外来的知识分子，短期居住，可以对乡亲们说来临时休养，住长了，难免引起各种猜疑。正当我们不知如何是好时，孙仲宇来看我们。我们一起商量，认为应当离开这村子，乃决定我先走，陈珽稍后走。这样，就在11月下旬，我在车站同陈珽握别。

蜜月刚过被捕入狱

抗战后期，我几经辗转来到北平。我和陈琏天各一方，不通音讯。抗战胜利不久，我先知道袁永熙又回到昆明，并从他那里得悉陈琏在重庆，我们通了信，彼此在信中抒发着兴奋与快乐之情。1946年夏，原先在西南联大读过书的党员有不少人来到北平，袁永熙也来了，而陈琏则随着家人去了南京。之后，她又从南京来到北平，到北平时没地方住，而那时我和两名同志住在一座大宅院里，陈琏便临时住在我们那里。久别重聚，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陈琏告诉我，我们在宜良狗街子握别后，她接到组织指示，从云南去重庆，住在她父亲家里，并就读于中央大学。在重庆，她利用她父亲的关系，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并同南方局的邓颖超、钱瑛同志有了联系。

陈琏来北平不久，就到贝满女中任教。曾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李炳泉，也从后方来到北平。袁永熙叫我同陈琏、李炳泉组成职业青年支部，由我做负责人，由他直接领导。陈琏在贝满女中团结了一些教员和学生，组织读书会，做了不少宣传教育工作。有几个参加读书会的学生，后来参加了民主青年同盟，成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

1947年夏，袁永熙与陈琏结婚，婚礼在六国饭店举行。他们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好事多磨，袁永熙与陈琏结婚刚过一个多月，便遭遇不幸。9月24日晚，临近中秋节，我同陈琏在她家里开支委会，袁永熙参加，李炳泉因事请假没来。我同袁永熙、陈琏谈到晚上9点多钟，想告辞回家。陈琏说，再谈一会儿，窗外月亮很亮，晚点走没关系。我于是又坐下。就在10点左右，忽然外面有叩门声。袁永熙走出房子，穿过院子，前去问叩门者是谁。来人说是李宗仁行辕派来的，要见袁永熙。袁没开门，马上回来，叫陈琏去对叩门人说，袁永熙患感冒，已上床休息了，请他们明天再来。陈琏出去后很快又回来，说有危险，来人一定要见。我们感到形势危急，袁永熙立刻把《民主青年同盟章程》扔到衣橱顶上，我也把口

袋里装的几份章程也扔上去。这时闯进几个大汉，端着手枪，喊了声“不许动”，随后问谁叫袁永熙？谁叫陈琏？然后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来干什么的？”我报了自己的姓名，说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那时我又回到大学，做学生工作）。特务叫我到门外站着，由两个特务看守，其他人搜查袁永熙的家。袁永熙提出抗议，特务不予理睬。忽然，一个特务嚷道，找到了共产党的文件，也就是我们扔到衣橱上面的《民主青年同盟章程》。过了有一个多钟头，特务们再没搜到什么东西，便叫袁永熙和陈琏上汽车，说到行辕去一趟，也叫我跟着上车。我说我明天还要上课，不能随他们去。特务们强行让我上车。正在往门口走的时候，特务们又从另外一个房间搜出藏在那里的清华大学党支部负责人陈彰远。袁永熙告诉特务说，这个同学刚毕业，来托我们介绍工作。因为我们正在开会，就请他在另外房间等着。接着，陈琏机智地从屋里拿出一件毛背心和20元钱交给陈彰远，说先拿去用，好像陈真是生活困难来找工作似的。但是特务不予理睬，由两个特务押着袁永熙和陈琏，另两个特务押着陈彰远和我，分乘两辆汽车，送到炮局监狱。之后，特务们派人在袁永熙家守着，有人来找袁永熙或陈琏，便加以逮捕，押送到监狱。先后被捕的有北京大学的吴谟、力易周，燕京大学的龚理康。

在狱中，有一天，特务把我从囚房里带到一个阴暗的房间。几个特务已坐在那里，眼瞪着我。一个特务审问我，我尽量编造一些假话。例如，说到陈琏家来，是因为快要从北京大学毕业了想找陈琏请他父亲陈布雷为我介绍一份工作等等。当时，我很庆幸自己做了一件机警的事，在特务押着我乘车去监狱的路上，我发现我裤子的后兜里装着一个本小本子，里面记着许多朋友和同志的通讯地址。我想，这个小本子无论如何不能让特务搜去，否则会牵连不少人。我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办法，在黑暗中，我悄悄地把右手伸进后兜，掏出小本子，塞进汽车软座的下面，这才放下了心。不料，在受审时，一个特务突然拿出一张名单，问是不是我写的？我一看，是袁永熙与陈琏结婚时，我同十几个朋友共同出钱买了一套《鲁迅全集》，由我开了个单子夹在书里交给陈琏。这次被特务从《鲁迅全集》里翻了出来。我心里思忖，绝不能承认这单子是我写的，如果承

认了，就必定承认认识单子上开列的朋友，那样问题就大了，会牵连不少同志。我于是心一横，回答说，单子不是我开的，单子上那些人我也不认识。特务问，那你怎么参加送礼的？我说，我本来想到六国饭店送几元礼金，一进门却被人拉着参加集体送礼，我就把钱交给他了。至于那个人是谁，因为时间仓促，而且人很拥挤，我没有注意。特务喝一声：“狡辩！押下去！”我以为要去受刑，但被带回囚室。我们被捕后，北平几所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广大学生，联合向国民党当局抗议，要求北大校长胡适向国民党当局交涉释放我们，否则就要罢课。国民党迫不得已把我们释放了，而袁永熙和陈琏却没能出来。之后，他们在12月1日被特务用飞机押送到南京，关在监狱里。我出狱不久，即去解放区，在河北平山县和中央青委的一些同志参加土改。从此，我同陈琏又失去了联系。

一唱雄鸡天下白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我随中央青委的同志回到北平。不久，袁永熙和陈琏也由中共上海市委派人秘密护送到解放区，又辗转来到北平。他们是在1948年先后被陈布雷保释出狱的。团中央成立后，袁永熙在学校工作部，陈琏在少年儿童部，我在宣传部，我们又一次聚集在了一起。我和陈琏、袁永熙几次分离，几次重聚，我们之间的革命友谊更加深了。

有一天，我问陈琏，1947年特务们到底为什么去逮捕你们？在狱中有些什么遭遇？陈琏说，贝满女中有一个教员叫田冲，曾到她家里拜访，同袁永熙交换了名片。后来田冲因党的地下电台一个报务员叛变而被捕。特务从田冲家里搜出袁永熙的名片，而田冲曾供认领导他的是袁某，于是特务认为袁某就是袁永熙。田冲又胡说了一些不真实的情节，牵连了陈琏和袁永熙，于是他们就被捕了。在狱中，特务对陈琏诱供说：“你丈夫已招认了，你快坦白，可以从宽处理。”又对袁永熙说：“你太太已交代了，你快老实交代，不然没有好下场。”他们两人根本不予理睬。特务对

袁永熙施以酷刑，还把陈琏拉到审讯室门口，要她规劝袁永熙。陈琏坚定地说：“他根本没有任何问题，我劝他什么！”由于他们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特务们无法确定他们的政治身份，也知道他们和党的地下电台没有关系，但也不敢释放他们，便把他们押解到南京。之后，陈布雷得知女儿和女婿是这一情况，便把他们保出了监狱。

1956年，陈琏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此之前和以后又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全国妇联第四届委员。1956年2月，陈琏在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上作了发言，她针对当时有一些出身剥削阶级的知识青年为自己出身感到苦恼和悲观的情况，以现身说法，帮助这些青年卸掉思想包袱。她说：“也许在座有的同志是知道的，我是陈布雷的女儿。在十几年前，我也是一个怀抱着热情和苦闷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求抗日救亡的途径，我找到了共产党。党把我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社会解放的前途，我的苦闷消失了……从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我深深地感觉到：正是因为党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依归的，因此，她对于一切有爱国热情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都是欢迎和爱护的……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生之地，但是我们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只要我们认对了方向，而且肯干努力，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都是具有宽广的道路和远大的前程的。”她的发言受到周恩来同志的称赞，《人民日报》也摘要刊登，对不少青年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963年，周总理应中国青年杂志社的请求，前来参加杂志创刊40周年纪念会。我当时任中国青年杂志社总编辑，陪同周总理参观杂志社举办的展览。当周总理知道我和陈琏是同学时，询问陈琏现在在哪里，做什么工作。

遗憾的是，在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的年代里，一个人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发生不幸。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袁永熙被错划为“右派”，他们的家庭破裂了。以后，袁永熙被分配到河北省南宫县一所中学任教，陈琏带着3个孩子一起生活。她一如往昔，积极从事少年先锋队的工作。1959年，陈琏向团中央领导提出，要到农村劳动锻炼。领导考虑她走后孩子无人照管，劝她不要去，但陈琏的态度很坚决。她的大孩

子、第二个孩子都已上小学，有点儿生活能力，唯独第三个孩子名叫小代，还在上幼儿园，周末回家没有人照管，陈琏有些为难。我同我爱人商量，愿意帮她照顾孩子，这样她才放心地到河北涿县一个农村去锻炼。她在村子里同农民一起劳动，还协助村干部开展工作，很少回京看孩子，偶尔回来，也是住上两三天又赶回农村。我爱人对我说，陈琏真是个坚强的人，若是别人，一般是不肯舍下3个孩子去农村的。陈琏在农村锻炼了一年，组织上叫她回京，她才回来。1960年，陈琏被调到林业部任教育司副司长，但工作并不顺手，时常同我说她想离开这个岗位。后来，团中央书记处一位书记调任华东局任组织部部长，1962年，陈琏也到华东局做宣传工作。以后，我每次出差路经上海，总要抽空去看陈琏。她住在泰兴大楼第11层，生活过得很俭朴。她仍然那样端庄恬静，但脸上有了几道皱纹，头发添了些许银丝。我知道她是怎样生活过来的。我到她家里去，只看到她的两个儿子，见不到她的女儿必泓。我问她必泓到哪里去了？她说，到松江县松江中学读书，住校，不常回家。我奇怪，为什么不把大孩子留在身边帮助照顾两个弟弟呢？她说，到松江，可以使女儿和农民出身的学生生活在一起，学习农民的吃苦耐劳精神。她对自己要求很严，对孩子要求也很严。

不白之冤得昭雪

“文化大革命”前夕，陈琏来北京参加一个会，我们又见了面，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她感到一场暴风雨就要来到，但她很难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她问我，我同样也陷于迷惘之中。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是搞报刊工作的，在劫难逃，就同所有熟人断绝了来往，也得不到关于陈琏的消息。后来，华东局造反组织派人向我调查陈琏的情况，我知道陈琏的处境也不好。但可惜的是，一个在中学时代就舍弃了国民党高级官员家庭的优越生活，毅然投身到革命队伍的党的好女儿，一个在革命道路上经历种种艰辛但始终意志坚定地为之奋斗不息的无产阶级战士，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被加上种种罪名，戴上叛徒

帽子，被迫害致死。

陈璉去世时，3个孩子都未成年，一下子失去了母亲，无依无靠，流离失所，后来分别到吉林和云南农村插队。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新中国崭新的一页。在邓颖超和其他老同志的关注下，上海市委宣传部于1979年3月21日为陈璉举行了追悼会。胡耀邦作为共青团中央原第一书记、陈璉的老领导，给陈璉送了花圈。悼词说：“陈璉同志几十年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献出了毕生的精力。”还说：

“1947年9月，由于北平我党地下电台被敌人破坏牵连被捕，陈璉机智地掩护了同志。在狱中坚定不移，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没有泄露党的机密。”陈璉蒙受的不白之冤，终于得到昭雪。她的3个孩子，在党的培养下，都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继承了母亲的遗志，为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工作。

死者已矣，不能复生。但这样一位毅然抛弃优越的生活、敢于走上革命道路的女性，是永远值得纪念和怀念的。

丰碑直矗千里外

——怀念亲爱的战友和伴侣李湘

安淑静

整理者按：位于朝鲜平壤的朝中友谊塔内，珍藏着10本精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名录》，《名录》第一册第一名就是被聂荣臻元帅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年优秀将领的李湘。朝鲜战争爆发后，李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七军军长。在历次战斗中，由于他指挥得当，歼灭了大量的敌人，特别是在1951年10月中旬志愿军战史上有名的金城南阻击战中，李湘指挥部队依托阵地顽强阻击，创造了3天歼敌1.7万余人的赫赫战果。后来由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丧心病狂地对志愿军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导致李湘败血症和脑膜炎并发，壮烈殉国。2010年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整理者采访了李湘的遗孀安淑静女士，以纪念当年那些为保家卫国而浴血奋战的最可爱的人。

刻骨铭心的记忆：坟茔前的新婚照

我是13岁参加革命的，1945年冬调到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机关做共青团的工作。1946年10月随机关从张家口撤出后，转移到唐县一带，住在唐县南深安村，担负着配合唐县县委查租查息的任务。这期间，李湘率第十一旅也驻训唐县。原本李湘和我互不相识，是唐县县委书记唐振华，

还有第四纵队三十二团团团长马卫华等人向我介绍的李湘，希望我们常联系，多聊聊，培养感情，结为革命伴侣。同时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也出面保媒，做我的工作。

其实，我对李湘早有耳闻，知道他机智勇敢，是位善打硬仗、恶仗的年轻指挥员。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知道了李湘不仅善于用兵，还很会带兵，知道他关心体贴部属，视他们为亲兄弟，更为重要的是李湘不仅爱兵，而且爱民。就在我俩认识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出动飞机疯狂轰炸和扫射唐县县城，当时西关正值集市，老百姓受伤的很多。驻在离县城百多里外的李湘得知后，马上组织医务人员连夜前往抢救受伤的乡亲们。他还同县委书记、县长一起看望、慰问受伤的群众，这给唐县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对李湘的爱慕之心。生活中的李湘是一个活泼、风趣的人。一次，旅里的几位领导工作闲暇聊天，有人问旅长李湘：“好久没看到安淑静了，她到哪儿去了？”他笑答：“她呀，让王母娘娘请到天宫里去了……”旅政委张明河说：“你还不赶紧向土地爷要人！”他装作一本正经地回答：“是不是你想发挥自己的特长，打算帮我这个忙啊？”还有一次，李湘当着众人的面交给我一个纸团，并说：“送你一件礼物。”我展开纸团后，看到上面胡乱涂鸦着层层叠叠、七缠八绕的圆圈圈，自然是大惑不解。李湘说：“这是我送给你的线团嘛！”逗得众人哈哈大笑。

1947年2月7日，我与李湘结婚。婚后第二天，李湘便把我带到定县城郊的一片树林里。映入我眼帘的是树下的20几座新坟。李湘告诉我，那一座座新坟，埋葬的就是第十一旅为解放定县而英勇牺牲的指战员……李湘拉着我的手坐在一个土坎上，并以烈士们的坟莹为背景，让宣传干事为我们拍摄了婚后第一张合影。我明白李湘这么做，是想告诉我，要做好他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思想准备。于是我对李湘说：“我知道，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但我宁愿做英雄的寡妇，也不做懦夫的妻子！”话虽如此，可也正是李湘此举，使我日后平添了对李湘的无尽担心和牵挂，特别是每当李湘率队出征之时。60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张有着特殊意义的新婚合影。当年李湘那不同寻常的举动，给我留下了终生的、刻骨铭

心的记忆！

婚后第三天，即1947年2月10日，李湘奉命率第十一旅暂调归第二纵队指挥，参加保（定）北作战。15日，李湘率部在宝塔铺地区担任阻击固城增援徐水之敌的任务。国民党军在飞机、坦克和装甲车配合下向第十一旅发起多次冲击，李湘亲临前沿指挥，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李湘常常跟我讲述自己参加过的一次次战斗和战役：他身上负过十几处伤，在红军长征经过大渡河的时候，因为腿和手都有伤，几乎是爬过去的；他也经常会为部队打了胜仗而高兴；他最关心部队的伤亡情况，即便敌人的损失是自己的多少倍，他也会为部属的伤亡而痛心、自责，并常常为此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和许许多多革命者一样，李湘抛家弃舍、辞别亲人，少年时期便投身革命、行军打仗，假若没有誓死的追求和坚强的意志，这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李湘既然是一个普通人，自然也会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他不但爱惜部队、体恤部属，同时也关爱妻子和儿女，更牵挂年迈的母亲。但直到1949年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整个南方接近解放时，李湘才派一名警卫员去找他那分别了20几年的老母亲。警卫员来到江西，找了十几天，终于在井冈山下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李湘75岁的老母亲。这位老人，在白色恐怖下，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当时，老人身上披着打满补丁的麻袋片，炕上只有一堆稻草用来御寒，半个破锅做饭，警卫员看到这样的情景哭了，背着老人投奔了部队。1950年，李湘听到朝鲜的形势紧张，在年初就让妈妈回去，此时他们母子俩才刚刚团聚两个月。临别前，妈妈对李湘说：“儿子，我还没有和你说完话呢……”说着说着，老人家哽咽了，眼里噙着泪花。老母亲回去后，我们时常给她寄生活费和物品。从李湘赴朝后，我按时给老妈妈寄钱物，在李湘不幸逝世后也没有间断，一直到老妈妈去世。

1949年3月，即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不久，华北军区将李湘这个战斗里成长起来的优秀指挥员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事政治大学（简称华北军大）深造。由于文化水平的提高，增强了李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他很快具备了从游击战到联合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才能。这在以后

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得到充分证明。1950年8月，华北军大结业后，李湘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同年11月，他被任命为六十七军代军长兼唐（山）、秦（皇岛）警备区司令员。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进行干涉，并将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的新生活受到了严重威胁。李湘的胸中燃起了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他积极响应党和祖国的召唤，随时准备赴朝作战。1951年春节前，李湘参加了第二十兵团在天津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接受了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任务。

1951年3月20日，李湘义无反顾地走上抗美援朝的最前线。当时，我正住在医院里，我们的小女儿刚刚出生不久。出发前两小时，他才到医院告诉我这个消息。他仅仅在医院待了大约15分钟，深情地端详着我和襁褓中的女儿，兴奋地说：“我们有了儿子，又有了女儿，我们是一对美满的夫妻，我去保卫祖国，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带好孩子。”我内心有好多话想对他说，可没等我说出口，他便匆忙离去了。他出征后，我时时刻刻盼着他的来信和胜利归来，但万万没有想到这匆匆的离别竟成为我与李湘今生的诀别。

在入朝前的1951年春节，二〇〇师师长李雪瑞来我们家拜年。当听说二〇〇师有一个干部犯了错误时，李湘对李雪瑞说：“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军官，一不要贪权，不要争权夺势，要互相信赖，互相帮助；二不要贪财，总想多吃多占，看财物眼红，特别是战利品，不能随便拿；三不要贪色，见了漂亮女人就追人家，拉拉扯扯。军队一定要在入朝前开展一次思想品德和纪律教育。”

1951年12月，李湘曾从朝鲜前线给我写来一封信，其中几句话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也是我一直所遵循的。他说：“我们在朝鲜虽然很苦，但是很愉快，因为这是为了祖国。你在国内要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带好孩子。你一定不要和别人比享受，比安逸，要和别人比艰苦奋斗，比工作成绩，比奉献。千万别忘了我们是革命夫妻……”他还不断来信嘱咐我要努力工作，教育好子女。1952年，他在牺牲前两天从朝鲜前线寄来的信

里说：希望你在祖国努力工作，很好学习，要和别人比工作成绩，不要和别人比享受，贪安逸，要教育孩子从小养成吃苦耐劳的好习惯……（李湘为国捐躯时，安淑静才24岁，此后她独自一人把一双儿女养大。已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袖金日成曾经对安淑静说：“你用青春抚育了一双儿女，你也是伟大的！”）

志愿军战史上以少胜多的有名战例： 金城南阻击战

入朝后，李湘立即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请示工作，接受任务。他不顾疲劳，连续工作，认真贯彻上级意图，同时到朝鲜人民军、到兄弟部队、到地方调查了解情况，悉心研究敌我态势，认真汲取群众智慧和兄弟部队作战经验。在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的陪同下，李湘反复、认真地察看地形，了解、熟悉准备接防地区的各方面情况。朝鲜人民军派一位师参谋长到第六十七军帮助工作，李湘处处以诚相待，虚心听取他的意见，与他一道分析情况，考虑对策，切实做到知己知彼，以求在最短的时间适应出国作战的要求。

跟随李湘多年的警卫员刘志民对李湘的工作作风和作战指挥特点感触颇深，他说：李军长工作扎实、稳健，而且善于调查研究，观察分析，每次战斗他都亲临第一线，掌握第一手材料。情况明确后速下决心，力求做到战则胜。就是在战斗打响后他也经常去前沿阵地进行指挥。原第六十七军二〇〇师五八九团政委王金泉、六〇〇团团团长刘政等回忆，面对错综复杂的战场形势，李军长“临危不乱，当机立断，心细灵活，以少胜多”，体现出了良好的军事素质和过人的指挥才能。

1951年8月31日，第六十七军正式接防金城以南地区沿三八线24公里的正面防务。敌军的“夏季攻势”正处强弩之末，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抗击，致敌损失惨重。激战关头，北汉江桥被毁，前线粮食供应不上，李湘等军领导带头将吃粮标准降至每日4两，辅以野菜充饥，用实际行动鼓舞士气。9月21日，美军向第六十七军阵地发起以步兵、飞机、大炮、坦克同

时进攻，进行所谓“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的立体攻坚战，李湘沉着应敌，指挥部队勇猛回击，歼敌1000余人。

五次战役后，敌我形成对峙。不少指战员反映：“出国打仗，反而在战壕里蹲起来了。”表现出急躁的反攻复仇情绪，纷纷要求进行运动防御和战役出击。李湘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情绪对长期防御的作战思想极为不利。他与军党委成员认真交换意见后，在党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急躁情绪和单纯出击的狭隘性、短见性和危害性，重申总部作战方针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有力地教育干部战士，统一了认识，为粉碎敌人更疯狂的“秋季攻势”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51年10月13日，第六十七军正面迎来敌4个整师和众多火炮、坦克、飞机支持的最猛烈的“秋季攻势”。每次攻击，美伪军先施以密集炮火，再在飞机低空轰炸的配合下，以坦克为先导，以强志愿军3倍至10倍的兵力轮番上阵。李湘以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无畏的英雄气概，指挥部队依托阵地顽强阻击，创造了3天歼敌1.7万余人的赫赫战果。胜利完成阻击任务后，李湘认为继续坚持下去只会增加志愿军无谓的伤亡，因此力排众议，果断下令阵地上两个师的部队撤退。果然，敌军当晚对志愿军阵地发动猛烈攻击，此时志愿军已安全转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24天连续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歼敌3.7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40架，击毁坦克、装甲车13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和作战物资。这便是志愿军战史上有名的金城南阻击战。此役，志愿军挫败敌人，巩固阵地，创造了正面迎敌，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与李湘一起并肩作战的第六十七军政委旷伏兆曾回忆说：

在长时间的阻击战中，李湘同志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他真正做到缜密详尽地分析敌我情况，认真细致地研究上级命令并坚决执行。朝鲜战场自五次战役以后，转入敌我对峙，阵线巩固的情况，阵地得失的意义加大了。当时部队中运动防御及准备进行战役出击的思想还很普遍，而固守当前阵地，较长期的防御作战的思想尚未完全树立，对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贯彻与接受较

差。这种思想的存在将会直接影响今后的作战。李湘同志经过几次战斗后，在上级指示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就迅速地认识到这一思想问题的解决，是打好仗的关键。因而在我军去年（1951年——整理者注）9月21日召开的军党委扩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以无可争辩的、明确的论点教育干部，从而统一了战术思想，为粉碎敌人“秋季攻势”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这个问题的解决在我军军事建设上，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去年秋季敌人发动了攻势，以4个师的兵力向我24公里宽的正面大举进犯。在这些时日里，李湘同志充分表现了他固有的坚毅沉着的军事素养。在最艰苦的战斗中，他从不惊慌，从不叫苦，顽强地进行指挥。十多天中夜以继日，很少休息，坚持在作战室里工作。嗓子喊哑了，他还是不间断地用电话指挥；时常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情况，电话一直通到一线营部。在他正确的指挥下，我军终于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获得了极大的胜利。战斗下来以后，李湘同志消瘦了，体重减了五六公斤，三个月以后才逐渐地恢复过来。但就在战斗刚刚结束以后，李湘同志立即以充沛的精力，刻苦钻研：他一方面随时在会议、汇报和谈话中，搜集材料，总结作战经验；另一方面又努力学习苏联和我军的军事理论书籍。他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不久以后，就在同志们的协助下，作出了此次粉碎敌人“秋季攻势”的军事总结。这一总结已被上级和全军干部认为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文献，对部队的教育作用是很大的。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参谋长的萧文玖详细回忆了整个战役：

敌人在发动秋季攻势之前，为试探第六十七军的战斗力，并进行所谓“特种混合支队的作战实验”，9月12日，美第七师一个营和南朝鲜第二师两个营加两个连的兵力，在70余辆坦克及10余架飞机的配合下，向志愿军第二〇〇师第五九九团正面的几个前

沿阵地发动强攻，被我坚决打退。此后，几乎每天都有两个连到一个营的敌人兵力，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向我进攻。9月21日，敌人进行了所谓“特种混合支队的作战试验”，由8个步兵营组成，集中了各种优势装备，其中有10多架飞机，70多辆坦克，100多门大炮，并使用先进的电子通信技术，将制空权和地面的先进技术装备配合一起，组成立体战争，与破坏志愿军后方交通运输线为主要战略目标的空中“绞杀战”遥相呼应。第六十七军顽强抗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9月29日，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经过充分准备，发起了“秋季攻势”。

10月13日凌晨3时，美第九军指挥美第七师、第二十四师、南朝鲜军第二师、第六师及哥伦比亚营，在14个炮兵营、200多辆坦克、10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从北汉江以西，向我金城以南的第六十七军24公里宽的正面阵地发动进攻，进攻特点与美第十军进攻第六十八军时基本相同，都是大量使用集群坦克和大炮。

敌炮兵对我第六十七军前沿主要支撑点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火力袭击后，5时30分，其17个步兵营以密集的队形，若无其事地向我军阵地拥来，有的还敲着鼓吹着号。我认为这是敌人的精神战术。李湘同志抓起电话命令一线部队：“沉住气，要把敌人放到有效杀伤距离，再狠狠打！”骄横的敌人继续向我阵地推进，满以为他们两个半小时的炮火已经奏效。当敌人进到距我前沿阵地三四十米时，我军各种武器同时开火，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当即死伤一大片，活着的赶忙夺路而逃。根据该军当天晚上统计，这一天共毙伤敌人5000多，我军伤亡1400多人。

第二天，敌人又在炮火准备后，以27个步兵营，在近百辆坦克配合下，于5时开始对我第六十七军的一线部队发起进攻，均被击退。第五九八团七连守卫在632.5高地上，敌人在一天中就对该高地发射炮弹3万余发。美军的两个步兵营在20多辆坦克支援下，向该高地轮番进攻，七连的指战员们毫不畏惧，坚决抗击，

前赴后继，击毙敌人500余人。

阻击战一直打到17日。这天，美军第七师，经“卷地毯”式的火力袭击后，步兵在坦克支援下，对第六十七军全线一次又一次进攻，夺占了我军几个山头。兵团将预备队第二〇二师（欠一个团）调给了第六十七军，作为该军的预备队，加强阵地防守。敌人于17日后由全线进攻改为重点进攻。

第六十七军在金城川以南有块阵地突出到敌人阵地中间，三面受敌，大家都称这块阵地像个椅子圈，由第五九八团第三营防守。敌人把这块阵地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美军第七师虽对该阵地进行了多次攻击，不但没有攻下，而且损失惨重，逼得不得不于当天撤退到第二线喘息休整。新换上来的敌军，对该阵地采取了正面进攻和迂回包围相结合的战术，分别从三面对该阵地进行了多次进攻，未能越雷池一步。该营在5天中以伤亡600人的代价歼敌4000余人。敌人仍不死心，要以血本夺取这块阵地。面对这一情况，该军首长和我研究，是守还是撤，意见不统一。李湘同志认为我军的这块阵地，已经有效地迟滞了敌人的进攻速度，并以小的代价歼灭了几倍于我的敌人。再守下去，伤亡会增加，现在看，就是失去这块阵地也无关大局，不会影响整个防御体系。我也同意他的意见，但有的领导同志不同意撤出。于是我带着两个意见，当夜回到兵团向杨成武司令员作了详细的汇报。他立即给李湘打电话，命令坚守在椅子圈阵地上的部队于当夜撤出现有阵地，转至金城川以北地区组织新的防御。

第六十七军第一九九师和第二〇〇师面对敌人立体进攻，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守住了阵地。在反击中，战士们说，美国兵是靠炮弹站岗，一旦飞机大炮停止轰炸，步兵进攻的锐气马上就减下来，近战夜战美军甚至不如南朝鲜军。我们的反击挫败了敌人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坚守前沿的部队树立了战胜敌人的信心。这次反击敌人的夏秋季攻势，是二十兵团入朝后进行的第一轮作战，也是转向现代条件下作战的开始。

金城南阻击战一直打到10月22日才停止。10天中，敌人虽向前推进了6至7公里，占领我兵团正面132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付出了巨大代价。第六十七军共毙伤敌2.6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26架，击毁坦克100多辆。我军伤亡1万余人。

敌人的“秋季攻势”被粉碎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叫苦不迭地讥讽说：“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20年光景才能打到鸭绿江边。”

10月16日，志愿军首长致电表扬第六十七军，在两次防御作战中表现英勇顽强，虽然自己伤亡较大，但杀伤敌人更多，使敌人攻势逐渐减弱，证明该军在战术上、工事构筑上均有显著进步，望继续努力，彻底粉碎敌之所谓秋季攻势。

美方付出了重大伤亡，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10月25日，“联合国军”重新提出和谈，中断了两个多月的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复会。

金城南阻击战后，为了表彰李湘在金城南阻击战中的突出贡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特授予他自由独立二级勋章一枚。为此，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还于1951年10月25日致信李湘：“你在抗美援朝打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建立了光荣伟大的功勋，这一功勋，朝鲜人民将永世不忘，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莫不表示崇高的敬意。”

金城南战斗结束后不久，李湘即着手作战总结，最终完成题为《目前防御作战中的几个战术问题》的长篇论述。《目前防御作战中的几个战术问题》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高度评价，并由志愿军总部转发全军，成为志愿军战史的重要文献。他在文章中充分论证积极防御的指导思想、兵力部署、火力使用、反战车问题、工事构筑问题、战术手段问题、指挥方法问题。同时，明确指出：此次阻击作战，师、团二梯队配置较远，未能重视二线工事构筑，造成被动；有组织反击100次，少数准备不足造成失利；53次伏击中，个别由于地形选择不当，火候掌握不佳等原因未获

成功。同时他还检讨了自己稍早地使用军预备队，导致未能在大量杀敌的同时，缴获更多的武器装备。

优秀的青年将领：丰碑直矗千里外

1952年春，志愿军总部命令第六十七军在剑布里东线构筑新的防御工事，准备迎击敌军发动的“春季攻势”。受命后，李湘带领作战参谋及军领导机关干部多次深入前沿侦察地形，制定作战方案，由于他工作深入，实事求是，认真吸取广大官兵的智慧，使坑道和工事的构筑完全符合实战要求。

然而就在美军发动攻势前夕，李湘病倒了。

其实，自打入朝后李湘的身体状况就一直不大好。但作为一军之长，他心里装的是4万多将士，对自己则很少顾及。1951年10月13日，即美军向第六十七军正面发动最猛烈的“秋季攻势”的当天深夜，李湘在军指挥部山洞里写给我的信中说：“我的身体实在不如从前，常常不想吃饭，也不觉得饿，饭量比以前是大量地减少了，表带和腰带都比来时紧了三孔，自然较前是瘦多了，入朝后又病了半月的时间。现在可以维持工作，因为工作和任务的重要也不好和别人谈这些问题，只有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李湘这次病倒，正值军党委会议召开之际，他渴望自己的病能很快地好起来，亲自参加会议听取汇报和指挥战斗。但是，他的病情却日益加重。这时，敌军发动的“春季攻势”战役已经打响，敌人投入的兵员、武器弹药远远超过1951年“秋季攻势”的规模，而且大规模使用了生化武器（包括细菌弹）。

李湘一面组织部署群众防疫，一面率干部深入前沿侦查地形，制订构筑工事的工程计划。当时李湘已被细菌感染，然而这个放牛、打铁出身的硬汉，为了打败强敌，竟日夜操劳，抱病工作，直累得身心俱疲。一天，第一九九师师长李水清向李湘报告称，美军在该师阵地前沿投放了十几个空壳弹。李湘立即赶了过去，他仔细翻看后认为，这些弹壳可能

隐含着重要的未知信息，便如实报告了志愿军总部。不久，李湘发起了高烧。为亲自听取某师构筑工事的汇报，他要求政委旷伏兆将汇报推迟一天，认为自己“明天就会好”。

不料，李湘病情迅速恶化，脸部也肿得非常厉害，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指挥作战。很快，他的病情转化为败血症和脑膜炎，虽经医生百般医治，终因抢救无效，于1952年7月8日13时与世长辞。李湘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7天时间。在军指挥所的山洞里，李湘诀别了他20余年一路拼杀的战场，诀别了他深爱着的战友和亲人。

由于李湘牺牲时正值暑期，遗体暂埋在军部附近的青山下。1952年12月10日，李湘的灵柩由朝鲜运回祖国，运送李湘灵柩的专列回国途经安（丹）东、沈阳、锦州、秦皇岛、唐山、天津、北京等地时，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路祭。人们追思李湘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战一生的光辉业绩，缅怀李湘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鞠躬尽瘁的不朽精神！其场面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12月11日，石家庄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和公祭大会，大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挥笔写下了：“我深以丧失了20年的老战友、优秀的青年将领李湘同志而哀悼！”

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题词：“李湘同志是以其国际主义的精神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死得其所，死有余荣！”

华北局副书记刘澜涛题词：“李湘同志革命精神不死！”

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主祭并致悼词。他对这位15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20余年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最终牺牲在战斗岗位上的优秀青年将领给予极高的评价：“李湘同志对党和上级给他的每一项任务和每一个战斗命令，从来没有马虎过。他兢兢业业、非常细心地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情况，下定决心，是最坚决执行命令的指挥员，最善于克服困难的指挥员，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最为明显。他很年轻，正是为祖国为人民尽最大贡献的时候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随后，李湘被安葬于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李湘牺牲后，朝鲜政府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朝鲜土地上建有李湘

的遗物墓，供朝鲜人民凭吊。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原文化参赞白锐同志曾填词《江城子》书赠与我：
“丰碑直矗千里外，捧函盖，英名在。抗美援朝，壮志何豪迈！任凭狂风
与暴雨，情谊存，永传代！”

(谢文雄 整理)

阎又文与北平和平解放

阎京兰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中共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功绩已为不少文章和作品披露，但是，身为傅作义最信任的机要秘书、华北“剿总”司令部对外发言人，实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员阎又文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所做的工作，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依然鲜为人知，有时甚至被人误解。

投笔从戎 历经艰辛奔赴延安

阎又文是山西省荣河县（今万荣县）荣河镇人，自幼勤奋好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因为家境并不宽裕，几次面临辍学，但是他白天打工挣钱，晚上坚持读书，并在多位老师的资助下，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在大学期间，阎又文接触到马列著作，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文化运动。他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党员邢西萍（徐冰）、杜任之、张友渔及进步教授温建公、周北峰等主持的进步团体“中外语文学会”，并担任该学会刊物《中外论坛》的编辑，参与翻译、出版及销售中外进步书籍，宣传进步思想和马列理论等工作。1935年，阎又文积极参加了太原学生支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活动。

1937年暑假过后，阎又文回到太原时，忻口已经不保，太原陷入混乱。在薄一波、程子华及彭雪枫等人的影响下，阎又文毅然决定投笔从

戎。于是回到晋南联络同学准备组织抗日游击队。但没等游击队组织起来，日本军队就占领了晋南重镇临汾，打到了家门口。他只好和9名同学西渡黄河前往西安，和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准备从那里奔赴延安。当时，日寇层层设关，肆意追杀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只要抓到，不是被活埋，就是被吊死。一路上，阎又文既要躲避日寇的追杀，又要克服身无盘缠的窘迫。他被迫卖掉了衣服和被褥，勉强果腹，但依然坚定地渴望奔向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

然而，他们因为走得急，到达西安后，这些家境贫寒的学生盘缠所剩无几，结果被困在西安，哪里都去不了。这时，阎又文碰巧遇到老同学樊长荣。樊长荣是傅作义派到西安来招收青年学生的。阎又文听他说傅作义的部队驻在山西临县，去那里必过延安，就决定随他们走，以便解决交通和食宿问题。

阎又文终于到达延安，但是在延安他接受了邢西萍（徐冰）的建议，利用他和傅作义同乡的身份及其他有利条件，到傅作义部队从事抗日工作。

助傅抗日 为解放战争提供可靠情报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派出政工人员帮助傅作义部队建立政治工作系统。1938年，阎又文在傅作义部队担任团政治部主任时，经中共特派员潘纪文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才华出众，文笔锋锐，阎又文很快得到傅作义的赏识和器重。1939年春，傅作义亲令调任阎又文当其秘书，并兼贯彻社（相当于政宣部）主任，负责抗战的思想宣传与政治动员，贯彻傅作义整军经武的大政方针。贯彻社的工作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为后来傅作义部队在抗战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阎又文辅佐傅作义组织并实施了一系列抗击日寇的战斗。其中著名的有袭击包头、绥西会战及收复五原等战役。阎又文曾在战斗中负伤，身上一直留有日军弹片。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急剧恶化。在蒋介石发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中共后套特委遭到破坏，撤回延安。由于情势危急，中共党组织来不及妥善安排，与阎又文失去联系。阎又文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牢记党对隐蔽战线工作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努力工作，辅助傅作义抗战。

由于阎又文所处的特殊地位，他和傅作义几乎形影不离，成为傅作义的得力助手，被大家称为傅作义的“左膀右臂”。傅作义的各种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同时，在傅作义的一系列政策、要求和军令的制定中，阎又文也起到重要参谋和得力助手的作用。他将傅作义交办的一切任务都完成得很圆满，因此深得傅作义的器重和信任，傅作义的高级将领和部属也都对他敬重有加。阎又文在傅作义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日后完成中共交给的一系列重大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1945年抗战胜利后，傅作义任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此时阎又文仍然是傅作义的秘书，同时兼任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又称宣导室）副主任及傅作义部机关报《奋斗日报》社长。

在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备战、积极准备打内战之时，中共中央急需了解绥远傅作义部的态度和战略意图，派王玉到傅作义总部所在地归绥（今呼和浩特）寻找和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阎又文。与阎又文接上关系之后，王玉向阎又文传达了党组织的指示：从现在起受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西北局社会部）直接领导，与王玉单线绝密联系，不允许与任何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

解放战争爆发后，1946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阎又文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和作战意图以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向中共党组织作了详尽汇报。这对解放军在后来的绥东战役中免受更大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1947年底，傅作义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总”总司令，阎又文也跟随傅作义进入北平。此时，他已是少将军衔，除继续做傅作义的秘书外，还兼任华北“剿总”办公室副主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傅作义的对外发言人等，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鉴于华北的形势和阎

又文的重要地位，他的组织关系转由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和一室（情报室）主任罗青长直接领导。

1948年5月辽沈战役前夕，按照李克农的要求，阎又文及时向党中央汇报了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军事力量，以及傅、蒋关系等许多重要情报。这些情报对中共中央对解放战争全局的决策和布局以及酝酿平津战役作战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10月底，在东北野战军入关之前，李克农要阎又文在两个星期内上报华北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计划。接到指示后，阎又文冒着生命危险，不负重托，仅用一个多星期就把该计划的详情告知中共中央。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原打算让东北野战军休整一个月后入关。由于接到阎又文这份重要情报，得知国民党华北军队可能西撤绥远，或由津塘南下与蒋介石会合。如果傅作义的60万大军撤往长江以南，将对解放战争的全局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发动平津战役。毛泽东断然下令东北野战军结束休整，不惜一切代价立即入关，切断敌军东西两个方向的退路。并作出了令华北解放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华东解放军对淮海战场上的杜聿明集团暂时围而不歼等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以便稳住华北敌军。阎又文的情报对平津战役的胜利以及缩短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左右沟通 促进北平和平解放

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后，中共中央争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阎又文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耐心地给傅作义谈形势，讲政策，消除其疑虑。他建议傅作义与中共秘密谈判，选择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并曾代表傅作义出城谈判，会见叶剑英。这些对傅作义最终选择和平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个关键时刻，阎又文几乎每天一份书面汇报，向中共中央反映傅作义的思想动态和表现。如此出色的情报工作，被华北野战军聂荣臻司令员赞叹为：你们对傅作义的情况了解得如此准确及时，在战场上是

罕见的。它对我军作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的作战部署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多方努力下，经过多次谈判，中共中央和傅作义最终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共识。1949年1月21日，受傅作义委托，阎又文与傅方其他两名代表和解放军代表苏静一起商定了实施和平解放的具体方案，并由阎又文草拟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

1月22日下午6时30分，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阎又文代表傅作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协议。1月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北平获得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仅避免了成千上万人的流血牺牲，而且保护了古都免受战火破坏。同时“北平方式”也对其后的湖南程潜和云南龙云的起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2月22日，阎又文随同傅作义到河北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赞扬傅作义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了大功，并商谈了对傅部数十万军队的改编方案。阎又文参加了这个改编方案的起草工作。在西柏坡，罗青长单独与阎又文进行了彻夜长谈。阎又文还与傅作义一起和周恩来、杨尚昆等人合影留念。

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绥远方式”。阎又文又开始辅佐傅作义配合中共着手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工作。中共与傅作义各出3名代表，组成“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阎又文为傅方3名谈判代表之一。在两个多月的谈判过程中，阎又文以他的特殊地位为绥远和平协议的达成作出了贡献。

4月1日，阎又文为傅作义起草向全世界发表的“和平通电”，表明了傅作义的政治态度：“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当时正值世界和平大会召开，据参加大会的郭沫若回忆，当该通电作为大会文件宣读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整个会场都沸腾了。

6月8日，绥远和平协议签字仪式在北平举行，阎又文作为“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傅方代表之一在协议上签字。协议签订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中南海丰泽园会见了傅作义、阎又文及傅方其他谈判代表。

1949年8月下旬，由于国民党的破坏，绥远和平协议的落实遇到困难，起义迟迟不能实现。在这紧要关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傅作义并请阎又文同去。毛泽东毅然决定，委托傅作义亲自赴绥远解决有关问题，使中共中央的方针尽快付诸实施。阎又文随同傅作义前往。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终于成功促成了绥远九一九起义。阎又文负责起草了《绥远起义通电》稿。

绥远起义后，阎又文被任命为绥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在绥远军区的民主改建运动中，为了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把近十万国民党旧军队改造成人民解放军，阎又文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付出了超常的精力。由于他的特殊地位和个人影响力，对这支部队的成功改造起了重要作用。

1962年9月，阎又文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年仅48岁。由于党和国家的需要，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阎又文作为隐蔽战线上情报人员的真实身份，近半个世纪都没有公开。直到1997年7月，阎又文的真实身份才通过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的纪念文章《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公诸于世。

罗青长在他的文章中是这样评价阎又文的：“同许多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一样，阎又文这个名字不仅不为他同时代的人所熟知，更不为现在的年轻人所了解。所幸的是，历史的时钟走到了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除了公开战场的搏杀外，还有隐蔽战场的较量。我的战友阎又文就是我党隐蔽战线上一位杰出的战士。”在文章的结尾，罗青长深情地写道：“在又文同志诞辰83周年纪念日之际，我不禁想起毛主席在《咏梅》诗词中所赞美的这样一种人：‘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如果又文同志在世，定会和我们一样高兴，‘拚却老红一万点，换将新绿百千重’。阎又文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奋战在特殊战线的韩乐然

康冀民

韩乐然是位奋战在特殊战线的同志，在统一战线工作上默默耕耘，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因为牺牲得太早，从事的又是秘密工作，他的革命事迹鲜为人知。下面，根据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和一些档案资料，将韩乐然奋战在特殊战线的事迹作一介绍，以资纪念。

由阎宝航推荐进入“战委会”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国共第二次合作逐步形成，抛弃历史恩怨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两党及所控制的军队之间依然存在一些磨擦和矛盾。为了解决两党两军及各部队和地方武装的矛盾，把各种武装力量都集中到共同抗战上，1939年初，在各方推动下，国民党决定设立一个新的机构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简称“战委会”）。因为李济深抗日态度坚决，与共产党关系也比较好，大家提议由他出面主持“战委会”的工作。对此，李济深提出两个建议：一是，请蒋介石任主任，他任副主任；二是，在用人方面应打破党派界限，凡主张抗日者都可以吸纳进来参加工作。上述两项提议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

在“战委会”工作的人员身份复杂，既有很多与李济深有旧关系或参加过福建事变的人，也有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的人，国民党的要员陈立

夫、谷正纲、张群等也都是“战委会”成员。在“战委会”中，设有军事、党务、政治、文化、敌情等研究组；还设有若干少将指导员，专门到各地各部队视察检查工作；还有若干人员不在正式编制内，无固定职务，但担任顾问，待遇等同少将。现在，在台湾的国民党党史馆可以查到“战委会”组织纲要的记载，如“民国28年8月30日，军委办四渝字第八五零七号训令第三次修正”公文中，记载了“少将指导员”这一职务，但具体人名已略去，没有公开。

在重庆主持“战委会”工作后，李济深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和博古（秦邦宪）商议国事。商议中，周恩来明确表示支持李济深的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地下党员张友渔、于炳然、韩乐然等进入该会工作。韩乐然1939年5月进入“战委会”工作，是由阎宝航向李济深推荐的。在该委员会工作的也有非党人士，如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等。

三件特殊武器

在“战委会”期间，韩乐然曾视察卫立煌为总司令的第一战区和阎锡山为总司令的第二战区。这两个战区地位重要，战区内国共军队和地方武装关系比较复杂。如第一战区司令部设在河南洛阳，作战区主要是在平汉路一带，北至冀察，南至江苏、安徽省北部，东至山东、江苏海边，西至陕西潼关等地区。跨及6个省，是最大的作战区，也是抗日武装力量最多的一个战区。辖10个集团军，其中包括八路军、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非嫡系部队、地方部队、各种杂牌军、地方武装等。各军之间关系比较复杂，时而发生不协调，甚至磨擦。韩乐然在视察工作中做了大量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工作，利用三件特殊武器，在宣传抗日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一件特殊武器是笔。韩乐然撰写发表了许多关于抗日前线实况的文章，如1939年在《反攻》第5卷第6期发表的《从西安到晋南》、第7卷第1期发表的《在晋东南的“扫荡”圈内》。同时，他也将视察检查情况汇报给“战委会”，引起很大关注。他还将在沿途收集到的情报传送给党

组织。

1939年5月至7月，韩乐然跋山涉水、冒着敌人的炮火视察晋东南的郎碧山、垣曲县、阳城县、晋城县、长子县、长治县等地。他写道：

渡了河，急忙走出城外时，一架双叶敌机由西空进袭小城上空，也就是我们的上空来了。我很镇静地安排了所有走路的人们之后，赶紧躲在路旁草丛中。望着敌机和投下来的三颗炸弹。敌机这样连续地在我们上空飞了六圈，投了四次炸弹，一共八枚……我们不能不为聚集在渡口两岸待渡的老百姓担心。可是我们的赶路任务不许我们回顾这些了。在前进的路上，又遇到三次敌机，共11架，它们低飞在我们的上空。而且在个别的城镇投弹，我们很清楚了解他们的来意，是在搜寻我们大部队的踪影。可是敌人再巧妙也不会找到机智神勇的我们的大部队的所在。他们正在避地准备给敌人意外的打击，来消灭敌人。我们就这样在晋东南扫荡圈内经过了六日的战斗生活，走过了380里路，在下午4时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军部。

第二件特殊武器是照相机。韩乐然拍摄了很多抗日前线战斗的实况和军民团结抗战的情景，并大量发往国外，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和各方援助。阎宝航的子女阎明光、阎明复回忆，韩乐然在他们在重庆的家中冲洗大量的照片，澡盆中放满了水，都是照片。国际友人路易·艾黎说，在武汉，看见韩乐然带着他在前线拍的照片和新闻报道，在外国记者中进行抗日宣传。曾是韩乐然助手的邱琴，将韩乐然用在视察工作中拍下的照片做抗日宣传，得到苏联记者卡尔曼赞扬一事，写成一篇报道《一个摄影记者的故事》，在1939年9月7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

1940年3月，韩乐然到河北唐县八路军冀中军区吕正操部视察。当时在该部队任火线剧社社长的王林在1940年3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

华北党政军指导员韩乐然演讲《摄影与国际宣传》，甚有技术上的特见。例如他说：许多照片人物眼光都对准镜头，显然是

为了照相，令人不生实感。匈牙利嘉宝到西班牙战场中在叛军正在扫射，政府军一战士正要倒下时摄的，卖了一万法郎。日本每年对外宣传公开的经费3500万日元。日本用无线电放射影片，中国在时间上争不过，只好用组织性，即将抗战后的进步，做一历史性的表现。要了解政治时代精神。有一次许多摄影专家在三八节给宋美龄摄讲演时相，都照她的妇人美态照，但韩却照她那怒目张爪时照，结果韩照的最好，因为韩的可以表现出宋在抗战期间的政治姿态。对国际宣传上，韩以为在初期可以多照日本残暴的情形，然而在武汉失守后则否，这时便应该表现中国在抗战中的进步和新生力量，否则不能建立国际对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如仍表现日本飞机轰炸，等于替人宣传。

第三件特殊武器是画笔。韩乐然能写善画，常常抓住点滴时间，素描几笔，画出各种地形和人物。余克坚（由九十三军投奔到八路军，解放后曾任北京对外经贸学院副院长）曾说：“韩乐然到九十三军后，他常带一个本，不是记录，他的记性太好了，而是顺手就画上几笔，还给我和其他人画过素描……军长刘戡曾让他画过蒋介石的像，他也画了，非常像……”

特殊使命

韩乐然是党派到“战委会”的，除了做宣传抗日，解决各部队之间的磨擦，更重要的是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为此，他到国民党部队找高级将领密谈，做思想工作，并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到延安和八路军总部汇报。

中共地下党员、卫立煌的秘书赵荣生回忆：“韩乐然由孟用潜（中共六大代表，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解放后任外交部党委委员，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带来找我。我不敢多和进步人士来往，他既然来到我家，我不好拒绝，只好陪他去见卫立煌。韩乐然很能干，政治态

度很明朗，在晋南为战地党政委员会做一些工作……”

杨公素在文章中写道：

1938年冬，在延安招待所同韩乐然相识。1939年秋，在山西晋东南抗日前线我又见到韩乐然，他以战地党政委员会特派员身份来到国民党第九十三军驻地，同军长刘戡、参谋长魏巍交谈后。请他给战地服务团训练班作报告，他讲抗日的道理，讲中国人的志气，一定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讲话风趣幽默，特别是以他个人的经历结合起来，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受到在座人的欢迎，使人感到了一次私人闲谈般的温情。本来有些人在九十三军工作不安定，在听了他的谈话后，觉得较为安定了，觉得工作有了盼头。他同魏巍密谈话后，即去八路军总部。9月份他由八路军总部返回，跟我们进行长谈，劝我安心地好好带着青年做抗战工作。

韩乐然多次到八路军总部和彭德怀、左权见面，传递重要情报，又返回国民党军队，在工作中贯彻党的指示。魏巍曾托韩乐然带一封密信给彭德怀，表示下决心离开国民党军队，投奔八路军。当韩乐然被国民党逮捕后，魏巍觉得事情暴露，就向刘戡摊牌，毅然投奔八路军。刘戡在自己家里为他饯行，泪流满面举杯说：“我与参谋长共事多年，情同手足。现在因思想不同，他要离去，人各有志，我不挽留，但愿友情常在。”

余克坚曾写道：“韩乐然当时的晋南之行，与九十三军有密切联系。他的活动直接影响了九十三军内部进步分子；军内部进步分子的遭遇又影响了韩乐然的活动，互相影响，连锁反应。”

韩乐然在晋东南等地的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怀疑。1940年他离开第九十三军后在宝鸡被捕。1943年初，在党组织的营救和李济深的多方努力下，韩乐然被假释出狱。1944年，按组织决定，韩乐然把家安置在兰州，以绘画和考古为掩护，继续他的特殊使命，做国民党高级将领和要员的统战工作。韩乐然和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

甘肃武威第三集团军司令赵寿山、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及邓宝珊将军和鲍尔汉等交朋友，和他们深入探讨相关问题。韩乐然夫人刘玉霞回忆说：“赵寿山曾三次找韩乐然密谈，最终把国民党部队带过来了。陶峙岳将军有几次是深夜穿便装找乐然商谈。最终他们都真诚地和我党合作。”

不幸的是，1947年7月30日，韩乐然自迪化（即今乌鲁木齐）乘国民党军用飞机赴兰州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枪栓为何被冻住射不出子弹？

——有关杨子荣牺牲的细节

苏志松

随着小说《林海雪原》及由此改编的电影、京剧、电视剧的广泛传播，侦察英雄杨子荣可谓名扬天下，妇孺皆知。几十年来，关于杨子荣的文章也多得难以胜数。但杨子荣究竟是怎样牺牲的？关键时刻枪为什么射不出子弹？似乎至今仍留下不少谜团。2011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中，关于杨子荣牺牲的情况是这样写的：

“（1947年）2月23日，在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匪首的战斗中，杨子荣冲在最前面，由于他的枪栓被严寒冻住未能打响，被土匪的子弹击中胸部，英勇牺牲，时年30岁。”很多文章讲述杨子荣的英雄事迹时，也是这样说的。对此，人们难免产生这样的疑问：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解放军和志愿军没少在零下二三十度的环境下作战，很少听说有人因枪栓被冻住射不出子弹。这种说法似乎有悖常理。另一个疑问，说杨子荣“被土匪的子弹击中胸部”，是哪一个土匪？杨子荣是在怎样的情势下与土匪面对面遭枪击的？对此，社会上流传各种不同的说法。对于上述两个疑问，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1978年8月的一天，哈尔滨市作家、时为《哈尔滨文艺》（《小说林》杂志的前身）编辑的刘子成到宁安县（现宁安市）采访。那时我在宁安县委工作，有幸与他倾谈多时。闲谈中，话题转到京剧《智取威虎山》上，重

点谈到杨子荣的牺牲。刘子成和我详谈了他采访杨子荣当年的老房东卢德权和亲手打死杨子荣的土匪孟老三的情形。后来，我又拜读了刘子成据此撰写的纪实作品《寻找郑三炮》，由此了解到有关杨子荣牺牲的一些细节。

1974年的一个秋日，刘子成（电影《飞来的仙鹤》编剧）为撰写电视连续剧《座山雕家世》，专程来到“林海雪原”故地采访。在海林县（1992年设市）一位友人的陪同下，他直达边远山区的阳光村（原名半脸沟），住进党支部书记卢德权家。卢德权是杨子荣当年的老房东，对杨子荣和“座山雕”等知之甚多。就在这栋普通的草屋内，杨子荣度过了他人生旅途中的最后一个夜晚。

听说省城作家要为杨子荣作传，卢德权老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提供了一切方便。他不仅不厌其烦地与刘子成倾谈了几个昼夜，还亲自找来两个当事人接受访谈。其中一个叫尤国太，曾当过土匪的伙夫，为匪首“座山雕”张乐山做饭十多年；另一个叫孟桐春，人称“孟老三”，此人也曾是“座山雕”的喽啰，在杨子荣化装带领小分队活捉“座山雕”的战斗中侥幸逃脱，后改换门庭，转而追随郑三炮。

当年电影《林海雪原》和京剧《智取威虎山》在全国各地上演后，牡丹江一带的不少百姓就风传打死杨子荣的那个土匪还活着，并且盛传那个土匪在看了电影和京剧后，常对熟人说：“威虎厅”哪来那么大的阵势！“百鸡宴”也不过是炖了几只小鸡……所传的那个土匪正是刑满释放的孟老三。

刘子成到阳光村采访时，恰逢孟老三出狱不久，作为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回村继续接受监管改造。刘子成就去找孟老三问杨子荣牺牲的具体情形。面对刘子成的提问，孟老三既不慌张也不躲闪，有问必答，一股脑儿把他当年当土匪的经历吐露出来。

孟老三是阳光村人，年轻时家境贫寒，也无劣迹，主要以上山打猎和挖人参为生。因为他总在山沟里转，久而久之和各路土匪混熟了，随之加盟入伙，人生轨迹从此改变。他开始在“座山雕”手下跑腿送信，搜集情报，是个密探的角色。在杨子荣带领小分队智取“威虎山”活捉“座山

雕”时，他侥幸脱身，辗转投奔到马喜山匪帮副司令郑三炮麾下，继续与牡丹江军分区的剿匪小分队周旋。此时，各路土匪已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只能三五伙地四处流窜。

当二团副政委曲波率领的小分队侦知郑三炮一伙土匪躲进闹枝沟山梁上一座马架房时，决定发动突袭，彻底铲除这股残匪。

1947年2月22日夜，杨子荣、孙大德、魏成友等5人组成的小分队悄悄住进卢德权家。因为天冷，怕战士们冻着，卢德权特地把大炕烧得热乎乎的，让大家睡个安稳觉，第二天打仗有精神。躺下不久，孙大德突然翻身坐起来，对杨子荣说：“排长，明天早晨打仗，咱得擦擦枪呀！”于是5个人全部坐起来擦枪。可是没有擦枪油咋办？卢德权说：“我家有猪油行不行？”大家齐说“行”，就坐在炕上用猪油擦起枪来。

第二天，即1947年2月23日凌晨，杨子荣等5人穿好衣服，整装待发。临行前，杨子荣对卢德权及其母亲说：“老乡啊，我们一大早去闹枝沟抓土匪，麻烦你们贴一锅大饼子，用牛车给我们送上山去……”卢德权爽快地答应了。

天色尚未破晓，小分队就出发了。作为侦察排长的杨子荣走在最前面，身后紧跟的是孙大德、魏成友等战士，赶来参战的二团副政委曲波殿后，负责全面指挥。正是数九寒天，林海山区气温是零下30多度，盘山小道上雪深过膝，战士们出门不久单薄的棉衣即被冻透，在热炕头上焐了一宿的枪管很快被冻得冰凉冰凉……

闹枝沟越来越近了，小分队在曲波副政委的指挥下包抄前进。当小分队接近马架房时，屋门突然被拉开，草编的门帘子掀动一下，随之闪出一个人影。此人正是孟老三。杨子荣以为土匪发现了小分队，迅即隐蔽在一棵树后，其他战士也机警地卧倒在地，举枪准备投入战斗。虚惊一场，孟老三原来是起床撒尿。待孟老三回身进屋时，杨子荣立即从树后闪出，手握着枪蹑手蹑脚地跟了过去。

此时郑三炮、丁焕章、刘维章、程树林、马连德、牟成顺等匪徒早已被冻醒，龟缩在大炕上闲唠着。他们也许正在做着最后挣扎的美梦。战机到了！杨子荣猛地飞起一脚将板门踹开，再用匣子枪擦开草编门帘子，

把枪管伸进屋里，大吼一声：“不许动，都举起手来！”

孟老三闻声一抖，连忙俯身抄起步枪。郑三炮则惊叫：“共军来了，快拿家伙，打！”匪徒们乱作一团，纷纷起来拿枪。孟老三首先持枪下炕迎击。杨子荣听到屋里发出“哗啦、哗啦”的拉枪栓声，立即抢先扣动扳机……不料枪未打响，弹未出膛。因为昨夜用猪油擦枪，出门后经寒气一冻，枪膛凝涩，撞针失灵，子弹卡壳了。

孟老三逃过一劫，见“共军”枪未打响，顺势举枪还击，一枪正中杨子荣左胸上部，杨子荣趔趄一下扑倒在地。随之草编门帘子自动落下来，挡住了屋外战友们的视线。这时孙大德快速冲到马架房窗台下面，魏成友尾随其后。两人本想开枪增援杨子荣，未料土匪们负隅顽抗，从窗户往外射击的火网使孙大德、魏成友抬不起头来。孙大德想往屋里扔手榴弹，因怕伤着杨子荣只好作罢。此时他还不知道杨子荣已中弹倒地，不能继续战斗了。

郑三炮困兽犹斗，掀开草帘子举着匣子枪向小分队射击。就在草帘子掀动的一刹那，机警的魏成友发现杨子荣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了。孙大德意识到大事不好，杨排长不是受伤就是遇难了；如果他已冲进屋里开枪，郑三炮怎能跑到门口向外射击呢！

孙大德一看到郑三炮的凶相，立马端枪扣动扳机，不料枪也没打响。但郑三炮没有举枪还击，而是跃身逃到屋里躲起来了。趁此间隙，孙大德不顾一切地掀开草帘子进屋，把躺在地上的杨子荣迅速拖出屋外，然后俯身抱起来就跑。杨子荣血染战衣，一息尚存，吃力地对孙大德说：“大德，任务……”话未说完就牺牲在孙大德的怀里，年仅30岁。

小分队的战友们见杨排长牺牲了，悲愤至极，全都红了眼，相继来到窗前往屋里一阵猛烈地射击。此时，曲波副政委命令魏成友：“快，上房顶从窗户往屋里扔手榴弹！”魏成友受命后，迅即绕到马架房的东侧上了房，从窗户里扔进捆绑在一起的集束手榴弹，片刻后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炸雷似的端了土匪的窝。土匪丁焕章、刘维章二人被当场炸死；郑三炮等三人被炸伤；马连德因头顶一口铁锅仅受一点轻伤，但也完全丧失了反抗能力。小分队战士满腔怒火，一阵排枪如骤雨般狂射，土匪基

本被歼灭。但举枪打死杨子荣的孟老三却狡猾地从房后越窗而逃，隐匿山林，成为7个土匪中唯一的漏网之鱼。全国解放后，孟老三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捕入狱，释放后回村监改。这样才发生了前面所说的，孟老三接受刘子成的采访，把杨子荣牺牲的细节讲述出来。

1989年冬天，刘子成率电视连续剧《座山雕家世》剧组来到海林县阳光村实景拍摄。全体演职人员无不想亲眼看一看那个打死杨子荣的土匪，甚至有人想把他也摄入镜头，凸显电视剧的纪实性，未料孟老三已在不久前因病死去。杨子荣牺牲的细节也就没有被更多的人知晓。

1997年秋天，我出差到胶东，特地到牟平县（现烟台市牟平区）嵎峡河村，拜访了杨子荣的长兄杨宗福老人。当他知道我曾到过海林市杨子荣纪念馆参观时，问我：“俺家宗贵到底是怎么死的？”（杨子荣的本名叫杨宗贵，子荣是他的字）我告诉老人，杨子荣首先冲进土匪住的宅子，枪没打响，被土匪打中一枪。老人又问：“匣子枪为什么没打响？”我说，是因为用猪油擦的枪，冻住了……杨宗福老人听了，目光凝重，唏嘘不已，连道：“要是枪打响了，俺家宗贵备不住现在还活着呢！”

他视富贵如浮云

——记我的祖父刘晓浦烈士

刘长琨

我未曾谋过面的祖父

我没有见过我的祖父，我出生时他早已牺牲。父亲对我祖父也没有多少直观印象，因为祖父牺牲时，他才12岁。而在这12年中，祖父一直在外面从事革命工作，很少回家，父子二人见面不多。我对祖父的印象大多是从祖母的讲述中得到的，再就是有关党史资料的记载。《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载有我祖父的简要事迹：

刘晓浦（1903—1931）原名刘显厚，又名刘小浦、刘泰和，1903年生，山东省蒙阴县垛庄村人，是山东党组织早期领导人之一。刘晓浦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幼时在原籍读私塾，后就读于临沂省立第五中学、济南育英中学。1920年考入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在校期间，受新文化、新思想影响，组织进步学生参加爱国运动，被开除学籍。1921年秋到济南，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由王尽美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转为中共党员。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受教于时在该校任教的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等，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基本知

识，并宣传革命思想。1925年在南通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9年1月，中共山东省委遭受破坏，同年4月受党中央派遣到济南，协助刘谦初重建山东省委和恢复山东省党的工作，任省委常委、秘书长。为尽快打开局面，他不顾严重白色恐怖，四处奔波，联系党员，整顿恢复地方党的组织；参与制定省委军运工作计划，确定了山东军运的中心区域和士兵工作的总方针；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同志。1929年7月，因叛徒告密，省委又遭破坏，刘晓浦等被捕。在狱中他面对酷刑，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其二哥刘云浦变卖家产，携巨款去济南设法营救。他说出狱得自首，要我自首绝对办不到，我和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是死对头。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1931年4月5日，刘晓浦在济南纬八路英勇就义，年仅28岁。

上述资料虽然简略，却较全面地概括了祖父短暂的一生。只是年龄稍有一点出入，他生于1900年而不是1903年，牺牲时31岁。

祖父是被国民党军阀韩复榘杀害的，和祖父同案牺牲的有邓恩铭、刘谦初、刘一梦等22人。这就是山东历史上有名的“四五惨案”。同案牺牲的刘一梦是我的五伯父（堂伯）。我的二伯祖刘云浦变卖家产携款到济南营救他们叔侄二人没有成功，用骡子驮回两具尸体，一家人都陷入极度悲痛之中。二伯祖和我祖母商议决定，暂时把棺材浮柩在一个叫桑行子的地方，上面用土掩盖，堆成两个没有地穴的大坟。二伯祖对家人说：“他们叔侄二人都是共产党员，是为共产党的事业牺牲的，要等共产党胜利了再正式出殡下葬！”表达了对共产党胜利的期盼和信心。

桑行子原来是我家的一块耕地，日久天长，这里慢慢发展成一个村庄。两座大坟被围在村中央，和居民的住房紧紧相连。乡亲们怀着对革命先烈的怀念与敬仰，年年为其培土修缮。时隔60余年，坟墓没有丝毫毁损，一直高高地耸立在桑行子。1994年，蒙阴县扩建孟良崮烈士陵园，把两位烈士的骨殖迁移安葬在烈士陵园之中，同时移葬的还有我的姑

姑刘增嵩（是八路军某旅机要秘书，1941年大青山反“扫荡”战役中牺牲，牺牲时年仅20岁）和堂伯刘滋泉（时任共产党沂水县委宣传部部长，1941年反“扫荡”战役中牺牲，牺牲时年仅24岁）。

舍弃“温柔富贵之乡”

祖父刘晓浦出生在山东省蒙阴县垛庄镇（当时属沂水县）一个有名的大地主家庭。家有良田5800亩，山林1000亩，地跨蒙阴、沂水、沂南三个县；另有酱园、酒店、油坊、百货等店铺，并在上海、济南、青岛等地设有商号。住宅是一个占地40余亩的庄园，按八卦图形修建，院中套院，既严密又牢固，人称八卦宅；有房屋160余间，在当地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传说乾隆南巡时，曾在刘家歇息居住，看到刘家诗书继世，家风整肃，心中大喜，亲笔题写“燕翼堂”三字赐予刘家作为堂号。其寓意有二：一是赞扬刘氏家族是一个以德为本、教子有方、知书达理的忠厚之家；二是希望刘家能够成为社稷朝廷的辅佐。

祖父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人称四少爷。成年后，他娶沂南县高氏小姐为妻。高家祖上做过官，系书香门第，有很好的家风传承。祖母高琪媛是一个聪慧美丽、品德贤淑、知书达理、深明大义的大家闺秀，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嫁给我祖父后，生有一子二女。这种家境，正是《红楼梦》中所说的“温柔富贵之乡”，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但祖父毅然舍弃这一切，走上一条为革命献身的不归之路。祖父牺牲后，许多人为他扼腕叹息。在祖父投身革命之初，就有亲朋挚友规劝他，让他珍惜眼前的一切，劝他改弦易辙，去求取“正路功名”，不愁荣华富贵。他斩钉截铁地答道：“我视富贵如浮云！为了民族的复兴和社会的进步，我甘愿献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祖父这种摒弃富贵、舍小家顾大家、为国捐躯的行为，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也有人不理解。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叔侄志同道合，同案慷慨就义

《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对我的五伯父刘一梦的生平事迹有如下记载：

刘一梦（1905—1931）原名刘增容，刘晓浦的侄子，参加革命后化名刘一梦、刘大觉。革命作家。早年在临沂五中上学，毕业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后转上海大学社会系。在学校受其叔刘晓浦的影响，信仰马列主义，并于1923年由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们叔侄在上海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7年，蒋光慈、钱杏邨（阿英）等人在上海成立文学团体太阳社，刘一梦是主要成员。他经常以“一梦”、“大觉”为笔名发表文章，抨击旧社会的黑暗。他曾写过不少文学作品，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失业以后》。作品中描绘了工农群众被剥削被压迫的非人生活及其反抗精神，塑造了众多的被压迫者和革命者的形象。

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中写道：“……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他的作品现已发现的还有《工人的儿子》、《谷债》、《雪朝》、《车厂内》、《斗》、《沉醉的一夜》、《暴民》等8篇。1928年，刘一梦由党派往山东，担任团省委书记。之后，中共山东省委派他和王永庆等人到诸城县楼子一带开展农民运动。9月，成立了“山东第四贫民会”，领导农民进行“抗租抢坡”斗争，为潍河沿岸农民暴动打下了基础。此后，他经常在济南、青岛等地，以饭店跑堂、拉黄包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初，他兼任《济南日报》副刊《晓风》的主笔，借以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反动当局的黑暗统治。

1929年3月，省委遭破坏，刘一梦被捕入狱，屡遭酷刑，坚贞不屈。1931年4月5日与其叔刘晓浦和山东省党组织的领导人邓

恩铭、刘谦初等22人被国民党反动军阀韩复榘枪杀于济南，史称“四五”惨案。

时年刘晓浦仅28岁，刘一梦26岁。

刘一梦、刘晓浦牺牲后，其家人置棺敛尸，一直浮殡，刘一梦的叔父刘云浦含泪发誓，共产党不取得胜利，我决不出殡。

直至烈士63周年忌辰时，也就是1994年4月5日，刘一梦、刘晓浦的遗体才正式出殡，安葬在孟良崮烈士陵园，山东省及北京等地1万多人参加了隆重的安葬揭牌仪式。

上述记载是较为全面准确的。只有年龄和我知道的有点出入。据我了解，刘一梦生于1902年，牺牲时29岁。五伯父仅比我祖父小两岁，二人名为叔侄，实如兄弟，自幼一起玩耍，一起在县里上小学，后来又一起到临沂五中读书，在那里受到爱国主义思想影响，共同立下报国之志（临沂五中是一个具有进步办学思想的学校，继祖父和五伯父之后，我的父亲以及我叔伯辈的多位亲人都曾在这所学校读书，在这里受到先进思想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祖父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中学毕业后考入南通纺织专科学校，准备将来做一名纺织工业工程师。五伯父则立志以文学唤起民众的觉醒、提高国民素质，从而实现民族的复兴。怀着这一志向，他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在大学读书期间，二人先后认识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并由王尽美介绍先后于1922年和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二人又先后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那里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受到更多党的早期领导人的教诲。1928年和1929年，五伯父和祖父先后受党中央派遣回到山东，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因叛徒出卖先后被捕。在狱中，二人坚贞不屈，拒绝家人的大力营救，为真理、为理想慷慨就义。叔侄二人的这一段革命经历，听起来仿佛是一个传奇，却是我们党的一段真实的历史。有人说：刘晓浦和刘一梦叔侄二人为共产主义理想英勇献身的故事，是一首悲壮豪迈的交响曲，用他们的一腔热血和年轻的生命所谱写，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还有人说：刘晓浦、刘一梦是那个时代中国先进青年的代表，他们的事迹，反映了那个时代

爱国青年的精神风貌。

毁家纾难，举家抗日

听祖母讲，祖父在外上学的时候，就频频给家中写信，劝家里把土地分给佃户和贫苦农民，不要再过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参加革命之后，更是殷殷劝导家人要为劳苦大众着想，放弃剥削生活，把家产分给穷人，过自食其力的普通人的日子。祖父牺牲后，祖母和其子侄辈共同践行了他的遗愿：（一）尽全力支援八路军抗日，倾其家产为八路军提供各种物质支援；（二）家中年轻后辈几乎全部参加八路军，参加抗日救国战争；（三）为支持八路军反“扫荡”，自愿炸毁燕翼堂老宅。

据蒙阴县委党史研究室的一份材料记载：“沂蒙抗日根据地开创之初，‘燕翼堂’担负起了我党我军垛庄一带驻防部队、工作人员的后勤供应任务，肖华将军曾带领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全部住在‘燕翼堂’。（燕翼堂）还曾一次卖地300亩，购枪100余支，支援八路军抗日。”另外，抗战一开始，燕翼堂便出钱购买40余支枪，组建了一支地方抗日武装——独立营，由祖父的侄子刘竹泉担任营长。后来独立营被编入八路军某部二支队。

据我十二伯父（堂伯）刘增浩（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回忆：“我们家的两位烈士（刘晓浦、刘一梦）对我们兄弟姐妹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他们是被国民党军阀韩复榘杀害的，两位烈士在外地参加党的地下活动时，曾不断给家中来信，教育家中老人‘不要再过那种寄生生活了，共产主义就是要改变那种人压迫人的制度，为劳动人民谋利益……’这样我们从心里就对共产党有了感情，和国民党反动派有仇恨，也与地主阶级开始决裂，所以，抗日战争刚开始，民主改革刚进行，我家的所有房产、土地全部献出，我兄弟姐妹20余人都投入革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祖父兄弟四人，共生了14个儿子，除了年龄较大的大伯父、二伯父和早年去世的三伯父、四伯父之外，其余8人连同我的几位姑姑和几位年长

的堂兄堂姐共26人全都参加了八路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其中有6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加上我的祖父和五伯父，我家共为革命牺牲8人。

据堂姐刘纯（原名刘长珠，国家建设部离休干部，2010年于北京去世）回忆：“抗战之初，八路军在我们家里来往不断，吃饭，住宿，来者不拒……经常人来人往。肖华曾和我说：你们家里驻一个团还有余。”“抗战开始不久，徐向前在我们家住过，我们家有个大望远镜叫他带走啦（送给了徐向前司令员——笔者注）……徐向前从我们家里带走了100多支枪。为了抗战，共产党、八路军要枪我们家给枪，要人我们家给人，要钱我们家给钱，要粮我们家给粮，要什么只要我们家有的就给什么。”

上述情况我曾从多位老一辈人的口中听说过。我还曾听说，除了徐向前、肖华等领导人之外，还有党和八路军的许多领导同志都曾经在我家住过。我知道姓名的有李子超（曾任山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高克亭（曾任山东省副省长、省委书记）、王传斌（曾任驻外大使，2011年11月在北京逝世）。我与王传斌老人认识，是一次偶然邂逅，也可以说是一次奇遇，一种缘分，我把它作为一段佳话、一个花絮记述于此：

大约是2000年或2001年，我在北京医院候诊室等候看病，一起候诊的还有两位老同志，正在相互聊天，其中一位操山东口音。

我于是问道：您是山东人？

他说：是啊，你是哪儿人啊？

我说：我也是山东人。

山东什么地方？

山东蒙阴。

蒙阴哪儿？

垛庄。

你家是垛庄？那我向你打听个人你知道不？

不知您打听谁？

刘露泉你认识吗？

我不由笑起来，说道：刘露泉是我父亲。

他也笑了，说道：怎么这么巧啊！我打听你父亲多年也没打听到。

王老问起我父亲的情况。我告诉他我父亲1958年被打成右派之后，就和许多老同志失去了联系。他听后十分感慨：“抗战时期我和你父亲一起工作了好多年，你父亲可是个好人啊，很正派，很有才华。”我听了很感动，这么多年过去了，经历了多少人事沧桑，他也早已成为国家高级干部，却还没有忘记当年的战友。只可惜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否则他会多么高兴啊！王老不仅谈到我父亲，也谈到我家的情况。他曾经在我家住过，说我家院子很大，大院套小院，住了四五天也没把我家的院子看全。我说：“听说我家的院子占地40亩呢！”他说：“40亩可不止！——那是大亩。”我这才知道亩还有大亩和小亩之分。

还有一位叫李惠的年轻八路军女战士（据说后来改名陈若愚，解放后曾在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曾长期住在我家，做地方群众工作。她和我的几位姑姑关系很好，在她的带动帮助下，我的几个姑姑先后参加了八路军。李惠对我家情况十分了解，“文化大革命”中她在北京家中养病，曾经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找她，她要向我介绍她所了解的我家的情况，让我写一本书。她说：那会是一本很好的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但因当时正处于十年动乱时期，这一约见未能成行。这真是一个遗憾！

凡是在我家住过的人，都对燕翼堂留下深刻印象。据老人讲，燕翼堂是一座祖传老宅，庭院设计与房屋建筑非常考究，用料精工，梁柱都是楠木的，且有乾隆御笔亲题的堂号。有人说，如果留存到现在，肯定会被列入地方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燕翼堂宅院庞大（据说能驻一个整编团），院墙高固，院墙四角各有一个哨楼，如同一个天然的军事堡垒，且按八卦图形与原理布局，不熟悉的人进去找不到门出来。1940年，当日本鬼子开始对这里进行“扫荡”时，驻扎在这里的八路军领导考虑到万一这座宅院被日本鬼子占领，反“扫荡”战斗将会遇到极大困难，造成重大牺牲。因此，八路军转移的时候，部队领导提议：炸毁燕翼堂，不给日本鬼子留下这样一个易守难攻的驻兵场所和作战堡垒。对八路军驻军领导的这一提议，当时我家全家老小都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同意炸毁燕翼堂所有建筑，一家几十口人从此背井离乡，投亲靠友，过起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的日子。那时父亲和大姑均已参加八路军，小姑已

因病去世，祖母便带着她的婆婆（我的曾祖母）和我的母亲（刚过门不久的儿媳妇）回了沂南县的娘家。我和弟弟都是在祖母的娘家高家中诞生的，我们没有见过燕翼堂老宅，只是从老人的回忆中听到过它如何富丽与堂皇。20世纪90年代，我出差顺便回了趟老家，看了看祖父的坟（当时尚未迁移安葬），也看了看燕翼堂遗址。那里已经变成一大片民宅，镇政府所在地也在其中。在一块类似广场的空地上，还残留着两块太湖石和长条花岗石，透漏着一丝历史的信息，暗示着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个极为美丽动人的传奇故事。一个老人指着石头告诉我：过去这里是燕翼堂的后花园。县里一位领导对我说，省政协主席李子超同志曾经向县里提议重修燕翼堂，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问我是什么意见。我知道当时县里财政还很困难，老百姓生活还比较艰苦，因此没有同意。事后我对父亲讲了这件事，父亲很郑重地对我说：你可不能同意这件事，现在那里老百姓生活还很困难，哪里有钱干这个！我对他说：我的想法和您一样，已经向县里表示了。

毁家纾难，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也许并不鲜见，但像燕翼堂这种深明大义的爱国之举，可以说是少见的典型案例。当我站在燕翼堂的原宅基地上，看到当年封建地主的深宅大院已经变成一片欣欣向荣的平民百姓的居住新区时，心中不由感慨万千。我想：祖父当年要把家产分与百姓，要求家人过自食其力的平民生活的愿望实现了，他的子孙后代没有辜负他的教诲与期盼。

一位太行老八路的心愿

宋河星

山西省黎城县，位于巍巍太行山腹地。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邓小平曾在这里战斗生活，度过一段艰难的岁月。刘贵德就是那个年代从黎城县新庄村参军的太行老八路，现已86岁高龄。当年，他的父亲是秘密党员、新庄村农会主席，长期为村里的八路军做抗战工作，同刘邓首长很熟悉。刘贵德从刘邓首长到他家，就给刘邓首长送信，在刘邓首长的关怀下参军，又到刘邓首长身边担任警卫员，目睹和聆听了首长们在战争期间的一些事迹，同时也留下一个尚未实现的心愿。

在暖岩寺卷烟厂给八路军送信

暖岩寺，坐落于新庄村后1里处的大山脚下，是个古寺院。寺院为两进串心院，有正庙、东西庙，还有7间房，后院大殿里有大佛像。正殿侧后留有通往后山的小门。寺院旁边还有一座12层高的灵塔。庙里有13个和尚。

抗战初期，八路军进驻新庄村后在暖岩寺建立了卷烟厂，有100多位工人。厂领导和工人均穿老百姓衣服。前院主要是工厂区，后院是厂领导陈主任（四川人）的工作区，是一个禁区。工人卷的烟比筷子还长，有马兰花、红宝石等牌子，为白皮烟，先是一盒装50根，后来为55根，从来不对本地人卖。寺内和尚也参加了抗战工作，有的还参加了八路军。

1939年3月，原任儿童团团长的郭沫成到龄参加八路军后，11岁的刘贵德接任儿童团团长，在村口和小伙伴们拿着大刀站岗放哨。不久，暖岩寺卷烟厂负责人陈主任到刘贵德家，征得刘贵德父母的同意和支持，让刘贵德到暖岩寺卷烟厂当了公务员，任务是做日常杂务及护送来往的信件。

刘贵德最早是到山西辽县（为纪念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1942年改名为左权县）麻田镇苇村给刘伯承、邓小平送信。后来刘伯承、邓小平又分别迁到黎城下黄堂、南委泉，于是，刘贵德就往下黄堂、南委泉送信。他执行任务最多的是给晋冀豫边区政府送信，也给八路军总部送过信。送信时，陈主任给他一张纸，上面写着目的地村名，走哪条路，经过哪几个村。

1939年秋，刘贵德往驻武乡王家峪的八路军总部送过两次信，两次送信间隔不超过一个星期。第一次去时，谷子还长在地里；第二次去时谷子已经被收割后垛在地里。当时，武乡的蟠龙、洪水还被日军占领着。第二次送信时，陈主任给了一个小本和太行区的两张《武乡小报》、《战斗快报》，在《快报》上面写着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住地相隔10多里。送信时，陈主任让刘贵德和同厂的张小堂一起，另外还派一个战士（后两人都是南方人）穿着便衣带枪负责保护。由于三人穿的衣衫都很破旧，于是信就塞在张小堂衣服上的一个破洞里。然后他们带上路条，按照陈主任指定的路线走到王家峪，并把信亲自交给朱德和彭德怀。到王家峪后，刘贵德见到朱德和彭德怀就在一个小院里，分别坐在两块石头上，在用石灰画的棋盘上下棋。由于送的信非常机密和重要，陈主任总是把信折叠成有两个十字的形状。回来时带的收条同样也经过仔细折叠，还是藏在衣服的破洞里。回来后，经陈主任查验收条，没问题才让走。有一次，因为装在身上的信不知什么时候给弄皱了，叠的形状有些走样，陈主任见到收条后，发了大火。而在第二次送信后不久，八路军总部就转移了。

那时，村里的张二明也给卷烟厂送了几年信。张二明主要往平头村、岭西沟那边送的信多。他不识字，从来不知道给谁送、送给谁，只按人家

的要求送就行了。有一次，张二明因好奇硬闯暖岩寺后院禁地，被人家捆起来差点给枪毙了。

师部电话总机房、 被服厂、养马房和宿营地

刘贵德家住在新庄村东南方向上，临近村边。他家左边街对面赵火旺家的院子就是一二九师师部电话总机房所在地。这个院子隔壁崖下有宽阔的干石河滩，河滩对面就是高山、峡谷、小道，遇有紧急情况便于观望和撤离。总机房是邓小平选定的，其中有刘伯承、邓小平的专用电话。机房有6个穿军装佩手枪的女话务员，也有男话务员，一天三班倒值守总机。电话线很粗，内为铜线，都埋在地下，通往周围的牛居、上下黄堂、茶壶山、金家岩、孔家蛟、佛堂凹、南埡等村。电话总机房有一个警卫排负责保护，警卫战士住在刘贵德家的楼上。还有一个巡逻班，住在路口的小房子里。

与总机房院子左侧隔壁相邻的就是被服厂。被服厂院子为二进院，都是二层居民楼，有300多名工人，楼上楼下有一二百台缝纫机，全天倒班工作。被服厂不仅有这一处，就是在其他人家中也有做被服的。还有染工队、裁衣队。被服染的都是灰色的。被服厂在新庄村有五六年时间，敌人“扫荡”时就转移到山上。刘伯承、邓小平常来检查，有段时间不到一个星期就来一次。刘伯承、邓小平和刘贵德家里人都很熟，两人还在刘贵德家里吃过一顿饭。邓小平直说好吃，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那时，刘贵德虽已到卷烟厂，但他和刘邓首长很熟。有一次，刘伯承提议让刘贵德到前线去看一下打仗，邓小平说他还小，就不要去了。

紧邻被服厂的张梦喜家的三间房为养马房。房里喂着七八匹马，这些马主要是给刘邓首长和警卫准备的。刘邓首长用时，电话一通知就把马送去。灾荒那年，部队的口粮从1斤半减少到7两，还主要吃的是野菜和高粱，大家都吃不饱。就连刘伯承的妻子汪荣华、邓小平的妻子卓琳都分配有挖野菜的任务，每天都必须交几斤野菜，以至于人们把山上的

野菜都挖完了。饲养马的战士有一个班，有人饿得不行就偷吃马料——黑豆。邓小平有一次用马时，马饿得牵都牵不动，邓小平就叫来班长，说，你就不能少偷吃点，叫马也吃一点，有点劲？这马一点劲都没有，哪行啊？！

新庄村后有一座大山，叫百堤山，山上有几处很大的崖，分别叫下黄崖、中黄崖、上黄崖。这些崖下的地方很大，如下黄崖长约120米，宽处约15米，窄处约8米；上黄崖长约400米，宽约6米。附近还有水，能住一个团的人。如遇战事紧张或特殊情况时，部队就住在崖下或地里。有一次，刘贵德和村里的老百姓见八路军约一个团的人进了百堤山，两三天没出来，原来他们就住在那些崖下。有时候八路军也宿营在地里。在打皎口滩阻击战的前一天晚上，八路军就宿营在新庄村的野地里，老百姓没人知道，只是第二天清早才发现地上睡着一片人，随后他们就一声不响地走了。

秘密交通站，为部队开会烧水、 送饭及地下党暗号

在卷烟厂期间，刘贵德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为部队领导开会时烧水、送饭。最早的一次是为晋冀豫边区领导人召集的一次会议烧水。新庄村的后边有个叫苇地沟的地方，高差有四五百米。苇地沟再往上有一处山崖，叫“避兵崖”，只有一条窄壕能上去，叫“西反井”，得用双手撑住两边的崖壁才能攀爬上去。有一次日军“扫荡”，刘伯承、邓小平就是进入“避兵崖”才躲过一劫的。苇地沟还有一座古寺，据说朱德到过那里。古寺顶上有一户人家，户主人称西湾老二。这次会议就是在西湾老二家开的。主持会议的是杨秀峰和薄一波，参加会议的是各县区的干部。开会报到时，参加会议的人得先到暖岩寺卷烟厂和看大门的人对上暗号，才让上山去开会。否则，看门的人会说不知道。就是在平时，陈主任接待外来的地下党时，也要对暗号。来人中，有穿长衫戴礼帽，看上去很有钱的；有穿破衣服，看上去很穷的。什么样的打扮都有，都说是来和陈

主任做买卖的。要是穿长衫的在门外问：有货吗？定些货。陈主任就说有或无；要是穿破衣服的说：给口饭吃吧。再问：师傅可以给点干的吗？陈主任说，可以。让他进来，给他点。这些话都是暗语。只有对上暗号后，陈主任才发话让人去开门。大门平时从外面锁着，开门的时候，里面的人从后院的小门出去，绕到寺前的大门开了锁放人进去，再从外面把大门锁上。

另外一次烧水、送饭是在1940年4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新庄村外的南辿沟主持召开会议。南辿沟是新庄村西南方向上的一条又大又深的山沟。在这条山沟往里1公里多地的小路边上只住有一户人家，并且屋子和院墙都是由沙石砌成的独家小院，院里有堂屋和左右两边的石屋。会议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左侧一间大一点的外房子里开的。刘贵德则在其隔壁的半间小屋里烧水。开会时，周围的山头上有8个人持枪站岗，而主人家里的男女三四口人则被集中安排到打谷场上暂时回避。参加会议的有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吕正操、陈赓、陈锡联。会议开了3个多小时，还吃了饭。吃的是由张小堂送来的玉米团子，红、白萝卜加萝卜缨子，烩着少量粉条。

一二九师师部迁驻南委泉

南委泉为黎城县西井镇辖村，位于县城北27公里处，西南至新庄村4公里。1942年前，刘伯承在辽县麻田镇苇村住。有一天，房东找他说有个事想请他说说情。刘伯承派人调查，村干部说村里在搞减租减息，房东家成分不好，想改成分，不想减租减息。刘伯承感到有点为难，于是就离开苇村，搬到黎城彭庄村，后来又到下黄堂村，住在莫二孩家的西院里，断断续续住了大约两年。刘贵德在卷烟厂期间，每次去给刘伯承送信，都是送到莫二孩家，有专人收信，还打收条，有时候也管饭。有一次，刘贵德还见刘伯承从莫二孩家西院里出来。莫二孩母亲还给刘伯承一个孩子喂过奶，为了保密，让孩子姓张，不姓刘。因为刘伯承经常外出打仗，只留家属在这里。抗战初期，邓小平在南委泉靳宝华家园地的三间房里

住过，走了来，来了走，陆陆续续也有两年左右。刘贵德也到靳宝华家园地给邓小平送过信。有一次，刘伯承、邓小平在一起，知道是刘贵德来了，刘伯承就喊：“是小刘来了吗？”叫他进去，并说：“小刘，好好干，不要怕死。”

一二九师师部驻地在战争中经常转移。大约在1943年春，驻河北涉县赤岸村的一二九师师部机关发生了一起打黑枪事件。有一对由上级派来视察的干部第二天就要举行结婚典礼，晚上睡在一起，结果半夜有人从窗外打了两枪，两人被害，案件未能侦破。邓小平恐怕暴露师部驻地，将师部转移到黎城南委泉村。南委泉除驻有师部外，还驻有生产部、军法处，生产部长是张克威。生产部在南委泉组织开荒的部队有500多人，主要是些病残军人，前后驻了八九年，开了很多地，主要种金皇后玉米、西红柿、山药蛋。有一天，刘伯承、邓小平正在岸上的小道散步，突然听得一声枪响，警卫排的人马上朝岸上包围过去，结果是一位老乡用枪打兔子。警卫员弄清情况后，要这个老乡赶紧离开。

八路军撤离新庄村， 领导的交代和惩治汉奸

由于抗战形势不断变化，1943年9月，八路军在新庄村南坳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首长有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及薄一波、杨秀峰等人。会议开了半天，随后部队就开始陆续转移。先是邻村牛居八路军野战医院撤离，后是新庄村暖岩寺卷烟厂，又隔了一个星期，驻新庄村的被服厂在一个晚上由村民牵着毛驴运送撤离。不久，部队全部转移走了。就在卷烟厂搬走前，厂里还请区、村干部聚餐了一顿。陈主任临走时交代说：“在反‘扫荡’中，新庄村牺牲了三名侦察员，这三人是地下党员，以后要在新庄村立个碑，把石金字、石字钱、石子月三名同志的名字刻在烈士碑上，并列入烈士名录，他们是为革命壮烈牺牲的，是光荣的。”从此，陈主任的交代成为刘贵德珍藏几十年的一个未了的心愿。

1940年秋末反“扫荡”时，卷烟厂曾在晚上往山上转移。陈主任让

刘贵德和张小堂去搬运物资，刘贵德才知道正殿大佛像下挖的地洞里，还藏有一部电台。电台就放在一个木箱子里。靠近寺庙的一户人家也曾看到八路军在他们家的大槐树上安装天线。这时，刘贵德年龄也稍大了，有些事也渐渐明白了，才知道这个卷烟厂是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有一年，交通站还送给新庄村民兵8杆枪。

卷烟厂搬走后，刘贵德就到驻南委泉的黎城县第五区政府工作，主要任务是给乡村送信。在这期间，日军对黎城进行大“扫荡”，进入新庄村连烧带炸毁掉了暖岩寺的7间房和刘邓首长的养马房。在抗日军民顽强的反“扫荡”斗争下，日军对黎城的这次“扫荡”成为最后一次。而在此之前，新庄村有一个人当了汉奸，竟然把暖岩寺中的大佛像送给日本人，后来这个人跑到武安后被抓住枪毙。另外，日军“扫荡”占据南委泉时，八路军军法处抓住一个来自辽县的汉奸，这人镶着两颗金牙，身上带着10根做着红蓝记号与日本人作联络用的火柴，就在新庄村外被处死。后来，日伪扬言，凡新庄村的人，只要被抓住，就别想活命。为了村民免遭涂炭，村名由“土地庙”改为“新庄”，直至今天。

参加八路军、观战团和整理档案

刘贵德在五区政府送信期间，萌生参军的想法，于是就多次报名。1943年12月，邓小平等首长把刘贵德叫到驻南委泉靳宝华家园地三间房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邓小平说：“这次参军你报了名，10月份的参军名单中也有你的名字，但军部考虑把你留下。”并嘱咐说：“你要有勇气参加革命，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去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们就放心了。”随后交给刘贵德一封信，让他到太行军区司令部报到。第二天，刘贵德就位于左权县桐峪村的太行军区司令部报到，月底被安排为作战处黄峰处长的警卫员，之后军部迁到河北涉县赤岸村。1944年8月，他还跟随黄峰以太行军区代表名义到延安，聆听毛泽东、朱德的讲话；随后参加由美国、苏联、加拿大等国组成的观战团，到山西汾阳观摩八路军部队作战。此后，他被调到太行军区侦察队，侦察队共分5个小组，每个小组两

三个人，刘贵德穿便衣在山西、河北、河南等地进行侦察活动。

在军部驻赤岸村时期，刘贵德做的一件极其重要而机密的事就是整理档案。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作为作战处派去的刘贵德和政治部、专案处分别派去的两个人，在武安县冶陶镇的一个村子里把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根据地，包括八路军总部、师部、军区在内的人事、军事等机密档案封装了二三十箱，每个木箱有1.5米长、1米多宽、1米多高，最后交给冀南总管备案处。平时，在装箱屋子的门口有两位警卫站岗，除作战处长、专案处长两个人可以进屋临时查阅一些资料外，其他人一律不准进入。保卫措施极其严密。刘贵德虽然没念过几天书，但由于在部队里指导员严格要求，背不下字来就不能吃饭，逼着他学了点文化。因是黎城人，所以他偷偷地看了看发生在黎城县的一些重要事件的资料，并把这些机密隐藏到记忆深处。

活捉孙殿英、押送俘虏

解放战争时期，刘贵德从太行军区司令部侦察队到了刘邓首长的警卫团，长期跟随和保护刘邓首长。在汤阴战役结束时，刘邓首长命令，全城搜捕，凡是有麻子脸的人就给弄回来，结果抓了很多麻子脸的人。最后找到一个满脸有麻子的人，穿着破衣服，是他老婆从洞里把他拉出来的。原来这个麻子脸是曾盗掘清东陵的孙殿英，被俘前为国民党第三纵队司令。

刘邓大军出太行时，部队曾在黎城长宁村进行整编。千里跃进大别山后，抓了很多俘虏，里面还有100多名日本人，是日本投降后当了土匪的。邓小平说，我是从太行山出来的，还是黎城编制，要把所有团长以上的俘虏，全都给我押回老根据地黎城，就是有上千里路也要押回去。于是，部队遵照命令，派了一个加强连，还配了一个邓小平所说的“横队”（区别于正规部队“纵队”，由黎城等县民兵组成的民兵连），千里迢迢，押送着200多名俘虏到黎城县境内，交由驻地部队和黎城民兵看管。

八路军首长们的心愿

抗战期间，刘伯承、邓小平曾长期在黎城南委泉、西井、长宁等村战斗生活，多次到新庄开会检查工作。1942年春夏，邓小平、徐向前在刘贵德家曾说过，咱们出来抗战这么长时间了，吃糠咽菜，辛辛苦苦，就是为了让全中国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一定要让后人知道。朝鲜战争爆发后，刘贵德被派到朝鲜志愿军警卫团，刘伯承和邓小平在武汉对他说：将来咱们只要活着，以后你从朝鲜返回来，一定把咱们在黎城的时候吃糠吃野菜吃黑豆，和咱们在太行山军民生死与共，八年抗战，辛苦打仗的情况——这你也知道，给咱们留下个名放到那儿，祖祖辈辈知道咱们在那儿吃了苦了。这个名，我们当干部的，也不能直接去要。刘邓两位首长的谈话，显示出他们对太行山的深厚情谊，也表达了他们在战火纷飞年代的一个真诚的心愿。而他们留名的本意，就是要把他们在太行山的这一段历史写下来、传下去。

刘贵德在部队服役长达11年时间。抗战胜利后，曾跟随刘邓大军参加了上党、平汉、汤阴等战役，接着挺进大别山，解放大西南，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退伍后到山西晋城工作，于1986年离休。至今，刘贵德每当回忆起抗战时的情景，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甚至是流泪，因为至今他有一个心愿，就是遵照抗战时期暖岩寺卷烟厂地下党陈主任的交代，给三位地下党烈士立个碑，并恢复暖岩寺。然而，作为一位太行老八路，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这个愿望还远未实现。不仅如此，在刘贵德的愿望中，何尝不想为刘邓首长在黎城县新庄村树立一个丰碑啊！一二九师干部战士曾长期保卫八路军总部转战、开拓根据地，战斗生活在黎城，黎城却没有一处国家级纪念馆。为此，他正向有关部门呼吁：要在黎城为抗战期间的那三位地下党烈士及其他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建立起一座永恒的纪念碑，以了刘邓首长和他个人已超越半个多世纪的心愿。

背着遗骨上战场 夫妻恩爱不分离

——刘咸一和余澄的革命爱情

刘大伟

我的母亲余澄是晚清进士、翰林余宝淩的四女儿，金陵女子大学多才多艺的高材生。我的父亲刘咸一天赋过人，由放牛娃成为东三省“头名状元”，从而得到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奖学金资助，留学日本和德国，成为化学专家。由于志同道合，他们两个知识分子成为了一对革命夫妻。我外公广邀各界名流，在北平城为他们办了极为豪华而洋气的婚礼，以掩饰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余家大院也成为共产党的据点和交通站。父母双双投奔延安后，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然而，没几年，母亲因病英年早逝，留在了宝塔山下。父亲奔赴东北前，拿出一张毯子嘱咐战友，如果离开延安，一定要将我母亲遗骨带走。后来，战友们履行诺言，辗转千里，历尽千辛万苦，将我母亲遗骨带给在东北战场的我父亲。从此，我父亲带着我母亲遗骨征战南北……

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当了地下党员

母亲生于1907年，是余家大院的四小姐。她气质高贵，风度优雅，一副眼镜又使她平添了几分书卷气。就连延安时期的老前辈提起我母亲时，都用“美若天仙”、“才华横溢”来形容。母亲聪明好学，读书成绩很

好，甚得外公欢心，后来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作为体育系的学生，母亲篮球打得很好，还曾带球队出去比赛并获奖。不仅如此，她的英语十分流利，还会唱京剧，我那宠爱她的外公甚至为她置办了相当专业的行头。从母亲遗存的手迹中，还可以发现她的书法也挺好。如此才貌双全的余家四小姐，后来迅速接受进步思想，投身革命，并于1933年经彭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教育家吴怡芳在谈到金陵女大的光荣传统时，曾举例说我母亲是金陵女大最早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

说到母亲的革命历程，就不能不提到靖任秋和彭文夫妇这一对革命老前辈。他们不但是母亲的战友、挚友，更是母亲的革命领路人。

靖任秋、彭文夫妇是黄埔军校的早期学员。靖伯伯和彭姨分别于1925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北伐和南昌起义。卢沟桥事变后，靖伯伯根据周恩来的直接指示，打入国民党高层，潜伏下来，最高当到国民党少将副师长。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策动了国民党将领高树勋在邯郸率部起义。他历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1996年逝世，享年91岁。

彭文在南昌起义后曾跟随朱德转战于闽、粤、赣三省界的山中，后被派驻湖北省委机关，当特委交通员。解放后，她曾任北师大女附中第一任校长、教育部中学教育司和普教司副司长。

母亲早在金陵女大读书时就认识了彭姨，并成为好朋友。1932年，彭姨和靖伯伯到北平从事革命工作，形势相当困难，连食宿都成问题，就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也就是我的母亲余澄，于是他们走进了余家大院。母亲和外公热情地接待他们。从此，余家大院成了共产党的交通站和据点，为靖伯伯和彭姨他们撑起了一把大大的保护伞。1933年，彭姨介绍我母亲入党后，两人便常常一起执行任务。有时打扮得漂漂亮亮，好像去参加舞会，其实是去传递情报、贴标语、撒传单。

从放牛娃到留洋专家

我的父亲刘咸一是黑龙江望奎县人。他小时候家里比较穷，虽然父

亲渴望读书，但家里没钱，只好去放牛。

父亲直到十几岁才得以上学读书，但他聪颖过人，读起书来又如饥似渴，其进步令人咋舌。那时候，东北王张作霖虽然是个军阀，但十分重视教育。为了培养人才，他设立奖学金，官费资助学业优异的拔尖人才出国深造。有一年会考，父亲一举夺得望奎县第一名，继而又考得东三省的第一名。于是，他有幸认识张作霖，并以东三省“头名状元”的身份得到奖学金资助，于1927年东渡日本，到明治专科学校学习化学专业。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遇难，但少帅张学良同样支持派人出国留学。听说在父亲留学日本期间，张学良还到过日本，并亲自点名接见了我的父亲。在日本明治专科学校留学这三年，父亲眼界大开，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学习，不断探求知识和真理。1930年，父亲从日本毕业回国。恰好此时张学良也设立奖学金，鼓励优秀人才出国学习。父亲再次一举成功，获得到德国的柏林工业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

德国深造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和命运。父亲不但成为一名化学专家和机械学专家，而且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父亲于1930年加入由高尔基、宋庆龄发起成立的“反帝大同盟”，投身革命，并在1933年由江隆基、王炳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时，中共旅欧总支部设在法国，在德国设有支部。为了工作方便和保密起见，德国支部对外称“德国语言组”。德国支部的前三任书记分别是朱德、谢唯进和王炳南，第四任书记就是我的父亲。在德国的革命活动中发生的一件大事，影响了父亲的后半生。

1936年，在巴黎中共旅欧总支部工作的吴玉章，用平信给柏林的中共德国支部布置党的工作和有关活动。此前，大家用平信通信，没出过问题。但是，这次吴玉章的信不幸被国民党政府驻德国大使馆特务截获，并知道了全部内容。国民党驻德国大使程天放与德国纳粹的“冲锋队”勾结，企图破坏我们党的组织。于是，他们就把截获的信件原样糊好，投放到“德国语言组”的地址，并布置特务，准备抓人。到那里取信的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当场被捕。然而，当时的“反帝大同盟”是公开的，父亲在其中也已挺有名气。他的被捕，激怒了“反帝大同盟”，从英国

到法国、德国，都有人起来声援我父亲，听说当时欧洲不少报纸都有文章声援，呼吁立即释放。而且，国民党的报纸也登了父亲被捕的消息。敌人拿不出什么证据，又承受巨大舆论压力，将父亲关了十多天后，不得不放人，但同时宣布将父亲“驱逐出境”。对这段历史，吴老在他的回忆录中也专门作了记述。

几年前，我去拜访当年也是反帝大同盟成员、已近百岁高龄的革命老前辈温朋久（温家宝同志的四爷爷），他大概是当时“德国语言组”唯一健在的老党员了吧。我带了一张父亲当年在德国拍的老照片给温老看，问他是否认识照片上的人？老人看到照片后，两眼顿时熠熠发光，拿过照片紧紧贴在胸口，几乎是喊着说：“刘咸一，刘光德，我的好兄弟呀！”97岁的老人，不但能叫出数十年前的战友真名，还记得他的化名“刘光德”，真让人不由得感叹，也说明父亲那时候很活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豪华婚礼上的革命夫妻

被驱逐出境后，父亲离开留学和战斗6年的德国，转道法国、英国、苏联回到北平。父亲回国后，和党组织联系不上，心急如焚。父亲这一辈子还真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结下不解之缘。在极端困难之时，他又找到了张学良。张学良看到当年那个英气勃勃的青年学成了专家，十分高兴，热情招待他，随后又亲自介绍他到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当了一名“上校咨议”。更令人预料不到的是，竟然又是张学良帮父亲找到杨秀峰同志（解放后曾任教育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接上党的组织关系。

西安事变前，由于父亲既是东北人，又曾得到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奖学金资助出国留学，组织上就利用这层特殊关系，让他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根据组织安排，父亲做了不少统战工作，并于1936年去西安直接做张学良及其部下的工作。然而，父亲到西安的事情被国民党政府知道后，便以父亲在德国被捕一事为由，通告张学良，说我父亲是共产党分子，不能留用。父亲只好离开西安，重返北平。

父亲回到北平后，正是通过靖伯伯和彭姨牵红线，认识了母亲。不久，两个志同道合的共产党员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情投意合。我那深明大义的外公，为他们在北平城里公开举办豪华的婚礼：披着红绸、扎满鲜花的小汽车接送新人；后面跟着大乐队吹吹打打；大饭店里大宴宾客，到场的都是各界名流；新郎西装革履，新娘披着婚纱，并拍了现在看着都很时髦的结婚照。余家大院张灯结彩，热闹了好多天，连大家族里的每一个小孩子都得到了是一套漂亮新衣裳：女孩子是纱质连衣裙，男孩子是小礼服……几十年后，表姐、表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豪华、气派、风光的婚礼就像一阵风似的，很快刮遍了北平城。大家都知道余家大院余翰林的四小姐结婚了，丈夫是个留洋归来的专家，郎才女貌！这正是我的外公为了掩护我父母的共产党员身份而释放的一颗又大又美丽的烟幕弹。办这么豪华、气派、排场的婚礼，谁会怀疑他们是共产党员呢！

比翼双飞在延安

婚后不久，组织上就派父亲和母亲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董必武同志手下工作。在那里，他们结识了叶剑英等许多同志。随后，他们又随董老去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9年，父亲和母亲在红岩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同志了解我父母的情况，知道他们既是职业革命家，又是党内学有专长的专家，还通晓多国语言文字，延安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当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从重庆返回延安时，就带上我的父母。于是，父亲和母亲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在延安，父亲所学的化学知识有了用武之地，派上了大用场！他是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最早的筹建者之一，又在化学系任教。父亲还先后担任了振华造纸厂、丰足火柴厂、玻璃厂、陶瓷厂、化工厂厂长以及军工局工程处处长等职。

父亲担任振华造纸厂厂长时，正是国民党封锁延安、根据地物资供应匮乏、军民生活困难的时候。吃穿自不必说，用纸尤其紧缺，连中央机

关的办公用纸和印刷边币的用纸也几近断档。看到这种情况，父亲心急如焚。于是，他就带着技术人员和工人到处搞调查研究。不久，他们把目光盯在了延安满山遍野的马兰草上！经过父亲和全厂技术人员、工人的反复试验，造纸终于成功！大家给这纸起了个美丽的名字——马兰纸。马兰纸研制成功后，振华造纸厂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不仅解决了党、政、军机关的办公用纸和《解放日报》的印刷用纸，还解决了更高级的边币用纸。为此，朱德总司令不仅当面表扬了我父亲，还在1942年的《游南泥湾》一诗中，写下“马兰造纸俏”的佳句以示赞扬。

在父亲日以继夜全身心工作的同时，母亲也没闲着。母亲一方面鼎力支持和辅佐我父亲，尽心照顾好家庭；另一方面在延安女子大学任教，而且又当会计又当文书，忙得不可开交。她还教厂里的工人识字、学文化，教年轻的知识青年学理论，在工余时间组织和带领青年人打篮球。节假日，延安的年轻人十分喜欢到我父母亲的窑洞里聚会，说说笑笑，亲密无间。有时，母亲还会拿出她的绝活，给大家唱一段京剧娱乐娱乐。从1939年5月到1944年4月，父亲和母亲在延安度过了人生最辉煌、最幸福、最值得珍藏的日子。

父亲背着母亲遗骨征战南北

1944年春，母亲突然生病发高烧，嗓子眼儿肿得像蜂窝，喘不上气来，被送到延安的中央医院急救了3天，但是因当时医疗条件太差，缺医少药，不治身亡，年仅37岁！父亲和同志们把我母亲埋葬在宝塔山下，下葬时我刚刚3岁半，模模糊糊有点印象，是其他阿姨抱着我站在旁边。父亲后来一提起母亲最后的日子，总爱说：“你妈妈真坚强，病成那个样子，咬着牙连哼都不哼一声！”37岁，那是多好的年华！才貌双全的母亲就这么走了，留下一对幼小的子女，带走的是父亲满腔的爱恋和永远的思念。

母亲一走，父亲不仅要负责繁忙的工作，还要照顾一个3岁、一个1岁多的孩子，生活十分艰难。中央对我们一家十分关怀，不仅给父亲多派了

一名勤务员，还给牵来两只奶羊，挤羊奶给我们喝。白天，父亲用繁忙的工作打发自己。可下了班，他会悄悄地采几朵野花到母亲的坟前，献上花，坐在旁边默默流泪，喃喃倾诉。

1945年9月，中央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派去大批干部，父亲也随林枫率领的干部团奔赴东北。临行前，父亲把一件大衣送给一位姓马的叔叔，又递给他一条毛毯，说：“你们什么时候离开延安，就请帮我把余澄挖出来，把她的遗骨用这条毯子包好，无论如何都要想法子带给我！”看到这个场面，在场的人都哭了。

后来，留在延安的叔叔阿姨们，不忘我父亲的嘱托，当他们即将离开延安时，刨开了我母亲的坟。令人吃惊的是，可能由于黄土高原极干燥的缘故，母亲的遗体竟完好无损，只是头发显得有点凌乱。年轻的金正阿姨拿了梳子给我母亲梳头，母亲的头发就像秋天的枯树叶似的，刷刷掉落了。此情此景，金阿姨终生难忘。叔叔阿姨们找了块铁板，把我母亲放在上面火化了。他们还做了一口小棺材，刷上红色的油漆，把我母亲的大部分遗骨放进去，安葬在延安。把几块大一点、整齐一点的遗骨，用父亲留下的毯子包好。其后，不知辗转了多少人的手，辗转了多少里的路，辗转了多少时间，母亲的遗骨终于送到了父亲手中。革命战友间的那份信义，那份深情，叫人怎能不惊叹！后来，父亲每次行军时，总把母亲的遗骨带上。见证这些事情的叔叔阿姨给我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无不感叹唏嘘，潸然泪下。

当年采访数学家陈景润

顾迈男

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一次采访中了解到，在数学基础理论方面作出世界先进成果的陈景润处在病危中，处境艰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出于一名新华社记者的责任心和对那个年代科学家不幸遭遇的同情，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写成几篇内参，这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使陈景润终于得以治疗。在长期交往中，我和陈景润结下了诚挚的友谊，知道了陈景润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初识陈景润

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春日，我在中国科学院参加一次报告会，听当时中科院负责人武衡在报告中说：“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他未讲姓名），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武衡讲的这位年轻的数学工作者是谁？听到这里，记者的敏感驱使我立即询问坐在旁边的中科院的一位局长。

“哦，他叫陈景润，病危啦！是个怪人！”

听了这番话，我心想：既然作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又病危了，此人一定有采访价值。于是我决定立即找到并采访陈景润。

次日早晨，我来到位于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说明来意后，

接待我的一位姓罗的“革委会”负责人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注视着我，慢吞吞地说道：“噢，你找陈景润，你找他干什么？”“我想采访他，听说他作出了一项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我答道。那位负责人眯缝着眼想了想，说：“这个人生命力很强，中关村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说他快不行了，而他至今还活着……”那位负责人用极为冷漠的语气讲了上述一番话，苦笑了一下，又说：“反正他也不能去工厂、去农村搞成果推广，他搞的那个哥德巴赫猜想也没啥用处，我们都懒得理睬他。”那位负责人说着说着，陈景润恰巧来了，笑嘻嘻地站在了我的面前。

我望着这位采访对象，惊诧不已。当时已是暮春时节，而他还穿着一身蓝色的棉袄棉裤，戴着一顶破旧的蓝色鸭舌帽。在场的人大概看出了我的惊讶，便说，陈景润因为患结核病，常年发低烧，因而这般模样。

“陈景润，这位是新华社记者，她要采访你，你要老实回答问题！”陈景润大概已经习惯了别人用这种语气对他说话，对那位负责人充满训斥的话语并不介意，苍白的脸上依然洋溢着笑意，不停地对我点头说：“谢谢，谢谢……”

为陈景润写内参

在这之后，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天天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找陈景润和研究所业务处的负责人等采访。通过相关资料和大量的采访，我知道了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大体情况、陈景润的研究成就和身体、生活状况。

1742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给大数学家欧拉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了两大猜想，一个猜想是，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是2个素数之和；第二个猜想是，任何一个大于5的奇数，都是3个素数之和。欧拉给哥德巴赫回信说，他相信两个猜想是对的，但是，他不能证明。

18世纪、19世纪的许多数学家研究过哥德巴赫猜想，但都没能作出证明，以至到了1900年，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在第二届国际数学会的著名演说中，把哥德巴赫猜想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未能解决的数学难

题之一，留给20世纪的数学家们解决。然而，要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很艰难的，1921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国际数学会上，德国数学家朗道十分无奈地说：用现今的数学方法，要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力不可及的……

自从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提出那个著名的猜想以来，在2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前150年研究它的工作进展始终不大，直到后来才陆续有了些成果。

我国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年轻的助理研究员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很感兴趣，他兴奋地关注着国内外数学家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对人说：“我不想和中国人比高低，我要和外国人比高低！”

在厦门大学读书时，陈景润听老师们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华罗庚就研究过哥德巴赫猜想，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因此，他首先钻研了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不仅读，而且按照自己的思路演算。后来，他给华罗庚写了信，附上自己的论文《塔内问题》。在论文中，他对《堆垒素数论》书中的5个定理进行了修正。华罗庚看了这篇论文后，问自己的学生、数论组负责人王元等人：“这个陈景润是干什么的？”王元等把听说的陈景润大学刚毕业、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情况告诉了华罗庚。华罗庚很高兴，认为“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很有培养前途。”在华罗庚的建议下，陈景润于1956年秋天被调入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陈景润对我这样说过：他“是华先生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走后门’调来的人。”从此以后，陈景润更是潜心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甚至在十年动乱中也没有停止过。

1965年冬的一天，陈景润兴冲冲地交给王元一篇论文，题目是《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共200多页。经过认真研究，王元认为这篇论文的论证是正确的，同时提出还必须进一步简化。

“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数学术刊物停刊。1966年5月，《科学通报》仅发表了一页简报，公开了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结果，但对此国内外的许多数学家不相信是真的。《中国科学》复刊后，1973年陈景

润在该刊发表了作了大量简化与改进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共20多页。王元等人看了他的这篇论文，惊喜地发现：从1960年到1972年，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作出了超越前人的独创性成果，既超过了国内的水平，也超过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陈景润所从事的这项题为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是一项基础数学研究工作，虽然一时还不能用在工农业生产上，但在国际上还是很有影响的。我还听中科院数学所的同志说，陈景润是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取得这些研究成就的。陈景润当时患有严重的结核病，仍潜心研究，用过的稿纸有几麻袋，体力不支时，就买些便宜的人参泡水喝。他每月只有80多元的工资，三年困难时期，他把自己节省的几十斤粮票捐给了灾区……可是，陈景润病情已经很严重，中关村医院已经多次给数学所下达病危通知书，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了解到陈景润在数论方面的杰出成就和他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的处境，我怀着极大的同情心和记者的责任感，在采访后，赶写了两篇内参稿件：一篇题目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另一篇题目是《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我在内参稿中详细记述了我了解的上述情况，并呼吁有关部门能关心关心陈景润，给他治治病，让他把这项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和陈景润成为好朋友

上述两篇内参稿件以及后来我接连采写的十几万字的关于陈景润的内参稿件，都受到新华社国内部有关负责人和编辑们的热情支持。他们及时将我写的稿件排成清样，迅速送给了中央领导。在这之后不久，我便接到当时的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的通知，要我陪同有关负责人（其中有迟群、武衡等人）到中科院数学所看望陈景润。

1973年4月25日凌晨3时左右，我们乘坐几辆小汽车，浩浩荡荡地来到中关村数学所的宿舍。穿过暗黑的走廊，来到了陈景润仅6平方米的小

屋。门打开后，我们看到陈景润正在稿纸上书写，进行数学研究，床上的铺盖还没有打开。见我们来了，陈景润呆呆地站在床和桌子的狭缝里，惊恐不安地看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他不知我们的来意，不知所措地沉吟片刻后，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我……”他解释他在听英语新闻广播，表示他关心政治，并非搞数学研究。他之所以如此惊恐和辩解，是因为那时对他专心搞研究、不问政治进行过严厉的批判，他曾表示今后不再搞业务了。他以为我们是半夜来检查的。

那天，我们突然进入陈景润的小屋，陈景润惶恐不安，我也被映入眼帘的景象惊呆了：房内靠墙放一张单人床，床前放着一张三屉桌，桌子上、床上到处都堆放着书籍、资料，窗台上、地上放着几个破饭碗、药瓶子，碗里剩有干了的酱油……同行的中科院的同志说，为了节省，陈景润平时不吃菜，用酱油泡水就着饭吃。“好长一段时间，陈景润因患病，发低烧，只拿80%的工资，而他房间里的灯夜夜亮着。”见这情景，我的眼睛不知不觉地湿润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那个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里，竟然还有像陈景润这样痴迷于科学研究的人。

刚刚获得解放的中科院负责人武衡向陈景润说明了来意，要陈景润到清华大学检查病情。陈景润这才释然。在这之前，武衡告诉我说，毛主席、周总理，还有江青等，看了我写的两篇内参，批示有关部门关心一下陈景润，并按内参提出的要求，给陈景润治病……原来，武衡等人深夜造访陈景润，是奉命来带他看病的。

这天凌晨，武衡等人把陈景润带到清华大学的一个会客室，坐下来以后，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陈景润听了，苍白的脸上漾起了笑意，用带有福建口音的话喃喃地说：“谢谢！谢谢！谢谢毛主席的关怀，我没有作出什么贡献……”随后，同行的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专家张孝骞等几位医生给陈景润检查了身体，然后，对陈景润说：“你需要系统的持续的治疗，需要休息，增加营养，只要肯住医院，你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几天以后，陈景润便被送进了解放军309医院。

住院治疗，是陈景润很不情愿的。送陈景润进医院的那天傍晚，我被邀请跟随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及中科院负责人一同前往。于是，我们

再次来到陈景润的宿舍，见我们来了，陈景润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迟迟不肯动身，并明确表示不愿意住院，数学所的负责人问他为什么？陈景润很小心地说：“再来了运动，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是修正主义苗子，住医院要花国家很多的钱，是会受批判的！”经过再三劝说，陈景润很勉强地跟我们走了。

我被安排同陈景润、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负责人同坐一辆车。途中，那位负责人问陈景润，听说你在银行里存了很多钱？你的生活国家负担，你存那么多钱干什么？陈景润听后，思忖半晌说，“文化大革命”中，数学所的造反派来宿舍把他的存折都拿走了，最近才还给他。他说：“我身体不好，怕将来退休后生活困难。因此，我把钱都分散存在了中关村附近的几个储蓄所里……”

说话间，我们来到309医院。由于事先打过招呼，因此，医院很重视对陈景润的接诊工作，各级医护人员都赶来了。护士拿来了病号服，要陈景润换时，无论人们怎么劝说，他也不肯脱下那身厚厚的棉衣、棉裤。最后，不得已把白色的病号服套在了他的棉衣棉裤上。见这情形，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那位负责人让在场的医护人员出去以后，说：“陈景润，把存款单拿出来吧！”陈景润不情愿地从棉袄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递给那位负责人。随后，那位负责人又递给了同去的中科院数学所负责人。

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那位负责人问陈景润：“你这里面共有多少钱？”

“不知道，现在我的脑子很乱！”陈景润说。

“这样吧，我念，你记。”那位负责人对我说。

一张张存单最后算下来，共有6000多元人民币。另外，还有两块手表。

“这些存单请你们所长带回去，锁在研究所的保险柜里，你在这里安心养病，等病好了，回到研究所时再还给你。”那位负责人说。

陈景润听了，无奈地点了点头。但是，住院期间，他还是偷偷跑回数学所，要回了那些存单，由自己保存。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陈景润的病情大有好转，我不时地去医院看望他，随时把他的病情通过内参向上反映。从这以后，我和陈景润成了好朋友。他从一次次无形受到的关怀中判断，我大概是他唯一可以讲真话、可以信赖的朋友。

向我倾诉出名后的烦恼

陈景润成名后，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四人帮”垮台以后，科学界恢复职称评定工作，他第一批被评为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还在中关村分给他一套宽敞的住房。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陈景润被安排坐在主席台上，并作报告，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科技人员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报告中，他用了整整一段的篇幅，讲述了新华社记者对他的帮助。

在这之后，我发现陈景润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作为老朋友，我曾委婉地批评过他。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人大开会期间，我和他在京西宾馆相遇。那天，他精神焕发，笑容满面，他对我谈了成为名人后的种种苦恼，也谈了研究哥德巴（陈景润这样称呼哥德巴赫猜想）的进展。谈话中，他向我诉苦说，出名了，有很多记者在各种场合老是围着他转，弄得他很烦。有的记者甚至半夜去敲他的门，他问我怎么样才能摆脱这些记者。他还笑着对我说：“深更半夜地来敲门，谁知道他是记者还是小偷？”“不过，顾大姐，你例外，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心里很不舒服，对他说，新闻记者都是我的同行，人家采访报道你，是好意，你不应该把深夜来采访的记者和小偷等同看待。然后，我对他说，以后我也不会随便打扰他……

不过，即便是这样，陈景润仍把我视为知己。有一天，他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家中，对我说，他要结婚了，征求我的意见。我祝贺了他，对他说，这纯属他个人的私事，请他自己决定。

“陈景润回来了！”1979年6月的一天，中科院数学所业务处负责人乔立风打电话给我说。我问陈景润现在在哪里，乔立风说在他原来那间

6平方米的宿舍里。于是我赶到了数学所，和乔立风见了面，一起去宿舍见陈景润。

乔立风说，陈景润提升为研究员后，研究所给他安排了宽敞的住房，“但是，他仍然不肯搬家呀！”谈话间，乔立风陪我来到了陈景润的宿舍门前。正要敲门，陈景润已经从门里迈出来了，笑着邀我们里面坐。这天，陈景润上身穿了一件褪了色的中山装，下身穿一条“的确凉”裤子，留着小平头，除了人显得胖些外，和以前相比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宿舍里，床上、桌上、地上、窗台上，仍旧堆满了书。

“你还住这间小房子啊？”我一面环视宿舍的摆设，一面问。

“早就叫我搬家，我没搬。现在大家住房都很紧张。我只有一个人，这就够好啦。”

我们之间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陈景润兴致勃勃地向我谈了不久前他访问美国的观感。他说，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所长伍尔夫教授分别给他和著名拓扑学家吴文俊来信，邀请他们前往参观访问。他和吴文俊夫妇、一名翻译于1979年1月6日到达普林斯顿。这个研究所是世界著名的研究中心，经常邀请各国知名的学者前去访问，那里环境幽静，类似我国北京的香山，有茂密的森林，如茵的草地和盛开的鲜花。最使人感兴趣的是这里的图书馆藏书很多，一天24小时开放。各国科学家有时在阅览室喝茶的时候也交流学术思想。

“我还是老毛病，喜欢一个人在图书馆里看书，有时也参加茶会，但是不多。”他笑着说。然后，他继续告诉我：“我也同各国科学家交谈，印度、意大利、日本的都有。大家在黑板上演算各种各样的题目。这个研究所分物理、数学、历史3个研究部门，行政负责人是美国人。但是，在这里工作的科学家大都不是美国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最后在这里去世。我和吴文俊教授在这里参加了纪念爱因斯坦诞生100周年的纪念会。”

陈景润告诉我，他到普林斯顿主要是参观、访问，继续搞自己原来的研究工作。访问期间，应邀到普林斯顿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各国科学家对他以往在数学研究方面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赞誉他发表在

《中国科学》上的关于哥德巴赫问题的研究成果是著名的“陈氏定理”，还称赞他在“筛法”问题上有很大贡献。美国以及英、法、德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所也曾邀请他前去讲学或短期工作，由于他感到国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都婉言谢绝了。

“几个月以来，通过和各国同行共同探讨数论方面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也增强了相互间的了解，这对大家都是有益的。”最后，陈景润说。

谈到今后的打算，他说了两个字——“念书”。

对于成名后忙于各种事务，陈景润也还是很清醒的。他说：“现在学术活动以外的事太多了，太分散精力了。我非常想静下来念书。不然，就要落后了，就要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了。”然后，他告诉我在美国访问期间，他收到了中外人士上万封来信。对此，他很无奈地说：“我很想都答复，实在没有时间啊！”

这次采访以后，我针对当时社会上传说陈景润可能在美国不回来了的种种谣言，写了一篇通讯，题目叫《他还是他》。新华社播发后，1979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及各报在显著位置刊出。

从哥德巴赫提出那个著名的猜想，到陈景润的论文发表，中间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陈景润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英国数学家赫胥黎在给陈景润的信中赞叹说：“啊，你移动了群山！”如今，陈景润早已驾鹤西去。前些年，他的遗物、手稿被永久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里，供世代瞻仰、缅怀。他的名字和业绩，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英雄人物一样，将永垂青史。

采访丁肇中印象

顾迈男

丁肇中是继李政道、杨振宁之后，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华裔科学家。我与丁肇中教授相识，已是多年前的事了。在与他的交往中，我时常想起他在获得诺贝尔奖时的那段著名演讲：“我是在旧中国长大的……我希望由于我这次得奖，能够唤起在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的兴趣，而注意实验工作的重要性。”这段话，充分表达了丁肇中对祖国的一片深情，也使我对他产生了敬意。

初次采访

1979年秋季的一天早晨，我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采访时，听说了丁肇中要来中国访问、讲学的消息。在这之前，我对丁肇中一无所知。

丁肇中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访问，可我无缘与他相见，他的名气和成就是那样的显赫，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对他的采访报道工作，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对此，我有些踌躇，为了完成好采访任务，决定求助中国科学院当时的负责人方毅。

听了我的想法后，方毅说：“丁肇中教授对我国培养实验物理人才，很热心。我们的高能加速器（也就是目前正在运行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后，很需要他的帮助，希望你能像采访报道李政道那样采访报

道丁肇中。”

我一般是在正式采访本人之前，先做外围采访，对于将要报道的人物有足够了解之后，再与采访对象接触。这样做的好处是，有了充足的素材，不至于临时慌乱。就这样，在丁肇中到来之前，我用半个月的时间访问了中国科学院到丁肇中实验组工作过的科学家唐孝威、郑志鹏等人，阅读了丁肇中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以后写的文章《个人的回忆》。正当万事俱备时，不料直接采访丁肇中时却遇到了麻烦：中国科学院外事局美大处的负责人以种种借口，拒绝安排我直接采访丁肇中。

那时，我年轻气盛，一气之下把他告到了方毅那里。很快，方毅的秘书郭曰方便通知我说，方毅批评了那位负责同志，他们已经安排我到北京饭店会见并采访丁肇中。就这样，我与这位物理学家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秋日。午后，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北京饭店旧楼的一个会客室里。下午2时半，丁肇中教授走进了和我会见的房间。那天，他身穿黑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满面红光，英气勃勃，看起来不像43岁的人。他笑着和我握手问好，然后坐下来认真地听我提问。

“听说您领导的实验组近来找到了胶子存在的证据，祝贺您啊！”

丁教授笑吟吟地听了我的开场白，说：“最值得祝贺的事情，是中国人民决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随后，他使用带有山东日照口音的普通话和我交谈起来。

丁肇中离开中国台湾去美国求学时只有20岁，他靠奖学金念完了大学，用6年时间获得美国密执安大学的博士学位，曾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20世纪70年代初，丁肇中带领一个实验组在美国东海岸的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把一束高能量的质子打在铍靶的原子核上，发现了一个重量比质子重3倍多的粒子，就是著名的由丁肇中亲自命名的J粒子。丁肇中因此获得1976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

在这之后，丁肇中带领一个由各国科学家组成的实验组，在欧洲和美国的各大加速器上继续做实验，寻找新粒子。

采访中，丁肇中对我说，高能物理这门科学发展非常迅速。自从伽利略从比萨斜塔上丢下两个大小不同的物体证实了重力加速度是一个常数，即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直线加速器吧。到19世纪末期，光的发现，相对地说也算是当时的高能物理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子的发现以及后来越来越多的新粒子的发现，使高能物理研究的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对仪器精密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为它探索的粒子越来越小。而且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当时，中国正在酝酿建造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对此，丁肇中说：“在加速器建成前，物理人才的训练，实验题目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否则，加速器虽然建成了，很可能做不出像样的物理实验。”

这是我对丁肇中的初次采访。从那以后，我开始了与这位物理学家长达十几年的密切交往。

虽是初次相识，但我发现丁教授非常坦率，平易近人。初次谈话时，他就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做科学研究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因此，在生活上应当尽量让科技人员不要为生活琐事分心，他说：“一天回家做三个钟头的家务，做饭、买菜，那还搞什么科学研究？”

访问快结束时，我请他谈谈自1975年以来，四次访华的观感，他笑着坦率地说：“1975年我来的时候，在北京和科学家们谈了谈。那时，没有人谈科学，科学家们都处于恐慌状态。1977年我再次来访，科学家们兴奋地告诉我，他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这次回来，我见到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已经开始，慢慢地也有个计划，大批的留学生、研究生、访问学者也都派出去了，和几年前相比，大不一样了！”

采访过后，我写了长篇通讯《丁肇中教授谈科学实验》，新华社对国内外播发后，被报刊广泛采用。

到日内瓦采访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过了9年。1988年夏天，我在北京饭店再次见到了丁肇中教授。我发现，9年的时光在他身上仿佛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他

依然是那么年轻，那么幽默，那么雄心勃勃。见面后，谈到分别几年的情形。我把刚出版的《华罗庚传》一书送给他，还谈了采访邓稼先的种种见闻。

“可惜这些人都去世了。”听完，他说。随即站起来从里屋拿来几张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正在建造的世界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LEP）的大幅照片。

“你看，这张照片是从空中拍摄的，这是日内瓦城。这个对撞机周长27公里，离地面最浅50米，最深150米，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差不多快要完工了，预计明年7月份全部建成，建成后将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在这台对撞机上做实验。”

丁肇中说，他领导的L3实验，在这个对撞机的地下50米处进行……随后，他拿来一块核桃大的白色晶体对我说：“这是一种非常名贵的晶体，和钢一样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科学家研制的，现在已经研制出8吨。准备用在我领导的L3实验的探测器上，你瞧，很重是不是？”

听完丁肇中兴致勃勃的谈话，我心里想的是采访后如何写篇访问记，于是便对他说：“听说您很关心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意见？”

沉吟片刻，丁肇中说：“任何一个大国，尤其是有历史传统的国家，都不能不重视自然科学研究；现在，工业、商业、国民经济都是用已经成熟的技术，新的技术只能从发展自然科学得到，不然，就会永远落在别人的后面。举例说，假使没有高能物理的研究，这个世纪就不会发现激光，也就不会有激光在医学和工业上的广泛应用；如果没有30年代的高能物理研究，就不会发现电子，核裂变，不发现电子和核裂变，就不会有新的能源，不会有核电……”

他说，自然科学从发现到应用都有一过程，自然科学研究的新发现能够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中国是占世界人口1/4的大国，有悠久的历史，过去对人类科学作出过很重要的贡献，因此，不应忽略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支持。

访问中，他还对我谈了对自然科学投资的重要性。他说：“目前世界各国用在自然科学研究上的钱，相对地说很少，例如我领导这个大型实验，所用的钱还顶不了几架军用飞机的钱。”

在座的陈和生博士（现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告诉我，从1977年开始，丁肇中教授已经为中国培养了100多位科教人才。

随后，我写了一篇访问记，刊登在1988年第27期的《瞭望》周刊上。

这次访问中，丁教授表示想邀请我去CERN采访。他说：“你可以去看看，来个‘西游记’，不一定写东西。”

丁教授是位很细心的科学家，在这之后，他不仅很快寄来了邀请信和往返机票，还请中科院的一位访问学者陪同我去欧洲采访。

那是1988年冬季的一天，我们乘坐南斯拉夫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北京经迪拜，到达苏黎世。然后，又从苏黎世乘火车到达日内瓦。瑞士的火车宽敞、明亮，乘客很少。从车窗向外望去，只见碧绿的草地一直延伸到天边。草地上间或见到一些矮小的房舍，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被绿树、花草簇拥着。远远望去，宛如一幅幅迷人的风景画，令人心旷神怡。

那天，我大约坐了3小时的火车，穿过瑞士绿色的原野，傍晚时分到达日内瓦。下车以后，我被安排住在日内瓦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馆里。晚上，电话铃声响了，对方用缓慢的英语自报说，他叫施道耶，是奥地利人，在丁教授实验室工作。他说：“顾女士，明天早晨丁教授想见你，到时候我到旅馆里来接你。”

坐了将近10个小时的飞机，又坐了3个小时的火车，可是我丝毫没有倦意。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过夜。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子里不停地想着明天和丁肇中的会见，以及如何度过这紧张而又漫长的两个星期（丁教授在信中写的邀请时间是两周）。

天亮以后，我问旅馆服务员在哪里可以吃到早饭，他用不太纯正的英语回答说，旅馆里不管早饭。无奈，我便信步走到日内瓦大街上，这时，街上已是车水马龙，日内瓦的建筑物都不太高，除了柏油马路外，许多偏僻的街道都是用鹅卵石铺成的，显得有些古朴典雅。我花了1美元买了一个火腿面包，带回旅馆作为早餐。不久，施道耶博士来了，他是位中

等身材的奥地利人，大约40岁，憨厚的脸上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茬儿，简短的寒暄过后，他把我带到一辆白色的奔驰车上，沿着日内瓦宽阔的街道，向瑞士和法国交界的边境地区驶去。汽车大约行驶了十几分钟，路边出现了一个醒目的标牌——CERN。进了这个中心，只见鳞次栉比的建筑物，施道耶带我走进了一座米黄色的建筑物——32号楼的4层。

见我来了，丁肇中教授迎上来，用炯炯的目光望着我，笑着说：“很恐怖吧！”意思是我一个人来国外采访，很害怕吧。

“我叫你顾女士呢，还是叫你顾小姐？”

他大概见我有些局促不安，诙谐地说。

他又问我一路上可顺利，随后给了我一个纸口袋，说：“这是你两个星期的生活费（每天30美元），因为你在国内有工资，所以只发给生活费。不包括你在瑞士停留期间的房租费，房租费我已另外替你支付了。”

这年，丁肇中正在领导由十几个国家、数百位科技人员参加的L3实验，可以说是非常的忙，但他对我的生活琐事还是很关心。短暂会见以后，他又亲自带我到三楼——中国参加L3实验的访问学者的工作室。人们见他来了都站起来，人人面前都摆着一台电脑终端。

丁肇中把我领到一位访问学者面前，交代了几句，就匆匆忙忙工作去了。随后，这位访问学者把我带到一幢白色的建筑物——CERN的招待所里，住下以后，他又带我到日内瓦一个名叫JUMBO（音江仓，中国人叫它大象鼻子）的超级市场买了些食品，然后又回到CERN。

吃过午饭，我随便转了转。CERN坐落在瑞士和法国交界处，在这个庞大的研究机构的墙壁上，到外都可以看到一张式样奇特的挂图。这张图的背景是从空中拍摄的日内瓦城，图的中心印着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LEP。

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示意图。这台周长27公里的巨型粒子加速器，能量高达1300亿电子伏特，它用一个城市的电力，让正负电子在1亿分之1秒的时间里进行碰撞，丁肇中领导的L3实验，就在第二个对撞点上进行。

当天下午，丁教授又带我参观了他领导的L3实验地下隧道里的

现场。

我们来到地下隧道里，他头戴防护帽在前面走，我在后面紧跟，我情不自禁地对他说：“你已经得到诺贝尔奖，为何还这样不辞辛劳？”

他停下来，用炯炯的目光注视着我，说：“关于这个问题，10年以后我再回答你！”

第一次到瑞士访问，邀请信上写的是两个星期，后来丁教授盛情相邀，我的访问延长到两个月。两个月中，除采访外，我还被丁教授指派的瑞士人皮特·拉抗领着，驾车进行了瑞士全境一日游。

瑞士给我的印象是：发达、富有。从日内瓦到苏黎世，再到伯尔尼，城市虽小，但整洁有序；街上店铺的橱窗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手表、金银饰品，还有五花八门的巧克力。

游过瑞士后，我觉得瑞士不但是名不虚传的钟表的王国、巧克力的王国，而且还是勤劳牧民的聚集地，因为到了20世纪末，宇宙飞船已上蓝天，而这里的人们还在放牧。

从这以后，我几乎每年都应邀去丁肇中的实验组采访。年复一年，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我广泛接触并采访了许多世界著名科学家，其中有CERN的负责人，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丁教授的得力助手贝克博士，以及陈敏教授等。

他们详细地谈了多年来与丁肇中共事的许多动人故事，尤其是丁教授获得诺贝尔奖前后的共同经历。

有一年，丁教授亲自开车带我和中国访问学者马基茂到他的家中做客，顺便说一下，那些年采访中我时常被邀请去他家做客。日内瓦郊区的深秋，山下碧草连天、山顶白雪皑皑的莱拉山，云雾缭绕，在这片田园诗般的原野上，间或看到两三头奶牛在悠闲地吃草。

丁教授一面开车，一面说笑。

他指着窗外起伏的山峦和绿色的原野，幽默地说：“我住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三家村’，这里所有的人都加起来，还没有北京王府井的人多！”我们听了都笑起来。

丁教授的家在靠近瑞士边境的法国一个小镇。他家的门前是片葡萄

园。在两幢不太高的欧式建筑物前，他把车子停下来，用钥匙打开了矮矮的铁门。进了院子，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院落，绿茵茵的草地环绕着两幢小楼。草地上，间或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松树、桃树、苹果树、梨树……

“这院子里大约有80多棵树，秋天苹果熟了，落了一地，因为没有时间摘……”丁教授说。

走进客厅，正面墙上挂着丁肇中和儿子丁明童的照片，另一面墙上挂着丁教授妻子苏姗抱着儿子的画像。书橱里摆着丁教授和女儿丁明隽、丁明美的照片，以及各种文字的书藉。其中有许多中国的线装书，如《儒林外史》、《山海经》，等等。它提示客人：房子的主人除了精通物理学外，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学也很酷爱。此外，还有些来自中国的录像带《淮海战役》、《大决战》，以及中国相声的录音带等。书架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中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书写的大条幅：“丁肇中先生大雅：万木参天宝殿雄，四方游客浴香风；劝君休做山门客，不再飞来第二峰。”落款是：“苏步青灵隐寺前戏作”。

我们正在欣赏主人客厅里的摆设时，丁教授端来了他亲手泡制的乌龙茶款待我们。

我们坐在沙发上一面品茶，一面听丁教授谈他青少年时代的经历，谈话间，他讲了中国的许多历史典故。

丁肇中说，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已经去世。回中国后，华国锋会见了，他还见过邓小平和胡耀邦。有一年回国时，中央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请他看了电影《城南旧事》。

有一年，我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还访问了丁教授的妻子苏姗·马克斯·丁。她是一位长着满头金色长发，皮肤白净，双眼碧蓝，瘦削而又美丽的美国籍爱尔兰裔妇女。

她用纯正流利的英语和我交谈，我们聊天时，他们的儿子丁明童就在旁边玩耍。一开始，苏姗在纸上工工整整地给我写下了她的名字：SuSan Marks Ting，她微笑着对我说，早年她曾就读于美国波士顿大学，毕业后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作。

“我第一次遇见丁是在汉堡。听说他对科学贡献很大，于是，我便

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和丁接触后学了许多物理学的知识，因此，我对物理也很感兴趣。大学毕业后，我做过一段时间的专职教师，因此，我对中国的教育也很感兴趣。在丁的帮助下，我还对中国的教育进行了研究。丁是一位年轻人很崇拜的科学家，他工作非常刻苦，致力于物理学的研究，决心是很大的。”

苏姗说：“我们的儿子出生时，丁就在我们母子身旁，因此，儿子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他的父亲。平时，他虽然大部分时间在实验室工作，但是，他是一位很好的丈夫和父亲。虽然终日忙于工作……”谈到这里，苏姗郑重地笑着说：“他是Work Work and Work！（工作，工作，再工作！）但总是和家庭保持着密切联系。”

当时，丁肇中正领导着有14个国家460多位物理学家以及600多位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的L3实验。听了苏姗的这番话，我心想，丁肇中如此刻苦、勤奋，以至于他最亲近的人都这样评价他，这大概就是他之所以还不到40岁就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杰出物理学家的原因吧！

1991年春天，我再次应邀到CERN采访。当时，L3实验组的科学家们正在召开每月一次的组会。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教授因患肺癌，在台北去世。丁肇中专程从瑞士飞往台北，参加了父亲的葬礼。那天，他从台湾奔父丧归来，下飞机后没有休息就直接来到会场。他在主持召开组会前，见到我，递给我一份他父亲丁观海教授的讣告。我想安慰他几句，但又不知说什么好，见他有些疲惫和伤感，便问道：“丁观海教授的葬礼举行得很隆重吧？”“嗯。”他苦笑着说，“台湾所有的‘政府要员’都参加了追悼会，说什么我父亲的去世是对‘党国’的一大损失。其实，我父亲无党无派，谈何‘党国’？”

散会以后，我看了丁肇中教授给我的讣告。

讣告说：“1991年9月19日，丁观海教授不幸因患肺癌，病逝于台湾大学医院。享年80岁，在这之前，丁棠华（丁肇中的弟弟）随侍在侧，亲视含殓。噩耗传来，丁肇中、丁肇民（丁肇中妹妹）立即从国外赶回台北奔丧。”

由吴大猷等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在讣告中高度赞扬了丁观海

教授的一生。我正在看讣告时，丁肇中突然来到中国访问学者的办公室，他交给了我一份英文稿，文章的题目是《怀念》。我和在场的中国访问学者们边看边把这篇文章译成了中文。丁肇中在这篇文章中深情地缅怀了他父亲的一生。

征得他的同意后，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国内的《瞭望》周刊海外版，他们很快就编发了。

去美国采访

“你去过美国吗？”有一天，丁肇中问我。

“去过。”我说。

“什么时候？”

“1980年夏天，我随中国高能物理代表团去美国访问了一个多月。”

“我想邀请你去美国采访。”丁肇中说。

事情就这样定了。签证办好后，我独自一人从日内瓦乘飞机，在大西洋上大约飞了七个多小时，到达波士顿。

下飞机后，我就被丁教授安排的人接到了波士顿的剑桥。在剑桥，波涛汹涌的查尔斯河将丁肇中执教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分开。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里，高楼林立，鲜花盛开。在丁教授工作的44号楼前，矗立着一个大写的“J”（他发现了粒子的标志）字。上面标着“1974—1984”。进门以后，左边大厅里，摆着L3实验用的 ω 子探测器的模型。再往里走，是科学家们的工作间。一台台的电脑终端，随时可以和世界各地的高能物理加速器中心联系。右边是丁肇中秘书的办公室，当时，他的女秘书名叫爱伦·宝贝，是位德国人的后裔。我去的时候，她正在谈恋爱，她上班的时候，身旁总有一条大狗陪伴。

上班后，爱伦小姐总是拿着电话用英语不停地说：“This is Prof. Ting Office!”（这里是丁教授办公室）。

上了二楼，右边会议室兼学术报告厅的墙壁上，挂着丁肇中在瑞典

皇家科学院接受诺贝尔奖时的大幅照片。穿过走廊便是丁教授的工作间。在他工作间的墙壁上，挂着许多彩色的大照片，都是他和他孩子们的照片。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步行到麻省理工学院采访。除采访丁肇中本人外，我还与他的助手们交谈，并且采访了麻省理工学院核能研究所所长柯尔曼教授。他说，这个研究所是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的。在这里工作过的学生和教授中共有7位诺贝尔奖得主，在距离研究所不远的地方，建有一台电子加速器，这个研究所参与的第二个大项目是丁肇中教授领导的L3实验。我们和中国物理学界有很多联系，时常有中国学者来访。

“作为一位世界杰出的物理学家，丁在这里工作，我们感到很自豪。他是MIT（麻省理工学院英文缩写）的骄傲。”

“丁领导一个实验组从事寻找新粒子的研究，在世界高能物理领域里，是迄今为止国际上最大的合作项目。他成功地把各国物理学家组织在一起，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各国物理学家都愿意跟丁在一起工作。”

一天，丁肇中教授要去波士顿大学演讲，我应邀去旁听，同行的还有柯尔曼教授和丁教授的女秘书爱伦·宝贝。

途中，丁肇中用英语说：“这河名叫查尔斯河，和英国查尔斯王子同名，类似中国的秦淮河。柯尔曼也知道秦淮河，因为他到过中国。”

报告结束时，夜幕降临。丁肇中教授开车把我送回了旅馆。

在暮色中，波士顿街上车水马龙。查尔斯河畔的绿树红花，在夕阳的辉映下，披上了金黄色。我一面透过车窗望着这异国城市的美景，一面盘算着如何独自一人应付从波士顿到日内瓦横渡大西洋的旅行。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这样好吗？”途中，丁肇中突然对我说。

“不知道。”

“就因为当年你和某某某（即当时中科院外事局美大处的那位负责同志）吵了一架！”

“我和他吵架，你怎么知道的？”

“他告诉我的。他说，你把他告到了方毅那里，他觉得很委屈……”
丁肇中说完笑起来，我也笑了。

听了丁肇中的这番话，我心想，如果当年我不坚持采访丁肇中，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情，就不会和他以及他的助手、学生们打那么多年交道，也就不会受到丁教授如此特殊的厚待和礼遇。

所有这些，都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其实，在第一次采访丁肇中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做好对这位大物理学家的采访报道工作，把稿件写好。

我在CERN和MIT采访期间，丁教授曾不止一次亲自开车带我到街上吃饭，除了吃西餐外，他还多次请我去日内瓦的中餐馆吃山东人爱吃的、也是他这个山东人童年爱吃的食品——锅贴。离开波士顿前的那天中午，他又带我来到一家西餐馆，吃了清蒸龙虾。席间，他拿出两本印刷精美的大画册，说：这本《丝绸之路》是送给你的。另一本《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他让我带给当时的国家科委负责人宋健。

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我所了解的钱伟长先生

徐匡迪

和大家一样，我了解钱伟长先生是从“三钱”开始的。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时，钱老和钱学森、钱三强这三位科学家因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被周总理赞誉为“中国的三钱”，从此成为当时年轻知识分子的楷模。幸运的是，我与钱老有过共事、交往27个春秋的经历。2010年7月30日，他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是在南方考察期间突然得知这一噩耗的，一时难以接受这个令人伤心的事实。从此，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中国失去了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一位教育改革的实践家、一位多才多艺的科学家，上海大学失去了一位好校长。

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

在我看来，钱老的爱国主义精神根植于他的童年，是一种中国传统文人的报国情结。他出生于一个贫寒的书香门第，祖辈三代都是靠教书生活。他没有进过小学，而是师从于他的四叔、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从小在家塾里念四书五经。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观念很深。由此，我们能够理解钱老那一辈人，为什么能在国家那么困难，可以说是战火纷飞、社会动荡、物资极度

短缺的情况下，毅然决然抛弃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到祖国，参与国家建设。

1946年，钱老离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回到祖国，并出现在他的母校——清华大学的讲台上。他家里人口多，一度生活十分困窘。他曾说清华大学一个月发的工资买小米全家都不够吃。为了维持生计，他只好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但仍不得温饱，最后不得不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借贷度日。1948年美国友人捎信给钱老，告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进展较快，亟望他回所复职，可携全家去定居，并给出了优厚待遇。当时他确实心动过，曾到美国驻北平的总领馆申办签证。当时美国的签证官问他：如果中国和美国发生了战争或者冲突，你是站在中国一边还是站在美国一边？他说：我是中国人，当然是站在中国一边。结果他被拒签。

钱老赴美被拒签的事流传很广，成为一段佳话。但是，近年来，民间打假人士方舟子在网上撰文，说1948年美国的签证申请书，没有“若中美交战，你将忠于哪一国？”这个栏目。为了澄清这个问题，上海大学曾派人走访了一些1948年前后到美国驻北平总领馆申办签证的留学人员，他们很多人是北大、清华毕业的，都证实美国签证官确实问过“若中美交战，你将忠于哪一国？”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申请签证的表格上没有这一栏，而美国总领馆的签证官员会问这个问题呢？我想答案也很明显，当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淮海战役即将打响，美国人已经意识到蒋介石将失去政权，中国共产党会建立新中国，而将来这个新中国很可能和美国会是一种敌对关系。美国人不得不防。而钱老准备去的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拥有美国六大国家实验室中的一个，大量研究的是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火箭等与国防、军工有关的项目，是个敏感的地方。

其实，钱老惊人的爱国之举，在此之前已经不止一次了。钱老是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考进清华大学的，数、理、化、英文等一共只考了25分。因此，大家都认定，他要么学中文，要么学历史。钱老一开始选择的是历史专业。但是，九一八事变以后，钱老作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

决定，要弃文从理，要学能制造飞机大炮的学问。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因他数理基础太差，怎么也不同意。钱老软磨硬泡了一周，总算成功了。他又花了一年时间拼命苦读，才赶上物理系的学习进度。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北平的一些大学生曾经骑自行车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时值隆冬，朔风中长途骑车是很艰苦的，而且那个时候治安不好，匪患丛生。开始的时候队伍有几百人，最后到南京只有几十人，钱老便是其中之一。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钱老虽然已经是研究生，当助教了，但仍然积极参加学生的各种爱国民主运动。

对钱老的爱国主义情怀，我的感受是很深的。和钱老的初次近距离交往，是在1983年初履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后他到各系科调研时，但不久我便出国工作。1984年秋，钱老赴丹麦哥本哈根出席世界力学大会，我开车去把他接到瑞典家中休息两天，白天我请他去我所在公司参观考察，晚上彻夜长谈。他热切地敦促我早点回国。当时一些人到国外留学、工作，一方面是国门初开，希望能多学一点、多出成果；另一方面国外物质生活比国内好很多，有上百倍的收入差距。他当时很动感情，跟我讲了他1948年被美国拒签的故事。最后，他说：你能快回去就快回去吧，不要再给外国人干了。我们都是中国人，还得为自己的国家多做一些事情。国家和学校都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回去帮我一起管理学校。我深感此话的分量，也为钱老拳拳报国之心感动，于是尽快结束了在国外的研究工作，提前回国。

20世纪90年代中期，钱老反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最优秀的学生出去了大都不回来？在一次毕业典礼上，他说：我刚到上海工业大学任校长时，提出来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十年来，大家都很努力，已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但是自强不息不是让个人成名成家，也不是让个人发财致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要牢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才是一名合格的中国知识分子。他的讲话使得在场的师生都非常动容。后来上海大学就把校训扩充成了“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可能是中国大学里最长的校训，上海大学也可能是唯一一把师生个人和国家、天下的关系作为校训的学校。我觉得这充分反

映出钱老的爱国情怀，彰显了这位科学大师的博大胸怀与高尚境界。

勇于教育改革的实践家

在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27年的时间中，钱老大刀阔斧地进行教学科研的改革，使上海大学从一个原来只有3800名学生的地方院校，发展为在校学生数万人的全国百所重点建设的“211”高校之一。

钱老到任以后，首先做的就是“拆除围墙，打开校门”。上海工业大学作为地方大学，原先师资基础薄弱。钱老非常重视增强师资力量。对外，钱老利用自己的影响，充分利用校外资源，包括从国外聘请一大批著名学者来校讲学或做兼职教授，他们中有陈省身、田长霖、任之恭、戴振铎、李政道、杨振宁等。这些国际大师的到访与兼职，不仅为闭塞的校园带来最新科技信息、活跃了学校的学术氛围，更重要的是为大家传递了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促成上海大学逐渐具备现代大学先进的管理模式。一直到他晚年精力已经很差了，还是要每年请10位左右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学者到学校大礼堂作报告，他亲自去介绍人家的学术成绩、贡献。而且，他强调，学生不一定要是这个专业的才来听，也不一定要听懂专业的内容，重要的是培养“两个精神”，一个科学精神，一个奉献精神。他说：凡是成功的科学家，一定是按科学规律办事的，讲的那些专业你不一定懂，但是那种百折不挠、不迷信权威、不断探求创新的精神可以学。学有专长的大家大都是淡泊名利、终生刻苦学习的，这也可以学、应该学。对内，钱老狠抓师资队伍建设，尤其重视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与引进，在当时人事、户口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为了广揽既能搞教学又能搞科研的人才，钱老常常不辞辛苦，亲自登门造访。在钱老到任后的短短几年间，学校就从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及多家科研院所引进了一批高水平人才，对于较快地提升学科水平、活跃研究氛围、创立学术新风有着显而易见的作用。

1986年我从国外回来后不久就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副校长，几个月以后又被任命为常务副校长。在协助钱老管理学校的那几年里，钱

老和我经常为了学校建设的方方面面开展持续的调研和座谈交流工作。我感觉，钱老最关注的是学校教育理念的更新，管理队伍思想观念的进步，强调“我们的改革重点是拆四堵‘墙’，它们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系和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那些超前的教育理念是非常正确的，只是我们现在实践得还不够，或者说没有完全达到他的要求。

第一，钱老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以后，首先提出拆除教与学之间的“墙”，搞讨论式教学，教学相长。我们的学生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学会上课看着老师，认真听讲；到了中学以后开始记笔记。但很少有人怀疑老师讲得对不对，或者向老师提问题，没有这个习惯。而且，学生大都认为向老师提问题，一方面不礼貌，另一方面也是无知，老师的知识肯定比你多。

1942年钱老毕业后来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教授。这里的学习方式是研讨的方式，导师指定你看几篇文章，看完以后由你报告，大家来提问题。讨论会富有民主精神和创造性，鼓励敢想敢说，勇于探索和创新，这种风格影响了钱老的一生。

钱老回国以后，就一直主张打破我们传统的教学模式，提倡开展课堂讨论。他说：教师只有和学生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才能发现自己教的内容学生是不是理解了；也可以教学相长，允许学生超过老师，允许学生提出一些比老师想得更深、更难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点是有超前性的，某种意义上也回答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的学校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物？就是因为中国的学校是“填鸭式”教育、应试教育，而不是启发式、讨论式教学。

钱老多次嘱咐我要真正让大学教育回归到育人的本源上，即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只起引导作用，在“教与学”这对矛盾中，“学”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释放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教师要把课堂时间和主角地位让给学生。在钱老的提倡下，20世纪80年代，上海工业大学至少已经在研究生里面形成了风气，每星期有半天时间进行专题讨论，效

果非常好。

第二，拆除各系和各专业之间的“墙”。过去学校不愿意让学生转系。比如说像我所在的冶金系，不少学生高考成绩不是很高，考别的系没有录取，转到这儿来的。如果允许学生转系，那冶金系的生源就无法保证了。但不少学生确实是很想学别的专业。怎么办？钱老提出可实行双学位制度来解决这个难题。他说，学生要学习是好事，不能高考时一考定终身，要允许他们选修别的系的课，将来两个专业考试都能通过，毕业的时候可以给他一个双学位。这在80年代中后期是一个创举，带有很大的挑战性，国家教委开始并不认同。

上海大学的管理学院很有特色，和其他学校不一样。钱老提出，管理有很多类别，比如工业管理、商业管理、贸易管理，需要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依托才能学得好。因此，上海大学学生是二年级以后才可以选修管理学课程，将来可以授予双学位。

钱老认为，中国外贸专业照搬苏联，只学外文和经济学知识，这是不对的。外贸是要交易制造业产品或者原材料的，而产品或者原材料各有特性，客户的需求也不一样。如果不了解外贸商品的基础知识，搞好外贸是很难的。后来，我们按照这个思路设立了一个双学位，叫做工业外贸，从各学科招收二年级学生，每周用两个下午，强化外语，并授以经贸课程。学生毕业以后，非常受外贸系统欢迎。

拆除各系和各专业之间的“墙”之后，学生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从过去的“让我学”，变成了“我要学”。

第三，拆除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墙”。钱老强调，所有教师都要上课，不上课的人不能保持教授、副教授、讲师的头衔。1986年，我回国担任上海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每星期也要上六节课。同时，钱老又强调，要做一名好的教师必须搞科研，不搞研究就可能变成教书匠，只会照本宣科。学校要把时间更多地留给教师做科研，提高教师自身的创造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带动学生学习，提升育人水平。

第四，拆除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钱老非常注意鼓励师生参加社会实践、搞科研。80年代，他就提倡“三学期制”，当时被批评为照搬

美国的教育模式。上海大学在中国是唯一实行三学期制的学校。具体来讲，就是9月1日开学，上10个星期的课，然后1个星期考试，基本上11月中旬结束第一个学期；中间放假一个星期，然后再上10个星期的课，春节前结束，放两个星期的寒假；寒假过后再上一学期课，6月份结束。6月份到9月份接近3个月的时间，必须有1个月的时间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工科的学生到工厂去，理科的学生到研究所、实验室去，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到社会、到社区去做调查研究。

开始的时候，老师们都不是很适应，后来慢慢就感受到“三学期制”的好处，最主要的是给教师走向社会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而且，除了基础课教师以外，大部分的教师都可以在一个学期，也就是10周完成授课任务，其他的大半年时间就可以在学校、工厂、研究所里做科学研究。

在和钱老接触交往中，我曾一遍遍聆听钱老的教诲，深切体会到钱老始终把学生成才放在教育改革的核心位置，在钱老的内心世界，学生是他的最爱。他曾指出：“我们实行‘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就是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自由度、更大的学习自主权，活跃学校的学术氛围，为培养无师自通的人创造良好的大环境。”

当时，钱老提出的教育改革主张，实施起来有不少阻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当时的教委。新中国的教育体制是从苏联学习来的，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当时的改革尚相对滞后。因此，钱老的教育改革思想当然会受到一些抵触，或者发生冲撞。二是来自学校的教师、干部。大家都习惯了老的教学方式、模式，要改一个新的必然很不适应。三是学生也有不赞成的。比如，实行“三学期制”以后，春节前后放两个星期寒假。那时候火车慢，一些外地农村的学生往返时间比较长，就觉得回家时间太短了。学生另外一个反映就是假期要参加社会实践，并且要考核。原来很多学生假期就玩儿、休息，现在要下工厂去实习，到社区去服务，不适应。但是经过五到十年以后，大家慢慢习惯了。

尽管阻力很大，但好在钱校长手里有一把尚方宝剑。他是73岁到上海工业大学做校长的。征求他意见时，他跟中组部说：我73岁了，如果只

能做一两年校长，我就不想去了（当时一般的高校校长70岁退休）。后来，事情反映到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亲自签署了调令，特意加了一句话：这个任命，不受年龄限制。因此，谁都不能让钱老退休，一说退休他就生气。钱老做校长一直做到98岁，这恐怕古今中外也是独一无二的了。事实上，小平同志是给钱老搞教学改革提供了一块试验田。当然，这块试验田不能在北京，也不能在教育部直属院校，只能在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地方院校。

另外，上海市委、市政府对钱老一直比较尊重，支持他的工作，希望他改革出成绩。汪道涵市长、江泽民市长、朱镕基市长都曾先后到学校拜访钱老，相谈甚欢，并常常要到秘书催促才起身告别，这是很少见的。

功底深厚、多才多艺的科学家

钱老是一个基础扎实、多才多艺的科学家。他的专业是力学，博士论文写的是板壳体的计算方法，实际上就是利用固体力学的办法来研究板壳体的受力。大家都知道鸡蛋壳很薄，但是很难捏碎，原因很简单，鸡蛋壳是板壳体，有张力。板壳体研究应用得很广，不光在大跨度建筑上用、压力容器上用，包括航空航天，我们的“神舟”飞船都要考虑板壳结构的问题。

钱老的专业是力学，但他涉足的领域非常广泛。1969年珍宝岛事件时，苏联坦克从冰冻的江面开过来，我们的战士抱着炸药包去打坦克牺牲比较多。苏联的坦克，照我们战士的说法就是“乌龟壳”，反坦克火箭弹打上去会滑出去。周总理提议找钱老来研究破解这个问题。这样，钱老当时有一段时间脱产研究，制定了新的反坦克火箭弹的方案。这项研究的理论成果，集中反映在他“文化大革命”中写的《穿甲力学》这本书里。一般认为，要打穿装甲板，弹头应该比装甲板更硬，才能打得进去。但钱老认为，穿甲不是直接穿进去的，是靠爆炸而破坏的，所以弹头不能硬，而是相对要软，弹头接触装甲板后就像泥巴一样趴在甲板上，碰到里面的引信，就把甲板炸开穿透了。他分析得很透，也非常有想象力。

在瑞典工作的时候，我搞的是喷射冶金。过去传统的冶金是把东西放在炉子里面，用高温把它烧化；喷射冶金是把材料变成粉末，然后用一种气体载着它，瞬间高温反应就完成了。1984年，钱老到我所在公司参观考察，对喷射冶金非常感兴趣。做工科研究的一般动手能力比较强，当然也有一些基本的理论，对喷射冶金研究，我们比较多的是做实验。他看了我的实验车间以后，就说你可以先算一下。他还给我具体的指导，我一听就知道老先生的学术功底深厚，基本理论学得非常扎实，触类旁通，真是很少有人能赶得上。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如果让我去讲钱老的专业板壳力学，我根本讲不出来，而他对我当时搞的科研工作却能从原理上一一点明，真让我钦佩不已。

钱老在学校里一项重要活动是听老师讲课。他听课一般只听45分钟，听完以后他就提出意见。学校专业门类比较多，有教摩擦学的，教自动控制的，教电机的，教机械零件设计的，教计算机软硬件的，甚至还有教炸药的等等。钱老一年听几十节课，都能提出一些意见来。

钱老在一生中涉猎了很多不同的专业和领域，做了很多貌似不相干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人颇有微词，说他是万能科学家，似乎并没有自己的专业。钱老本人倒是并不介意，正像他自己所说的，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多才多艺、功底深厚的大家，不是一个专家。新中国成立以后，科学工作者贡献很大，但是像他这样的大家，我觉得还是比较少见的。

钱老还是一个国学修养很深的人。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他以深邃的国学修养来命名学校的若干新建筑。1986年上海工业大学新的专家楼落成，本来已经把牌子挂上去了，就是“专家楼”。他一看不高兴了，说我请来的不是专家，都是名家和大家。但是要写“名家大家楼”也不好。第二天他告诉我们叫“乐乎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多雅、多好啊！

留学生楼也是1986年底建成的。因为学校的专业比较全，又不涉及保密，所以当时上海工业大学是上海留学生最多的学校之一。学生只有6000人，却有四五百名亚非国家来的留学生，比例相当高。留学生楼本来

取的名字叫做“留远楼”，他看了不高兴，说“留远”，是留级还是留在中国？他们是要回去的。第二天，他就提出来叫“莘远楼”，欢迎“莘莘学子远道而来”，彰显了浓浓的大学文化氛围。

2001年我领导的“现代钢铁冶金与材料”重点实验室拆旧建新。因为已经有前面的教训，所以就请钱老取名。他写下了“日新楼”三个字。我和这一团队的全体教授、研究人员都深深体会到钱老是在期望我们这一传统的专业能“日日新、又日新”，不断创新。

同共产党肝胆相照

钱老一生追求国富民强，最终归结到一点，就是尊重党、热爱党，在党的领导下做好自己的工作，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一般来说一位科学家，凡是在学术上贡献比较卓越的，往往容易恃才傲物，觉得大家都应该尊重我。但是，钱老什么事都和我们党委书记、党员干部商量，很少一意孤行，或者说不听大家的意见。

当然，有时候老先生也会“擦枪走火”。比如，1988年初夏他从北京开完政协常委会会议回沪，我到机场接他。在回校的路上，他问我今天学校有什么大事，我说下午开大会传达国家教委一个严禁考试作弊的紧急电报。那时候学风比较松散，考试作弊现象很普遍。钱老说他最痛恨弄虚作假，一定要刹住这股风。他主动提出，下午等我读完电报以后，他作一个讲话，最后党委书记老郑讲话。回去以后，老郑听说钱老要讲话，很高兴。她说，学生对钱校长都很敬仰，钱校长来讲这个事情最有权威了。

下午，在我读完电报以后，钱老讲话。一开始，钱老讲得挺好的：学生作弊是很可耻的事情，知识分子的知识就是你的财富，你自己没有去拿人家的，你是不劳而获，和偷盗没有什么两样。今天在学校里面读书作弊，将来工作的时候就可能盗取别人的成果，这要引起法律问题。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话锋突然一转，说考试作弊学生是不负主要责任的，现在社会上弄虚作假成风。学生开始鼓掌、起哄、叫好。接

着，钱老又说，在政协开会，很多同志就质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大家的感觉大不一样（8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比较厉害，尤其是1988年物价闯关失败，价格指数超过20%）。这之后，钱老每讲一句话，学生就鼓一次掌。钱老讲得很激动，说有的工厂明明是亏损的，厂长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硬说是盈利的，结果发不出工资。有的地方为了要政绩，在统计数据上做手脚，经济没有那么好也说得很好。钱老这些话也有一定道理，但是这样一来，就把反对学生作弊的主题给冲掉了。学生作弊就变得一点责任都没有，只是全社会弄虚作假里面很小的一部分了。

没有办法，我就去给钱老的夫人打电话。钱老夫妇在上海没有住房，就在学校招待所住。钱老夫人孔祥瑛老师系孔夫子的后代，是一位深明大义的人。她说：钱伟长又在那儿胡说什么了？我说：您最好能请他回去。她说：你告诉他，我叫他马上回来，有重要的事情。后来，我就写了张条子给钱老，说孔老师请你马上回去。钱老有两件事情不放心：一是老伴的身体不好。二是当时他孩子在海外，也经常有病，打电话来。于是，他马上结束了讲话，回去了。回去以后，孔老师就批评了他：你这个校长怎么能和国家教委唱对台戏，在学生面前这么讲，你是不对的。

钱老离开会场以后，党委书记老郑花了很大精力，才把会议主题扭转了过来。老郑强调：到底现在是不是社会上全部弄虚作假？弄虚作假不是主流。凡是弄虚作假的事情都要处理。不但学生作弊要严肃处理、要禁止，生产单位、政府部门弄虚作假也要受到处置。听了这些以后，学生慢慢冷静了下来。

因为钱老刚从北京回来，党委书记老郑和我一起陪他吃晚饭。吃饭的时候，老郑说：钱校长，你的想法是很对的，我们党也需要监督（钱老那时候是民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是，对于学生，我们要引导他们看社会发展的主流。而且，年轻人不应该跟着世俗跑，而是应该作为新一代精神的代表。

没想到，钱老主动提出：我今天讲话走火了，讲得不对，需不需要我更正一下？后来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钱老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讲严谨的学风和反对考试作弊，举从古到今的事例正面来讲，发表在校刊上。

从这件小事情可以看出，钱老非常尊重我们党的领导。哪怕学校的党委书记比他年轻30多岁，他还是很尊重。

这一类的事情很多，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80年代后期两次学潮和之后的政治风波中，他的表现非常好。他能够既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又要求学生理性思维，不能发生过激行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意识，把个人的成长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结合，始终把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教育学生一切以大局为重，共同维护国家稳定。1989年政治风波开始的时候，钱老好几次跟学生对话，讲我们民族的苦难历史，讲国家怎么不容易，讲改革开放能有今天是我们应该珍惜的，讲得都很好。后来，小平同志曾讲：在这次风波中，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像费孝通、钱伟长，表现得比我们某些党员干部还要好。

情系新上海大学

钱老办学一贯主张“文理相通、理工结合”。他认为，一个大学里面没有文科，不可能形成很好的人文精神。科学和艺术要交流，科学家不是一个工匠，要有文化底蕴。理工要结合，搞工程的不懂理科，就没有深度；搞理科的不和工科结合，必然就是纸上谈兵，不能转换为现实的生产力。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全盘照搬苏联的做法，成立了各种专门院校，而把过去的综合性大学大都拆散了。对于这种做法，钱老当时就坦诚地发表过自己的意见。

到上海工作以后，钱老发现上海文化底蕴深厚，学科门类齐全。建设一所综合性大学的设想，油然而生。为此，他奔走于政府各部门。在新的上海大学没有成立之前，钱先生就请上海书画院的一些老先生到学校里开讲座，讲书法课、国画课，叫学生都来大礼堂听；同时，还请人讲音乐、美术、文学，然后组织学生座谈。

在上海市委的大力支持和正确领导下，1994年由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工业大学、原来的上海大学以及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四校合并，组建新的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新上海大学。德高望重的钱老再次受命就任

校长。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钱校长的带领和广大师生的努力下，1996年新组建的上海大学跻身“211工程”；1998年新校区建成投入使用。这个时期，我已经到上海市政府工作，对钱老为推进学校跃升，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顺势而上所起到的奠基性的、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是非常清楚的。

当时，上海市委、市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正好宝山区和闸北区相交的地方有一块地，本来是要搞工业园区的，后来就改成搞上海大学新校区。把原来几片分散在市区的学校用地置换出来，把钱集中都投到这里。钱老亲自规划和审定了新校区的建筑群设计样稿，还多次邀我去和他探讨新校园的学科布局以及多校区规划的相关事宜。今天，当我有机会漫步新上海大学的美丽校园时，自然而然想到的是钱老为缔造这个学府所付出的辛劳和智慧！他的那句“我要办一所上海人民满意的大学”的话语再次萦绕我的耳畔！

当然，有些问题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暂时还无法解决，比如，钱老生前一直想在上海大学建医学院和研究生院的愿望，这还需要上大人继续努力。

对钱老的回忆有很多，但是这几个方面是我印象最深的。总而言之，我觉得他们是他们那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我们大家应该很好学习的榜样。他渴望国家、民族振兴的那种迫切的心情，是不以个人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而左右的。今后党培养和我们肝胆相照的民主党派人士，钱老是一个风范长存的楷模。

(汪文庆 刘一丁 整理)

朱光亚与新中国核科技事业

顾迈男

2011年2月26日，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在北京逝世。在20世纪80年代，这位青年时代曾远赴重洋学习研制原子弹，最终却在自己的祖国圆梦的核物理学家，曾经对我详细地讲述了他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心路历程，至今想来，仍然让我感慨不已。

“朱光亚终于归队了！”

那是20世纪80年代，我采访邓稼先的通讯报道《两弹元勋邓稼先》发表后，我对“两弹”研制过程中的科学家们产生了极大的敬意，想陆续采写一些稿件，将这些科学家数十年默默无闻地为增强中国国防事业经历的艰辛公诸于世，当时朱光亚是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因此我首先采访了他。

朱光亚出生于湖北宜昌，1945年，他从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后，经吴大猷教授推荐，赴美国考察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朱光亚生动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他说，中国人研制原子弹的梦想，在旧中国就有了。那是1946年，蒋介石在庐山的别墅里，接见了华罗庚、李政道和朱光亚，提出要造一颗原子弹。朱光亚说，蒋介石的这个梦想，是从1945年8月6日那个震惊世界的日子开始的。那天，美军轰炸机在

日本广岛上空扔下一颗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对日本军国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军事威慑效应，世界上所有国家对其产生的威力印象深刻，无不想拥有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装备。然而，这种新式的武器是如何研制的秘密，除了美国外，世界上其他国家均不掌握。蒋介石也想造原子弹，于是他就让兵工署署长、国际弹道学家俞大维博士想办法。俞大维提出，造原子弹，首先要向数理化方面的科学家请教。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俞大维和军工部部长陈诚邀请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秘密讨论了研制原子弹的有关事宜。三位教授很快拟定了一个计划，并建议派遣一个科学考察团去美国，争取到美国“曼哈顿工程”（美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代号）的研究生产机构考察，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蒋介石批准了这个计划。除了这三位著名专家外，国民政府还让他们在数理化三个领域分别挑选两名优秀的青年学者，组成考察团。吴大猷挑选了朱光亚和李政道；曾昭抡挑选了唐敖庆、王瑞骥，华罗庚则挑选了孙本旺，到美国后又挑选了徐贤修。

据朱光亚回忆，临行前，蒋介石把科学家们召集到庐山，鼓励大家说：“你们到了美国，要好好地学，早去早回！”还说：“你们学成归来后，我给你们钱，给你们房子，尽快造出原子弹！”

1946年8月的一天，朱光亚与李政道、唐敖庆等跟随华罗庚教授搭乘远洋轮船“美格将军号”赴美。在这之前，曾昭抡教授已经先期赴美，吴大猷教授因为去英国开会，也未能同行。但是他们一行刚踏上旧金山，就听到了沮丧的消息，先期抵美的曾昭抡对他们说：他到达美国后，虽然几经奔走，但毫无所获。美国政府不同意外国人进入原子弹研究机构，甚至原来已经参加“曼哈顿工程”的外国科学家都被剔除出科研队伍了！曾昭抡说：但是各位既然已经来了，那就各奔前程吧！考察团就这样解散了。在这之后，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等人到美国的大学里分别从事教书、科研，朱光亚、李政道等青年学者则进入不同的大学攻读学业。朱光亚进了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从事实验核物理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不久，他便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在美国《物理评论》等顶级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从而在核物理这门新兴的前沿科学领域里留下了

他创新探索的足迹。

1950年2月，年仅25岁的朱光亚在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毅然返回祖国。在回国途中的轮船上，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写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呼吁留学生们回国参加建设。这封信不久发表在《留美学生通讯》上，在海外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回国后，朱光亚兴致勃勃地跟随土地改革工作队到大别山等地参加土改。“国家还这样穷，刚刚翻身，首先应该把人才培养出来，才能把国家建设起来。”怀着这样的志向，朱光亚走上了北京大学的讲台，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物理学教学的第一线。那段时间，在完成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他仍然没有忘记研制中国原子弹的梦想。1951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书中介绍了原子能的发展、原子弹的研制、氢弹秘密等内容，是我国系统介绍和论述这方面知识的早期著作之一。

1952年，朱光亚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的英文高级翻译，到板门店参加了朝鲜停战谈判。谈起当年赴朝的往事，朱光亚对我回忆了一段趣闻，描述他是如何被选中的。

那是1952年初的一天，一位同学走过来对他说：“朱老师，考考您的英语！”师生二人用英语一问一答地对了一会儿话。最后，学生满意地对老师说：“Very good！”学生考老师的原因很快便弄清楚了：组织上让他担任代表团的英语翻译。朱光亚回到家中对妻子许慧君说：“我要走了！”“到哪里去？”朱光亚想到组织上叮嘱要保密的话，便诙谐地说：“呵，到东北‘打老虎’去！”许慧君见他有难言之隐，便没有多问。几天后，他便以高级翻译的身份跟随志愿军代表团抵达开城，参与停战谈判。

1953年，朱光亚从朝鲜回国后，奉调东北人民大学，参与组建物理系，先后担任教授、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代主任等职务。在教师少、教学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他一方面主讲力学、热学、原子物理等大课，另一方面还注重在工作中培养青年教师。在朱光亚和其他同事的共同努力下，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便跻身全国高等学校物理

系的前列。

1955年5月，中央作出建立中国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之后，朱光亚奉命与胡济民、虞福春等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8年改称原子能研究所，即现在的原子能研究院）筹建物理研究室（1956年划归北京大学，后改称技术物理系），从此以后，他担负起尽快为我国原子能科技工业培养专业人才的重任。钱三强曾戏言称：“朱光亚终于归队了！”意思是朱光亚又回到了核物理专业队伍。

科学界的“中字辈”担任了 科学技术领导人

1957年，朱光亚调任原子能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任副主任，参与组织苏联援建的核反应堆建设和启动工作，并带领年轻人开展中子物理与堆物理的实验研究，设计并建成了国内第一座轻水零功率装置，为掌握堆物理实验技术迈出了第一步。这时，苏联方面对中国的核技术援助几经起伏，但苏联科学家中也有真诚愿意帮助中国的。有位名叫加弗利洛夫的科技顾问就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他认为，中国需要有一位科学技术领导人来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他还特别点名要见朱光亚，说他在来中国之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塔姆院士曾向他推荐过朱光亚。1959年6月，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7月，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在这之后，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委托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挑选一位原子能研制工作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经过深入考虑和物色，推荐了正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朱光亚。20多年后，钱三强撰文专门谈了当年推荐朱光亚的原因：“当时，朱光亚还属于科学界的‘中字辈’，年仅三十五六岁，论资历没有那么深，论名气没有那么大。那么，为什么要选拔他，他有什么长处呢？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务的能力；第二，能团结人，既与年长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第三，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实践证

明，他不仅把担子挑起来了，而且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作出了贡献。”1959年7月的一天，宋任穷等人把朱光亚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说：“光亚同志，我们想请你到九所（核武器研究所，1964年2月改称九院）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你看怎么样？”听了这个决定，朱光亚很激动。

回忆往事，朱光亚感慨地对我说：没有想到，当年那个曾经漂洋过海追求过但被拒之门外而破灭的梦想，现在有可能在自己的国家，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变为现实了。他说：“就这样，从50年代末投身到核武器的研制工作起，到如今（80年代中期）已经几十年了，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朱光亚被任命为九所副所长后，开始全面负责核武器研制中的科学技术工作，在与李觉、吴际霖、郭英会等九所领导多次讨论后，他们立即改变了原来的部署，根据我国当时的条件，制订了科研工作计划，明确提出：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要完全建立在自己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即自己研究，自己试验，自己设计，自己装备。当时，无论从以上哪个方面讲，朱光亚都是不轻松的，因为这时，很多人对苏联专家的帮助仍抱有幻想，直到1960年7月，苏联突然全部撤走了在华工作的专家，并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

苏联停止一切援助后，二机部提出了核工业在新形势下的总任务：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具体要求是，争取在五年内（1960年至1964年）自力更生研制出原子弹，并进行爆炸试验。为了集中力量突破原子弹的技术难关，朱光亚与九所的其他领导建议：由二机部向中央要求从中国科学院和全国各地、各部门选调人才，充实科研队伍。不久，先后有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王淦昌、彭桓武等科研人员调入，这批科学家和工程师会同先期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朱光亚、邓稼先等人，基本上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科技骨干力量。

中国人依靠自己的人力和物力，能不能把有关的核设施建成？能不能造出原子弹呢？全世界都在关注着。

研制原子弹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工程，涉及理论、试验、设

计、生产等各个环节，需要多学科、多专业的密切配合。当时，新中国成立才10年，科技与工业基础还非常薄弱，专业人员也少，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和禁运。在这种情况下，想短期内突破原子弹技术，难度确实很大。为了激励人们的斗志，1963年8月，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刘杰赴青海基地检查工作时，决定把苏联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也就是1959年6月，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程的代号，即命名为“596工程”。

采访中，朱光亚笑着回忆说：“在九院（所）这个既像工厂，又像学校的奇特的研究机构里，当时，每个人的情绪都处于亢奋状态，各个实验室里天天灯火通明。”宋任穷对朱光亚他们说：“你们给我也办个出入证，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到实验室去了。”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人一起组织大家制订规划，选调人才，组建机构，建立设施，迅速而又扎实地开展各项工作。各方面著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相继调到九院以后，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学技术难关，人们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着。宋任穷、刘杰、钱三强和李觉、吴际霖等知人善任，对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等科学家充分信任，放手让他们工作，并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

朱光亚和吴际霖负责全所的科学管理，他们组织各方面专家和科技人员精心选择目标，分解任务，确定应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组织全所科技人员分头开展研究和攻关。由于朱光亚精通业务，为人谦虚、诚恳，善于综合各方面意见作出科学判断，他不但受到科研人员的尊重和支持，而且能和党政领导干部密切合作、沟通，使全所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高速有效地运转起来。

经过紧张探索、研究，到1962年，九所科研人员在原子弹的理论研究、试验技术、核材料生产等方面都获得许多重要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也面临是加快还是放慢，甚至是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这年9月，二机部部长刘杰与九所负责人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等人研究以后，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两年内实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同时，为了进一步研究分析可行性，根据领导、专家集体讨论的

意见，朱光亚主持编写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实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实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及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在科学总结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技术上最关键的问题，提出了必须完成的基本建设项目和工作条件，并对下一步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其中，对于核爆炸试验，文件提出了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先做地面爆炸试验，再做空投爆炸试验。整个安排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分析和部署是符合实际的，对科研人员很快突破原子弹技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两份文件后来被誉为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纲领性文件”。

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朱光亚除了对科研工作进行全面组织、领导外，他还担任了四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主任委员彭桓武一起，指导青年科技工作人员开展了中子源的攻关研究。

1963年底，核武器研究人员在原子弹理论、技术和生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等开始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11月20日，他们成功地进行了缩小尺寸的原子弹整体模型爆轰模拟试验；1964年6月6日，又进行了全尺寸的原子弹整体模型模拟试验，这是一次核爆炸前的综合检验，除了核装置不是活性材料外，其他都是核爆炸时所要用的实物。试验结果实现了预先的设想。至此，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经过大量小型试验和若干次的大型试验，已经是成功在望了。1964年10月16日，我国在罗布泊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原子弹爆炸时，朱光亚和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们一样，非常激动和兴奋。这时，他还不到40周岁，青年时代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可以说，他是用自己的智慧和爱国热情圆了一个美丽的梦！此后，他又带领广大科技人员迈向了新的高峰——研制氢弹。

1964年5月及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的汇报时，曾两次谈到中国的核武器发展问题。他说：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在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之后，周总理也提到氢弹的研制能否加快一些。他要求二机部就核武器发展的问题作出全面的规划。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二机部领导下，朱光亚会同其他同志提出了加速核武器发展的全面规划。他还替二机部起草了《关于加快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呈报给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为周恩来总理，成员有15人，主要负责全面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报告提出：一方面要加速原子弹的武器化，另一方面要尽快突破氢弹技术。由此，九院的工作迅速作了调整，并抽调出三分之一的研究人员全面开展氢弹的理论研究。在这之前，原子能所成立了中子物理领导小组，由所长、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主持，组织黄祖洽、于敏等开始着手热核材料性能和热核反应机理的基础研究。

1965年1月，二机部把原子能所这批先期进行氢弹研究探索的科研人员调到九院，两方面力量集中到一起，在朱光亚和彭桓武的指导下，对氢弹进行攻关。1967年6月17日，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聂荣臻元帅亲临现场指挥，成功地进行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提前实现了毛泽东在1958年6月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中国也从此进入了世界核先进国家的行列。邓小平在谈到新中国的高科技时曾经这样说过：“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做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国“两弹”的研制工作之所以能走在世界的前列，除了党的坚强领导、全国人民大力协作之外，还因为我国有一批饱经忧患、了解中国国情而又有强烈爱国热情的科学家，其中朱光亚就是杰出代表，党和国家对他的贡献也给予了充分肯定：1969年，年仅45岁的朱光亚和钱学森一起，作为科学家代表，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之后，他又被连续选

为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至第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国科协协会主席，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这在科学家中是不多见的。

自20世纪70年代初，朱光亚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以来，他在领导核技术科研工作的同时，还参与组织了核潜艇动力装置的研究，以及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生产和放射性同位素等民用项目的开发与研究工作。80年代中期开始，他还参与组织领导了国家“863”计划的制订与实施。

作为一个老朋友，他的逝去，使我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哀伤。当年，他对我说过的一番话，始终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50多年过去了，我自己当年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用毕生的精力亲自参与中国核科技事业的创立和发展，为祖国的安全和中华民族的强盛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欣慰！”

钱三强与中国的核科学

顾迈男

在中国的核科学发展史上，钱三强的名字熠熠闪光，称他为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并不为过，即使在国外，他的成就也广为人知。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曾多次采访过钱三强和他的学生、助手们，下面记述的就是有关他的一些往事。

我只是一名普通战士

2003年8月6日，俄罗斯《新闻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原子能问题是如何破坏中苏友谊的》的文章。文章说：“还在1949年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年前，中共领导人就派了物理学家钱三强前往欧洲参加和平大会。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购置现代物理研究所所必需的资料和设备。”还说，在法国科学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的帮助下，这一目的达到了。1954年10月，在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请莫斯科帮助中国制造核武器。赫鲁晓夫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并劝说毛泽东放弃这一不切实际的计划。因为中国不具备相应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

那么中国核计划是怎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快速发展起来的呢？从当时领导研制中国“两弹”的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的非凡经历中，也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钱三强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核工业部副部长。他虽

然身居要职，却十分平易近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任新华社记者，经常出入他的办公室，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俭朴，讲话幽默，爱开玩笑。因而我这个晚辈记者对他讲话也很随便。

“三强同志，人们都说您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是这样吗？”有一天，我问他。

“噢，话不能这么说——”他听了后，慢条斯理地笑着对我说。说完，他又憨厚地笑笑说：“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是比较快的，外国从原子弹到氢弹，一般要花四至七年时间，而我们只花了两年多时间。我们之所以能赢得这样快的速度，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而是在毛主席、周总理、聂荣臻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在广大科技人员、干部、解放军战士和工人的大力协作下取得的，我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像一名普通战士那样，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其实，中国这个震惊世界的成就，和钱三强有着密切的关系。

怎样才能为国家争口气？

钱三强出生在浙江绍兴的外婆家中。他家上两代一门五人分别是中国近百年来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和外交家，是名不虚传的“钱氏一门俊秀”。绍兴出过许多仁人志士，钱三强孩提时代，他父母给他讲过鉴湖女侠秋瑾的故事。长大后，钱三强逐渐懂得了中国人受气的根本原因，落后的封建制度、落后的工业和落后的科学技术。

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以后，在求学的年代，钱三强每年都要参加几次学校举办的国耻纪念日：九一八、一二八……

国家的现实促使他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受气？”“中国人真的不行啊？”“怎样才能为国家争口气？”

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后，钱三强进入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他在所长、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的指导下，从事铷分子光谱的研究工作。

1937年春季的一天，钱三强正在图书馆里看书，严济慈教授走来对

他说：“听说你在中学学过法语，现在还记得吗？”“忘了不少，查着字典还可以看看文献。”“那好，我来考考你的法文程度。”说完，严济慈顺手从书架上拿了一本法文杂志，让钱三强念了一段，然后让他译成中文。

“还行啊，你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准备留学考试吧！”

就这样，钱三强考取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留法公费生的“镭学”名额。24岁的钱三强就这样乘船去了法国。

1937年冬，钱三强到达巴黎。正在巴黎考察光学食品制造的严济慈教授，亲自带他到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会见了约里奥-居里夫人。钱三强深知留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在这里他非常勤奋地学习与工作。那时，除了受难的祖国时时牵动着他的心外，他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做核物理实验上。

钱三强到居里夫人的实验室不久，约里奥-居里夫人和南斯拉夫科学家萨维奇合作，发现铀和钍受中子打击后，生成一种像镧的放射性元素。法国科学家哈恩和斯特拉斯曼也发现铀和钍受中子打击后，生成一种非常像钡的元素。这些实验结果说明，铀和钍受中子打击后，可以分裂成两个质量差不多的原子核。这就是原子核裂变现象的发现。这是1938年底的事情。第二年初，约里奥-居里夫人与钱三强同做一个实验，目的是观察用中子打击铀的原子核和钍的原子核，得到的非常像镧的放射性元素放出的 β （贝他）射线能谱。做实验时，居里夫人做放射源，钱三强用云雾室拍照片（为博士论文做准备），师生二人经过两个星期的紧张工作，最后证明两者的能谱一样，是同一物质。这个实验用物理的方法，为重原子核的裂变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不久，居里夫人用低压云雾室拍摄到世界上第一张记录有原子核裂变碎片的照片，直接证实了原子核裂变现象的存在。

这一重大发现使人类对原子核的研究进入了新时期。那天，钱三强从实验室出来，非常兴奋地对正在法国留学的水声学家汪德昭说：“你知道原子核裂变释放能量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吗？这种能量将来如果为人类服务，那该多好！但是，如果用来制造武器，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六年以后，美国人利用原子核裂变的原理，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

子弹。

约里奥-居里夫妇和他的中国学生钱三强，当年在努力弄清原子核的内部结构和裂变的威力时，都是梦想人类能够和平利用原子能。在这之后，居里夫人又和别人合作，发现了原子核裂变的连续反应。差不多同时，英美科学家也观察到了这种现象。钱三强很快完成了博士论文，1946年他与清华大学同学、正在法国留学的何泽慧结婚。婚后，钱三强和何泽慧一起继续研究原子核的裂变现象，他的想法得到了居里夫人的热情支持。经过紧张地工作，钱三强夫妇用核发乳胶技术发现：铀的原子核受中子打击后，在300次裂变中，有一次分裂成了3个碎片。这个重大发现，使他们异常兴奋，但是，他们没有立即声张，而是继续做实验。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研究，他们终于在1946年底证明：铀的原子核在中子的打击下，不仅可以分裂为二，而且可以分裂为三。1947年春天，钱三强和何泽慧对铀原子核“三分裂”的机理做出了解释。这些发现，使人类对原子核的裂变现象，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取得上述成就后，钱三强和何泽慧提出了准备回国的想法。

“我要是你，也会这样做的！”约里奥说。

“祝愿你们回国后，为你们的国家和人民好好地服务！”居里夫人说。

分别时，法国老师送给钱三强一份两人签名的鉴定书，用法文写着：“10年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代人中，他最为优异。我们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在法国期间，钱三强先后发表了30多篇论文，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和法国科学院颁发的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并先后担任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和研究导师职务。

1948年5月，钱三强和何泽慧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当时，正值北平解放前夕，他对物理研究所师生们谈了欧美各国研制原子弹的情况。他在讲话中暗示将来有一天，中国为自卫和反对核讹诈，也应当迎头赶上，并很有信心地说：“一个国家有了铀矿，如果政府又能充分重视原子能的研制，那只是时间的问题。”

不久，新中国诞生。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成立。钱三强在一片空白中开始筹建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当时，连他和何泽慧在内研究所总共只有5个人。起初，他们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禁运封锁，可以说是异常困难。他们在北京一个旧式的四合院里开始了新中国原子能科学的艰苦创业：没有仪器，他们就骑着自行车到旧货店里采购器材，自己着手研制；没有从事核物理研究的人才，就自己培养。不久，在国外留学的一些青年，其中包括“娃娃博士”邓稼先等人，陆续回国参加了研究所的工作，到1955年，白手起家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已经扩大到150人左右。

1955年1月14日，周总理把钱三强和李四光请到中南海，详细询问中国核科学研究人员、设备和铀矿地质资源的情况，并认真细致地了解了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第二天，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研究了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毛主席听完汇报后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的。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些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随后，毛主席和与会的人们一起吃饭，他举杯祝酒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

会后，由钱三强组成领导小组，加紧了培养发展原子能事业的科技人才的工作。为了使全国都来关心和重视原子能事业的发展，钱三强等人和各个高等院校的教授们组成宣传团，到全国各地宣讲关于原子能的科普知识。在这同时，他还率领数十名科技人员到苏联学习。

就这样，钱三强历尽艰辛，与物理学家彭恒武、王淦昌等人一起，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建起了中国的核科学研究机构，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核科学人才。

我们要放个“大炮仗”

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撤走专家，使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陷入困境。在这紧要关头，钱三强推荐朱光亚、王淦昌、彭恒武等科学家，带领当时还很年轻的邓稼先、周光召、于敏、胡仁宇等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终于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如期爆炸。在这之后，他又参与领导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工作。

在领导研制“两弹”的过程中，钱三强知人善任，一些当年与他共事的科学家生动地回忆了他当时的情景。

一天，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委托钱三强挑选一位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经过深入考虑和物色，推荐了核物理学家朱光亚。20多年后，钱三强撰文谈了推荐朱光亚的原因：当时朱光亚属于科技界的“中字辈”，年仅35至36岁，论资历不那么深，论名气没有那么大，那么为什么要选他呢？他有什么长处？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的能力；第二，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能团结人，既与年长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实践证明，他不仅把担子排起来了，而且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

邓稼先曾生动地回忆说：“1958年秋天，有一天，当时已是二机部负责人的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找到我说：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说完，钱三强又严肃地说：这可是光荣的任务啊！”

邓稼先听钱三强说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而且让他参加，他立刻明白了，这就是说要让他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面对这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他不免有些惶恐，说：“呵，研制原子弹，我能行吗？”

“能行，你就和大家干吧！这是国家对你的信任。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我相信你能干好。”

在党中央和二机部负责人的领导下，钱三强带领大批科学家，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在戈壁滩上接连放起了“大炮仗”。

年轻人不要对自己的国家妄自菲薄

我最后一次见到钱三强教授，是在1989年的一天，编辑部让我请他谈谈如何对年轻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那天，钱三强语重心长地说：“中华民族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自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间，经历了近现代史上相当艰苦的民族求自存的历程。可以说，是经过了多少代人艰苦奋斗才得到的独立。我是民国二年（1913年）出生的，正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之后，经过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在旧中国也待了30多年。抵抗外国列强入侵，求得自存，使国家强盛起来，是我们这样一个年龄上下的人共同追求的目标。我们在国内奋斗，到国外求学，总想把他的国强盛起来的经验拿到手，并不是只图个人待遇如何。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独立的心愿才真正得以实现。”

钱三强说：“像我们这样一个被压迫的国家，独立之后，要一点点自强起来，不仅现在的年轻人要艰苦奋斗若干年，而且需要一代两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青年们（当然包括青年学生和科技战线年轻人）肩负着建设未来国家的历史重任，了解国家的过去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青年们应该好好学习我们民族受压迫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了解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变化，取得的成就。”

钱三强说：“国家要强盛起来，离不开科学技术，青年们也应懂得这个道理。因此，我希望年轻人（一切有志于使中国摆脱落后状态的青年们），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应致力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不要对自己的国家妄自菲薄。我们新中国成立时，科学技术十分落后，只用了15至20年左右，就实现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的突破，跻身于五个核大国之列。主要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了社会主义道路，调动了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协同作战完成的。”

钱三强说：“当年，正是我们这一些人，不仅理解马列主义，而且了解中国的实际，才能结合我国的国情，把科技队伍训练和组织起来，又有些人把世界各国先进的东西带回来。作为一名中国人，要有在自己或下一代的手里使中国强大起来的强烈愿望。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接连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成就，其中包括举世瞩目的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钱三强最后说：“后生可畏，我相信中国会涌现出大批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会接好老一代科学家的班，把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引向繁荣和富强。”

回忆周炳琳老师

厉以宁

我是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那时，周炳琳先生早已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了。但我入学后的第一学年内，没有机会同他见面，也没有机会听他的课，因为二、三、四年级同学和系里的许多教师，都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到广西土改去了。参加土改工作团的教师先回北京，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学生们晚回校，大约在1952年初夏才回到北京大学。

接着，1952年夏季开始了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从城里的沙滩迁入西郊燕京大学校址，燕京大学的文理科并入北大。那年秋季，我们就在燕园上课。我是先认识经济系的赵迺抃教授，再通过赵迺抃教授认识周炳琳教授的。记得他们两位教授同住在燕东园教授宿舍29号，两层小楼，赵老师住在楼上，周老师住在楼下。他们两位都已是50多岁的长者，学生们尊称他们为周老、赵老。赵老师专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周老师专治外国经济史。在我上学期间，他们只做研究工作，没有开课。所以我并没有听过他们讲课。

我认识赵老师在先。那时他刚从广西参加土改回京。我们还没有从城内原校址迁到西郊新校址。在沙滩区有一座法学院大楼，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三个系都在这里办公。楼内还有一个法学院图书阅览室，我是里面的常客，没有课时，我就到那里去借书、阅读。赵老师也经常

去。由于阅览室里学生很少，所以赵老师去久了就感到奇怪，怎么这个学生这么勤快，老在这里读书，就问我是几年级的，我说是刚入学的，一年级下学期的学生。那天我刚好读的是一本英文的西欧经济史的书籍，我一边读，一边把书内的资料摘录在笔记本上。赵老师很感兴趣，就说：“周炳琳教授是研究西欧经济史的，以后我请他指点指点你。”赵老师还把他家庭的地址告诉我，他住在东四十条的宿舍里，欢迎我到他家里去。但当时我没有机会认识周老师。

学校迁到西郊后，赵老师和周老师同住一栋小楼，楼上楼下。大约是1952年放寒假期间，有一天我去赵老师家，谈完后他对我说：“我已经向周先生提到你了，说有一个学生对西欧经济史很感兴趣，周先生说让他来找我吧。今天周先生在家，你去他家看看他，他会指教你的。”这样，我下楼到了周先生家。那天，刚好周老师在家，师母魏璧老师也在，我就同两位老人畅谈起来了。周先生问我对什么问题感兴趣，我说我一直想研究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并告诉他们我读过哪些书。周老师很高兴，说现在的大学生对经济史感兴趣的人不多了。

从那以后，直到我大学毕业，我每次到燕东园教授宿舍，都是先到赵老师家，再到周老师家。但周老师的社会活动多，所以有时没有见到周老师。赵老师和周老师两人的藏书颇丰，有些英文书北大图书馆没有，我常在两位老师家中借阅。这些书籍对我打下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基础是非常有用的。我常想，在大学学习阶段如果能比较扎实地打好基础，对今后的成长的影响，时间过去越久，越能有较深的体会。

二

1955年我自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留校担任资料员，但编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室。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作为周炳琳教授的助手，帮助他整理、收集外国经济史的资料。这样，我就有机会同周炳琳老师经常在一起了。

分配工作后，我第一次到周老师家里去时，他十分高兴，对我说：

“我知道你俄文不错，已经翻译了几本俄文书出版，你帮我翻一些苏联学者论述西欧经济史的资料，供我们参考。”又说：“如果时间富裕，你不妨把北大图书馆内所藏的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史杂志《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上历年刊载的经济史论文一一编写内容摘要，供教师们参考，这不仅对大家有好处，对你自己也很有好处。”周老师的这一建议使我一生受益，因为从此我开始在周老师的指引下进入西欧经济史这一学术领域。

从周老师家里出来后，我又到了赵迺抃老师家中。他知道我留在北大经济系当资料员了，很高兴地对我说：“你没有当教员，当了资料员，心里要想开些，不要计较名分，只要有真才实学，名分算个什么？”还说：“周先生为人正直，他很器重你，你继续努力，做学问吧！”赵老师和周老师是几十年至交，周老师年龄稍长于赵老师，他们两老对我的培养、扶植，使我终身难忘。

稍后，我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到了苏联学者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一书，读后感到这部书如果翻译成中文，一定有助于当时国内缺少外国经济史参考书的教师和学生。于是我先把该书的目录译出来，送给周炳琳老师看。他觉得可以翻译此书，于是列入了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室的工作计划。全书40万字，我一个人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全部译出，并交给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当时的工作情况是这样的，我每译完一章，就整理出来，誊清交给周老师审阅。周老师仔细阅读，哪些译名需要斟酌，他都标上记号，同我商量。尤其是有关法兰克王国封建土地关系的术语译名，他都再三推敲。周老师的法语很好，但他依然十分谦虚，总是说“供你参考”。对于法国波旁王朝的社会性经济变更，他提了不少看法，这些都是他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我记得当时他的一句插话：“现在对法国大革命中群众行为的评价似乎过头了。”虽然只是简短的一句，却令人深思。可惜那时我还年轻，对周老师这句话的理解还不深。

在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一书中，有整整一

章是讲述拜占庭经济史的。以前，对于拜占庭的兴亡我是不了解的。这一章的翻译过程也是我学习拜占庭经济史的过程。译完这一章后，我照例交给了周老师审阅。他说：“这一章的内容很有意思，我要细细读。”把稿子还给我时，他对我说：“苏联学者对拜占庭的研究比较深入。你知道吗？俄罗斯一直以第三罗马自居，罗马是第一罗马，君士坦丁堡或拜占庭是第二罗马，俄罗斯自称是第三罗马。要了解俄罗斯，离不开对拜占庭的了解。”我记住了周老师的指点，所以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拜占庭历史以及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一直有浓厚的兴趣。

这本书于1957年初译完，交给了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了。稿费是归学校的，但我分得了约20%的劳务费。结婚、安家和把我的外祖母、母亲和弟弟（厉以平）由武汉接到北京来住，全靠这笔劳务费。

三

紧接着展开了“反右”斗争。会议越来越多，教师都忙于开会。这段时间内，教师为了避免惹麻烦，串门的少多了。我没有到赵老师和周老师的家中去看望他们。到了年底，北京大学的教师分批到北京门头沟区（当时称京西矿区）的农村下放劳动，1958年初出发。我是第一批下放的，整整一年在西斋堂村。到1959年春季才返回北京大学校园。这时，北大经济系设立了编译组，我转到编译组工作，从事英文经济学资料的编译，有空就又到赵老师、周老师家中请教。

1959年到1961年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食品供应紧张。我已有一个孩子，妻子远在辽宁鞍山，两地分居，租了海淀苏公家庙四号院三间简陋的平房居住，三间小房子加起来不过20多平方米，上有外祖母、母亲，此外还有弟弟厉以平在北京101中学读书，生活相当艰难。幸亏我还利用晚间从事翻译，赚些稿费，贴补生活。令我感动的是，周老师、赵老师两老都从北大步行到我简陋的家中来探望我。他们看到我家如此清苦而仍埋头读书和翻译，不断对我勉励和安慰。此情此景，至今我仍铭记于心。

从这时起，我到两位老师家中去访谈时，题材已经不限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了。我们都对现实的经济状况畅谈自己的看法，认为三年经济困难主要不是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的，而是政策的失误所导致。周老师认为我人品可靠，所以在谈话中没有什么顾忌，直抒自己的观点。今天回想起来，当时我的认识是有限的，我只认识到这些都是政策失误的后果，而政策之所以失误，则是由于下情不能上达，甚至基层隐瞒实情，才导致政策制定出了偏差。当时我没有认识到是经济体制的弊端所致。大约十年之后，即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再到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农场下放劳动，目睹了农民的艰苦生活之后，我才进而认识到正是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这些灾难。我个人经济思想的转变，并非开始于三年困难时期，而是开始于鲤鱼洲农场下放劳动期间。

四

1962年，周老师患上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匆匆赶到医院，那时他还能下床走走，师生二人在病房前面走廊的靠椅上交谈很久。周老师清瘦多了，我说：“现在政策已经宽松些了，市面上的供应也比前两年丰富一些了，看来情况正在好转。”他点点头，只说了一句：“但愿如此。”接着他把话题转到了我的工作上来。他问我最近忙些什么，我说仍在研究外国经济史，并且和马雍同学着手翻译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周老师笑了，他说：“这可是一部世界名著啊，罗斯托夫采夫另一部世界名著是《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译完这本再译那一本吧，你们都才30岁出头，大有可为啊。”今天可以告慰周老师的是：《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在1965年就译完了，交给了商务印书馆，接着开始了十年动乱，拖到1985年才出版。至于《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一书，我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再从事翻译了，况且马雍同学也已在1985年《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译本出版后不久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到哪里去找一位互译互校的同龄合作伙伴呢？

1963年周老师逝世。在追悼会上，我痛哭失声。师母魏璧老师握住我的手，一边哭，一边叮嘱：“周先生把研究工作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要多多努力啊！”现在，魏璧老师也早已谢世。当年参加周老师追悼会的北大经济系的教师中，不少人也先后离开了人间，但追悼会的情景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因为周老师是最早把我领上西方经济史研究道路的恩师。

1993年，周老师逝世30周年之际，我曾经以一首七绝表达了对周老师的怀念和崇敬。

七 绝

纪念周炳琳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一九九三年

旧事模糊淡淡痕，
只知冬冷未知春，
先生不顾潮流议，
夜半邀谈深闭门。

外国经济史一直是我的第一研究方向。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一度被借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我把研究的重点转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问题。1988年起，我连续担任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又转入全国政协，担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我的研究重点在这些年内一直是中国经济现实问题，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证券法和资本市场、就业、民营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和二元体制、城镇化、贫困地区发展等等。但外国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始终未中断。可以告慰周老师的是，我们的外国经济史专著《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一拜占庭经济史》已经出版；《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即将出版；《希腊古代经济史》上下两卷：上卷《希腊城邦制度》、下卷《希腊

化时期》，正在整理过程中。此外，我的外国经济史论文集《西方经济史的探讨》也出版在即。尊敬的周老师，弟子从未忘记过您的嘱咐，尽我所能，在外国经济史研究中作出成绩。

王芸生与《大公报》

张颂甲

看到时下新闻工作者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周恩来总理和曾任《大公报》总编辑、社长的王芸生先生的一段谈话。

解放后，周总理有一次问王芸生：多年来，《大公报》培养出许多名记者，有什么经验？王芸生笑着说：报告总理，我没有什么经验，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三个字：“发路费。”

王芸生所说的“发路费”，也就是鼓励记者走下去，深入采访，放手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不作过多干预。这样，写出的报道自然会有创造性和特色。他的做法，是应当肯定的。当然，它的内涵与今天的“走转改”的丰富内容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了。

抨击时政，惹得蒋介石大发雷霆

王芸生，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即1901年，天津市人。幼年就读于塾馆，没有上过洋学堂，当过茶叶店和木行学徒。他的文化知识全靠自学得来。1929年因与《大公报》打笔墨官司，他受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赏识而被邀请参加《大公报》，历任编辑、编辑主任、总编辑、社长等职。他先后在《大公报》天津馆、上海馆、武汉馆、重庆馆、北京馆任职（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日寇入侵，《大公报》辗转各地设馆，坚持出报，

从未间断)，也去过香港馆，只是待的时间不长，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公报》被迫停刊，历时37年。

余生也晚，对《大公报》初期的情况既不了解，更未参与。我对《大公报》和王芸生先生的了解，始于抗战时期，而我和王芸生先生共事（作为他的部下）则是在我进入《大公报》后的17年。

抗日战争中后期，我作为流亡学生在四川永川县国立十六中学就读。因国难当头，背井离乡，加以生活贫苦，心情比较苦闷，所以时时关心战局的发展和时局的变化。在校门外不远处，有一块贴报牌，张贴着《大公报》，每天中午时分邮车运来报纸，便可看到当天的《大公报》，我和许多同学是《大公报》的忠实读者，几乎每天都站在那里看报。

1940年夏，国民党大后方物价飞涨，米珠薪桂，民不聊生。为此，王芸生于6月29日发表社评《天时人事之雨》，提出用曹操借人头的办法，杀几个囤积居奇、操纵粮食买卖的奸商，以平抑粮价，稍解民怨。文章敦促当局关心群众生活，要动真格的！其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社评，对大后方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形势予以抨击，痛斥黑暗，为民请命。这些言论理所当然地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支持，我们这些穷学生也为之叫好，当然也遭到官商一体、鱼肉人民的国民党统治当局的记恨。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会同翁文灏、张嘉璈等政要约见王芸生，指责“引用数字不准”，表示抗议。

1942年河南省大旱，3000万同胞深陷在饥饿死亡线上。1943年2月1日，《大公报》刊登记者张高峰寄自河南叶县的通讯《豫灾实录》，对河南人民惨遭“水、旱、蝗、汤”的祸害，导致妻离子散、饿殍遍野和以人肉为食的惨绝人寰情况作了报道。王芸生读罢通讯，心潮起伏，不能自己。对比重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情景，他无比痛心，便奋笔疾书，写出了《看重庆，念中原！》的著名社评，刊登在第二天的《大公报》上，淋漓尽致地鞭挞国民党政府腐败透顶，横征暴敛，草菅人命，致使万千生灵涂炭。这篇社评惹得蒋介石大发雷霆，当晚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命令《大公报》停刊三天，记者张高峰被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

因为《大公报》能为老百姓说话，当时受到众多读者的声援和热爱。

订户激增，发行量之大，为重庆其他各报的总和。记得重庆《大公报》刊登过一则启事，因印刷能力所限，劝说读者不要再订阅《大公报》了，一份报纸，大家可以传阅。

的确，《大公报》在国民党大后方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一张报纸，类似受群众欢迎的报道还有许多，不能一一列举。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社评作者是王芸生，只知道《大公报》和王芸生是连在一起的，是不可分的。

在国共停战谈判期间，我们通过读报了解到毛泽东对《大公报》特别重视，并亲自做《大公报》的工作。他去重庆与国民党政府和谈时，工作十分繁忙紧张，仍然抽出时间三次会见王芸生等《大公报》负责人。一次是1945年9月5日下午，在重庆桂园（张治中的公馆，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将此处备作毛泽东在重庆市内办公会客的地方），毛泽东接见《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和编辑主任孔昭恺、采访主任王文彬三人，谈话三小时，肯定《大公报》具有爱国情怀，在动员全国人民抗日宣传上起了大作用等。谈话后，又留他们一起吃晚饭，作陪的有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等同志。第二次是9月20日，毛泽东再次接见三人，又进行了长时间谈话。第三次是9月20日晚上7时，《大公报》宴请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席间，大公报社负责人重提所谓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回答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宴会结束时，毛泽东为《大公报》题写“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不仅毛泽东，周恩来也多次在不同场合称赞《大公报》是爱国的、抗日的，《大公报》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大公报》人都具有强烈的事业心等等。

当我高中毕业，先后进入广州中山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继续求学时，王芸生等民主人士为避免国民党迫害，于1949年2月在地下党安排下，由上海秘密赴香港，随后由海上取道大连来到北平。其时，天津已解放，天津《大公报》更名《进步日报》继续出版。我于1949年8月进入报社工作，当了一名记者，因而得知了上述情况。

当王芸生听说天津《大公报》未能恢复原名出版时，非常懊丧。但

王芸生到北平后，周恩来很快对他说：上海《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这时王芸生才欣然释怀。南下前，周恩来为他饯行。

原来，中央对天津《大公报》更名一事很快进行了反思。毛泽东看到刚创刊的《进步日报》时，对左右说：旧瓶可以装新酒，《大公报》可以不改嘛！由是，上海解放后，《大公报》保留原名，继续出版。其后，中央决定，1953年上海《大公报》北上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仍以《大公报》命名；1956年《大公报》迁至北京出版，中共中央文件明确：“大公报是党在财经工作方面的公开报纸。”《大公报》成为全国性的财经党报，同时兼顾国际宣传。在组织领导关系上，《大公报》曾先后由文化部、财贸部领导，最后由李先念副总理为主任的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领导，实际负责的是时为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的姚依林。

王芸生北上后，仍任社长，副社长孟秋江、李纯青，总编辑张琴南，他们都是老同事、老朋友，相处愉快，对报社全面工作可以随时过问，对报纸的编排也不时提出意见。此时，王芸生以全国政协常委身份，参加了一些政治活动，如参加《共同纲领》的讨论、定稿，10月1日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道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等。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判：“照单全收”

我在报社17年，王芸生不期而遇地和我谈过一次话。他是长者，和颜悦色，满面慈祥，温文尔雅，我从未见过他发脾气，只是有时偶见他二目圆睁，颇有威严。那次他和我谈话的内容已记不清了，大抵是从爱护青年出发，讲一些鼓励的话，让我“好好干”。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奉调参加解放军总政治部敌工部组成的抗美援朝记者组，临出发前，他和李纯青一道听取了我的汇报，鼓励我在外面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干”。

1954年，李纯青调离《大公报》，中央派来杨永直任副社长，袁毓明为总编辑，二人先后担任《大公报》党组书记，成为报社实际上的“一把手”。王芸生虽仍保有社长之名，实际上已不管编辑业务。他作为全国人

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只能忙于社外的一些社会活动了。

1957年，开展了整风运动，王芸生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哲学班学习。当时，中央召开的几次民主人士“大鸣大放”座谈会，王芸生并未参加，也未“鸣放”，似乎躲过了“向党进攻”的磨难。但是不久，反击右派大规模的斗争开始了，王芸生和《大公报》编辑、记者几次参加全国记协召开的批判大会。每次大会都有人成为批判的重点。批判会在北京日报社四楼礼堂召开，一次有人当场跳楼自尽，可见斗争的激烈程度。有一天，大会刚开到一半，火力突然转向王芸生。顿时，全场口诛笔伐，纷至沓来，使王芸生一时不知所措。当天休会时，全场人都走光了，他还一人呆呆坐在会场一动不动。

事后，对王芸生的批判起了变化，大会不开了，此后也不再追究了。王芸生大感诧异。直到1960年，杨东莼作为党与王芸生的联系人，才将真相告诉了他：毛泽东认为当时全国只有三家全国性党外报纸，而《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总编都已划为右派，《大公报》的总编辑（社长）不宜再划为右派了，因而让胡乔木打电话通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王芸生才逃过这一劫。

反右派斗争以后，《大公报》编委会宣布社长王芸生以后不再参加编委会，以便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大约1959年底，在一次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遇见王芸生，让他会后留下，有事要谈。周恩来提出要王芸生写《大公报》史。王提出，当事人写“当时史”不恰当，因而加以推辞。后来，当周恩来征求了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意见后，仍主张由王写。最后，周恩来再次找王谈话，亮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时，王才勉强接受下来。他约请曾任《大公报》总经理的曹谷冰与他合写。

为写《大公报》史，他们历经两年多时间，仔细查阅了几十年的旧《大公报》，写出了《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和《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两篇长文，史实的叙述不可谓不详尽，只是在论点上尽量“自我讨伐”，无端地“上纲上线”，把《大公报》说成是“政治上反动的大资产阶级报纸”，无情地进行批判。这当然不符合《大公报》的实际情况。

《大公报》一贯坚持“四不”方针：“不党、不私、不盲、不卖”，这样说

也这样做了，它从未接受过国民党政府一文资助，也从未接受资本家的一文资助，纯粹是一张“文人论政”、“以文章报国”的民间报纸。因为它敢于痛骂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曾多次刊登文章责骂《大公报》和王芸生“其主义是民族失败主义，其方略为国家分裂主义，其目的是助长动乱，危害国家”；多次指责《大公报》为共产党“张目”，是新华社的“应声虫”。由此可见，说《大公报》“政治上反动”，是违心之言。

在写完《大公报》史后，王芸生又把精力投注于唐代文宗韩愈、柳宗元的研究上，曾写出多篇学术论文。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共与苏共论战，陆续发表“九评”长篇文章。这主要是由康生主持进行的。这本与《大公报》无干。有一天，康生突然找到王芸生说，《大公报》有人才，也参加和“苏修”的论战吧，你们自出题目，写出后统发。王芸生奉命不敢有违，回到报社与时任大公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常芝青商定，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两条路线斗争为题，撰写文章。他亲自动手，写出一个简单的提纲，最后以唐代杜甫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作结。由于写作匆忙，记忆有错，将“名俱灭”误为“名俱裂”。他事后赶忙更正，并一再检讨，成为一个小插曲。

为写这篇“反修”文章，报社编辑部抽调国际部主任张契尼和俞振基、徐洪烈和我四人集体合作。我们昼夜奋战，历经月余，几易其稿，又是一篇“万言书”完成了。经康生审阅同意后见报，署名“范秀珠”（“反修组”谐音），是康生加上的。我们在挑灯夜战时，王芸生和常芝青几次前来慰问、打气，给了我们很大鼓励。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北京《大公报》作为文化机关首当其冲。6月初，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派出工作组进驻报社，发动群众广贴大字报，揭批报社当权派及所谓的“牛鬼蛇神”。大部分党政领导成员立刻成为“黑帮”，王芸生自然难逃此劫。6月中旬，中央财贸部工作组撤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派遣某装甲兵学院的工作组进入报社。转年，为使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上级又派出高等军事学院军管小组进驻报社。此时，中央财金学院红卫兵

“八八战斗队”也派来“孙大圣支队”进驻报社。王芸生等“黑帮分子”每日被批斗，日子不好过。全报社人员分成两大派，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整天乱哄哄，七斗八斗，朝不保夕，人人自危。

王芸生一生不抽烟、不喝酒，甚至连茶也不喝，吃饭清淡。他是行政七级的高级干部，每月薪金用不完，都存入银行。但他被“专政”后，不再发给工资，存款、稿费也被冻结，每月只发给他12元生活费，妻子和正在上大学的小女儿每月另发15元生活费。王芸生出身贫寒，生活苦一些，不太在意，只要不挨打受骂，就满足了。他早餐半个窝头或馒头，一小块咸菜，中午半个窝头，5分钱水煮白菜，一月只花3元钱伙食费、1元钱公交车费，剩余8元钱都交给老伴。

王芸生被责令清扫厕所，晨起还要把报社门前人行道清扫干净。他绝不怠慢，每天清晨5点就去清扫，无论是夏日还是寒冬。他每天还要按时去看揭发批判大字报，并且都要记录下来，好接受批判。造反派针对解放前《大公报》发表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质中共》和《可耻的长春之战》等攻击过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社评，大加挞伐，什么“反共老手”、“老反动派”、“狼心狗肺”等等大小“帽子”统统加在王芸生头上。有一次批斗者问他：你是不是右派？他们以为王芸生会否认，准备狠狠批他。他却说：我就是右派，如果我不是右派还有谁是右派呢？他对所有批判都是“照单全收”。

王芸生自幼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不论多忙多累，即使生病，都不会影响他记日记。谁料他保留的日记竟给他带来了灾难。造反派从王芸生的日记中发现抗战期间，他曾两次被蒋介石邀请到重庆南岸黄山总统官邸为蒋讲学。审问者立刻火冒三丈，质问王芸生：“怎么你一会儿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一会儿又见人民公敌‘蒋该死’，你不是反革命两面派是什么，你不是狗特务是什么……”王芸生被问得哭笑不得，纵使有十张嘴，也说不清楚啊，他只有低头认罪，忙说：“该死，该死！”

意外“特赦”，拨开云雾见青天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准备接待日本首相时，毛泽东让秘书找来由当年王芸生编写出版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参考阅读材料。凡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总要看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部书。在日本，该书就有两种译本，田中角荣首相也熟悉此书。

1972年国庆节前夕的9月26日，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时，就两次提到这本书。当他们再次提起这本书时，毛泽东突然向在场的周恩来说，应该让王芸生参加接待活动，周恩来答应下来。实际上，周恩来并不知道当时王芸生身在何处。接待田中角荣的活动，王芸生当然来不及参加了。1966年北京《大公报》被宣布解体，《大公报》人，包括编辑、记者、工人等共200多人，除少数几人留在市内外，全部下放京郊农村。此时的王芸生正和《大公报》的编辑、记者、工人们一道，在北京西城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内，会同旧市直机关的广大干部群众共同接受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再教育，每天“斗私批修”，劳动改造。我和王芸生先生同在一个连队，只是不同排、班，平时不能来往。王芸生在改造时自我革命，勇于否定自己，表示“我连滚带爬也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因态度好，曾受到连队的表扬。我有时在厕所遇见他。由于前列腺肿大，他排尿困难，痛苦不已。平时少见，这次见他形销骨立，瘦弱不堪，一脸病容，显现苍老。后来严重的肝病，可能就在这已埋下了种子。见四下无人，我小声地说：“芸老，多注意身体！”

周恩来抓住机遇，指示有关部门立刻找到王芸生，同时尽快做两件事：一是安排王芸生参加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二是在对日友好交往中适当安排王芸生参加。

周恩来的指示如同突如其来的“特赦令”，王芸生的“劳动改造”生活随之结束。他从市委党校离去，当时保密，《大公报》人都不知道，也不敢打听。用王芸生后来的话说：“我就如在云雾之中，看看四周难友无

一赦免，自己既感到庆幸，也觉得莫名其妙。”

事情很快明朗了，他回家当日，收到出席国庆23周年招待会的请柬。9月30日，王芸生诚惶诚恐地手持请柬，步行前往人民大会堂。由于几次抄家，已无像样的服装，一身布衣装束的老者不像是一位首长，因而被警卫挡住。后经多次联系，反复盘查，才被允许进入。眼见大会堂宴会厅招待会隆重的场面，王芸生真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10月1日，王芸生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他才相信真的被“解放”了。

王芸生手持请柬步行参加国庆招待会一事惊动了周恩来，他立即通过有关部门给北京市革委会打招呼，给王芸生恢复生活待遇和医疗保健待遇，为他配备了专车，还将他的档案由1966年被红卫兵封门的大公报社转到全国政协。王芸生不仅恢复了全国政协常委职务，还担任了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要职。他曾一度活跃于外交场合，周总理等每次接待日本朋友，他都陪同接见；1975年邓小平“出山”，他陪同邓接待日本来宾。据王芸生说，每次接见时，邓小平总是让他先行，并谦虚地说：“王芸老，您比我年长，请先行。”令他十分感动。随后，他率中日友好代表团访问了日本。

王芸生和我们分手后，我就很难见到他了。随着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和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国家形势逐渐明朗。1980年，王芸生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的肝病已到了危重地步，4月份，他进入昏迷状态，5月30日不治与世长辞，享年79岁。王芸生去世后，各大报发布讣告，称他为“我国卓越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著名的无党派爱国人士”。6月19日，王芸生的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邓小平、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出席追悼会的有400多人，礼堂门外聚有1000多人。

王芸生去世后，赵朴初先生写了一首挽诗：

少年苦学历荆榛，终作浮天击水鲲。
人海燃犀尝烛鬼，论坛主笔仰扶轮。
朝宗百折溪流志，报国千端老病身。

十载论文风雨共，泪挥遗著勉重温。

我认为，这是对王芸生不平凡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值得如此赞誉。

九三学社的两只“老虎”

——许德珩与周培源的交往

许 进

祖父许德珩是九三学社首任主席，生于1890年，属虎。九三学社第二任主席周培源，生于1902年，也属虎，我称呼他周公公。1989年10月17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医院北楼病房举行活动，庆贺我的祖父步入百岁之年。早晨，我给祖父穿上了红色的寿袍。不久，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周培源主席和严济慈名誉主席陪同万里委员长和习仲勋副委员长来到病房。万里委员长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向我祖父祝贺生日。他对我祖父说，许老，您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习仲勋副委员长祝我祖父健康长寿。我祖父十分高兴地与他们握手致谢。当周培源主席走到我祖父的身边时，我祖父伸出双手紧握住这位继任者的手，久久没有放开，嘱托与希望，尽在不言中。此情此景令我十分感动。随后，国务院李鹏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江泽民总书记，全国政协王任重副主席代表全国政协和病中的李先念主席向我祖父祝贺生日。李鹏总理问周培源主席：“周老，您高寿啦？”周公公回答说：“我也是属虎的，比许老小一轮，许老是大老虎，我是小老虎。”他幽默的话语把大家全逗笑了。

周老夫妇是我们家座上的鸿儒之一。我的祖父、祖母命我称呼他们周公公、周奶奶。童年的我，对于周公公与众不同的几个特点印象深刻。其一，周公公满头鹤发，雪白的头发梳理得非常整齐。其二，周公公戴助

听器。50年前，助听器是稀罕之物。我随同祖父见过的知名人物当中，记得只有周公公、郭沫若郭老和吴有训吴老戴助听器。其三，周公公戴无框的金丝眼镜。对于喜爱汽车的我，尤其感兴趣的是周公公坐的是一辆美国雪佛兰牌轿车。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轿车都是国有的，由国家统一购置，根据需求和级别配备给干部使用。到了20世纪60年代，街上跑的轿车几乎都是苏联制造的，比如吉斯牌、吉姆牌、伏尔加牌和胜利牌等，相当于今天的国产车。来我家的客人中，坐美制轿车的周公公和坐英制轿车的水产部杨扶清副部长令我特别感兴趣。在我的童心中，周公公是大科学家、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北京大学的副校长。至于他来我家时与我祖父谈话的内容，我就不关心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九三学社被红卫兵勒令取消，机关被红卫兵占据了。祖父亲自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九三学社机关的门口，声明九三学社从即日起取消。在此17年之前，九三学社内部曾经商议过解散的事情。那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九三学社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其政治纲领，其成员在各自的教学和科研岗位上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一部分社员认为，九三学社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可以解散了。此动议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劝止了。他们认为，九三学社不仅不能解散，还要继续发展。谁知，17年后，九三学社就这样被取消了。不久，水产部的工作也停止了。祖父天天关在家中，因为担心给对方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朋友之间的来往全部中断了。祖父偶尔出门，上天安门城楼陪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平时，他在家通过阅读红卫兵出版的各种小报了解运动的情况。那时，我的父亲和姑姑都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没有行动自由。祖父命我的母亲把街上卖的各种小报买回来给他看。通过这些报纸，祖父不仅可以了解到运动的动向，还可以间接地了解到一些老朋友的处境。

1967年底的一天，祖父看罢小报十分气愤地说，北大的红卫兵到周培源家抄家，还用木棒打他，幸亏周培源的女儿力气大，用胳膊挡住了木棒，真是岂有此理！他又读了一会儿，很少骂人的祖父说了一句：“混账！”后来才知道，小报报道的内容不准确。当时周公公已经被支持他的

学生保护起来了，周奶奶和他们的儿女被来抄家的学生和工人打伤了。过了一段时间，在得知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周公公担任了革委会的副主任以后，祖父对周公公的安全比较放心了。

1969年夏末，祖父在北京大学的老同学范文澜去世了。当祖父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伤感地赋《忆友》诗一首：

留滞京华又见秋，暮年身世转悠悠。

旧交零落新知少，怕向人前说旧游。

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以后，国内的政治气氛有所缓和。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周公公多次陪同周总理接待来访的美籍科学家，祖父也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祖父认为，他现在出门看朋友，已经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了，遂恢复了到北大看望老朋友的习惯。我曾经多次陪祖父到燕南园看望周公公、周奶奶、魏建功先生和住在周公公家对门的汤用彤的夫人；到燕东园看望游国恩、赵迺抃先生。后来，周公公、周奶奶也像往常一样到我家做客了。一次，在我家，周奶奶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她说：“许老，你知道北大外语系怎么‘开门办学’吗？他们到农村去，用英语斗地主。久经运动的地主竟被他们吓得够呛。因为地主们听不懂学生说的话，看到学生们愤怒地呱呱呱地叫喊，不知道学生要如何处置他们，所以吓得发抖。”听了周奶奶讲的故事，祖父和祖母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笑过之后，他们又为北大的教育沦落到如此地步感到十分悲哀。

1978年，周公公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次年4月，周公公率北京大学代表团到美国、加拿大和欧洲访问、考察，先后参观访问了21所高等院校，历时5个月。当他了解到西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水平，再看看因十年内乱造成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十分落后的状况，非常着急。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周公公将他的感受写成《访美有感——关于高等教育改革》一文，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不料，周公公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番热情和建议却被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斥为“不要党的领导”。

一天，周公公和周奶奶来到我家，向我祖父诉苦。周公公说：“许

老，我看到中国大学落后的现状十分着急，才写了这篇东西。粉碎‘四人帮’已经三年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了一年多了，没想到极左的人还大有人在。他们批判我是‘专家治校’，‘反对党的领导’，还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我，我拭目以待。”周奶奶说：“许老，培源已经这么大了，他当不了这个校长了，跟他们着不了这个急了。你跟中央说说，给他换个地方工作吧。”对于老朋友的处境，祖父十分同情。关于专家治校的问题，祖父在1957年时就曾经提过并险些因此被划为“右派分子”。祖父压住内心的不平，对周公公周奶奶劝慰了一番。后来，祖父多次向中共中央反映周公公的工作问题。在1980年9月闭幕的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周公公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前，周公公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为了方便参加全国政协和九三学社的工作，周公公从北大的燕南园搬到了北太平庄4号院。当时，民主党派的工作刚刚恢复，百废待兴，周公公协助祖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对九三学社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6年1月，祖父长期住院治疗，周公公主持九三学社的工作。祖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辞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由周培源担任主席的申请。在1989年1月闭幕的九三学社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公公当选为九三学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祖父当选为名誉主席。

此后，周公公主持了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三江水电资源的论证，以及大西南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的研究论证，提交了《关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区的建议》等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建议，使九三学社的参政议政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不幸的是，周公公在1993年去世了。

祖父和周公公这两只“老虎”早已离我而去，但我所亲历的他们交往的故事恍如昨日，难以忘记。

我所了解的邵循正先生

周承恩

2009年是邵循正先生诞辰100周年。我感到当前即使在文教学术界，特别是在青年学子中，知道邵循正名字的，恐怕已经为数不多了。可是在三四十年前，邵先生却是一位在国内外很著名的大专家、大学者。

我在读大学期间，曾上过邵先生讲授的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外关系史等课程。毕业留校后，又在邵先生领导的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工作多年（主要是跟随教研室副主任荣天琳先生分担中国现代史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所以我也可以忝列邵先生的众多学生之一，对邵先生多少有一些了解，觉得应该将我所了解的有关邵先生的一些事情写出来，以抒怀念之情。

我是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七名学生之一。历史系的系主任原是吴晗先生。但此时由于吴先生已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公务繁忙，无暇顾及系务，乃由邵循正先生继任系主任。在清华期间，除上过邵先生的课外，我由于曾担任历史系学生会的总干事，与系主任邵先生也时有接触。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法学院系大都并入新的北京大学。于是原清华、燕大和老北大历史系的绝大多数教师都聚集在新北大历史系，使该系教师阵容十分强大。系主任由翦伯赞先生担任，系副主任是周一良先生。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四个教研室主任分别由邓广铭、邵循正、齐思和、

杨人榘四位先生担任，当时被戏称为“四大名旦”。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由周一良先生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由苏秉琦先生兼任（苏先生时任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还有新设立的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主任是王铁崖先生。1954年我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开始就分配在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任助教。1957年王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后，国际关系史教研室随之被撤销，此后我才转到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国际关系史教研室共有五名教师，其中两名是教授。王铁崖教授原是老北大政治系主任，另一位教授陈芳芝先生则是原燕大政治系主任。一个教研室即拥有两位系主任级的教授。至于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除主任邓广铭先生外，还拥有向达（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张政烺、余逊等多位知名教授。由此可见历史系教师阵容之强大。

这种情况也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在教授评级时就对上述各位大教授（包括邵先生在内），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全国高等院校中进行了一次教授评级工作。北大历史系也在翦伯赞先生主持下，召开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联席会议进行评议。我当时兼任系秘书，作为工作人员也列席了那次会议。翦老在会上首先发言，大意是他认为在座的各位先生都是在各自专业领域中的知名专家学者，所以都应该评为一级教授。在讨论中，对翦老的发言似乎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大多是补充，如认为未参加会议的向达、张政烺、余逊等先生也应评为一级。记得只有王铁崖先生发言说，他是搞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如果在政法界，他大概可以评为一级，但在历史学界，和在座的各位相比，恐怕只能退居二级了。后来经过全校平衡，历史系只批准了翦伯赞、向达二位先生为一级教授，其余上述诸先生一律被定为二级教授。当时在史学界就有不少人议论说，北大历史系的那些二级教授，如果分散在其他高等院校，大约都可能被评为一级教授；特别是邵循正先生，无论在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外关系史领域，还是在蒙元史和满清史等领域，都是国内外知名的权威学者，如在其他院校，一定会评为一级教授。例如在蒙元史学界，与邵先生齐名的韩儒林先生（当时有“南韩北邵”之称）在南京大学不就是一级教授吗！

大家都知道陈寅恪先生与邵循正先生多年来同校共事，关系介乎师友之间。邵循正与其弟邵循恪两位先生于1926年同时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本科。1930年毕业后又同时升入本校研究院。按清华当时惯例，在每届研究生毕业时，一般每系可选派其中一名出国留学。邵循正先生为了避免以后可能与其弟发生竞争，乃转系师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先生，攻读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外关系史。当时陈寅恪先生已在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后又被中文、历史两系聘为教授。邵先生在清华学习期间，曾经选修过多门陈先生开的课程，学到不少陈先生特长的专业知识和语言文字，深受陈先生器重。1934年，清华曾发生过一件轰动教育界的“朱延丰事件”。大致情况是：清华在决定从当年毕业的研究生中选派出国留学生时，历史系有两名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即朱延丰（导师是陈寅恪先生）和邵循正（导师是蒋廷黻先生）。而系主任蒋廷黻只向校方推荐了邵循正一人。朱便先后向校领导和教育部申诉，认为蒋先生有私心，只推荐自己的研究生。一时闹得满城风雨。最后陈寅恪先生主动致信校长梅贻琦，说明当日历史系教授开会，研究该派谁出国时，正是他自己首先表态，“认为只宜派邵循正一人，这一主张得到与会各教授全体赞同，无一异议”。这样，朱才无话可说，一场风波得以平息。由此可见陈先生对邵循正的器重。还应该提到，邵循恪先生也被政治系推选为出国留学生。兄弟二人同时被选派出国，一时传为佳话。

1934年邵先生出国后，与陈先生一样，都是先去巴黎法兰西学院师从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学习蒙古史、古波斯文等，次年即转入德国柏林大学继续学习。只是比陈先生少去一些国家。1936年邵先生回国后即到清华历史系任教。此后，两位先生乃长期同校共事。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的极端困难时期，二人在工作上、生活上互相帮助。1943年陈先生的名著《唐代政治史述略稿》出版时，陈先生曾对其门生蒋天枢说：“此书之出版系经邵循正用不完整之草稿拼凑成书，交商务出版。原在香港手写清稿则寄沪遗失矣。”想不到此手稿经王兼士先生保存多年，得以于2009年由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这真是学术界的一件幸事。

邵先生和陈先生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突出的是，二人都不追求什

么名校学位，早年著作都很少，论文也不多。但都是博闻强记，学贯古今，会通中外。尤其二人都掌握十余种外文和古民族语言，因而能将国内国外的各种文献资料和中西学者的众多研究成果融会贯通，纠讹辨误，发人之所未发。因此他们都在中青年时，即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

近年来不少书报披露，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清华成立国学院时，梁启超向当时的校长推荐年仅30岁左右的陈寅恪来院担任导师。当校长得知陈先生既无名校学位，又没有多少论著时，怀疑其能否胜任。梁启超当即对校长说：我可以称得上著作等身，但我的所有著作加起来，也没有陈寅恪几篇论文的价值高。这样，陈先生才得以进入清华大学。陈先生晚年目盲，他依靠惊人的记忆力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在助手的帮助下，继续担任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还写了《柳如是传》等若干名著。

邵循正先生一贯惜墨如金，寿命又较陈先生短，所以一生论著比陈先生更少。最主要的就是一本20多万字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和在他去世后才由张寄谦等先生编辑的《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前者是邵先生在读研究生时写的硕士论文，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作为清华大学研究生论文丛书之一公开出版后，很快受到国内外相关学者的高度评价。邵先生因此一举成名。当时他还只是一位年仅20多岁毕业不久的研究生。以后多年来，仍有一些出版社把此书作为20世纪学术名著，几次重印再版。近几年还看到此书又新印上市。邵先生在学术功底和记忆力方面也有类似陈先生的表现。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曾流传过“邵循正摸黑讲元史”的故事。说的是有一天晚上，邵先生应邀在联大作题为《元遗山和耶律楚材》的学术讲座。许多知名教授和姚从吾、罗常培、毛子水、吴宓等先生都来听讲。不料开讲不久，电灯突然熄灭。邵先生稍作等待，即脱离讲稿，摸黑继续讲下去。而且仍然旁征博引，仿佛还在看着讲稿讲，且内容无甚遗漏。在快讲完时，电灯复亮，全场掌声雷动。主持讲座的罗常培先生即席赋诗一首，盛赞邵先生的才学。抗战胜利后，邵先生又与陈寅恪先生一起应邀赴英国牛津大学任访问教授，并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和鲁汶大学讲学。1946年回国后，仍到清华任教。

在思想和学风方面，我感觉邵先生实际上也继承了陈先生倡导的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邵先生承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但他在讲课或著作中，从不像一些人那样，言必称马、恩、列、斯、毛的“教导”，并把他们的片言只语作为衡量各种历史是非的唯一标准；而往往是用许多确切的历史事实来说明这些革命领袖们某些具体论述的正确或局限。他从不主动去写那些政治批判或政治宣传一类的文章，也很少去看别人写的这类东西。他拿到别人的专著或论文时，首先是翻看文末的注释和参考书目。如果没有引用新的资料，他一般也是不会看的。

邵先生在讲课时慢条斯理，声音很低，而且往往讲半句，吸一口烟，下半句也被吸没了。学生们则习以为常，似乎不需言传，也可意会。邵先生对学生可以说是“有教无类”、“唯才是举”。凡是聪敏好学，功课优异的，不论他们政治表现如何，他都一视同仁地喜爱。比我高一班的一位学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但由于他知识广博，外文又好，邵先生依旧热情地带他攻读中外交通史，并把自己未发表过的珍贵笔记等资料，借他研读，使他学识大进。在我们班上，他最喜欢的是殷叙彝、张磊、周清澍以及比我们低一班的周良霄等几位。他们都是共青团员或学生干部，同时又都肯钻研业务，成绩优秀，得到邵先生的器重。毕业分配时，他很早就提议要殷叙彝留系任教。但中央编译局得知殷掌握英、德、俄等多种外文，乃指名将他调走，使邵先生遗憾不已。张磊、周良霄等则被留做研究生，分配跟随邵先生攻读中国近代史或蒙元史。周清澍虽被分配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仍不时求教于邵先生。邵先生也很器重他，经常与他交流学术心得。上述各位学长都已成为各自专业领域中的著名专家学者。

邵先生一生谨言慎行，在公开场合，对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很少议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邵先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残酷揪斗、抄家、关入“牛棚”。直到林彪事件发生后，境遇才有所改善，得到“解放”，并被调去参与《元史》标点工作。邓广铭先生对于《元史》断句之难，曾有精彩论述：认为除了像邵先生这样的专家，一般学者都很难胜任。

可惜的是邵先生重新工作后不久，由于居住在一间装修后不久的办公室，导致呼吸过敏而不治逝世，时年仅64岁，比陈寅恪先生享年短了不少。我常想，假如邵先生能像一些老学者那样长命百岁，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他在学术上必然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回忆胡华老师

徐 焰 黄易宇

逝者如斯。弹指一挥间，到201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已90周年，新中国成立也有60多年了。一个甲子的光阴，带走了为新中国建立而奋斗的那一代人的壮丽韶华，胡华老师去世也已多年，可是他的音容笑貌却总浮现在我们夫妻的脑海中，并引来怀念和追思。

对我们二人来说，胡华老师是辅导我们专业学习的导师，同时又是长辈。他是母亲（婆母）抗战时的同学和战友。对我们这些已经度过中年的后辈来说，胡华老师那一代人的奋斗业绩已经刻入了历史的年轮；对于今天在工业化、信息化和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更已是遥远的过去。今天，我们立足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延续，现在的人们想要具备深邃的眼光，还是应该温故知新、借古鉴今，通过反思前辈所走过的道路而为未来的发展定下正确的坐标。胡华老师参与开创的中共党史研究这一学科，在今天和今后仍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他留下的一系列名篇华章始终给后人宝贵的启迪。

革命者、学者、立志从教者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我们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刚刚师从于胡华老师时，便听家母讲述过关于他的许多往事。在全面抗日烽火燃起不

久，胡华老师即从浙江奉化家乡来到延安陕北公学，投身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在政治上也彻底成为他那个同乡“蒋委员长”的对立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中，“三八式”是有着突出特点的一代人。胡华老师可以说是其中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的典型，革命和治学从一开始便交织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亲身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他在党史研究中具备了独有的专长，不到30岁便在国内这一研究领域中树立了自己权威的学术地位。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胡华老师首先是一个战士。据家母讲，在陕北公学他们两人同班，家母年龄最小，胡华老师倒数第二。胡华不到18岁便背负着沉重的背包穿越日寇的封锁线，在部队掩护下边打边走，三千里行军到达晋察冀边区。1939年冬，华北联合大学在敌后开学，胡华老师便留校任教（家母当时留校担任政治协理员），成为最年轻的“小教员”，随那所“战火中的大学”一面转战、一面教学。据胡华老师和家母讲，当年他们都看不起校内负责宣传的那个为人孤傲、爱睡懒觉、站岗时漫不经心、日寇来袭时误了报警的张春桥。后来张春桥在国内气焰熏天时，胡华老师一直对其嗤之以鼻，显现出真诚的革命者与投机野心家的冰炭不相容的品质。

胡华老师也曾有弃教从政的机会。1945年八路军解放第一座城市张家口后，他被党组织派往那里从事工人运动，担任过市总工会宣传部部长。不过他更喜欢研究和教学工作，撤离张家口后，25岁的胡华老师选择回到华北联合大学，继续从教。胡华老师不想当“官”而专心治学，这除了兴趣之外，还在于他长于思考，不愿盲从，更想用笔而不是权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事实证明，胡华老师选择了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工作时，亲身领会了导师的学识，不无感慨：“国内不乏宣传部长，可是像胡华老师这样的学者却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仔细分析新中国成立前投身革命队伍的人们的出身素质，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理想主义驱动的知识分子，一类是为改变现实苦难境遇的翻身农民。前者大都出身于生活条件和文化教育相对较好的家庭，后者大都属于《国际歌》所说的“饥寒交迫的奴隶”。在中国革命

从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中，前者是火种，后者是干柴。前者从一开始就是为“解放社会”而奋斗，后者则是从“解放自己”逐步提升觉悟而投身于解放全中国。像胡华老师那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革命知识分子，确实是那个时代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奋斗的难能可贵的骄子。党内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愿意思考、不甘盲从，因而在政治风浪中往往历经坎坷，却能留下许多发人深省的思考。胡华老师的一生经历恰恰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如今的人们翻阅1950年3月出版的胡华老师成名之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可能会感到有一些当年特定的政治概念的印记，但当年这本书却是让千百万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启蒙读物。在新中国奠基之时，胡华老师艰辛探索形成的这一史学著述赢得了千百万基层读者，从而开启了中共党史学科与新中国的成长同步前行的局面。

接着，由胡华老师主编，戴逸、彦奇两位老师参与编辑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辅助读物也成为畅销书。新中国成立之初，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地区级和师级干部都只有几十元津贴，这本参考资料版税颇丰，可谓天文数字。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由胡华老师提议，戴、彦两位老师一致赞同，把这些钱款悉数捐献给志愿军购买战斗机，充分体现了这位革命者兼学者的精神境界。当时在国内能做到这一点的，除了工商业人士，只有梅兰芳、常香玉等几位文化界名人。对这件足以震动全国的事迹，胡华老师却在几十年内从不愿提及，因为他感到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和爱国者分内的举动。

在胡华老师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我们几乎天天相见，朝夕聆听教诲，一个深切的感受：胡华老师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起，就始终是一位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得知胡华老师患肝癌要赴上海手术时，我们夫妇前去送行，他面带微笑淡淡地说，今后可能再见不到面了。那种无畏面对生命终结的精神，让人始终难以忘怀。

构建党史学科，勤于理论探索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至解放后的几十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中教授党史的人不计其数，能在社会上留名的却为数不多。胡华老师作为党史学科的开拓者和权威学者，独树一帜。因为他不满足于做一个照本宣科、陈陈相因的“传声筒”，始终坚持在史料发掘和理论指导方面进行独立探索。在中国社会从思想禁锢、僵化走向启蒙和开放的道路，胡华老师是一位难得的智者和开拓者。

史论结合是史学研究包括党史研究的基本要求。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却是常青的。中国共产党信仰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和教授中共党史无疑应以此为指导，然而怎样理解这些理论却有着“死板僵化”和“发展创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如今，重新翻阅胡华老师解放初期的一些著述，难免留有那个时代的政治印记，可贵的是，他并不拘泥于革命领袖的现成结论，而是在后来的岁月中不断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从延安时期起，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作为学习和写作史书的典范，因而深受苏联个人崇拜、领袖意志至上和路线斗争决定论的影响。胡华老师那一代人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教育。不过，他却在后来不断有所突破，解放初期所写的党史著作便体现了新的风格，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成为党史学科开拓创新的带头人。记得在1978年国内党史界刚开始拨乱反正之际，正是胡华老师所作的一个个报告，率先打破过去“左”的教条束缚，影响遍及国内院校、学术研究部门乃至党政军机关，让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学后有振聋发聩之感。当时一些坚持僵化理念的人将胡华同胡耀邦等人并列，讽刺为“五胡乱华”，其实这正是他的光荣。

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到胡华老师那里做研讨式的上课（这也是他当时带研究生的一种独特方式），曾专门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有关

奋斗与利益相关的观点。胡华老师特别叹息的是，在苏联、中国乃至世界上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建立后，都出现了以空想的政治口号取代人民现实利益的倾向，这些违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精髓的做法，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1978年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的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恰恰又是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与改革开放事业紧紧挂钩，才迎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世界头号农业大国长久无法解决吃饭问题的历史难题也终于得到解决。我们当时深有感慨的一点，就是听胡华老师解释党史中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活的马克思主义。

现在有些人在纪念老一辈革命家时，往往只谈其早年的奋斗，而较少谈及老年时的认识成熟。其实，正如中国古语所说的“春华秋实”，春天的花朵是美丽的，而秋季的果实才能真正供人享用。胡华老师那一代人在年轻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晚年时又根据中国特色在理论上思考如何创新发展，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焕发活力并能重新兴旺发展的原因。纵观胡华老师一生的研究成果，从1978年直至他去世前的著述学术价值可谓最高，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之一。

对史料的发掘和考证，是党史研究另一个重要领域。由于我国对历史档案长期坚持严格的保密制度却缺乏解密制度，这就使国内党史工作者普遍遇到难以找到原始史料和发表受到限制的难题。胡华老师一向善于从各种渠道搜集史料，还特别注重口述史学，采访众多党史事件的当事者。尤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大解放、众多老一辈革命家还健在的那个宝贵阶段，他直接采访了从大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众多老同志和革命的同路人，从口述中获得不少第一手资料。记得1981年访吴亮平，1982年访罗章龙、刘仁静等时，还带上我们这些学生一同前往。同时，胡华老师还经常去档案馆，通过考证原始资料揭开许多历史谜团。例如1981年为重新研究西路军问题，笔者便随他去过中央档案馆，通过对史料的重新发掘得出了新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0余年间，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大多只

限于叙述，深入探讨其起因和反思其教训的著述少而又少。胡华老师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1979年以后便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和教训，并由此思考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并逐年取得一些研究成果。记得胡华老师病危前，曾特别提出有志于“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可惜因种种主客观原因难以进行下去。时至今日，从理论上研究“文化大革命”仍是有待突破的重大难题。

治史服务现实，预言富有远见

缅怀和研究先人，其实是为了教育和激励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自师从胡华老师之后，一个深刻的感受便是，他不像一些学究那样只自封书斋和故纸堆里，而是以党史研究紧密服务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时，年过80的成仿吾担任校长。曾担任过吴玉章校长学术助手的胡华老师又成为成校长的学术助手。他协助这位他在陕北公学时的老校长完成了《战火中的大学》、《长征回忆录》、《记叛徒张国焘》等书稿。当时胡华老师特别称道的，是成老在70年代根据德文原版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纠正了过去译自日文版、俄文版所带来的不准确之处。他当时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晚年对早期著作中的一些观点便做过修正，后来苏联模式的问题，恰恰在于用僵化、教条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并把自身并不成功的生产和建设经验当成金科玉律强加于他国，最终使社会主义事业丧失了活力。例如在很长时间内，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的一些共产党人曾机械、片面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消灭私有制”的提法，夺取政权不久后便超越时空地采取一系列充满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激进举措，留下的教训极其深刻。胡华老师在研究和宣讲党史时，特别注重揭示这些教训出现的原因，并大力颂扬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他在生命最后几年反复思考的也是改革开放后如何巩固、发展这一成果。

令我们印象至深的一件事，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在如何对待20世纪50年代中国曾模仿过的苏联模式问题上出现了争论。面对有人提出应回到50年代效仿苏联的建设模式的意见，胡华老师特别指出，既然脱离出来就不能再回去，虽然“文化大革命”搞错了，但苏联模式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走不通的！差不多10年之后，当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发生时，我们回首他生前对此的看法，真是感慨万千！

在80年代初，胡华老师便提出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出现“异化”这一问题。他担心和反复告诫的，就是中国如何避免出现这一现象。他去世后不久，当苏联因革命的“异化”而最终走向瓦解时，中国共产党人却打破了前进道路上的发展瓶颈，这应归功于老一代和新一代革命和改革者的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胡华老师的成就显然也包含在其中。

注重现实问题而不背过重的历史包袱，研究历史时更立足于今后，这是开拓进取的国家和人民需要具有的特征。胡华老师的身上，正具备了这种特点。人民大学复校后，同学们普遍有一个反映，便是在校内名教授、老教授之中，胡华是最能与年轻学生打成一片的。例如，在校内食堂的午、晚两餐时（早餐他通常是在那间办公室兼寝室中简单吃点“牛舌饼”之类），他与同学们一起打饭、一起站在餐桌边谈笑风生，我们还将此称为“第二课堂”。胡华老师是真正按照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和现实教育，使老一代和年轻一代得到了很好沟通。这不仅体现了他的心态始终年轻，而且也说明他的思维方式在改革开放后的新形势下也是紧跟潮流，确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生动写照。

回首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之际，国家正百废待兴，胡华老师这样校内最有名的教授也只能“蜗居”一栋筒子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学生因食堂不够用而常挤在户外露餐。今天，人大校园早已是旧貌换新颜，北京城乃至整个中国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他的学生和后辈，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真是当年不可想象的。如今一些年轻人已不愿花费很多时间在历史纪念物前徘徊，而是开着私家车飞速奔向一个富裕、和谐的社会，这或许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随着时代变迁，再像当年那种以政

治说教的方式讲党史，显然已不符合多数现代人的心态要求。胡华老师在晚年思考的改进党史教育的一些设想，恰恰应作为如今和未来发展的参照。

不容否认的是，如今历史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都存在着严重的教育方式僵化问题。面对打开国门看到的多彩外部世界，许多中青年人已不相信那种陈陈相因并脱离现实的说教。为了新世纪的国家健康发展，中国需要根据新形势重新思考党史教育的问题，服务于新一代人的灵魂塑造以及树立他们对未来事业的信仰和信心。胡华老师当年的治学方法、理论思维和史学成就，仍然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今天，在出版《胡华文集》之际，人们看到一个和平崛起的富强中国已经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应该偿了胡华老师等开拓者的心愿，后辈人也终于可以无愧地告慰“乃翁”。

作为胡华老师的学生，今天，我们仍记得他那间“斗室”墙上所挂的、书写着李大钊名言的条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后人从这些老一辈先驱者身上所能继承的最宝贵的财富，不也正是这种“道义”吗！胡华老师妙手所写的文章，也将如同长途长跑的接力棒，传给一代代愿意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的人们。

穆青的最后岁月

罗海岩

2003年10月10日子夜时分，京城暴雨倾盆。谁也没有注意到，在雨中有一辆轿车从首都机场向北京医院疾驰，车上的人在心中默默祈祷：一定要赶在老人闭上眼睛之前让他看一眼新书！车子停在医院住院部门前，他怀揣墨迹未干的新书，冒雨拾级而上，闯进了那个熟悉的房间。当新书展示在病床前时，老人已处弥留之际，人们的呼唤他或许能听到，但他的灵魂似已远行。三个多小时后，老人溘然而逝。

这位老人就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新华社原社长穆青。送书人就是新华出版社参与出版穆青著作的责任编辑。从穆青感到去日不多，提出整理自己的书籍，到新华社党组下达出版任务，历时半年多的时间里，穆青一遍遍审阅书稿书样，总想把这最后一件事情做好，给人们留下完美的印象……当几本书稿基本已定时，他也闭上眼睛，放心地去了。

2002年9月，“穆青摄影展”在成都闭幕后，穆青感到肺部时有阵痛，经过检查，发现已有癌细胞在游荡，需要马上手术治疗。10月18日，他参加党的十六大闭幕式合影后，第二天即住进医院，并进行了肺部手术。

因癌细胞扩散，手术已经无能为力。按常规，做完这样的大手术后，一般也就还有半年或几个月的时间，况且穆青已年届八旬。虽然人们对穆青严格保密，但他体力日感不支，似乎已有不好的预感。经过认真考虑，他向前来看望的新华社领导同志，提出整理出版他的几本书的

愿望。

在长达60多年的新闻生涯中，穆青采写了数以百万字的各类作品，教育和影响了我国几代人的成长。他的内心深处一直认为，精神产品至高无上，唯有作品才是财富。现在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应该把宝贵的财富留给后人。

一方面千方百计救治穆青，一方面抓紧编辑出版他的著作，而后者就是穆青生命的兴奋点，是医治他病情的一剂最好良药。新华社党组了解穆青的心事，立即部署编辑事宜，决定抽调专人编辑整理《穆青通讯》、《穆青论新闻》、《穆青散文》三本书，同时要求新华出版社抓紧出版正在编辑整理的《穆青书法》和《穆青摄影》。在“非典”横行的4月，社领导召集国内部、国际部、对外部和出版社等部门领导戴着口罩进行座谈，落实编辑出版事项。因为出好这些书，迫在眉睫，丝毫耽误不得。

屈指算来，穆青先后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16本著作。当年他的《十个共产党员》一书组稿完成后，一家出版单位辗转前来约稿，穆青回答说，我的书都是在自己社里出啊！穆青的每部著作都给新华社带来荣誉，具有无以比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次参加编辑出版的同志精心编辑，不舍昼夜，多次到穆青家中请教和看望。此时的穆青，因为身体不好，谢绝了许多来客，却几次嘱咐家里的人：只要是编书的事来电话立即叫我，有人来谈出书的事时一定要热情接待人家。

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怎样收集和编辑成书，穆青自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给大家讲了几点原则：作品不是文稿的汇编，一些在个别年代里起作用的应景文章不要收入，有关名人和领导人的稿子要少，不要丢掉反映老百姓生活的内容；标题和内容基本不动，要维持原貌。后来，他在审核《穆青通讯》、《穆青论新闻》和《穆青散文》三本书的目录时，看到有些文章篇幅较长，就建议适当删减，别耽误读者时间，或做个提要，以方便阅读。

《穆青书法》和《穆青摄影》两本书，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了穆青独特的审美情趣和风格，分别收入近百幅书法和篆刻作品，以及150多幅经典照片。两本书稿在完成编排后，穆青一张张地审视和检查，有时一

幅作品要看上十几分钟。性情中人的穆青，看到得意之作时，常常高兴得手舞足蹈，左看右看，摇头晃脑地一声声叫“好！”见到不满意的作品时，又非常执拗地非要拿下来，等身体好些时重写。大家劝他，这已经够好了，您不必追求完美了，因为大家都希望早日看到这本书。穆青并不以为然，他要把一生的最后一项任务完成得更好，不留一丝遗憾。

编辑穆青的书稿是幸福的，也是比较容易的事，因为他和气可亲，尊重别人的意见，哪怕别人说错了，他也只是笑着摇摇头而不轻易批评。同时，编他的书又最不容易，因为他的要求高，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个基准线。“聊发少年狂”的穆青，有时像老小孩一般可爱可亲。当范敬宜应穆青之约写来《正气浩然上笔端》的序言时，穆青一遍遍地阅读，喜不待言。文中预祝他用生花之笔，挥写更多更美的篇章。穆老一边嘱咐编辑一字不改，一边爽朗地给范敬宜打电话，欣然接受他的祝福。

这一年盛夏的8月，新华社党组又专门召开会议，列出分阶段出版穆青著作的具体日程。决定由著名记者冯健审定《穆青通讯》、《穆青论新闻》和《穆青散文》。穆青最挚爱的《穆青书法》和《穆青摄影》两书，要加快编排修改，选取国内最好的印刷厂准备付梓。

老人、编辑们与病魔在拼搏中赛跑，一边是狂虐而肆意的侵蚀，一边是严谨、静谧的推敲和商讨，后者当然不及前者。10月9日，穆青病情骤变，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住院前一天的晚上，他收拾完行装，靠在床头，再次拿起电话，要通了远在深圳负责印制的编辑，了解《穆青书法》和《穆青摄影》两本书的情况，一方面表示感激和谢意，一方面表述他企盼和热望看到这本书的心情。这是老人生前拨打的最后一次长途电话，他用半个多小时的宝贵时间，表达了他漫长人生的最后一个追求。次日，他住进了医院，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中国新闻界的旗舰和泰斗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而今，他的鸿篇巨制先后问世，这是他留给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好纪念。新华社著名记者张严平在几个月后，又饱蘸激情，推出了数十万字的《穆青传》。从这一系列作品中，你会想象到穆青徜徉在农家小院，盘坐在农家炕沿，嚼着玉米饼的情景；看到穆青一手握笔，一手拿着相机，放情在祖国和世界的天地

山水之间。白纸无意，因记录了喷薄着激情的文字而有幸；巨笔无声，因挥就黄钟大吕式的名作而多情！

从穆青个人离开这个世界时的心情上说，他没有看到他的书籍全部出版，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憾事。但从他成规模推出的系列作品而论，堪称中国人民半个世纪前进脚步的忠实记录，是新华社80年历史上难以逾越的峰巅，我们中间罕有和他比肩者，穆青是没有丝毫遗憾的。他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和历史性贡献，永远镶嵌在新华社的光辉史册上。

我当中央委员有感

王 蒙

我自1982年秋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在两次党代会之间开过一次党的代表会议，此会上我当选为中央委员。1987年秋，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至1992年届满。前后参加中委活动十年。

每年召开全体会议一次，都在秋天，在京西宾馆。这个宾馆有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会议室，用来开会比较方便。

每次会议都有一个主题，通过一个文件一个公报，至少是一个公报。会前，文件草稿会在不同的范围内征求意见。我的印象中，研究并决定过城市改革问题、整顿党的组织问题、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加强党与群众联系的问题，可能还有农村工作问题等。

每次会议上，我都看到许多领导人物，实权人物，知名人物，权威人物。例如中央领导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各省的省委书记，各部部长，军队的三总部领导，海陆空三军司令、政委，少数民族领导，还有例如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吴蔚然这样的医生，胡绳这样的理论家，吴祖强这样的作曲家，邢燕子、陈福汉（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郭风莲这样的工农杰出人物，华国锋、汪东兴这样的有过不寻常经历的人物。我一方面感到一些拘谨，感到诚惶诚恐，心想我这么一个爱开玩笑爱闲言碎语相当情绪化，乃至生活上说话上不无散漫的人，一下子进入这个庄严的机构，谈的是这样严肃的不可儿戏不可轻忽的话题，真够我呛。

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心存惊叹，党可真有两下子，天南海北，党政军企，身经百战的虎将，运筹帷幄的官员，各有绝门的专家，各色头面人物，土的土，洋的洋，文的文，武的武，汉满蒙回藏苗瑶……堪称网罗殆尽，尽善尽美，硬使几百万几千万各不相同的人物拧成一股绳，使成一股劲，团结起方方面面，管理住东西南北，步调基本一致，说贯彻就贯彻，说制止就制止，说转弯就转弯，办成一件大事又一件大事，错误也没有少犯，犯完了改过来再干，仍然是说嘛算嘛，指东绝不打西，毫不含糊。究竟什么人才干得成这样的大事啊！

而且它招来了多少咒骂、嘲笑、轻视、侮辱、孤立、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与部署与行动，它又触动了得罪了毁灭了多少人的幻想、理念、美梦、价值崇拜、既得利益……成了多少人的切齿痛恨的对象。同时却又受到多少人的赞扬、歌颂、服膺、拥戴、跟随包括投机与利用……这才是真正的事业，这才是真正的男子的壮举！

有许多相对高龄的领导同志，他们喜欢穿中山服，布底鞋，走小碎步。但是邓小平永远是迈着大步，挺着胸，虽然他个子不高。我想起我曾以国际交流协会的名义宴请过日本女演员中野良子，她在影片《追捕》中饰演真由美。她不但称赞而且模仿邓小平走路的样子，她说邓走起路来挺着胸，很有气度。我想这与邓的部队工作经历有关吧。中野良子很关注社会与政治，她访华的时候拿着前首相福田赳夫的推介信件。她后来与白桦也颇有往来。

在1983年讨论城市经济改革问题时，有一位党内的理论家在小组会上提出，说是领导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样一个判断从马恩著作的原文上找不到依据。他的这个说法没有什么人置理。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位有高级别的理论家会说出这样天真的话。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难道只有马恩著作才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早就讲过，学马克思，是要有的放矢的，马恩原文是箭，中国实情才是靶子。那么，原文，只是一个起点，一个契机，结合中国实际运用成功，才算是掌握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自己没有说过要什么紧？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发展了，运用

了，成功了，有效了，总结出来了，认可了；这样的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再说白一点，马克思没有说过，但是已经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反复证明，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概括，一句话，是毛泽东说过或邓小平说过了，大家赞成，也确实符合实际，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相反，即使马克思说过的话，经过中国的实践检验，证明已经失去时效了，为我党所搁置不用了的，也不能算马克思主义。

头几年开会期间，我们这些行政级别不高的人，是两人住一间屋，我一直与北京来的陈福汉一间屋，此人极好，温良恭俭，谦虚谨慎，时任市总工会副主席。还有一位姓名与我接近、又都是沧州同乡的部队同志王猛，曾任三十八军政委、国家体委主任，时任广州军区政委。他是沧州盐山人，我是南皮人。按姓氏笔画，我们常坐在一起，有时难免说几句闲话。我说我去正定大佛寺，被称作“王政委”，他说他去什么地方，被问有什么新作。他告诉过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席党的十次代表大会的情况，由于保密严格，闹得家属不知就里，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吓得不轻，开完全会才放下了一颗心。这么比，我参加的中委会就相当轻松了。我常常看到在小卖部前人们聊天，包括有些特殊经历的人也在那里说说笑笑。晚餐后的电影放映与歌舞表演也都很放松愉快。

吃饭四个人一小桌，伙食清淡朴素，但很干净精致，色泽明亮。小花卷做得好看。吃饭的时候也都谨言慎行，没有大声谈笑。相互高声叫唤的也没有。有时晚餐还供应酸奶，你需要索取才会送来。啤酒饮料要自己花现钱购买。我曾给一位后来成了国家领导人而当时还只是候补委员的同志买啤酒，并被称作“先富起来”的人。喝茶的情况记不清了，反正胡耀邦主持工作时，去中南海勤政殿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只供白开水，龙井茶摆在那里，一小包五角钱。有一次我忘了带钱，便只喝白水，艾知生（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看到后笑道：“没有带钱吧，我给你……”这才喝上了茶。

过晚11点以后有夜宵，我只去吃过一次，其中的酸奶与阳春面比较吸引人。

香港出版过一些侈谈大陆政治“秘闻”的书。一看它写的中央委员

会、书记处会议的细节，就知道是生编硬造的了。

当然，谈大的政治问题也不免有些套话。如说听了领导人的讲话，则都说是“受到鼓舞，受到教育”，对于重要决策，则说“非常重要，非常及时”。联系到实际工作，则各有千秋。通过参加讨论，例如对于拐卖人口问题、政企分开问题、文物盗窃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就业问题、粮食问题……我增加了许多知识，学会用更务实的态度考虑许多事。我还听到过一位担任过省市委书记的老同志讲，他几十年来的工作经验说明，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文化低、教育程度差，工农如此，干部也是如此，甚至知识分子圈里，也缺少应有的文化素质与文化培训，这样，制定政策与贯彻政策之间，提出目标与实践目标之间，说的与做的之间，常有差距。他讲得我很受触动。

这段时间，每次全会结束时，都有邓小平与陈云两位领导人的讲话，他们是真的做到了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一语中的，令人回味。通过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议后，小平同志显得很兴奋，他即席说了一句：“这是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意）他还在中顾委的全体会议上说过，不搞改革开放，就只能“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可谓有声有泪，一字千钧。当张光年（时任中顾委委员）与我谈起此话时，也是眼眶湿润。陈云同志讲，农村党员开会，一律不可以给工分补贴。讲“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粮则乱”，还有“一要吃饭，二要建设”都起着一语中的、实话实说的提醒的作用，出言难忘。

那个阶段广东各项改革走在前面，有些相对超前一些的做法。我在会议上见到广东的领导干部，颇有不同之感。遇到大力推动改革时，大家去广东学习先进经验；遇到侧重解决改革中的失误困难时，又时而传出广东出了什么问题。社会上怕政策变的各种说法极多，如说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某些高级干部中也用这种说法开玩笑。广东的文艺人说广东是“香三年臭三年，不香不臭又三年”。还有北京的文艺人说，逢单年（指八一、八三、八五……）怎么怎么整顿，逢双年（八二、八四、八六……）怎么怎么开放……这种流年论，反映了那个特定年代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与摇摆。

这么大一个国家，搞了多少年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文化大革命”，现在一下子改革开放急于发展起经济来了，谈何容易！

中央全会上要通过文件，这对于文字工作者来说，倒是进言尽责的机会，除重要内容外，对于文字、用词、结构直到标点符号我都提出过一些具体意见，而且采用率不算低，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意见都在文件定稿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参加中委的十年大大丰富了我的经历，增加了我对于全局性信息的掌握，对于执政党的权力运作的了解。这使我得到了我此生重要的政治经历、政治资源、理论资源、生活资源与文学资源。胡风讲的到处有生活，如果不包含一切生活都可以不加以区分与评价的意思，那就是极其正确的论断。那么中央委员的生活就更加宝贵，它可以去魅、去偏见、去谎言，透过表层看到内里。它使我对许多事不再感觉那样陌生，以及因陌生而神魔化、夸张化、恶意化。

同时，我必须反省，必须承认，我与一个真正合格的中央委员的素质保留着差距。我太迷恋文学，迷恋想象与修辞。迷恋风格、个性、创新、才华、推敲、抒情、游戏、俏皮、眼泪与微笑、善良与天真、爱心与浪漫、小人物的情怀、日子的五光十色……而我实在缺少杀伐决断（此词出自《红楼梦》对于王熙凤的描写）的雄心、壮心、决心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斗争永无穷期的狠心与韧性。一句话，我缺少的是力量，是拼老命的精神，是压倒对手而不被对手压倒的英雄主义。而献身革命，献身社会主义，献身执政兴国，献身领导指挥，不珍惜、不善用、不保持一定的力量——权力是不现实的。而我在力量、权力的问题上，总是那样地宁可失之清高，失之无为，失之清风明月，失之斯文酸腐。就是说，我有时怯于权，羞于权，腼腆于权，心虚于权。文人，作家，而且自以为是个好作家的身份认同，始终拉着阻挡着我不要太较真于计较于争夺于权与力。说下大天来，写小说比当领导逍遥自在舒服得多。抱歉了，对不起了，对我寄予厚望的上级、师长与同行们，我的面太宽，我的线太长，我的爱恋我的关注我的兴趣太宽泛又太个人太投入了。努力将一切都做到最好的结果必定会使你们哪一个哪一方面都不解气。

然而，这才是我。

我的十年全国政协委员生涯

陈漱渝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被下放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那段荒唐岁月，知识分子的称谓是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比较最无知识”联系在一起的；据说灵魂也远不如满腿牛屎、浑身汗味的工人农民洁净。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又听到对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界定，说知识分子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精神家园的守夜人”、“精神现代化的引领者”、“社会的道德表率”……把我单纯置于被改造的地位我当然并不心服，但也承受不起“博雅之士”、“社会精英”一类桂冠，承担不起“思想启蒙”的神圣职责。我只是一个在蹉跎岁月中没有接受过完整教育的普通读书人，仅仅想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社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作为老百姓当中的一员，我当然最关心跟老百姓生存、温饱和发展息息相关的事情，但人微言轻，有话也无人听，无处说。不料从1998年3月至2008年3月，我居然担任了全国政协九、十两届委员。政协委员不是职务，不是待遇；实话说，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荣誉。但应该承认，政协的会议和活动却为担任委员的人们搭建了一个“平台”，使他们能够发表超乎于专业领域之外的言论，在公共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有意做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当政协委员倒的确是一种机遇。

为文博事业鼓与呼

我说自己“不料”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这“不料”二字完完全全是写实，并不是一种文学性的夸张。1998年1月22日上午，中国文史出版社吕长赋副总编来电话，祝贺我担任了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名单已经见报。我说这不可能，中国同名同姓者多得很。我既非中共高干，又非民主党派成员，更无任何特殊背景，怎会突然当上政协委员？接着电话铃声又响起，我接到周海婴先生同样的电话，他说消息十分可靠。我随即打电话询问鲁迅博物馆副馆长贾学平，她说不知道此事；再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他也说不知道。但没过几天，我接到全国政协办公厅的正式通知，要我填写表格，洗印照片，这才相信这件事情是的的确确发生了。不久读到文化部机关报《中国文化报》，才知道文化部系统此次共增补了21名委员，其中有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副部长陈昌本，艺术院校教授金铁林、潘公凯、陈钢、肖峰，演员于魁智、吴雁泽、刘秀荣、杨春霞、刘秉义、鲍国安、冯英、李羚等。记得在一次鲁迅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上，首都师范大学一位资深教授曾发感慨：“如今什么行业都出政协委员，但从来没有代表鲁迅研究界的政协委员。”我并不认为我专属于什么“界”，更不认为我有资格代表什么“界”，但由于我从1976年就开始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供职，从事了几十年鲁迅研究工作，本能地感到当上政协委员之后，应该以自己的特殊身份为鲁迅研究事业说一些话，办一些有益的事情。

当时通往鲁迅博物馆大门的主干道两旁违章建筑林立，有些摊位在路旁出售内衣内裤，既有碍交通，又有碍观瞻；馆内的鲁迅藏书（特别是报刊）因为年代久远，纸质老化，一碰即碎，既不能长期保存，更无法提供使用。鉴于这种状况，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期间，我这个还没有完全进入角色的政协委员提交了两份提案：一份题为《拆除鲁迅博物馆附近街道的违章建筑》，另一份是《抢救濒临毁损的鲁迅收藏报刊》。

这两份提案当年就得到落实。经西城区人民政府派员调查，鲁迅博物馆所在的阜内北街虽然仅长155米，但却有违章建筑35处，占地194平方米，经营人员中还有劳改劳教释放者，工作难度很大。当整治工作进行时，鲁迅博物馆人保处的同事主动在我下班时目送一程，担心有不法分子在我身后扔砖头进行报复。鲁迅博物馆资料部的数字化工程也开始启动，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目前已达到国内名人博物馆系统的先进水平。此外，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我提交了《隆重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关于筹建鲁迅文化广场》的提案；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我领衔提交了《关于在南京建立鲁迅纪念馆的建议案》；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我提交了《把北京阜成门鲁迅故居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提案。上述提案，除《关于筹建鲁迅文化广场》的提案得到部分落实之外，其余提案全部得到落实。

鲁迅博物馆是国家文物局的直属单位。1999年3月4日下午，在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期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同志到我所在的社会科学小组参加讨论，听取意见。我反映了当时有些省市将兵马俑等著名文物遗址作为“名牌产品”推出，成立公司，发行股票，甚至准备将重庆的革命遗址“周公馆”跟后来迫害革命志士的中美合作所捆绑上市的情况。对于旅游部门兼并文物部门的做法我也表示了疑虑。我认为，旅游工作和文物工作原本是可以互相促进的。一方面，文物部门为旅游部门提供了景点；没有文物，旅游就会缺少内涵。另一方面，旅游部门可以为文博单位组织观众，使文物更好地发挥审美、教育功能。问题在于这两个部门性质不同：旅游作为一种产业，需要创收，是营利性的；文物则是一种公益事业，在两个效益当中以社会效益为第一位。把这两个系统强行捆绑在一起必然产生矛盾。以前，由于文物经费的匮乏，一些文物单位希望挂靠在旅游部门，以便争取旅游部门的经费支持，增加工资、奖金，增加文物科研经费。事实上，文物系统内部各单位的条件并不相同，划归旅游部门管理的文物单位有些原来条件就相当好，比如陕西秦兵马俑博物馆，从来就不缺少客源，本身就有很强的“造血功能”，有非常好的门票收入，被旅游部门兼并之后，旅游部门着眼的是门票收

入，这对兵马俑博物馆来讲，就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绍兴鲁迅纪念馆也一样。因为绍兴是鲁迅的故乡，游客到绍兴的第一站就是鲁迅纪念馆，它的门票收入本来就可观，发展得也不错。被旅游部门兼并后，大部分职工待遇降低了，一些专家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整个陈列也没有多少改进，仅增加了一台触摸屏。鲁迅故居、三味书屋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周边扩大建筑群，使观众误认为鲁迅故家特别阔气。旅游和文物是两个专业，如果文物部门让一个不精通文物的领导来决策，很多问题就可能背离文物工作自身的规律，导致文物的毁损、破坏，曲阜孔庙被兼并后，壁画遭破坏就是一例。所以应该提倡文物部门与旅游部门的战略合作，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李鹏同志认真听取了我的意见，并让秘书要走了我的发言提纲。3月5日，上海《新民晚报》对此作了报道，题为《文物保护不宜姓“钱”》。文章引述我的发言，指出：“文物遗址上市的做法不仅在国际上尚无先例，还将由此引发文物资源归属、文物资产评估、上市后由谁承担风险等问题，有可能使原本属于国家的民族文化遗产化为集体所有、私人所有，甚至被境外财团控制。”

关注民生

我深深懂得，政协委员并不是行会代表，不能将眼光仅仅停留在某一个局部的利益，而忽略了全局。根据我作为一个公民的切身感受，影响当前安定团结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

我最近看到一个材料，说中国经济总量在过去30年中增加了18倍，有专家估计中国人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生活水平可以提高7倍。我并不怀疑这种说法。以我的情况为例，刚粉碎“四人帮”时月薪是54元，如今领取的退休月薪是5034元，单纯从钱数来计算提高了将近100倍；即使考虑物价上涨指数，提高的幅度也相对明显。30年来，我国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当贫困人口迅速下降，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有背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影响

社会的长治久安。在1997年至2007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报酬大多占到GDP比重的50%以上。诚然，邓小平说过，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但这是基于承认现状和改变现状的务实考虑，目的是通过勤劳致富和科技致富等正当手段，让全社会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绝不是让少数人依赖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致富，使我国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更不是默认逃税致富、特权致富等非法致富途径。在社会财富这块“蛋糕”逐渐做大的情况下，如何把“蛋糕”切得更好非常重要；归根结底，分不好“蛋糕”，也就做不大“蛋糕”。

2004年4月16日，全国政协办公厅特聘我为全国政协信息特邀委员，列席政协常委会。我感到责任重大。我当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我在全国政协信息局召开的一次内部座谈会上作了一次发言，题为《我对当前收入分配的看法》。

2005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召开。我所在的社会科学界召集人李君如（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告诉我，中央领导人有可能在会议期间参加社科界的联组讨论，希望我准备一个简短发言，谈谈“主旋律”方面的问题。于是我准备针对艺术界的现状，就“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问题谈几点个人看法。3月6日下午李君如问我准备得怎样？我粗略谈了以上想法。李君如说：“你领会错了。不是要你专谈文艺，我说的主旋律是指有关当前国家的大局的问题。”我一下子懵了！晚饭后回到房间，想写一份发言提纲，但头脑一片空白。为了不白白浪费时间，我决定先养精蓄锐。睡到凌晨4点忽然醒了，决定就构建和谐社会问题发表五点意见；到早上6点，终于理出一个头绪。

3月7日上午，中央及有关部门领导人来到社科界联组讨论会场。他们是胡锦涛总书记、贾庆林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文化部孙家正部长，还有一些其他领导。会上有10位委员发言。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态度都很谦和，所以我情绪松弛，没有照本宣科，而是脱稿作了一些即兴发挥。记得我在现场说，我们今天构建的和谐社会不是儒家的“仁政”，不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更不是西

方的“福利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做到“志之和”和“利之和”。古语说：“道不同，不相与谋”。所谓“志”就是理想信念。所谓“利”就是利益分配。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有两条基本经验：一条是有精神追求，所以才能靠“小米加步枪”战胜敌人的“飞机加大炮”；另一条是给工农大众以切实的物质利益，所以工农子弟兵才会喊着“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冲锋陷阵。当前的社会隐患正好出现在这两个方面。鉴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合理调整分配格局当然会有一个过程，但当前迫切需要做到的是严惩贪污腐败，坚决打击非法致富行为，有效遏制过高收入，给低收入的弱势群体以切实的生活保障，使收入分配的金字塔形逐渐变成橄榄形。如果不能在实践中切实把握和尊重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规律，做到社会财富增长的最大化和财富分配的公平化相统一，构建和谐社会就会成为纸上空谈，而不能取信于民。和谐的基础是社会各群体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相同。儒家所说的“和而不同”是在“不同”中求“和”。但“同”毕竟是“和”的稳固基石。离开“同”求“和”，就难免缘木求鱼，可望而不可及。

听完委员们的发言，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刚才有10位同志发了言，讲得都很有见地，听了以后很受启发。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怎么样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样才能从贫困走向富裕，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性课题，需要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来探索规律，来寻找、完善我们的发展思路。”临近中午的时候，社科界的另一位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对我说：“今天与会的领导同志对你的发言评价很高。”当天下午，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王忠禹给我们小组秘书打电话，通知我在3月10日下午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在人民大会堂作大会发言。

今天，当我回忆这次发言的时候，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阶层之间、群众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持续扩大。这种状况构成了我国改革开放“高风险期”各种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深刻根源。我期待在“十二五”期间利益格局失衡与收入分配秩序失范的状况能进一步得到扭转。

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我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也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多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0年来，我通过不同途径反映过城市医疗改革中的问题，改善出租车司机工作条件和待遇问题；北京海淀区四季青乡农民养老金过低的问题；安徽阜阳地区某农民的冤案问题；辽宁昌图县中医院退休人员退休金不能全额发放问题；北京市西城区居民郑树林、谢沙浮落实私房政策问题；农民工祝尚坤等被开发商派人殴打致伤问题；落实北京原玉渊潭棉纺厂99名退休职工医保待遇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些反映之后杳无下文，如泥牛入海；有的则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2006年4月10日，《人民政协报》刊登了一篇报道，题为《“现在我们敢去看病了”——陈漱渝委员一份社情民意让近百位退休职工有了医保》，介绍了我反映社情民意的情况。

建言民主

我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民生问题绝不是孤立的。目前发生的很多民生问题，实际上都跟体制有关，而体制的完善又有赖于不断推进民主化的进程。“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念。但究竟什么是民主的真谛，特别是如何确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人们在理解上又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分歧。

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民主问题，但我的民主理念却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1）我是一个文史工作者。纵览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就能看到一些实行民主制的西方国家做了不少践踏其他国家民主的事情。这种印象，我至今没有改变。回顾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我发现北洋时期中国曾出现过多党制，但走马灯似的政局只支撑了17年；1928年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全国政权也只维持了20年。（2）我是一个鲁迅研究者。鲁迅对西方代议制的批判对我影响尤深。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立宪国会借众欺寡，利用（众治）的名义，实则压制别人，这比暴君还要厉害（“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鲁迅的上述早期思想虽

然不无偏颇，但在强调“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民主原则时，的确容易导致平高填低，让“平庸”压抑“先觉”。我对此深信不疑，因为真理的确是经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3) 台湾的民主实践。我曾六赴台湾。台湾在“解严”之前实行一党专政，至1990年正式登记的政党则多达53个。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中经常可以看到“立法院”里的乱象，有些对毆的场景令人触目惊心。台湾目前只有2000多万人，要做到“乱中有序”仍如此之艰难；而中国大陆的人口已超过13亿，如果照搬西方模式，引发社会动乱，那最吃苦头的恐怕还是广大老百姓。我并不是反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而是希望这种改革要在稳中求快，有序推进。

在全国政协的一次内部征求意见会上，我就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政治改革步伐的问题发表了四点意见：(1) 逐步扩大国家机关配备党外干部的比例。党的干部要真正做到尊重走上领导岗位的党外干部和党外人士，使他们有职有权。(2) 加强政协民主监督的职能，制定民主监督的程序，建立民主监督的有效机制。对于贪赃枉法，失职渎职，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切身利益的现象尤其需要加强监督。(3) 广开言路，首先从政协做起。不要轻易将不同意见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这是执政党充满自信心的表现，也是对多党合作原则的考验。(4) 改善民主党派的办公条件，适当增加民主党派的行政编制，不断提高民主党派干部的福利待遇。

2007年3月，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在京召开。这是十届政协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事前提交了 two 篇书面发言，一篇谈协商民主，另一篇谈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真实动机是以此履行职责，在小组会或联组会上就可以少讲话了。我没想过再作大会发言，所以报到时都没带正装。全国政协当时有2238名委员，而大会发言只能安排三四场，每场发言者最多也只有十来位，必须要照顾到部门、界别、党派，更何况我在2005年已经作过大会发言。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大会发言组对我的两篇书面发言都很肯定，最后选定了《关于协商民主的几点认识》这一篇作大会发言。

2007年3月12日下午，我在十届政协五次会议最后一次大会发言中谈

了对协商民主的几点认识，其中讲道：

为了消弭选举民主的种种弊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提出了一种协商民主理论，把民主视为各种政治力量友好协商的公共论坛，而不是权力争夺的角斗场。协商民主关注重点在决策的形成过程，力图使权力行使更为充分地反映公民意志。这种理论虽然90年代后期在西方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理论研究层面，基本上与真正的政治实践脱节。然而在中国，却早已有了协商民主的理念与成功实践。

实行协商民主，应该把握四个核心概念：一是“参与”，二是“倾听”，三是“讨论”，四是“妥协”。“参与”是协商民主的核心。政协委员“参与”的政治前提是坚持和维护我国“执政党”与“参政党”的法定地位和合作关系，而不是以“反对党”成员的姿态出现。“倾听”主要是对执政党的要求，这是协商民主成为有效协商而不流于形式的根本保证。“讨论”是协商民主的关键环节。所谓讨论就是平等交流，理性讨论，互相说服，集思广益，而不是单纯的通报或表态。“妥协”是协商民主能否实现的必要条件。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不同利益集团或群体要达到绝对意义上的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仅仅通过简单多数规则而形成决策，因此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就必须根据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进行妥协，局部要服从全局，地方要服从中央，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从而使协商后的决策更具有包容性和可行性。

会议结束后，我在发言席上等待参加会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先退场。很多领导人都主动跟我握手，对我的发言表示肯定。跟我在同一会上发言的王蒙委员对我提出的协商民主四个核心概念尤为赞赏，他当场说：“妥协，不是消极行为，一个家庭要保持和谐不也需要妥协吗？”

在九届、十届全国政协，我除了被聘为信息特邀员之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文史资料委员会（十届改名为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提起全国政协的文史委，人们立即就会想起溥仪、溥杰、杜聿明、宋希濂、沈醉、文强这些人的名字，因为这个机构最早安排了一批特赦的战犯，让他们出狱之后撰写回忆录。但我成为文史委委员的时候，这个机构的性质

完全变了，被聘为文史委成员的大多是文化界、社科界的知名人士，如王蒙、金开诚、刘庆柱、李致忠、李燕、王晓秋、张文彬、郑欣淼、舒乙、聂震宁、梁晓声、弥松颐、王兴东等，但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人士，如设计“神舟”五号的戚发轫、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德、董必武副主席的女儿董良翬、民国总统冯国璋的孙女冯友等。

2008年1月22日，政协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议程之一，就是要通过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名单。当天上午11时，我正在办公室清点书籍，突然接到全国政协办公厅的电话，说贾庆林主席下午3点要约见我。我按时来到贾主席的办公室。他跟我亲切晤谈了半个小时。他说，上午看到新一届政协2237人的名单，上面没有我的名字，对此表示遗憾，并代表全国政协党组对我在九届、十届全国政协期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称赞我参政议政的热情很高、水平很高。他还当场拿出一张中南海的贺年卡，写上“祝愿漱渝同志：新春快乐 阖家幸福 贾庆林”。至此，我的十年全国政协委员生涯可以说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追念吴晗先生

李曦沐

吴晗先生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教授，在西南联大和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们敬爱的老师。我在西南联大学习4年，师生之谊最深的就是吴晗先生和闻一多先生，主要不是在课业学习方面，而是在政治活动方面。2009年是吴晗先生诞辰100周年，不由得想起亲聆吴先生教诲和与吴先生接触、交往的一些往事。

吴晗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是明史专家，他在西南联大不仅讲授专史，还讲授全校各院系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课中国通史。我在1941年下学期入校读一年级的時候，上的中国通史课就是吴先生讲授的。吴先生不仅向我们传授历史知识，还常常在讲课中联系现实，借古讽今，抨击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和政治激情。给我们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是在联大发生“倒孔运动”前的一堂课。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当时包括联大教授、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内的一批名人，如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都无法及时撤离，而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却垄断中航公司的飞机抢运他的私人财物，甚至把他家的洋狗也运回重庆。重庆《大公报》于12月22日发表社论《拥护政治修明案》，透露了孔祥熙用飞机运洋狗之事，舆论大哗。吴晗先生对此十分气愤，他在给大一学生讲中国通史课时抨击说，中国古代有“蟋蟀相公”，现在又有“洋狗院长”。他将孔祥熙和南宋的贾似道、南明的马士英这两个奸臣联系起来，更激起同学们的愤

慨。1942年1月6日，联大住在昆华中学的一年级学生首先行动起来，发起示威游行。他们走到新校舍校本部后，二、三、四年级的学生也参加进来，上千人一起走上街头。后来，住在拓东路的工学院学生也前来汇合，沿途又有云南大学和一些中学的学生加入，形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学生们高呼着“打倒孔祥熙”、“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在昆明的主要街道游行了三四个小时。游行后，全市各大中学校纷纷停课，联大、云大学生自治会都发表宣言，发出通电，声讨孔祥熙。在贵州的浙江大学和在四川的武汉大学的学生也积极起来响应。这就是当时在整个大后方产生了很大政治影响的“倒孔运动”。吴晗先生给这次运动的发动投了一把火。

吴先生进一步公开和同学们走到一起的标志，是1944年5月3日晚联大历史学会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晚会。1941年皖南事变后，整个大后方笼罩着白色恐怖，昆明虽然好一些，但也在这个阴影之下。“倒孔运动”活跃了一阵以后归于沉寂。1944年春，抗战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4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一个月内郑州、许昌、洛阳等相继失守；继之湘北日军南攻岳阳，前线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联大学生忧心如焚。在此之前的3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取消五四纪念日，以黄花岗起义的4月27日为青年节，也引起同学们的强烈不满。那时，我正被同学推选担任联大历史学会主席，同室好友、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马识途（在校时名为马千禾）找到我（在校时我名叫李晓），建议我们历史学会在五四运动25周年的时候举办一次时事晚会，并指名让我们请吴晗、闻一多、张奚若、周炳琳、沈有鼎等几位教授参加并发表讲演，当然还要请我们的系主任雷海宗教授。按照老马的意见，我们提前几天贴出海报，宣告5月3日晚在联大最大的教室南区10号举行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晚会，欢迎同学参加。结果来的人出乎意料地踊跃，能容几百人的教室挤得满满的，连室外也站满了人，即使会议中下大雨同学们也不肯离去。纪念会由我主持，请几位教授讲话。周炳琳、闻一多先生讲了自己亲身参加五四运动的经过。张奚若先生把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作了对比，说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革命，它的价值远在辛亥革命之上。吴晗先生从五四精神讲到当前青年的任务，提出要打破思想文化、社会制度和经济

制度的束缚。因为有的教授在发言中说学生的天职是读书，过问国家大事不免幼稚，容易冲动，是国家的不幸。闻一多先生又起来痛加批驳，并表示自己愿意“里应外合”，和同学们一起来摧毁毒害我们民族的封建思想。同学们也争相慷慨激昂地发言，表达了对时局的焦虑和对现状的不满。有的建议通电全国学生以实际行动争取民主，有的要求政府确定5月4日为青年节，站在窗外的同学有的也把头探进来大声疾呼。会场气氛之热烈，情绪之高昂，为几年来所未见，一扫皖南事变后的沉闷气氛。这次晚会成为联大爱国民主运动掀起新高潮的起点。吴晗、闻一多、张奚若等几位教授也是在这次晚会上，在广大群众面前，亮出了自己的战斗旗帜，从此不断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群众集会，可以说是无役不与。吴晗和闻一多两位先生更是参加了我们每一次示威游行，成为和学生一起战斗最多、同学最信赖的老师。

吴晗先生不仅积极参加同学们的公开活动，他与昆明地下党和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也有密切的联系，并共同商讨运动中的问题。在校外，他同南方局派到昆明做龙云工作的华岗以及楚图南、周新民、李文宜等也有联系，参加了他们发起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在联大校内，他先同地下党负责人马识途后与袁永熙有联系，和“民青”的联系更密切一些。当时“民青”有两个支部，第一支部同他联系的主要是洪季凯（后改名洪德铭），第二支部同他联系的主要是许寿镔（后改名许师谦）和我。我们都是历史系的学生。

在联大读四年级时要写毕业论文，我的论文导师就是吴晗先生。由于同吴晗先生在政治活动中接触较多，他知道我既在联大上课，又在中学教书，还有些政治和组织工作要做，时间不很充裕，所以对我很宽容，给予很多照顾。毕业以后，我受地下党派遣，去滇南石屏县农村办小学，做群众工作，所以没有参加一二一运动。直到死难四烈士出殡前才回到昆明，先后在天祥中学和云南大学附中教书，做地下党和“民青”的工作。其间，我和吴晗先生仍时有过从，下乡前和回昆后我都曾去看望过他和闻一多先生。他们二人住在同一院内的斜对门，志同道合。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吴先生家的墙上悬挂着闻先生用篆体字给吴先生写的

横幅：“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上款是“辰伯兄补壁”，落款署“一多”。这充分反映了两人关系的密切。那时在昆明街头已经出现特务们的大字报，称吴晗先生为“吴晗诺夫”，称闻一多先生为“闻一多夫”，暗示他们是拿苏联卢布的红色分子，阴谋以此给加害他们制造借口。后来闻先生不幸惨遭杀害，吴晗先生因为离开昆明较早才幸免于难。

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平津复校，师生分批北返。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我谈话，说东北解放了，我是东北人，要我回东北工作。于是我同联大最后一批北上的同学一起，于7月11日离开昆明。途经上海时，我去吴晗先生的弟弟吴春曦先生家看望了吴先生。他听说我要去东北，又知道我申请读清华研究生已获批准（联大有规定，4个学年各门课程的分数的总平均超过85分的可申请入三校的研究院做研究生），就说要我留在清华，帮助他工作。我说自己在学校“已经红了”（即在政治上已经暴露了），不宜再待下去。他未再坚持，告诉我阎宝航先生正在上海，准备搭苏联船只去东北解放区，最好能与他同行，并介绍我去找了阎宝航先生。阎先生说什么时候走还不一定，于是我继续同联大复员同学一起到了北平。路过南京去中共代表团转组织关系时，钱瑛同志要我到北平后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找我方代表李秘书长。当时军调部国共双方代表都住在北京饭店，内外都有特务监视，根本无法与我方人员联系。这时我想到吴先生已到北平，一定会与我方人员有联系，于是找到他。他介绍我去找了刘清扬先生，经刘联系，徐冰同志接见了，我才又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得到指示，去了东北。

北平解放时，我在旅大高级师范学校任校长。1949年春，我到北平招聘教师，同时参加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会上，我见到了吴晗先生。吴先生非常高兴地领我到他的住处，并在那里和一些名人同桌吃了一顿午餐。后来，我又到清华园吴先生家看望他和夫人袁震先生。看到久病的袁先生已经康复，容光焕发，吴先生更是神采奕奕，我非常高兴。1950年末，我调到旅大市委工作。不久，吴晗先生到了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请他吃饭，要我这个学生给老师作陪。以后我到北京开会，在北京饭店

理发室又见到在那里理发的吴先生，我说常见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吴先生说，他虽然忙，以后还要写下去。此后就再没有见过吴先生。

1966年初，我到北京出差，帮助在京治病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办一点儿事。当时正在批判吴晗先生的《海瑞罢官》，欧阳钦这位留法勤工俭学时在法国入党的老革命家很不以为然，和我说“这样批判，谁还敢研究历史？”这时，北京市委也曾派人来找我调查吴晗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情况，我就自己所知如实给他们写了材料。可以看出，当时北京市委还是很想全面客观地了解吴晗先生的情况，希望能据此给予正确对待和处理的。后来，我在东北局被打倒，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打倒吴晗的门徒李曦沐》。在批斗我的大会上，专案组组长在发言中说：我们去北京找了吴晗，他正在扫地。我们问他认不认得李晓，他说“认得，东北人，小个儿，很精神”。你们看，隔了这么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学生，可见你们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吴晗先生的消息。原以为劫后还可重逢，哪知道，这位奋不顾身和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最后加入共产党的爱国学者、民主斗士、忠诚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转眼间吴晗先生诞辰100周年、逝世40周年，但愿先生地下有知，知道乌云早已散去，他的冤案早已得到平反昭雪，他赢得了亿万人民的景仰、同情和敬重。清华大学在校园内为他建了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词的“晗亭”，立了酷似他本人的雕像。他永远是青年学子的楷模！

我在北大保卫组处理翦伯赞之死

谢甲林

1966年6月，我受组织安排，离开最高检察院到北大保卫组工作，翦伯赞是当时保卫组的重点保护对象。1968年12月18日，发生了翦伯赞服毒自杀事件。翦伯赞自杀事件是在毛泽东最高指示“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前提下发生的，因此引发了更多人的关注和深思。以往对翦伯赞之死记述的文章已经比较多，本文将我在北大保卫组所知道的翦伯赞自杀前后的一些情况介绍如下，以使人们了解其中更多的一些细节和缘由。

翦伯赞成为保卫组重点保护对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6月16日，最高检察院党委书记李放通知我说：“中共中央组织部给高检院来函通知要你去北京大学做保卫工作。”我说：“服从组织，要求不要留在北大。”随后，我马上开始交代工作，22日持高检院的介绍信赴北大工作组报到。先在图书馆工作几天后，工作组副组长、中组部副部长杨以希找我谈话，要我到二组（保卫组）任副组长，组长是蔡润田。全组36人，都是海军保卫部的在职人员。

“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曾讲过：北大有个翦伯赞，你要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去问翦伯赞；北大有个冯友兰，你要知道什么是唯心主义，就去问冯友兰。经翻阅有关材料再加上组长介绍，了解到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总理指示：周培源、翦伯赞、冯友兰、饶毓泰、闻家驷和温特（美国教授）六人为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

1966年8月4日，“中央文革”宣布撤销北大工作组，决定二组人员全部留校，继续承担保卫工作，改称保卫组；北大“校文革”成立后，保卫组受其领导，并给增加了3人，仍由蔡润田任组长，我任副组长。经总政批准，1966年12月海军人员全部撤离，因高检院被砸烂无法报批，我不能撤离，仍留在北大，继任保卫组组长。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宣传队）进驻北大，宣布“校文革”及各个组均停止工作，唯独留下保卫组，仍让我任组长继续工作，由军代表李志刚主管保卫组。

从1968年9月初开始，宣传队首先组织批斗陆平、彭珮云大会。不久开始在全校清理阶级队伍。他们认为“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全校先后有900多人受审查，共揭发出够敌我矛盾的500多人。当时，所有清查对象，包括翦伯赞、冯友兰等几名重点保护对象，都集中食宿，不准自由回家。对此，我向宣传队总部明确提出：翦伯赞、冯友兰等是周总理指示的重点保护对象，隔离审查、限制自由，是违背指示的。

1968年10月16日夜，周总理指示的重点保护对象饶毓泰上吊身亡，我带领保卫组的干部联合市公安局的干部勘查现场，结论是“自缢”。我遂到宣传队总指挥部全面汇报，送上“结论”。同时，又提出要加强翦伯赞、冯友兰的重点保护，亡羊补牢。

宣传队接受我的意见，把翦、冯二人放回家。当时，翦伯赞家住燕东园28号，在大院外，不便保护，我提出建议后，宣传队把他夫妻二人搬到燕南园64号（保卫组原址63号），每月发生活费120元，白天有历史系的学生值班，夜间雇用了退休工人杜师傅伺候。并明确要求，非经宣传队总指挥部批准，不准外来人员接触。

服毒自杀事件发生及现场查验

1968年12月18日早晨，天还没亮，伺候翦伯赞、戴淑婉夫妻的退休

工人杜师傅泪流满面地跑到保卫组，扑通跪倒在地上向我哭诉：两条人命，翦伯赞老两口都死了。我马上打电话报告了宣传队总指挥部，然后立即带领萧祖德、蓝绍江和苑世男赶赴现场。在燕南园64号翦伯赞夫妻的卧室内，有南北向的两张单人床。在左边的床上，头南脚北仰卧着翦伯赞，在右边的床上，头南脚北仰卧着戴淑婉，两人面色安详，衣着整洁，均穿鞋袜。一摸两人的体温，早已冰凉，没有脉搏了，但尚无尸斑出现。我们立即电话报告了北京市公安局。

报告完公安局之后，我们继续勘查现场。首先搜查翦伯赞遗体的上衣双兜，左兜里有一张纸，上写：“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右兜里有一张纸，上写：“我实在交不出了，才走上这条绝路。我走上这条绝路，杜师傅不知道。”我内心感动了，多么好的品质啊！一个身陷“囹圄”的人，在受到逼迫的时候，没有违心地交代；而且，在他决定要离开人世的时候，还生怕连累别人，因此，在遗嘱中说明自己的死是与别人毫无关系的。接着，搜查翦伯赞的床铺，在枕头右下方，发现了一个服药袋，内装两粒进口的速可眠胶囊。这让我再次涌起了一阵感动，他这是明确地告诉我们自己是怎么死的，不给我们勘查现场添麻烦。再搜查，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异物。又搜查戴淑婉的床铺，任何异物也未出现，由于是女同志我们不便翻身，也不好翻外面的兜，就没有翻出任何东西。我们的初步结论：可能是服安眠药自杀。

为了将事情进一步弄清楚，我们问伺候他们夫妻二人住在外屋的杜师傅：夜间有什么动静没有？杜师傅说：快午夜12点了，听到炉子响声，我问有事吗？翦伯赞的老伴说：翦先生饿了，我给他热点牛奶喝，你就睡吧，不用管了。据此，我们初步断定，服毒时间是在夜晚11点半到12点之间。

问完杜师傅话之后，历史系在翦伯赞住处值班的同学来了，我们把他们堵在外屋，询问他们昨天的情况。他们说：昨天下午中央第一专案组的巫某等人，持介绍信经宣传队总指挥部批准，来找翦伯赞调查刘少奇的问题，听到他们一再追问刘少奇的有关历史，翦先生一再回答“记不起来了”。双方僵持一会儿后，调查人对翦先生说：你明白，这关系到刘少

奇的问题，你必须好好想想，把他的问题交代清楚。我们明天再来，你一定要把问题说清楚，交代清楚，交代不清楚，是要坐牢的，并一再强调。

上午7时许，我把翦伯赞的两纸“遗书”亲自送到宣传队总指挥部，拍照留底，由指挥部把原件直接上报毛主席。其他情况，查明后上报。我回到现场，同保卫组的其他同志继续勘查。

上午8时许，我们还未勘查完现场，中央第一专案组的巫某等人又来了，被我堵在门外。我说：今天不准找翦伯赞。他们说：我们是刘少奇专案组的。我说：什么专案组也不行，你们可以去找宣传队总指挥部嘛！他们才离开了。

专案组的人一走，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包括赵法医）就来了。我们把勘查现场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要求他们进行复查，通知家属，进行尸体解剖。经电话通知，家属不来，给出的答复是，已经划清了界线。我们把家属的回答记录在案。

死因确定及相关处理

12月18日下午，我们从翦伯赞的住处把最需要的东西取了出来，考虑到目标太大，当时没有查封。我们招呼历史系的学生，让他们将屋门锁好，并认真看管。接着，经我引领，市公安局的人员与宣传队总指挥部商量，由我始终跟随，将翦伯赞夫妻的遗体送到北医三院地下解剖室。

到了北医三院之后，由赵法医主刀，对翦的遗体做了全身解剖，有关部位做了切片、取液等；对戴的遗体做了局部解剖，只取了部分胃液。肉眼发现两遗体的胃里均有尚未溶解完的进口速可眠胶囊。法医的最后结论是：翦伯赞、戴淑婉夫妻均为速可眠中毒死亡。

为了把翦伯赞夫妻自杀案情全部弄清楚，12月19日上午，我手持宣传队总指挥部的介绍信，乘坐专车，亲自到北京医院调查毒源。北京医院院部的负责人说：翦伯赞的病历，依照有关规定，属保密范围，非经特批，不准查阅。我马上到市委吴德办公室汇报情况，提出要求，吴德的秘书立即打电话给北京医院院长说明了情况，于是我又赶回北京医院。

回到北京医院后，他们已把翦伯赞的病历拿出来，摆在桌子上。我到后，由专人帮助我查阅，把大夫的处方、翦伯赞派人去取药的时间，一一列出清单。其中进口速可眠胶囊按间隔日期，依照规定数量，每次付给20粒，多年以来，没有变化。

我在北京医院查清楚情况以后，便返回北大，又询问值班学生。值班学生说：翦先生夫妻年岁老，行动不便，都是委托我们到北京医院给他取药。每次都取有速可眠胶囊。有一次，我们还对翦先生开玩笑说：“您可别一次吃了。”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不想死，要活着报恩毛主席、周总理啊！”

在做了以上一些调查取证之后，保卫组通过宣传队总指挥部把翦伯赞夫妻自杀的调查材料全部上报。宣传队总指挥部让后勤部门把翦伯赞夫妻的两具遗体运送火葬场，匿名火化，不留骨灰。短短两天，对翦伯赞夫妻自杀一案的处理，比较顺利地完成了。

过后听说，谢富治对中央第一专案组调查、审问翦伯赞的巫某，当面予以批评指责说：翦伯赞是毛主席、周总理指令保护的人，你有什么权力要他去坐牢。因此，巫某受到了党纪处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及时进行了拨乱反正，翦伯赞也得到平反。北京大学校方决定给他举行追悼会，找到我问骨灰的事情。我跟他们说：保卫组没有管，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到八宝山去查，哪年哪月建的档案。他们一开始没有查到，因为用的是化名。后来又去查了一遍，火葬场工作人员按火化时间一查，这才弄清楚了。北大校方又问我要当时的证据材料，原件当时已经报毛主席了，只有拍的照片，我就给他们了。事后想想，觉得很后悔，自己亲自经历的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现在手里什么一手的材料都没有了！

新中国成立前我与张申府的接触

马 旬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我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因请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到北大作时事报告一事，与张申府先生相识，并慢慢结为忘年之交。因此，我有幸亲耳聆听了张申府先生忆述他为何突然脱党，为何不合时宜地发表《呼吁和平》而被民盟开除等故事及其心路历程。

请张申府、刘清扬夫妇 到北大作时事报告

1947年初，我受北京大学文学院学生社团联合会委托，请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到北大作时事报告。我持老共产党员焦敏之同志给我写的介绍信，到北平黄花门五号去拜访他们两位。他们两位的住家离北大沙滩不远，是一座独门的四合院。他们在书房兼客厅接待了我。家具很简单，四周摆满了书柜。他们夫妇是有名望的爱国民主人士，没有一点架子，对我这个20岁的年轻学生很热诚。张申府老先生用一口河北话问我：“在哪个系学习，系里有哪几位老师？”我告诉他：在历史系学习，系主任是郑天挺，教授有向达、杨人榘等。张老是北大文学院的老教授，对文学院的很多教授很熟悉。

刘清扬女士的问话最多，问胡适对学生怎样，对学生活动干涉不干涉，等等。我回答：在北大复校典礼上，胡适先生讲要继承蔡元培校长

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强调这是北大的传统，是治校方针。并说：“你们学生要独立思考，兼听则明，偏听则愚。”许德珩、周炳麟、钱端升等参与过五四运动的老教授全力倡导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北大校方允许学生在校内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学生组织的社团很多，课外集会很多，壁报贴满了校园，大多是反对蒋介石国民政府专制、独裁、打内战的。

他们两位很关心学生的思想状态。我向他们汇报：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10月11日占领了张家口，当天宣布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国共谈判全面破裂之后，部分同学受暂时现象迷惑，产生一些悲观情绪。1946年底，由北大同学发起，爆发了北平和全国声势浩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大游行之后，增强了与国民党腐败当局斗争的信心，关心形势的同学大大增加了。我今天来拜访你们，就是受北大进步学生的委托，请你们给我们北大学生作形势报告，提高和鼓舞同学们对革命的信心。他们两位听了邀请之后，欣然答应。

1947年2月，新学期开学不久，刘清扬女士首先来校作报告。地点是在沙滩北楼第一教室，有300多人参加，把教室挤得满满的。刘女士讲话声音洪亮，激昂慷慨，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政协协议和停战协议的行为，指明人民力量大，国民党反动派与人民为敌，必然会失败。她的讲话不断被掌声打断，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3月，张申府老先生也在同一地方作报告，他在1946年1月参加了在重庆由国民党召开的政协会议，他摆事实，讲道理，把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政协协议，背信弃义发动全面内战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增强了同学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对共产党的同情和信任。他们夫妇来北大作报告，由我接送，并领着他们在校园转转，看看学生社团的集会场所，民主广场贴的反对国民党的壁报、大字报等等。

同张申府老先生认识后，因为他的住地离沙滩很近，常常叫我代他在北大图书馆借书还书。我借每次取书的机会，常向他请教哲学问题，他总是详细给我解答。1948年3月，他给北平民主同盟的盟员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叫我也参加，给他作记录并整理讲稿。我把整理好的讲

稿送去，他看后很高兴，对我说：“整理得很精炼，我引证的话，你都注出了出处。”他的讲稿发表时，特别注明是我整理的。

张申府一生值得回忆的两件大事

交往多了，彼此熟悉了，张申府老先生把我看做忘年之交。互相之间有了信任，谈话也就自由和深入了。我向他打听他的身世，问他在北大同陈独秀、李大钊的交往，他都很坦白地向我作了介绍。张申府说：“我是河北献县人，1893年出生，是书香世家，家父濂公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少年时我和弟弟张岱年跟家父念古书。1912年家父被选为国会议员，迁到北京，我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1914年考入本科，先学哲学，后学数学，1917年毕业留校做助教，教逻辑学，1920年升为讲师。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回到北京，主编《晨钟报》的《甲寅日刊》，经同窗郭仁林介绍，我认识了他。1917年，蔡元培先生当北大校长，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图书馆馆长。我和大钊同志都支持新文化运动，我们两人都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积极撰稿，陈独秀聘我们二人当这个刊物的主编。我们三个人经常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商议这两个刊物的编辑工作，陈独秀曾说过，他在北大同李大钊和我最谈得来。”

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后，最先吸收张申府入会，他们两人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负责人，约请天津“觉悟社”的周恩来、刘清扬来北京。1920年8月16日，两个社团的代表20人在陶然亭慈悲庵开会，商议两地爱国进步青年加强联系，共同战斗等问题。在这次会上，张申府结识了周恩来、刘清扬。后来在巴黎，张申府介绍他们二人入党，并同刘清扬相爱，结成夫妇。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北京找到李大钊，要他组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说：“我的号召力不及陈独秀”，所以为维经斯基写了介绍信，介绍他到上海。1920年8月，陈独秀在维经斯基帮助下在上海建立共产党小组。在建立之前，他曾写信给张申府：“建党是叫社会党或

共产党?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的字)可谈。”张申府持信向李大钊商议,李说:“叫共产党好!”叫张申府给陈独秀回信,最后陈独秀采纳了李、张意见,取名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带话给他们二人,嘱咐在北京也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李大钊、张申府在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的图书馆长办公室介绍北大学生张国焘入党,三人成立了继上海后第二个共产党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

1920年,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在法国里昂办中法大学,经蔡元培推荐,聘请张申府为中法大学的哲学教师,年底张申府随蔡元培一齐赴欧。张申府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在欧洲建立中国共产党旅欧小组。1921年,张申府先介绍刘清扬入党(两人不久结婚),两人介绍周恩来入党,后来有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到了巴黎,他们五个人在巴黎建立旅法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张申府、周恩来在巴黎发展朱德、孙炳文入党。

1923年底,张申府回国到了广州,在广州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24年,苏联帮助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当时会俄文的人很少,孙中山聘请张申府帮助苏联派来的人一同筹建黄埔军校。张申府负责招考第一期学员,亲自参加了对学员的面试。1924年5月开学,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聘加伦等苏联军官为军事顾问。孙中山聘请张申府为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戴季陶不到职,工作由张申府直接同廖仲恺联系,实际上是张申府主持政治部的工作。当时黄埔军校很重视政治教育,把它提高到与军事训练同等地位,培养学生爱国精神和革命意识。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中有陈赓、左权、徐象谦(后改名为徐向前)等40多名地下党员,占了学员的十分之一,张申府推荐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共产党员做政治教官。廖仲恺对张申府很器重,亲自推荐给蒋介石当翻译。张申府回忆说:“我在黄埔军校看到蒋介石非常跋扈,什么事都是他独断独行,一个人说了算,我一生气,就不干了。廖仲恺极力挽留我,我说不干就不干。廖仲恺叫我推荐人选,我推荐周恩来,廖仲恺同意,并给周恩来寄去路费。1924年底(1924年9月——作者注),周恩来回到广州,当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

任。”说到这里，张申府笑着对我说：“我一生做事不多，值得回忆的就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介绍周恩来入党，二是推荐周恩来当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张申府谈自动退党： “这是我的个性和缺点，宁折不弯”

我曾问张申府老先生：“你同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发起组织共产党，为什么后来却自动退党了？”他很坦白地对我说：“这怪我是知识分子，脾气直，看不惯当时党内重大决议总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1923年党的三大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决议案，我就不赞成。1925年1月在党的四大会议上，一个同志发言主张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我不同意，在会上同他吵了起来。当时我怒不可遏，就退场，并大声喊我退党了，周恩来马上跑出场外，追上我劝我息怒，不要退党，我没有听他劝阻，就离开会场了。后来赵世炎也劝我不要退党，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个性和缺点，宁折不弯。退党后，李大钊找我谈话，劝我不要退党，他也劝不动，只好向我约定，你在党外要帮助党，我接受了，并一生践行了这一诺言。全国抗战爆发前，我在北平从事华北救国会的工作，参加一二九游行；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当参政员，参加民盟，批评国民党专政、独裁，都是这样做的。”

张申府先生离开党组织后，一直在北大、清华、中法等大学任教，他对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哲学、英国伯兰特·罗素的哲学研究造诣很深。

1948年10月，张申府先生在政治上做了一件错事。他是民主同盟华北总部的负责人，在东北辽沈战役胜利后，竟然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引起共产党、民主同盟的严重不满。11月15日，民盟中央开除了张申府的盟籍，12月6日在石家庄出版的《人民日报》刊文批评张申府“卖身投靠”国民党。12月16日，他的夫人刘清扬在解放区声明和他离婚，划清界限。

北平解放后，许多老同志都责备张申府：“你一生反对国民党专制、

腐败，当解放战争决战前夕，你怎么作出这种蠢事？”张申府先生对这事也后悔不已，说：“都怪我本性难移，当时我看到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太痛苦了，我想让人民缓缓气，就写出了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不慎重。”他说的这段话，反映了他一贯直抒心意、率性而为的特性，暴露了他的弱点，或许也正是这种个性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

新中国成立后，经周恩来、李维汉安排，张申府先生在北京图书馆当研究员，干他的老本行，研究罗素哲学、数理逻辑和中外哲学。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平反，晚年当了第五、六两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病逝，享年93岁。

我所知道的刘仁静

陆立之

1927年，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因为学潮问题，认识了在列宁学院的刘仁静。当时，他支持东大同学的“反官僚主义”（反“旅莫支部”的官僚作风）活动，颇有正义感，我们就成了朋友。他比我大7岁，见多识广，因支持东大同学，被学校当局上报共产国际，成了被打击的“反对派”。学潮的结果是“各打五十板”——“旅莫支部”被撤销，负责人武和景（即武胡景）等被遣送回国；改善了学习环境（增加俄文教师、在图书馆允准学习马列原著、对中国同学平等讲解……）等。同时也惩罚领头闹学潮上访的人，开除五名同学：两人改送列宁学院学习，三人远遣列宁格勒的军政学校。调到列宁学院的两名同学朱代杰和马员生都与我友好，我就时常去列宁学院访谈，由此也与刘仁静熟知了。

早年经历

刘仁静1902年生，肖虎，个性有些虎劲；人很憨厚、执拗，对理论问题的分析清晰，但有些迂。关于东大学潮的起因，刘仁静分析透彻，他指出：（1）“旅莫支部”是不合法的小组织，当初因为照顾初次到莫斯科学习的人，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一样，临时性地设立了一个“支部”，帮助同学生活；第一期同学刘少奇、任弼时等回国后，“旅莫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叶青）别有用心地将“支部”变成固定的党组织，操纵同学

们的生活和学习限制（不允许钻研马列原著，图书馆专业讲师不接待中国同学），其用意是垄断俄文原著学习，只能听信“支部”的翻译人员讲解。在生活上，因是供给制，日常生活用品、衣服鞋帽、大衣手套、洗漱用品，以及理发洗澡和观剧，都由“支部”控制转手，其他国家（日本、土耳其、印度、越南……）学生都直接由校务办发放实物和证券以及每月零用钱。“旅莫支部”为什么“卡”住同学们的生活与学习，很明显是中国官僚式的有中饱之私。在国际规章方面这也是违法的。按共产国际原则，任何国家的“支部”党员到达莫斯科后应在当地过支部生活，因为“工人无祖国”，只有党，在莫斯科私设同学会式的“旅莫支部”是不许可的。（2）1927年第三期同学到达莫斯科，绝大多数是刚从斗争火线上退下来的战士，在学习中只听到翻译们解说形势的“转折点”（根据布哈林文章：《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不少人扑在图书室查字典，啃论文原著，发现罅漏；（3）国内南昌和广州两次暴动失败后，又在东大增设了临时军训班，约200人只准受入伍训练，不学习理论知识，甚至被禁止与东大本班中国同学交往……这些不近人情的“支部”决定，导致几百人不满。“旅莫支部”的非法措施引爆了学潮。

据朱代杰介绍说：刘仁静是个雄辩家，他谈锋甚健，洞察事理，每有争论必滔滔不绝，从不服输。他是党的一大13个代表中较年轻的，当时只有19岁，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和李汉俊争辩。又知道，刘仁静在北京大学受教于李大钊，钻研马克思主义，曾与自由主义、国粹派和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辩士黄警魂等人论战，引“马克思说”为据，批判了谬论，因此在北大获得“小马克思”诨号。他还是“五四”游行的带头人之一。

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刘仁静指出了它的错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列宁与托洛茨基合作的胜利，这有书为证（美国进步作家约翰·里德著《震撼世界的十天》）。俄国人民最初呼喊的口号就是“列宁、托洛茨基！”但是列宁病逝后，斯大林禁绝了这本书，并且篡改历史说是列宁与斯大林创建了“十月革命”。斯大林粗暴地专权，排斥异己，列宁曾形容说：斯大林像一个不善烹调的厨师，任何菜肴里都撒一把胡椒。托洛茨

基指出斯大林的中国革命策略的错误，利用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必然会失败。刘仁静赞扬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论”，在列宁学院成了“反对派”（托派）。

书生意气

刘仁静由于个性执拗，他对信服的理论知识或文化艺术，始终不渝；秉性耿直，从来不要手腕，因此也惹来不少是非。追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共产国际将责任诿卸在中共领导人头上，托洛茨基讲了公道话，证实是国际代表虚报情况，互相争宠，而共产国际领导层又闭门造车，遥控指挥，所以酿成恶果。刘仁静崇拜托洛茨基，即以为托洛茨基才真正懂得中国问题，对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中山大学）校长、托派的理论家拉狄克（他主讲“中国革命问题”，引证中国古代就有资本主义萌芽，分析详尽）也倍加赞许，认为他是一个可信赖的革命理论家。刘仁静回国时，特别绕道去土耳其专访托洛茨基，自谦为弟子，却惹来了日后的“麻烦”。回国后，早年的挚友恽代英敦促他向党中央报到，刘仁静则认为李立三在执行斯大林路线，是官僚腐化分子，并且想另树一帜，按托洛茨基意见，要从事议会斗争。这时候，在上海已有两股人举起了“托派”旗号——一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被驱逐回国的梁干乔、宋逢春等组织了一个小集团，名叫“我们的话社”；一是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由他的老班底五六十人（号称81人）组成小集团叫“无产者社”。刘仁静自诩是托洛茨基的入门弟子，也与宋逢春、王文元组成了第三个托派小集团，叫“十月社”。此后，又有王平一、徐乃达、赵济等5人合组第四个托派小集团，叫“战斗社”。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四个“托派”组织与王明、博古等展开了斗争。这时候的刘仁静凭书生意气，也与陈独秀抗衡，曾在争论中对陈独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他自以为中国只有他能解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是取真经的人。其实，当时四个“托派”组织各有意图，谁也不能实践“不断革命”。刘仁静很快被宋逢春、王文元排斥，他

又单枪匹马独自为王，组织成立“明天社”，独自一人自编自导自演，没有喽啰，没有观众，更没有掌声和鲜花，不久就湮没了。

托洛茨基派反对斯大林路线的“第三时期”、“马鞍型”、“波德约姆”（高潮或高涨）等观点，主张与国民党拼“议会斗争”……这也是幻想。蒋介石既扼杀共产党，更不会容许中共参加议会夺权。后来，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参政会”，中共有7个名额，也只是陪衬的摆设。

后来，“托派”四个小集团先后解体。刘仁静也只得落荒逃遁了。我对刘仁静的执著个性觉得近乎迂，从理论知识的角度看他很有成就，但在革命实践的行动中只凸显出书卷气，与工农兵还是有距离的。

自我反思

刘仁静被各方排斥后，对党、对“托派”、对政治都兴趣索然，又蜷缩在书斋中从事译作。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上海为“神州国光社”译出了几本马恩经典巨著，之后在北平又译出了《中国革命的悲剧》；新中国成立后到北京归队，经与刘少奇一夕谈，返璞归真，后埋头译出《普列汉诺夫文集》等，追还了书生本色。

这是刘仁静闪光的一面。

平时，刘仁静待人接物忠诚友爱，即使在会场争辩中口沫飞溅，喋喋不休据理力争，会后仍和颜悦色协助对方解除困境。例如宋逢春、董剑平等生活维艰，刘仁静屡屡解衣推食济助，他有善良的心愿，不计仇怨。别人背后詈讽他为“刘姥姥”、“刘神经”，他置之一笑，豁达大度，从不反噬。在派系斗争中，别人耍花招玩权术，争逐选票，他都坦荡固守原则。这许多优秀的秉性，是那些争逐名利的丑角应愧对的。

回溯往事，刘仁静的直率认真也是值得纪念的。

刘仁静的功过是非，其长处是率直，他从不隐晦、不说假话。他钦服托洛茨基主张就直率地批评李立三中央是斯大林尾巴、官僚主义。他的政治信念，从19岁起始，在党的一大上争论问题，藐视“教授”的尊严，这在当时是一鸣惊人的。随同陈独秀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代表中共发言，

也语惊四座。回国后主持共青团工作，在当时几个知名的知识分子（陈望道、邵力子……）拂袖而去脱离中共时，刘仁静则是积极坚定的。他在生活方面，在发现周佛海与杨淑慧私奔事等后，愤恨这类苟且行为，鄙视这些无节操行径，自己始终不逾规，决无秽行。在莫斯科学习时期，苏联正风行“一杯水”主义，许多同学都接受莫斯科姑娘的追求，他始终不涉足污行，一直是个正派的大丈夫。

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顿悟昨日之非，坦诚地进行了忏悔。他说：“由于小资产阶级劣根性，我自以为是，不服从组织的纪律，因此当我不同意党的路线的时候，就进行闹分裂的派别活动。”这些应该是符合他个性的真心话。但当时正值解放初期，刘仁静被定罪为“托匪”、“反革命”、“反党”。于是，他平静的生活又夭折了，失去了北师大讲师的职业。“文化大革命”时期又遭殃，虽不判刑，却遭囚禁，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获自由。1986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1987年8月5日清晨5时许，刘仁静按习惯，由住宅去对邻的北京师大广场参加晨练。不料，一辆失控的公交车在朦胧的薄雾中飞驰而来，撞倒了这位85岁的老人，经抢救无效去世。事后，由国务院参事室王海容主持，在八宝山举行悼念仪式，随后火葬。刘仁静坎坷的一生，就此画上了句号。

江青轶事四则

胡邦定

由于各种机缘，我听到几件关于江青的轶事，大都属于第一手材料。通过这些材料，可以进一步了解江青其人，也可以窥见社会世相的变化。下面按时间顺序一一道来。

第一则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江青当时叫李云鹤，由于失业，找到她早年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实习时的校长、老师赵太侔，请他介绍工作。赵这时任青岛大学副校长，就安排她在校图书馆当管理员。赵太侔的妻子俞珊是上海南国剧社著名的话剧演员，曾因主演《卡门》、《沙乐美》而轰动一时。李云鹤也热爱戏剧，对俞珊十分崇拜。她经常去赵家串门，虽然俞珊只比李云鹤大七岁，她却一口一声师母叫得十分亲热。她在这里还认识了俞珊的弟弟、在青岛大学读书的地下党员俞启威（即黄敬），并从恋爱发展到同居，就住在由他们出面租赁的作为中共机关的房子里。30年代初，人们的思想比较守旧，单身男女是租不到房子的，因为房主不放心，怕他或她不稳定、不安全，已婚夫妇就是另一种情况了。这也是他们以夫妻名义租房的原因之一。这样李云鹤与赵家就有了双重关系，既是师生、属员，又是亲戚。她常到赵家走动，是很自然的。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俞珊是名演员，又是大学校长夫人，有一只价值2000银元的钻戒不见了。这样贵重的东西当然不会随便乱放，只能是很熟悉的人才可以拿到。环顾左右，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李云鹤。俞珊不好明说，更不好报警追查。于是由黄敬出面做工作，

不挑明，而是旁敲侧击地启发动员。不久，这只钻戒又在俞珊的家里被发现了。毫无疑问，这是拿走钻戒的人又把它送回来了。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当事人不得不想，不得不分析。李云鹤的母亲原是人家的侧室，丈夫死后，原配夫人及其子女就把她和李云鹤（当时名“李进孩”）挤出家门。母女两人处境艰难，生活拮据，渴望摆脱贫困之心，概可想见。李云鹤又在小戏班子里当过演员，有虚荣心，对名演员才能拥有的钻石戒指那样华丽的首饰十分羡慕也是可以理解的。所幸她取而复还，说明年轻人良知未泯。黄敬对她进行的革命思想教育也许起了一定作用。但这毕竟是一件丑行，使她在赵家很没有面子。1933年4月，黄敬在青岛因从事党的秘密活动被捕，李云鹤失去亲人又恐受牵连，就求俞珊写了几封介绍信离开青岛到上海另谋生计去了。

以上所述，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王林告诉我的。事情的缘由是这样：1958年2月，黄敬英年早逝。作为老战友，王林要为他编一本纪念文集，为此他专程到北京遍访黄敬的知交、战友、亲朋等等，约大家写纪念文章。我与黄敬有亲戚关系，王林在天津总工会任宣传部长时，我作为记者和他曾有联系，因此他找到我约稿。闲谈中我问起黄敬与江青的关系。那时江青还没有被尊为“伟大旗手”，人们也还没有后来那样“为尊者讳”或谈虎色变的恐惧。因此他很随便地谈了一些情况，其中有些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自然无须赘述。唯有钻戒一事，迄今似乎还没有人披露过。所以就记忆所及，不厌其详地复述王林的介绍如上。

第二则要说的是：50年代初，大概因为江青在上海演过话剧、电影，比较熟悉演艺界的缘故，她曾一度被派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工作。办公地点不在中南海，公家派一部汽车接送她。可这是一辆老牛破车，行进中不时会熄火抛锚，需要司机下来用摇把使劲地转动，等到噗噗作响之后，司机才能重新发动，让车子继续前进。这无疑是很烦人的。江青对此却并无怨言，而是安之若素，耐心等待。这件事是时任江青秘书、我的中学同学齐锡宝在一次闲谈中提到的。因为事涉江青这个名人，我就在无意中记住了。

这是一件小事，却使我认识到人的思想意识、生活作风，与其所处

的环境及时代风尚有很大关系。尽管江青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影剧界混了三四年，但她毕竟在延安窑洞住了差不多十年。初到北京，在共产党躬行节约、廉洁奉公的风气下，人们对生活一般是没有过高要求的，包括江青在内。

轶事之三说的是江青到苏联治病时的事。由于在撤离延安后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东奔西走，江青身体很弱，体重不足90斤。解放后她曾两次去苏联治病。她不懂俄文，公家给她配了一名翻译，实际上也是秘书。她叫张国男，是著名社会活动家、1946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烈士的女儿（李的夫人姓张，国男随母亲的姓）。我在昆明云南大学附中代过课，张国男是我的学生。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一天我到她家做客，她拿出一大本相册，里面都是江青在苏联照的相片。国男的爱人王健说：江青那些破玩意儿有啥好看？我说这也是一段历史记录，不妨看看。我翻了那本相册，江青衣着朴素，态度亲和，绝没有“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盛气凌人的“恶行恶状”。国男还告诉我，江青原本不会照相，也没有照相机。到苏联后，苏联政府照顾这位主席夫人，送了她一架，是苏联二战胜利后把德国的照相机厂拆迁到国内生产出来的，质量相当好。从此江青才学着照相，也才有后来毛泽东那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著名诗篇。回顾这些事，使我颇有感慨。江青作为第一夫人，当年并没有什么贵重的生活资料，一架照相机也不可得。时间过了十多年之后，江青住进钓鱼台，竟能集天下之精华财富而奉养之。这岂仅是江青个人的问题？！

轶事之四要说江青的待人接物。还是50年代初，天津总医院妇产科主任俞蔼峰，是美国留学归来的，医术高明，久负盛名。由于江青多病，俞蔼峰每月从天津到北京为她检查、治病。我在黄敬家多次见到俞大夫，闲谈中提到江青，她说江青平易近人，对医生很客气也很尊重。俞大夫还形容江青白白净净，看起来让人觉得很舒服，没有浓妆艳抹，但在穿着打扮上似乎也并非全无心计。从一些小地方可以看出一点俏头来，比如在布鞋的鞋面钉上一个小绒球之类。这就是俞蔼峰眼中的江青，一个亲和而美丽的女人。当然，那是党和毛主席的威望无比崇高的年代，爱

屋及乌，看江青时不自觉地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轻纱也是很自然的。但无论如何，江青那时并非性情乖戾、高高在上、盛气凌人，则是肯定的。

把以上四件事联系起来看，50年代前后的江青，其生活作风还是近乎常人的。后来她贵为“旗手”，以第一夫人之尊，从而权倾天下，专横跋扈，不可一世，成为千夫所指、恶贯满盈的罪人。其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个朴素的真理在起作用：没有民主监督，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江青的堕落，就是绝好的例证！

最后，附带说一下王林的遭遇。众所周知，江青在上海以蓝苹的艺名在影剧界争强好胜，出过风头，也有一些绯闻、丑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达到权力的顶峰，唯恐那些不光彩的事传播出去，因而对知情人或与她有嫌隙的人百般迫害，置之死地而后快。作恶多端，不胜枚举，比如著名演员王莹惨死狱中，名导演章泯受尽磨难，赵丹、郑君里、顾而已、陈鲤庭等人因被怀疑藏有江青过去与他们联系的书信、资料而被多次抄家、审讯，连多年帮助她、伺候她的保姆秦桂贞，也被江青让人把她骗到北京，投进监狱达八年之久。

王林是知道江青底细的重要见证人之一，他的命运如何呢？据说对找他调查江青历史的人，不论来自何方、何派、何组织，王林都用同一口径答复：江青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地位特殊，除非中共中央开介绍信来，我一概不回答任何提问。这些话，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义正词严，理直气壮。造反派无论多么狡诈凶残，对此也无从反驳，只能扫兴而归。江青左右自有许多耳目，知道王林这种态度后，就没有再对他有任何行动。因此，王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和许多老同志一样受到种种冲击，但总算没有从江青那儿再受到更多磨难。

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

王文耀 王保春

江青与陈伯达是从延安开始认识的。那时，陈伯达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江青涉及政治工作较少，她主要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所以，江、陈之间没有矛盾。据陈伯达说，江青曾两次向他表示想离开毛泽东，一次在延安，一次是解放初期在北京的西山。一段时期江青因身体不好，毛泽东就送她去苏联治病。

陈伯达帮了江青的忙

20世纪50年代初期，江青曾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但是从未见她到任上过班。后来她成为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

江青是个聪明且过于敏感的人。她是演员出身，对于艺术很内行。她也怀有个人野心，不断就中宣部的工作向毛泽东进谗言。20世纪60年代，她在上海和张春桥、姚文元秘密搞了一个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尽管他们曾几易其稿，但是毛泽东还是不满意，让他们去找陈伯达给改一改。陈伯达当时在上海正忙于工业调查，因有毛泽东的指示，只好为其修改，这才得以通过。

当时，周扬夫妇身体不好，刚在北京动完大手术不久，来上海修养。周、陈过去秀才交往，关系一直不错。陈伯达本想去看望周扬，但被江青知道后阻挡。江青说：“这里正准备批判周扬，而你去看他？不行，这让

主席知道可不行。你不能去。”陈伯达无奈，只好派秘书王保春代表他去看望周扬以示关切。

江青与陈伯达争权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为小组的组长，江青为小组的副组长。江青为了权力，起初处处关心维护陈伯达。当陈伯达因劳累过度生病住院时，江青曾向文革小组成员郑重宣布：“小组的大小事情，都要随时请示组长。”由于江青对陈伯达大献殷勤，陈伯达便写报告给毛泽东，说在他生病住院期间，由江青代理组长职务，临时将权交给江青。这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群众，江青就代表中央文革出席并讲话，大出风头。从此，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随风转向江青，渐渐远离陈伯达。待陈伯达出院后，江青紧握权力再也不放手。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还是江青说了算，陈伯达得听她的。从此，陈、江意见不一，起了矛盾。

江青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不断膨胀，到处发号施令。陈伯达为了约束江青的权力，便找王力、关锋、戚本禹开会起草了给中央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办事机构，一切言行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擅自做主。会还未完，江青来了，她大发脾气：“我还是不是代理组长，我还是不是第一副组长！”她看了报告的草稿后，立即加上自己的话，并且反复强调说：“我加上的这句是最最重要的！”

陈伯达抱怨：毛泽东 痛斥江青的话没能向下传达

1967年二三月间，陈伯达对我们说，毛主席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对江青的霸道行径严厉地批评过。毛主席生气地说：“有人说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话不对！她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上！她根本就没有

把我放在眼里！我多次批评过她，她听了吗？！她这个人呢，有武则天之心，而无武则天之才！”毛泽东说完后，谁也没有说话。后来，还是周总理打破沉闷的气氛，说：“江青同志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很辛苦，是有成绩的。”这时紧张的气氛才缓和下来。然而散会后，没有一个人传达。可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还哭闹着诉委屈：“正因为我是他（指主席）的老婆，他总是限制着我。这么多年来，如果不是这样，我早就放开工作了，我真是受不了……”

陈伯达不满地说：“别人做错了事，主席有时生气地批评别人几句，就马上向下传达，被批评的人，很快就会倒台了。而主席这么严厉地批评江青，就没人传达一句，反而还护着她。”陈伯达说完直叹气。

我们听完陈伯达的话后，心想，陈伯达自己也挨了批评没有向下传达，还埋怨总理。看他情绪不好，我们只能安慰陈伯达说：“总理也很为难，因为江青和主席总还有夫妻关系这一层，而且批评她是希望她好嘛，也不是要打倒她。她不是说过，主席对没有希望的人，是不批评的。再说假如没有正式请示过主席就向下传达，主席万一不高兴，说这是我的家事，怎么你们也要管？那就不好收场了嘛！”陈伯达听后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陈伯达与江青厕所之争

1968年有一段时间，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转到了京西宾馆。陈伯达因平时喝水较多，年纪大了又有尿频的毛病，常去厕所。京西宾馆会议室附近的厕所外边门上写着盥洗室，里边只有一个厕所，不分男女。

一次，陈伯达刚上完厕所出来，正巧江青推门欲进。这时，江青见陈伯达从里边出来，便气愤地问陈伯达：“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伯达吃惊地看了一下门上的标记说：“这哪里写着是你的厕所？！”说完便不满地走了。江青怒气冲冲朝着陈伯达大声地说：“今天你闯进我的厕所，明天你还要闯进我的卧室了！”

从此，这个厕所就再也没有人敢去了。

江青向陈伯达怒摔茶杯

1968年八九月的一天夜里，陈伯达从十一楼（江青住处，也是江青的代号）开会回来，直接回到自己的卧室。王文耀知道陈伯达回来了，便拿着精选好的文件卷宗送到他的床前（陈伯达习惯回来就上床看书）请他审阅。

陈伯达斜靠在床头，目视前方，脸色不是很好，看样子受了很大委屈而又无法对别人说。看到陈伯达痛苦的样子，王文耀吓了一跳。王文耀知道陈伯达的日子一直不怎么好过，便轻声问他怎么了。陈伯达小声地说：“没有什么，有点不舒服。”等了片刻，陈伯达看屋外无人进来便小声地对王文耀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刚才‘十一楼’（江青）给我发了很大的脾气，还摔了杯子。”说着便从被窝里拿出一个纸包给王文耀。

王文耀听后吃了一惊，当他双手接过纸包时，陈伯达小声说：“这个我拿出来时谁都不知道，只有‘十一楼’知道。也可能她还会要回去的，你看怎么处理一下？”王文耀说交给我吧。并问陈伯达：“她为什么向你发那么大的火，都有谁在场？”

陈伯达摇摇头叹了口气说：“有康老（康生）、姚文元他们。说是研究工作，可是一开始她就向我面前扔了一封信让我看，说我把写信的人逼到绝路上去了。康老在一旁说‘那不是信，那是绝命书呀！’”

王文耀问陈伯达这个写信的人是谁，陈伯达不肯说，只说：“他是人民日报社的一个编辑，是搞文艺工作的（后来才知道是李希凡）。‘十一楼’说我把他逼上绝路。你们知道，《人民日报》我就没有怎么管，怎么就说是我逼他呢？你不知道，她对我发了很大很大的脾气呀！”陈伯达说着形象地学着江青当时生气摔茶杯的情况：“嘭的一下，水洒了一地，杯子也碎了。我怕外边服务员听见了进来看见，就把地上的碎片捡了起来，用纸包上了。”陈伯达还说，过后他看江青似乎也有些后悔。

这些东西带回来以后，陈伯达又怕江青找他的麻烦，不知放到哪里

才好，就交给王文耀处理，并且说扔掉，别扎着人。

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江青的边是不能沾的。王文耀拿着这包碎瓷片也不知怎么办？不能丢，丢了江青要时拿不出来就坏了；可是不扔，她又会说你还留着干什么。王文耀想来想去，觉得还是留着好。当天晚上，王文耀就把碎瓷片埋在了十五楼门前小河边的松树下。

过了不久，据说李希凡授意人民日报社一位青年，拼凑了一张江青和毛泽东的合影照片。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忽然就着这张照片说：“人家说我要当武则天、慈禧太后，我又没有她们的本事。李希凡有什么历史问题也不跟我说。”陈伯达插了一句：“你说我要逼死他，谁还敢给你说。”江青大声说：“你造谣……我瞧不起你！”陈伯达也顶了一句：“我也瞧不起你！”这时，周总理对江青说：“你是说过的呀。”江青又和周总理对顶起来。陈伯达生气地走出会场，在走廊里转了一圈，又准备进会场，刚走到门口，周总理出来见到陈伯达说：“你还回来干什么？！”陈伯达理解周总理的意思，便转身出门，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江青说：陈伯达比毛泽东谱还大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陈伯达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于当时社会上较乱，组织上出于安全着想，为他配备了一辆苏制保险吉斯车和一辆国产红旗车（这些车都属中办车队管），当然他原来坐的那辆灰色吉姆车还在。另外我们工作人员有时因工作出去办事，就临时从红旗杂志社司机班暂借一辆米色的伏尔加小车用一下。陈伯达为了出去调查方便，也坐过几次伏尔加。他去工厂、学校、郊区农村时喜欢坐这辆车，不招摇显眼，较为随便，但就一样不称心，车身小，上下车特别费劲。

在一次会议上，江青对陈伯达很不客气地说：“哼，你比主席谱还大，主席才1辆车，1个厨师。你可好，用4辆车，4个厨师呀！”陈伯达当时就愣了，说：“我，我哪儿有那么多车和厨师，我怎么不知道！”他散会回来后，很不高兴地问我们，他是不是有那么多的车和厨师。我们当时听了也很吃惊。后来仔细一想，情况也不完全不对。陈伯达原来坐的是1辆吉

姆车，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组织上给他配备了两辆车，1辆保险吉斯和1辆红旗车。保险吉斯车他只坐过一两次就不坐了，嫌太大，太显眼，让人退回去了。红旗车起初也说太大不愿意坐，后来换了1辆小红旗，开会时常坐。厨师，陈伯达原来住中南海迎春堂时，是不要厨师的，吃饭是工作人员到甲区的西楼特灶食堂打饭吃。1967年，因刘叔晏（陈伯达的夫人）怀疑有人爬她家的墙，让公安部的人进去查脚印，被江青知道了，被“赶出”中南海。搬到新建胡同以后，组织上给陈伯达配备了1名厨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陈伯达自己就住在了钓鱼台十五号楼。同时住在十五楼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尹达、关锋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按照钓鱼台原来接待外宾的习惯规定，住在哪个楼，吃饭也就在哪个楼里。陈伯达住的楼里有3名厨师，特级厨师宋师傅给陈伯达做饭，另外两位给文革小组成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做饭。这是当时按接待外宾的做法，还未改变。江青可能将这3名厨师和陈伯达新建胡同家中的那位厨师算在一起，陈伯达就有4名厨师。

陈伯达对此极为在意，提出不要厨师，说原来就没有厨师，要和大家都一起去食堂吃饭，或者打饭回来吃。后来钓鱼台改为各楼就给首长一人做饭，工作人员都集中到十七楼去吃饭，十五楼就留下宋师傅给陈伯达做饭。陈伯达心里不痛快，起初他只是说饭菜不好吃，味道像饭馆的菜饭，说是说还吃些。其实他并非对宋师傅本人有意见。宋师傅看到陈伯达常剩下饭菜，知道他对饭菜有意见，便当面征求陈伯达的意见，以便改进自己的工作。陈伯达对宋师傅说，你做饭的技术很好，很辛苦，表扬了一番。同时又说，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吃不惯这样好的饭菜，喜欢吃普通的饭菜。宋师傅也向我们工作人员征求意见，很诚恳地想改进工作，其结果还是一样，做好的饭菜，陈伯达只吃很少一点，大部分剩下。

1969年12月林彪发出一号战备令时，陈伯达被遣散住在京西的玉泉山。陈伯达平时吃饭是两菜一汤，一荤一素。宋师傅每次做好香喷喷的饭菜送上去，鱼、虾原封不动端下来，倒了浪费，别人吃了也不好，只好中午的菜晚上热一下再送上去。但陈伯达还是未动，照旧端下来。我们每次都劝，陈伯达就一句话：饭馆子味，不想吃。急得这位钓鱼台名厨宋师

傅都要哭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工作没有做好，长此下去怕影响陈伯达的健康，这可是大事。可能宋师傅也向钓鱼台的领导汇报过，觉得自己工作不好。其实，陈伯达的目的就是不想要厨师，和江青斗气。

米粮库胡同的房子装修好后，战备解除了，陈伯达搬进了新房，他吃饭还是如此，并提出请宋师傅回钓鱼台。我们说，宋师傅走了你吃饭怎么办？陈伯达说：“你们随便给我做点吃的就行了。你们忙不过来时，就让李玉元（管理员）做就可以。”我们也不好为难宋师傅，就请他回钓鱼台了。

李玉元是农村来的，做城里人吃的饭菜水平差了点，我们俩也就常抽空去做饭。三个人中就王保春还会做几个像样的菜，但偶尔为之还可以，长此以往可不行，其间闹过几次笑话。我们做的饭菜也比较单调，也就是鸡丝面之类的。陈伯达是福建人，爱吃鱼，我们就做红烧鱼什么的。一次，李玉元去供应站采购了一只宰好的鸡，拿回来洗洗就放锅里煮，熟了以后，老李准备把它切成丝，做鸡丝面。这时王保春去厨房看看，发现老李切的鸡肉丝怎么有黑色杂物。一看未切完的整块鸡肉上，有个像橘子样大小的黑糊糊的东西，再仔细看发现，老李煮的鸡没有取出鸡嗉子，将鸡嗉子里鸡吃的杂物当肉切了。幸好发现得早，没有把它做到饭里。还有一次，李玉元给陈伯达学做了一条红烧鱼。陈伯达开完会回来正饿，听说老李做的是红烧鱼很高兴。李玉元非常高兴地将自己得意之作送了上去。这时王保春有事去向陈伯达汇报，一进门，只见陈伯达和平时一样，边看书边吃饭，吃得正香。陈伯达用筷子不停地在那条红烧鱼身上捅来捅去，鱼皮都剥得吃光了，可是鱼肉和鱼骨、鱼刺怎么也分不开，鱼肉还露出红色。王保春在一旁看出了问题，便对陈伯达说：“您别吃了，那鱼好像不熟，再去烧一下吧。”陈伯达看不清楚，还固执地说：“嗯，没关系。”王保春赶快将鱼端到厨房，又回锅烧了一遍送上去，陈伯达才算吃完了这顿饭。

在这段时间里，陈伯达因为感冒，中央开会他请假没有去。周总理很关心他，同时也知道他让宋师傅回钓鱼台去了，没有厨师做饭，便给陈伯达打电话，批评他说：“你让厨师回钓鱼台是不对的，怎么能让秘书

们给你做饭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嘛！你这样把身体搞坏了，让我怎么向主席交代！”周总理同时也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工作，还是要找个厨师来给伯达同志做饭，要注意他的身体才是呀！”当时陈伯达正患感冒，周总理介绍了他自己对付感冒的办法。他对陈伯达说：“我有时在感冒初期，喝一杯茅台酒就好了，挺灵的，不妨你也试试看，少喝一点。”陈伯达告诉我们，他也想试试总理这个办法。我们就为他买了一瓶茅台酒，他只喝了一小杯的少半杯，就受不了了，发起烧来。其实他和总理不一样，总理平时参加宴会多，还可以喝一点酒。而陈伯达平时一点酒不沾，所以他说：“总理好意向我介绍他的经验，可到我这儿怎么就不灵了呢。”

陈伯达以后一直没有要厨师，一直到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都是李玉元为他兼管做饭。

江青对陈伯达说： 我要摘掉你的领章帽徽

大约是196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社报送了一份有关日本问题的材料，毛泽东阅后有一个较长的批示。

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看文艺演出，节目没有完，陈伯达便叫王文耀，告诉在他办公室值班的缪俊胜，通知人民日报社尽快把这个文件给其他领导同志传阅。这件事小缪当时就办了。

节目演完之后，陈伯达说是去一楼大厅参加一个在京的宣传口的会。陈伯达事先不知道，出席中央碰头会的人大都出席了，会议由江青主持。会议一开始，江青便说：“让陈伯达作检讨，他管的《红旗》杂志，半年不出版。他还封锁最高指示。”陈伯达听了一愣，说：“我没有封锁主席最高指示呀！”江青说：“还说没有，主席最近有关日本问题的指示，你问问别人都知道吗？”康生在一旁拉着长声说：“我反正没有看到。”陈伯达说：“我看了以后，当时就传送出去了……”陈伯达还没有说完，江青就把话筒从陈伯达面前抢了过去，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

说了，我来揭发。你还穿着军装，戴着军帽。”陈伯达说：“大家都穿军装，也不是我一个人穿军装。”江青紧接着说：“我要摘你的领章帽徽！你知道红五星的来历吗？”陈伯达看到江青这种架势，知道会议是要批自己，便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使劲往桌面上一甩，大声说：“大字报上街！”意思是说，可以贴大字报打倒我。叶群接着举手喊口号似的说：“拥护江青同志！”场内无人响应，气氛十分紧张。这时江青好像想起什么似的，马上对到会的人员宣布：“在场的人不许出会场，今天的会议不许传出去，作为一条纪律，谁传出去，拿谁是问。不许记录，记了的必须放下笔记再走。”说完，江青继续说“红五星的来历”。

散会以后，陈伯达回到家里，心情不好，情绪极为低落。第二天，他到红旗杂志社，在全体人员参加的大会上说了不少丧气话。他说：“……你们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我也有不少错误，可以对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杂志半年不出版不怪你们，责任都在我，我没有抓紧，由我承担这个责任。你们也可以给我写大字报，大字报上街都可以……”大家听了莫名其妙，以为他在说笑话。

离开会场之后，我们对陈伯达说：“你不该向大家说这些话，搞得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有气无力地说：“唉，昨天的会议，他们一定有人去参加了，会回去说的，不可能不说，他们会知道的。没有关系，随他们的便吧……”

两天以后，我们将那次会议的录音带从中央办公厅借来，王保春、王文耀、缪俊胜三人重新听了一遍。我们对江青的这种无理霸道行为很是不平。这盘录音带我们没有马上还回去，而是存放在我们的办公室里。

1970年8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天才论”受到批判后，这盘录音带让我们紧张起来。当时觉得将带子退回办公厅，怕江青知道，会引火烧身；不退放在办公室，也是条罪状；将它洗掉也不忍心。犹豫很久，我们最后将它放在办公室不易发现的地方。

江青与中央碰头会对抗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央领导人员发生了变化，中央文革小组人员锐减，陈伯达与江青的矛盾不断，而江青不断向毛泽东告陈伯达的“黑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为工作能顺利进行，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召集人、中央其他党政军领导人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来研究重大决策。从此，陈伯达积极参加这个碰头会议，而不主动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但是，江青并不满意周总理召开的碰头会议，她多次催促陈伯达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就一些问题作出决定，与周总理的碰头会议相对抗。陈伯达总以各种借口推脱，拒绝召开文革小组会议。江青对此非常生气，但陈伯达是组长，他不参加江青就只好单独召开小组会议。江青很狡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她事先和张春桥、姚文元商量好了，借江青每天晚上请文革小组成员看电影的机会来开会。有一天晚上，陈伯达正在卧室床上躺着看书，钓鱼台值班室来电话说，江青请陈伯达去十七楼看电影。陈伯达一听马上对我们说：“你们告诉他们，说我已经睡觉了。”我们照此转告了值班室。过了没有两分钟，江青又让值班室来电话，说：“康老、江青同志都在等伯达同志。”陈伯达听后急了，毫不掩饰地对我们说：“你们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了。哼！什么看电影，她是又要开小组会，强迫我表态，我不去。你们就说我安眠药已经发作，起不来了。”说着他把被子往上一拉，不说话了。

江青批判新启蒙运动

1968年，陈伯达实在不愿意住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想离江青他们远一点儿。可是新建胡同的家已经被他的妻子刘叔晏闹得不像样子了（刘叔晏正和陈伯达闹离婚），街坊四邻都知道那是陈伯达的家。中办管理局给陈伯达另安的新家——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因房子破旧正

在修缮。陈伯达又不想住钓鱼台，管理局无奈就临时将他安排在中南海丙区，国务院这边一个大殿北边，一个很深的四合院。这里前后几个院子很长，但几个院子无人居住和办公，非常安静。在那人心慌慌的年代，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陈伯达很满意，再三对我们说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让“十一楼”（江青）他们知道了。我们当时觉得很好笑，对陈伯达说：“‘十一楼’要找你，去问警卫局你住在哪儿，他们敢不告诉她？”

当时江青、姚文元等正在挖空心思找陈伯达的茬儿。他们写了一篇批判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呈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对江青说他不看，让她找陈伯达看去。一天，江青真的来找陈伯达谈这件事。江青一进院子见到陈伯达便说：“哎呀，这个地方可真不错，赶明儿我也来这住。”江青把准备好的批判文章交给陈伯达。江青走后，陈伯达既生气，又着急。因为1936年至1937年间，中国文化界掀起的新启蒙运动，陈伯达是主要发起人，这不是直接对着他来的吗？

陈伯达很气愤地对我们说：“他们这是冲我来的，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就是30年代我在《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中提出的‘反对异族奴役、反对复古、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唤起广大人民的抗敌和民主的觉醒’，是反日反蒋的，这有什么错？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禁止提‘反对日本侵略’，禁止报刊上出现‘抗日’这个词，所以只能用‘反对异族奴役’的提法来代替，我这里的‘异族’就是指日本嘛。新启蒙运动的建议提出以后，上海的《读书生活》、《新世纪》，北平的《现实月刊》、《时代文化》、《北平新报》、《华北呼声》等等好多报刊都发表文章响应，抗日民主思潮得到蓬勃发展。当时的亲日派郑孝胥、守旧派杨立奎等对此很恐慌，通电宣称要‘铲除’新启蒙运动。但是进步思潮总是阻挡不住的。”他很生气地讲了一阵。

于是陈伯达就翻阅书籍，找出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肯定新启蒙运动方面的一些言论，让王文耀都抄录下来，经他仔细看后，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看，他们都表示不同意批判新启蒙运动，这才把那篇批判文章堵了回去，没有让它出笼。

但是，陈伯达并没有忘记江青说要来这个地方住的那句话。为了躲

避江青，陈伯达急得不知往哪儿钻。他对我们说：“这个地方不能住了，她还会来的。”他将这件事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暂时到养蜂夹道干部俱乐部的游泳池边上去住，说是林彪在那儿刚住过，较为安静。

就这样，陈伯达在中南海丙区的大四合院里住了没两天，又匆匆忙忙地搬到中南海外边的养蜂夹道去了。

陈伯达撕碎了与江青的合影照

中共九大以后，陈伯达住在米粮库胡同，可是他在钓鱼台十五楼的办公室还留着，由缪俊胜留守。陈伯达好久没有去了，想去看看。一天，他去钓鱼台，正巧碰上江青在大院里拿着照相器材，许多身边工作人员陪着，兴致正浓地拍摄风景、人物。见陈伯达来了，江青也为陈伯达拍了好几张，同时还让别人为她和陈伯达拍了几张合影照。之后，陈伯达回到自己的十五楼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但总觉得有些不安，便离开了钓鱼台。

对于与江青拍合影照之事，陈伯达老放心不下，犹豫许久，最后将与江青照相的事告诉了叶群。叶群听后，对陈伯达说：“这可不好，这让主席知道了可不好，江青是什么目的？！”陈伯达听叶群这么一说，心里更加不安。江青洗照片都是在新华社，陈伯达马上让自己身边的缪俊胜坐车去新华社摄影部。照片正好洗完，江青还未取走，缪俊胜向摄影部的人打过招呼就取走了陈伯达的照片。

缪俊胜将照片交到陈伯达手中，陈伯达当场就将照片撕成碎片。缪俊胜当时吃惊地说：“唉呀！你怎么给撕了！新华社知道是我取走的，江青同志向我要，我可怎么交代呀！”陈伯达说：“没关系，你就说给我了。”从表情上看，陈伯达的心情一下轻松了许多。

后来，听说江青严厉训斥了新华社，而且提出无她的指示，以后任何人不许拿她的东西。

陈伯达家来了“不速之客”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定了文章的篇数，并排印有清样稿，“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断。大约1968年底，陈伯达因无事可做，便决定重新再编。于是他找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几个人，编起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印出清样以后，报送给毛泽东审阅。过了几天，陈伯达给汪东兴打了个电话，讲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目前出版的必要性等情况，并且问汪东兴毛泽东看了没有，汪东兴告诉陈伯达，毛泽东一夜未睡看完了。陈伯达听了非常高兴。

大约是1969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广场有一个大型群众活动。晚上看过焰火之后，在城楼上休息当中，陈伯达和毛泽东谈话讲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问题时说，里边有几篇文章对当前情况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应该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只是说，你先选几篇送我看看。

晚会散了之后，人们都下了城楼，剩下陈伯达、姚文元和新华社国内部的记者在城楼的西侧厅审改当天的新闻稿。定稿之后已经很晚了，在下城楼时，陈伯达和姚文元并肩走着。陈伯达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将他和毛泽东在城楼上的谈话告诉了姚文元。

第二天下午，陈伯达正考虑给毛泽东呈送哪几篇文章时，来了位“不速之客”——江青。江青是第一次来陈伯达这个家，她下车后边进陈伯达家的门，嘴里边嚷着：“哎呀！老夫子在哪儿呀！”进来后，她对陈伯达说，她是刚从毛泽东那儿来的，毛泽东同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们大家来分头搞吧，文章由你来分配。寒暄了一阵，江青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放下就走了。

江青走后，陈伯达很丧气，他很不愿意江青插手。陈伯达估计在城楼上告诉姚文元之后，当天晚上姚文元便将这一信息告诉了江青，而江青马上就到毛泽东那去抢了这个差事。

不管怎么样，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总是件好事，陈伯达也有事可做了。在碰头会上，有人说可以以《毛泽东文集》编辑委员会的名义进行工作。陈伯达反对说：“毛主席自己写的东西，每一篇都经过他本人审改过，不能叫编辑委员会，我们只作具体的出版工作，要说只能是一个出版委员会。”会上按文章内容分了几部分，陈伯达一部分，周总理一部分，康生一部分。我们记得总理那部分是有关经济建设和财政方面的文章。

陈伯达这边的人来自中央政治研究室，康生那边是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当时康生那边人手不够，要从政研室调过几个去。在未调去之前，陈伯达给政研室的同志开了个会。会上在研究如何进行工作时，大家认为，为了全书文章体例的衔接，调到康生那边去的人，应该经常回来说说情况。但又觉得这样不太好，怕会引起康生等人误解。怎么沟通，想不出办法来。在大家作难时，王保春建议，调过去的同志，可中途回研究室过党组织生活，这样可以顺便谈一下情况，不就解决了嘛。陈伯达对这一建议非常赞同，大家也都认为这样好。后来，陈伯达倒台后，中央专案组审查王保春时，多次逼他交代：“你王保春的点子多得很，陈伯达都很赏识你。”

不管陈伯达如何努力，但在江青的多方干扰、破坏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没有完成，最后还是被康生总揽过去了。

江青对陈伯达落井下石

在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已被批判。会议将要结束前，陈伯达去求见毛泽东。毛泽东接见了，很平和地对陈伯达说：“你看你把个会议搞成这个样子，下一步怎么办？”陈伯达说：“我下农村去。”毛泽东说：“你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好好谈一谈……”陈伯达离开毛泽东住地去找江青。江青一见陈伯达便说：“啊！稀客稀客……”江青自己不和陈伯达谈，而是驱车带陈伯达一起去找康生。

到康生那里时，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坐在康生的会客厅里等着，这似乎是早已准备好的。

陈伯达坐下还没说上两句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同时开火，对陈伯达连讽刺带挖苦。陈伯达被羞辱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大文人受到如此待遇，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几乎当场晕倒。他们让陈伯达准备下次在大会上向大家检讨。陈伯达说：“我现在脑子很乱，无法动笔写。”康生说：“你无法动笔，我代你写。”康生代替陈伯达写的检讨，用词相当刻薄，陈伯达都难以启齿。没有办法，为了过关，只好忍辱在会上照本宣科。

下山回京之后，陈伯达本想回家当农民，过个平民的晚年。他没有想到被关进监狱度过了18年，期满1年后就去世了。

江青在小靳庄的闹剧

陈大斌

1974年6月“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在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假借“评法批儒”之名，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党活动，种种丑行令人不齿。作为新华社派出的随行记者，事后曾经向社领导汇报过有关情况，也在一些朋友中“传播”过。近年来，有些当年曾耳闻过此事的人，建议我把当时的现场见闻写出来，让“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的小插曲有更多的人知道。但当时对江青的活动没有公开报道，“内参”报道也不可能真实记述其事。所以现在要真实地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也非易事。2003年夏天，在新华社天津分社的帮助下，我去天津访问了有关人员，查看了一些资料，又到小靳庄访问了当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等人，核实了有关史实，遂写下这篇追忆文字。

“批林批孔”：大作反党反革命文章

1974年新年伊始，“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这场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早在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前后，毛泽东便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他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1974年1月，中共中央将供批判的小册子《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党，一场“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

江青等人竭力利用这场运动大作反党反革命文章。1974年1月，江青赤膊上阵，在驻京部队和中央国家机关大会上动员“批林批孔”。她大放厥词，公然影射和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点名攻击一批中央及军队领导干部，还说中央有“很大的儒”，叫嚣要批“现在的儒”。同时大反所谓“复辟回潮”，树立“反潮流”典型，煽动揪斗老干部，批判斗争教育界、文化界的一批人。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一时间全国形势紧张起来。一些造反派又组织起联络站、上访团，拉山头、打派仗，有些人竟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煽动停工停产，致使全国各地大乱，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又遭到严重破坏。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8年，全党全国人民心定。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我所在的新华社大多数人对江青的言行极为反感，对“批林批孔”采取消极应付甚至是抵制的态度。当时我在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做新闻采编工作，也很不理解这场“批林批孔”运动。对江青等人的言行非常厌恶。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这时国内部农村组派我和另一位青年记者到昔阳大寨“蹲点”，为期一年。春节过后，我们便钻进太行山里，“蹲”了半年时间，这年6月，我们来到太原新华社山西分社。分社的同志说，这样在一个地方死“蹲”下去，不如到各地走走看看。6月中旬我们去了晋东南地区，参观了李顺达领导的平顺县西沟大队等老先进典型。在平顺我们听说闻名全国的林县“红旗渠”引得就是平顺境内的漳河水。林县属河南省，但与平顺山水相连。我们便请示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要去林县看看“红旗渠”工程。农村组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并同意我们顺便从林县回京休整几天。我们两人从平顺翻过太行山来到河南林县，参观了“红旗渠”工程，于6月19日乘车回北京。

6月20日我们到北京后，上午到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办公室，与组里的同志们闲聊了一会儿，农村组组长谷峰急匆匆地走进办公室，通知我，快去社总编室报到，有重要采访任务。原来新华社刚刚接到中央办公厅紧急通知，要求新华社速派熟悉工业及农村的记者各两名，立即赶往天津。国内部决定，由国内部工业组派出两位大姐，而农村组就派了我与另一位青年同志。穆青在办公室里见了我们四人，他什么任务也没有说，只

是让我们马上出发，后勤部门的车已经在楼下待命。上午10时许，我们四人挤进一辆轿车赶赴天津。

我们不知道要到天津什么地方，司机也不熟悉天津市的道路，天津市有关人员与我们约定，一辆灰色的轿车在京津公路津郊某个桥头等待我们。天津市来迎接我们的一位干部说，你们的车跟在我们后面走，至于上哪儿，去干什么，他没有说，我们也不便问。后来我们来到天津南郊一处有着很大院落的招待所。这时已经是午后，他安排我们吃了饭，住下来，并嘱咐我们：就在房间休息等待，不要外出。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要我们来做什么？弄得如此神秘！一直等了整整一个下午，没有人理睬我们。晚饭后才见到新华社天津分社社长朱波匆匆赶来。他对我们说，江青几天前来到天津，主要是了解天津站工人“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还要去农村听农民“评法批儒”。她通过中央办公厅让新华社派四名记者来，要搞天津工人、农民的“批林批孔”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心里好不懊恼！在太行山里“蹲”得好好的，谁让你出来看什么“红旗渠”？看就看吧，谁让你又跑回北京来？这不是自己往漩涡里跳吗？

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城乡的一系列活动和表演，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严重的反党活动。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天津市委领导中的一些人紧紧跟上，特别下力气组织力量研究“儒法斗争史”，鼓吹工农兵要当“评法批儒的主力军”。他们指定南开大学举办“儒法斗争史”学习班，为工厂企业开办“儒法斗争史”讲座。在市委一些人的鼓动下，天津站组织工人参加，于当年5月编写出一部《儒法斗争简史讲稿》。江青于6月16日得知这一情况，只隔了一天，即6月18日，就带上迟群、于会泳等亲信，还有北大清华写作班子（“梁效”）等急匆匆来到天津，声称要听取天津站工人的宣讲。6月19日晚，江青在天津发表了“六一九讲话”，大讲“儒法斗争史”。她不懂装懂，胡拉乱扯，说“两千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她把从秦汉时代到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统统歪曲为

“儒法斗争史”，把党史上历次政治思想斗争全部归结为“儒法斗争”，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诬为“儒家”。同时，江青宣布天津站是她的“点”，她要通过抓这个点，推动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前后十几天的时间里，江青批发有关“批林批孔”的材料43件，总印数达78万份。

在抓天津站这个“点”的同时，江青还要抓一个农村的“点”。天津市委便向她推荐了宝坻县的一个大队——林亭口公社小靳庄大队。这个大队原为天津市委一位副书记抓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先进典型。6月22日，江青在小靳庄当场宣布：小靳庄是我的“点”！1974年6月到1976年8月，江青先后三次来到小靳庄，并派来她的联络员进驻，派迟群等亲信多次到小靳庄活动，大肆进行反党活动，散布大量反党谬论，流毒全国。

笔者只经历了江青第一次到小靳庄的情景。小靳庄大队当时只有101户，582人，地处宝坻县东部黄庄洼边缘，历史上是个多涝灾的穷地方。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王作山是个老实厚道的基层干部。几年来他带领全村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年年冬天挖河泥垫耕地，口号是“河挖三尺，地高一寸”，不断提高了地力和抗涝水平，生产节节上升。全队以农业为主，除粮食作物外，还种植大蒜等经济作物，有数口鱼塘养鱼，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中等偏上水平。另外小靳庄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群众文化活动活跃。由于这里地处大洼边缘，土地少又易涝，所以历史上村民外出讨生活的人不少，“上京下卫”跑码头，在京津唐等大中城市里，从事理发、浴室服务等服务业的人不少。所以，不少人都见过“世面”，不像有的地方的农民见了生人不敢说话。小靳庄的男女老少大多敢说敢做，尤其是热心文化活动。不少人能说会唱，会编顺口溜，敢于当众登台朗诵、演唱。村里有个评剧班子，能演整出的大戏，参加过天津市和宝坻县的会演，还得过奖。多年来一直是全县的文化活动先进典型。

“评法批儒”：篡党夺权野心毕露

我们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的两人于1974年6月21日中午赶到小靳庄。

当时正是麦收时节。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已经被召到天津，“领受”接待任务。大队长等在市、县委派来的干部的帮助下，找来几个能说会道的社员，抄书抄报凑稿子，准备“评法批儒”汇报会。一般社员忙着打扫卫生，修补道路，紧张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村民朴实善良，只知道江青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以对毛主席的一腔真情来准备迎接她的到来。我们走进村来就能感受到一片紧张和兴奋的气氛。

江青于6月21日下午从天津出发，带领一大帮随从人员，乘火车到达宝坻，当天就吃住在专车上。傍晚时分，江青要下车去“看看宝坻县城居民”，以展示她的“亲民”形象。她走进城边一处干部家属宿舍院，进了一位干部家属的门。女主人热情欢迎她，她也极力表示着“亲热”，拉着她的手说：“我要好好看看你的家，聊聊家常。”但刚坐下来，就有人悄悄地告诉她，这家女主人可能患过肝炎。江青立时变了脸，站起身来快步逃了出去，连句告别的话都没有说。送客的主人在后边小跑着都赶不上她。江青逃也似的回到火车后，再没下火车。

6月22日上午，江青从专列上下来，换乘汽车前往小靳庄。从县城到小靳庄50里路，其中进小靳庄的几里河堤路为泥土路，夜间一场小雨把河堤路浇成一片泥泞。一大早市里调来几辆大型推土机，为江青开道，硬是把泥泞路面上的一层稀泥全部铲掉，再铺上一层干土，又轧了一遍。江青的车队这样才勉强开进小靳庄。

江青进村后就宣布要召开社员会，听农民“评法批儒”。会场就设在村头的小学校里。学校恰好放了收麦忙假，大队腾出所有教室和整个院落。主会场设在一个最大的教室里，江青及主要随行人员占去了一大半座位。村里除了几名主要干部外，只有几位社员代表参加，天津和宝坻县来的许多干部只能在院子里旁听。

我被安排进了教室，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亲见亲闻了江青等人的丑恶表演。

上午10时许，小靳庄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开始，名义上是天津市委主持，小靳庄农民唱主角，其实成了江青个人为所欲为的表演舞台。首先，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报告了大队基本情况，没说几句就被

江青打断。她说今天是来听农民“评法批儒”的，其他的少说。可社员们的“评法批儒”发言，没有一个不被她中途打断，没有一个能按照自己准备的内容说完。

女社员周福兰发言，批判儒家提倡男尊女卑。可是还没容她说上几句，江青就打断她的话，借题发挥起来：“男尊女卑处处存在，我们中央就不合理……他们都是大男子主义，到了掌握政权，都出来了，一把抓。”她叫嚣：“这回要改变。”“女的要超过男的。”显然，她说的“这回”，指的是正在筹备的四届全国人大关于国务院领导的人事安排，其篡党夺权的野心毕露无遗。

接着，江青攻击的矛头就更直接了，她问周福兰叫什么名字？周福兰告诉了她，江青喊道：“是周公的周，还是周礼的周？”周福兰莫名其妙，说：“就是那个周呗。”江青大声喊道：“我要造你的反！”周福兰吓得一哆嗦。江青接着喊道：“我不是造你的反，是造你名字的反。你的名字太封建了。”她要周福兰“马上改掉这个封建的名字”，说，“你就改成周抵周吧！”随后又改口说：“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个‘周’，克他那个‘周’。”

江青的这些话使人很容易想到她要“克”的是那个“周”。之后，每个社员发言，江青都先给他们改名字。女社员于瑞芳刚报上姓名，江青就说，什么“瑞芳”，去掉那个“瑞”，就叫于芳。女社员王淑贤一说出自己的名字，江青就嚷：“又淑又贤，不行！淑贤两字去掉，就叫王先！”男青年王孝歧是个高中生，事先认真准备了个发言稿，可是刚开始念稿子，江青就忍不住了，喊道：“什么孝歧，孝谁？孝什么？典型的封建意识！这个名字不行！以后你叫王灭孔！”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叫李淑凤，江青把手一挥：“净是什么龙啊凤啊，改！就叫李树风！树立新风！”江青不仅给男女社员改名字，就连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也被她改了名字。她说那个“恭”是温良恭俭让的“恭”，是封建主义的，儒家的思想，要改成“工人阶级的‘工’！学工，向工人阶级学习嘛！”

江青除了随意改社员的的名字之外，还有更让人大跌眼镜的丑行上演。女社员于瑞芳汇报之后，要唱一段京剧样板戏，她要唱的是《红灯

记》中铁梅的一个唱段。刚开口就被江青叫停，她大声喊道：“你们知道吗？所有样板戏统统是我搞的！”转脸又喊随行的一位闻名全国的演李玉和的京剧男演员，“你来和她一起唱”！说着递给他一杯水，那位演员接过来昂首挺胸一饮而尽，丢下杯子，高喊一声：“谢谢妈！”接着就唱起来：“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本来这是戏中的叫板道白和唱词，可是在这种场合，经过江青与他的如此“配合”，给人造成的感觉可就不那么美妙了。当场不少人惊得“瞠目结舌”！事后有人问我此事确否？我说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千真万确！

这样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社员的“评法批儒汇报会”结束，江青说她要 go 去地里参加劳动，与社员一起割麦子。当时正值麦收时节，学校外不远处就有一块麦地，不少社员正在收割小麦。

江青在一伙人的簇拥下来到麦地里，拿过一把镰刀要割小麦。可是她既不会使镰刀，也抓不住麦棵，乱砍几下，一棵麦子也没有割下来。其实她真实的目的并不是割麦，而是让随行的记者照相，老实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不解其意，怕她砍了自己的脚，忙上去帮她，结果挡住了镜头，江青很不高兴，一把推开了他，喊着：“你走开，别尽来帮倒忙！”

当时，在宝坻县有两位全国闻名的下乡、回乡女知识青年，一位叫侯隽，一位叫邢燕子。天津市委和宝坻县委把她们俩叫来见江青。在麦地里，有人把两人带到江青面前，江青为了表示对两人的亲热，说，我早就熟悉你们俩了，一直想念着你们啊！然后就从头上摘下一顶白草帽，说，今天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这顶草帽是我1942年从延安撤退，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时，从延安带出来的。多年来南征北战，一直跟随我。今天我送给你们俩做个纪念。

听了这话，我们一个个面面相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说的是真话吗？看那顶草帽，虽不知道是不是全新的，但那是一顶很精致的草编织物，颜色雪白，帽顶帽边都十分整齐，一点也没有破损。延安时期是个极为艰苦的年代，会有这样高档精致的草帽吗？即使有，从延安撤退，一路辗转，战火硝烟，30余年过去了，还能保持如此崭新吗？再说，一顶草帽送给两个人，谁来戴呢？这不是在演戏吗？！

赠毕草帽，江青向大队干部要一顶当地农民戴的那种芦苇秸编的“蘑菇帽”，她说她很喜欢农民的帽子，其实是想戴上照相。可是接过王作山送来的那顶农民戴过的“蘑菇帽”之后，见上面满是汗渍，便不往头上戴，借口说“太小了，我不能戴”。接着又埋怨起侯隽说，你下地来也不戴个草帽？我看你也变成个小官僚了！

新的“蘑菇帽”还没买回来，江青已离开麦地，要到场院上“打场”去了。在场院上，有人给她一把翻麦子的木杈，她扬了扬，让人照相。照完相转身又看见场上正晒着新打下的小麦，便说，这麦子多好呀！我要把你们的劳动果实带回去给毛主席尝尝。社员们忙去找了干净的口袋，装上10多斤小麦……

江青在场院上转了一圈，就宣布“收麦劳动”结束。她要吃午饭了。这时，天津宾馆的工作人员早已在小学校里准备好了午餐。面包、菜、饮水和碗筷等用具都是从市里运来的。女服务员一律白衣黑裙，也全是天津宾馆里来的。江青等人在一间教室里摆开餐桌，我们和工作人员便在院里树荫下吃饭。

午餐之后，江青要午休，说是要到社员家里去“同住”，村里事先已接到通知，早已选定大队会计王启恩家作为她的午休之处。王家人口少，房子宽敞，环境也较干净。县里村里前一天已派人帮王家来了个彻底大扫除。当天上午，天津宾馆的服务员又重新扫过大炕，屋里屋外全消了毒，炕上铺上宾馆的被褥枕头，服务员还用带来的深色窗帘遮住王家前后窗户。王家和前后左右邻居养的狗和鸡鸭全被捉住送到别处暂管，以免发出叫声惊扰江青午休。江青进去后，王家几口人全走出来在院子里等候。大队干部午饭也没吃，轮流在王家院门口为江青站岗放哨。这就是江青的与农民“同住”！

语重心长：纪登奎有胆有识

作为记者，那天中午我只吃了一块面包，就忙起来，生怕漏掉重要活动。我跑到小学校里，只见迟群、刘庆棠等人正围着桌子起劲地甩扑克，

没有一个人肯到村里走走，看看农村农家生活，去和农民说句话。只有同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没有午休，也没去打牌，他把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找来，两人蹲在村头小树林里说话。王作山忙了一上午，情绪兴奋又紧张，满头大汗，也没工夫回家吃午饭。纪登奎说，我知道你没吃上饭，给你拿来个面包，还有西瓜，先垫垫吧！见我来了，纪登奎说，记者同志也坐坐吧，咱们随便聊聊。那个中午，他们大概聊了一个多钟头。先是王作山详细汇报了大队的生产情况，纪登奎也说了不少话。印象最深刻的是：今后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了。你们的确有很多优点、长处。可作为农村，不管是谁的点，今后主要任务还是种好地。要踏踏实实学好大寨经验，继续兴修水利，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发展生产。还说，生产上光种粮食不行，除了大蒜，可否种点棉花？搞好生产，发展经济，这是农村工作的根本。生产搞不上去，农民没饭吃，一切便无从谈起。

天津一行，使我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纪登奎。这次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是这个中午他与王作山语重心长地谈话；二是我听天津的同志说：1974年6月19日那天，江青在全市“评法批儒”大会上大放厥词之后，曾让纪登奎讲话，他当时只讲了短短的几句，大意是：毛主席曾经批评一些人不学中国历史，不知道自己的祖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的历史知识很少，但我不是毛主席批评的那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人。我是深以为耻的！今后要努力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大家一起努力学习历史知识。

在那样的特殊年月里，那样的场合，当着不可一世的江青，他不投其所好，却讲出这样的一番话，应当说是胆识的！

说到这里，还有一段有关纪登奎与小靳庄颇为有趣的插曲，不妨在此一说。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参加了一次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有一天我刚吃完饭从食堂走出来，回头一看，见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与纪登奎并肩走来。吴象见到我，就喊道，快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纪登奎，现在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

自从被罢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纪登奎已经几年未曾公开露面。不久前中央刚分配他这项新的工作，这是他第一次以研究员的身份参加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我上前与之握手、问候，回过头来，吴象又要向他介绍我。可没等吴象开口，纪登奎就打断了他，说：“你先别说，这位我认识，肯定认识！我们一块工作过。你让我想想……”他拍着脑袋，苦苦思索，却一时想不出来。我忙上前对他说：“是在小靳庄。”他一听，使劲一拍大腿，哈哈大笑：“对了，对了！咱们在小靳庄一起工作过！你是新华社的，那天你们去了两位同志，那一位也是个年轻人，个子不矮。”人们都说纪登奎没有官架子，记忆力特强。这次真的见识了。我说：“你说得对，记得准！”

纪登奎哈哈笑着，拉起我的手，若有所思，走了几步，对我说道，那次在天津，江青简直是猖狂之极！在小靳庄又闹了个一塌糊涂！

我说，是的，那天你与他们截然不同。

纪登奎看了看吴象，又看了看我，说：“老陈，你说说那天的情况，说说我那天的表现怎么样？”

我想起当年的情景，尤其是树荫下他与王作山的谈话，由衷地说：“我很佩服那天你的谈话。江青他们在丑恶表演，搞阴谋。而你对王作山说了许多知心话，语重心长！”

纪登奎高兴地笑着，天真地像个孩童。

1975年6月22日下午3时许，江青睡了两个小时后起床，乘车离开了小靳庄。至此，江青一访小靳庄的闹剧落幕。

但这场连续剧还没有结束。这年9月，江青陪着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二下小靳庄，又有许多丑恶表演，还弄出一种不土不洋的大袍子“江青服”，一下子成了许多城市里时髦女性的“时装”。1976年9月，毛泽东病重期间，江青又率领一帮亲信，三下小靳庄，猖狂进行反党活动，又演出许多丑行。不过，后两次我都不在现场，虽有耳闻，没有亲见，期望现场亲见的人也能写出来。

我所了解的陈伯达

杨 波

“文化大革命”前，陈伯达曾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国家计委研究室，而我当时任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所以在工作和生活中与陈伯达交往颇多，对其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所作所为和为人处世的情况甚为了解。

不愧是“老夫子”

全国解放后，我读了陈伯达撰写的《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后，知道他是个理论家。那时候，很多同志尊称他为“陈夫子”，我对他也颇为敬仰。

我第一次跟陈伯达面对面交谈，是在1959年。1959年庐山会议后，为配合全国正在掀起的“反右倾”斗争，时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的陈伯达要写一篇驳斥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评论文章，他要国家统计局提供资料。我当时任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司长，局领导要我负责这件事。我认真整理了1958年的资料，然后到红旗杂志社陈伯达的办公室，向他当面汇报。眼前的陈伯达，个头矮小，面无表情，戴副黑框大眼镜，操一口浓重的闽南口音，说话让人很难听懂。他和我谈了谈写文章的事情，向我详细了解了相关数据和资料。同时由他口述、红旗杂志社的编辑记录并整理成一篇社论稿，我负责校对文中的统计数字。此社论1959年9月发表

在《红旗》第18期上，题目是《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谬论》。应当说，由于受浮夸风的影响，1958年的统计数字有很大的水分，不准确，不能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陈伯达以此为根据，认为“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是谬论，当然不可避免地颠倒是非。

我和陈伯达真正深入接触是从1961年开始的。1961年初，毛泽东主席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领一个小组，到农村调查农业政策问题。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分别为广东组、浙江组、湖南组组长。毛主席亲自写了调查计划，每个组多少人，什么人参加，主要做些什么工作，都规定了。我跟随胡乔木参加了湖南的调查工作。从1961年1月到2月中旬，我们吃住在农村，调查走访了一个半月，了解人民公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之后各组组长集中到广州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由毛主席主持，讨论拟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人民公社60条》）的第一次草案。会后，每个组都带着草案回到调查地点，去征集群众的意见。这时候，刘少奇同志也回到湖南老家，亲自指导并参加了调查组对草案意见的征集工作。刘少奇提出，农村的问题不只是农业问题，还有手工业和商业问题。于是，我被抽调出来专门做手工业和商业问题调查，还就此当面向刘少奇作了两次汇报。

1961年5月下旬，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我们各个调查组回到北京。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修改《人民公社60条》，同时拟定手工业和商业的政策文件。由于我在湖南参加了这方面的调查，所以通知我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参与手工业、商业条例的起草。条例起草本来由胡乔木主持，因他生病需要休息，就改由陈伯达主持。这个时候，我和陈伯达的工作接触开始多起来，经常参加他主持的讨论、修改条例草案的会议，并最终形成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40条》）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35条》）。这期间我感觉陈伯达文字功底很深，对于文章结构、遣词造句等很有讲究，不愧是“老夫子”。他经常引用韩愈的一句话“唯陈言之务去”，意思就是不要说那些没有新意的话，不要陈词滥调。他写文件喜欢用短句，不用拗口难懂的长句，这样读起来简洁有力，

易于理解。这些都给我印象很深，觉得值得自己学习。

这次一起工作后，陈伯达对我有了一定的印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他去唐山调查工业发展情况，就向国家统计局提出要我陪同前去。在唐山调查时，工作之余，他常铺纸研墨练习书法。我素喜书画，见他的字写得自成一家，颇见功力，就趁他兴致高时要了一幅，留做纪念，但他给我的字没有盖章。我后来才知道，他有个习惯，送人的字从不当场盖章，只有别人装裱好了拿去给他看，他才会盖上自己的名章。为什么这样做？这是他考验要字者是否尊重他，是否真的喜欢他的书法。从这里也透露出陈伯达这个人城府极深，很有心机。

两次状告李富春

1961年底，中央办公厅新成立一个经济组，我被调去工作。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分管经济工作，我们这个经济组主要是为他服务的。经济组成立之后，第一项任务就是为即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起草文件做准备，并一起参加会务工作。这次大会的召开，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刘少奇作了工作报告，毛主席就“民主集中制”问题发表了讲话，周恩来总理就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做了部署。

通过贯彻大会精神，1962年上半年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就，特别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工作，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成绩尤为显著。当年七八月间，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首先讨论了《人民公社60条》的修改完善问题，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按照原定议程，接下来要讨论财贸工作和计划问题。8月6日，毛主席在全体大会上作“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就大变，没有再讨论经济问题，而是转到讨论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为接下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做思想准备。8月9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中心组会议上讲反对分散主义，说有的经济部门的同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汇报，四时八节，强

迫签字。毛主席说的“有的经济部门”，其中就包括国家计委。

会议结束后，8月24日，陈伯达突然找到他在北戴河的住处。他知道毛主席对李富春主持的计划工作不满意，就口述了几条改革计划工作的意见（以下称《意见》），让我记录下来，并当场修改定稿，要我重新抄清后送给李富春。我当时有些为难，向他提出：你们都是中央领导，富春同志就住在你隔壁，希望你亲自找富春同志谈谈，我去不合适。陈伯达说：“你去你去，我家乡口音太重，说话富春同志听不懂……”他为自己找了诸如此类的一堆借口。无奈，我只好带着《意见》去李富春在北戴河的住所。到了那里一看，李富春已经回北京了。于是我立即乘火车返回北京，下了火车直接坐车赶往中南海李富春家。李富春和蔡畅大姐正在吃晚饭，我把《意见》拿给他看。《意见》的全文我已记不清了，但有一句很尖刻的话我是记得的，意思是计划工作的改革要下重药，只抹“二百二”（红药水的俗称）、紫药水是不行的。李富春看后，觉得此事来得突然，问我怎么办。我建议他赶紧批示，印发中央领导同志。李富春考虑后即批示印送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我把他的批示送到中办秘书局，准备第二天一早发出。

到了第二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李富春一起床就发现，毛主席已经对同样的一份文件作出批示，并印发出来。原来，陈伯达在要我去给李富春送文件的同时，自己又抄录一份直接报送了毛主席，毛主席当天就作了批示。陈伯达的这种做法，等于暗地里向毛主席告了李富春一状，不是与人为善。李富春接到毛主席的批示，立即找来经济组组长梅行、房维中和我，商量给毛主席写一份检讨。遵照李富春的意见，着重检讨了计划体制和计划工作方法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一套，没有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及时改革。我们三人边商量边起草，边起草边修改，足足用了一整天，才拿出一份检讨稿。李富春审定修改后，亲笔写信报送给毛主席。从这件事开始，我对陈伯达的印象完全改变了。

由于写了这份意见，陈伯达于1962年底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他从来没有管过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怎么当国家计委副主任呢？让他具体负责什么工作好呢？李富春和周总理商量，决定专门设立一个研究室，

让陈伯达分管。李富春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为人非常厚道，对陈伯达的这种行为，竟然不多计较，实在令人钦佩。

国家计委过去有个研究室，“大跃进”的时候因精简机构被撤销，可为了安置陈伯达，又重新恢复起来。谁来当研究室的领导呢？李富春提出把我调去担任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直接归陈伯达领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找我谈话，告诉我组织上的这一决定。一听这话，我立即想到陈伯达状告李富春的事，从心底里不愿和他共事，于是向田家英表示还是想留在中办经济组。田家英说：“我也不愿意放你走啊，你有意见可以找尚昆同志反映。”于是我就找了中办主任杨尚昆，表示想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不想去国家计委。杨尚昆告诉我说这是富春同志的意见，并把李富春写的调我的纸条给我看了，这时我只好尊重这个意见。但我还是不死心，又找国家计委负责干部管理工作的王光伟副主任，他告诉我不要再提意见了，说这是周总理亲自决定的，于是我只好服从了。

1963年初，我担任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开始了在陈伯达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日子。当时研究室共有五六位干部，主要负责收集资料，做些调查工作。陈伯达也并不过问太多。

陈伯达这位副主任，既不管国家计委的工作，也不参加计委的会议，他有意见也不同李富春交谈，而是处心积虑寻找机会继续打他的“小报告”。1964年8月，他认为“气候”适宜，于是又就计划工作方法问题口述了一个《意见》，让我记录整理，然后将《意见》送给李富春，同时又直接送交毛主席批示。这份《意见》讲了在工业中采用新技术，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要从实现社会主义的新工业革命、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来看待这个问题，要从全局着想，抓住要点；讲了三线建设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赶快抓，改变拖拖沓沓的作风。他说如果不这样做，不赶快抓，我们就会犯大错误。陈伯达所提的这些意见，毛主席已多次当面同李富春说过，国家计委也在努力改进，三线建设部署正在积极进行，对此陈伯达都是知道的。但是陈伯达又把这些作为严重问题提出来，显然是别有用心。8月26日陈伯达把《意见》呈毛主席，27日毛主席作了批示，措辞比上次更为严厉，肯定陈伯达的意见，提出“计划工

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

据我所知，李富春是有苦衷的。他作为国家计委主任，必须量力而行，要考虑综合平衡，这也是陈云同志的一贯思想。他主持制定“三五”计划时，计划方法已有改进，强调要解决吃、穿、用，已经不是先定多少钢、再定其他指标了。三线建设是毛主席新提出的战略任务，涉及“三五”计划原定任务的调整，也关系一线部分工厂的搬迁和新的工业布局，需要统筹安排，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太急了不行。陈伯达不考虑这些，再次“告状”，使李富春又一次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并再次写信给毛主席检讨自己的问题。此后不久，1964年底中央决定调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到国家计委任第一副主任，协助李富春工作；同时改组国家计委的领导班子，几位副主任调到各大区任职；调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林乎加，国家建筑工程部部长李人俊，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贾庭三到国家计委任职，成立以余秋里为主的“小计委”，负责拟定“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研究战略问题。“小计委”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

视田家英为“眼中钉”

1964年初，毛主席要陈伯达代中央起草一个关于工业问题的决定。他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干干停停，停停干干，先后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调查。在调查中他经常讲列宁的一句名言：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陈伯达认为，现在已过了电气化的时代，是电子化的时代。所以，他起草的文件要以电子工业为中心。

在这两年时间里，陈伯达常常和我说起田家英，说了很多贬低、诋毁田家英的话。陈伯达对我说，是他将田家英推荐给毛主席当秘书的（实际上田家英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主要是胡乔木推荐的，当然陈伯达也起了一些作用），而现在他“翅膀硬了，羽毛丰满了，不搭理我了”。还说自己现在想见毛主席一面，还得通过田家英，田家英不同意他就见不到

毛主席，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我开始还耐着性子听他发牢骚，后来就建议他找田家英当面交换意见，不要在我面前如此议论。有时实在忍不住了，就替田家英打抱不平，说田家英不是那样的人，也不可能作出那样的事，让他不要误会。有一次他又说田家英的问题，我就说他怎么能不让你见毛主席呢？结果陈伯达勃然大怒，对我拍起了桌子，质问：“田家英给了你什么好处，你总替他说话？”我说，我1960年才认识田家英，他没有给我什么好处，我调来中央办公厅在他领导下工作，认为他是一位很正派的同志，不是你所说的那种人。听我这样说，陈伯达自然很不高兴。但是没想到，陈伯达对此怀恨在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加害于我。

1965年上半年，陈伯达负责起草的关于工业问题的决定稿终于写出来了，共计1万多字，送给毛主席后，主席很长时间没有批示。由于担心、焦虑，陈伯达的情绪很不稳定，经常莫名其妙地发脾气。1965年9月的一天，毛主席要找陈伯达谈话，不巧这一天陈伯达去天津了，没有谈成。后来，彭真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说“主席看了，说不像个中央决定，倒像教科书”。这等于批评了陈伯达。这时候，陈伯达不住在中南海里，而是搬出去住在中南海外西南角新建胡同的一处寓所。他得知毛主席的意见以后，情绪非常低落，把我找去，说了这件事。我听后，建议他找邓小平谈谈，他摇摇头，说了四个字：“人微言轻”。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敢待在屋里，而是把我拉到院子里悄声言语，原因是怕屋里有窃听器。这是“莫须有”的事，但可以看出陈伯达疑心特重。

当年12月初，毛主席把陈伯达叫到杭州，和胡绳、田家英、艾思奇等一起研究为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的事。我当时随国家计委的几位负责同志去西北、西南地区了解三线建设的情况，大概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当我回到成都时，陈伯达的秘书从杭州打电话给我，让我不要回京，就留在成都过春节，因为毛主席要陈伯达去看看三线建设情况，接触一下实际工作。陈伯达春节后到了成都，我陪他去西昌、攀枝花再回到成都、德阳等地视察，然后去重庆，看了20多天。从重庆坐船过三峡的路上，他又愤愤不平地讲起田家英，说田家英“没有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应下放到农村人民公社去改造”。这次的口气跟以往相比更加严厉，我听后吃了一惊，不禁为田家英暗暗担心。

陈伯达嫉妒心很强。谁在毛主席那里做出工作成绩，谁为中央起草过好文件，他都怀恨在心，总要设法排斥、打击。对此，胡乔木感触很深，曾说过一句亲身体会的话：“谁在毛主席那里做了一件事，就好像在他陈伯达身上挖了一块肉一样。”田家英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重用，从而也就成了陈伯达的“眼中钉”。

这里我再讲一件买字画的事，也可以看出陈伯达的为人。陈、田二人都喜欢收藏旧书画，每到一地都愿在工作之余去逛字画店。田家英不收藏画，专门收集古人书法，尤其喜爱清人翰墨，有人赞誉田家英收藏的清人翰墨为“海内第一家”。1961年，田家英在杭州一家旧书画店看中了清朝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一幅中堂，当即决定购买，但没有当场拿走，仍然留在店里挂了一段时间。后来陈伯达来杭州，也看上了这幅中堂，也要买，店家告知“田家英已经订购了”。陈伯达很生气，觉得是田家英抢了自己的心头爱物，一直怀恨在心。他对我说这件事时，还说田家英霸道。

三线建设考察结束后，陈伯达听说毛主席在武汉，就带着我从重庆赶往武汉。到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告知毛主席当晚要去长沙，没空见他，于是他就乘坐毛主席专列一起去长沙。我也跟着上了毛主席的专列。到了长沙，陈伯达没有立即得到毛主席的接见。有一天，毛主席要见他，他却去了韶山参观。等他回来，毛主席已有别的安排，没有理他。过了两天，毛主席乘车去了上海。随后，陈伯达也坐飞机去了上海。临走前，他对我说：“你回去跟余秋里同志说一下，研究室的事情我不再管了。”很快，他在上海跟江青、张春桥等为伍，专心为“文化大革命”做起了筹备。

我听到陈伯达说不再管国家计委的工作，想到以后不用再忍受他的虚伪做派了，心里很高兴。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我就去看望田家英，把陈伯达说的话跟他讲了。我对田家英说：“‘老夫子’说要把你下放到农村人民公社改造，你要注意提防。”当时，田家英正在编《毛泽东选

集》第五卷，听了微微一笑，也没太当回事，只是告诉我他和陈伯达打交道的一些往事，并谈了对陈伯达本质的认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我和田家英的最后一次见面。一个多月后，“文化大革命”风暴初起，《五一六通知》还没发，田家英就受到陈伯达、江青一伙的迫害，含冤离开人世。田家英曾同他夫人董边说：“我是江青、陈伯达诬害的，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

罗织罪状，欲置我于死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授意下，我很快被点名批斗。1966年6月30日，中央办公厅的造反组织贴出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田家英的高级情报员——杨波》，这也是整个国家计委的第一张大字报。那天是星期六，中午我刚从八一湖游泳回来，正在办公室看报纸，突然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越来越近，是国家经委的一些人把大字报给我送上门来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陈伯达授意写的，我已离开中央办公厅三年半，他们并不了解我，也不清楚我在国家计委工作，把大字报送到了国家经委，经委的造反派又送了过来。我被挂上“反党分子”的牌子，从五楼的办公室一层一层往上批斗，一直“斗”到九楼楼顶。我站在垒起来的三层桌子上挨斗，周围群众口号喊得震天响，要我交代反党事实。我说没什么好交代的，坚决不承认“反党分子”这顶帽子。正巧那天我的夫人谢映岚晚饭后带着孩子去看电影了，不知道机关里发生的一切。直到有人告诉她：“你还看电影，你家老杨正在挨斗呢！”她才匆忙赶回家。7点钟以后我回到家里，她晚饭也没吃，只是生闷气。

我的“罪名”越来越多，不断受到批斗，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要我交代散布了哪些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流言蜚语。我睡眠不好，有吃安眠药的习惯，那段时间，谢映岚怕我想不开，偷偷地把安眠药都收起来了。我对她说：“你放心，我不会走那条路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田家英去世的消息。

这期间，我亲眼看到陈伯达的汽车停在国家计委大院里，知道他是来看我的大字报，同时与计委负责同志谈审查我的问题。其实，一开始我就明白，是他授意批斗我，要封我的口，怕我揭发他的问题。这是他整人的一贯伎俩。我熟悉的马列主义研究院（陈伯达兼任院长）秘书长柴沫，是田家英的好友，也知道陈伯达的一些底细，“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被陈伯达点名批斗，不久含冤离世。

过了一些时间，陈伯达的秘书来国家计委找我，要收回陈伯达曾经写给我的字。陈伯达先后为我写过五六幅字，我都装裱好收起来了，也盖了他的章。我当时活动受管制，传达室派人把我叫了出去。陈伯达的秘书说：“伯达同志讲，他给你写过几幅字，现在有人要看这些字，要我来取回给他们看。”我一听就知道是假话，很生气，也不想留他的字，就回家找出来给了他。过了一个多月，他的秘书又来了，拿给我100块钱，说：那几幅字拿回去，别人看了很好，就留下了，收不回来了。伯达同志说你孩子多，工资也不高，所以要付给你裱画的费用。我说：“我现在工资没有扣，这点钱还出得起，你转告伯达同志，以后方便的时候再给我写几幅字就可以了，钱我不收。”其实我很明白，他是想用小恩小惠封我的口，这只能让我更加厌恶他的虚伪。没过几天，他又派秘书来了：“伯达同志说，还送过你一幅字，你上次没给，要我来取回。”我一想，的确有这么一幅字，上面写着“实事求是”四个字，那是他自己写了装裱好挂在家里墙上，有一天主动送给我的。没想到他心细如发，连这都记得。于是，我回家找出来给他秘书带走了。陈伯达两次派秘书向我收字，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挨批斗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69年初。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没有批斗出陈伯达所要的能置我于死地的材料。但陈伯达仍不死心，还要继续管制我。感谢周恩来总理，他在1969年春节期间接见国家计委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时，询问了我的情况，并说：“杨波还可以工作吧！”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使进驻国家计委的军代表不久就允许我自由行动，随后通知我参加了机关办的“学习班”（当时这是“解放”干部的一部曲），并于1969年8月13日得到“解放”。接着就下放到国家计委湖北五七干校去劳

动，直到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以后，我才有了重新工作的机会。

虚伪的“小小老百姓”

陈伯达到处口口声声说他是“小小老百姓”，其实他骨子里是把自己放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谁也得罪不起他。他刚愎自用，却喜欢摆出一副民主开明的面孔。每次开调查会他讲话后，总要问我有什么意见，开始时我还不明白他的为人，就按照我一贯心直口快的性格，常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但很快我发现，不管你说什么，有没有道理，他都根本不予考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后来我就再也不提什么意见了。他也知道我这个人不怎么听人摆布，所以对我渐渐地有所忌惮。

陈伯达的虚伪还表现在另一件小事上，他在北京逛琉璃厂，常常不坐自己的专车，而是打电话让我从国家计委要车带他去。我开始还不理解，后来明白了这是他的伪装和心计。

对于陈伯达的种种行径，我和很多同志当时就十分看不惯，认为这种李林甫式的人物藏在毛主席身边很危险，但我坚信毛主席迟早会察觉并揭穿他的真面目。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很快，1970年，他在庐山会议上被毛主席点名批判，后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 如何迫害林枫的

梁红伍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对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进行了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我在中央党校做落实政策和清查工作时，曾查阅、收集和整理了有关“康生问题”的资料，写出多份材料，上报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转呈中央。本文就是依据当时的相关资料写成的。

康生指使中央高级党校 “造反派”打倒林枫

“文化大革命”伊始，康生就下手整林枫。1966年6月20日，康生严厉指责林枫在中央高级党校“镇压革命群众”，同时还警告他说，“你要准备，有人提你在东北反对林彪同志的问题，犯了路线错误”。6月29日，他还在党校校委（即党委）会议上，再次指责林枫“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

受到康生来校和讲话的鼓励，7月10日，党校的一名年轻学员贴出诬蔑林枫“反对毛泽东思想”等“十大罪状”的大字报。8月13日，康生接见了大字报的作者以及另一名写过“炮轰黑校委”大字报的青年干部（后

成为党校“造反派”的主要负责人)，鼓励他们“坚持和林枫黑帮进行斗争”。第二天，两人按照康生的“指示精神”，贴出大字报，说“以林枫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的末日到了”，并“呼吁全校革命同志向林枫黑帮猛攻”。这样，校内一夜之间贴出许多“炮轰林枫黑帮”的大字报。康生立即表示：“我欢迎、支持同志们的革命精神、革命态度。”8月16日，康生有一个针对林枫的批语在党校宣读：“你们应当彻底揭发、严肃批判这种压制民主不准革命的严重错误。”坐镇党校的曹轶欧还特别提醒：“要体会康老为什么写信给‘高级党校师生员工大会’。”曹的言外之意很明白，就是要党校群众以“师生员工大会”的形式取代党校校委，“夺林枫的权”。

8月19日，“造反派”指使一些人在校委召开的全校大会上，突然跳上主席台把林枫等人轰下来，给林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在校园内游斗，进行人身侮辱。当晚，康生就接见了“造反派”的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党校斗争发展这么快，乱了就可以治。戴高帽子没关系，轻得很！”又说，“林枫的问题并没有彻底揭露，没搞深，没搞透，有许多问题根本没有提到。不光包括党校的问题，还有在东北反对林彪同志的问题。”第二天，在全校批斗林枫的大会上，又传达了康生的“电话指示”：“我完全支持革命同志们的革命热情。要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挖深挖透”；“要文斗，不要武斗。当然，戴高帽子、挂牌子不算武斗”。康生的这个“指示”是公开支持对林枫进行变相武斗和人身侮辱，而“戴高帽子、挂牌子不算武斗”这句话，则立即传遍全国，影响极其恶劣。

8月28日和30日，康生两次亲自跑到中央党校召开座谈会。他在总结讲话中居然说“党校是长期抗拒、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又大、又深、又厚”，“是有一条黑线联系着的”。这实际上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解放初期刘少奇曾兼任中央马列学院院长，而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正是马列学院。康生这样讲，是有意把林枫的所谓“问题”与刘少奇联系在一起。之后，看到林枫依然“不肯认错”的“顽固态度”，康生又多次指示党校“要开林枫的大会”，“向中央提罢林枫官的问题”。

9月19日至21日，在康生的多次催促下，由取代党校校委、以“造反派”为主的“联席会议”，连续3天组织大会批斗林枫。面对那些揭发和批判的不实之词，林枫一一作了有力的回击。他的强硬表现，使康生等人十分恼火。12月10日，康生对党校“造反派”负责人讲，“林彪同志说，反正这个人（指林枫）是彭真的死党”，再次催促党校“用签名的办法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林枫停职反省”，并具体授意“罢林枫官”的“四条理由”。康生还告诉他们，“后天在体育馆开大会，先斗彭真市委一批，第二批斗陆定一、林枫等人”，要他们“搞点票去参加”，“要准备斗林枫、贾震（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12月14日，康生派人将林枫押送到首都体育馆批斗大会现场。林枫不愧是条硬汉子，他拒不低头弯腰下跪，遭到几个“红卫兵”的暴打，造成重伤，当场昏迷不醒。不久，林枫被送到北京卫戍区关押。

12月23日，中央批发了康生指使党校以“斗争林枫大会”名义要求撤销林枫校长职务的报告。紧接着，康生派人与党校“造反派”一起，用两天时间抄了林枫的家，不仅翻箱倒柜查找所谓“林枫的黑材料”，而且乘机将家中财物实行掠夺性“查抄”，将所有贵重物品全部装车拉走。

这样，“文化大革命”开始短短几个月，林枫就被“彻底打倒”、“扫地出门”了。

康生通过“专案审查”诬陷迫害林枫

康生是“林枫专案组”的策划者、组织者和直接指挥者。他在1966年9月21日接见党校“联席会议”代表时，一方面具体布置“如何开小会批斗林枫”，另一方面则提出要成立“林枫专案组”。随后，在中央“彭真专案组”之下设立了一个“林枫专案组”，人员从起初的8人发展到后来的24人。1968年2月，康生指令“党校也成立一个林枫专案组”，作为中央“林枫专案组”的“外围组织”。

“林枫专案组”成立之后，康生便有计划、有步骤地捏造“罪状”，进行诬陷迫害林枫的活动。1966年11月至1967年5月，康生指使专案组先

后向中央政治局报送了诬陷林枫“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伪造历史，参加共产党是假、加入国民党是真”等4份“罪行报告”。此后，他一再强调“林枫的案子”要“集中精力，突破重点，重点是政治历史问题”，“党校要抽一些人协同搞林枫问题”。

1968年2月14日，专案组在给康生的报告中说：“九个月来，通过调查、审讯查清了林枫长期伪造历史、是个真国民党、假共产党的问题。但对他的其他政治历史问题，案情进展缓慢。”康生在“案情进展缓慢”底下画了一杠，批道：“应在党校组织专案组大力进行外地调查工作，查阅敌伪档案工作也要抓紧进行。”他对办案人员说：“×××（专案组负责人）的专案没有深入，进展也不那么快。譬如，林枫到底是什么东西，这要作出结论。”他有意引导专案组把“林枫的问题”和“刘少奇的问题”直接挂上钩。他说：“林枫是假共产党员，进一步怎么样？因为他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人，在国民党里到处跑。”在康生的不断点拨和鼓动下，专案组加强了“斗争火力”，对林枫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会式的审讯”和“逼供信”活动。而在康生捕风捉影、诱供指供下制造出的“林枫保存刘少奇四万元特务经费”的假案，则是这种“逼供信”行为中最突出、最典型的事例。

1968年3月9日，专案组在给康生的报告中写道，林枫谈到1936年刘少奇曾给他一张汇票，款额四万元，但林枫说不知道钱从何处来，又用到何处去。康生立即将这“四万元问题”与“1936年刘少奇去南京同国民党谈判”一事联系起来，认定这是“国民党给刘少奇的特务活动经费”。两天之后，在事情远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康生急不可耐地将此材料批转中央政治局。同时，他指使办案人员立即审讯林枫夫人郭明秋，明确提出，“今后要通过林枫、郭明秋突击刘少奇的问题”，说要把“四万元问题”作为打开“刘少奇叛徒、特务集团”的“突破口”。3月30日，康生又急忙将刚得到的逼供诱供材料上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同日，林彪和康生下令“正式逮捕”林枫，关进秦城监狱。第二天，康生再次将一份诱供材料上报毛泽东和政治局。

4月18日至26日，按照康生的指示，专案组人员到秦城监狱对林枫连

续进行“突击审讯”，逼迫他承认“参与了内奸刘少奇勾结蒋介石的阴谋活动”，交代“四万元的来历和用场”。林枫此时已经看穿康生的险恶用心，始终一言不发，以沉默和怒视进行顽强抗争。

就在对林枫进行“突击审讯”的同时，专案组在天津银行的档案中查出连名连号的4张存折卡片，每张金额1万元，署名分别为“王德仁”、“王德义”、“王德礼”、“王德智”。康生如获至宝，说“林枫四万元问题”是刘少奇“这个大叛徒集团的一个大突破口”。1968年5月6日，康生在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负责人时更加得意地说：“从口供中找证据，用证据来证实口供。例如四万块钱问题，去年林枫隐约讲过，但专案组没有重视，抓晚了。林枫好像装糊涂，我说要抓紧，可以问郭明秋。但又发生另一个问题，到底可信不可信？从口供中发现刘少奇一个大问题，但口供确实不确实？你们去调查。用了4张卡片，一下就落实了！”他又说，“这个问题是个大成绩”，“证明刘少奇三六年到南京同蒋介石勾结”。很明显，康生一口咬住“四万元”不放，就是要“证明”存在一个“刘少奇叛徒、特务集团”。

5月16日，康生批示将关于《刘少奇四万元特务活动经费的调查、审讯报告》上报中央，以虚假材料陷害刘少奇和林枫。其后，康生对中央党校“造反派”负责人谈及“四万元问题”时说：“分析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四万元问题，开始说宋子文给的，报到主席那里，主席说不合乎道理。后来又说陈立夫给的，合道理，但要有证据。”可见，毛泽东当时就指出这种事情“不合乎道理”，但康生并未就此罢手。

后来，专案组查明“四张卡片”是东北军一个师长王南屏的小老婆盖淑勤的存折，同时又从中央档案馆查清那四万元是张闻天交给刘少奇的款项。专案组负责人经过思想斗争，才将此事通过康生上报毛泽东。

“四万元问题”真相大白之后，康生气急败坏，持续在“林枫专案组”中进行反“右倾”活动。为了使审讯人员在林枫面前“站稳立场”，1970年2月，康生开始在专案组大搞“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的“三查活动”，要求人人检查“右倾思想”，组织学习“彭真专案组”的“经验”，其中重要一条是“敢不敢把审查对象当作阶级敌人”。5月初，康生

亲自到专案组作总结讲话，再次批评专案组负责人“右倾”，说他在审讯中“问郭明秋病情如何”、“给吕正操一支烟”是“阶级立场不稳”，要他“深刻检查”，并当场宣布撤销他的组长职务，将“党校林枫专案组”与“中央林枫专案组”合编为“联合专案组”，叫更加听命于他的中央党校军代表×××当组长，由曹轶欧直接抓。

在大搞“四万元问题”的同时，康生还指挥专案组搞所谓林枫等人“以东北桃园三结义为中心，以营救张学良为名进行投敌叛变阴谋活动的罪行”，长时间对林枫等人进行审讯和逼供。从1968年6月19日至7月18日的一个月中，对林枫的审讯竟达28次之多。7月28日康生在专案组关于审讯情况的报告上批示，“此材料颇重要，办案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效果，望继续努力”，还亲笔改写了报告。接着，专案组按照康生改写的报告稿抄报给他，康生遂于8月2日将《林枫营张叛党问题》的材料批报毛泽东和政治局，以新的虚假材料陷害林枫。

在康、曹的指使和压力下，1970年5月，专案组开始审讯林枫所谓“里通苏修、×修的罪行”以及“内奸嫌疑”问题。6月29日，康生将相关材料批转政治局，对林枫进行新一轮政治诬陷，一直持续到1973年。

就这样，在近5年的时间里，康生通过“专案审查”，先后给林枫罗织了“黑帮分子”、“内奸”、“特务”等10多项罪名；捏造了“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里通外国”、“长期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等“罪状”，在政治上将林枫置于死地。

在监狱中折磨摧残林枫

如果说在康生亲自指挥下的政治诬陷和审讯逼供，对林枫的精神造成了无比痛苦的折磨，那么在康生一伙控制的监狱所实行的“法西斯式”虐待，则给林枫的身体造成了致命的摧残。

监狱的牢房阴暗而潮湿，床板离地面不足一尺。每当看守冲洗走廊时，污水就流进牢房。林枫要求将水排出，却无人理睬，连块抹布都不给，他只得把自己的衣袖撕下一块，将地面的污水蘸起来，拧到马桶里，

就这样一点一点把牢房的污水排掉。冬夜寒冷，难以入睡，他就把脊背贴在刚能感觉到温度的暖气片上，熬过漫长的寒夜。由于牢房终年阴冷，他夏天也要穿着棉衣棉裤。衬衣实在太脏了，他只能用一只手（另一条胳膊已被打残）把衣服放在马桶里，淘几次，再放水冲几次，然后晾干。

夹杂着沙子的饭只送到牢门下方一个小洞旁，要自己去取。林枫的腰被打坏，弯不下去，只得爬着去取饭。“提审”常常超过开饭时间，因为没能及时把饭盒放回小洞旁，就不给盛饭，就被饿上一顿。林枫后来说，如果再晚些出监狱，我连取饭的气力都没有了，连饭也吃不上了。他入院体检时，医生问他，“放风时能见到太阳吗”？他回答说：“四年中只见过24小时阳光”。医生噙着泪水，悲愤地摇着头，无声地谴责这种惨无人道的虐待行为。

长期的监牢折磨，致使林枫原有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大大加重，同时又增加了严重的肺病和关节炎。1972年七八月，狱中的林枫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奄奄一息。这年8月，他的6名子女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如实反映父亲的病情。8月13日，毛泽东作出“放他出来治病”的批示，并斥责“过去办案似有逼供信”。这实际上是对康生一伙的严厉批评。但狠毒的康生一伙并不肯罢手，在林枫出狱住进医院后，他们一方面指示专案组要对林枫“继续审查”，另一方面则以新的更加卑劣的方式残害林枫。林枫出狱住进的医院，是由公安机关管辖的病房区，这里的“病房”实际是“变相牢房”。病房不大，四五个人挤在一起，空气恶浊，地面潮湿。更甚的是，竟然把身患重病的林枫列为“轻病号”，指派他给其他重病号端屎倒尿，还不许他对外讲。林枫直到去世前才对老伴郭明秋说出这件事。

1972年12月，阜外医院在上送的《林枫病情报告》中明确写道：“由于各种病之间互相都有影响，且病情又较重、较复杂，随时可能加剧病情恶化而发生危险。”

1977年9月29日，林枫含冤去世，没能等到平反的那一天。

“我信天总会亮”

——康生秘书谈“沙韬事件”

魏小兰

沙韬，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过康生的秘书。沙韬叔叔与我父亲王涛江是30年代在延安时的老相识；在60年代轰动中调部的“沙韬事件”（人称“杀头”事件）中，我父亲也曾帮助过他。因此，他与我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1995年我父亲过世之后，沙韬叔叔曾多次来到我家，向我和我的母亲谈他的经历，特别是历史上所谓的“沙韬事件”。

在我的记忆中，沙韬叔叔虽年事已高，但头脑清楚。他到我家做客时，常向我出具涉及“沙韬事件”的资料和档案，使我对这一事件有了一些了解。下面我将自己从沙韬叔叔及他的亲属、原中调部部长罗青长、我父亲（原中调部副部长）等人那里了解到的“沙韬事件”的大致情况写出，以此纪念沙韬叔叔。

为康生当秘书

1948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副书记的康生，向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李克农提出他需要重新配备一位兼文书、生活服务、安全保卫等工作集于一身的秘书。沙韬由于忠厚、可靠、能干，经李克农推荐，由周恩来批准，于1948年8月至1950年7月担任康生的秘书。

在沙韬给康生当秘书初期，康生对沙韬是满意的。如康生在翻阅沙韬的一份个人鉴定时曾说过，沙韬的优点比他自己列举的要多；康生曾对沙韬的母亲说过，你儿子在我这里工作很好；康生也向李克农表示过对沙韬的好评，说有沙韬在这儿，我很放心等等。甚至有一次，沙韬误拆了曹轶欧给康生的信（沙韬的工作之一即帮助康生处理信件，当时康生、曹轶欧不住在一处——作者注）而得罪了曹轶欧，但康生当时未曾多想什么。当然十几年后，康生翻脸不认人，给沙韬扣上了偷拆信件的帽子，这是后话。

1949年山东分局成立，康生出任山东分局书记。半年以后，他的情绪开始消沉。在沙韬眼里，康生像是得了什么病：只见他有时在屋中走来走去，自说自话，但说的是什么，旁人听不清；有时他卧床发呆，显得心事重重，神情恍惚；在与人交谈时，他也一度有过说话语无伦次的情况。对此，康生身边的大夫却无事可做，苏联专家在为康生查体后也曾说过他无大病。倒是十几年以后曹轶欧讲过的“康生之所以从中央调往山东是由于党内其他人的排斥”这句话，道破了康生得的是什么“病”。原来，康生当时身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按理说在党内的地位，他比饶漱石高，但中央任命饶漱石做了华东局书记，康生仅为山东分局书记，因山东分局有事向中央请示报告前，必先报华东局，这使康生感到自己的地位、权势均低于饶漱石了。为此，康生曾不止一次向饶漱石提出，希望他出面向中央建议把山东分局改成省委，但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这样一来，权势欲逐渐膨胀的康生，将自己在仕途中的某种压抑心理莫名其妙地迁怒于秘书沙韬。由于长期压抑导致的心理扭曲，使康生对沙韬渐渐表现出积怨积恨，并且这种情绪的释放，又是以康生阴险残暴的性格来显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性格耿直的沙韬最终难逃“一劫”。

沙韬自担任康生的秘书后，对康生的照顾可以说无微不至。康生对此不但不感激，反而怀疑沙韬是被派来监视他的。他常常唠唠叨叨地对饶漱石和沙韬说：“我不是特务。”听到沙韬叔叔的这些叙述，我曾好奇地问过他：“康生身为党的高级干部，他毫无原由地对自己的上级与下属总是提及‘我不是特务’，这句话像是有意识地对自己某段历史的‘过

去时’做一个判断。换句话说，像是针对自己曾做过的什么事而去有意识地证实自己，也许这块心结正是康生怀疑他不能得到升迁的原因?!”沙韬叔叔对此也有同感。但当时身为秘书，他的最大职责是照顾康生的工作、生活，对康生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自然无言以对。

1949年8月，为了调整身心，康生到济南休养。之后，又脱离工作岗位易地青岛休养。为了康生的安全，沙韬与当时的青岛市公安局局长商议，对康生住所周围加强了警力。夜间，康生因爱琢磨事经常失眠又有烟瘾，有一次把被子烧了个洞。所以沙韬经常守夜，小心谨慎地陪伴在康生的左右，等康生睡熟了他再去睡。守夜时，沙韬为了避免自己的走动影响康生，经常在门口踱步。对此，康生在十几年后说，沙韬是特务，在监视他。

1950年3月，康生在情绪低潮中迎来了山东省人代会的选举。选举结果，康生拟任省主席的得票数不够。这使康生夫妇极为不满，曹轶欧甚至因承受不了这种“打击”，曾为此神经质地指责“沙韬的背后有人指使”，因而引起沙韬的反感。沙韬认为：既然不被信任何苦再做秘书，便请示调动工作。曹轶欧考虑到康生的身体健康，没有应允。但这件事情过后，康生夫妇对沙韬的言行有了更多的戒备和挑剔。在一次人多的场合，曹轶欧竟然无端地指责沙韬“有政治问题”，但沙韬为顾全大局，没有去反驳什么。我也曾问过沙韬叔叔：这种无声的隐忍是不是对思维方式不正常的人的不屑一顾？沙韬说：伴君如伴虎。

1950年5月，康生又想到杭州去疗养（多年后康生却把自己的杭州之行说成是沙韬等人故意把他带到杭州以害他——作者注）。走之前，康生提出，孙医生、沙韬把他送到杭州后即从杭州返回，秘书工作让曹轶欧的妹妹苏枚来做，但曹轶欧不同意，尤其反对让孙医生离开杭州。康生夫妇为身边工作人员走与留的问题闹得很不愉快。

在杭州时，正巧饶漱石、陈毅等华东局的几位领导有一天来探望康生。事后，沙韬代替康生对几位领导的探望作了回访，并向他们提到：康生想让孙大夫离杭，是否可以让他走？自己对康生的生活情况较熟，为康生着想自愿留下。饶漱石采纳了沙韬的建议，由此一时缓解了康生夫妇

生活中的不和谐气氛。由于有记日记的习惯，沙韬把那天他见到饶漱石的情况特别是他与饶漱石的谈话写在日记中，而十几年后康生得到了这本日记并在此处让人做了修改，以陷害沙韬。

1950年5月至7月，康生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又想回北京了。走之前，康生夫妇为是否带苏枚一起走的问题发生了口角，苏枚与曹轶欧之间也发生了争吵，苏枚为此还哭肿了眼睛。这之后，苏枚的情绪很不稳定，结果发生了苏枚跳楼自杀事件（但未遂）。事发时，沙韬不在现场，是康生身边的警卫人员告诉后才知道出事了，并赶到现场。沙韬到现场后，听康生讲到“苏枚跳楼了”。并看到曹轶欧正把苏枚抱在怀中。于是，沙韬催促赶紧把苏枚送往医院救治，但曹轶欧听到后并没有什么反应。后经沙韬一催再催，曹轶欧才松手。大家把苏枚送到医院，进行抢救。经抢救，苏枚总算保住了性命。沙韬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可以说尽到了一个秘书的责任，按说康生夫妇应感谢他才对，但事后他们颠倒黑白，说沙韬想害死苏枚，于是将苏枚从楼上推下去了。苏枚事件之后，康生夫妇即回京，不久他们住进了北京医院，沙韬也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意，结束了为康生当秘书的生涯。

受政治审查

沙韬结束秘书工作后，于1950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但三个月后，中央军委联络部（中调部前身——作者注）办公室主任杜长天受李克农部长之托，找到沙韬，对他说：曹轶欧已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汇报，说你有关政治问题，要你中断学习。自此，沙韬中断学业，回到原单位，边工作边接受审查。1953年高饶事件发生后，康生把沙韬的“问题”与饶漱石的问题牵扯到一起，由曹轶欧出面公开说沙韬“有政治问题”，饶漱石是沙韬的政治后台，由此沙韬被硬扯进当时的政治漩涡中。

当时，中央出于对康生的尊重，十分重视康生夫妇对沙韬问题的态度。1954年3月，由李克农部长主持，我父亲王涛江等具体运作，开始对沙韬本人和他夫人的情况进行审查。经过派人调查，由我父亲签署了对

沙韬问题的调查报告，大意是：我们掌握了沙韬同志各个历史阶段的历次鉴定材料，据此我们的调查小组可确认，沙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尤其是在恶劣的环境中，表现始终是好的，这一点也已为群众所公认。根据沙韬参加革命后的表现，我们认为他无政治问题。沙韬夫人鱼惠茹同志在党的考验与自己的努力下，1947年入党，参加革命后表现好，政治上也无问题。这份调查报告送给了李克农审阅，李克农又召集中组部、公安部的领导进行研究，大家同意后报告送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审阅、认可了这份报告，并批示说，康生怀疑沙韬有政治问题属他病时所言。经过调查，沙韬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曾在这个调查报告上批示：王涛江包庇刘少奇，替地主、国民党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沙韬辩护等——作者注）。当时对沙韬的审查是采取背对背的方式，沙韬本人对这些情况并不了解，是沙韬家人通过家信向他传递了这些消息。于是，沙韬要求组织上对自己的秘书工作做出一个结论，毛诚副部长便以李部长所说的话，“你没有问题，不用做结论”，肯定地答复了沙韬。尽管如此，在以后的时间里，沙韬仍被所谓的“政治问题”纠缠着。

1955年5月，根据康生的意思，李克农、罗青长、毛诚等人集体同沙韬做了一次面对面的交谈，要沙韬把康生提出的有关“沙韬与饶漱石的问题”谈出来。沙韬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只好把做康生秘书时的情况认真地作了叙述。随后李克农部长表示让沙韬再好好想一想，写出一个文字材料，并强调一定要如实。几天后，沙韬写出文字材料，并送军委联络部领导传看。以后，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建议下，此件一直存档。因对沙韬“背对背”与“面对面”的审查结果都不如康生所愿，康生又委派北京市公安系统的刘涌，直接参与对沙韬的政审，但因原则上公安系统的工作范围不涉及对这类问题的处理，以致搞得刘涌不知如何是好。后由李克农部长出面向刘涌等交底，“沙韬没有问题，没有必要这么做”，以免去了又要无端生出是非。

1955年底，组织决定对沙韬的工作进行调动，这也是康生向组织提出的要求。但由于康生同时强调，沙韬不能留在北京、不能进中央机关及要害部门，部领导无奈，只好将沙韬调往甘肃。当时我父亲（时任干部

局局长)等建议要对沙韬采取保护措施,所以未把康生编造的所谓沙韬“有政治问题”的材料转去。沙韬到甘肃工作后将名字改为张韬,他原名就叫张韬,所以也是恢复本姓。在甘肃工作期间,沙韬的情绪从某种压抑感中解脱,工作起来渐渐感到心境宽松、愉快。

牢狱之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康生趁机培植亲信,纠集造反派势力,给沙韬罗列了“特务”、“罗瑞卿的走狗”等罪名,对他进行迫害。1967年8月上旬,中调部的造反派抄了部干部局的档案室,从保险柜中拿到有关“沙韬问题”的档案,将此交到部造反联络站,联络站的人又将这些文件作为绝密文件送到康生手里。8月17日,沙韬被人强行挟持到其工作单位的一间空屋内,被打得遍体鳞伤,随后被非法关押,失去人身自由长达8年之久。

在沙韬受政治审查及在甘肃工作期间,鉴于他本人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中调部领导遵循对党的干部政治生命负责的原则,对沙韬始终给予保护,从而得罪了康生。1967年8月底,康生召见了中调部罗青长和我父亲等人,用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对他们“训话”,大骂,你们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包庇地主、特务、“三反”分子沙韬。你们是我培养的人(康生当时负责中调部工作,包括干部任免——作者注),却站在我的对立面:刘少奇的批示向我隐瞒,还背着我重用沙韬。我算弄清楚了,你们是修正主义黑线上的人,中调部的领导是反党集团,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当时我父亲实事求是地讲了沙韬的情况,并说“沙韬没有问题”,康生便骂我父亲是“坏人”。为此,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戴高帽、游街、示众、批斗达300多次。尽管如此,以后每当提起“沙韬事件”,我父亲便会这样说:“共产党员不能说假话,瞎编出来的东西硬要我承认,我做不出来,打死我也做不出来。”后来,沙韬叔叔曾对我说过,“你父亲始终坚持‘沙韬政治历史清楚、品质好、没有问题、是好同志’的公道话,尤其是在逆境中。”杨尚昆、罗青长、凌云、毛诚等人也因“沙

韬事件”受到牵连。被“沙韬事件”牵连的人还有安子文、罗瑞卿、谭震林、李克农、习仲勋、黄火青等。

1969年，曹轶欧给康生写报告，把沙韬的问题上挂到刘少奇、杨尚昆、罗瑞卿、安子文、饶漱石等人的问题上，并指出，沙韬的问题也与中调部领导的“问题”有关。这样，沙韬的问题便被定性为属于党的最高领导内部的“反革命叛徒集团”的“阴谋问题”。康生在曹轶欧的报告上做出意思相同的批示，并说中调部领导跟随刘少奇在以往对沙韬问题的处理中，采取了包庇态度，他对中调部将沙韬的职务予以提升的情况（甘肃省组织部副部长）表示不满，还鼓动中调部领导揭露刘少奇等人的问题。康生夫妇背着中央，在甘肃、吉林、中调部设立了三个沙韬专案组，并亲自出马，具体过问专案组的人事任命、工作计划、工作步骤、调查情况的编写等。康生曾授意甘肃的沙韬专案组：一定要“攻下”沙韬。他们强加给沙韬的罪名也越来越多，什么“蓝衣社特务”、“假党员”等。

在狱中，他们还逼迫沙韬反复交代问题，如调任秘书的内幕是什么？与李克农的特殊关系是怎样的？曾接受过李克农所布置的特殊任务是什么？为什么偷拆康生、曹轶欧的信？为什么监视康生？为什么害苏枚？与饶漱石有什么密谋与勾结？罗瑞卿、谭震林如何指使你迫害康生？怎样与山东分局副书记（傅秋涛）一起谋害康生？你要揭发后台刘少奇，等等。他们还按照康生的意志修改沙韬的日记，逼迫沙韬重抄这本已经修改过的日记，想依据被修改过的沙韬日记与笔记的手抄本（如增加了饶漱石与沙韬“密谋对付康生的对话”等等），达到他们落井下石的目的，而沙韬原来的真实日记则石沉大海，直到后来沙韬平反后仍未归还。

康生对沙韬等人的迫害是他20世纪50年代某种心病的彻底暴露与释放：康生对沙韬的怀疑，从客观视角上看，始终是子虚乌有的事，但他始终不能化解以至放弃这种不符合事实的揣测之心，由此转化为一种变态心理，即像我父亲所说：“这桌子上原本没有茶杯，偏偏说这桌子上确实有一个茶杯”，甚至“有时还会把桌子上的杯子说成是茶壶”。

1971年12月至1973年7月，沙韬在狱中曾8次写信给毛泽东，申诉自己

的冤情。当时，他只有一支别人送给他的笔（为此，沙韬在出狱后一直未忘这位好心人——作者注），他只能用报刊的空白处和卫生纸写字。在信中，他曾说：“我的案子很大，为什么扣压，不让您知道？”“他们说我的主要问题已查清，但我的问题先不给定，让我等着；还说，我写什么材料由我，转不转，转给谁不由我，说因为我没有党籍，没权利反映问题”；“他们说不能放我出去，怕我上北京告状”；“他们究竟欲求什么？他们这样做更深的用意是什么？我做交代、做检查已有十几年，我的问题究竟在哪儿？是什么……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有冤不能伸，我冤、冤、冤……”作为西北汉子，沙韬性格中有倔强的一面，他把“近8年的囚徒生涯”看做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面对“康生、曹轶欧专权下的暴行”，他“凭借事实，凭借真理”与之抗争，哪怕把牢底坐穿，也要与“窃居我们党内崇高地位的野心家、阴谋家康曹夫妇”“顽强抗争”（引号内为沙韬语——作者注）。年过半百的沙韬在狱中已不指望自己还能活着出去，但是不把自己的冤情大白于天下，他死不瞑目。正是靠着这种宁死不屈、坚忍不拔的精神，沙韬于1975年5月17日出狱。沙韬叔叔曾对我说：“我有幸活着出狱”，说明“冬天总会过去”。

“我信历史最公平”

1977年10月24日，中央批文：康生、曹轶欧等人制造的张韬案件纯属冤案。经过反复审查，张韬政治历史清楚、无问题。过去强加于张韬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有关材料予以销毁。在张韬案件中，张韬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在政治上、精神上受到种种折磨与迫害，但面对康生、曹轶欧等人的无情打击与摧残，张韬一直坚持向党中央反映事实真相，这是正确的做法。就此，“沙韬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

1979年3月，中央决定派沙韬进入中纪委的“康生专案组”，负责调查康生在中调部的问题。1980年10月，中央宣布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对其所做的《悼词》。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在党纪国法的公正

审判下，康生、曹轶欧“带着沉重的孽债去见阎王了”（引号内为沙韬语——作者注）。提起往事，沙韬总是说：“我信天总会亮”，“我信历史最公平”。

康生死前为何揭发江青和张春桥

梁红伍

“文化大革命”结束多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件。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说这是他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有说这是他“迫害狂”的本能反应；粉碎“四人帮”之初，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康生同“四人帮”有过斗争的证明。1978年，我曾在中央党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问题”的材料时，曾看到过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有关内容。现就我所掌握的资料，谈谈此事。

1974年12月，在周恩来总理即将于23日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前，病入膏肓的康生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周总理那里，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接着，康生又找王海容和唐闻生给毛泽东带话揭发此事，显得十分急迫。一年之后康生病死。康生原本是江青集团的核心人物，可他为什么要在临死之前急切地去揭发江青和张春桥呢？康生的目的究竟何在？

要解开这个谜团，只要重温一下1974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形势，就可以弄明白。这一年的形势，主要围绕“批林批孔”运动和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展开。这两件大事以及当年的“评法批儒”，内情复杂，涉及面广，这里仅从康生和江青的关系这个侧面来叙述，以便考察当年康生对江青的态度为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即由“热情支持”转为“致命一击”，从中找出康生为什么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答案。

1974年初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矛头实际上是指向周恩来的。还在这之前的1973年7月和12月，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工作和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工作，先后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此，“批林批孔”伊始，江青就向周总理和叶帅发难，企图乘机扫除她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主要障碍。1974年1月，江青在北京召开的两次驻京部队、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大会上，动员“批林批孔”。她在这两次大会上以运动领导者自居，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把参加大会的周总理和叶帅置于受指责地位。会后，江青通过其操纵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等儒家思想为名，含沙射影地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所采取的正确措施，特别是落实干部政策、重新安排一批老干部出来工作，进行猛烈攻击。后来，江青又抓住“评法批儒”的时机，到处讲话，宣称要批判“现代大儒”。一时间，“孔老二”（当时对孔子的贬称）、“现代大儒”等称谓，竟然成为恶毒诬蔑周恩来的隐语。

正当江青一伙起劲攻击周恩来等人的时候，康生在林彪事件之后抱病沉寂一段时间后，突然活跃起来。他积极支持和配合江青的行动，把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的负责人和一名教授推荐给江青。江青在1974年1月25日的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说，康生同志有功劳，康生同志立了一功……他特意请教授写了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这本书，我建议学，可能难一些，不过也没什么。江青还在大会上表扬了由康生主管的中央党校“很快就搞出了批林批孔的材料”。会后第二天，康生即打电话给中央党校，询问动员大会那位教授去了没有？康生说：“请转告他，江青同志的讲话说《诛卯》不通俗，不是批评，在研究成果上还是肯定的。现在再叫他写一篇东西，题目为《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康生不仅亲自规定题目，还就文章的内容和写法作了具体说明。康生授意的这篇文章写出后，立即受到江青的赏识，成为她手中的“炮弹”。3月10日，江青在给中国科学院感光所的回信中，要他们“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随后又把《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材料寄给该所。于是，科学院系统就掀起了“揪孔老二徒子徒孙”的浪潮。

3月中旬，由江青掌控、迟群和谢静宜负责的写作班子“梁效”（北

大、清华“两校”的谐音），在康生主管的写作班子“唐晓文”（“唐晓”即党校谐音）的协助下，写出《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等文章，影射攻击周总理。3月27日，江青把康生送交她的一本古文（节译）材料，经迟群、谢静宜修改后送还康生，批示“请康老参阅”、“供康老酌量”。康生当天看到江青送回的修改本和批示后，立即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送来的修改本，已告党校同志认真研究学习，并要他们今后在编写材料中，注意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考虑问题。”很清楚，康生所谓“注意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考虑问题”，就是编写材料可以任意篡改历史，搞影射史学，更好地为江青一伙的政治活动服务。

5月间，康生虽然病情加重，但仍布置中央党校编写出五种材料，以配合江青“批孔老二”和“评法批儒”的活动。康生还特意通过秘书转告中央党校：“材料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要写上是遵领导（即康生）嘱咐送的。”不久，江青对中央党校负责人说：“康老有病，我过问一下党校的编写组。”6月下旬至7月初，江青带领迟群、谢静宜和党校负责人两次去天津活动，得意地说，“两校”和党校是“我的两个班子”。她在天津大讲所谓“现在的儒”，宣称要批“现代大儒”，批“周公”，批“宰相”，借古喻今，含沙射影，继续恶毒攻击周总理，气焰十分嚣张。而康生在这段时间对江青的阴谋活动，一直热情支持，积极配合。

然而，江青一伙的好景不长。1974年下半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江青一伙。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且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11月12日，江青从北京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她对领导层人事安排的意见。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在此前的3月20日，毛泽东还在给江青的信中说：“过去多年同你谈的话你有好些不执行”，“我

死了，看你怎么办？”这期间，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江青的亲信、国务院科技组负责人迟群，说他是“北京一霸”。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前，毛泽东曾提议复出的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18日，王洪文按照江青一伙的策划，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诬告说，总理住在医院里日夜找人谈话，常去的有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北京现在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企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排斥周恩来，由江青一伙出面“组阁”。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10月20日，毛泽东又派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12月23日，周恩来带病与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再一次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

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在对江青一伙多次批评的同时，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样，对挫败江青一伙“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顺利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面对这种形势，对于康生这样一个十分熟知党内斗争、善于窥测政治动向的人，很清楚今后形势发展的趋势。一向老谋深算、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对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他急忙与江青一伙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转而靠近周恩来和邓小平，并作出系列姿态：他拒绝江青的探望，气得江青大哭大闹；他一改冷漠态度，询问和关心起周总理的病情；他拖着病体让人用担架抬到周总理那里，揭发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他托人带话给毛泽东，揭发江、张的叛徒问题；他托邓小平“在中央讲讲解解决党校问题”以示“尊重”等。

其实，康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与“四人帮”拉开距离也好，靠拢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友好也罢，并非真心实意。他在临死前对一个亲

信的谈话，道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1974年12月26日，康生在病床上召见中央党校负责人，此时他讲话已经很困难，语句含糊不清，有的话还需要贴身秘书复述。康生断断续续地说，下部长瘤子，淌血，不行了。党内斗争复杂，你不了解，迟群犯了错误……我们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靠我不行了，但我不甘心死……康生说“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到底所谓何指？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中旬，他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后又出任了第一副总理。其后，在周恩来重病期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掌握着党政军大权，这既是康生所不愿意看到的、“不甘心”的，也是他所预料到的。联系局势的这种发展，再来想康生此前所说“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的真正含义，就再清楚不过了。而康生在这之前急着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意图，也就一目了然了。康生于1975年12月16日死去。

粉碎“四人帮”之初，康生原先的几个秘书利用一些场合和机会，竭力宣称康生“对‘四人帮’早有抵制”，“同‘四人帮’有斗争”。他们举出的主要证据，一是康生揭发了张春桥、江青的叛徒问题；二是在1976年12月中央下发的“四人帮”《罪行材料》（之一）中，也放进了“康生同志托人传话揭发张春桥、江青的叛徒问题”这个材料。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尽管老奸巨猾的康生临死前“揭发”过江青和张春桥，幻想死后留下一个好名声，但他却没有逃过历史的公正审判。1980年9月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周密审查，写出了《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报告》的结论部分明确指出：“康生犯下的一系列罪行证明：他确实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确实是曾经残害大批革命同志、血债累累的凶手，确实是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骗子，确实是林彪、‘四人帮’两个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核心人物和罪魁祸首之一，罪大恶极。建议中央向全党公布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撤销对康生的‘悼词’，开除其党籍。”198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反革命罪行。康生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而康生临死前“机

关算尽”所玩弄的“揭发江青、张春桥”这一招，没能蒙蔽世人的眼睛，反而留下了他惯于看风使舵、投机钻营的最后佐证。

康生与“谋杀苏枚”案

凌 云

康生是林彪、江青集团案的主犯，已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只是因为已经死亡，依照我国法律，决定对他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整人，是康生的看家本领，直接、间接挨过他整，遭他阴谋诬陷，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托派而被捕坐牢，甚至丧失生命的，难以计数，他亦以此出了名。人们谈到康生时，都想刨根究底弄个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坏？为什么这样狠毒？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延安时期，我曾在康生任部长的中央社会部工作了5年，接着又随他领导的中央土改工作团一起到山东，其间约有大半年的时间担任他的秘书。从1950年起到“文化大革命”，又长期遭康生和他老婆曹轶欧的诬陷与迫害。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有些同志希望我谈谈康生的情况。其实我也不清楚康生的底细，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回答不了。前些年我有机会比较系统地了解康生制造的“谋杀苏枚”案的翔实情况，由此联想起我亲身经历或间接听闻的一些往事，回忆和思索，使我有话想说，不吐不快。

我以为，从1948年以后我所接触的事实看，康生整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左”，搞什么“逼供信”；也不能简单地解释成为了抓权，排斥异己，结党营私。我认为康生的整人与他和曹轶欧这家“夫妻店”的利害紧密关联。在他们俩看来，周围的人都不可信，总有人想整他们，不是“坏人”，就是“特务”；而他们自己总像是在紧张地保护着什么隐私，生

怕被人发现或抓住他们见不得人的什么秘密。而康生与曹轶欧制造的这起“谋杀苏枚”案，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佐证。

苏枚自杀，偏说他杀

苏枚，原名曹文敏，是曹轶欧的亲妹妹。1928年由康生介绍入党。历史上曾被捕，出狱后，康生给她恢复了党籍。1950年春夏间，康生与曹轶欧在杭州疗养，苏枚同他们住在一起，有一天忽然跳了楼。康生硬说是保卫人员把她推下楼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康生还把“残害苏枚”作为当时担任他秘书的沙韬的一条罪状。苏枚跳楼无恙，回到北京，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中央政法干校任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正当造反派组织到处“揪叛徒”的时候，苏枚竟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了。时间是1967年4月6日。上午10时许，她的儿子回家，见房门紧锁，呼叫没有人应答，便从厨房破窗而入，发现苏枚睡在床上，已深度昏迷，无法叫醒，当即报告校方，叫救护车送往北京医院。经抢救无效，苏枚于当日下午3时47分死于医院急救室。

为了查明苏枚死因，北京医院进行了尸体解剖和药物检验，于4月18日对苏枚之死作出结论。结论报告说：“根据患者处于昏迷状态，各种反应均消失，血压下降，唇印紫绀及心电图检查有心肌缺氧等临床现象，死亡后病理解剖在胃内发现有多量药物存留，经过验定该药物为导眠能。小便检验导眠能为阳性。因此患者之死亡原因为安眠药（导眠能）中毒”。另经解放军总后勤部、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等单位多次化验、鉴定，结论是一致的：苏枚是服安眠药自杀身死。接着，公安部又组织公安部治安局、政法干校和北京市公安局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尸体检验和现场勘查，未发现外人作案的任何痕迹，排除他杀的可能，认定苏枚确属自杀无疑。

但是，康生与曹轶欧坚决不接受苏枚自杀身亡这个确凿无疑的事实。他俩不等医院的结论，也不等公安部门现场勘查的结果，当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在北京医院向政法干校造反派的人讲述起苏枚的生平，说

她在白区工作如何英勇，如何有贡献，“是个好同志，不会自杀”。责令公安部成立“苏枚被害案件调查组”，并要立即为苏枚开追悼会。康生说：“你们不开追悼会，我们开家庭追悼会。”开追悼会时，康生、曹轶欧特意带一个警卫班，威风凛凛，到场示威。

追悼会前，康生、曹轶欧多次接见政法干校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还连续召见联合调查组听取汇报。在1967年5月12日的第五次汇报会上，康生讲了很长一番话，他说：“苏枚既然站在革命方面，保守势力打击她是必然的。”“她虽然受到打击，不等于动摇革命信心”，强调：“要从一个具体问题看出阶级斗争”。康生最害怕的是医院检查和现场勘查作出的科学结论。他摆出理论权威的样子，假惺惺地说：“要通过这个案件学会用辩证的方法，不是主观片面，而是实事求是，全面、客观、辩证地看问题，做调查工作。”接着，话锋一转，说：“调查中涉及很多技术，凡是接触到技术，就很容易形而上学，如法医、化验、侦查，越是技术专家，越容易形而上学、片面。”他对医院和公安部门作出的科学结论，全都不予承认。

曹轶欧配合康生，随心所欲，信口制造“谋杀”的论据，提出了一大堆“谋杀”的疑点。比如说：苏枚尸体的药斑是“外伤”；厨房窗子的小破洞是“人为的”；铝壶底有两个凸起，是“凶手”为吓唬苏枚敲打水壶形成的；奶锅里残渣发臭，有点水底，是“有人冲刷毁灭罪证”。最恶毒无耻的是说“苏枚胃里的安眠药是医生解剖时放进去的”等等。这些为了掩盖真相而制造出来的奇谈怪论，当然经不起核证，被调查组一一否定了。

曹轶欧还乱指乱咬“谋杀”嫌疑人。她说，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住在苏枚楼下，苏枚死的当天，她在苏家就见到石家的人两次上楼归还借用的小磨，看水管漏水，这是打听动静。又说，干校卫生科科长闻伯俊在北京医院抢救苏枚时“出来进去，一定是在策划什么”。公务员段学思“不能因为是贫农就排除他，他同石磊住在一起，要联系起来看”。先后被指名为“谋杀案”嫌疑人的共8位，强令调查组进行重点调查。

这个调查组还是实事求是的，根据事实依然确认苏枚是自杀。对

此，康生、曹轶欧极为不满，一再指责“不突出政治”，“单纯技术观点”。调查组把苏枚自杀的证据材料汇总写成书面报告，送给当时公安部的负责人李震。李震不得不承认苏枚是自杀，但也耍了个花招，要调查组“一次不要报这么多材料，一件一件地慢慢报，时间长了，不了了之”。

直接操纵，滥捕无辜

真能不了了之吗？1967年底风波再起。李震接到政法干校某人的诬告，说王久成（政法干校主任教员）私下到辽阳东北民警干校调查苏枚历史上的被捕问题。曹轶欧得知后，神情激动，全身颤抖。第二天，康生与曹轶欧经由谢富治和李震下令捕人。被捕的有石磊、闻伯俊，罪名是“谋害苏枚”。还以“进行黑调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逮捕了王久成。逮捕行动开始前，调查组一再向李震申辩：怀疑石磊与闻伯俊杀人没有根据，王久成到辽阳搞“黑调查”没有查对核实。这时，李震却一改原来不了了之的态度，不顾调查组的申辩，强令执行，决定另行成立“干校军管组”和“石磊专案组”，对所谓嫌疑人严刑逼供。

康生、曹轶欧利用中央政法干校归属公安部领导的特殊条件，借口“防止案情扩散”，把“石磊专案”交给当时由公安部负责的“中央专案三办”代管，并指令政法干校军管组组长兼任“石磊专案组”组长，实际上是直接对康生、曹轶欧负责。康生、曹轶欧把此案定性为“反革命谋杀”，多次在家中召见专案组负责人，当面作指示，逼令抓“凶手”。案件进行情况，“作战方案”，以及专案人员的变动，受审人员到医院看病，都要向他们汇报，经他们批准。用“专案组”负责人的话说，“是在康老关怀下，由曹大姐直接抓的”。后来有人讥讽说，这是康生、曹轶欧的“家庭专案组”。“专案组”成立后，捕人越来越多。石磊的妻子是西城区月坛街道办事处干部，专案组竟以“群众专政”的名义，将其抓到政法干校院内，单独关押了6年。闻伯俊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也被不分青红皂白逮捕入狱。1968年4月以后，又将政法干校另一副校长张效良、卫生科医生宋公田、公务员段学思等逮捕入狱。北京医院的内科女医生顾惜

春，1967年4月6日碰巧在急诊室值班，参加了对苏枚的抢救工作。根据苏枚的症状和解剖化验的结果，她从医生的职业道德出发，认定苏枚是自杀身死，为此触怒了康生、曹轶欧。1969年11月11日，以有“严重问题”为名，被捕入狱。

1968年1月，政法干校实行军管。在“专案组”迫害无辜的同时，按康生、曹轶欧的指示，政法干校的“文化大革命”围绕“谋杀苏枚”案进行，开展“大揭发”，“查凶手”，“追后台”，大抓“石磊一小撮”。曹轶欧再三强调，“苏枚被害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问题”，凡是对苏枚提过意见或对“谋害”表示过怀疑的，都被诬为“反康生”，“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遭到批斗和挨整。这起“谋杀”冤案，遭诬陷迫害的多达99人。其中捕押在监狱的9人，隔离关在政法干校内的23人，逼死2人，逼疯3人，整成终身残废的1人。

曹轶欧对“专案组”刑讯逼供、以假作真的卑鄙行径极为赞赏，又写信，又送“语录”，一再表扬是“高举”、“活学活用”。在康生、曹轶欧的鼓励下，刑讯逼供愈演愈烈。他们要攻破石磊这个“堡垒”，但直到最后还是连一根稻草也没有捞着。石磊是这一冤案的“首要分子”，被关押了7年，受尽了种种酷刑的迫害，身心遭到极大摧残，九死一生，始终顶住了逼供，挺住了腰杆。

1969年11月17日，按照康生、曹轶欧的旨意，公安部领导小组谢富治、李震等制造了一份报送中央的假报告，以逼供出来的假口供为依据，加上拼凑捏造，硬把苏枚自杀说成是“谋杀”，诬说是石磊、闻伯俊、宋公田“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地谋害的”。谢富治等同康生、曹轶欧一样，最害怕他们所谓的“黑调查”，也就是害怕揭开苏枚历史上的谜团。说“黑调查”是对苏枚“进一步进行政治陷害，恶毒地攻击康老”，“其用心险恶，无以伦比！”总之，苏枚的历史是触动不得的。在报告中还说：“他们的黑后台还有待于深挖”。看来是想把他们要整治的更大的人物罗织进来，这才是真正的用心险恶！

但是，冤案毕竟是冤案，假口供不能当真。从1971年起案件实际上搞不下去了。康生、曹轶欧咬住“谋杀”不松口；对石磊等人则关而不放，

折磨得浑身是病。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在押的人才陆续放出来。石磊是1975年3月2日放回政法干校的，但直到康生死后的1977年，“专案组”还在阻挠对此案作出平反结论。这年6月9日，“专案组”在写给公安部负责人的信中说，苏枚是怎么死的，“这个结论不好作，也不能作”。“特别是结案过程中，康老曾指示，不要再为此案打扰曹大姐了。”“要给苏枚之死做结论，必须通过她，这对她身心健康是很有害的”，云云。后来由于胡耀邦同志的果断决定，公安部党组于1978年5月作出《关于因苏枚自杀造成冤错案件问题的复查报告》。石磊等同志的冤案才于1978年10月相继得到平反。

冤案虽平，谜底未揭

这桩冤案的受害者是平反了，可是苏枚为什么要自杀，又恰恰在“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组织“揪叛徒”的时候决心一死呢？这个最重要的疑问并没有得到解答。康生、曹轶欧又为什么这样性急，慌忙跳出来亲自导演了这一出恶作剧，并颠倒黑白，用尽一切卑鄙手段，蓄意制造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

原在济南市公安局工作已经退休的几位老同志向我提供了有关苏枚的一段历史情况，使我想得很多，不妨写下来供大家思考。

苏枚（曹文敏）1928年由康生介绍入党。1930年她和丈夫刘少甫被派到济南，刘任中共地下党山东省委书记兼团省委书记，苏在省委机关工作。他们的家在济南市内顺河街一个居民院内，是省委秘书处的机关。这时曹轶欧的前夫李应臣（曾是上海地下党沪西区委书记，已叛变）也从上海来到济南。一次，李应臣正巧看到出门倒水的苏枚，当即密报给国民党特务机关，经过盯梢监视和密查，并派特务仲文焕带家属住到苏枚家隔壁严密监视，不久逮捕了苏枚与刘少甫。接着，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济南以至山东省内到处进行搜捕，中共山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相继被捕的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和党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女革命家郭隆真等20多位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这些党的重要人物，后

来都被敌人残酷杀害，唯独苏枚一人出狱生还。苏枚出狱后不久，由康生恢复了她的党籍，分配了工作。

苏枚的这段历史，现在是没有人再去彻底查究了。但是，康生和曹轶欧把苏枚自杀硬栽成“谋杀”，用尽心机，制造冤案，残害无辜，究竟为的是什么，是为死者苏枚，还是为他们自己？

康生心怀鬼胎已久。让我们听听曹轶欧和康生自己是怎么说的。1967年6月29日，即苏枚自杀身亡后2个月又20多天，曹轶欧在笔记中写道：“许多问题前前后后联系起来看，枚被害不是孤立的”，“枚被害也不仅限于干校一个单位，有远因、近因”。“远因：饶（漱石）、李（？）、杨（尚昆）、李（克农）”，“近因：（苏枚）分配到干校去是安子文、帅孟奇早已计划好的……”安和帅，一个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个是副部长。1968年7月，康生亲笔将两人列入“叛徒、特务”名单，进行诬陷迫害。

1967年7月15日，即苏枚自杀身亡后3个月零9天，康生与李震等人谈话，造谣刘少奇迫害他。又说：“苏枚同志的事，同罗（瑞卿）、杨尚昆、李克农有关。（公安部）五〇年档案中，有没有罗（瑞卿）、李克农陷害我的文件，找可靠同志翻一翻。”

康生与曹轶欧夫妻两人唱的是一个调，意思是说“谋害”苏枚为的是“谋害”康生，并且把“有待于深挖的黑台后”都一一指明了。

历史谜团有待历史解开

康生、曹轶欧把刘少奇、罗瑞卿、杨尚昆、李克农等都牵进去，是有一段历史背景的。

1947年冬，康生率领土改工作团到达山东渤海区。先是参加该区的土改整党会议，第二年春，工作团和区党委的同志组合一起到阳信县搞土改。负责人是区党委的秘书长彭瑞林，曹轶欧和贾琏（高文华的夫人）与彭的夫人分在一个村工作。因为工作中有些不同意见，曹轶欧竟借口彭的夫人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诬陷她是“国民党分子”，“有政治问题”，“包庇村里的坏人”，还无理指责贾琏一道反对她，“包庇坏人”，是

“立场问题”，在村里大闹一场后，称病回到区党委住地。曹轶欧大闹工作组的时候，康生和我正在西柏坡中央工委（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回到渤海，曹轶欧就向康生“告状”。康生、曹轶欧要我转告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张晔查究彭的夫人的“政治问题”。我不能鲁莽行事，先向中央工作团的几位同志了解情况，他们都不满曹轶欧的所为。张琴秋大姐说曹“太过分了”。徐冰说“曹轶欧政治上太狭隘”，要我不必管曹这桩子事。我觉得曹轶欧确实没理，也就没有再理会她。高文华曾经担任过白区地下党北方局和省委的领导工作，是一位很有修养的老同志。四五月间，在他与贾璉要回中央前，特意向康生道歉，说贾璉对不起曹轶欧。康生没有作什么回应。至于我的不遵命，康生与曹轶欧当然很不满意，可我没有立刻意识到。20年后，我在北京秦城监狱受审时，审讯员说康生、曹轶欧“在渤海区党委时就看出你不对头了”，我才明白过来。

1949年，康生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10月间他病休去青岛。不久，他到北京治病路经济南。我当时在济南市公安局工作，特意去看望他。康生问我：“你对沙韬了解不了解？他在政治上怎么样？在社会部的表现怎样？”沙韬是一年多前应康生的要求从中央社会部调来给他当秘书的。康生这一问来得很突然。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得很爽利：“沙历史清楚，政治上很单纯，整风审干中做有结论，工作表现也不错。”康生面无表情地说：“那他为什么拆看曹轶欧给我的信呢？”这一问，出乎我的意料，我说：“可能是误拆吧。”他摇头表示不以为然。我又补了一句：“刚做秘书工作，没有经验，年轻不懂事也是可能的。”康生很不满意我的回答，默默地坐在那里不吭气，不再理我，我只好退了出来。后来我才知道，拆信这件事发生在沙韬初到康生那里工作的时候，康生在益都闵家庄中共华东局，曹轶欧在沂水中共鲁中南区党委，秘书每天收到的信件不是一封两封，又不认识曹轶欧的笔迹，完全是误拆，而且及时向康生作了检讨，说清楚了，按照常理，何疑之有！但是，康生与曹轶欧对此事刻骨铭心，认定是故意偷拆信件，一直不肯放过，并且愈来愈严重，诬陷沙韬是有人指使的“特务行为”，这是后话。

1950年春，康生在青岛休养。曹轶欧时任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

在济南。一天夜里，曹轶欧来到省公安厅副厅长季明的住处，胡说有人对她“搞阴谋”，她在山东分局“已被严密监视”。季明原是延安中央社会部的干部，曹找季的本意是希望能够得到季的支持，并为她做些什么。季当然不能同意她的说法，一再解释不会有人监视她，并把她送回山东分局的住处。第二天，季明向主持工作的分局副书记傅秋涛作了报告。傅与分局其他负责同志觉得事出意外，对曹轶欧无中生有，凭空提出“搞阴谋”、“监视”这样严重的指责，极为恼火；但碍于康生的关系，处理上又觉得十分困难。分局的几位负责同志出于好心，认为曹轶欧是心神过于紧张，是病态的反映，考虑送去青岛又恐对康生养病不利，于是希望她去医院或休养所养息一段时间，但遭到曹轶欧的拒绝。不得已，他们希望把她接到我家住几天，缓和一下她的情绪。开始我并不愿意揽这桩烦事，后来分局作出决定并取得曹轶欧本人的同意，我也就只好同意了。曹轶欧在我家住了三天，搅扰得我全家不安，傅秋涛等分局负责同志同意我的意见送她去青岛。行前，傅秋涛还同她谈话，说了不少宽解的话。就是这么一回事，引来曹轶欧对我们夫妇的刻骨仇恨。她到北京后曾对罗瑞卿造谣说，在山东济南的一个晚上，我们夫妇两人把她推进一间黑屋子里整她，企图谋害她。罗瑞卿是在1978年把这些话告诉我的。他说从来没有相信过曹轶欧这些鬼话。

1950年春夏间，华东局和党中央电告康生，从健康考虑，劝他离开青岛去杭州休养。康生犹豫再三，先是拟发了一个不同意去杭州的电报，交青岛军管会参谋长陈雷送机要译发，接着又要陈追回，另发一个同意去杭州的复电。这是多年后陈雷告诉我的。康生与曹轶欧去了杭州，心里是不满意的。过了20年后，即1969年，康生在一个材料上批道：饶（漱石）、傅（秋涛）、向（明）都想赶我离开华东，就是指的这回事。傅、向当时都是山东分局副书记。

康生与曹轶欧在青岛、杭州休养期间，一直诬指沙韬在监视他，说连他睡觉时“沙都坐在卧室门外监视着”。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康生常在被窝里抽烟，一次叼着烟睡着了，被子被烧了个洞。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沙韬总要等康生睡着了，检查过烟火才去休息。认真负责的工作，

竟被诬为“特务监视”，可恶又可笑！是谁指使派遣沙的呢？康生最早指的是李克农，沙韬是从李任代理部长的中央社会部调去的。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康生又指向饶漱石，饶原是华东局书记。到了1969年，康生在一个材料上又批道“当时我已看出沙是饶（漱石）、傅（秋涛）等人监视我的小走狗，故要沙走”，并且把矛盾进一步指向刘少奇。

康生和曹轶欧在杭州时出了苏枚跳楼事件，杭州住不下去了，1950年7月到了北京，康住进北京医院疗养。1952年初，我调到北京，在公安部工作，先是李克农对我说：“康生说沙韬有问题，沙有什么问题！”李又说，已经作了安排，“以后不要再让康生见到沙韬就是了”。公安部的一些同志告诉我：康生到北京，罗瑞卿作为公安部长对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负有保卫责任，所以去医院看他，孰料事后康生说，罗瑞卿为什么来看我？对罗抱着疑问和很深的戒备。不少原是延安中央社会部的同志都知道，康生见不得中央社会部的人，也听不得提起中央社会部和公安部。我问过徐冰：“康生究竟怎么了？”徐说：康生到北京，少奇同志见了，说他神情恍恍惚惚，康生要求见毛主席。徐说：“康生是认为中央不信任他。”待到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我才确知，早在1950年康生在杭州、上海时就曾反复向饶漱石说过党对他不信任的话，饶曾报告中央。

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处理了饶漱石的问题后，人们发现6年没有工作、深居不出的康生，又在一些公众场合露面了。这时，他想起我来了，诬说我有“政治问题”，要求中央审查我。由于罗瑞卿和当时在中央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的明智，不相信他的诬蔑陷害之词。“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杀气腾腾，信口雌黄，任意诬陷迫害人，我当然在劫难逃了。他伙同谢富治，利用公安部的侦察、情报档案，采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等卑鄙手段，亲笔写下许多批语，诬我为“叛徒”、“特务”，捏造了一个所谓“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内奸集团”。我为此坐了7年冤狱。

沙韬当然也在劫难逃。1967年6月，康生从中央调查部“造反联络站”给他的报告中，得知沙韬改名张韬，在甘肃省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并

看到1954年少奇同志在一个报告上的批示，大为恼火，怒气冲冲地批了一段话：“我很久不知此人下落，原来改了名字，是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杨尚昆包庇起来的”，“这是刘、杨、李（克农）包庇之力，他竟然作了副部长”。原来在1954年11月间，沙韬所在组织为了澄清康生对沙的诬陷，曾将有关情况写了报告报送“李克农并尚昆同志”，后又转给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作了批示说：“怀疑沙韬政治上有问题，曹轶欧和我谈过，他们是病时谈的，并且谈到其他的人，但没有谈到饶漱石，我不相信曹轶欧所说的。经过调查，沙韬同志和他的夫人是没有问题的。以上事实应同沙韬同志谈清楚，使他们放心。至于沙韬的工作，也不必因此调动，但也不要为此故意去刺激康生。”这个批示大概就是一度传说的：“少奇同志批示病人之言不可信。”康生怎肯就此甘休！1969年8月，先由曹轶欧写报告给康生，要求组成“沙韬专案审查小组”，“彻底搞清这一阴谋案件”。然后再由康生批示：“同意这种处置”，并诬说这是“涉及刘少奇、饶漱石、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等叛徒集团的反革命阴谋问题”。从此，从误拆一封信起，沙韬受康生、曹轶欧诬陷长达29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关押近8年，受尽了折磨摧残。

罗瑞卿于1978年5月给胡耀邦的信中说：“康也组织了一个所谓专案组整我，罪名两条：（一）包庇凌云，陷害他的贵夫人曹轶欧；（二）包庇沙韬陷害他，这不仅是无中生有，而且是比海外奇谈还要高超得不知多少倍的怪论。这位沙韬同志，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

从1948年至1975年近30年的时间，纵观康生与曹轶欧的种种异常表现，应该有理由相信，他们确实是在保护、掩藏什么隐私，怕被人发现或被人抓住。这里，我再引用一段我参加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工作时记录下来的材料：“1975年康生死前曾对人说过大体是这样的一段话：1920……1921……1922……没有；1923，没有；1924，没有叛变；1925，没有叛变；1926，我没有叛变；1927，没有……接着说，江青是叛徒，她30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康生吞吞吐吐，欲说又止，他心怀鬼胎，究竟想说些什么呢？！康生到底是什么人？现在还是个谜，但历史总会进一步作出回答的。

司马璐其人其事

张林冬

司马璐，原名马义，初名马元福，江苏海安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到延安。以后离开延安，1941年被开除出党。曾在重庆办《自由东方》、《人民周报》，组织中国人民党。1949年定居香港，出版《展望》杂志，继续从事反共活动。1983年移居美国，主持《探索》杂志。

“老朋友”马义及其“回忆”

我最初知道马义这个名字是看到他编辑的《中共党史文萃》，了解到他曾到过延安，仅此而已。20世纪80年代，我及苏姐（苏姐，即张林苏，又名林萍。浙江奉化人。1936年9月参加中华民族先锋队，1937年到延安，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边区抗战剧团教育科科长、鲁迅艺术学院办公室秘书、中央社会部科长、中共黑龙江道理区常委、组织部部长等职——笔者注）少年时代的朋友阎明（杨明）移居香港。2002年9月，司马璐与戈扬（戈扬，本名树佩华，笔名洛文。江苏海安县人。早年入江苏镇江师范学校。1941年参加新四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战地记者，与杨刚、浦熙修、彭子岗被称为“中共新闻界四大花旦”——笔者注）结婚，香港《争鸣》登载了这条消息，并附有照片，阎明立即将文章寄给我们，才发现司马璐即马义。

马义我们太熟悉了，是“老朋友”了，他的两次回忆录都提到我们。看来苏姐在马义的心中留下的印象深刻。他写道：

有一次我在边区合作社餐室吃饭，一个偶然的场合中，认识了一个边区剧团的女演员林萍，她在延安已经住了一年多，抗大二期毕业，活泼美丽，热情可爱，时时流露着天真的微笑，在边区认识女同志，没有人不感到兴趣的，第二天我就去看她，她单独住了一个小房间，房内收拾得很整洁，她待人也颇有人情味，态度温和，心地善良，她虽然没有特别的好东西款待客人，但是能够给客人一种说不出的精神上的愉快，亲切而诚恳。她站在人面前，有一种高贵之感。

苏姐在延安叫林萍，她的公开身份是边区剧团的干部（不是演员），实际上她是西北保卫处的保卫员，负有特殊使命，主要任务是了解一些到延安来的可疑人员，通过接近，设法搞清楚他们的真实面目。马义那时在西北青年救国会，是她了解的对象之一，所以我到苏姐处，苏姐一再叮嘱我，马义有问题，不要和他多接触。

马义常去苏姐的住处，并在那里认识了杨明，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写了与杨明的交往。在延安，我也是在苏姐那里认识马义的。他长得矮小，一米六左右。人长得尚清秀，脸上的白麻子十分显眼。他操一口苏北话，对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很能献殷勤。

马义的回忆录有许多错误，有的是记忆造成，有的是不了解情况，但大多数是出自反共的需要。我们与他的交往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马义在《斗争十八年》中，他通过第三者的口吻，写道：

……李苇泉后来在昆明发生李公朴、闻一多（均系民盟盟员）的枪杀案以后，又对我说：

“你如果在那次中韩文化协会的枪杀案中被打死就好了，说不定新华日报还为你出特刊，追赠你一个民主烈士呢！”

“你以为这次李公朴、闻一多的事，都是共产党自己干的？”

我问。

“当然，毫无疑问，政府做这样的事自讨苦吃，犯不着。共产党就不同了，他们认为杀一个人可以造成政治影响，又是一种政治教育。况且被杀的或者本来就是他们认为有了问题的人，死后再为他们出特刊，开追悼会，送殡，又是政治……”

“你说得太刻薄了。”

“说我刻薄，好，你等着瞧吧。”他说完就扬长而去。

果然，不多一个时候，我又有事发生了。有一个民主建国会的朋友田钟灵（又名苏东，后来在香港办过《快活报》，现在大概在广州）请我吃饭，我很谨慎，我说：“不必客气了，我请你吃便饭吧。”

我们就约好青年路“爱伦餐厅”，届时他又带了一个叫李新民（应是李学民——笔者注）的朋友来，吃过饭，我们就分道扬镳。岂知第二天我打开《新华日报》一看，赫然一个大标题，就正是说为了我请客，李新民途中被人打伤，幸好李新民溜得快，不然他做了“民主烈士”，我也做了凶手嫌疑犯，中共的阴谋又是一箭双雕了。

从前后文看，马义是想通过这件事情，说明《自由导报》记者挨打事件是共产党干的，反而嫁祸于他。

52年后，马义又重新提起这件事，不知是马义觉得在戈扬面前不要太露骨，还是觉得自己制造出来的天方夜谭太可笑了？他在《中共历史的见证》作了“修正”：

中共“资料”说我“参加民主同盟，因搞小组织活动被除名”。事实刚刚相反，我是因为要发展民主同盟的青年运动大组织而与中共发生正面冲突的。那时我对共产党的朋友，基本上还是友善的。但我逐渐发现，我能“容共”，而共产党已经绝对容不得一个异己。他们的方法，一是孤立，二是打击，三是造谣。

我有一天和几个民盟朋友吃饭，我们彼此道别以后，那几个

民盟朋友就和别人打了一架，我无法证明是谁的错，但是第二天《新华日报》报道说，几个民主人士和我在一起以后，就被国民党特务打了。有些我尊敬的民主人士私下告诉我，中共警告他们：“马义（司马璐）是托派，是国特，不能和他往来。”而同时也有接近国民党的朋友告诉我，要我小心，因为有人说：“马义是共产党。”

对照马义的两次回忆录，不难发现，他才是造谣者。在后一次回忆录中，他将自己打扮成共产党的朋友，是共产党不容他，而把自己以前将《自由导报》记者挨打事件说成是共产党制造的删掉了，这就不打自招承认自己的第一次回忆是造谣。

前一个回忆录写于1952年，那时因朝鲜战争，西方掀起了反共反华高潮，马义当年对此并不回避，声称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共战争”。有鉴于此，他不惜将历史歪曲，将这个事件嫁祸于共产党；52年后，他改变了说法。其实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不对。我是当事人，有责任将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事情的真相

要说清这件事，首先需要交代我和爱人田海燕在重庆是怎样与马义见面的。

1945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书记、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的王若飞指示海燕，办一家从工商界角度谈民主的刊物。

当时在大后方办刊物，必须向国民党内政部申请登记证，才能合法地发行。而申请登记证，非要与国民党有一定的关系者才能得到批准，这对我们来讲是十分困难的。王若飞指示我们登报征买无力出版的刊物的登记证。于是海燕就用“田钟灵”的名字在重庆《新蜀报》刊登征购广告。应征者很多，海燕和李学民商量后，选中了《自由东方》这个杂志。他们从该刊负责人马义处购买了登记证，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将《自由导

报》与《自由东方》区隔清楚。我没有参加交易，因此没有与马义见过面。

1945年11月17日，《自由导报》第一号出刊。这时王若飞让中共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许涤新来领导我们，编辑部组成人员都是老许决定的，海燕是发行人，我以“苏东”的笔名为主编，李学民任经理，杜国庠（守素）任总编辑，编辑邵荃麟、勇龙桂。

一天，我手头正拿着一捆《自由导报》向外走，突然在楼梯上碰见马义，我们双方都很惊奇。我打过招呼后请他坐到过道上的办公桌旁，他问我怎么到重庆来。为了迷惑他，我说吃不了延安的苦，将父亲是宪兵司令部少将的身份抬出来，说是我父亲要我回来，介绍我与四川青年工业家田钟灵结婚。

当天，我们就到曾家岩50号，向王若飞汇报了马义的情况。王若飞分析了两点：一是根据种种情况来看，田钟灵就是“海燕”，马义不知道；二是即将召开政协会议，国民党还要搞假民主的形式，他正要办也谈民主、自由的《人民周报》，因此不使其发现《自由导报》与党的关系，可以以民主人士的身份与之周旋。

这样，我们多半去马义处与之交往，尽量不让他到报社，以免碰到领导我们的许涤新等党内同志。我们故意标榜《自由导报》与民建会（海燕是民建会的发起人、民建会重庆分会的负责人）的关系。海燕与他闲扯与其身份有关的工商界和报刊公开报道的事情。马义也有几次到报社来，都被我挡在过道上。

在马义的住处，有一个中年人与他同住，朝夕相处，可见关系非同一般。此人不怎么说话，只是在旁边听，偶尔插上上一两句有关版面的话，以致我们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记得，长相也非常模糊。

马义在回忆录亦有意回避了这个人。正是这个人的出现告诉我们，马义与国民党特务的关系非同寻常。全国解放后，我们知道了这个人的确切名字和身份，他叫陈兰荪，是国民党军统（保密局）渝区组长兼党派科长，那时的公开身份是《人民周报》的编辑，专门从事新闻界的特务活动，以后担任《新华时报》编辑部主任。《新华时报》是军统办的一家以反共

为目的的报纸，之所以取这个报名，就是专门与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对抗，混淆视听。

自由导报社积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参加民主运动，被国民党查禁，制造了封禁《自由导报》事件。1946年旧政协开会期间，海燕与李学民是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新闻处的负责人，每天都要发布消息，对国民党反动政策打击很大，国民党特务对《自由导报》更是恨得要死，多次在协进会开会时扰乱会场。在旧政协开会期间，特务们还制造了沧白堂等事件。

1946年1月24日，马义突然来报社，坚请海燕、李学民和我吃晚饭（不是像马义说的那样，是海燕要请他吃饭。那些天，人都忙不过来，哪有闲工夫请他吃饭）。当时我们感到事情有些蹊跷，碰巧这天晚上协进会没有会议，为了敷衍他，我们还是答应了。

吃饭地点是国泰电影院对门的爱伦餐厅，吃毛肚火锅。海燕这个人从来不修边幅，剃一个光头，穿一件长袍。那个时期男的一般都穿长袍，穿西装的多半是有身份的人或有钱人。李学民西装革履，皮鞋擦得亮锃锃的，很有点派头。当时我有8个月的身孕，挺着大肚子。我们三人走进饭馆时，马义早等候在那里了。

这个饭馆在最繁华的闹市地段，但厅的面积不大。我进去时发现没有什么食客，而周围却坐着或站着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正像电影中的那些打手形象，我警觉起来，用劲踩海燕和李学民的脚，他们已有察觉，但都不动声色，仍然谈笑如常，品评菜肴的好坏。我可没有那份闲情了，一边用眼睛狠狠地盯着马义，一边心里想如何摆脱这个局面。吃完饭，我们四个人一起出门，马义在门口就和我们告别走了。我们三人刚走到国泰电影院门口，突然路灯停电，十多个穿着蓝色呢子中山制服装的人，一下子围了上来。

四个人夹着李学民。他们大概以为老李穿得这样洋气，肯定是苏东。

“干什么！”老李大喊起来。

“奉命逮捕，识相点。”

“我是陪都各界协进会新闻记者。”

“你干得好，老子正是拿你！”特务们见老李反抗，拳打脚踢，把他打倒在地上。一个暴徒将他压住，朝他的头、腰又是一顿乱打。老李的后脑袋被刀划破。

老李大喊：“特务打人呀！”路上群众喊起来：“特务打人！”暴徒扬言：“奉有命令，警察不得干涉！”警察要他们出示公文，他们才在人群中呼啸而去。

一个特务要拉我走。我挺着大肚子，拼命扯开嗓门大叫：“流氓欺侮女人啊！”赖着不走。周围老百姓都围拢过来，有的人责骂那些特务。我乘机脱了身，连跑带走地往七星岗方向去。

新华日报社在七星岗莲花池有一座二层楼的房屋，是专供记者住的。我径直走上二楼，碰到汪琦（刘白羽的夫人，在延安就认识，时任记者，有时也到《自由导报》来走走），我将我们出事的经过告诉她，说海燕和老李下落不明，请她速报党组织。汪琦说海燕已来过，正去打电话同各报社记者联系，请记者到现场采访国民党特务行凶的新闻消息。我心里这块石头顿时落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海燕趁他们抓李学民时，很快跑到停在街对面的汽车后面，特务以为他是往前走的，跟着追上去，巧遇停电，没抓到。海燕绕到小汽车后面，摆脱特务后，迅速去报社报告情况。

当天晚上，海燕向王若飞作了汇报。王若飞指示，利用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的名义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他要海燕赶快去找老李，先到法院验伤，取得“官方”伤单，以“毒”攻“毒”。

我回到林森路母亲家时已是夜里11点了。父母赶忙起身，看我疲惫而紧张的样子，忙问出了什么事。我说没有事。我悄悄叫醒了大妹林枫和小妹林雪，要她们速去中正路看看报社有什么动静。

一会儿妹妹回来说，报社街面上很安静，不像有什么事情发生过。我正准备再去国泰电影院看看，海燕扶着老李走了进来。老李伤势不轻，我问，验了伤没有？海燕说，验过了。那一夜，我们三人就在母亲家中我住的一间小房间里商讨第二天的对策。大家情绪愤慨，谁也没有睡意。

第二天,《新华日报》登出了《自由导报》工作人员被打的消息。27日下午,政协陪都各界促进会在迁川大厦招待新闻界,请李德全女士主持会议。李学民因伤重住在医院,由人在会场代为宣读他写的控诉书,说明我们应《人民周报》马义之约晚餐,出门就被特务殴打之经过。海燕和我分别报告马义请客与特务逞凶情形。

当场,章乃器、陶行知、胡子婴、刘清扬等谴责国民党罪行,要求实现“言论自由”的诺言和惩凶。联系到最近促进会在沧白堂召开群众大会时,特务多次扰乱会场的情况,新闻界一致要求当局制止这种暴行。事后,许涤新夫妇、罗叔章、朱宝粹、徐崇林等相继到医院慰问李学民。

在记者招待会上,马义没有出现,但陈兰荪以《人民周报》记者的身份为马义辩解,声称《人民周报》宣扬“民主、自由、进步”。海燕当场驳斥,说明“事实不是那么简单,马义这种幕后指使与他公开言论相反,值得民主界严加警惕”。

第二天,马义跑到我们报社,罗叔章正在里屋谈话,我怕他闯进去,推说海燕不在,把他挡在过道上。他哭诉:“我是真正主张民主、自由、进步,李记者挨打的事,不是我干的,你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有问题,今后我怎样做人呀!”

我厉声地说:“你真卑鄙!事情有那么巧合?你心中明白,要取得别人信任,看你以后的行动。你不要再来这里了。”我把他赶了出去。

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马义。

假民主,真反共

这件事情马义绝对脱不了干系。第一,吃饭是马义请客,餐馆是他订的。而特务们的行动也是有组织、计划的。那么谁通知特务的呢?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知道陈兰荪是军统特务的身份,他负责的《新华时报》攻击我们是延安抗大的,是“二排共匪”。在重庆只有马义(中共办事处的同志和我父母除外——笔者注)知道我从延安出来,陈兰荪对于这方面的情报,最有可能从他那里获得。

第三，陈兰荪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人民周报》是宣扬民主、自由、进步。我们已经知道陈兰荪是军统特务，这就有力地说明他们宣扬的“民主、自由、进步”只是幌子。

第四，陈兰荪主办的《新华时报》说海燕是民盟的（根据什么不清楚）。马义的《中共历史的见证》也说我们是民盟的，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参加民盟。这就不打自招将他们之间的关系泄露出来。

1949年，马义来到香港。他故伎重演，在回忆录中说，中共对他在香港的“围剿”是在《华商报》上发表了骂他的文章《马义救主》。这是马义抬举了自己。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党还没有闲工夫去“围剿”他，这是海燕等旅港进步文化人士自发组织的一次“围剿”行动。

那时我们正在香港办《周末报》。一天，作家秦牧告诉海燕，马义到了香港。海燕觉得应该揭发他，让他真实面貌在香港见见阳光。于是他提供资料，秦牧写了《马义救主》的杂文。1950年初，胡希明搜集了马义在香港活动的一些资料，由海燕写了两篇文章，分别在《周末报》和《快乐报》上发表，揭露他的假民主、真反共的面目。

应该指出，马义到现在还标榜自己是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迷惑了一些到海外的大陆中青年学人。标榜“民主”、“自由”的马义做了些什么呢？无论是《斗争十八年》，还是《中共历史的见证》，对国民党的反民主的独裁专制统治都没有加以谴责。他之所以将第一个回忆录取名为《斗争十八年》，亦表白得很清楚，他是与中共斗争18年，而不是与独裁的国民党斗争。这又从一个侧面与陈兰荪相呼应，对他主张“民主”、“自由”的真实的目作了准确解读。

（田子渝 整理）

“四人帮”余党马天水在上海 接受审查

陈锦华

《中外书摘》2008年第9期刊登的《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文介绍称：“据我所在的法庭所知，‘四人帮’被粉碎第二天，马天水就被中央通知去北京‘开会’，从此再未到上海。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在北京被捕的。这是马天水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原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王文正口述、沈国凡整理的《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一书。鉴于这段历史涉及主要人物、地点的重要性和该书作者工作岗位的权威性，特将我的亲身经历和我所知道的情况写出来，以证明粉碎“四人帮”以后，马天水一直在上海接受审查，不仅未在“北京被捕”，更不是“去北京‘开会’，从此再未到上海”。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最担心的是上海的局势，因为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重要基地。粉碎“四人帮”次日，中央首先找了江苏、山东、湖北和南京军区的负责同志到北京谈话，向他们通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情况，要他们注意上海的动态。10月7日凌晨4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举行的会议结束以后，汪东兴当面交代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要他给马天水打电话，通知他上午来北京，中央领导同志有事要

谈。电话接通后，马天水问周局长谈什么事？周说中央领导同志没讲；马天水又问还有谁参加？周说还有上海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马天水还问徐景贤、王秀珍去不去？周答没说要他们来。马天水到北京以后，中央向他通报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他由于深陷“四人帮”帮派体系而不能自拔，坚持其顽固立场。据当时在场的彭冲回忆说，马天水讲了两点：（一）要求见“四人帮”；（二）希望中央作为党内问题处理。彭冲事后说，“马天水很蠢”。

10月7日，也就是马天水到北京听中央通报的这一天，留在上海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直在想办法打听马天水到北京后的情况。因为中央有规定，马天水不敢往上海打电话，所以联系不到马天水。他们给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办公室打电话也都打不通，找在北京的几位跟他们关系比较深的人，也打听不到消息。一直到晚上11点多钟，文化部的于会泳传来消息，说：“今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通知我，告诉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说是华总理定的。”徐景贤听到这个情况后，他联系当天发生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意识到可能出事了。徐景贤这个人很机灵，我后来上海后，他找我谈话，说了4个小时，很严密，滴水不漏。前几年香港出版了他写的回忆录《十年一梦》，我看了，估计他看不到什么档案材料，可能是凭记忆写出来的。8日，徐景贤、王秀珍继续同北京各方面的关系人物联系。最后他们通过关系，接通了京西宾馆的总机，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他告诉徐景贤，说马天水讲，他身体不好，老胃病又犯了。徐景贤一听到这句话，赶紧派人去找马天水的爱人，问马天水有没有胃病？马天水的爱人说马天水没有胃病。徐景贤马上就意识到真的出事了。徐景贤、王秀珍在意识到北京出事后，就着手策划武装叛乱。当天下午，徐景贤和王秀珍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武装叛乱。晚上，在北京的马天水在中央找他谈话以后，他一回到京西宾馆的房间，就对秘书房佐庭说，搞一个假的表态可以回去，回去以后还得研究是大干还是小干？他还说，一旦干起来，损失太大，现在是大势所趋，干是不行了。马天水的这些话，都是他的秘书后来交代的。从马天水所说的这些话看，他当时感到很难办，表态也难，不表态也难，他要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

回到上海怎么办，那些“小兄弟”可不好驾驭；他要是不表态，不拥护中央的决定，恐怕回不去。这真实地反映了马天水当时的心态。

10月10日，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紧锣密鼓地策划武装叛乱的重要时刻，中央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打乱了他们武装叛乱的部署。由于马天水迟迟不表态，中央认为马天水一人在北京不行，要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北京。徐景贤、王秀珍走之前，特别交代自己的“小兄弟”，要小心，有事请示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徐景贤、王秀珍走后，留下的几个常委，如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等人，资历长，有政治斗争经验，他们已从一些渠道了解到“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便假托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再说，将8日常委会上决定的事情拖了下来。

也就在这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国家轻工业部机械局局长谢红胜和我谈话。我当时是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过去对上海的情况有一些了解。谷牧一见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奉命找我们谈话的。他说中央已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现在中央最关心的是上海的情况，所以决定由各部委派一些人，以研究、准备明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名义到上海去。他要我们尽可能地接触各方面的同志，了解工厂的情况，了解社会上的动向，了解“四人帮”余党有什么动作，把所了解的情况尽快写信寄回北京，寄到北皇城根立新路9号，有专人处理这些信件，并随时向中央报告。谷牧要我们尽快动身到上海。谷牧找我们谈话后，我们已经买不到第二天去上海的飞机票了，到10月12日，我们才动身去上海。当天晚上，我们一行8人到达上海虹桥机场，并住进了国际饭店。第二天，我们先后去了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交组和纺织工业局、轻工业局了解情况。当时，我们没看出他们有什么大的变动，包括办公室的人来人往也没有大的异常现象。我们只是接触了一些表面情况，也听到一些反映，先后给北京寄了三四次信。我记得，为了以防万一，第一封信没敢在上海寄，是派人到苏州寄的。

针对“四人帮”上海余党妄图发动对抗中央的武装叛乱的情况，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

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问题。会议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前往上海，接管上海党政大权。中央工作组由中央和国家各部委、人民解放军海军、北京市、江苏省派人组成，最多时有226人，加上随行人员和新闻记者，约250人左右。中央作出派工作组去上海的决定后，中央领导同志又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明确要求他们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放弃叛乱的企图，把立场转变过来，把上海的工作做好。叶剑英说：上海是大革命开始的地方，上海的人民、工人觉悟高，对“四人帮”的活动如果说以前受了蒙蔽的话，现在则应当看清楚了。你们不能再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没有前途。要站在多数人一面，把上海的事情办好。

在中央领导同志找马天水等谈话后，他们回到上海的当天，也就是10月13日下午4点钟，马天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讲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示。在会议议论中，黄涛（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发言，说就这些能把“四人帮”打倒？！经他这一煽动，会场立即闹开，有人当场叫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叛变。

10月20日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中央工作组主要成员抵达上海，住在海军上海基地。中央工作组当晚即把马天水找去，当面问他从北京回来后做了什么？现在的认识怎样？马天水结结巴巴地回答，从北京回来后，已把中央打招呼会的精神向市委常委和区县局干部作了传达，并印成文件发到基层。群众都起来了，冲击市委，我们已难于工作，现在中央工作组来了，我们就好办了，我们保证服从你们的领导。苏振华对马天水说，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过去你们在“四人帮”的泥坑里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上海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改组上海市的领导班子，中央的通知是：为了加强对上海的领导，中央决定苏振华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同志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在收到中央的通知后，中央工作组按照当时重大事件要组织群众祝贺报喜活动的惯例，决定组织上海市群众祝贺报喜活动，并派我找市委商量落实。我当即从工作组的住地延安饭店到康平路市委书记办公大院直接找到马天水，我对他说了中央的通知和工作组的意见，请市委、市革委会部署通知，接待祝贺地点定在外滩市革委会办公大楼，有关祝贺报喜和群众的游行顺序、交通指挥等，要一并作出妥善安排。马天水表示立即照办。在谈完正事我要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他追着问我，你什么时候离开国家计委的？现在是不是在中央办公厅？我说我现在不是在上海吗？他说，我是问你的工作单位？我还是说我就在上海嘛！他不再追问了。过去为了上海引进成套石油化纤设备安排在上海的事，他在京西宾馆开会时曾找过我；1975年10月，我携带李先念的亲笔介绍信，去上海石化总厂检查工程质量，也同他有过接触，他误以为我在国家计委工作。

10月27日，市委召开区县干部会议，传达中央通知，苏振华讲话，我坐在主席台的第二排位置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个书记也坐在主席台上的最后一排位置，马天水正好坐在我的身后。当天的会上已经有许多同志站出来揭批“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其中以张承宗的发言揭发最为尖锐。张承宗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市副市长，曾经担任过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并长期负责统战工作。他在会上揭发说，马天水曾经让工厂突击生产几万副手铐，他质问马天水：你要赶做这几万副手铐，要干什么？你要铐谁呀？谁让你这么干的？张承宗把这个问题一端出来，马天水顿时惊慌失措，没办法回答，也不敢回答。因为当时会议上围绕着武装叛乱、篡党夺权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斗争的气氛极为紧张。

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后，在新上海市委的领导下，以清查武装叛乱为突破口，揭发批判和清查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的罪行，夺回了“四人帮”及其余党把持的党政大权，“既搞清了问题，又稳定了局势”。到1977年底，全市各委办、各区县在发动群众、广泛深入揭发“四人帮”及其余党罪行的基础上，查清了全市需要查清的事件300多起，其中全市性的与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重大事件12起。这些事件都得到了认真处

理。在揭、批、查斗争中查出的重大事件，被写进中央关于“四人帮”三批罪证材料的有98件，向审判林彪、“四人帮”集团案特别法庭提供证据174件。后来严佑民在市委常委会上传达彭真的意见时说：彭真讲，上海对“四人帮”的揭、批、查斗争是彻底的，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上海提供的罪证材料占三分之一。

197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马天水离职审查。1978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被正式逮捕。在羁押、审查过程中，马天水态度不好，不肯交代“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要害问题。后来随着审查的深入，马天水精神失常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直至确诊为精神病（属偏执型），按照法律规定，不予审判、收监。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

“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1978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以追究。”之后，马天水在河北老家的弟弟提出把他领回赡养。上海市委经请示中央同意后，批准了他弟弟的请求，让其把马天水领回河北老家赡养。1988年，马天水病故。